

陈独秀社会主义思想学术研讨会

论

文

集

安庆市陈独秀学术研究会 编印
二〇〇八年五月

目 录

论陈独秀社会主义思想

陈独秀：一位勇于探索、终生不渝的社会主义先行者.....	叶尚志(1)
建党前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盖 军(10)
陈独秀对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探索	杨熙曼(15)
陈独秀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	聂皖辉(24)
陈独秀“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思想初探	叶 庆(28)
二十世纪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孙中山、陈独秀、毛泽东的异同	沈 寂(33)
陈独秀对社会主义与民族解放问题的见解	
——读陈独秀的《被压迫民族之前途》有感	姚金果(43)
堪称远见卓识的“最后见解”	
——陈独秀晚年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思考	孙其明(47)
陈独秀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层困局	冉占国(54)
浅议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思想	奚金芳(59)
陈独秀与中国社会主义	李淑嫒(62)
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变化轨迹	祝 彦(69)
晚年陈独秀对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探析	张 雷(74)
陈独秀晚年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想	钱让能(77)
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是对中国行向社会主义途径的探索	佟英明(81)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之我见	李 颖(93)
陈独秀的扩大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	
——兼谈陈独秀是不是“民主社会主义”者	陈 辽(97)
锐意进取 执着追求	
——陈独秀与社会主义.....	黄 河(100)
从自由主义到社会主义.....	何卓恩(111)
陈独秀与社会主义.....	陈镜林(124)
陈独秀对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认识和反思.....	黄公演(132)
晚年陈独秀是怎样坚持马克思社会主义信仰的.....	高国发 张 同(137)

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思想的论述..... 李银德(141)

其 它 论 文

评八七会议对陈独秀的处理与批判..... 郭德宏(159)

简论陈独秀晚年民主观..... 贾立臣(163)

应该宣传和学习“独秀精神”..... 王福湘(169)

陈独秀宗教观的变迁轨迹..... 张洪波(172)

陈独秀是不宽容的代表吗？

——兼评胡适《容忍与自由》..... 靳树鹏(176)

试述陈独秀等中共三大代表在广州春园的重要活动..... 卜穗文(179)

朱蕴山与陈独秀..... 徐承伦(181)

《新青年》三个字的金字招牌

——《新青年》的经营与传播策略..... 石钟扬(187)

还一个真实的陈独秀..... 李衍增(201)

陈独秀：江淮地域人精神的一面镜子 龚 武(206)

不能忘记陈独秀..... 黄学诗(211)

试论陈独秀的武装斗争..... 彭劲秀(213)

身处艰难气若虹

——陈独秀晚年的理论创新..... 黎 化(218)

浅谈陈独秀、托洛茨基与中国革命 陈良初(225)

陈独秀出狱后就抗战等三问题与托派同志们的争论..... 曹家骢 叶春华(231)

论陈独秀的妇女人权思想..... 谢一彪 欧阳云梓(243)

陈独秀学习与研究精神刍议..... 喻国良 罗孟冬 陈晓南(249)

从日本看对陈独秀的评价

——陈独秀既不是右倾，也不是“左倾” 横山宏章(251)

论陈独秀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影响

——兼论陈独秀何以当选“一大”中央局书记..... 董根明(257)

被湮没的陈独秀伟大思想光辉..... 常 征(262)

秉笔直书写伟人 敢当华夏太史公

——从写《胡耀邦传》想到写《陈独秀正传》..... 陈利明(264)

陈独秀先生还需要平反吗？ 刘焕明 侯 玉(269)

陈独秀：一位勇于探索、终生不渝的 社会主义先行者

——为安庆召开《陈独秀与社会主义》研讨会而作

叶 尚 志

一

关于陈独秀先生，改革开放以来打破禁区，开展研究，人才辈出，著述充栋，硕果累累。对陈独秀先生的各个方面，乃至对他一生、全面经历、整体评价，都有不少美文、卓见，虽不能说他在全社会广为人知，但在报刊传媒上、在文化、学术、理论界、党内外，确已广泛流传，今非昔比。

这次研讨会主题是陈独秀先生与社会主义，我认为突出研讨这个主题很有意义。这既可以重点突出，把陈先生对社会主义的观点、见识的历史脉络深入加以剖析，可以进一步加深对他的认识、理解；也可以对当前我国、乃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陈先生这一历史角度的发展脉络来加深研究。毕竟，社会主义是一庞然大物，博大精深，它是动态的、发展的，对它的认识还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对社会主义，我国研究了近百年，至党的十七大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社会主义理论宝库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意义重大。但谁也不能说，对社会主义的研究达到了顶峰，到此为止；更不可认为研究社会主义学说理论是少数人的专利，可以垄断。就这个意义来说，我们研究陈独秀先生与社会主义，可以鉴古而知今，了解他是从什么基础、什么角度来理解、接受社会主义，并为之奋斗、终生不渝，这对我们加深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会有所启发，有所教益。

坦白地说，我虽然与陈独秀先生是同乡，但在改革开放之前对他是无知的。我是在“牛棚”处境中看到了他在南京监狱里写的56首《金粉泪》，才引起注意，促使我对这位安庆同乡、前辈加以了解、探究。加之从“牛棚”出来后，我对政治和历史比从前有了许多不同的感受，又幸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许多框框、禁区被打破，接触到的研究资料日渐丰富，为求知欲和历史责任感所驱使，我积极参加了京沪皖苏陈研会，在交流研讨中受到许多启发、教益，也写过不少拙文参加讨论。

我过去写的文章冗杂、肤浅，这次想就陈独秀与社会主义问题作些探讨，但他的著作浩繁，已出版的总约有近二千万字，加上他的一生行状大部分与社会主义有关，贯穿其间，需要专家作专门深入研究。我只能将一些片断观感联系起来，作一些观察，谈不上系统论述。

二

陈独秀从少年便立志为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谋求解放，是一位以天下为己任，以身许国、无私无畏的爱国者、革命家。他的特性是眼界开阔、心存高远，不以眼前成就为满足，是一位不怕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不断革命的思想家、实干家。

陈独秀成长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他的政治觉醒和投入政治活动较早。对他少年时代刺激最深的是甲午战败和清廷腐朽，在我国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那时十六岁的他，从直感自然产生反帝、反封建的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思想。他从安庆到南京、经上海、五渡东洋，得到大量的、深刻的启示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之所以强盛，是由于工业发达、科学昌明，民主政体所使然。他最初的政治启蒙与孙中山走的道路不约而同。所不同的是因为眼见辛亥革命不彻底，没有根本解决问题，所以他接下来一门心思致力于新文化启蒙运动，特别强调民主与科学，这仍属于民主主义革命范畴。

从陈独秀推翻清政府到反对旧礼教等一系列实践来看，他是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这是他日后迅速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并身体力行、贯彻始终的思想基础。与他同时代和后来的几代人，差不多都是从激进民主主义这一思想和实践基础上转入社会主义轨道，而且都是在国内外先受过儒学教养后受过西学教育、先

走上民主主义道路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没有一人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这是我国社会主义者思想与实践的一条共同发展轨迹,可以说是一条共同的规律。而陈独秀与众不同的一点是,他政治上早熟,比较敏锐,知而后行,言行一致,敢做敢为,果断坚毅。如果说孙中山是我国民主主义的先行者,那么陈独秀既是我国民主主义的先行者,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先行者。

陈独秀以反清救国起步,从未停止革命实践。从1915年起,他创办了《新青年》杂志。正当他大力鼓吹科学与民主、带头推进新文化启蒙运动之际,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传到了我国,他立即接受,衷心赞成、全力实践以俄为师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这一点与欧洲、俄国的社会主义者有所不同:欧洲、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往往经过一段或短或长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熏陶或研究,在投入革命实践之前大都有比较系统的理论准备;而我国大都没有充分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准备,即投入热烈紧张的革命实践,边干边学。社会主义运动160年来一直在持续、曲折中前进,有很大发展,方兴未艾,今非昔比;但也避免不了“左”倾、右倾、空想、盲动、教条主义等重大错误。但中国共产党有一条优点,这就是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之后,一开始便从不脱离革命实践,在不断革命过程中,英勇牺牲、艰苦卓绝,获得实实在在的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和教训。这一点为西方许多无产阶级政党所钦佩。

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和中国的陈独秀,他俩在政治生涯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在上述优缺点的表现上二人不同:前者流亡国外,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著述三十七年才回国;后者接受社会主义理论后立即投入实际斗争。这种反差的形成,原因既在于两者个人的条件和所处的环境有别,也反映了俄国和中国都并非处于马克思主义所论述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社会条件。中国的这一特点又比俄国更加突出。历史证明,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更加艰难,更加长期,决非一两代人便可大体完成并达到比较成熟的阶段。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比较完备体系的形成,硬是要经过几十年的峥嵘、曲折、艰难探索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从邓小平复出,率领全党提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功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到党的十七大得以继承、发展,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之不易。充分说明在经济文化发展滞后的国度探索社会主义之艰难。

三

综上所述,我们就容易理解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党内出现的分歧和走过的弯路有一定的历史和社会的必然性,是难以避免的。

虽然如此,我对陈独秀先生探索我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经历,还是感到由衷钦佩。陈独秀艰险、峥嵘、跌宕、曲折的一生,表明他是一位从炽烈的爱国主义者到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又到勇于实践、至死不变的社会主义者;是一位最早从中国历史特点出发,睿智、敏锐、触及问题实质,较少教条主义束缚,具有卓越见解的社会主义先行者。

1、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我国建党之前,直接影响陈独秀的有: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同龄人、日本马克思主义先驱河上肇;北大同事、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先行者李大钊;共产国际派到中国联络的维经斯基(即伍廷康)。陈独秀从中国革命的迫切需要出发,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并在加紧探索的过程中身体力行。五四运动当年出狱后,他与李大钊在化装离京的马车上商量组党,二人一拍即合,这是他必然的选择。其间,全国研究社会主义学说兴盛;北京大学领风气之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会。陈独秀利用各种场合,写文、演说,对社会主义学说作过大量宣传。这从他当时的文著可以证明。1920年法国著名思想左倾学者罗素来华讲学,陈独秀曾因该学者未能着重阐述社会主义学说发表声明表示遗憾,借机宣扬了社会主义。可见他对社会主义学说求索、弘扬之忱。

2、建党之前一年即1920年,陈独秀已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小组),由这个小组联络、推动了北京、山东、湖南、湖北和法国、日本等地党组织的建立。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陈独秀在广州因故无法抽身,只能派包惠僧代表他参加。1922年7月他参加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海成都路),主导制定、通过了一系列重要决议,尤其是确定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方针:第一步实行民主革命,推翻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互

相利用、勾结的反动统治；第二步今后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此次大会之前，陈独秀参考了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革命党派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列宁制定《民族和殖民地纲领》的精神；当年11月他到莫斯科参加了第三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起草《东方问题总提纲》，撰写了《中国共产党目前的策略》供大会各国参考（参见《陈独秀大传》294、300页）。他深入领会列宁主导下殖民地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二者息息相关、命运与共；但东方与西方国家革命性质不同，对与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关系，既要合作，又要保持独立性，阐述明确。他忠实地贯彻了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纲领，促使中国党避免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照搬《共产党宣言》，剥夺资本家财产、废除私有制等等教条、空想，回归于中国社会实际和历史特点。这实际上是为日后《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著）奠定了理论基石，是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革命理论打下基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意义重大、深远。

3、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关于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即民主革命的性质，从理论上来说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观点更加明确。会议正式决定按二十一项条件加入共产国际。并通过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确立了与国民党的合作关系，实质上是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关系。这种关系本应该是既有联合又有斗争，以坚持无产阶级政党政治上的独立性。这正是从科学社会主义宗旨出发必须坚守的原则。从陈独秀由始至终的大量言行，可见他是深谙这一理论原则的。然而通过大量的史实，不能不承认中国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在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违反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在指导思想上右倾，处处依靠国民党，忽视共产党的作用，把中共视为苦力、当作附庸；坚持实行与国民党党内合作，放弃领导权，武装蒋介石，拒绝军援中共，把枪交给国民党等等。以前，这些历史是非无法澄清。现在，公开的大量文献资料表明，陈独秀始终主张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要争领导权，主张与国民党只能党外合作，最先主张共产党要掌握武装。而斯大林主张武装革命指的是武装国民党；两者的立足点不同。大革命期间，陈曾在上述许多重大问题坚持了正确立场，对共产国际有抵制，但终被否决。因中共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受其高度集中领导的纪律约束，陈被迫不得不执行过某些右倾错误政策。当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不但不承担任何错误指导的责任，反而把导致大革命惨败的错误责任强加在陈独秀头上，把他作为替罪羊，他始终不服。李立三在《党内报告》中回忆这一段党的历史时毫不讳言：“国际为挽救威信，牺牲了他（陈独秀）。”（《陈独秀大传》442页）

4、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是一般的学术成果，它一产生便与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成为行动的指南。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已从指导各国一般的工人运动，进而指导胜利了的俄国，并以俄国为中心指导世界各国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当时的历史实践，早已跨越了社会主义运动初期的启蒙和宣传阶段。鉴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立场是否坚定、正确，不在于是否善于理论的说教、口头的原则性，而在于对实际运动和革命斗争的看法和问题解决得是否正确、有效，必须以实践的结果来加以检验。中国大革命是当时世界所有社会主义者关心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在东方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一个重要战场。中国大革命失败，也就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一个重要部分的失败；它反过来检验共产国际这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总部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有哪些错误、经验与教训。历史检验表明，当时共产国际内部对此存在尖锐的分歧，最终斯大林的观点占了上风，坚持了原来的错误，没有得出正确的结论，导致中国大革命失败；乃至一错再错，后来又接连三次“左”倾，致使中国革命连遭不幸、损失惨重，几乎断送了革命前程；直到红军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纠正了王明第三次“左”倾、实际上也是抵制了共产国际的错误这一前提下，才扭转了局势，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走上正确的道路。历史检验也表明，陈独秀1929年被开除党籍之前，曾经抵制共产国际前右后“左”、有“左”有右的错误；他所说“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陈独秀大传》442页），是一项带根本性的经验总结、至理名言。

当然，这并不否认陈独秀出党之前、之后也有错误。任何杰出、伟大人物，都是人，而不是神，陈独秀也不例外；干无产阶级革命这一史无前例的伟业，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但客观公平地说，陈独秀在大革命期间，毕竟是经历了30年左右政治风云、见多识广的革命老将；当时党内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在政治水平上未有出其右者，不少人与他不在一个档次上。他既具备敢于坚持原则立场和求真务实、无私无畏的精神，有一

种坚忍不拔的硬骨头品格,也勇于面对实际,承认错误,光明正大,从来不搞阴谋诡计。如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检讨,是真诚、实在的,没有文过饰非,回避错误和责任。纵观当时全局和陈的根本表现,应该承认他在失败、挫折面前,仍是一位铁骨铮铮的社会主义者。

5、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仅俄国人,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也都认为俄国是当时世界革命的中心、总指挥部。这个中心、总指挥部应该担负什么责任?应该如何发挥作用?它的经验教训是什么?这些都是复杂的历史问题,至今都无权威性的论断,显然是一项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在列宁建立了共产国际和他逝世后,这个中心仍然存在,但内部的斗争变得相当尖锐,涉及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也涉及指导各国社会主义运动与革命斗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仅就俄国内部斗争的结果来看,列宁逝世后,由斯大林执政开始,到斯大林逝世后,又延续了几代人,直到前苏联解体,这一段长约66年的历史时期,其功过、是非、成败,后人应该评价。关于以俄国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指挥中心的问题现代人很难理解,即使当时的人,不论局内或局外,如果不掌握丰富的内部资料、不经深入研究,很难窥其全豹、触及内核和真谛。

前苏联解体后,许多问题暴露得明若观火,才可以逐步得出某些共识;而陈独秀生前便对这些问题却早有过卓见和预言。这证明他敢为人先、出语惊人,是一位了不起的具有博大胸怀、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从大革命问题的切身体会中,凭直感早就认识到斯大林的领导存在问题,并进一步认识到,这不仅仅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而是制度问题;斯大林的出现具有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

共产国际指挥如此广大、异常复杂、无比艰巨的世界革命,高度集中,包办代替,包打天下,这样能把事情办好吗?共产国际的后台就是俄共、联共,对不同意见不是疏导、宽容、择善而从,正确实行集体领导、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而实际上是实行领袖独断专行的独裁制。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尤其是失败后,对共产国际的存在和工作制度早就质疑,倾向于否定。共产国际在不经任何民主、申辩程序革除他的职务之后,两次邀他前往莫斯科讨论大革命和他的问题,都被他拒绝,并质问:“托洛斯基早已预言这种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必然遭到的结果,已经一步一步由事实证明出来了……其他和你们政治意见不同的大批同志都被监禁和流放,现在又要从中国调我到莫斯科说是专门解决我的问题,我实不知你们又打算干什么?”(1930年2月《致国际的信》,《陈独秀著作选》下简称《陈选》第162页)陈独秀并不是傻瓜,他是一位久经磨炼的革命老将,政治异常敏感,又极具傲骨、自尊性格,他怎么会去负荆请罪、引颈受戮呢?怎么可能到那里去讨回公道呢?

当时陈独秀所经受的一切,导致他与莫斯科、也与他缔造的中国共产党分道扬镳。他之所以出党是因为分歧无法调和,这个结局无法避免。此时正处于蒋介石十年剿共、白色恐怖时期,陈独秀处在一种极其尴尬、矛盾、困难的境地。他转入地下,一面反蒋、抗日,反国民党剿共、屠杀工农;一面囿于托派另有一套,闭塞、局限,不了解农村的斗争,与我党隔膜,政治主张分歧,有错误。他在狱中五年,表现却非凡的英勇、坚毅,在敌人面前从不屈服;他在法庭上的《辩诉状》(《陈选》第三卷315页)充分表明,他总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尖锐抨击国民党,维护革命和社会主义原则,义正词严,浩气凛然,大节可赞可佩。这一时期陈独秀的言行,应该说坚持了社会主义的一贯信念。直到晚年,他贫病交加,孤处江津,在那种二次大战战火燃烧、法西斯阴魂笼罩全球、兽蹄践踏中国大地的险恶环境中,仍没有放弃自己一贯的信念,终生为社会主义而探索、思考、鼓呼,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在南京狱中有一段赠刘海粟的题字“黄山孤松,不孤而孤,孤而不孤。孤与不孤,各有其境,各有其图”,另书一副对联赠刘:“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正是他的精神写照。

四

陈独秀为祖国,为中国人民,为推翻腐朽透顶的清王朝,为新文化,为民主与科学,为唤醒国人而鼓呼;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与对民主主义的信念同样,不是从概念出发,从理论到理论,而是从实际出发,从具体行动上表现出来。他缔造无产阶级政党,为民主革命夙兴夜寐,无私无畏,抛家献子,牺牲奋斗。即使投入托派,陷入牢狱,也没有放弃针锋相对与蒋介石反动统治进行斗争。晚年带病出狱,仍以全力支持抗战,并

没有消沉；仍然不间断地思考、探索二次大战、国际形势，人民的命运、革命的趋向，儿童的教育，民族的解放，人类的前途；虽身患高血压常致晕眩，仍奋笔直书，写成许多文著，对抗日战争、国际形势，总是联系社会主义前途，不乏卓见，极甚珍贵。

陈独秀关于抗日战争的言论甚多，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从甲午战争、五四运动开始，他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的态度一贯非常激烈、非常鲜明。1931年“9·18”事变之后，全国抗日运动高涨；他曾提出反蒋抗日、赤化中国纲领，希望与我党合作抗日，却受到王明极左路线的抵制。七·七全面抗战爆发，他自南京坐狱五年获释之始，便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之意见》，《陈选》第三卷）；“有世界革命意义”（见《宇宙风》杂志）。他在答《抗战》周刊记者问时说：“现在的抗日运动，就是政治运动，我能不参加抗日运动么？”有《大公报》记者曾问他是不是打算参加政府里的行政工作，他说：“这与我并不大相宜……我最怕被政府里的实际工作缠住，没有清醒的头脑观察政治局势。换言之，我的个性不大适宜于做官，但是政治运动则每个人都应该参加的。”（《陈选》第三卷404页）

陈独秀还认为，抗战是为发展民族工业扫清障碍，“以推翻帝国主义者所加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障碍为此次抗日战争之最终目的”（《我对抗战的意见》，《陈选》第三卷460页）。他认为抗战应该发动群众，自力更生，不可一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抗战，一面对英、美帝国主义摇尾乞怜；这并不是说拒绝别国现实的帮助，而是不可完全依靠外援。他认为敌强我弱，抗战必定是持久的，“要抗战到底”，“不可幻想能够速成”；日军虽装备优良，但兵力有限，最终必然失败。在抗战初期面对悲观失望情绪，陈独秀说道：“我们不要害怕各色黑暗势力笼罩着全世界，在黑暗营垒中，迟早会放出一线曙光，终于照耀大地。只要我们有自信力，不肯附和、屈服、投降于黑暗……我们断然有救。”（《我们断然有救》，《陈选》第三卷480页）

基于上述见解，陈独秀主张利用一切条件，即使战时也要发展民族工业。“不要害怕资本主义。我们不要学唯名主义者，一听到社会主义便肃然起敬，一听到资本主义便畏之如蛇蝎、厌之如粪蛆。”“资本主义工业虽然要造成滔天罪恶，同时却创造了较高的生产力”，“带来它所需要的民主制度”，“扫荡了旧社会各方面的落后性，奠定了将来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是人类进化途中一次大跃进”。资本主义能够扫荡封建主义更反动、落后、残暴的势力和影响。资本主义终于要由社会主义来代替，才能扫除它的罪恶。“我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的过程，要来的东西让它快点来，不要害怕它。”他从社会主义、唯物史观出发，主张在战时发展资本主义作为过渡，迎接将来的发展。他引证列宁所说，认为“俄国工人阶级吃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而不是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在中国更是如此”。又说：“人类进化有两种形式：一是循序的进化，一是跳跃的进化……而跳跃的进化则大半由于外界的影响。”工业化亦然。将来要搞社会主义，如果没有工业，没有工人阶级的发展，怎么可能呢？“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具备经济上成熟、政治上成熟这两个基本条件，缺一不可、否则就是空中楼阁，只能是乌托邦、幻想（参见《陈选》第三卷491、497、519页）。

在战时极端困难的条件和晚年贫病交加的情况下，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的思考仍能达到这样的地步，如果不是学养有素、信仰坚定、深谙国情，是不可能讲出这一番道理来的。

五

抗战开始，陈独秀出狱后，1937年11月20日延安《解放周报》曾载文，庆幸陈独秀先生出狱恢复了自由，希望他“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李锐所著《庐山会议纪实》一书透露，在批斗彭德怀同志的一次小会上，刘少奇曾插话：“陈独秀抗战初期曾要求回到延安来（注：另据报道，陈自己没有提出要求），如来，看到革命胜利，也可能改。”毛泽东接着说：“他后来去世，那个责任在我，我没有把他接来。”据改革开放后的许多报道，陈独秀从南京出狱后，曾与叶剑英、博古、董必武友好会面；叶事后说：“关于合作抗日问题谈得很融洽。”陈与叶谈话时曾声明“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意为任何党派所拘束”（《致新华日报》，《陈选》第三卷469页）。有一位罗汉先生在南京和西安两地穿梭，联系陈回到延安，但因大雨路阻，罗汉未能到达延安，只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林伯渠转达信息。

延安由洛甫、毛泽东署名复信；陈对要他认错、检讨一条，不愿表态，因此没有达成协议。据悉，罗汉牵线搭桥确有其事，但陈自己并未要求回到延安，罗汉只是个人行为，应当是事实。客观看来，陈与党中央有太多恩怨、隔膜不计，实质上是与共产国际、联共隔阂太深，分歧更加不可调和；何况当时斯大林在世，共产国际仍然存在，政治上难于消除距离。因此，合理的判断是，按陈的性格，他不可能要求回到延安。

更有甚者，1937年11月王明、康生从苏联回到延安，下车伊始，便秉承莫斯科意志，变本加厉，大批大反陈独秀，摆出了势不两立的架势。接着，王明任长江局书记，常驻武汉，成为与蒋介石谈判的头号代表，在国统区红极一时；他和康生对陈独秀造谣诬蔑无所不用其极，炮制陈接受日寇每月三百元津贴，是汉奸、间谍、托匪一文，公开发表，不仅在国统区，而且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混淆视听、造成影响。此文虽蒙蔽对陈缺乏了解的军民于一时，但瞒不过国统区不少老一辈知陈者，包括许多著名人物；于是数十名人士联名发表声明，谴责王明、康生在抗战后方造谣生事、破坏团结抗战。陈独秀对此灭顶的中伤当然不愿沉默，于是在大报上声明辟谣；还考虑过要向法院起诉。这是1938年新春发生在武汉的事件，此事由周恩来同志调处，通过徐特立派人劝陈“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陈照顾抗战大局，没有起诉。王明、康生的嘴脸为识者所不齿，政治如此作为，叫人如何评说呢？由此推想，陈独秀更加不会有去延安的念头了。

此后，日寇猖狂进犯，武汉眼看不保，当局迁都重庆。陈独秀先生带着一身伤病和中伤，流亡江津。他在寄人篱下、横遭白眼、身处逆境的情况下，仍以全副精力投身抗战，为世界形势、祖国命运费心、操觚，写出大量政论宏文。字里行间贯穿了他执着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一贯的社会主义信念。他的文字，既针对面临的现实问题，有感沉思而发，又非就事论事，总能超越眼前，看到大局，想到将来。这只有富于远大理想又具有史学、哲学、文化素养的人，才能做到。

1、陈独秀以自己掌握的各国丰富史料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反复阐述民主与科学和社会主义及其相互关系，有不少精辟、独到、深刻的见解；他是一位至死不变的彻底民主主义者，这正是他的思想之所以自然而然地转入社会主义的基础。他说：“政治上的民主与经济上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没有民主做官僚制的消毒剂，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官僚政权……决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只有科学昌明才有工业和现代化，才有社会主义，否则都无从谈起。

陈独秀认为，“民主主义制度，远在氏族社会就发生了，其精义即大众管理大众的事，那时国家制度还未发生……一切决于‘民会’（如希腊、罗马）。所以后来资产阶级无论在欧洲或亚洲，都……拿民主主义做他们反对君主或贵族的旗帜。”也是“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对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

他又说：“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指古代的民主制）要丰富得多，实施的范围也广大得多……我们称之为资产阶级民主，其实此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

“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

他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名词，有它的具体内容，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宽狭而已”。无产阶级民主即社会主义民主，是多数人的民主，是大众的民主，自然要比资产阶级民主广泛得多。“我认为：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在国内外恶势力双重压迫下的工人贫农一切劳苦大众，他们对实现民主政治的要求，比任何人都迫切。”他认为国民党当局、军阀、封建反动统治最怕民主政治。进一步论述“中国的资产阶级太落后了，不但害怕‘真’的民主政治，并且害怕像欧美各国的‘伪’民主即形式民主”。这便是我国反民主传统特别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

陈独秀还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应该强调民主，防止权力腐败。“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足够镇压资产阶级反革命，用不着拿独裁来代替民主。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列宁当时也曾经警觉到‘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而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后来才想到……

然而太晚了。”至于苏俄政权性质的演变，陈认为其根源是只讲专政不讲民主，其实是专制、独裁，根本上与社会主义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原理背道而驰，表明其政权变质，是历史的倒退。

本节以上引证都是陈独秀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初，包括他在逝世之前不久的言论（《陈选》第三卷283、285、553、554、555、559、560页）。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演变，苏联终于解体，不幸被他言中；这是社会主义运动一大挫折，也表明陈独秀作为一位社会主义信念坚定不移的先驱，其洞察预见之犀利。他当初既非杞人忧天，亦非幸灾乐祸，而是胸怀人民，对历史唯物主义执着信仰，石破天惊、敢言人之不敢言的一种先觉、良知的表达。

2、陈独秀是一位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他对党派问题思想解放，与他的自由思想、独立意志、奔放性格是一脉相承的。他在大革命失败后激烈抨击国民党日渐走上反动独裁的文章中，曾引证国民党右派张继“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是国民党人一致主张”的话，实为蒋介石日后大肆宣扬“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谬论之滥觞，严加驳斥。接着陈又说：“一国之中，各阶级各团体的利害与政见不尽相同，各就所同结党议政，这是人权之一。专制帝王之下，尚不能禁止王党之下复有民党；国民党主张‘党外无党’，是谓横霸；党内有派，是世界各国大党所不免。”所以毛泽东在“文革”开始亦讲：“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其实这句话陈独秀早在大革命失败后所作的一首四言诗中便已发表，广为人知。两者所处的历史条件、针对的对象和涵义却不相同。蒋介石的专制反动统治早已垮台，不必多费笔墨。陈独秀八十年前的这些话，也有力地说明俄共之有托洛斯基派、斯大林派之分，并不稀奇；稀奇的倒是俄共与共产国际对待内部的分歧采取的解决方法，过于粗暴、残酷，不利于分清是非、加强团结；不利于共同事业的推进。更不幸的是这一解决内部分歧的方式扩大化，发展成以流放、残杀，来对待国内和国际的革命人士，违反了起码的民主原则、文明传统，毫无社会主义气味可言；其后果不堪设想，乃是前苏联瓦解的一大原因，成为千古教训。能不沉思、彻悟么！？

3、1938年3月陈独秀在《致新华日报》说：“从前我因反对盲动政策，被以取消主义而开除，此全世界周知的事。”（《陈选》第三卷469页）他在1940年11月28日写的《我的根本意见》中认定：“现在并不是最后斗争的时代”，“无产阶级的群众，不会在任何时间都倾向革命。”根据近期中外经验，“使我们不能把无产阶级力量估计过高，使我们不能轻率宣布‘资本主义已到末日’。”“应该毫无成见地领悟苏俄二十余年来的教训，科学而非宗教地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不能一切归罪于斯大林，例如无产阶级政权之下民主制的问题。”

“希特勒纳粹党徒，企图以其统治德国的野蛮黑暗的办法统治全世界……使世界只许有它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不容许任何异己之存在……希特勒党徒之胜利，使全世界窒息，将使全人类有思想脑神经有自由意志的人，变为无思想脑神经无自由意志的牛马器械。所以全世界……有良心的进步分子……都应该以消灭希特勒的纳粹党徒为各民族共同进攻的总目标……才有进步意义。因为（如果）希特勒胜利，甚么社会主义，甚么民主主义，甚么民族解放，一切都无从谈起。”“帝国主义以殖民地半殖民地为存在条件，犹之资本主义制度以私有财产为存在条件。我们不能幻想资本统治不崩溃就可以取销私有财产。”（《陈选》第三卷559—563页）

以上言简意赅，是他以一生的学养、体念为基础，发出的与社会主义有关的重要论断。

4、他在同年9月致友人胡秋原等之函称：“弟自来立论，喜根据历史及现时之事变发展，而不喜空谈主义，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以为立论之前提，此种‘圣言量’的办法，乃宗教之武器，而非科学之武器也。”“‘圈子’即是‘教派’，‘正统’即中国宋儒所谓‘道统’，此等素与弟胃口不合。故而见得孔教道理不对处，便反对孔教；见得第三国际道理不对处，便反对它，对第四国际、第五国际、第……国际亦然。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反对派’，实是如此，然非弟故意如此，乃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也。”迷信与成见，均经不起事变之实验及时间之淘汰，弟两不取之。”（《陈选》第三卷567页）

这几段话，可以窥见陈独秀治学、格物、致知的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立场，和只认真理，不受任何羁绊的辩证科学方法，是他不同于常规、流俗，而获得卓见的奥秘，是理解他为人处事的一把钥匙。这一点对

于他成为一位坚持信念的思想家、革命家和终生不渝、至死不变的社会主义者非常重要。

六

陈独秀是历史人物,应该将他为社会主义执着信仰、终身奋斗的轨迹,放在我国人民为社会主义宏伟事业奋斗、改变历史、振兴中华、艰难、曲折的特定历史中来看待。在研究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史时,无论如何都应饮水思源,不能撇开这位在我国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行者;应该按照毛泽东在1942年2月所说“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讲他(陈独秀)的功劳”。也要按照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所说“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要加强对陈独秀问题的学术研究,逐步恢复历史的原貌”。时至今日已有很大进展;但距上述要求还有一段距离,“事业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当初陈独秀投身革命、推翻旧制、革新社会、追求真理的那个时代,是个什么状况呢?他是在前人探索振兴中华屡遭失败的情况下,苦思冥想,踏着民主主义的轨迹,毫无保留地接受社会主义思想,背着黑暗,朝着曙光,擎起火把,扛起旗帜,无私无畏,勇打头阵,带领民众顶着旧社会凶恶、腐朽势力,向着新社会的光明奋进。他由民主主义转入社会主义是顺理成章,非常自然,没有经过曲折弯路。在广大人民为后盾热烈参与下,使他从事的革命事业,像万顷波涛海浪,汹涌奔腾,势不可挡,取得划时代的发展,推动了历史大踏步前进。他为人民所拥护,如日中天。这便是从新文化启蒙运动、到五四之后,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一部分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起步阶段的情形。

陈终身所追求的社会主义事业,与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是联结在一起的。他的政治生命与大革命的兴衰息息相关。客观地、历史地来看,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从党建立到大革命兴起,都得到了共产国际帮助。但共产国际对大革命的指导,从对国民党的依靠和武装上的援助,到对蒋介石在先、汪精卫在后的扶持,都从根本上犯了右倾错误,是导致大革命的惨败、又把责任推到陈独秀身上加以贬斥,错上加错的主要原因。显然这一段历史的导演者是共产国际,“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历史演变是各种复杂因素的错综交叉起作用形成的客观事物。相隔八十年,我们现在只能从当时的各种主客观条件出发进行研究。历史是既成的事实,是不能重复的,也是不能假设的;但是从当时的实际条件出发,历史其实也曾经有可能向另一种状态演变。例如,如果共产国际不是斯大林在俄共分歧中掌权后不依靠中国人民、不依靠猛烈发展的中国共产党,单纯依靠国民党并对其一味退让、武装援助,从而把蒋介石养肥,推行了一套实用主义、眼光短浅的右倾政策;那么,正如陈独秀事后评价“我们也可以假定,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中,如果中国党采用了‘不断革命’(注:他认为正确)的战略,谁也不能够武断说无产阶级绝对不能取得政权”(《陈选》第三卷334页)。又如,大革命失败已成定局,不可挽回,如果这时共产国际采用的是民主制,不是专制命令、听不得不同意见,而是真诚谦虚地听取批评、建议,多尊重一点当事人陈独秀一再申述、建议的意见,认真检查,总结经验,接受教训,改弦更张;如果不谄过于人,不采取惩办主义,不是未经任何民主程序就缺席批判、排斥陈独秀,而是恰当处理;结果也会大不相同。但历史与人们良好的愿望背道而驰,迫使革命家陈独秀走上另一条道路。

由于托洛斯基不同意斯大林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大体符合中国大革命的实际,比较正确;陈独秀只认真理,不顾托洛斯基已被驱逐出境,流亡土耳其,也不顾共产国际组织纪律约束,坚持意见,投入托派。这便踩过了当时共产国际的底线,矛盾不可调和,导致陈被开除党籍。事情的实质是政治的是非,组织纪律并不是主要问题。共产国际根本不可能采取解决政治分歧的正常办法,而是动用组织手段,导致后来的结局不可避免。这只能以历史的局限性来解释,当时谈不上能够分清是非。现在评论,应该跳出八十年前的框框,探讨问题的实质。陈独秀这位杰出的革命家遭受到本来完全应该避免的挫折和不幸,是一场悲剧。如果陈独秀仍在党内工作,中国革命、中国社会又将是一番什么光景呢?这是不可逆睹的。

纵观陈独秀一生,可以说他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中国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涌现出的一位光辉、杰出、难得的人物,前无古人,后鲜来者。把他作为中华优秀子孙、伟大英雄人物,谅不为过。但是我们按唯物史观评论,陈独秀是人不是神,他和历史上的其他伟大人物一样,不可能没有历史的局限性。他在一生政治

生涯中,除了客观因素致使遭受艰险、跌宕、挫折之外,也不可能没有主观错误。这里不能不提到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恩与怨、合与分交织,不能不发生联系,又不可避免决裂。不言而喻,这也必然影响到他与自己缔造的中国党的关系。共产国际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不可能没有历史的局限性。列宁在世时,共产国际曾起过凝聚、发展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巨大作用。但列宁逝世后,内部斗争激烈,在内部体制、机制不健全、不合理条件下,斯大林发展了专制,排斥不同意见,对中国大革命的指导屡犯错误、坚持错误,致使陈独秀难于应付,无所适从,不可避免地跟着犯了执行上的错误,也不可避免最后的决裂。

陈独秀与托洛斯基发生关系,过去我们许多老干部感到困惑、不解;但前苏联解体,大批史料公布后,便容易理解了。这完全是大革命失败后一次历史的偶然契合。过去我们党内只知托洛斯基是负面人物,并不了解他原来是列宁的左右手,在俄共内和红军中是仅次于列宁的显赫人物。他坚持了一系列与斯大林不同的政见,不仅对俄国、对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后来在联共党内斗争中被斥于门外。中国大革命失败后,证明他的意见比斯大林正确。陈在极端困惑、苦闷的探索过程中,看到关于托的意见的一些文件,如梦初醒,非常契合,确信如按托洛斯基的意见,中国大革命决不至于导致当时的恶果。这便是他投入托所代表的第四国际的主要原因。托洛斯基原来代表俄共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派别,既拥护马克思,又拥护列宁,目的都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所不同的是与斯大林一派意见分歧,不可调和。陈独秀只认对中国革命的见解是否正确,而不顾及权势和组织纪律。但后来陈说:“中国托派是一个关门主义的小团体……假如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郑超龄晚年回忆:1935年2月陈因与托派只反蒋而不支持抗日的谬论无法调和,竟被托派开除。陈从托派的死胡同中得以脱身,终于反复声明与托派“道不同,不相为谋”,脱离关系、分道扬镳。这都成为历史;连托洛斯基及其一派和第四国际,也早已烟消云散,成为历史了。

把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论发展的轨迹,放在过去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来观察,得出的看法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他对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理解在我国应该说是早悟、深刻、站得高、看得远、眼界开阔,能联系实际、领会实质、加以运用,较少教条、空泛、狭仄、短视。第二,一旦领悟,他便身体力行,果断坚毅,无私无畏,不怕艰险,敢于承担,任劳任怨,在历经艰难、困苦、内外压力,泰山压顶、牢狱羁绊条件下,都能迎难而上,不改初衷;到了晚年,思想磨炼更加老辣,常有深入思考、惊人卓见,至可宝贵。第三,他密切关注国际、国内时局、事变,思想随客观形势发展,与时俱进,不守旧、不机械、不僵化,能够适应时代潮流前进。这正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核心和灵魂,在他的思想上已经锤炼得炉火纯青。第四,限于历史条件,他壮志未酬,赍志以殁,不能不借用古人之言以作悼念:敬君之品,赞君之识,惜君之才,悲君之遇。他晚年说:“我前半生所做的事情,似乎大半失败了,然而我不承认失败,只有自己承认失败而屈服,才是真正的最后的失败。”(《陈选》第三卷)表明他是一位至死不变的斗士,正如他在南京监狱题字:“三军可以夺帅,不可以夺志也。”他虽死犹生,精神不朽。

巨星已落,往者已矣。陈独秀早已成为历史人物,他已经尽其可能最大限度地起到了他的历史作用。假若他在历史上没有遇到意想不到的掣肘和无理的对待,假若历史能够给予他一种最低限度的便利条件,他能够发挥的主观能量和历史作用定会比已经铸造的辉煌大得无比。写到这里我不能不为这位巨星陨落感到无比惋惜,更为我中华民族的厄运而悲怆莫名。假如陈独秀能活着看到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假如他能看到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浩劫;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推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取得当今如此辉煌的成就;他难道不会开怀大笑、欢欣鼓舞吗?

建党前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中共中央党校 盖 军

本文阐述的几个问题,是从1915年9月至1920年5月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这个阶段陈独秀认识社会主义,有一个这样的历史背景: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在恩格斯逝世后发生了分歧。事实上,恩格斯在世时,这种分歧已经初露端倪,只不过尚未激化而已。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斯坦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诸方面,对马克思的学说提出批评或曰“修正”;考茨基、卢森堡、李卜克内西在第二国际内部,同伯恩斯坦展开了激烈论争。到二十世纪初叶,这个论争的最终结果,是第二国际的分化,建立了第三国际,形成社会民主主义和列宁主义。其中,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等问题,是双方分歧的焦点之一。

陈独秀正是在这个分化过程中,开始接触和接受社会主义学说的。回过头来看当时的文献,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就是陈此时的一些观点倒是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如果再把观察的目光往后延伸,就会进一步发现,陈在接触和接受社会主义时的最初认识,也是他在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和作为中共总书记的八年以及以后他对在中国搞社会主义认识的思想渊源。

一、执政者谋资本劳力之调和是人类的幸福

从十九世纪末欧洲关于社会主义学说通过多种途径传入中国以后,许多知识分子从关注中国命运的视角,都在积极了解、研究社会主义的学说,联系中国的实际,探索救国图存的出路。到二十世纪初,中国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追求、阐释,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但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的主张上,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分歧的焦点在于是以暴力的手段还是以和平的手段,或者说是用革命的办法还是用改良的办法实现社会主义。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首先介绍了社会主义学说。指出:社会主义学说“始于法兰西革命时,有巴布夫(Babeuf)者,主张废弃所有权,行财产共有制(La commune des biens)。其说未为当世所重。十九世纪之初,此主义复盛兴于法兰西。“圣西孟(Saint-Simon)及傅里耶(Fourier),其最著称者也。彼等所主张者,以国家或社会,为财产所有主,人各从其才能以事事,各称其劳力以获报酬,排斥违背人道之私有权而建设一新社会也。其后数十年,德意志之拉萨尔(Lassalle)及马克思(Karl Marx),承法人之师说,发挥而光大之”。这段阐述虽不够确切,但说明陈独秀已经初知并关注社会主义的学说及其实践。

接着,他指出:“资本与劳力之争愈烈,社会革命之声愈高。欧洲社会,岌岌不可终日。财产私有制虽不克因之遽废,然各国之执政及富豪,恍然于贫富之度过差,决非社会之福;于是谋资本劳力之调和,保护工人,限制兼并,所谓社会政策是也。晚近经济学说,莫不以生产分配,相提并论。”

然后,他表明了自己的观点:“继此以往,贫民生计,或以昭苏”。^①在他看来,贫富悬殊绝不是社会之福,而保护工人、限制兼并、实行劳资调和,这才是“人类之幸福”。

这正是当时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以经济改良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初,伯恩斯坦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有了相当广泛的影响。法、德、英、意、比利时等国的不少领袖和工会领导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实行改良主义。可以说,陈独秀写此文章时伯恩斯坦主义已成为第二国际所属多数社会民主党的主导思想。因为接受伯恩斯坦主义的一些社会民主党,在其执政或参与执政的过程中,确实提出了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政策主张,并在为改善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推进社会生活进一步民主化等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其中包括劳动、就医、养老、残疾人的福利、儿

童的保护、家庭维持补助金、平等的教育机会、失业保险、社会保障等。

站在劳动人民立场,熟悉巴黎公社失败教训的陈独秀,认为欧洲各国执政者实行劳资调和的改良主义政策是“人类的幸福”。这是他根据形势把暴力革命和改良主义对比后得出的结论,他的认识反映了二十世纪初欧美一些国家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资本主义面对社会矛盾也在进行自我调整的实际情况。可以说这是他与时俱进的思想亮点。

二、通过协调资本“个人社会间利益两全”的办法发展大工业

陈独秀早期不仅有通过劳资协调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还针对当时中国出现的劳资矛盾事件,提出了解快的路径。特别是他对经济落后的中国提出了发展工业的思路,很有创意。集中反映在1920年5月1日他写的《我的意见》一文中。这篇文章总的来说是他运用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分析工人的工资,对资本主义持批判的态度。

1920年春,上海厚生纱厂在湖南招募女工。招工简章规定每天工作12小时,工资仅够维持一个人最低生活,伙食、医药、卫生等待遇很差,引起舆论界强烈反响。其中有长沙、上海等12家报纸与厚生纱厂经理穆藕初之间的批评、答复、再批评。《我的意见》对事件中反映出的各种观点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个人的看法和解决劳资矛盾办法。

文章指出:“穆先生或者可以说,我们中国纱业底势力,漫说英、美了,就是比日本还不及四分之一;现时纱业虽有点利益,正要少数的资本家垄断这种利益,才能够把资本聚住,才能够叫他们乐于投资而且便于投资,才能够使这资本有再生产的效力,若是分配给工人,这资本不但分散了,而且都用在消费上,失了再生产的效力,因此营业不能够推广,岂不是社会的损失吗?穆先生倘若说出这个理由,恐怕有许多旧式的经济学者都要点头称是;就是我也以为这个理由含有一半真理,不能全然否认;但是我以为也有一种法子,可以免除这个个人和社会问题底利害冲突。这法子是什么呢?就是采用 Co-operative Society 底一部分制度,一方面承认工人都有得红利底权利;一方面规定所有股东,经理,以下事务员,工人等应得的红利,一律作为股本,填给股票,以便推广营业;如此工人都可以渐渐变到资本家地位,个人方面比现在卖劳力而得不着全工值总好得多;资本都用在再生产上,社会方面工业也因此推广了;这法子似乎可以使个人社会间利益两全”^②。

陈的思想其有价值之处,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批判资本不等于消灭资本,资本的产生、积累和发展与工业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是一致的,这正是穆藕初所言“含有一半真理”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护资本,就是推进社会进步和工业发展。

第二,保护劳工的合法利益是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陈独秀认为“中国底资本固然还没有集中到工业上,但是现在已经起首了;倘然仍旧走欧、美、日本人的错路,前途遍地荆棘,这是不可不预防的。”^③这里讲的欧、美、日本人走过的错路,应是指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即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对广大劳动者、工人残酷地剥削与掠夺,给广大劳工带来无限的痛苦和灾难,社会严重两极分化,周期性经济危机不断爆发,整个社会付出惨重代价的状况。这条老路、错路不能再走。他呼吁人们“要有预防社会前途危险的大觉大悟……那才是社会的大幸啊!”这些肺腑之言,在时过87年后的今天,仍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第三,要害是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文中提出的办法就是实行合作社的一部分制度,即给工人分红,使其转化为企业股票,既可防止削减企业积累的后劲,又可逐渐改变工人一无所有的地位,从而体现资本、工人及社会利益“两全”。“两全”即双赢和多赢的意思。这是企业内部劳资利益协调的一种办法,在西方资本主义实践中已有实行,在当代IT产业中,以这种办法激励员工积极性的企业很多。此外,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北欧诸国,通过政府在社会范围内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险,推行社会福利制度,都取得了好的社会效果。

三、中国产业未兴,实行社会主义可缓于欧洲

社会主义学说传入中国后,中国是否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问题,自然会被提了出来。早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前的1917年初,陈独秀就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个颇为爱戴《新青年》杂志的名为褚葆衡的读者,曾写信给陈独秀。他说:“近代文明之真谛,最新之

思潮，仆以为当推社会主义。此种学说，为政府及资本家专横之反应，大足为我人研究之资料。我国于此种主义，输入未久，鼓吹乏人，故信仰者寡，足以强权者势愈甚，而贫民乃愈陷水火之中。贵报素主输入世界新理，独于斯类学说，乃未多觐，足下如以社会主义实可为救世之良药，则阐扬之责端在贵报矣。仆愿望如此，不识足下以为如何。”^④

陈独秀于1917年1月1日写信回答说：“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并兼未盛也。”^⑤寥寥数语，看出他对马克思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的学说，理解是相当准确的。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大工业生产基础之上的，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别，消灭了商品货币关系，实现很高水平的统一的全社会的公有制，社会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其理想确是很高的，而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这样的客观条件。

社会主义产生的经济条件，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充分暴露。十九世纪30、40年代，西欧的英国、法国、德国等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工业革命，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逐渐实现工业化。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发展为公开的对抗，工人阶级形成了独立的政治力量，才有可能爆发社会主义革命。而半封建半殖民地、小农经济占优势的中国，“产业未兴”，即现代工业数量极少，规模小，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所以，陈独秀才有社会主义之兴“似可缓于欧洲”的感叹。他认为中国需要进行的是在经济上“发展生产事业、发达生产技术”，政治上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的民主革命，而不是急于搞社会主义。陈独秀此时的认识，比之当时孙中山曾经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作为他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设计；比之梁启超主张限制个人竞争、实行国家干涉的社会主义，都更为接近中国实际。

1919年4月，即五四运动前夕，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说：“英、美两国有承认俄罗斯布尔塞维克政府的消息，这事如果实行，世界大势必有大大的变动。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⑥他对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对在俄国搞社会主义革命，承认是人类社会变动的大关键。但是也就在同一天，陈独秀在另一篇文章中又指出：“中国资产社会和劳动社会都不很发达，社会革命一时或者不至发生。”^⑦他依然坚持两年前的一些看法：认为中国无论在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都不具备搞社会主义的条件。

四、世界上没有包医百病的学说

1920年3月1日，陈独秀在《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一文的开头有一段精彩的论述，我全文抄下：

“我向来有两种信念：一是相信进化无穷期，古往今来只有在一时代是补偏救弊的贤哲，时间上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也没有‘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一是相信在复杂的人类社会，只有一方面的真理，对于社会各有一种救济的学说，空间上没有包医百病的良方。我对于马尔塞斯的人口论，就是这种见解；不但马尔塞斯人口论是这样，就是近代别的著名学说，象达尔文自然淘汰说，弥尔自由论，布鲁东私有财产论，马克斯唯物史观，克鲁泡特金互助论，也都是这样。除了牵强，附会，迷信，世界上定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医百病的学说这三件东西。在鼓吹一种理想实际运动的时候，这种妄想，迷信，自然很有力量，价值；但是在我们学术思想进步上，在我们讨论社会问题上，却有很大的障碍。这本是我个人的一种愚见，是由种种事实上所得一种归纳的论断，并且想用这种论断演绎到评判各种学说，研究各种问题的态度上去。”^⑧

这段长达380字的引文，鲜明地体现出陈独秀身上那种不事盲从、追求科学的真正知识分子的品格。

他对马尔塞斯人口论的长文批判，说明他的才智不只是某个领域的专家，在许多方面都反映出他渊博的学识和创造的活力，本文不在这里详加阐述。

值得推崇的是，年仅41岁的陈独秀，依据书本上、实践中，国际、国内“种种事实上所得一种归纳的论断”，提出：“世界上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医百病的学说”的至理格言，今天读

起来实在令人敬佩！

上述论断中，他提到了包括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学说也不能包医百病，虽然没有专门展开论述，但他当时对马克思学说的态度已跃然纸上。

这时已经是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了广泛的传播。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他以唯物史观学说和《资本论》巨著所阐述的剩余价值学说，奠定了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是将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有机结合起来的严谨的学说，是人类思想发展的极大成就。中共成立前，中国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都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按照传统的说法，在五四运动后期陈独秀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且在一个月后，俄共远东局维经斯基率代表团来华，在上海与陈独秀商谈组建中国共产党问题。而陈独秀此时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包医百病”的学说，这说明了什么？

我以为，这正反映了他观察事物的一种科学精神。任何理论，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条件的变化，一度适合当时情况的理论，就会部分地或全部地变得不适合新的情况，从而需要加以补充、修正。马克思的学说也同样如此，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经之万世都灵验、包医百病的绝对真理。他“相信进化无穷期”，既然发展不会停止，斗争的形式也要随着斗争的条件有所变化。《共产党宣言》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末（蒸汽机工业时代）的出现是必然的，也是正确的。因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达到了从来没有达到的程度，“欧洲社会岌岌不可终日”。但到十九世纪末电力工业出现，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形成了新的生产关系，劳资间的斗争将按新的方式进行。恩格斯1895年在《资本论》《导言》就曾经说：“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种幻想，”“当时欧洲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⑨

极力推崇以科学和民主精神救中国，关注欧美等先进国家形势的变化和国际共运的分歧的陈独秀，尤其敏锐地注意到二十世纪初在欧美一些国家，由于工人阶级和城市贫民的斗争，统治者不得不调整社会政策，以缓和日益尖锐矛盾的情况。在1919年4月27日的《贫民的哭声》一文中写到，为什么会发生社会革命？他说：“在欧、美各国，他们贫富悬隔的原因，乃是有钱的人开设工厂，雇用许多穷人替他做工，做出来的钱财，大部分进了他的腰包，把一小部分发给工人，叫做工价。工厂越大越多，那少数开工厂的资本家越富，那无数做工的穷人仍旧是穷。”“渐渐造成那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这就是现在各国顶紧急顶重大的问题。”“所以欧、美、日本连政府也都在那里赶紧讲究什么贫民生计、保护劳工，劳工组合，劳工教育，分配公平，遗产归公，等等政策，好预防那社会革命。”^⑩同月的另一篇文章中也说：“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学说，已经大大的流行了。俄、德和匈牙利，并且成了共产党的世界。这种风气恐怕马上就要来到东方。日本人害怕得很，因此想用普遍选举、优待劳工、补助农民、尊重女权等方法，来消弭社会不平之气。”^⑪他这里强调的是面对尖锐的社会矛盾，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富豪和执政者都在进行自我改良，以缓解劳资之间的矛盾。

一个多月后，在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国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领导下，德国、匈牙利爆发的革命很快就失败了，说明完全按俄国十月革命的办法换一个国度就不灵。

两种解决矛盾的策略和方法，两种结果。因此在陈独秀看来，马克思的学说“只有在一个时代里是补偏救弊的贤哲”，“只有一方面的真理”，不可能包医百病。

他不愧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思想领袖，始终坚持以科学民主的尺度衡量一切事物。他的远见卓识同他此前四次去日本学习、考察不无关系。明治维新后开放的日本，对他开阔视野，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思考救国救民之路大有裨益。

很长时间以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里，对社会民主主义一直持批判态度。社会民主主义被视为“修正主义”，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中国也是如此。在历史研究中，当历史人物最初接受或认同社会民主主义时，就认定其思想还不成熟或者还处于模糊状态，甚至说成是“倒退”；而一旦放弃了社会民主主义，就认定其成为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今，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评价，在我国学术界已经有了很大

不同。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北美特别是北欧的成功实践,使得研究者不仅对它的理论、学说作出客观分析,甚至主张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也应该借鉴。因此,对于陈独秀早年接触和接受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也应该重新评价。当我们回顾中国 1949 年以来的历史,特别是回顾中国铲除一切非公有制经济、实行“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导致经济发展停滞徘徊的历史的时候,陈独秀早年的那些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和主张,不正好是一面镜子吗?

注释:

- ①《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 80—81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年出版。
- ②《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 526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 ③《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 527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 年出版。
- ④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第 72 页。新华出版社,1987 年(内部发行)。
- ⑤《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 170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 年出版。
- ⑥《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 381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 年出版。
- ⑦同上,第 381 页。
- ⑧《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 498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年出版。
-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512 页。
- ⑩《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 384—385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 年出版。
- ⑪同上,第 373 页。

陈独秀对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探索

中共中央党校 杨熙曼

人们习惯把建国视为探索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探索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实际上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是同步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五届总书记的陈独秀,正是这种探索的开拓者,其功过是非也始终离不开这一探索。

一、认定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还在青年时期,陈独秀就抱着强烈的爱国热情投入先进分子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行列。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已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暴露无遗,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已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五四运动前陈独秀虽主张以法、美为师实现中国的民主共和,认为中国“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实行社会主义“似可缓于欧洲”^①,但也强调,为“谋资本劳力之调和,保护工人,限制兼并”,实行“社会政策”^②是必要的。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立即以这个思想为武器,重新探索中国的出路,很快就得出了社会主义救中国的结论。

这个结论是在社会主义论战中做出的,主张资本主义救中国的一方也讲社会主义,但提出了三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一是中国能否跳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实行社会主义;二是中国有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三是对发展大工业来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何者优越。这些问题一经提出,就使一些人陷入困惑。

以陈独秀为首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迎接了挑战。

陈独秀当时已经觉察到,在中国不解决独立问题便谈不上发展资本主义。但经验告诉他,中国资产阶级不仅没有使中国独立的能力,也没有这种勇气,有时还可能开门揖盗。所以指望中国资本主义“发达起来能够抵制外国资本家,能够保全中国独立,再过一两世纪也没有希望”^③。因此陈独秀明确地说:“我断然不能迷信他能够将中国从危险中救出”^④,中国不配讲资本主义。

那么,中国能不能讲社会主义呢?

陈独秀首先回答了在中国讲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在感受资本主义“弊病”的基础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立即树立了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理念。他认定,只有社会主义才“可以救济现代经济的危机及社会不安的状况”^⑤,“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运命”^⑥。陈独秀还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认为“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趋于崩坏”^⑦,在最近的将来,都将进入社会主义,“中国那能够拿国民性和特别国情等理由来单独保存他”^⑧;并且认为,幸而中国工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就有了更好的制度,中国何必再走“欧、美、日本的错路”^⑨,何必去做“挖肉作疮”的“庸医”呢?

陈独秀接着回答了中国有没有讲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回答它最重要的是回答是否有这种条件。陈独秀早在1917年就思考过这个问题,面对挑战他倍加关注。这时陈独秀已隐约地认识到实现社会主义第一个条件就是一切产业社会化,中国经济落后,搞社会主义加倍困难。但是他又认为,“马克思固预料在果上资本主义必倒,但未尝教人在因上要故意造成推车撞壁的必倒状况”^⑩。工业落后的国家,只要工人阶级有了一定的觉悟,就可以先夺取政权,然后靠社会主义的方法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

陈独秀就是依据上述理由,改变了以往“以为资本主义是天经地义”那种对“资本主义底迷信”^⑪。在论战中坚定地树立起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信念,得出了中国革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论。

评价这个结论,首先应该肯定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其所依据的理由相当部分是科学的。其中最重要的也是实质性的,便是看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从而初步认定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这个结

论是探索中国如何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第一个成果,它表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已迈出了最初的一步。

但是,陈独秀及其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还不甚了了”,对中国国情也知之不多,更不真正懂得怎样将二者相结合。比如,他们并不懂得民主革命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必不可少的中间站,不知道中国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还有革命性的一面。又如,他们对资本主义“弊病”在认识上还夹杂着某些单纯的伦理观念,对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也不适当地强调了主观能动性,因而急于抄近路。此外,他们对世界形势的估计也有错误,更不知道如何将中国问题放在世界大环境中去思考。有了这些错误认识,陈独秀便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全部看成了革命对象,主张在中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在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正式提出了这种主张,这种主张还被载入了一大党纲。于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步骤问题,即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成了没有解决的悬案。

二、将走社会主义道路分为两段路程

值得庆幸的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主张,很快就纠正了。

党的一大前陈独秀在这个问题上就有一个思想变化的过程。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最初阶段,并没有否定在中国进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就在这时他还说,民主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②,我们承认它“在人类进化史上有相当的价值”^③，“在封建主义未倒底国里,就是现在我们也并不绝对的反对他”^④,而中国直到如今还完全是封建主义“支配一切”^⑤。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分量,在陈独秀当时的认识上确实越来越重。陈独秀的思想显然是矛盾的。不过正因当时就有这种矛盾,在做出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之后,陈独秀并没有放弃对中国革命如何发展的思考。正如,1922年1月《先驱》发刊词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人要继续“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⑥。5月陈独秀又在《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一文中,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实际研究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⑦。陈独秀不仅是这种精神的提倡者,还是这种精神的实践者,因而成为继续探索解决中国问题方案的代表。

不可否认,一大后的国际及国内形势也为党及陈独秀分析中国的乱源,找出解决中国问题的更好的方案,提供了有利条件。列宁提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理论,更为党及陈独秀制定新的救国方案找到了理论依据。早在1920年7月列宁就指出: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已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世界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援助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并指出:这些国家的革命,首先是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1922年1月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全面贯彻了列宁的上述理论。中国共产党出席会议的代表回国后,立即向党中央做了汇报,陈独秀的认识也立即有了新的飞跃。

1922年4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起草的《关于中国少年运动的纲要》,第一次提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段程途”。6月陈独秀正式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文中,分析了世界及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对两段路程作了论述。他说:“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第一段争斗,是中国人对于现在的政治问题上至急切要的工作”,“解决现在的中国政治问题”,只有“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对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⑧。

陈独秀的意见很快形成了全党的共识。6月《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明确宣布:中国是“半独立的封建国家”,“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源泉”,所以“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7月党的二大便在陈独秀主持下,在重申党的最高纲领的同时,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即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纲领。

党的二大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的国情,特别强调帝国主义勾结中国的封建势力统治中国,使中国政府成为帝国主义的“共同工具”。因此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是中国的乱源,而帝国主义的侵略乃

“是中国政治上一切纠纷内讧的复杂基础”。据此二大更加明确地指出：当前阶段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二大认为，这样的革命就是“民族革命”和“民主主义的革命”。

党的二大在肯定中国必须进行民主革命的同时，还改变了把中国资产阶级全部当作革命对象的错误认识，虽然仍旧没有将中国的资产阶级进行区分，但已认为他们还没有发达起来，就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阻碍”，为要免除这种压迫，一定要起来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因此二大再次提出与民主派联合打倒共同的敌人的主张，并且在制定民主革命纲领的同时，做出了“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

将中国革命分为两段路程，制定出民主革命的纲领，是在中国如何走向社会主义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取得的第二个成果。它从步骤上为中国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大的方向；也为动员全国人民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可能。它是中国革命迅速走向高潮的首要保证。

陈独秀对制定民主革命纲领作出了重大贡献，所以二大后陈独秀被捕时，中国十大团体为释放陈独秀发出的宣言中赞颂说，“陈独秀是一个改造中国的先驱，一个为解放中国劳苦群众奋斗的革命家”，救护陈独秀就是“救护垂危的改造运动，这是解放我们自己必要的奋斗”。

三、处理两段路程关系的三种设想

将中国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分为两段路程即两个革命阶段之后，如何处理两个革命阶段的关系，立即成为新的探索主题。陈独秀很快就把精力集中到思考这个问题上来，而且就在1922年内不到一年的时间先后提出了三种设想。这三种设想难免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关论述，照搬现实生活中现成模式的痕迹，但仍不乏独立思考和不断探索真理的精神，不乏研究中国实际的精神。1922年8月陈独秀在《独秀文存》自序中曾说：我的观点“都是我的直觉”，“不曾剿袭人家的说话”。我的文章确“有许多不同的论旨”，但可以把它看成“社会思想变迁底产物”^⑨。

下面就让我们分别看一下陈独秀的三种设想。

第一种设想的提出与将中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是同步的。1922年4月中国第一次出现两阶段论，5月陈独秀便明确地说，劳动者在力量未充足的时期，“对于别的阶级反抗封建式的政府之革命党派，应该予以援助”，“援助这种革命的党派成功了，劳动者至少可以得着集会、结社、出版、罢工底自由，这几种自由是劳动运动重要的基础”^⑩。6月陈独秀正式将中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同时就正式说明：第一阶段只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进行反对封建势力的革命，革命胜利虽只给“中国资产阶级以充分的机会”。中国“劳苦群众”仍然“应该加入”到这个革命中去，以便在革命过程中“使自己由幼稚而到强壮”^⑪。《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更明确地说，“民主政治当然由民主派掌握政权”。党的二大接受了上述设想并作了如下的表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民主主义成功，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之后，无产阶级才须“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但是，无产阶级应该“援助”、“扶助”、“帮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保证其成功。因为它是“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是“使工人、农民到权力之路的第一步”。

上述设想可以看作二次革命论的萌芽，起码可以说已经有了二次革命论的某些因素。对这种说法目前仍有不同意见，关键是对什么叫二次革命论众说纷纭，甚至将其与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列宁的革命转变论，毛泽东的“两步走”的理论相混淆。所谓二次革命论其内涵应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胜利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完全处于对抗地位之后，无产阶级再进行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理论的基本特点，不仅在于要进行两次夺取政权的革命，而且在两个革命之间插上一个资本主义时代，把二者完全分隔为毫不衔接的两个阶段。1927年的《中央政治局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就说明了上述特点。《解释》说：我们党有过一个“根本错误”，那就是“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截然划分毫不衔接的两个时期”，“准备还有第二次革命”。陈独秀及二大的第一个设想，虽尚未形成完整形态的二次革命论，却具有这个特点。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当时德国的状况,虽提出了不断革命的口号,仍然要求德国无产阶级“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这个革命是工人革命的前提”^②,它可以使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统治下取得更多手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③。后来德国以至整个欧洲的形势发生了变化,马克思、恩格斯搁置了不断革命的口号,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不会很快到来,继续要求无产阶级支持资产阶级革命,以争取自由和“自己本身存在的条件”^④,逐步地耐心地准备未来的战斗。陈独秀此时萌发的二次革命论,显然有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论述以及十七、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模式的痕迹。应该指出的是,这时的二次革命论与第二国际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和俄国孟什维克的有关论述还是有区别的。陈独秀仍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主张,强调无产阶级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要独立作自己阶级的运动,为自己阶级的利益进行斗争。而且陈独秀此时与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同时还有其他设想与之并存。

陈独秀的第二个设想是在党的二大正式出现的。二大关于民主革命如何发展,即两个革命阶段关系的论述,除了萌发二次革命论之外,还认为“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第二步可以“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据此二大强调无产阶级要“训练自己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并把“民主革命的奋斗”,看成“训练无产阶级革命的绝好机会”。

实际上在建党前陈独秀就有过这种想法。他1920年10月就讲过,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不一定“必须经过共和时代”,“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虽是一定的轨道,然这轨道却不能够说必须要经过若干岁月才可以改变方向”,“俄罗斯共和推倒了封建半年便被社会主义代替了”,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⑤二大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紧跟民主革命之后即刻成功,乃是陈独秀上述想法的再现。不同的是,二大已较前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即刻成功的条件,即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

陈独秀的第二个设想,属于不断革命论范畴。1905年列宁根据俄国的实际情况,把马克思、恩格斯搁置起来的不断革命口号继承下来并加以发展。列宁指出,“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⑥。列宁还从当时俄国的资产阶级比以往欧洲民主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更软弱,无产阶级更强大这种阶级力量对比的实际出发,明确提出了民主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及工农联盟的主张,认为这种革命胜利后可以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以加速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1917年二月革命进一步改变了阶级力量的对比,列宁立即把社会主义革命提上了日程。列宁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⑦当然“在落后的国家里不经过许多过渡,不经过许多过渡阶段”,也“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变成社会主义革命”^⑧。陈独秀及二大的第二种设想,还没有完整地运用列宁的上述理论,但以阶级力量对比为条件立即实行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不能不说已带有列宁发展了的不断革命理论和俄国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模式痕迹。

陈独秀仍然没有满足他所提出的两种设想,于是二大后不久,陈独秀又提出了具有点滴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因素的第三种设想。

陈独秀对前两种设想思考的问题,仍旧是它们是否适用于中国。

首先,陈独秀仍然认为,走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陈独秀再次明确表示,“真的民治主义的政制能否在中国完全实现”,实乃“万分怀疑”^⑨。因为,“以中国资产阶级幼稚的现状,断然不能在短期间发展到能够应付中国急于开发实业的需要,而且在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国内军阀的扰乱未解除以前,中国的资产阶级很难得着发展的机会,到了国民革命能解除国外的侵略和国内的扰乱以后,无产阶级所尽的力量所造成的地位,未必不大过资产阶级,以现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倾向大过资产阶级便可推知,那时资产阶级决难坚持独厚于自己阶级的经济制度”^⑩。而且我们也“不能赞成”中国再走这条道路了,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日本所造成的罪恶已是不能掩饰的了”^⑪。此外“世界的趋势能否容民主的政制占领长时代而不生急进的变化”,也“是一个问题”^⑫。

陈独秀紧接着想到的仍然是在中国是否有条件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陈独秀在《马克思学说》一文中再度说明:“一个社会制度,非到了生产力在其制度内更无发展之余地时,决不会崩坏。新制度之物质的生存

条件,在旧制度的母胎内未完全成立以前,决不能产生,至少也须在成立过程中才能产生”。这个认识使陈独秀改变了二大提出的以无产阶级组织力及战斗力是否强固作为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观点。他明确指出,虽然国民革命成功后,“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来开发实业”,是“不能免的境界”^③,但是“国家社会主义,决非建设在现状之上”^④。

基于以上思考,1922年9月陈独秀在《答张东荪》和《造国论》两文中指出,在中国企图革命胜利之后,马上就“由国家包办一切大小工商业”,“马上就要禁绝一切私人企业”是不现实的。他设想在中国实行所谓国家社会主义也要有个过程,“其初只是国家资本主义,再进一步才能到国家社会主义”。

给予陈独秀提出上述设想以启示作用的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这段时间党的刊物连续发表过介绍新经济政策的译文与著述,其中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也可见存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大企业归国家,小企业可以租给私人经营。陈独秀的上述设想发表后,高君宇、瞿秋白、蔡和森等人都有与之相呼应的文字,可见新经济政策影响之广泛。也可见这个设想虽然还处于朦胧状态,但它符合中国的实际,某些方面和后来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相吻合,可以看作在对中国如何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三个成果。1922年陈独秀就能提出这种闪光的设想,既可以说是他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一种创造,也可以说是他将刚刚介绍到中国来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用之于中国的初步尝试。

1922年陈独秀提出的上述三种设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陈独秀及中国共产党此后关于中国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无不是这三种设想的较量和发展。

四、三种设想在继续探索中交织出现

正确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第三种设想虽然有生命力,但陈独秀不可能就此便将这种点滴的设想发展下去。随着资产阶级革命一面有所发展以及第一次工运高潮走向低落,1923年4月至12月,陈独秀又连续发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将他初步萌发的二次革命论向前推进了一步,使之更加理论化。所以如此说,既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仅仅抓住“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样一句话做文章,而是根据以上两文所做的阶级分析、对革命转变条件的认识、以及对革命前途的判断做出的结论。

陈独秀的文章虽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较早地作了阶级分析,而且不乏亮点,但都有教条主义的成分。陈独秀不懂得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始终具有的革命和软弱这种两面性,是“从娘肚子里带出来”^⑤的一种特殊的阶级本性。竟把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成长的公式搬到了中国,认为其软弱性只是资本初步积累时期暂时出现的一种“懦弱心理”,这种心理必然随着资本积累的完成而消失,所以不当以此“决定其全阶级的终身运命”。陈独秀也不懂得中国工人阶级发生和发展的特殊规律。他们“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⑥。而是把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发生和发展的规律套到中国工人阶级身上,认为中国工人队伍也单纯随着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而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也仅仅“随着产业发达阶级分化而发生而强烈”。所以,中国资产阶级幼稚,中国工人阶级必然幼稚,中国工人阶级无论物质力量还是阶级觉悟都不及资产阶级。陈独秀对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做出了如上分析,自然会得出如下结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上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没有阶级意义和社会基础的革命,“必不能使社会组织变更,必没有一个阶级代替他一阶级的力量”,即使能够打倒现在的统治阶级,被打倒的阶级“时时都有恢复故物之可能。”有了这样的结论,陈独秀不仅从此前重视工人阶级转而重视资产阶级,实际上肯定中国的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以资产阶级为主力;而且很容易因为害怕吓跑资产阶级而使革命失去阶级意义和社会基础,便对资产阶级实行退让政策。

两文对于民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没有直接论述,却有两段表明了陈独秀此时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一段是说:“共产的社会革命固然要得着农民的国情与协助,然必须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

另一段是说：“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从这两段话可以看出，陈独秀仍然关心革命转变的经济条件，再次放弃了第二种设想提出的依据无产阶级组织力和战斗力是否强固来决定转变时间的观点。然而他同时放弃了第三种设想中萌发的合理因素，事实上把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当作转变的条件。

在阶级分析和对革命转变条件认识的基础上，陈独秀对民主革命前途的判断虽然仍旧没有离开二大的两种设想，但二者的地位已有变化。二大虽认为党所面临的现实可能性还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第一种设想，但二大对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与觉悟是充满信心的，甚至预见了无产阶级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前景，所以二大对民主革命胜利后即刻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种设想是力争的。而此时陈独秀的文章已强调，“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无产阶级只能“参加”国民革命，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文章也说，“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种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但是又说，“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上述判断充分说明，陈独秀已将第一种设想上升到“一心不乱”的主导地位，对第二种设想已没有了力争的积极态度。其实陈独秀的上述两文早已开门见山地做出了这种判断，他说，人类社会组织之历史的进化，最大的是由封建时代而“资产阶级时代”，各国进化的时间可以不同，但“进化的历程恒次第不爽”。就是说社会进化是不能跳过“资产阶级时代”，即资产阶级专政下的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时代的。

但是陈独秀并没有顽固地坚持二次革命论。随着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陈独秀对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析，不但遭到事实的撞击，还受到党的一些领导人的批评。彭述之认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并不是暂时的，陈独秀的分析是“机会主义”的^⑤。邓中夏指出，“中国的无产阶级是在本国的和外国的两个资产阶级之下发育孳长的”，因此“中国本国的资产阶级尽管幼稚，在客观上中国的无产阶级却能长成壮大”^⑥。就在这时，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述种种促使陈独秀很快从重视资产阶级再度转向重视无产阶级。四大前夕陈独秀已觉悟到：“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须他做一个督战者，督促一切带妥协性的友军”，“才能够达到国民革命之真正目的——民族解放”^⑦。不久，党的四大在陈独秀主持下，正式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现实领导权，再次强调了民主革命胜利后紧接着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五卅运动后，1925年9月，陈独秀又进一步指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民族的资产阶级在客观上很难发展”，因此中国“决不会有欧洲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实现出来”^⑧。至此，陈独秀又一次否定了他的第一种设想二次革命论。

不过与此同时，列宁在1905年提出的革命转变论，经过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中共及陈独秀的影响在不断加强。

共产国际除了提出中国民主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之外，还强调了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这两点自然无可非议。但是他们又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甚至比1905年期间俄国的资产阶级还软弱，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必然从革命走向反动，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只能建立无产阶级、农民及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的政权。在这种理论影响下，加上五卅运动中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充分暴露，陈独秀提出的第二种设想便取代二次革命论以更加完备的姿态占据了主导地位。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就指出，“这几个月来中国的经验，明显的证实中国资产阶级也和过去时代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一样，当他们的要争政权而反对压迫他们的国内外势力的时期，他们固然要和工人阶级携手”，只要工人阶级“对国内资本家要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法律上的权利，国内资产阶级立刻就开始压迫工人，宁可抛弃民族利益而与敌人妥协”。11月陈独秀在文章中进一步说，中国资产阶级原则上“应该有革命的要求；然而在实际上，他已是全世界反动的资产阶级之一部分，他所应有的革命要求，很容易被他阶级的反动性消灭下去。”^⑨甚至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实质上是反革命的”，“即使最激进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也是反对革命的”^⑩。

然而，随着北伐出师，形势又有新的变化。一方面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右翼正阴谋篡夺国民党的党政军

大权,但并未走向反动,而且准备在此基础上进行打倒北洋军阀的北伐;一方面北方的革命运动因遭到镇压而走向低落,北洋军阀各派系开始组成反革命联合阵线,准备进行反革命的南伐。在形势变化的关键时刻,陈独秀在坚持上述理论即第二种设想的同时,再度提出了二次革命论。1926年7月,陈独秀在中共四届三中全会的中央政治报告中,在仍然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基础上隐约表示:中国革命的目标应是“以革命手段达到民族的资本主义之建设”。会后陈独秀在他的文章中将这种表示更加明朗化。文中说,民主革命的结果是由国民党左派掌握政权,“自由发展”“民族的民主的资本主义”^③,使“中国历史由半封建时代进化到资本主义时代”^④。并且说,“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⑤。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二次革命论,显然是变态的,但变态的二次革命论此时已与对民族资产阶级只联合不斗争的退让政策相联系,故拉狄克曾讲,中共四届三中全会会有“半孟什维主义论调”^⑥。

从理论上说第二种设想显然与二次革命论相悖,但两种理论此时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却殊途同归。因为第二种设想虽然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必然由革命走向反动,政策上应该是只斗争不联合。但又因这种设想认为此时这个阶级还处在过渡阶段,尚未完全走向反动,还可以“利用”,因此暂时还应实行只联合不斗争的退让政策。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陈独秀虽然在理论上摇摆,政策上却不变,所以两种性质不同的理论,竟可以在陈独秀思想上交织甚至同时存在。

不过二次革命论在陈独秀思想上仍然只是一时闪现。1927年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的精神传到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陈独秀主持下进行了讨论。讨论结果旗帜鲜明地否定了二次革命论,强调了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前途。此后中共中央和陈独秀都认为,民主革命胜利应建立把民族资产阶级排除在外的工农小资产阶级政权,走向社会主义。四·一二政变后,共产国际和陈独秀都把蒋介石的叛变看成民族资产阶级正式走向反动的标志,中国革命进入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开始,认为武汉国民政府是这个联盟的体现,汪精卫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因而继续实行妥协让步政策。陈独秀在党的五大的报告中说,蒋介石叛变表示99%的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武汉国民政府虽还不是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也是走向此专政的途径,我们必须利用这个机构走上工农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道路。五大后陈独秀在《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一文中又说,中国革命之前途,只能是“无产阶级与农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专政,“行向社会主义的建设”。

这期间我们应该充分重视的是,陈独秀经过一、二两种设想反复较量最终放弃了第一种设想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第二种设想的怀疑和对第三种设想的思考。1927年4月陈独秀发表了《答沈滨祈、朱近赤〈国民革命之归趋〉》。此文虽仍然认为革命胜利后只能建立“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实现“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建设”,但第一次提出了如此就可以不“经过再度革命方式而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并且在再次强调必须首先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时候,第一次对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作了解释,提出了四种经济并存的主张。陈独秀认为,首先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只是说它是“全社会中主要的生产制度”,不是说只采用这一种而禁绝其余一切。革命胜利后,我国的经济制度应该是“家庭的手工业与农业、小生产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制、国家资本主义等,四种并行”,而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依国家的性质而定,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采用国家资本主义,“才能够由此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这个设想既有了某些革命转变论的因素,又把革命胜利后的经济成份具体化。可见此时陈独秀不仅没有放弃第三种设想,还将其向新民主主义方向推进了一步。虽然这一步也只是昙花一现,仍然可以看作自建党至此,陈独秀多年探索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大亮点。

五、最后的归宿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岗位,但仍然关注国内外形势以及党的路线、策略,仍然在探索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不过思想之起伏较前更为频繁和复杂。

大革命失败后相当一段时间,陈独秀还是认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胜利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行向社会主义。1928年1月陈独秀撰文仍称:“共产党的金箍棒”是“反帝国主义、军

阀及主张工农民众政权”^①。接受托洛斯基派的观点之后,陈独秀对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任务等问题的看法才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变。他在1929年8月5日写给中央的信中说,大革命对于共产党来说是失败了,但“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打击”,“变成了残余势力之残余”,中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道路。并且说,现阶段是没有革命形势的阶段,社会主义革命条件尚未成熟,无产阶级只能通过参加国民会议,提出自己的要求,为未来的革命做准备。不过上述看法并没有存在很长时间。1932年10月陈独秀被捕。此后他多次在上诉、辩诉状上表明,不反帝反军阀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实属梦呓,而且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只为少数人谋利益,只有工农苏维埃成立“始获睹真正大多数人民统治之实现”,“最新之工农苏维埃政制,乃民主制之最后最高阶级”。

抗日战争开始后,陈独秀被释放。陈独秀拥护抗日,但其思想再度发生变化。他通过对抗日前途的论述表达了这种变化。他认为,抗战胜利虽然要发动民众,但更重要的是依靠武器,他说以为大刀队可以抵抗飞机大炮,等于用符咒治病。据此,他不仅反复说明抗日要由国民党政府统一领导,要依靠外援,向外国获得武器;还明确主张抗日胜利应由国民党领导建国,他的思想也逐渐向建设资本主义国家的方向转化。1938年4月至8月陈独秀在相继发表的《抗战与建国》、《资本主义在中国》、《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等文中指出:“现代的经济制度只有两个:一是资本主义制度,一是社会主义制度,没有第三个”^②。陈独秀对这两种制度再度做了比较。他一方面默认社会主义国家已由红变黑^③。一方面强调,“到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便“万象一新”了^④;因此陈独秀不但主张实行资本主义,而且主张“全部欧化”^⑤。陈独秀还再次分析了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他说“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若走循序进化的路,必须以内部经济的政治的成熟为条件,若走跳跃进化的路,则必须以外部的影响(刺激与援助)及内部政治的成熟为条件”。所谓政治上的成熟是要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而这“只有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够生长起来”^⑥。他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但资本主义“未有高度的发展”,目前还是一个“初期资本主义的国家”^⑦,可见中国并不具备跳跃到社会主义的条件。根据以上看法,陈独秀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本国的资本主义,或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⑧。

既然陈独秀把抗日希望寄托于国民党,随着国民党战场对日作战的不断失败,他的看法也自然随之向消极转化。1940年至1942年陈独秀写了不少文章,逐渐认为,此次大战“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将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英法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⑨,他当时认为前者战胜的可能性更大些。不过他又认为,无论胜利属于谁,“帝国主义的统治都仍旧不变”^⑩,只是世界将分属于两个对立的帝国主义集团。在这种情况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战争,不和帝国主义国家(宗主国及宗主国的敌对国家)中的社会革命结合起来”,不会“得到胜利”^⑪,“无论由何阶级领导,不是完全失败,便是更换主人”^⑫,“根本不能改变原来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奴役地位”^⑬。中国也是一样,中国自己“没有力量”将日本赶出去,其结果乃是:胜利属于美国,“我们有可能恢复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倘若属于德、意、日,“我们必然沦陷为殖民地,连南京的傀儡政府不久都会滚蛋”^⑭。

陈独秀最后的探索告诉我们,他是以终于抛弃甚至批判了具有某些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因素的第三种设想,第三次抬起了具有二次革命论因素的第一种设想为归宿的。他的所谓目前世界没有第三种制度是最明白的表达。而且对中国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来说,其思想已悲观到把两次革命都看成遥远未来的事。不过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否认陈独秀一生在探索中国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方面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探索如此重大问题正确答案,有曲折和反复是带有一定必然性的。

注释:

①②《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70页、第81页。

③—⑥《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57页、第34页、第87页、第32页。

⑦—⑪《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50页、第92页、第52页、第57—58页、第32页。

- ⑫-⑮《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12页、第31页、第67页、第33页。
- ⑯《“一大”前后》(一),第80页。
- ⑰-⑳《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177-178页、第185-188页、第200页、第175页、第186页。
- 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86页。
- 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49页。
- 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第86-87页。
- ㉔《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33页。
- ㉕《列宁文选》第一卷,第634页。
- ㉖《列宁文选》第四卷,第565页。
- ㉗《列宁文选》第三卷,第689页。
- ㉘-㉙《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206页、第208-209页、第208页。
- ㉚-㉛《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206页、第209页、第206页。
- 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147页。
- ㉝《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627页。
- ㉞《新青年》季刊第4期。
- ㉟《邓中夏文集》第99页。
- ㊱《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620页。
- ㊲㊳《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87页、第120页。
- ㊴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377页。
- ㊵-㊶《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264页、第273页、第264页。
- 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3卷,第568页。
- ㊸-㊹《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483页、第621页、第599页、第609页。
- ㊺-㊻《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610页、第617-618页、第617页、第618页。
- ㊼陈独秀《给西流等的三封信》
- ㊽《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646页。
- ㊾-㊿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
- ㊿《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649-650页。

陈独秀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

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 聂皖辉

内容提要:此文分3个部分撰写:一、写陈独秀从调查研究中国工人阶级的现状入手,编辑出版《劳动节纪念号》,号召工人群众迅速觉悟起来,认识到自己的伟大力量和历史使命。二、写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之前后,陈独秀主持创办《劳动界》、《伙友》等刊物,直接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三、写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陈独秀是有大功的。

在党的历史上,李大钊是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陈独秀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位践行者。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日益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这个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在这个初始阶段,陈独秀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综合起来看,陈独秀主要做了启蒙、鼓动、宣传、传播的作用。

一、调查研究中国工人阶级的现状,编辑出版《劳动节纪念号》,号召工人群众迅速觉悟起来,认识到自己的伟大力量和历史使命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新文化运动中左翼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进行宣传,使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自1919年1月至“五四”,陈独秀和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发表了大量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报道。也是《每周评论》,最先摘译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五四”前夕,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指出了十月革命的伟大的历史意义,说:“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步的大关键。”

这时,陈独秀要把他刚刚学到的一些革命理论,哪怕是他的理解还不甚深刻,也要马上传授给工人群众。他认为,要使无产阶级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强大的力量,必须首先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并进行组织工作。而要向工人群众宣传革命真理,就必须了解工人,了解劳动运动,就必须调查当时上海的一些工会团体的现状,这样,宣传、教育工人群众才能有的放矢。

为此,他从北京到上海,亲自到码头工人中了解工人罢工的情况,到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等劳动团体调查工会团体的情况。与此同时,他约请北大的进步学生和各地革命青年,深入工人中开展调查,广泛了解工人的状况。他还亲自写信给高君宇,请他托在太原的朋友,调查当地工人的劳动状况。他对产业最集中的上海的劳动状况,尤其关注,有托朋友调查的,有登报征求又派人亲自调查的。在开展调查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劳动者的支持、指导和帮助,甚至有的工人自己写作投稿,向《新青年》杂志反映工人的情况。

陈独秀在广泛深入调查、基本了解工人状况的基础上,又独具慧眼,利用《新青年》这块举国闻名的舆论阵地,独具匠心地编辑出版了一期专刊——《劳动节纪念号》。

这期特刊凝聚着陈独秀的心血,其内容非常丰富,形式新颖活泼,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第一篇文章是李大钊写的《五一运动史》,介绍国际劳动节的由来及欧美工人为实现8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史,希望中国工人“认定今年‘五一’纪念日作一个觉醒的日期”。另有美国、英国、日本劳动运动的介绍,还全文刊载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劳动法典》。对国内劳动状况调查的文章,约占专刊全部篇幅的三分之二,有香港工人罢工、巴黎华工以及南京、唐山、山西、江苏、江都、长沙、芜湖、无锡、北京、上海、天津和皖豫鄂浙冶铁工人等省市劳动状况的调查,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工人阶级的现状。如《上海劳动状况》一文,按照机器

工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服务行业四大类、47个业别，分别介绍了工人人数，工作时间，工资数，工人家庭生活，工人受资本家、工头的剥削和掠夺，工人的来源和帮会组织以及受黑势力的压迫，工人的文化程度及严重缺乏教育等状况。

《劳动节纪念号》发表了16人的题字，其中有孙中山、蔡元培等革命家、教育家的题字。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劳苦工人的题字，内容反映的都是工人阶级的心声，如：“不劳动者人类之公敌也”；“黜逐强权，劳动自治”；“不劳动者口中之道德神圣皆伪也”；“惟亲身劳动者有平等互助精神”等等。除工人题字外，还刊登了33幅工人劳动状况的照片。工人的题字和照片登上举国闻名的大型刊物《新青年》，史无前例，非但使《新青年》这一名刊显得光彩夺目，更是凸现陈独秀宣传工人、教育工人的良苦用心，特别是引导工人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思想情结。

这期特刊，是当时知识分子了解工人、宣传工人的一部好教材，是先进的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开始相结合的产物。陈独秀编辑、出版《劳动节纪念号》，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次大胆地、成功的实践，也是他思想转变的一个重大的表现。蔡和森曾说：《新青年》以前“是美国思想宣传机关，但是到了仲甫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就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蔡和森认为，陈独秀编辑、出版的这期《劳动节纪念号》特刊，“才完全把美国思想赶跑了。”

陈独秀在编辑《劳动节纪念号》的同时，还积极组织领导了庆祝五一节的集会。之前，他积极参加工会庆祝“五一”节的筹备工作。4月2日，他出席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4月中旬，陈独秀联合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界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和药业友谊联合会七家团体，召开联席会议，筹备召开“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在这次筹备会上，陈独秀发表了关于“劳工要旨”的演讲，他呼吁各工会团体，要注重各业分会之组织，急谋工人本身之利益，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

在陈独秀的指导下，五一节庆祝大会如期隆重召开，上海各业有5000多产业工人参加。大会庄严提出了“三八制”的要求，喊出了“劳工万岁”的口号，并发布了《上海工人宣言》。宣言指出：“我们上海工人今年举行破天荒的‘五一’运动，……唤起中国工人觉悟”，以“改善中国工人的生活，增进中国工人的知识，表现中国工人的人格。”

“五一”这一天，广州、北京、漳州等地工人分别举行纪念活动，工人和知识分子共同集会，革命知识分子发表演说，宣传马克思主义，热情支持工人的斗争。“五一”这一天，单是长辛店这个地方，就“召开了有千百个工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工人亲自在会上发表了鼓动性的演说，会议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可是仍有一些工人没有来得及发言。群众大会以后，开始游行，由一千五百名工人组成的游行队伍，高举着写有重要标语的旗帜，唱着革命歌曲，喊着‘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的口号沿街行进。这个事件过后，在不到一个星期之内，工厂车间里发生了十起使管理人员感到极大不安的小型活动。”^①可见，五一节纪念活动的规模之大、声势之大、影响之大。

这次五一节纪念活动，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尝试，它使中国在“黑暗里突然的透出一线儿红”。这是“北极下来的新潮，从近东卷到远东。那潮头上拥著无数的锤儿锄儿，直要锤匀了锄光了世间的平不公”！^②

二、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之前后，陈独秀主持创办《劳动界》、《伙友》等刊物，直接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思想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学说。陈独秀在他向马克思主义者飞跃前进的时期，特别重视创办工人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1920年1月，陈独秀著文《告新文化运动诸同志》，文章针对当时出版界许多刊物性质相同的情况，劝说“上海的朋友要办报，不必办和人雷同的报。上海工商业都很发达，像‘店员周刊’、‘劳动周刊’，倒有办的必要。但至今无人肯办。难道不高兴张嘴和店员劳动家说话吗？难道因为这种报不时髦，不能挂‘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招牌吗？”他还明确地指出新文化运动将影响到各个方面，“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要把劳动者当作同类的‘人’看待，不要当做机器、牛、马、奴隶看待。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现实政治底羁绊。”^③陈独秀主张，宣传社会主义，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必须把宣传教育的对象扩大到工人群众，让广大劳动群众通过阅读进步的报刊，接受教育，及早觉悟起来，因为劳动者的阶级觉悟是最高的觉悟。

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前后,陈独秀着手筹办了两种工人刊物,一为《劳动界》周刊,一为《伙友》周刊。

《劳动界》周刊于1920年8月15日创刊,1921年1月23日陈独秀离沪到广州后停刊,共出版了24期。该周刊由陈独秀和李汉俊发起创办,其宗旨在于:通过刊物宣传,改良劳动界的境遇,使刊物成为一个中国劳动阶级有力的言论机关。主要撰稿人有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袁振英(署名震瀛)等。每期有演说、国内外劳动界、调查、时事、读者投稿等栏目,内容甚为丰富。

《伙友》周刊于1920年10月10日创刊,新青年社发行,由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与工商友谊会联合创办,陈独秀任主编。刊物宗旨是“(一)诉说伙友们现在的苦恼;(二)研究伙友们将来的职务”。后来由于工商友谊会利用《伙友》宣扬劳资合作,新青年社即不再代为发行。工商友谊会扬言“同陈某绝交”。至11月中旬,《伙友》第六期出版以后,便和中共上海发起组完全脱离了关系。

陈独秀不仅发起创办或主编这些工人刊物,而且积极为报刊撰稿,满腔热情地向工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1920年,陈独秀为这些工人报刊及《新青年》等其他刊物,撰写发表的关于工人运动的文章就有20篇左右,数量相当可观。

在这些论著(包括演讲)中,作者怀着对工人阶级深厚的感情,高度评价工人劳苦大众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1920年5月1日,陈独秀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上,发表了《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说,称赞“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是没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他希望工人群众迅速觉悟起来,认识到自己的伟大力量和历史使命。他指出:“世界劳动者的觉悟,计分两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改良,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第一步觉悟后所要求的,是劳动者对于国家、资本家,要求待遇改良(像减少时间,增加工价,改良卫生,保险教育等事),第二步觉悟后所要求的,是要求做工的人自己起来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居于治人的地位。”这第二步要求,虽然“眼前办不到,也不妨作此想”。要敢于把几千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话倒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④

陈独秀在文章中极力为工人“减时增资”呼吁。工人每日工作长达12个小时,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而一天的工资却只有二、三角钱,这点工资仅仅能够糊个人的口,社会地位十分卑贱,没有丝毫的政治权利,人世间是何等的不平等啊!有人认为“工人缺乏知识,非注重教育,则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适足以资其为恶。”陈独秀针对这一错误言论,在《答知耻(工人时间、工资问题)》一文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工人的教育固然要紧,但不能做减时增资的必须条件;“社会上有钱不做工的人很多,因何理由要强迫穷人非增加教育时间不能减少做工时间呢?”“况且十二时制倘不改少,工人教育问题便绝对没有办法;照这样下去,工业越发达,人民底知识精力越退步,将造成人种衰微的现象。……工人教育问题,固然非工作时间减少无办法,工人卫生问题,也非减少时间无办法。”^⑤

陈独秀利用自己的笔,向工人群众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工人为什么苦?工人创造的财富哪儿去了?陈独秀对这个问题,按照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作了通俗的解释:“工人劳力所生产的价值,远在他们每日所得的工资以上,这工资以上的剩余价,都被资本家抢去,叫做‘红利’分配了。”^⑥工值是什么?工值“是工人每日劳动结果的生产额在市面上的价值,不是资本家任意定的三角二角。三角二角以外的剩余工值,都被资本家——股东用红利底名义抢夺去了,工人丝毫分不着;工值抢了去,反过脸来还要审问被抢者底工作能力之大小责任心之有无,这实在是清平世界里不可赦的罪恶”!^⑦

陈独秀高度关注劳苦人民的生计、生存问题。1919年6月8日,他在《立宪政治与政党》、《吃饭问题》等文章中,明确地提出“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与政党,马上都要成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饭要紧。”吃饭问题,“成了二十世纪劈头第一个大问题”。^⑧

陈独秀等人所创办的工人刊物或给工人写的文章,说的都是工人的事,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很受工人欢迎。杨树浦电灯厂钳工陈文焕曾写信给陈独秀,说“从前受资本家的压逼,……有话不能讲,有冤无处伸!现在有了你们所刊行的《劳动界》,我们苦恼的工人,有话可以讲了,有冤可以伸了,做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呵!我们祝《劳动界》万岁!祝先生的身体健康!”可见,创办工人刊物是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很好的方式,这种方式,广大工人群众是真诚欢迎和乐意接受的。

三、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催生了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这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必然

1920年9月1日,陈独秀发表长篇论文《谈政治》,明确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①

1919年12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宣言》中大声疾呼,说“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即资本主义——笔者)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他主张“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并进而指明新社会的“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无职业做标准,不拿有无财产做标准”,这显然是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狭隘性和局限性,期求更广泛的民主政治。《宣言》明确提出“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但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要“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很显然,陈独秀有朝一日他将独树一帜,创立为全体人民谋利益的政党。^②

1920年5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着手为建党做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经过酝酿和准备,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出版部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陈独秀指导下,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成为创建中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中心。从1920年秋天到1921年上半年,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陆续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主要的活动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运动,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将《新青年》改为自己的机关刊物,随后又创办了半公开的刊物《共产党》和通俗刊物《劳动界》,领导成立了机器工会和印刷工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出版了《劳动音》、《工人周刊》,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1920年1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阐明中国共产主义者关于创立共产主义新社会的理想,提出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废除旧的国家机器,消灭阶级的主张。《宣言》还提出,无产阶级要创立新社会,就要团结起来,开展阶级斗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铲除资本制度;就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宣言》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主张。

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成立,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它的诞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陈独秀是有大功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任建树著:《陈独秀大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版。

注释:

- ①《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1,第17—18页。
- ②《红色的新年》,《星期评论新年号》第31号。笔者转引自任建树著《陈独秀大传》,1999年5月版,第211页。
- ③《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出版,1984年6月版,第516页。
- ④《劳动者底觉悟》,《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出版,1984年6月版,第520、521页。
- ⑤《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一文中《我的意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出版,1984年6月版,第524页。
- ⑥《答知耻(工人时间、工资问题)》,《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出版,1984年6月版,第528页。
- ⑦《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一文中《我的意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出版,1984年6月版,第525页。
- ⑧《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出版,1984年6月版,第422页、423页。
- 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出版,1984年6月版,第10页。
- ⑩《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出版,1984年6月版,第427页、428页。

陈独秀“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思想初探

安庆市陈独秀学术研究会 叶庆

“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是陈独秀在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述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近年来,陈独秀的这一思想已逐渐引起理论界的关注,不少人在研究陈独秀的文章中都提到了这一思想。这里不揣浅陋,谨对陈独秀“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思想的形成及其主要内容和历史意义作一初步探索,以求教于各位专家。

一、陈独秀“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思想的形成

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早年,他愤于帝国主义列强侵掠和清廷腐败,是个忧国忧民的民主主义者,其主张只是要通过改变以“孔教”为代表的传统思想,实现“国富民强”。对“社会主义”虽有所闻,却并不以为中国也要实行。1917年他曾说:“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唯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①1919年他描绘的理想社会是:“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辗转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倍受屈辱,而袁世凯之后国内仍然是军阀混战不休,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和世界的残酷现实促使陈独秀不得不思考新的道路。在逐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了迅速而巨大的变化,很快从一个“社会进化论”者完全转变为一个“社会革命论”者。1920年9月他在《谈政治》一文结尾说:“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后事如何,就不是我们所应该所能够包办的了。”^③1921年他又说:“社会的进步不单是空发高论可以收效的,必须有一部分人真能指出现社会制度的弊病,用力量把旧制度推翻,同时用力量把新制度建设起来,社会才有进步。力量用得最剧烈的就是革命。革命不是别的,只是新旧制度交替的一种手段。”^④

在这之后,陈独秀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认为,由于“现代人类的经济关系乃国际的而非国别的了……此时我们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底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底必要。”^⑤

第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之前要经历一个“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陈独秀说:“在这种世界政治的经济状况之下的中国……遂使中国的阶级争斗不得不分为两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阶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⑥

第三,中国的“国民革命”只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陈独秀指出:“或者有人发生一种疑问:社会主义者为什么做国民运动?国民运动与社会主义有什么关系?简单的答案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其性质其结果不是属于一个国家的革命,乃是世界的革命;不仅是民主主义对于军阀的革命,还是平民主义对于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⑦“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国民革命,形式上虽是一国的革命,事实上是世界的革命之一部分,而且是重大的一部分。”^⑧

第四,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过去人们批判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核心问题是认定陈独秀主张民主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这是不符合事实的。陈独秀确实认为当时中国无产阶级尚不能独立承担民主革命重任,主张“此种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所以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必由之路。”^⑨但他同时也认为,“革命的资产阶级应该和革命的无产阶级妥协,打倒共同敌对的

军阀阶级,不应该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妥协;因为劳动群众本来具有革命的实力,应在革命运动中占重要部分。”^⑨当然,陈独秀在开始主张“各阶级群起合作的大革命”时对“谁来领导”的问题态度模糊,但这种情况很快就得到了改变。1925年,陈独秀主持的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就明确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而且把无产阶级领导地位问题与农民同盟军问题联系起来,指出如果不发动农民斗争,“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⑩

第五,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有可能直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指出:“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一九一七年俄罗斯革命就是一个好例。俄罗斯各阶级各党派的联合革命,本以推倒皇室为共同目标,只以工人阶级在一九〇五年之革命及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中特殊努力,又以当时资本主义的列强因大战而濒于破产,自救不遑,十月革命遂至发生新的政治组织。但是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⑪

应该承认,由于陈独秀从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过程是这样之短,因此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虽然已经有一个轮廓,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明显还是受到“正统思想”的影响,还不是经过他自己深思熟虑的。在中国当时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当“革命”和“社会主义”已被中国的先进分子狂热崇拜的情况下,陈独秀在阐述这些观点的时候便难免有时明确犀利,有时偏激走火,甚至有自相矛盾之处。这种矛盾表面看是理论和现实的矛盾,实质上却源于他内心深处长期的思考:革命的目的是什么?革命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目的?

陈独秀从来就是一个“孤独的思想者”,而不是一個人云亦云的人。1919年他在文章中写道:“我个人的意思:觉得‘社会生活向上’是我们的目的,政治、道德、经济的进步,不过是达到这目的的工具,总不算得是目的。我敢说若要改良政治,别忘了政治是一种工具,别拿工具当目的,才可以改良出来适合我们目的的工具。”“我不愿意采用‘两元’的名词。因为本来我们所痛苦的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分裂生活,我们所渴望的是将来社会制度的结合生活,我们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我们渴望纯粹资本作用——离开劳力的资本作用——渐渐消灭,不至于造成阶级争斗……我心中所想说的话,不愿说出,恐怕有人误作调和政策,为一方面所利用,失了我的本意。”^⑫1927年他又说:“真正的革命主义者,对于实际许可的固然不肯轻让一步,同时对于实际所不许可的也不愿意乱进一步,民众若有时超过实际可能的幻想,领导民众的革命党便应该努力向民众解释,领导他们从幻想的迷途与危险阵地到能够实际争斗的战场,民众所需要的是这样知己知彼、知进知退、能争善战的先锋,而不是跟着民众后面乱跑的尾巴主义者。因此,凡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党,不分在野在朝,对民众应该取这样真诚的态度,并不是在野时便可以故意向左一点,任意发出些不负责任的支票以取悦民众;一旦在朝便向右转,另摆出一副面孔,以前发出的支票一概不兑现或大打其折扣。所以革命党应该始终以民众的真实利益为前提。”^⑬陈独秀对那种不顾客观条件,仅凭主观意愿盲目追求社会经济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特别反感,认为这实际上将造成历史倒退。他说:“我们想把中国现在不好的社会改造过来,一定不可忽视了客观境界。不然,必至弄到主张社会革命简直和张勋复辟是同样的价值。张勋复辟也说现社会不好,非把它改造不可,这完全是他主观的要求,并不是客观的境界。所以离开客观的境界,单由主观的要求,只是不满足现社会来谋改造,在主观上,无异于张勋复辟。”^⑭正是在经历这样长期的矛盾和思考之后,1927年4月,陈独秀提出了“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概念。这是陈独秀在对社会主义的论述中第一个独创性的理论思想,也标志着陈独秀对中国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在认识上有了质的飞跃。

二、陈独秀“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历史意义

1927年4月6日,陈独秀在答沈滨祈、朱近赤的信中说:“中国国民革命之性质,是世界资本主义将近崩溃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资本帝国主义之各压迫阶级的民族、民权、民生革命,而不是世界资本主义初兴时代之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因为革命的世界环境不同,革命的国内社会势力又不同,所以革命时

革命后之政治的构造和经济的建设,便自然和前两世纪纯资产阶级的革命不同。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政治的经济的统治下之殖民地半殖民地……只有工农及其它被压迫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才能够真正脱离帝国主义之统治,才能够力图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建设,才能够不一定经过再度革命方式而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陈独秀接着指出,在这个过渡的“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阶段内,不是采取单一所有制,而是保持各种经济成份并存,在“国民革命成功之后,我国的经济制度,自然是家庭的手工业与农业、小生产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制、国家资本主义等,四种并行。我们所谓采用何种经济制度,并不是说只采用那一种而禁绝其余一切,乃是说采用某一种为全社会中主要的生产制度。我们以为中国国民革命成功后的经济建设,在主观上在客观上,都不必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全社会主要的生产制度,而可以采用国家资本主义以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即是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⑩

陈独秀提出“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思想,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的观点,而是他长期思考的结果,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随着大革命的失败、抗日战争的爆发和对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种种弊病的反思,陈独秀“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思想也更加明晰、成熟和丰富起来,体现了陈独秀作为一个革命导师非凡的政治智慧和超人的理论勇气。

“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思想的核心,在于阐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陈独秀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空前激化的时代,世界范围内的革命高潮迭起。在许多人中间,产生了为政治斗争而政治斗争的偏向,把阶级斗争当成了目的,而不是解放生产力、并为生产力发展服务的一种手段;而另一些人则主张回避阶级斗争,以教育或文化救国。陈独秀力排这两个方面的错误认识,把“脱离帝国主义之统治”和“力图经济建设”作为“行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两个标志,体现了他一贯认为阶级斗争应该服从并服务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任何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所表现作用的好坏归根到底是看其对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看其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主张。他曾说:“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⑪“社会经济的问题不解决,政治上的大问题没有一件能解决的,社会经济简直是政治的基础。”^⑫陈独秀认为,发展经济实质上就是各种社会争斗的直接或间接的动因和目的。他尖锐地指出:“此次我们对日战争,固然可以说为民族生存而战,然而明了正确地说,应该是‘为民族工业而战’。”“只要大家靠定为发展民族工业自作主人而战这一具体要求,即令此次战争完全失败,我们的民族运动决不会瓦解冰消;可是我们的民族运动,决不会在空洞的‘民族利益’口号或什么‘为正义’‘为世界和平’等空话大话之下再起的。”“‘战争与革命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后果’,这句话可以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⑬对于发展经济的目的,陈独秀认为就是为了提高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说,“民国必须建设在最大多数人民的幸福上面,人民的幸福又以经济的生活最切要。经济的生活不进步,所谓人民的幸福,仍只是一句空话。”^⑭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很有针对性的,也是需要极大的理论信念和政治勇气的。

“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思想的实质,在于坚持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方向。陈独秀在对世界各国发展经济的不同道路进行研究,并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批判之后,仍然主张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1922年他在《造国论》中就说,“用什么方法来创造经济?我们的答案是:采取国家社会主义……用私人资本主义开发实业,在理论上我们不能赞成,因为他在欧、美、日本所造成的罪恶已是不能掩饰的了;在事实上,以中国资产阶级幼稚的现状,断然不能在短期间发展到能够应付中国急于开发实业的需要,而且在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国内军阀的扰乱未解除以前,中国的资产阶级很难得着发展的机会……所以我们敢说,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来开发实业,是国民革命成功后不能免的境界。”^⑮1923年他在演讲中指出:“我们从‘社会历史的进化’观察起来,已经证明社会主义是今后必走的路。所以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并不是凭空的盲目的——主观的要求,乃是事实的理性的——客观的境界。”^⑯1938年在《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文中他仍然说:“直到今天,除了古代社会,我们所知道的逐渐进步的经济制度主要的只有三个: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对于生产力之增高和人类幸福,都好过资本主义制,为取法乎上计,我们为什么不应该采用社会主义制度来发展工业……都由于社会发展的条件使然,并非人类主观上故意要先采用较坏的资本主义制,后采用较好的社会主义制。”他又说:“现在的中国,

也有许多青年人模模糊糊的反对资本主义,爱好社会主义,这可以说是一个进步。但我们必须向他们指出,不根据经济发展,不根据政治斗争,只满怀着厌恶资本主义感情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区别。”^⑧由此可以看出,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始终如一的。“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实质是行向“社会主义”,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激进派的“空想社会主义”,是要经过一个过渡时期的“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

“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思想的最大贡献,在于为中国指明了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从列宁到毛泽东,始终困扰着革命领袖的最大难题是:怎样在经济落后国家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由于理论家们总是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下意识地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截然分开,完全对立,非此即彼,水火不容,因此也就不可能解决马克思所未曾涉及的这一课题。虽然列宁曾通过“新经济政策”作过一些探索,终因他逝世过早而半途而废。陈独秀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真正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像《皇帝的新衣》寓言中那个敢说实话的小孩一样,揭示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不过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历史过程”、其间并没有绝对界限的真象。陈独秀认为,“我们改造社会,并不是将原有的社会完全不要,白地里另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来给我们居住。我们改造社会,绝对没有这么一回事。仍然是在旧社会里造出一新社会来,所以我们要从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造成社会主义的社会,便不得不先要明白社会之历史的进化是怎么一回事。”^⑨他说:“无产阶级开始建设的时候,即在产业充分发达的国家,也不能没有一种过渡的经济政策,才能渡到废绝私产,实行社会主义的分配。”^⑩陈独秀还指出,一个社会的性质并不在于它贴的是“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标签,而要看它实际的经济关系。因此,关键是如何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只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并不可怕。而生产力发展不够,就是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也没用。出于这一认识,陈独秀在后期又把“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直接称为“民族的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他说:“在科学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无论为功为罪,而毕竟是人类社会进化所必经的过程。没有它,小有产者的社会便没有发展生产力和生产集中之可能。因此只有无产者,而不会有工业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决不会因为厌恶它而不来,社会主义也不能因为人们爱好它而来。”“我们不要学唯名主义者,一听到社会主义便肃然起敬,一听资本主义便畏之如蛇蝎,厌之如粪蛆。如果人们不敢断言中国此时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制发展工业,就必然毅然决然采用资本主义制来发展工业。只有工业发展,才能够清除旧社会的落后性,才能开辟新社会的道路。”^⑪他在分析当时苏俄的情况后说:“如果列宁有理由说苏俄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也可以说,苏俄的国家工业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苏俄虽然经过了社会革命,变更了财产关系,变更了国家的阶级性,剩余劳动在名义上归了工人自己的国家,而实际上远远优裕过一般工人工资和生活的高级职员和寄生官僚这一阶层还存在着,如此便不能够说已经走出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⑫他还引用列宁的话说:“列宁说过:‘俄国工人吃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而不是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在中国更是如此!”^⑬

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明确地指出,在“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必须是工农掌握政权,才能够使国家资本主义方式行向社会主义的建设。他把这种“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或称“民族的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严格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私人资本主义”。他在答沈滨祈、朱近赤的信中提出“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概念的前提就是“只有工农及其它被压迫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才能够……”,而在提出这个概念后紧接着又强调说:“不过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其在经济上的性质如何,乃依政治上的构造如何而定,即是依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之国家的构造如何而定……只有在工农及其它被压迫剥削阶级革命的国家而采用国家资本主义,才能够由此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⑭他还说过:“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不过那时的中国资本主义,已经过国民革命的洗礼,已经是民族的民主的资本主义,他的发展影响到全民族的经济生活,和研究系这类人所要的资本主义——‘不要民族革命,不要民主革命,不经过国民革命洗礼,只由半封建势力下之军阀官僚买办,结托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道威斯式的资本主义’——相差甚大。”^⑮

“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思想,鲜明地表现了陈独秀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

合,善于将革命的“原则性”和“策略性”、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和“近期可能”相结合的创造性水平。1920年陈独秀在给郑贤宗的信中就曾说过:“我以为在社会的进化上,物质的自然趋向底势力很大,留心改造社会底人万万不可漠视这种客观的趋向,万万不能够妄想拿主观的理想来自由改造;因为有机体的复杂社会不是一个面粉团子能够让我们自由改造的,近代空想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之重要的区别就在此一点……我们应该努力去做有益的有益事业只有说明现在社会里已有的毛病,建设最近的将来比较善良的社会。倘若迷信很远的将来及终极的理想社会才算彻底,而对于现在及最近的将来之改造以为不彻底不去努力,这种人只算是‘后补改造者’,可惜他来到这世界上太早了一点。”^⑧1929年陈独秀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又说道:“原则是一定不变的,此所以谓之原则;至于策略战略,则因有复杂的时空性之不同,便不能时时事事都必须照着原则机械的死板的应用不能有一点变化性;有时因为在时空性上有需要经过曲线方能达到革命之目的,竟可采用和原则形式不同之策略。我们若不懂得这一点,就会责备列宁布列斯特和约的政策……我们若只拿几个原则甚至几个名词,以为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主义,这未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主义看得太浅薄了。”^⑨

八十年过去,“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这个拗口的概念作为名词早已被湮没在历史的烟云之中;但作为思想,却在不知不觉中为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仍不失其真理的光芒。当我们客观和冷静地回顾这段历史,回顾我们党八十年来对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程,回顾陈独秀当年的这些论述时,不能不感慨万千。也许,作为先知者的陈独秀并不遗憾,因为历史可能注定要走这样曲折的路,注定要经过挫折和牺牲才能给人以教育。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使我们更加感受到陈独秀的伟大,邓小平的伟大,更加理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加自觉地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注释:

- ①《新青年》2卷5号《答褚葆衡》
- ②《新青年》7卷1号《〈新青年〉宣言》
- ③《新青年》8卷1号
- ④《新青年》9卷3号《革命与制度》
- ⑤《新青年》9卷3号《社会主义批评》
- ⑥《东方杂志》1922年19卷15号
- ⑦⑮⑳㉑1923年在广东高师的讲演《关于社会主义问题》,见《陈独秀先生讲演录》
- ⑧⑫《前锋》1923年第2号《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 ⑨⑩《向导》22期《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
- ⑪中共四大文件
- ⑬⑱《新青年》7卷1号《实行民治的基础》
- ⑭《向导》第186期《革命与民众》
- ⑯㉒《向导》第193期
- ⑰《共产党》第1号
- ⑲1938年《我们为什么而战》
- ⑳㉓《向导》第2期《造国论》
- ㉔《政论》旬刊第1卷第23期
- ㉕《新青年》季刊第3期《答张君励及梁任公》
- ㉖㉗《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
- ㉘《资本主义在中国》
- ㉙《向导》第172期
- ㉚《新青年》8卷3号
- ㉛《陈独秀书信集》

二十世纪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孙中山、陈独秀、毛泽东的异同

沈 寂

“亚洲底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底开端,标志了在二十世纪初所揭开的全世界历史底一个新阶段。”^①因此,西方的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几乎是同时传入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在中国,几乎是政治思想的主流。这是世界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各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随其国情的不同而相异。社会主义在一国发展,也随历史阶段的不同及人的因素的差别而不同。今以孙中山、陈独秀、毛泽东三人为代表。审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念,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解读与态度,以及对经济问题的处理,排比其异同,并考察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与变异。时限在五十年代“大普及”之前,由此探究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与变异的原因所在。

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早在第一国际、第二国际时期已成气候。在十月革命之后出现的第三国际,使工人运动别开生面。我国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受俄共与第三国际的影响所笼罩。在进入本文正题之前,有必要对国际背景先作交待。

以列宁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1903年在国外秘密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即加入了第二国际。第二国际在恩格斯晚年,已由暴力推翻资本主义,转变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但列宁的俄国党仍在党纲中明载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款,并把党成为“有组织的部队”,在党内实行“集中化”,以适应秘密革命的需要。这与其当时的国情相符。它在第二国际中是独树一帜,与众不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多数参战国的西方国家的社会党领导人,诸如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放弃反战立场,转而支持本国政府。列宁则称之为“机会主义派”,或“社会沙文主义派”。他提倡“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祖国在大战中失败,无产阶级乘机夺取政权。俄国二月由人民自发起来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革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各政党都参加了。三月,临时政府宣布要召开立宪会议,因准备工作未做好而一再推延,列宁则再三催促早日召开。并以及早召开自由选举立宪会议与把土地交给农民以及对外媾和等三项与临时政府不同意见为由,发动十月革命(不流血的政变)取得政权。但在立宪会议的投票中,布尔什维克却成了少数党。其它政党则要求还政给立宪会议。列宁在1917年11月14日(27日)说:“不能忘掉步枪。”开始以枪杆子捍卫既得的政权。于是与第二国际决裂。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分裂。列宁则另建新的国际——第三国际,1919年在莫斯科召开第一次新的国际大会,改“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自称共产党,新的国际也叫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严厉斥责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自称是第二国际革命传统的真正继承者。1920年在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之后,又于7月至8月召开第二次共产国际大会。这次大会会有218人参加,代表了33个国家,不仅有欧洲的,还有亚洲的代表。有些第二国际的成员也要求参加共产国际。有人说“第三国际已取得了‘世界革命’的指挥权,……出席大会的人们,都怀着满腔的热望,以为红色先知马克思所预言的人类弥赛亚,不久之后将在大地上实现。”^②

新的共产国际与第二国际不同。第二国际是各国社会民主党的自由结合,联合各国工人对不公正进行反抗的运动,国际没有集中及指挥的权力。第三国际则不同,它由苏维埃政权所掌控,由一国资源的支持,可以集中、指挥所参与的成员国的党。推行弥赛亚的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原则,也就成了共产国际的原则。并规定了21条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成员国的党必须完全服从其主张与指挥。实际上,这个共产国际就是俄共(布)的一个外交工具,输出革命,以此推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企图赤化全球,迄斯大林时期,则由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胜利,进而为在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第三国际成立后,意大利、德国、英国、西班牙及瑞士等国的社会党都退出了第二国际。1920年2月第

二国际在斯特拉斯堡开代表大会,投票赞成抛弃第二国际。革命派主张立即加入第三国际。在12月的图尔会议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分裂成定局。共产国际以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为本;德国、瑞典和英国等国家的社会党则采取“福利国家”为模式。

1923年第二国际重建,从此社会民主党“代表民主的社会主义”而不谈共产主义。1925年虽重申为工人阶级团结而斗争,但拒绝与共产党合作。1928年宣称社会主义必须通过消灭阶级统治才能单独保障安全。同在这一年,第三国际第六次大会上提出了“第三时期”^⑤的理论,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必将发生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反对苏联的战争,殖民地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战争必引发革命,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崩溃。于是共产国际的领袖们攻击社会民主党,诬称他们是“社会法西斯主义”。1931年3月共产国际第11次全会上,斯大林说“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是孪生子。”

社会党的第二国际1931年在代表大会上通过“德国和中欧形势与工人阶级争取民主的斗争”的决议。1933年抗议希特勒的野蛮行动,呼吁国际工人联合起来。共产国际在“六大”所预言的“第三时期”不仅没到来,也没有引发革命高潮促使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崩溃。苏联自身却受到法西斯的严重威胁,共产国际才于1934年召开的第七次大会上,放弃“第三时期”的口号,并要求与第二国际成立反法西斯联合阵线。由于纳粹主义的胜利,第二国际发生分裂,并在1940年崩溃,嗣后则停止活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在1943年与欧美联盟对付德、日、意法西斯。主张消灭资本主义的共产国际宣布解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冷战开始。斯大林又成立欧洲九国共产党情报局(苏、波、南、保、罗、匈、捷,以及意大利和法国的共产党)以抵制美国的马歇尔计划。1949年美国组织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苏联则于1955年建立华沙条约组织,这都是国家的联盟,针锋相对。

社会党国际1951年6月20日在法兰克福召开代表大会,依旧是自由结合,正式重建社会党国际,出席者有34个党,共计9800万党员,本届代表大会主要通过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的与任务”的原则声明。这个文件是经过全体成员党的研究并互相讨论后通过的。它综合了所有社会党的根本原则,不管它们各自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抑或是马克思主义,或是受人道主义、宗教影响的一切其它体系。这在工人国际的历史上是第一次。1957年苏共已在致力非斯大林化,社会党国际仍然宣称与共产主义无共同之处。1964年社会党国际在布鲁塞尔庆祝国际成立100周年的特别大会,重申自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以来的目标是:“使劳动群众的生存条件,富有人道主义,并全面改善人民的生活方式”。1980年马德里代表大会,回顾并检查了六大问题:武器控制与裁军、南北关系、原则与目标、社会主义与人权、社会主义与经济民主,以及社会主义与平等。并从这天起,社会党国际转向第三世界。(下略)

有人说,整个二十世纪,世界历史是向左倾的,知识精英都向左倾斜,诸如中国的鲁迅、英国的萧伯纳、法国的罗曼·罗兰都是。这都与俄国的十月革命和共产国际弥赛亚宣传有关。中国的革命者,就是在上述国际背景下创导社会主义的。早期受第二国际的影响,继则接受苏维埃的领导。

下面分别介绍三人情况:

一、孙中山

1、大同理想

孙中山把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比附为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1905年,他就到布尔塞尔访问第二国际常设执行部,解释他所主张的纲领(他称之为“目标”)时说:

“我们黄种的同志希望……防止往往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如像欧洲国家都曾发生过的那样……。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他们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过渡的新社会,……换句话说,由于它们,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资本家剥削的痛苦”。^④

这是中国最早与西欧社会党直接接触,并希图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家。自己命名为“民生主义”。

十月革命后,他说:

“夫苏维埃主义者，即孔子之所谓大同也。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用，幼者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⑤

1912年列宁说孙中山民主主义政纲与俄国、土耳其、波斯等国的革命一样，都“涂上了完全同样的民粹主义色彩”。说他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以为经济落后而易于“社会革命”，在理论上是反动的，根据这“预防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实行纯粹资本主义的，最大限度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⑥在实践上又是进步的。

列宁也没有继续完成二月革命的民主任务，同样在“落后而比较易于进行‘社会革命’”的俄国实行了社会主义。所以1920年第二次共产国际大会上，列宁在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著名演说中，即明白具体地指出：“对于目前正在争取解放、而战后已经有了进步运动的落后民族，国民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不可避免的说法究竟对不对？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如果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对它（指经济落后的国家）进行系统的宣传，而各国苏维埃政府以它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去帮助他们，那末，说落后民族无法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不对了”。^⑦就是说拔苗是可以助长的。于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都涂上民粹主义色彩，成了苏俄所推行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2、“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

孙中山在同盟会时所规定的革命建国事业的程序，分军法、约法、宪法三个时期。在接受苏联援助，同时接受苏俄政制后，1924年实行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即把“约法”时期改为“训政”时期，仿列宁“一党专政”。因此解释“训政”为“保育”，人民是幼主，革命党是保姆，在此“保育”期间，幼主的权力，都由革命党代行。“保育”期仍为六年，进入宪法期，则还政于民。^⑧

孙中山说“师马克思之意则可”，是国共合作的前提，认同人类社会最终必实现共产主义，亦即世界大同。“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是说苏共提倡的“阶级战争”，在中国不适用。1924年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时，提出“民生史观”，就是为了改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他说用马克思的“物质是历史的中心”的理论来观察近世物质生产，就是资本家与工人两大阶级的对立关系，资本家以机器剥削工人，便产生阶级战争。要消灭资本制度，必实行“无产专制”。“到了社会革命完全成功，这两个互相战争的阶级才可以一齐消灭。”^⑨他说这是错误的，错就错在只注意社会的生产，而忽视了社会的消费。他说生产的中心，其实就是在消费“而消费就是民生问题”。^⑩

同时，孙中山还认为，当前的中国社会，是患贫，不是患不均，只有“在不均的社会，当然可用马克思的办法，提倡阶级战争去打平他。”但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今天，“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使用不着”。^⑪他指出，当前的民生主义，“但须研究对于将来的资本家加以如何限制，不必遽学外国，将资本家悉数扫除。”^⑫

孙中山不认同阶级战争为“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却认为是“一种病症。这种病症的原因，是人类不能生存。”^⑬是社会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当靠经济力量来解决。“经济力是一种天然力量，就是中国所说的‘王道’。到了经济力量有时而穷，不能达到目的时，便用政治而压迫。这种政治力量就是中国所说的‘霸道’。”^⑭时值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他说“农工专制”的激烈办法在俄国已经“试验”过了，所能解决的只是民族、民权等政治问题，近来“改变一种新经济政策，……由此便知纯用革命手段不能完全解决经济问题”。^⑮

孙中山在国共合作前，并没有提及“阶级战争”和“无产专制”，而对马克思的学说推崇备至，这里提出要纠正的，显然是指共产国际所推行的政策。

孙中山提出“以俄为师”对苏联的崇仰是真诚的，临终前的遗书，还托孤于苏联，说“我遗下的是国民党……继续与你们提携”。

3、《实业计划》

1917—1919年之间，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就是“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

《实业计划》的主要内容：1、建筑六个铁路系统，计长十万英里；2、修浚现有运河两条，新开运河两条；

3、同时对长江、黄河、淮河、西江等水道进行治理；4、在中国中部、北部、南部各建一大港口；同时开发钢铁工业和农业，使交通要隘城市现代化，移民边疆地区，以营垦植……。是一个工、农、交通等各业的综合计划，使沿海港口和内地工业区、农业区、重要原料产地与工业城市、边疆和国家政治经济重心均联成一个整体。

经济建设的方针是：以交通为开路先锋，以农矿业为实业之母，以“关键及根本”工业优先发展。

孙中山的经济建设一反清廷的闭关自守。他说“孤人之处于荒岛”易产生夜郎自大、固步自封，“尚不知国际互助之益，故不能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所以主张把国门打开的“门户开放”。提倡向西方学习，“取法乎上，赶超世界先进”。正如他在《国民月刊》出刊词所说：“外瞻世界之大势，内察本国之利弊，以日新又新之精神，图民生之幸福”。

二、陈独秀

1、改信苏维埃政制

陈独秀在东京留学时就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见诸文字的是1915年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他说“近世文明的发生，使欧洲旧社会之制度破坏无余，所存者私有财产制耳”。私有财产制“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解决之道是“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也”。^⑧

中国的“社会革命”，他认为“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也”。^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无视中国权益，激发五四爱国运动，苏俄乘机于此时发表《对华宣言》，宣布放弃前俄在华攫取之各项帝国主义权益，号召中国人民与之携手进行推翻帝国主义之世界革命，以期革命输出打破列强合围。^⑩陈独秀说“进步主义的列宁政府，宣言要帮助中国”，^⑪并轻信“十八世界以来旧的政治已经破产，中国政治界所演的丑剧，就是破产时代应有的现象”^⑫“十八世界以来的旧政治”即指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陈独秀转变后，对苏维埃的崇尚，在《苏俄六周》中可见一斑。陈撰此文，是为“解世人之疑”的。其中第三疑，“说俄国仍是专制政治”。他解释说：“其实苏俄在国家的组织上，或为省或为自治区为联邦，一任民族之自由；在政治组织上，各级苏维埃皆得随时撤其所举上级苏维埃代表，全俄苏维埃得随时撤回其所举人民委员会之委员。现在世界上这样自由民主的更有何国？”第四疑“有侵略全世界的野心”。他说经济侵略，军事侵略都不可能，“若说是理想的侵略吗？这应该是我们毫不恐惧的了。”他说“俄国目前只是物质不足，不能向共产主义猛进，至于一般政治上的建设，不但比中国、比欧美哪国都好；经济恐慌是没有的，政治的阴谋与暗斗是没有的，国家财政是有严格的预标的，……拥戴个人争权夺地盘，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市上虽有警察，我们不容易看见，因为他们从来不肯站在街心指挥市民，然而争斗失窃的事竟不大有”。^⑬晚年提及当年转变的情景：“十月革命是全俄绝大多数人民集合在共产党‘解放劳动者’、‘解放农民’、‘解放小民族’三大旗帜之下成功的；革命胜利后，三样都一一实现了，并非是俄国共产党的空头支票，并且对国外把帝俄时代对被压迫的不平等条约自动的宣告废除了。把它在被压迫国家的特殊权利如租界、领事裁判权等一一宣告放弃了。所以当时全世界劳动人民，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都看着莫斯科是全世界被压迫者的灯塔，是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参谋部”。^⑭如果说，他听信民主政治已破产，列宁政府的进步，尚属于莫斯科革命与外交东进双翼的宣传成效。那么1923年所撰《苏俄六周》已是在他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一年之后。说明他在苏联所看到的都是“形像”社会；未能接触实际情况。以上论述都是建筑在虚假现象之上的。

陈独秀信仰工农苏维埃，诚如他所说：“一不是跟着外国底新思潮凑热闹，二不是高谈什么社会主义，不过希望有一种运动，好唤起我们对于人类底同情心和对于同胞底感情，大家好来援助贫苦的劳动者，使他们不至于受我们所不能受的苦”。^⑮也是十分真诚的，1927年以后，已与苏共产生意见不合，并被开除出共产党，也没有动摇。1932年在国民党政府的法庭上，仍为苏维埃政府的先进性进行辩护。但历史是无情的，1933年开始，陈独秀“对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六七年”，终于认清苏联不是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将“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⑯

2、开明专制

陈独秀的理解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许有产者级得到政权的意思，”^⑤“从前有产阶级和封建制度争斗时，是掌了政权才打倒了封建，才完成了争斗之目的；现在无产阶级争斗也必然要掌握政权利用政权来达到他们争斗之完全目的”。^⑥如何利用政权来完成其任务呢？他说，“怎样使我们由强制而习惯的作工，使人人真能各尽所能，乃是怎样通力合作，怎样使生产事业集中为社会化，怎样使生产力大增，生产品充裕，使人人真能各取所需。想努力实行这些理想，都非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不可，……”^⑦

还是一种扩大民主的途经。他说“经济制度革命以后，凡劳动的人都得着自由，有什么不合乎‘德谟克拉西’？那班得不着自由底财产家，为什么不去劳动？到了没有不劳动的财产家，社会上都是无产的劳动者，还有什么专政不专政？”^⑧陈独秀1933年在南京监狱所撰的《上诉状》中有这样的话：“吾辈无欺之共产党，固尝提出由无产阶级、贫农专政之苏维埃政制之主张，以诉诸人民公意，此一政制特为对待剥削阶级少数人，以专政以实现被剥削者大多数人民行使统治权之真正民主国家也。”^⑨

上述理解与解读，可用英国工党领袖之一拉斯基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出版100周年时所说：

“没有一个名词像‘无产阶级专政’那样受过那么多的曲解。……无论对马克思或恩格斯来说，这个名词不是‘民主’的对称词；对他们来说，它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对称词。他们认为，任何国家，只要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那么一定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哪怕表面上是用民主的政治制度来隐蔽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指一种社会组织，在那里，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并且被竭尽全力用来防止以前当权的那个阶级把它夺回去。他们认为，工人阶级的代表们利用政权来改变生产关系，并压制阻碍这种改变的任何企图。但是既然恩格斯把巴黎公社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同起来，那么显然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建立在多数人的支持上的，它是采用普选这种技术的，而且它承认人民有权经常进行选举，有权罢免他们的代表，这就意味着广大人民群众是充分参加专政的工作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等于共产党对社会其余部分的专政，并不等于把政权集中在一个单独的党手里，然后把它的意志用暴力强加在党外全体公民的身上。”^⑩

拉斯基在此是针对列宁与苏联，与陈独秀的解读却基本一致。

陈独秀在晚年对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反思的结果是：

“不幸十月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话而已。”

“斯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之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苏联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呢？……”

“列宁当时曾经警觉到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而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LT直至独裁这把利刀伤害到自己，才想到……，然而太晚了！其余一班无知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更加把独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这种荒谬的观点，随着十月革命的权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个采用这种观点的便是墨索黑尼，第二个便是希特勒，首创独裁制本土——苏联，更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为，从此崇拜独裁的徒子徒孙普遍了全世界，特别是欧洲……第一个是莫斯科，第二个是柏林，第三个是罗马，这三个反动堡垒，把现代变成了新的中世纪。”^⑪

陈独秀在《我的根本意见》中总结：

“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决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⑫

3、“社会生活向上”与“不要害怕资本主义”

陈独秀倡导新文化运动时，认为国家当“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⑬同时指出：“今日之社会、植

产兴业之社会也；分工合力之社会也，尊重个人生产力，以谋求其安宁幸福之社会也”。^④

“人生在世，究为的什么？”陈独秀说：“我敢说道，个人生存的时候，当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并且留在社会上，后来的个人也能享受。递相授受，以至无穷”。这就是“人生真义”。^⑤

1919年他在回应杜威关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时说：

“我们现在所盼望的实行民治，自然也不限于政治一方面。而且我个人的意思，觉得‘社会生活向上’是我们的目的，政治、道德、经济的进步，不过是达到这目的的各种工具。政治虽是重要的工具，总不算得是目的。我敢说若要改良政治，别忘了政治是一种工具，别拿工具当目的，才可以改良出来适合我们目的的工具。……因此我们所主张的民治，是照着杜威博士所举的四种原素，把政治和社会经济两方面的民治主义，当做达到我们目的——社会生活向上——的两大工具。”

同时强调两大工具“应该置重社会经济方面……社会经济简直是政治的基础”。^⑥

陈独秀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1921年，陈独秀复信蔡和森说：“唯物史观是研究过去历史之经济的说明；主张革命是我们创造将来历史之最努力最有效的方法。”“历史上一切制度底变化是随经济制度底变化而变化的”。^⑦他认为以唯物史观进行经济制度的革命，犹如利用自然法则来征服自然一样。这里所说的经济制度的革命就是社会主义。

陈独秀在接受苏维埃主义后，则以理想化的苏俄共和国与现实的共和国相对照。认为“封建主义时代只最少数人得着幸福，资本主义时代也不过次少数人得着幸福，多数人仍然被压在少数人势力底下，得不着自由与幸福”。把原来信仰的进化思想，套用列宁神化了的规律说，“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的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的”。^⑧

陈独秀在宣传理想化的苏维埃共和国时，未免言之偏颇，如他说“世界各共和国底报纸那一家不受资本家支配”。竟忘了自我，他办的《新青年》究由谁支配？过早地把西方劳资间的“阶级战争”观念介绍来中国；过早地宣传资本主义在生产与分配中的负面因素……。都有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事实证明，世界资本主义在发展中还能吸取社会主义的长处而自我调节；而共产主义者却对资本主义的长处一概排斥而固步自封。历史证明苏俄的“社会主义”不是理想的天堂。

陈独秀经过反思，再次以进化观点审视问题，认为社会历史依一般进化是“循序渐进的”。他同意列宁所说“俄国工人吃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不是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在中国更是如此……。目前的问题不是‘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本国资本主义，或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⑨最后，他说：“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经的过程，要来的东西让它快点来，不要害怕它。老成谋国者，要‘负责任，说老实话’，不好存在丝毫虚骄之气”。^⑩

三、毛泽东

1、“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思想与制度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落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保夕，快进博物馆了。唯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⑪

这里所歌颂的是一国建设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在1948年他说：“十月革命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这条革命战线是在列宁，而在列宁死后是在斯大林的英明的指导之下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⑫1949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时说：

“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中国人

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④

1957年他这样说：

“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⑤

毛泽东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范式，来谱写中国革命史，是属原理的演绎，非史事的归纳。他的逻辑推导，还须辅以历史事实的验证。

毛泽东在1919年尚信奉无政府主义，主张以温和的方法“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⑥1920年接到蔡和森由法国转来“俄国方式的革命”后，于是放弃了不流血的“忠告运动”，改走苏共之路——枪杆子里出政权。把中国革命归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亦称西欧社会民主党为“社会帝国主义”。把世界未来预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将来要成为一定时期中的世界统治形式”。^⑦

毛泽东说：“积二十八年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⑧历史不是这样，如上所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是站在英美一边的。1941年希特勒突然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掉转枪口，在一天之内侵入苏俄国境，丘吉尔立即呼吁全面支援苏俄。^⑨蒋介石也曾受到斯大林援助。在《雅尔塔秘密协定》中，中国旅大的租借，中东铁路的中俄共管等规定，苏联无故侵占了中国权益。

毛泽东又说：“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地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⑩事实亦非如此。解放军渡过长江，国民政府迁去广州，美驻华大使依然留驻，表明美国已决定不支持国民政府，“希望开设新店”者，即是希望与中国建交，使中共政权在冷战中中立；建交后不是“捞一把”，而是给予支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文中、对两种援助的态度是绝然相反的：(1)有人建议“不要国际(指第三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毛泽东说：“这是错误的想法。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这是他的自我辩解，但反之亦然，国民政府接受美国的援助，同样是可以理解的。但蒋介石没有提出“一边倒”。(2)另有人说：“我们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毛则说：“在现时，这是幼稚的想法。现时英美的统治还是帝国主义者，他们会给人民国家以援助吗？我们同这些国家做生意以及假设这些国家在将来愿意在互利的条件之下借钱给我们，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要赚钱，银行家要赚利息，借以解救他们自己的危机，并不是什么对中国人民的援助。”^⑪平等建交，互利借款，这是正常的国际关系，做生意赚钱也是普世通则，苏俄的援助亦非无私的！所谓“借以解救他们自己的危机！”酷似乾隆拒绝马戛尔尼的通商要求，究竟谁是“幼稚的想法”？毛泽东毅然“别了司徒雷登”，公然宣称“一边倒”。表明他只愿、也只会走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愿、亦不会走独立的自主道路。是“性相近”的本能反映。

2、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的阐释是：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个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这种“人民”与“反动派”，是政治的界定，凭其好恶为标准。不是法律的界定。他说“蒋介石背叛孙中山，拿了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专政作为压迫中国平民的工具。这个反革命专政实行了二十二年，到现在才为我们领导的中国平民所推翻。”他说 he 现在是学蒋介石的一党独裁来行使人民民主专政，“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考诸历史,蒋介石在反共问题上背叛了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但在“一党专政”问题上遵循了孙中山的遗训的。孙中山的“一党专政”体制是从苏俄移植来的,与毛泽东即将实施的,同出一源。照毛泽东的说法,蒋介石当年是把“中国平民”当作专政对象,那么中共是当时中国平民的代表,在此前的二十二年中,只能“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但在1927年以后的二十二年中,亦有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还去重庆与国民党政府谈判过,中共办有自己的报纸,始终不辍,不是在“乱说”吗?根据地与军队不是在“乱动”吗?当然,这一切都是由苏联导演的,却是事实。所以他说的“革命专政”,不能说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引用朱熹的话“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更离题了。朱熹所说,是为《中庸》里“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的注释。注云:“若以人治人,则所以为人之道,各在当人之身,初无彼此之则。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盖责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远人以为道也”。^⑨

1940年,毛泽东向蒋氏政权说:“从前有人说过一句话,说是‘有饭大家吃’,我想这可比喻新民主主义。既然有饭大家吃,就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⑩但在他执政后,没有人敢再说这样的话了。因为他公开承认“‘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你们说对了”。这是从列宁处继承来的。

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完全是仿行列宁、斯大林式的无产阶级专政。

3、经济与政治——政治挂帅

在《毛主席语录》里所选编的32类论中,没有一类是经济的。在《矛盾论》中,他说马克思注意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会引发各种不同的社会革命。毛则强调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理论的反作用。但在掌权后则说“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的社会主义部分,所研究的是阶级斗争学说、国家论、革命论、党论、战略、策略等等”。于是把政治挂帅说成普遍的规律:“首先造成舆论,夺取政权,然后才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并认为落后的国家,革命愈容易。他说“列宁说‘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这个说法现在看来不对。其实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愈穷,愈要革命。”^⑪先有政治的觉悟,后有经济的发展,“抓革命,促生产”。

早在1937年,毛在延安接见美国托·阿·比森时说:“从世界的现实情况看,中国也可能不经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⑫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说:中国革命的两个阶段,“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⑬所谓第一阶段,即是指夺取政权的革命时期,第二步即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必须衔接”,即是两步并作一步行。但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中又说“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发展——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种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亦有利于无产阶级”。^⑭前后所论,似乎是矛盾的。其究竟是认识的发展、抑或策略的改变?当时是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的前夕,如谈判成功,成立联合政府,则发展资本主义势成必然;若谈判失败,发生内战,在内战中取得政权,实行一党执政,则执行固定方针。毛泽东的策略逻辑:两种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事实的发展,正如他说“我国在解放战争中,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民主革命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我们还用了三年时间来完成土地改革,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立即没收了占全国工业、运输业固定资产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转为全民所有制。”^⑮于是,再次闭关,与世隔绝,建设他所想像的“社会主义”。

孙中山与陈独秀原先都是接受第二国际的主张。在社会党的书中,称“社会主义”一词,可能是意大利作家吉利亚尼在1803年前后“创造”的,1822年英国的罗伯特欧文,1832年法国圣西门派和傅立叶派等沿用这个名词。它表示对社会不公正的反抗。^⑯

孙中山自幼接受西方教育,为避免中国工人遭受西方工人那样的压迫。“诚恳地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接受一党专政的政制,而不行阶级战争,是对议会民主的留恋。

陈独秀在日本接受的社会主义,视其为去除经济“不平等与压制”的方法。自信奉苏维埃主义后,“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后事如何?就不是我们所应该所能够包办的了。”^⑧强调只限于宣传倡导。仍不失为一种新的启蒙。陈独秀实是把苏维埃主义引入我国的始作俑者,却能迷途知返,晚年的反思,是自我超越,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

毛泽东依据斯大林的理论架构新民主主义论之时,正是陈独秀反思莫斯科“把现代变成了新的中世纪”之日。陈独秀当时说毛“既不懂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是什么、又厌恶资本主义,于是提出力争非资本主义前途的说法”。^⑨又警告说:“列宁曾劝俄国的民粹派学习中国的孙中山先生……我希望历史不至重演……不至倒过来学习俄国的民粹派”。^⑩不幸而言中了。毛泽东是直接效法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前进的。其原因固有时代差别的因素,领导人的素质更是关键。中国社会主义的理念在异化。

“青史已书殷鉴在”,弥赛亚——大救星,就是社会主义的异化?!

注释:

①列宁《亚洲底觉醒》《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41页。

②转引自郑学稼《第三国际兴亡史》第58页,香港亚洲出版有限公司,1954年6月。

③“第三时期”的理论,是共产国际“六大”召开期间,1928年8月29日第75次会议上通过的《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的任务》的序言(由布哈林起草)提出的。其主要内容是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政治形势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资本主义制度陷于严重危机,无产阶级采取直接革命行动时期。这个时期在1921年达到顶峰,而以1923年德国无产阶级十月失败而告终。第二时期是资本主义制度渐趋稳定,资本主义经济复兴时期,也是无产阶级大军为几次严重失败所削弱后,继续进行自卫斗争时期。第三时期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内部矛盾愈演愈烈的时期。经过这一时期,将导致一个新时代。(见顾西林《新时期与共产国际政策之转变》,载《国际月刊》1卷2期,1930.3.15)。

④《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谈话报导》1905年5月中旬,《孙中山全集》(一)第273页。

⑤《孙中山选集》第535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1版。

⑥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29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

⑦《列宁选集》(四),第336页。

⑧均见孙中山《建国大纲》。

⑨《孙中山选集》第813页。

⑩《孙中山选集》第825页。

⑪《孙中山选集》第847页。

⑫《军人精神教育》(1922.1)。

⑬《孙中山选集》第817页。

⑭《孙中山选集》第873页。

⑮《孙中山选集》第826—827页。

⑯《新青年》1卷1号,1915年9月。

⑰《新青年》2卷5号。

⑱参阅敖光旭《革命,外交之变奏——中俄交涉中知识界对俄态度之演变》(1919—192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5期,2007.3。

⑲《保守主义与侵略主义》《新青年》7卷2号(1920.1.1)。

⑳《我的解决中国政治方针》《时事新报·学灯》1920.5.24。

㉑《苏俄六周》《民国日报·觉悟》1923.11.7。

㉒《被压迫民族之前途》《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

㉓《此时中国劳动运动底意思》《劳动界》第4号,1920.9.5。

㉔《致郑学稼信》《陈独秀著作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28页,1993年4月版。该书所署时间为1938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误。应为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三日。

㉕《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9卷3号。

②⑥《马克思学说》《新青年》9卷6号。

②⑦答黄凌霜《新青年》9卷6号。

②⑧答柯庆施《新青年》8卷3号。

②⑨《法治周报》第一卷三十三期,1933.8.13。

③⑩(英)拉斯基著,黄子祥译《‘共产党宣言’是社会主义的里程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56—57页。

③⑪给西流的信,《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

③⑫《我的根本意见》《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

③⑬《爱国心与自觉心》《甲寅》1卷4号。

③⑭《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1卷2号。

③⑮《人生真义》《新青年》4卷2号。

③⑯《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7卷1号。

③⑰《新青年》9卷4号。

③⑱《国庆纪念底价值》《新青年》8卷3号。

③⑲《资本主义在中国》《民族野心》广东亚东图书馆印行,1938年8月。

④⑩《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政论》旬刊,第一卷第廿三期,1938年9月15日。

④⑪《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

④⑫《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选集》(四),第1359页。

④⑬《论人民民主专政》。

④⑭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讲话。

④⑮《湘江评论》创刊宣言,1919.7.14。

④⑯《新民主主义论》。

④⑰《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四)第1473页。

④⑱1941年6月21日,是希特勒侵入俄境的翌日,邱吉尔即向全英国民及全世界广播,大意说:“谁都知道我邱吉尔是反共的,但今天形势不同……我们要帮助他……使他们能打到底。”所援助的物资难以计数,美国一次就援助了汽车三十万辆,飞机六千架……。遏制纳粹,固然与欧美利益相关,苏联的存在与大局有关。应属正义之举。

④⑲《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四)第1496页。

⑤⑩《论人民民主专政》。

⑤⑪《中庸》第十三章。

⑤⑫《新民主主义宪政》《毛泽东选集》(二)第727—730页。

⑤⑬以上均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第三版)的笔记》。

⑤⑭(美)托·阿·比森《和中共领袖谈话》,加利福尼亚1973年,魏明康译。转引自《中国革命问题译丛》(一)北京大学中国革命与建设研究中心,1986.11。

⑤⑮《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二)。

⑤⑯《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60页。

⑤⑰《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第三版)的笔记》。

⑥⑩(法)让·马雷、阿·乌鲁著,胡尧步、黄舍骄译《社会党历史——从乌托邦到今天》第7—8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北京。

⑥⑪《谈政治》《新青年》8卷1号。

⑥⑫《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政论》旬刊第一卷十九期1938年8月5日。

⑥⑬《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政论》旬刊第一卷,第二三期1938年9月15日。

陈独秀对社会主义与民族解放问题的见解

——读陈独秀的《被压迫民族之前途》有感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姚金果

《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一文写作于1942年5月13日,这是陈独秀生前最后一篇政论性文章。同一天,陈独秀还写了给何之瑜的信,信中说,《被压迫民族之前途》是此前所写的《我的根本意见》、《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再论世界大势》这三篇文章的结论,更是“画龙点睛”之笔。14天后,即5月27日,陈独秀便不幸离开了人世。这篇绝笔之作、“画龙点睛”之作,究竟表达了陈独秀怎样的观点?换句话说,陈独秀在临终之前对社会主义究竟有怎样的见解?透过这篇文章,或许可以了解他内心深处最后的思考,了解他对社会主义最后的理解。

对劳苦大众充满人性关怀的陈独秀,在他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之后,他所同情的人群已经超越了国界,这也是他那一代共产党人群体所共同经历的意识升华。难能可贵的是,这种对弱者的同情和关注,已经深深地镌刻在陈独秀的灵魂中,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身在政治圈之内还是之外,他都坚守着这份感情,为改变弱小群体的命运探索着、奋斗着,直到生命的终点,他仍然在关心着被压迫民族的前途。这种“愿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的无私而博大的精神追求,烘托出陈独秀永远不能泯灭的高尚的人格魅力。

陈独秀的《被压迫民族之前途》^①一文,主要表达了以下观点:

第一,民族解放斗争是进步的事业,但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只有联合起来,争得社会主义前途,才能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陈独秀提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斗争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这样为民族自由而战的大斗争,无论为何人所领导,民族中一切进步分子都应该拥护;因为不但为资产阶级所领导,即令是封建王公所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有打击资本帝国主义的进步意义。”但是,进步的民族解放斗争不能限制在一国之内,否则就没有前途。这是因为:首先,就国内而言,由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政治经济的落后性,在举国一致对外的情况下,“因为没有社会制裁,政治上的组织又薄弱,很容易为贪官、奸商和地方造成囤积居奇大发其国难财之千载一时的机会,因此陷前方浴血抗战的将士和后方刻苦力作的平民以饥寒困苦”;而要清除这些现象,又会落一个“破坏了一致对外民族阵线”的罪名。其次,就国际而言,在“各派帝国主义相互争夺殖民地及落后国市场极端尖锐化的今天”,被压迫民族单靠自身的力量根本无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赶走了这个帝国主义,还会跑来那个帝国主义,“结果不过是照旧屈服在新主人的统治之下”而已。那么,被压迫民族的前途又在哪里?陈独秀明确指出:“它的唯一前途,只是和全世界被压迫的劳动者,被压迫的落后民族结合在一起,推翻一切帝国主义,以分工互助的国际社会主义世界,代替商品买卖的国际资本主义旧世界,民族问题使自然解放了。”

第二,被压迫民族能够争取到社会主义前途。陈独秀批驳了落后民族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这个观点“是被旧的民族观点蒙住了眼睛,看不出将来国际化的新趋势”。陈独秀提出,“近百年来,资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已经打破了各落后民族的万里长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统治已经由殖民政策转变为“更集中的更有机性的国际集团”。在经济愈来愈全球化的情况下,政治也必然愈来愈全球化。陈独秀设想,“如果有一个领导国际集团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于纳粹失败后的德国,先进国和落后国不久便会融成一个社会主义的联邦”。即便不会出现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在帝国主义领导的国际集团内,“落后国将被吸引着被强迫着和领导国全面合作”,这当然是不平等的合作,但它导致的结果便是被压迫民族的联合,“这便是帝国主义强盗自己造成推翻自己的被强压迫者之结集”。陈独秀坚信,国际集团化的趋势是世界历史必然的发展趋势,“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主义的英雄能够阻止”,因此,“被压迫的民族,也只有善于适应这一国际新趋势,将来才有前途”。

第三,解放被压迫民族是社会主义的天然使命。陈独秀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就是要根本推翻帝

国主义的统治,解放被压迫民族和人民。陈独秀以俄国十月革命为例说,“十月革命是全俄绝大多数人民集合在共产党‘解放劳动者’‘解放农民’‘解放小民族’三大旗帜之下成功的;革命成功后,三样都一一实现了,并非是俄国共产党的空头支票”。不仅如果,革命成功后,还废除了沙皇俄国与被压迫民族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从而使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看到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景,使苏联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因此,社会主义与民族解放是不可分割的。

第四,民族利己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陈独秀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以解放全人类为使命的,如果社会主义国家违背了这个原则,只强调民族利益,“以民族政策自限”,那么就“必至陷于孤立(民族政策实际上就是孤立政策)而没有前途”。陈独秀认为,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站在俄国民族利益的立场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以民族利益为中心,“实际上只得认为它是世界列强之一而已,若要更说她是社会主义国家,便未免糟塌社会主义了”。

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战役刚刚结束,苏联与德国之间谁胜谁输的形势还很不明朗。而中国的抗日战争,才刚刚度过了艰难的相持阶段,国共两个战场都还在同日军侵略者进行着艰苦的搏斗。陈独秀虽身在江津一个乡村的石墙院,且身患重病,却牵挂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前途。他以自己纯朴的然而又是异常执着的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探索着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未来的命运。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情怀,确实令我们后人钦佩至。

然而,陈独秀毕竟远离政治中心,而他所看到的材料又有限,因此不可能对战争的发展趋势作出准确的预测,也不可能对社会主义与民族解放问题作出全面、系统而科学的研究。在他的文章中,还是能看出一些偏颇之处的,这主要表现在他对民族利益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解上。笔者在这里试作一分析。

第一,陈独秀将苏联分为“前期苏联”和“后期苏联”,认为列宁领导的“前期苏联”是“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场”,斯大林领导的“后期苏联”是“站在俄国民族利益的立场”。其实,列宁领导下的苏联,也并不是为了世界革命而完全舍弃民族利益的。1920年至1924年的中国建交谈判之所以非常艰难,主要是在围绕中东路和外蒙问题中苏两国存在争论。苏联为了不放弃中东路利益、为了促使外蒙独立,使出许多招数迫使中国政府让步,中国政府虽然不想就范,但在内外强大压力之下,最终还是妥协了。尽管当时双方约定:关于中东路问题,再开会另议;关于外蒙问题,苏联可择时撤军,但结果却是:苏联掌握了中东路的最高领导权;外蒙在苏联的支持下,宣布脱离中国政府而独立。

中国共产党人最初完全相信苏俄领导人关于无意占领外蒙的说法。蔡和森指出,苏俄无意占领外蒙古,之所以不肯轻易撤退红军,是因为红军一旦撤退,日本帝国主义者便将资助白党(即反对苏维埃的旧帝制党)以遂其反革命的阴谋。^②陈独秀也多次撰文,针对一些中外报刊说苏俄不从外蒙古撤兵是对中国的侵略的说法,他断言:“由俄国共产党掌握政权的苏俄,是绝不会‘侵略’的。所有反对苏俄的宣传或谣言,都不过是想离间中俄人民的感情的”^③。

然而,当陈独秀于1922年11月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时,才了解到苏俄领导人的真正意图是希望外蒙独立。这与苏俄无意占领外蒙的说法,显然是相悖的。但他仍怀着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美好理解,不仅对此未提出任何异议。相反,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中,在谈到“对俄外交”问题时则这样表示:“俄国为现时世界上唯一抛弃帝国主义的国家,所以中国对俄交涉如通商,中东路,松花江航权,庚子赔款,蒙古等问题,吾人应主张即速与俄罗斯直接开始谈判,绝对不容第三国之干涉或参加”。在“蒙古问题”上,他表示:“在国家组织之原则上,凡经济状况不同民族历史不同言语不同的人民,至多也只能采用自由联邦制,很难适用单一国之政制;在中国政象之事实上,我们更应该尊重民族自决的精神,不应该强制经济状况不同民族历史不同言语不同之人民和我们同受帝国主义侵略及军阀统治的痛苦;因此我们不但应该消极的承认蒙古独立,并且应该积极的帮助他们推倒王公及上级喇嘛之特权,创造他们经济的及文化的基础,达到蒙古人民真正独立自主之客观的可能”。^④陈独秀认为,与其让外蒙人民在北京政府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下遭受痛苦,还不如让外蒙独立,使外蒙人民在革命党领导下,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帮助下,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这显然是他支持外蒙独立最深层的思想基础。

与其他一些中国共产党人一样,陈独秀是完成抛却了自己国家的利益来考虑外蒙问题的。这一点还可

以从下面的事实得到证明：1924年5月的最后一天，《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议》终于由谈判双方签字。《协议》承认外蒙为中华民国之一部分，苏方声明一俟有关撤退驻外蒙苏军问题在中苏会议中商定，即将一切军队由外蒙尽数撤退。这又引起了陈独秀对外蒙人民命运的担心。他认为，从中俄外交而论，“俄国撤退驻蒙兵，承认蒙古是中国之领土，都是应该的”；但对于外蒙人民而论，“第一不幸是中国犹在极横暴不法的军阀统治之下，决不会有丝毫尊重蒙民自治的观念”，如果中国政府派兵收蒙，“可怜素受中国军队凌虐的库伦市民，才平安了数年，现在又要重逢浩劫”；“第二不幸是蒙古民族中还有与平民对抗的旧势力王公喇嘛等特权阶级存在，……本来天天在那里做中国军阀扶助他们复辟的梦，现在他们的梦却真有实现的希望”，因此，“中国及俄国有理想的平民，对于这件事似乎都不能对岸观火”。^⑤

可见，出于对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纯真而美好的理解，当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陈独秀考虑更多的是意识形态的同一性问题。直到他去世时，这种纯真而美好的理解并没有改变。但我们不能苛求于陈独秀。实际上，如何正确处理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时碰到的一个难解的方程。直到邓小平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后，他才引导中国共产党人解析出正确的答案。

第二，陈独秀（不仅是上世纪40年代的陈独秀，21世纪的今天仍有人有这样的认识）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奉行国际主义的原则。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民族利益与世界革命利益产生矛盾时，应该放弃民族利益，选择世界革命利益。这就是“国际社会主义”。根据“国际社会主义”的原则，在中国遭到日本侵略时，苏联应该“全力援助中国”，包括领导中国抗战和出兵参加对日战争，“拼着苏联和中华民族共存亡”；苏联不应该为自己民族利益计，“以向法西斯蒂妥协代替了向法西斯蒂进攻”。陈独秀认为，在亚洲，由于苏联没有同中国并肩作战，结果使日本不仅轻易地占领了中国的重要城市，甚至横行到了南洋。在欧洲，当德军进攻波兰时，“苏联若仍旧站在国际社会主义的立场，便不会和希特勒妥协，便不会把代表民主主义，领导被压迫被侵略民族向法西斯蒂进攻的这一伟大事业，说成为他人在火中取栗，便不会伙同法西斯蒂瓜分波兰”。苏联妥协的结果是害人又害己，“俄国不但向法西斯蒂妥协的代价之半个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小国仍为希特勒所有，连欧俄的大部分土地人民也都沦陷于法西斯蒂军队之手”。

在这里，陈独秀将社会主义国家与其自身的民族利益放在了对立的两个方面。按照他的理解，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以解放天下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为己任，应该不计代价地援助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其实，有陈独秀这种理解的共产党人并不在少数，而且不仅仅是陈独秀那个时代的人。截止上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人的理解也是这样的。正是出于这样的理解，在我国国民经济还相当落后，人民生活还极不富裕的情况下，党和国家领导人要求全国人民勒紧裤带援助一些贫困的社会主义小国。正是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认为苏联援助我国建设是天经地义的。正是出于这样的理解，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中一些人对中苏关系史上一些牵涉到双方利益的条约和事件，仍不能平心静气地、客观地给予评价。

单就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苏联的态度而言。1937年8月21日，苏联与中国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中国政府通过这个条约不仅得到苏联道义上的支持，而且得到了军事和技术援助。1937年至1940年，苏联给予中国购买军火的贷款达到4.5亿美元，居同期各国对中国援助的首位。苏联还先后派出3000多名军事顾问、军事工程技术人员和2000多名志愿飞行员来到中国，帮助中国制定作战计划、训练飞行员。特别是苏联航空志愿队来华直接参加对日作战，包括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和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在内的200多名飞行员战死在中国。如果按照陈独秀的理解，苏联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就应该无代价的，而不以条约和贷款的方式来援助中国。这实在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绝对化的理解。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处理对外关系上的不同点，在于社会主义不主张对别国实行侵略政策，而主张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发展对外关系；不主张只顾自己民族利益，而主张援助一切需要援助的国家。但是，国家的职责是不以社会制度为转移的，任何统治者都应该也必须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而去侵略别国，但也不应该为了别国的安危而伤及自身的利益。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⑥一个主权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主要是围绕自身的国家利益来进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利益是民族利益、人民利益和阶级利益的集合体。离开了民族利益、人民利益和阶级利益，国家利益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离开了国家利益，任何对内、对外政策的制定

和实施,都必然损害到民族利益、人民利益和阶级利益。所以列宁指出:“我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归根结底是由我国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地位决定的。这个原理是马克思主义者整个世界观的基础”^⑦。邓小平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关系上的失误和教训,在1989年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明确提出,任何国家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都应“以自己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⑧。这就是说,在世界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中国要在国际交往中积极稳妥地应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其基本出发点和终极目标就是国家利益。为了国家利益,中国可以超越意识形态的异同,发展同世界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同样,为了国家利益,中国决不放弃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邓小平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提出了正确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继邓小平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国际利益为最高准则”的思想。江泽民明确提出“要坚持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准确指出21世纪中国国际战略的价值取向仍是“国家利益”,外交工作的根本目标就是“坚定不移地维护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⑨。胡锦涛十分重视国家利益在对外交往中的重要地位,强调对外交往“要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持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维护国家的安全和根本利益”^⑩。

在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思想指导下,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国际关系的不断改善,国际交往不断扩大,国际地位也由此不断提高。中国在世界贸易、环境、粮食、预防犯罪、禁毒、难民、妇女等领域愈来愈发挥着积极作用。由中国倡导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方式和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等主张,为亚太经合组织和亚欧会议进程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密切合作,相互支持,对西方国家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行径进行了有效的抵制和斗争。中国在国际事务的积极作用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同情和支持,重大国际问题的解决已不能没有中国的声音。所以邓小平曾骄傲地宣布:在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中,“中国算一极”^⑪。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得到维护和发展。中国的对外经贸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的经营体制。对外经济贸易的持续、快速发展,使中国的综合国力也得到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中国也在不断行使着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责,对于世界上遭受战争破坏和灾荒的国家给予道义上和经济上的无私援助。中国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坚决维护和不断扩展自己的国家利益,才能不断为全人类的利益作出贡献。

读陈独秀的《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一文,议论陈独秀对社会主义与民族问题的思考,分析他的见解的正确与不足,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从中看到时代的变迁对人的思想的影响。一方面,我们就向陈独秀学习他博大无私的爱国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一方面,我们不要苛求于陈独秀,因为他的生命结束于上个世纪40年代,不可能摆脱对社会主义的最纯真最传统的理解。而我从中得到的启示则是:只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才能把握正确的方向。学术研究亦是如此。

注释:

① 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04—610页。

② 蔡和森:《中国国际地位与承认苏维埃俄罗斯》(1922年9月),《蔡和森文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79页。

③ 致中:《离间中俄感情之宣传》,《向导》第13期,1922年12月23日。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22页。

⑤ 独秀:《中俄协定签字后之蒙古问题》,《向导》第68期,1924年6月4日。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82页。

⑦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6页。

⑧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30页。

⑨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第531、529页。

⑩ 2004年2月25日《人民日报》。

⑪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53页。

堪称远见卓识的“最后见解”

——陈独秀晚年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思考

同济大学 孙其明

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初,已进入人生晚年的陈独秀,曾对涉及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重新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当时,他思考得最多的是关于民主政治的问题,尤其是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有关的民主政治问题,并提出了令后人无比惊叹、无比佩服的新观点。陈独秀晚年对民主政治所作的宝贵探索,主要反映在他当时所写的一部分文章和书信中。但在陈独秀生前,上述绝大部分文章和书信并未公开发表,直到陈独秀逝世六、七年之后,它们才被陈独秀的学生和香港自由中国社分别结集在大陆、香港出版。1949年香港版的书被定名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论文和书信)》,又名《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①本文旨在对陈独秀晚年关于民主政治,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所作的思考和探索作点分析,谈谈笔者的看法,并以此求教于学术界的同行们。

一

陈独秀晚年对于民主政治,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的思考和见解,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当时他所写的《给连根的信》、《给西流的信》、《我的根本意见》、《致S和H的信》、《再论世界大势》、《被压迫民族之前途》等书信和论文中。陈独秀提出的基本观点,也是最主要的观点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重新认识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充分肯定其历史作用,强调民主政治对于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发展具有的普遍真实的价值。

自从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对如何看待资产阶级国家实行的民主政治制度,始终存有争议。其中,绝大多数人虽然也承认,以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代替中世纪的封建专制有进步的意义,但同时又总是猛烈地抨击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伪善的,只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和对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欺骗等等。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种看法实际上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主流或传统的观点。陈独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也曾受到过这种观点的影响,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制度大加批判。然而,到了晚年,陈独秀开始意识到,上述传统观点存有偏见,并开始对之进行重新思考,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看法。

在《给连根的信》中,针对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托派们的偏见,陈独秀指出:“你们错误的根由,第一,是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真实价值(自列托以下均如此),^②把民主政治当着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伪善,是欺骗,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是: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这都是大众所需要的,也是十三世纪以来大众以鲜血斗争七百余年来,才得到今天的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③在《给西流的信》中,陈独秀又说:“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过了时的一定时代中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如果说民主主义已经过了时,一去不复回了,同时便可以说政治及国家也已过了时即已经死亡了。”^④他还特别强调说:“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要丰富得多,实施的范围也广大得多,因为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时代,我们便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其实此制不仅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⑤

上述陈独秀的这些话,无疑已把他经过重新思考后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新看法表达得十分清楚了。陈独秀不仅明确地批评了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传统的偏见,而且指出民主政

治有着实实在在的内容,它也是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所需要的,因而廓清了长期笼罩在人们心头的迷雾。更重要的是,陈独秀对民主政治的评价,突破了多年来传统观点的局限,即只是笼统地肯定资产阶级以民主政治取代中世纪封建专制统治是一种进步,而否定民主政治对于人类社会进步普遍的真实价值,强调应站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高度上,肯定民主政治是一代又一代人民大众流血斗争的产物,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不断发展所取得的共同成果,并非资产阶级所专有,也不会因资产阶级时代的消失而过时。值得一提的是,陈独秀将“近代民主制”与科学、社会主义并称为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发明,充分地反映出他对民主政治制度深远的历史价值的高度肯定。科学和社会主义代表着人类社会的未来,这早已成为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共识。然而在陈独秀看来,近代民主制对于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绝不会在科学和社会主义之下。不仅如此,陈独秀实际上还认为,近代民主制、科学、社会主义这三者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对于未来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三者缺一不可。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陈独秀又进一步对民主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

第二、阐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及在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必须实行民主的政治制度,否则必将导致专制独裁的产生和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政权的堕落,导致社会历史的倒退。马克思主义创立伊始,马克思、恩格斯便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然后,“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⑥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剥夺了资产阶级所有资本而建立起来的新社会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社会主义社会”。总之,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这里既谈到了无产阶级的统治,也谈到了民主,还谈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这表明,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后,并不排斥民主。此后,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马克思、恩格斯曾对公社“炸毁旧的国家权力并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权力来代替”它,并实行完全的“普选制”、“低薪制”的做法大加赞扬,认为这是防止新的国家权力“从社会的公仆变成社会的主宰”的重要举措。^⑦这进一步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不仅赞成,而且十分重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实行民主政治的问题。不过,由于巴黎公社存在的时间太短,此后,即在马克思、恩格斯还活着时再也没有一个国家取得过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他们在生前也就无法通过进一步总结实际经验,对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主政治问题作出更明确更具体的论述。同样,后来的列宁虽然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被称为苏维埃的无产阶级政权,却也因为当时复杂的历史条件的限制,除了笼统地宣称苏维埃是“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外,在实行民主政治方面也未有多少创新。总之,在十月革命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对无产阶级政权下建立民主政治的问题并没有真正引起重视。

然而,随着列宁逝世,特别是斯大林主政后新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在苏联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一系列重大事件,它充分显示出,民主的原则正遭受践踏,且日趋严重;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正蜕变为少数人的专制独裁,号称“最民主”的苏维埃甚至连资产阶级的民主都不如。这不能不引起陈独秀的关注,不能不促使他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民主问题,并得出了新的结论。

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一种谬论,即认为“民主已经过时,无级政权只有独裁,没有民主”^⑧,陈独秀指出:“如果说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无产阶级的政权形式只有独裁,不应该民主,则史大林所做的一切罪恶都是应该的了,列宁所谓‘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乃成了一句废话。”^⑨他还说:“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已经耗竭之时,不必为民主而斗争,即等于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⑩陈独秀还指出:“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阶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绝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⑪

在对苏联斯大林式专制独裁政权的出现进行反思后,陈独秀认为,关键在于十月革命后,苏俄在反对资产阶级的同时,实际上丢弃了民主政治,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包含有具体内容的民主政治制度。他说:“我认为非大众政权固然不能实现大众民主;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级独裁,必然流为史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治,这是事势所必然,并非史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②他还指出:不幸的是,十月革命以来,苏俄“轻率地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有国有大工业、军队、警察、法院、苏维埃选举法,这些利器在手,足够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用不着拿独裁来代替民主,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列宁当时也曾经警觉到‘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而亦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警察,容许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自由等,LT^③直至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他自己,才想到党、工会、和各级苏维埃要民主,要选举自由,然而太晚了!”^④针对托派中有人仅仅将苏联出现的问题归咎斯大林个人的说法,陈独秀则强调制度的重要,认为社会主义不建立民主政治制度,必然导致专制独裁,必然产生独裁者。他尖锐地指出:“如果说史大林的罪恶与无产阶级独裁制无关,即是说史大林的罪恶非由于十月以来苏联制度之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自史大林),而是由于史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所以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史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史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⑤

笔者之所以不嫌其烦地大段引述陈独秀的话,是因为笔者觉得,这些话对于苏联政治制度所作的批评,真可谓切中要害,一针见血也。尽管它都是60多年前陈独秀所说,如今读来,仍使人不由得产生振聋发聩、惊世骇俗之感。

第三、阐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并不是空洞抽象的名词,如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那样,也必须有具体的内容,且实施的范围应当更广泛,否则便是假民主、真专制。

既然无产阶级掌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实行民主政治,那么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是个什么样子,它与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有何关系呢?对此,陈独秀也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在《给西流的信》中,陈独秀说:“我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名词,有它的具体内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⑥他还说:“如果说无级民主与资级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内容(法院外无捕人杀人权,政府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权利等。)无级和资级是一样的”^⑦在稍后所写的《我的根本意见》一文中,陈独秀更加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和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⑧

这便是陈独秀对何为无产阶级民主,它同资产阶级民主的异同等问题的回答。他的话已说得十分清楚,无须笔者多作解释。笔者只想指出一点: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在喋喋不休地大谈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不同,孰是孰非,难道还不发人深思吗?!

以上三方面即为笔者对陈独秀晚年关于民主政治,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后见解”所作的概述。其实,已有很多研究陈独秀的学者对此作过介绍和分析。尽管不同的学者对“最后见解”的内容所作的概括不尽一致,但因为这是见诸于正式发表的文字的,白纸黑字俱在,故人们的分歧并不大。然而,一旦涉及到对“最后见解”的评价,却免不了要出现众说纷纭的局面了。而这,也正是笔者要谈的重点所在。

二

究竟应如何评价上述陈独秀晚年关于民主政治的“最后见解”呢？

对此，笔者认为，首先应当简要地回顾一下历史过程。

如前所述，“最后见解”的绝大部分内容在陈独秀生前并未公开发表，只有少数人知道，主要是托派组织的一些人。他们的观点与陈独秀的见解不同，故坚决表示反对。由于陈独秀一度参加过托派，托派甚至以组织的名义正式作出决议予以谴责。陈独秀逝世几年之后，“最后见解”公开发表了。托派分子的态度仍未改变，但此时却有人开始予以关注和支持了，其中最著名的是陈独秀的老朋友胡适，他称“最后见解”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稀有的重要文献”。不过，陈独秀的话主要是说给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听的，而在苏联和中国，无论是在当权多年还是即将当权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党人中间，却未见多少反应。他们当时不可能赞同陈独秀的观点，且肯定会斥之为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他们之所以没有就此大动干戈，想必是不屑一顾吧。因此，在当时或以后若干年里，世人对陈独秀的“最后见解”的反应，只能以“空谷足音”来形容了。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今天看来，毫不奇怪。

然而，随着50年代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开始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揭开了斯大林时期专制独裁统治的盖子，随着60年代中国“文革”灾难的发生等等，情况终于发生变化。尤其是在80年代以后，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如同埋藏在地下的珍宝，终于被学术界、理论界重新发现了一样，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和重视。许多研究者不仅纷纷予以介绍，而且开始肯定其价值，对它的评价似乎也在日趋增高。更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并没有看到过陈独秀晚年的书信和文章，甚至至今不知道陈独秀晚年的这些看法，却也在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的过程中，得出了与陈独秀晚年几乎相同的结论。这就清楚地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陈独秀的“最后见解”，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再也不是“空谷足音”了，它终于被越来越多的人承认是真理，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赞同、所接受。

不过，笔者也深知，即便是在21世纪初的今天，人们对陈独秀晚年关于民主的“最后见解”的看法也不完全一致。就当今的理论界、学术界而言，“左”的影响远未彻底清除，仍有不少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颇有微词，甚至大加非议。更重要的是，国内外社会主义事业的现实，与人们的理想之间，仍有很大的距离，这方面的矛盾不能不反映到人们的认识上来。故陈独秀几十年前的观点并未成为纯粹的历史，仍与今天的现实，乃至社会主义事业今后的发展密切相关，换句话说，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因此，对陈独秀的观点作进一步的讨论很有必要，笔者也想借此机会讨论两个问题，并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陈独秀晚年关于民主的“最后见解”是不是真理？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无的放矢，事实上至今仍有不少人认为，陈独秀的看法并不正确，故确有辩明的必要。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基本原理，即判断人们的认识是不是真理，不能简单地以权威的话，或以“经典著作”的论述去衡量，必须而且只能以实践作为检验的标准。据此，笔者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只能是：陈独秀晚年关于民主的“最后见解”，是被几十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了的真理。当然，笔者在这里所指的是陈独秀的基本观点，而非陈独秀所说的每一句话，绝非什么“句句是真理”。

如本文第一部分所介绍，陈独秀晚年关于民主的“最后见解”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重新认识。多年来人们所争论的焦点在于：一种观点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只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只是对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欺骗手段，对人民大众没有任何好处，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更没有普遍价值；另一种观点则指出，资产阶级创立的民主政治虽然旨在为资产阶级服务，但也是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所需要的，它并非资产阶级所专有，而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共同的财富。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在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者中，第一种观点即传统观点占据绝对优势，早年的陈独秀也持这种观点。然而，晚年的陈独秀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应当纠正以往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偏见，客观而科学地评价民主政治的普适价值。两种观点孰是孰非，只能由实践来检验。那么，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世界历史的发展究竟怎么样呢？笔者以为，其中突出的一件大事便是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里，出现了抛弃民主政

治制度并与之完全对立的法西斯专制独裁统治,它不仅给法西斯国家的无产阶级劳苦大众带来了巨大灾难,也使全世界人民吃了大苦头,并导致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出现了尽管短暂,却无法否认的大倒退。虽然同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但民主政治与法西斯专制独裁的对比却是如此鲜明,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不能不促使人们重新认识民主政治的价值。事实充分表明,民主政治绝非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它关系到包括资产阶级和劳苦大众在内各个阶层的命运,关系到人类社会的进步或倒退。正因为如此,在德、意、日法西斯独裁政权被彻底击败的战后历史上,建立和完善民主政治制度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包括许多新独立国家的重要举措之一。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仍然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死抱着偏见不放的人难道不自感理屈吗?或者如陈独秀当时所说,他们“还有脸咒骂资产阶级的民主吗”?^⑩有些人虽然也承认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比法西斯专制独裁要好,但又强调民主政治有阶级性,因而批评陈独秀否认民主政治的阶级性,有过分美化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之嫌。然而,何谓民主政治的阶级性呢?以笔者之见,此指资产阶级实行民主政治,当然要利用它为本阶级的政治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政治专属于资产阶级,其他阶级或阶层就不能利用它。民主政治是有特定的基本内容的,它虽然随着历史的发展会有变化,但基本的内容和特征不会变,否则就不叫民主政治了。如同具有特定内容的科学一样,民主政治资产阶级可以利用,无产阶级和其他阶级也可以利用。就此而言,陈独秀并不否认,而且曾明确指出,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民主政治的施用范围受到限制,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劳苦大众仍要不断地为扩大民主、完善民主而斗争,直到在条件完全成熟时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并不是推翻民主政治制度,而应当在原有基础进一步扩大完善民主政治制度,使其完全为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所利用。这样的观点有什么不对呢?!

再来看陈独秀的“最后见解”涉及的第二方面的内容,即对无产阶级夺权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后,要不要实行民主政治及实行什么样的民主政治?他对这一问题所作的回答究竟对不对,同样也只有通过实践来检验。众所周知,从十月革命到20世纪末,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曾经历过一个十分曲折的发展过程。其间的深刻教训是什么呢?教训当然很多,但在其中,无论是苏联、东欧,还是中国,革命胜利并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之后,一方面片面地否定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另一方面又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一些当权的共产党人甚至极端地轻视民主、肆无忌惮地践踏民主,从而导致了严重的后果,这不能不是十分重要的教训之一。也正是这方面的严酷事实,证明了陈独秀晚年关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民主的论断极为正确。不过,至今仍有人对陈独秀晚年批评苏联斯大林搞独裁专制不满,指责陈独秀攻击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对此,笔者实不敢苟同。如前所述,无产阶级专政一词最早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来的,但他们并未作出明确解释,究竟何谓无产阶级专政。不过,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其他地方所说的一些话中,笔者认为他们所指的就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或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就此而言,陈独秀过去没有,晚年也没有否认过。他所讨论的问题只是无产阶级如何执政、掌权,并认为只能实行民主政治,而不是仅仅依靠暴力实行专政。专政只能对极少数反对无产阶级政权的敌人,而不能对绝大多数民众。陈独秀晚年曾尖锐地指出过:“现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能及吗?此无他,贱视民主之过也。”^⑪在斯大林主政以后,苏联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变成与民主政治相对立的专制独裁。尽管至今仍有人不赞成这一说法,但这却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的独裁”难道不应当否定,不应当反对吗?在斯大林之后,陈独秀没有看到,但笔者和许多上年纪的人还亲身经历过中国的“文革”,对当时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还有所谓的“全面专政”至今记忆犹新,对其难道也不应当彻底否定吗?当然,也有一些人并不反对无产阶级掌权后必须实行民主政治,却又认为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与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是根本不同的,因此不能照搬或照抄。实事求是地讲,陈独秀并没有说过“照搬照抄”的话,而且也承认差异的存在。他的观点很明确:在基本的内容和基本的原则上,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与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并无根本区别,无产阶级掌权以后应当进一步扩大、改善民主政治,甚至应当根据各国不同的国情采取不同的实行方式,但却不能违背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原则,否则就是假民主,就是陈独秀晚年所批评的,只是以所谓“根本不同”为口实,来抵制民主政治的实行。这样的看法难道不对吗?

总之,只要我们采取客观而又公正的态度,就不能不承认,陈独秀晚年关于民主的“最后见解”,是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了的真理。

第二、陈独秀晚年关于民主的“最后见解”能否称得上“远见卓识”? 笔者的回答也是肯定的。

如上文所述,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虽然也在原则上谈到过民主政治问题,然而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们都未能对民主政治,特别是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作系统而具体的论述。因此,俄国十月革命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对民主政治的看法都是“一边倒”的,即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是虚伪的,是对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欺骗,只有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苏俄的苏维埃政权则是实行民主的典范。尽管到了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主导下的苏维埃政权违背民主原则,践踏民主精神的做法及其产生的严重恶果已逐渐暴露于世。面对这种情况,除了西方国家以一贯反共反苏的立场予以抨击外,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共产党人仍处于无动于衷的状态。诚然,以第四国际为代表的托派倒是斯大林的专制独裁予以批评,但他们只是将此归咎于斯大林个人,看不到苏维埃政权在制度上存在着严重缺陷。当时不仅能够敏锐地意识到斯大林搞专制独裁的严重性,而且又能透过现象,看到问题的本质所在,即苏联的问题所涉及的正是有关民主政治,特别是有关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和实践这一重大问题的,在国际共运中,至少是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陈独秀是第一人。对此,如果我们用“众人皆醉,一人独醒”来形容,似乎并不为过。

更为重要的是,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发表以来,60多年过去了。其间,无论是资本主义世界,还是社会主义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凡涉及到民主政治或专制独裁方面的变化都证明了陈独秀晚年的看法是正确的。尤其是社会主义世界的曲折发展,均不幸被他当年的预见所言中。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在民主政治问题上的失误虽不是唯一原因,却是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此外,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受挫折,特别是“文革”灾难的发生,原因固然也很复杂,但新中国成立后没有搞好民主政治的建设,无疑也是祸源之一。正因为如此,“文革”之后,中共不得不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大力推行改革开放,包括在政治体制方面积极进行以民主化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不仅如此,陈独秀晚年关于民主的“最后见解”也对人们正确把握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启示。事实上,当人类历史进入21世纪之际,民主化已成为全球性的潮流,且势不可挡。凡是想推动本国社会不断进步的,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也不论这个国家是姓“资”,还是姓“社”,或姓别的什么,都不能逆此潮流,或以民主代替专制,或对民主政治予以不断改善。民主化虽然不能代替一切,不能视为社会进步发展的唯一标志,但它毕竟与促进社会进步发展的各个重要方面,如经济、文化的发展等等都紧密相关。可以说,没有民主化,就很难实现经济文化的现代化;没有民主化,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诚然,民主化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必然要经历许多曲折,还会遇到不少困难,但方向已定,而且不可逆转。

如此看来,陈独秀晚年的“最后见解”难道还称不上是“远见卓识”的吗?!

三

陈独秀晚年之所以能够发表堪称远见卓识的“最后见解”,在其人生的最后时刻为丰富人类的思想宝库作出新的贡献,这绝非偶然。以笔者之见,这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客观方面的原因,即客观形势的变化,也就是说,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新的情况。如笔者已在本文中多次提及,这指的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初,在德、意、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法西斯的独裁专制,在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反民主的弊病也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正是这些历史新现象冲击了陈独秀头脑中原有的传统观点,不可避免地促使他重新思考。而新观点的提出,正是他“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才有了可能。认识来源于实践,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之一。陈独秀晚年对民主的新认识,正是来源于实践所提供的新的实际材料。反之,如果没有上述新的客观事实,陈独秀则不可能有新的思考,更不可能突破传统观点,产生新的认识。其次是主观方面的原因,即与陈独秀超人的睿智,胆略和勇气,与他在思想方面固有的优秀品质密切相关。同样的事实出现在世人面前,为什么多

数人熟视无睹,即“众人皆醉”,陈独秀却能“一人独醒”呢?这不能不到陈独秀的主观方面找原因。

第一、陈独秀的突出的优点之一,是他从不迷信任何权威,也不迷信任何教条,一生始终坚持从事实出发,坚持独立思考,坚持旗帜鲜明。

凡是了解陈独秀而又不带偏见的人,都会承认上述优点在他的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早年的陈独秀之所以能在倡导新文化运动、领导五四爱国运动、创建中国共产党等许多方面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立下大功,无不与他的上述优点有关。甚至后来他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所走的曲折道路也无不与此有关。陈独秀自己也自嘲地说过:“我不懂得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意说不错又不对的话。”^②“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陈独秀也不可能不犯错误。或者说,错误对任何人都是难免的,只是犯错误的原因各不相同而已。但对陈独秀来说,是也好,非也好,都是建立在他尊重事实和独立思考这一基础之上的。即便到了晚年,陈独秀仍然如此,他的“最后见解”,不管后人如何评说,终究仍是他尊重事实,不带任何迷信和成见,坚持独立思考的结果。临终前一年,他还在给朋友的信中明确地表白说:“弟自来立论,喜根据历史及现时之事变发展,而不喜空谈主义,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以为立论之前提,此种‘圣言量’的办法,乃宗教之武器,非科学之武器也。”“近作根本意见,亦未涉及何种主义,第七条主张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托洛斯基都包含在内)之价值,乃根据苏俄二十余年的教训,非拟以马克思主义为尺度也。倘苏俄立国的道理不差(成败不必计),即不合乎马克思主义又谁得而非之。”^③他还说:“迷信与成见,均经不起事实之试验及时间之淘汰,弟两不取之。纸短话长,不尽万一,惟弟探讨真理之总态度,当以此得为二先生所了解也。”^④

总之,尊重事实、独立思考和旗帜鲜明并不能完全避免错误,陈独秀晚年的“最后见解”也不是完全正确,然而如果不能坚持从事实出发进行独立思考,不能旗帜鲜明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则绝不可能突破权威的、传统的束缚,不可能有创新的思想成果,更不可能有振聋发聩、警世骇俗的“远见卓识”。

第二、陈独秀的另一个突出的优点是,始终站在维护人民大众利益、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立场上,毕生不懈地追求真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敢于否定一切错误的东西,包括他自己的错误。

对于陈独秀这位历史巨人一生的功过,人们的评论历来众说纷纭,或誉或毁,各执一词。但是不论是赞誉他的,还是批评他的,都不能不承认,陈独秀是一个终其一生坚持不懈追求真理的人,而其目的,也只有一个,即为寻找救国救民之路。为求社会的进步和劳苦大众的解放,为获得真理、坚持真理,陈独秀无私无畏,从不退缩,从不消沉。1933年,他虽然身陷囹圄,却誓死不向国民党政府妥协。为了批驳国民党政府对他的诬陷,他曾自撰《辩诉状》,并大义凛然地写道:“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帝制,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专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予生平言论行动,无不光明磊落,无不可以公告国人,予固无罪,罪在拥护中国民族利益,拥护大多数劳苦人民之故而开罪于国民党已耳。”^⑤在狱中,陈独秀还自书过一副对联:“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⑥读了这些话和这副对联,人们不能不感叹,这确实是陈独秀为人民大众和社会进步事业奋斗终身的一个总结,也是他所具优秀品质真实而生动的写照。正因为陈独秀是这样的人,具有如此优秀的品质,他才能够成为历史巨人,不仅在早年以其探求到的真理启示并引领着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为改造中国不断地奋战,而且又在处境艰难的晚年以其少有的“远见卓识”为大家拨开云雾,看清自己的未来。

诚然,如本文多次提到的,陈独秀一生奋斗,一生追求真理,并非都是正确的,他也说过错话,犯过错误,遭受过不少挫折。尽管他对真理的追求十分执着,可一旦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却既不固执,也不文过饰非,而敢于自我否定。就以对民主的认识为例:五四时期他本是中国高举民主和科学大旗的旗手,但后来一度受到马克思主义传统观点的影响,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价值产生怀疑,并予以批判。然而,当他晚年认识到这是一种偏见之后,便毅然抛弃了这一错误认识。所以陈独秀晚年关于民主的“最后见解”,从某种意

义上讲,也是他自我否定的产物。坚持真理,则必须要修正错误,不论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都要敢于否定。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则绝不能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真正做到无私无畏。这是在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过程中必须具备的可贵品质。而陈独秀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此可贵品质却为数不多的历史巨人之一。

总之,既有了客观条件,又具备了必不可少的主观因素,亦即作者本人超人的智慧、胆略和勇气等等,两者互相结合,陈独秀才能在晚年发表堪称远见卓识的“最后见解”,给后人留下了又一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作为后人的笔者,则不能不为之深感庆幸。再进一步,如果国人,特别是当权者们能从先哲的远见卓识中汲取更多的营养,则更是国家之大幸,民族之大幸,人民之大幸也!

注释:

①②③任建树:《陈独秀大传》,第658页,第65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版。

④列,此指列宁;托,此指托洛茨基。

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第547页,第554页,第555页,第554页,第555页,第560页,第553页,第555—556页,第554—555页,第553—554页,第554页,第560页,第558页,第431页,第567页,第568页,第315—320页,第35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版。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9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425—426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⑧“无级政权”,此指无产阶级政权;“资级”,此指资产阶级。

⑬“LT”,此指列夫·托洛茨基。

陈独秀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层困局

南京大学 冉占国

由于陈独秀晚年有“前期苏联”和“后期苏联”之分,致使陈独秀对社会主义认识有两种模式。当陈独秀坚定自己“深思熟虑了六七年”的转变;当今很多人也认为陈独秀后期提出了新的社会主义模式,我们注意到陈独秀后期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上的困局与实践中矛盾。

一、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模式

(一)陈独秀的社会主义前期模式

1921年前后,大多数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还只达到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水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最早宣传者之一的陈独秀,当时已经不只是从政治层面上理解马克思的社会主义。1920年陈独秀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1921年的《社会主义的批评》,均已是深入到经济。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密切关系”的高度提出他认识 and 理解的社会主义。这时候,陈独秀理解的社会主义:1、首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所以被称为科学的而不是空想,正因为它能以唯物史观的见解,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所以成立所以发达所以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自然结果,是能够在客观上说明必然的因果,不是在主观上主张当然的理想。”^①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至今仍是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依据,所以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必然的。2、政治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恩将自己的理论、从事的运动和为之奋斗的制度称为共产主义,党称为共产党。在中国,承认这个制度和主义的只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惟一能领导中国走共产主义道路的政党。3、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陈独秀坚定地认为:资本主义的缺点正是“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①而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出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简单的说:一资本集中,二财产公有。”^①4、坚持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的道路。他认为: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理论并不矛盾,他承认马、恩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历史的”的论述。并认为“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里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的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产阶级永远不至发生。”^①

以此,陈独秀等认为找到了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社会发展体制,他将创造出更高速发展的生产力并排除资产阶级的虚伪民主,创造更新的社会文明。

(二)陈独秀的社会主义后期模式

陈独秀社会主义后期模式有以下几个亮点:1、反对希特勒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造成其野蛮黑暗的统治,认为“斯大林的一切罪恶,仍是无级独裁之逻辑的发展”,是“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市、选举之自由”。^②要容许不同意见,允许少数派存在。2、政治上肯定了资产阶级的民主的一些形式和内容(如法院外无捕杀人权,政府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权利)。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范围的广狭而已”。提出他“深思熟虑六七年”决定的关于民主的六条意见。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实现人民民主。他提出“大众民主”,只有大众政权才能实现大众民主。否则,“必然流为史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制。”3、经济上反对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②认为“资本主义始终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必经过程”。要看到“将来国际化的趋势”,认为“资本主义工业社会,那便是万象更新了,它使社会生产力有了惊人的发展”。^②指出“十月革命只是政治的成熟,而非经济的成熟”。^②落后民族的发展,“要依赖先进的国家”。

陈独秀的社会主义后期模式与前期模式虽有不同,但他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前期社会主义。有人认为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在广东《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讲演中,陈独秀专门分析过民主社会主

义,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右派,他和基尔特社会主义不同的地方,就是社会民主党主张工人须取得政权,基尔特社会主义主张经济和政治分开。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是同样主张取得政权,所不同的,就是方法不同,共产党主张用革命方法,取得工人独裁的政权,社会民主党主张用议会的方法,取得工人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权。”^①在《随感录》中又专门论述过《民主党和共产党》,说民主主义不代表封建党的意,不代表劳动阶级的意;“只能代表了资产阶级的意”。^②在《社会主义的批评》一文中专门就共产主义和国家的社会民主党进行对照比较:一派主张:阶级战争,直接行动,无产阶级专政,国际运动。一派主张:劳资携手,议会政策,民主政治,国家主义。^③其根本在于社会民主党所依据的是有产阶级;而马克思主义所依据的是无产阶级。基本立场是不同的。在陈独秀晚年,去世前四个月写的《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中仍强调不要“被第二国际的理论弄迷惑了”,他是“在资本统制下,从事改良运动”,是“资本帝国主义支柱之一”。民主社会主义是民主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在社会理想和实现方法上都是根本不同的。虽说陈独秀后期在议会政策、发展资本主义等方面与民主社会主义有着类似的主张,但在基本原则与民主社会主义是不同的。因而说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就是陈独秀本人也是不会接受的。

二、陈独秀的社会主义理论上的困局与实践中的矛盾

(一)坚持阶级斗争的主导意识与发展生产力的矛盾

运用阶级斗争理论,通过阶级分析,确认联合和团结对象,确定打击的敌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运作方式。通过阶级斗争,使工人阶级获得政权,通过巩固这个政权,而进入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和内容。社会主义,要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不断发现和认定打击对象,以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来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人人噤若寒蝉,谁又能够把发展生产放到首位和尽心去发展生产?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不断变革知识者思想和生产者工具的过程,要给知识者和有产者创造发展的环境。在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激烈大搏斗中,陈独秀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还没找到发展生产力的真正对象,同时也没有促使生产力发展的环境。无论是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权还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在真正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社会生产力都没有大的发展,其原因就在于此。有人认为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犯了错误,事实上初期一些共产主义者认定的社会主义模式就是如此。认为运用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现实社会矛盾,推动社会的发展是正确的。直到“文革十年”的疯狂,开始还只认为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而对阶级斗争的原理和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主导思想,并不认为有什么错误。毛泽东也不是不想发展生产,“文化大革命”中仍在喊着“抓革命,促生产”。一个用暴力争得来的政权,必然要用战斗来保卫,清除不同思想、清除不同声音首先是第一位的,又会有多少精力和时间去发展生产力呢?获得政权后的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所走过的道路的实践已经证明,不抛弃阶级斗争理论不可能会有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观又从实践的层面检验了阶级斗争主导意识与发展生产力的矛盾,他们是不可能统一的。虽然陈独秀提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要走循序进化的道路”,以经济的内部成熟为条件。同时也提出共产党人的“宽容”与“容忍反对派”思想,但陈独秀没有放弃“阶级争斗”的主导意识,仍认为“共产主义者主张是:立脚阶级争斗的原则上面(此点与基尔特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不同而与工团主义相同),集合无产阶级中最觉悟最革命的群众,组织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共产党;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即应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此点与工团主义不同)。利用无产阶级国家这个武器,压制资产阶级的反动,加入世界的革命,扑灭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然后渐渐灭绝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度及私有习惯与心理,建设无产阶级的工业与文化,最后达到废除一切阶级无国家的共产社会。”^④

(二)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发展资本主义的矛盾

陈独秀只是从政治上抨击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他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相反,对社会主义财产公有极力推崇。认为此制度是“客观上经济组织变化之自然趋势及历史进化之进程”,^⑤是“解救现代经济危机和社会不安”的主义。体现的正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陈独秀后期,不再全盘否定资本主义,但仍没有忘记“私有财产制”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水岭,认为“即是废除束缚生产力的财产私有制,以国家计划的生产代替私人的自由竞争,使社会生产力有进一步的

发展”。^②正是他在告诉人们,《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时讲的这段话,时间是1938年9月15日。以至到了1942年2月,《在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中仍认为“私人财产和商品生产制,是资本主义的基础,亦即其弊害之根源。这一生产制,其目的是为生产工具者出卖商品,增加其私有财富而生产。不是为了直接供给一切人民食用品而生产;”^③认为其生产力愈益发展,越会使生产力与购买力的失衡,产生生产过剩。

陈独秀只想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他没有深思:共产主义只是马克思设想的一个带有乌托邦性质的理想制度。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那是未来几十代、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以后可能出现或者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事。而陈独秀当时认为“二三十年”后就能实现。需要民族志士为这个将没有私欲的“公有”制度、“计划经济”社会的实现而奋斗而牺牲。一个用热血、头颅换来的天下,谁能轻易放弃呢?再说,陈独秀肯定资本主义是不可逾越的阶段,但他没有看到或不理解是谁发展和创造了生产力,仍认为财产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实际在社会发展初期财产总是在少数人手里,正是这部分人及其创造性才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和动力。正是“先富起来”的这部分人的带动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陈独秀只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失去了财产而变成了无产阶级,他没有想到:公有制下个体同样是没有财产,其境遇是一样的。次之,陈独秀同马克思一样只是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进步,而没有看到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应该明白:社会成员中的多数和少数是可以流动和转化的。有钱的少数人经营不好也会破产,无产者通过自己的努力也有发展到白领的机会。这正是资本主义生命的动力。陈独秀只是从原则上认识到利用资本主义的必要性,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还欠缺科学的认识。

资本主义私有制下需要公有经济的补充,凯恩斯主义帮助资本主义绕过了险滩。是否社会主义也需要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补充,有的经济学家正是这样认为的。实际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比较与推理:公有经济的补充,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因此,资本主义仍在原轨道上奔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引入,预示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改变,他将危及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不能允许的。陈独秀不害怕资本主义,但如果引入市场经济,必将危及到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陈独秀又会有怎样的表示?

(三)坚持一种“主义”与大众民主的矛盾

自列宁开始,共产党的建党学说就是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前夕,陈独秀就特别提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要别于孙中山的“党魁制”。想从组织原则上防止专制独裁政党的形成。但最后还是出现了如斯大林那样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政权代替马克思无产阶级民主社会的统治的现实。既然党的领导人对此早就有所警惕,但终无可避免。于此历史要求党和人民不仅要从某个领导人的思想品质上反思,而且要从“制度”上做出深入的思考。半个世纪的共产主义学说的实践,人们已深刻地知道:“一个党,一个领袖”统治思想的形成,既是统治者个人独裁专制思想意识的结果;也与有一些政治领袖盲目追求客观真理的思维定势。当他们把自己的理想追求作为惟一真理,当认为自己所在的党派已经把握了这个惟一真理,成了唯一代表,要求它的党员以理想信念为中心,追求这个信仰,忠于这个组织,并勇于为这个组织献身,也会形成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思想统治。陈独秀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只是认为斯大林的政权没有实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是“根据历史之进化和社会的经济文化状况种种的客观境界”^④。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且只有这个党才能拯救人民。把本党派的政治理想和政治追求作为惟一真理,并从舆论上加以控制,哪还能容许别人怀疑,容许别人再有“思索”。当把这种思想教育视为当然的合理的与正常的,其结果,必然是多数人的思想停止,当人们的思想停止的时候,看到和听到的只能是紧跟和高呼“万岁”。什么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等均失去其应该的意义。当胡适1948年在隆隆炮火中离开北平,万分无奈地选择了蒋家政权,也正是他看到了“一个主义”下民主的虚伪性。

党派名称与它的理想、奋斗目标往往是一致的。如孙中山针对君主统治创建“国民党”一样,他是以实现主权在民为奋斗目标的。共产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而且也只有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其他政党无论你主张什么,都只能在服从它的理想前提下活动。这种党制环境下,就是允许

“反对党派”存在,又会有多少实际意义?同时他更不允许让你形成足以能与之抗衡的政治力量。没有制约力量的反对党的存在,也就失去了反对党存在的意义。陈独秀思想的科学价值,就在于他看到了反对党派存在的力量和作用,但他没有放弃极终真理,这样形成的“反对派”组织很难发挥出实际的作用。提问未来,各派政党组织政治上都是平等的。以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政治进步,以得到人民的拥护为人民所信任为标准,这样的“反对派”存在才有实际意义。

民主是什么?一般认为,民主制度起始于古希腊时期,但它准确地表达而实现从理论向制度的转化是在18、19世纪“君权政治”的衰落和市场经济的兴起,是经济水平和政治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通过资本主义宪政和法律的确立而对公民和政府行为展开实施的。它扎根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是不可能随意的搬来移去的。陈独秀想撇开资本主义社会,把一些民主的内容作为一般形式抽象出来,移植到他的“大众民主”,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中来,是不可能的。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不相融性。陈独秀不害怕资本主义,但他决不想回到资本主义。他想引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此路能走得通吗?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作为中国的“共产主义派”,可以说,陈独秀是敲响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丧钟的第一人。在他人生晚期,努力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制度上寻求取缺点”;也曾表示怀疑列宁,提出要“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托洛茨基包括在内)之价值”,曾想写《俄国革命的教训》。也曾说:“如果能叫马克思、列宁复生,如果他俩肯定今日苏联所做的一切,就是他俩的主张,那我就说一声,你们的学说,我不赞成。”^②也只能说,他在开始怀疑马克思、列宁的理论,从中可见陈独秀思想的国际性和现代价值。但若像胡适所说陈独秀晚年“已不是托派了,已走上民主自由道理”,显然是不准确的。说陈独秀思想已经脱离托派,没有根据,说他“已走上民主自由道路”,显然是还有相当一段距离。他没有完全跳出马克思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是肯定的。

陈独秀觉悟、提出的问题,三十年后才与胡耀邦、赵紫阳、邓小平思想接轨;陈独秀没有解决甚至还没有来及更深入思考的问题提到我们党和政府改革的面前,仍然是我们当前政治改革的难题,任重而艰难。但历史是按照人民的物质和精神需要的规律发展的。陈独秀相信的这个“自然趋势”也就是“历史趋势”,是任何个人和派别组织也改变不了的。

最后,我们引证陈独秀的话结束这篇文章:“其实人类的进化历史,它始终很冷静的走着它前进的道路,此时他并未意图走向天国,也不是走向毁灭堕落深渊,对于人们自己由虚幻的希望欢喜而来之失望悲哀,他不负任何责任。”^③

注释:

①任建树等《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第355、201、468、219、254、470、466、470页。

②王树棣等《陈独秀评论选编》(上),河南人民出版社,第381页。

③任建树等《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第555、499、491、519、515、591、593页。

浅议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思想

奚 金 芳

今天我们谈论陈独秀先生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已经历过90余年的时间检验后的事。因此检验其是否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实践。而后者证明,这个命题本身在我国近现代史上是存在着一系列矛盾与失误的。它是在我国应当进行民主革命的时候(20世纪10—20年代)被引入,却以《共产党宣言》为党的总纲领与圣经、以“共产党”为名建党,进行共产革命。明明中国尚在封建专制时代,却以世界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为自己的纲领,这是一种错位。后来党的二大虽然制订了最高与最低纲领,但实际操作的还是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黄色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它党派的任何联系”^①“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②“无产阶级领导权”^③等共产国际的钦定理论,所以陈独秀在任党的总书记期间,自中共三大(1926年6月)作出《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起,短短五年他就五次提出要退出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均因共产国际的反对并作出决议而服从之。尤有甚者,他对我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动辄批判,连北伐也持反对态度(后来才转变为支持)。国共合作却同床异梦,磨擦不断。最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从这一系列行迹可见,上世纪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是失败的。因为在1917年的俄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远没有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因此十月革命根本就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当时的中国革命却直接以俄国为样板,又直接受其主宰的共产国际领导,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相混相长,莫逆难分的。这就是长期干扰了我国民主革命的“左”的国际根源。自大革命失败陈独秀作为“替罪羊”,于1929年11月15日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至今81年来,真相已大白于天下,偏偏还要给陈独秀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原罪,足以反证这种打上俄国印记的极“左”思潮烙印之深。我党至今仍深受其害而未能认识,一谈给陈独秀平反,还要加上一条“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尾巴^④。当然更谈不上去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说,陈独秀研究还真正是任重道远哩!对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是否也得从这里着手?

诚如列宁说过,中国是“外来的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同时输入,思想界顿成复杂的状况”^⑤。其时的复杂,从1905年孙中山也在《“民报”发刊词》中有“试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主张。当时所称道的社会主义,在陈独秀的文章里亦有与孙中山雷同的理解,1915年9月他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称社会主义乃“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彼等所主张者,以国家或社会,为财产所有主,人各从其才能以事事,各称其劳力以获报酬,排斥违背人道之私有权,而建设一新社会也”^⑥。这时的陈独秀是西化派中的激进者。他虽称赞欧罗巴文明的代表法兰西所最具近代文明特征的是三件事,即“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⑦。但他在总书记任上实践的却是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模式。因为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下属一个支部。按国际章程规定,下属支部必须绝对服从其领导(包括派驻代表的领导)。

直到他晚年在南京狱中,他经过6—7年的沉思(包括自1929年被开除出党起),准备写一本《法国大革命史》。当然这时的他不仅对法国大革命和法兰西的自由民主精神依旧情有独钟,而且他是在迭经监狱的苦难后的精神与理性升华。他从更高、更广的层面,继五四高举科学、民主两大旗帜之后,又把民主与社会主义近世两大天才发明的火种再次高擎着。此时的他,更深切体会到苏俄斯大林专制政体的残暴本质,还准备写一本总结其教训的书——《俄国革命的教训》。此书虽未写成,但在他出狱后几年内陆续写给友人及与托派同志争论的信中可见,他已得出了惊世骇俗的见解。主要内容是反映在他于1940年9月给西流(濮清泉)的信,及《我的根本意见》(1940年11月28日)中。前文说的:“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发明,至可宝贵;不幸十月以来轻率地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所谓“无产阶

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等六大方面,及此信中他反驳陈其昌认为的此次大战中的“民主与法西斯之显然的界限已归消失,或将归消失”^⑨,列出四大证明理由,指明民主与法西斯之界限决不会消失。

正是在这种争论与批判语境下,他列出英美及战败前法国的民主制,与俄、德、意的法西斯制在议会选举等五大方面民主权利的对比表,并在其中注明“(苏俄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师)”这样的话。他大声疾呼要“大家醒醒吧!”^{⑩2)}同此信中他说:“以独裁代替了民主。首创独裁本土——苏联,更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为”。他称莫斯科,柏林,罗马这“三个反动堡垒,把现代变成了中世纪”。今天看到这些文字,难道不为之震撼吗?这其中饱含了他与同代革命者们的血与泪;事实上这些成了他对苏俄十月以来,列宁亦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的历史性讨伐的宣言书。社会主义出了问题?还是大问题!当初作为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第一人^⑪,发出了《我的根本意见》。对自己昔日称之为是人类“天才发明”的社会主义在俄国与中国,乃至在东欧,认为本来就不合国情;他说“主张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托洛斯基都包含在内)之价值,乃根据苏俄二十余年的教训,非以马克思主义为尺度也。”这是他对包括自己在内曾移植、热衷宣扬与实践的马克思,列宁等外国的思想理论的失灵或失控,乃至失范作扬弃本身,就足以说明他的与时俱进的风范。他这样说和做,不仅及时告鉴,更从内外两方面去寻找出其中的原因。他在1941年1月19日《致s和h的信》(s及孙洪伊,h即胡秋原)说“弟自来理论,喜根据历史及现时之事变,更不喜应用前人之言以为理论之前提,此中“圣言量”的办法,乃宗教之武器,非科学之武器也”“非以马克思主义为尺度也。”^⑫。可以说对苏俄社会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本质的认识发展,是“不喜欢空谈”的陈独秀后期思想的主要之点。

对于这种种复杂性的探讨,还与另宁仓促建立的第三国际从成立到解散(1919年—1943年)的历史直接相关。篇幅关系,本文不作论述。下列一段话中所提问题可以作为对苏俄经验总结的注脚,也是对社会主义在苏俄的诠释:

“如果十月革命的结局是布尔什维克失败,沙皇在俄国复辟,或者某一共和主义的独裁者篡夺了胜利果实,则俄国将出现一个‘皇权专制主义’的政权。这些反革命被布尔什维克镇压了之后,复辟‘皇权专制主义’就成了他们的遗嘱。由于在当时俄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生存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布尔什维克在夺取了政权之后,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执行这一遗嘱,在俄国复辟帝制,诚然,布尔什维克所建立的帝制是一种变了形的帝制,一种以人民群众的名义进行统治的帝制。一般地说,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是:如果新的生产关系生存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时,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就已经夺取了政权,那么,不论他们是多么坚定的革命者,一旦执政,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被他们镇压的反革命的遗嘱执行人。”^⑬

因此我们还是可以提问:如果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的结局不是帝制复辟,而是工人领袖和工人政党夺取了政权,建立了“社会民主共和国”,结果将会怎么样?这是一个出现在十月革命之前的“列宁问题”。

为了建立了“社会民主共和国”,就得镇压反革命党人,首当其冲的是以路易·波拿巴为首的要求复辟帝制的反革命党人;此外,不言而喻,在工人领袖和工人政党的治理下,法国工业也会大大发展起来。除此之外,“社会民主共和国”还会有她的“另一方面”。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马克思已经指出:

(法兰西第二帝国)“国家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

“正如波旁王朝是大地产的王朝,奥尔良王朝是金钱的王朝一样,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即法国人民群众的王朝。……

……“(小农)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利保护他们不受其它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⑭。

细心领悟马克思的这一段话的精神,我们将得出结论:如果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的结果不是帝制复辟,而是建立了“社会民主共和国”,那么,建国的工人领袖和工人政党自然而然地成了小农的代表,即成了

法国的人民群众的代表。从而自然而然地成了“人民群众的主宰”，成了“高高站在人民群众上面的权威”。这样，“社会民主共和国”将和第二帝国一样有了“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而这就意味着它已经“异化”为一种帝制。在这种意义下，新政权镇压了帝制派的反革命以后，就执行了它的遗嘱——复辟帝制。诚然，这是一种变形了的帝制，一种以人民群众的名义进行统治的帝制。

这里，历史的复杂性告诉了我们二个真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生产力发展的问题，而非列宁所说的政权问题；权力的异化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综上所述，从大尺度的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无论1848年法国革命的结局是“复辟帝制”还是建立“社会民主共和国”，法国的工业都会大大发展起来，但都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法国接受一个“不受限制”的专制政府，从此进入拿破仑主义的历史阶段。

于是我们从马克思关于“革命的遗嘱”的命题得出的一个推论：

“如果在新的生产关系生存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时，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就已经夺取了政权，那么，不论他们是多么坚定的革命者，一旦执政，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被他们镇压的反革命的遗嘱执行人。”^⑬

至今应当说，这个由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著名命题，已经给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运动作了最好的注解。也给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由来和发展作出了某种总结。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先生始终未能写出的《俄国革命的教训》《法国大革命史》《中国革命史》三部书而抱恨终天。但他的遗愿已由历史与逻辑本身，以历史事实为载体写成了！陈先生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由来和发展，前期引入中国，与后期的肯定其为人类三大天才发明，但重在揭露与抛弃并存，当是题中应有之义了。其前后期民主思想演变的重大历史价值在于：是他第一个给出了马克思关于“革命的遗嘱”命题的唯一准确答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生产力发展及与之相应的民主政治体制问题，而非列宁所说的政权问题；权力的异化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绝非只标以“人民的共和国”或“社会主义”就能完事的。

(2008.5.4初稿,6日定稿于南大,感谢裴显生教授指点)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1921年。

②列宁《民族殖民地提纲初稿》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通过成决议。

③1924年中共四大决议案。

④见石仲泉：在武昌纪念中共党的八七会议暨五大8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载上海市委党校《战略与政策研究》杂志2007年12月期。

⑤列宁：《亚洲的觉醒》见《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48页。

⑥原载《青年杂志》第一卷一号。见上海人民出版社《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第138页。

⑦同上第136页。

⑧陈独秀：《给西流的信》，1940年9月。见上书第三卷555页。

⑨同上第558页。

⑩见陈中凡《中国思想科学化》，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陈中凡文集》第194页。该文称：“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五四运动时代，已由陈仲甫、李守常诸氏正式提出唯物史观的意见。但只不过是他的萌芽。直到1925年五卅事变，沙基惨案相继发生，国内的民族资本濒于破产，一般社会问题才引起的注意。”

⑪见上海人民出版社《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第567页。

⑫谭天荣：《刻骨铭心的往事》，在五柳春网站纪念林昭网页。

⑬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一卷第692—693页。

⑭谭天荣：《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同上注7网。

陈独秀与中国社会主义

厦门大学 李淑媛

陈独秀(1879—1942)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位著名而又复杂的人物。他的一生大起大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4—1927)是转折点。之前他是新文化运动旗手、五四运动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中共首任总书记;之后他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并被斥之托派、叛徒、汉奸等罪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指引下,重新评价陈独秀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广大干部、群众以及史学工作者努力下,对陈独秀的研究取得很大进展,这不仅有利于还历史以真实面貌,也将可还原从建党到遵义会议,确定毛泽东同志在全党领导地位之间,从党诞生之日起,就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鲜明地高举反帝反封建旗帜的无产阶级政党。陈独秀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他的名字与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不可分割。他是带领中国人民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和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之间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先后发表过《五四运动和建党时期的陈独秀》和《评大革命失败后的陈独秀》两篇文章^①。由于主客观条件限制,冲破一些禁区,但还有些禁区未能或未敢冲破。这篇《陈独秀与中国社会主义》,力图从他的著述言行,以及翔实资料,还其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应有的地位。

一

陈独秀把科学、民主和社会主义视为“近代人类三大天才的发明”^②。1902年陈独秀由日本返回安庆,组织励志学社,发表反清爱国演说时,在中国首先提出科学与民主的口号^③。1915年9月《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在上海创刊,陈独秀在《敬告青年》文中,进一步提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④。他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不仅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开辟了一个新时代,而且在俄国十月革命推动下,自身也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着科学底社会主义者的转化。晚年他把这三者的关系,写成一个公式:^⑤

民主、科学→社会主义。

民主、科学→共产主义。

从五四运动到第一次大革命这七年间,陈独秀在传播和实践社会主义上所作的贡献,突出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揭露资本主义本质和基本矛盾,提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1921年1月和1923年5、6月间,陈独秀在广东公立法政学校和广东高师分别作的《社会主义批评》^⑥和《关于社会主义问题》^⑦是早期传播社会主义较为全面系统的代表作,下面引文基本上都是这两次讲演的要旨。

他从唯物史观出发,指出社会组织进化的历程是客观的境界,不是主观的要求。

资本主义所以能够推倒农业手工业社会,其成功要素有二:一是资本集中,一是财产私有。从这两者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矛盾,指出:资本集中是发展生产力及社会经济组织之进步的方法,然在财产私有制度之下的资本集中,资产阶级之成功在此,其崩溃之原因亦在此。因为这两者矛盾的发展,其结果在生产上和分配上都发生不可挽救的危机。

在生产上,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开宗明义便是从“商品拜物教”分析入手,若不懂得这个“商品拜物教”是什么?就不会懂得资本主义,不懂得资本主义,就不会懂得社会主义。

他进一步指出:资本是社会的劳动力所积而成,是社会上最重要的东西,没有人能反对资本,我们反对的乃是个人占有这个资本,利用资本增加他的私有财产的资本主义。他运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剖析了工

业资本家如何从机器生产中获取巨额利润,指出:近代资本之所以如此集中,资本主义之所以如此发达,资本家之所以如此强有力,都是机器帮助资本家造成剩余价值渐次积累起来的。正因为剩余价值替资本阶级造到这样强盛的地位,而资本阶级必然崩溃不可救的危机也正含在这剩余价值里面。马克思说:“有产阶级锻炼了致自己死命的武器。”正指资本阶级是剩余价值造成的,将来破坏资本阶级的也就是剩余价值。

在分配方面,他指出:“资本制度时代社会的财富,比较农业手工业时代增加得多。但以财产私有之故,全社会的财富差不多操诸少数资本家之手,多数人则日益减少其购买力,其结果遂至社会上生产力和消费力失其均衡。进而指出:我们须注意,资本制度之下剩余生产,乃伪的剩余生产,是由生产力超过消费力发生的,非生产力超过社会需要之真的剩余生产。——资产阶级的国家,为解除这剩余生产之恐慌,不得不设法把这些无法出卖的商品运输至外国去,于是发生殖民地问题,资本主义国家因为要保守及增加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一面须镇压土人之反抗,一面又要和别的资本主义的国家竞争市场,在此争彼夺的当中,遂不得不维持强大的海陆军,才好保持商品在殖民地、半殖民地里面继续的安全的销流。以武力为工商业之后盾,向殖民地半殖民地进行经济的侵略,更进而行政治侵略,这就叫做“资本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最发达的最高形式,亦即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侵略工业落后的弱小民族之别名。

陈独秀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搜寻垂尽,帝国主义者间相互争夺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弱小民族的反抗,这三者合起来乃是帝国主义的致命伤”,“催命符”。由此,得出的结论便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帝国主义那条旧路不好走了,“客观的历史的进化之历程明白指出我们必要之路,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不相信社会主义,我们不能不走社会主义之路的原因。

如果陈独秀没有熟读并接受马恩从《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到列宁的论帝国主义,怎能有这么概括准确的把资本主义发展史以及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取代道理,以如此通俗明白的语言加以传播呢?

(二)强调只有进行阶级斗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才能取代资本主义。

陈独秀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固然要知道历史先生已经指教我们一条可走之路,但同时要知道历史先生仅仅指教我们一条可走之路,并未曾造好一条现成的路给我们去走。所以要把社会主义理想从空想变科学,从可能变现实,还是要靠理论正确组织严密的政党去实现。也就是在《社会主义批评》和《关于社会主义问题》这两次演讲中,前者第三道题目是(三)应讲何种社会主义?后者第二讲题目是(二)我们相信何种社会主义?在应讲何种社会主义中,他介绍了当时社会主义五个流派: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在我们相信何种社会主义中,他则把社会主义分为四个流派:基尔德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共产主义,即马克思科学的社会主义。而把前面的行会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包括于基尔德主义内。

他在对社会主义各个流派一一比较分析之后,认为:“讲到最有精密周到的办法,自然要算是共产主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他对共产主义破坏(即革命——注)和建设之大略程序作如下的概括:“共产主义者主张是:立脚在阶级斗争的原则上面(此点与基尔德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不同而与工团主义相同),集合无产阶级中最觉悟最革命的群众,组织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共产党;无产阶级的革命成功,即应建设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此点与工团主义不同),利用无产阶级的国家这个武器,压制资产阶级的反动,加入世界的革命,扑灭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然后渐渐灭绝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度及私有习惯与心理,建设无产阶级的工业与文化,最后达到消除一切阶级,无国家的共产社会。在这里他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本质作了极概括极明白的勾画。

在《应讲何种社会主义?》中,他将科学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即柯祖基(考茨基——注)和柏伦斯泰因(伯恩斯坦——注)的主张用表作了简明的对比,使人一目了然、泾渭分明。

共产主义的主张:	国家社会主义的主张:
阶级战争。	劳资携手。
直接行动。	议会政策。
无产阶级专政。	民主政治。
国际运动。	国家主义。

他引证马克思在《哥达纲领的批判》中说的：“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的中间，有一个由这面推移到那面的革命变形的时期。而这个时期，政治上的过渡时代就为必要。这个政治上过渡时代，不外是无产阶级的独裁政治。”以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

同时，他还批判无政府主义的错误，指出无政府党所诅咒的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国家、政治、法律，我们也应该诅咒的；但是劳动阶级据以铲除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我们是不应诅咒的。

对待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陈独秀以上言论，显然是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

（三）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中国不但要讲社会主义，更有急于讲社会主义的必要。

陈独秀针对一些人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并不发达，更没有像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濒临崩溃地步，怎能讲社会主义的观点，在《社会主义批评》中指出：抢救中国固然不能不发展实业，但决不能走欧美已经造成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老路等五个方面的理由，论证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的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的必要。

他清醒地看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必须根据国情逐步推进。他认为：社会主义者并不反对资本集中，所反对的，就是财产私有。所以在资本集中、财产私有八个字上，把“私”换成“公”。因为这一个字的更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分配方法便完全改变了。但是当时中国却不是苦于资本主义发达，而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发达，因此，他是主张要分步骤的推进。他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三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要有科学的根据。所谓科学的根据，是根据社会历史的进化和现代社会的经济文化状况的客观境界，不是空中楼阁主观的幻想。第二个原则就是社会改造应有的步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把各国共产党革命的步骤略略说过，指示在某种国家应该怎样，在某种国家应该怎样，并非主张同时一跳，就跳到共产主义的路上去。这是因为各民族之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进步各不相同，所以改造的步骤不能一致。第三个就是每一步骤都须用革命的方法。最后他指出：若是忘了第一、第二两个原则，便和其它空想的社会主义无异，若是忘了第三个原则，就变为改良的、堕落的社会民主党。

在这里他已意识到发达国家和像中国这样欠发达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上应有所区别，同时初步形成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构想。他在《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开始进行》讲演中，在对国内外经济、政治状况作仔细分析之后，提出：凡是奋斗总有一定对象，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开始进行，就是劳动阶级应该如何开始奋斗。中国劳动阶级奋斗的对象是什么？他的回答是：现在中国若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劳动阶级自然要打倒资产阶级，即行社会主义。但是半殖民地的中国，不像欧美各国已达到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中国的是封建的军阀阶级，他们勾结外国帝国主义为后援，资产阶级、劳动阶级都在他们压迫之下，所以中国劳动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目前工作，首先要做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

对劳动阶级和社会主义者参加国民革命运动陈独秀强调应注意两点：第一点，于国民运动以外，同时须特别注意劳动的宣传及组织，尽量促进其革命的精神与阶级的意识，以预备社会革命的基础。第二点，社会主义者的国民运动，要做成纯粹的国民运动，不可做半国民运动。此时国共尚未合作，国民革命运动正在酝酿中，他讲的第一点，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在国民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应该保持独立性和领导权的意思。而第二点则基于国民革命愈彻底对劳动阶级和社会革命愈有利的思想。所以他强调要做纯粹的国民运动，不可做成半国民运动。他强调：社会主义的国民运动是：团结民众势力，满具革命的精神，绝不与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这就叫做纯粹的国民运动。

他还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其性质其结果不属于一个国家的革命，乃是世界的革命；不仅仅是民主主义对军阀的革命，还是平民主义对于帝国主义的革命。能够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只有资本主义国内的劳农革命和殖民地的国民革命，两种革命势力的合拢起来，才可以实现。若是缺少一个，一时都不易成功。

以上这些言论思想，基本上是力图从中国国情的实际出发，而非教条主义的搬用马克思主义。这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期，能够如此理解与运用马克思主义，应当是已达到相当的高度了。

（四）认定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作了大量宣传和组织工

作。

陈独秀在揭露资本家对劳动者的残酷剥削和劳动者的悲惨生活后指出：中国劳动者要改变受剥削受压迫的状态，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革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他在指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同时，更明确地说到：“历史先生仅仅指教我们一条可走的路，并未曾造好一条现成的路给我们去走。因为这条路上荆棘满地，障碍重重，我们努力开辟荆棘，扫除障碍，然后才可以通行。若是我们不去努力创造，只坐候历史的自然进化，那历史先生对于这种懒惰专想吃现成饭的人是不负责的啊！”所以他认为：“共产主义者的主张应当是：集合无产阶级中最觉悟最革命的群众，组织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共产党。”^⑧

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的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上海小组是全国主要发起组，它推动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陈独秀还派人到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中去建党，同时将《新青年》于1920年9月改为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在这刊物上陈独秀发表了很多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在批判基尔德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等流派的斗争中、在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运动中，在论述中国社会主义中，陈独秀都有有关社会主义的闪光论述。

《新青年社》除出版《新青年》月刊外，还编印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丛书》，出版《劳动界》、《伙友》等通俗的工人刊物。用通俗的道理和生动的事例启发工人，揭露批判资本主义，宣扬劳动神圣。如在《劳动界》第6期，陈独秀用百多字写成的《无理的要求》短文，全文如下：“三新纱厂的工人因为上海万物昂贵已经不能活命，厂主还要减少工钱，他们罢工反抗这本是分所当然的事。然而厂主说是工人无理的要求。不错，牛替主人种了田，主人还要吃他的肉，牛也不曾罢工。如今厂主并没有吃工人的肉，工人倒罢起工来，怎么不是无理的要求。”这类短文，何等有力、何等犀利！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帮助下，组织成立了许多工会。上海机器工会成立大会，陈独秀不仅到会发表演说，还被大会推举为经募处主任。正是因为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被公认为旗手、领袖，以及在创建中国共产党中做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才顺理成章地被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推举为第一任总书记。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1921年5月，我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组织中占重要势力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从建党到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五年间陈独秀主持召开了五次党的代表大会，在这期间党员由建党时的50多人发展到近6万人，党内基本贯彻了民主集中制，党是团结的富有朝气的，在共产党人的组织推动下，全国工农运动蓬勃发展，从而推动了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力量。

大革命失败，陈独秀固然要负重要责任。但是当时中共不仅是幼年，而且又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代表对中共中央领导气使颐指，俨然以钦差大臣自居，推动国共合作胜利北伐成也国际，忽左忽右心中无数招致革命成败也是国际。陈独秀乃至中共中央纵有正确思想理论，在共产国际面前也不容易被接纳。所以不能以大革命成败，轻易地否定陈独秀的整体真实言论和思想。换句话说，不能因为大革命失败，而否认陈独秀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所作的重大贡献。

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中国人民展开全民族英勇的抗日战争。此时陈独秀也提早结束了被囚于国民党反动派长达五年的铁窗生涯。从出狱到去世五年期间所发表的言论和实践看，他还是拥护共产党及其抗日主张；支持苏联和英美等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密切关心国际国内局势发展，甚至表达了回归党怀抱的愿望。因此，讲他反苏、反共是不公允的，说他消沉堕落也非实际。只能说此时他已不像当年为民主、科学和社会主义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义无反顾的主将；而是虽息隐山野，仍心系大局，深沉思考的智者。不时仍对攸关社会主义重大问题，提出颇具真知灼见的观点。可惜由于地位身份转移，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

譬如此时他经常把二十多年的苏联社会主义分为之前即列宁与之后斯大林时期，对列宁时期，他认为“只有俄国的共产主义，在名义上、在本质上都是马克思主义的”。^⑨因此，早期他在讲社会主义时偏重于无产阶级专政；而晚年目睹斯大林背离民主，集权力于一身，大搞个人崇拜，排挤打击不同意见的异己，大搞

肃反扩大化,违背了社会主义民主。因此,晚年特别强调社会主义民主。他认为:“列宁说过资产阶级民主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民主,而苏维埃民主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的民主,后者的民主是比前者广泛得多扩大得多。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之时,恩格斯还健在,他并没有指责这个党名称要不得,列宁也没有摒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个名称,可见他们并不轻视民主而是重视民主的。……现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所及吗?”^⑤

他认为:“苏维埃制若没有民主内容,仍将是一种形式民主的代议制,甚至比资产阶级形式民主还不如。”“我认为非大众政权固不能实现大众民主;^⑥如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产阶级专政,必然流为斯大林或以少数人的格拍乌的政治,这是事所必然,并非斯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⑦“不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继斯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仿佛只要去掉斯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那永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

应与指出陈独秀把斯大林的专制与希特勒的法西斯独裁混为一谈,是不正确的。斯大林的专制是社会主义实践中偏离了民主轨道,而法西斯独裁是源生于反共反民主反人民的。但是陈独秀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尖锐地批判斯大林独裁专制,背离了社会主义民主。当原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复灭后的今天,回头看来,不能不惊叹陈独秀当初的远见卓识!

在对待中国的社会主义问题上,早期陈独秀不仅提出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的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的必要。晚年在这问题上,似乎更加强调在中国搞社会主义要从客观实际出发,重视经济条件成熟与否。1938年7月,陈独秀出狱不久,应邀到重庆民生公司讲演,他取题是:《资本主义在中国》。^⑧在这次演讲中,他提出中国此时还是一个“初期的资本主义国家”观点。这里他并非否认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而是把当时中国社会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上与欧美资本主义对比而言。他认为:“人类社会进化有两种形式,一是循序渐进,一是跳跃的进化,每个民族客观上和主观上的力量,固然能够循序的进化比较的加速,而跳跃的进化则大半由于外来之影响。在中国,一方面由先进的资本主义之影响而发生跳跃,一方面也由它(资本帝国主义)的阻碍而未有高度的发展”。因此他断言:中国此时还是一个“初期的资本主义国家”。由此出发,他认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若走循序进化的路,必须以内部经济的成熟为条件,若走跳跃进化的路,则必须以外部的影响(刺激与援助)及内部政治的成熟为条件,不像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是革命的而却是幻想的,在经济上是反动的”。他认为,像资本主义比欧美落后但又比中国先进的俄国,列宁尚说:“俄国工人吃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而不是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在中国更是如此。因此他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还大有发展之余地。而且只要是资本主义,就要有商品交换。他批判社会主义初期就立即取消为商品交换而生产的思想,指出:像你们“一反近代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为交换而生产”的主张,这正是全世界至少是最主要的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方法,所谓“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苏俄,还不敢也不能如此主张,何况中国!显然陈独秀已意识到在“初期资本主义的国家”,纵使进入社会主义,也不能过早的取消商品。从“初期资本主义”,不能不令人想到“初级社会主义”,其间思路是否有脉络可寻?

为此,他在《抗战与建国》一文,除讲民主政治外,特别强调民族工业之发展和农民的解放。他说:为什么要发展工业?因为非如此不能提高国家物质的力量和提高人民生活和文化,以减杀整个民族文化方面的落后性。为什么要解放农民?因为非如此不能根本摧毁封建的社会势力,繁荣本国工业的国内市场,这便是我们建国的整个概念。^⑨

建国后我们虽然取得了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胜利完成“一·五”计划的辉煌成就,可是由于缺乏对经济社会客观规律的认识,先是搞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继之又在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搞穷过渡。使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把国民经济推到崩溃边缘。社会主义建设上的失误,是与在社会主义民主上的失误相关连的。改革开放,确认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计划经济逐步变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逐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使中国社会主义恢复了生机与活力,取得了巨大成就,令全

世界为之瞩目。回首看陈独秀的有关论述,不难发现其中也不无真知灼见。正如陈独秀说的:没有民主就没有进步,也没有革命。有民主才有科学,有科学才能保证民主。^⑩

三

陈独秀为民主、科学和社会主义奋斗一生,他突出而令人肃然起敬的是:

(一)对主义信仰笃真。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是热情倡导民主科学的必然结果,是对众多社会主义流派比较斗争中的理性选择。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到中国,马恩列的中译本还极为罕见,但是从陈独秀的讲演或文章中,其观察分析社会问题的观点方法,虽然是通俗的、中国化的,但探其源泉究其根由,不少都可从马列论述中找到,甚至直接引摘自《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哥达纲领的批判》等经典著作。同时常常会指出译误的地方。如他看到胡秋原从日文中译出这样一句话:马克思主义在三层楼上展开。这是什么话,他看不懂,当然别人也看不懂,经他找到原本查对一下,原来是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分三个阶段。^⑪这除了因他懂得日、英文,用心潜研外,以他那通读经书子集却毫不盲从并起而反孔的性格,说明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征服了他,使他心悦诚服。他在“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一文中,把马克思精神归纳为:一是实际研究的精神,二是实际活动的精神。^⑫他希望青年同志们不仅仅要研究马克思的学说,还须使其学说用之于实际活动,于社会的革命。我以为:陈独秀与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相比,不仅毫不逊色,而且陈独秀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更富实践性战斗性,他不愧是一位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二)对劳农感情真挚。陈独秀不仅是大文豪,还当过北大文学院院长、广东省教育厅长,他有鲜明个性和高尚人格,但却没有官气傲气,生活俭朴,布衣粗食。章士钊回忆早年与陈独秀一道创办《国民日报》时,陈独秀“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白衣发黑,白虱如星,亦不在意。其工作的投入,生活之苦行,是终其一生的。这种性格当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是很容易和劳农大众打成一片的。他在《此时中国劳动运动的意思》”^⑬一文中写道:日本贺川先生在日本贫民窟住了十几年,美国的贫民窟他也去调查过,但是他说:“见了中国上海的贫民窟,那日本和美国的贫民窟却算不得苦恼”,进而说道:这些劳工做了社会的重要的工,和懒惰的乞丐不同,但是他们的生活比乞丐还不如,……我们但凡有一点对于同胞的感情,便应该出力帮助这种贫苦的劳动者。他们若是对于劳动运动袖手旁观,甚至于从中破坏,我奉劝你们以后便不必把什么仁义、道德或基督教挂在嘴上骗人了。至于应当如何改变劳工痛苦现状?他在答弗哲民提出如何解决妇女、青年、劳动三个问题时,明确地回答说:“非用战争的手段来改革社会制度不可”。^⑭

(三)对革命意志坚定。陈独秀说过:“自来立论喜欢根据历史现实之事变发展,而不喜空谈主义,更不喜用前人之言为立论之前提。”^⑮他追述自己一生,“故而见到孔教道理不对处,便反对孔教,见第三国际不对处,便反对他,对第四国际第五国际,第……国际亦然,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反对派’,实是如此,非弟故意如此,乃事实近我不得不如此也。……迷信与成见,均经不起事变之试验及时间的淘汰,弟两不取也。”他说:他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但不愿意说假话或不关痛痒的话。这正是陈独秀的性格。所以对于陈独秀的错误,毛泽东同志认为“陈独秀不搞阴谋”。但是讲真话需要勇气,出于忠诚。像毛泽东同志说的要有几不怕。陈独秀一生五次被捕,度过六、七年牢狱铁窗生活,但在法庭、监狱,他却昂首挺胸,毫无惧色,为了主义,视死如归。他把监狱和研究室看作世界文明的两大发源地,认为“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⑯硬的不行,国民党反动派用封官钱财收买他,也未能得逞。他一生光明磊落,刚直不阿,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新型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典范。

纵观陈独秀一生是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奋斗的一生。其中虽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有一度参加托派而犯下严重错误。他对革命有功也有过,但功过对比,功大于过。他的言论,有对也有错,对错相较,正确是主流。那么为什么加在他头上的帽子那么多那么沉重,而要摘除妄加在他头上不实不符之帽又是那么难之又难?为什么国外、党外敬他褒他,有人称他为崇高革命家,超过孙中山,社会主义大师,东方无产阶级革命之父……;而党内对他又是那么苛责?他的言论不下千万言,对当时社会影

响那么巨大,本是党的一项宝贵财富,为什么竟让他长期埋没而不去发掘?

长期以来,扬李(大钊)抑陈(独秀)成为正统。其实李大钊、陈独秀都是我党早期光辉夺目的领袖。公允的说北李南陈,陈独秀决不在李大钊之下。李大钊过早就从容就义,这是我党重大损失。陈独秀并未因怕死而苟生。蒋介石之所以不敢对他下手,乃因国际上如爱因斯坦、罗素、杜威等,国内如宋庆龄、蔡元培、鲁迅、胡适等知名人士的有力声援与营救才幸免遇害。北大学生曾打出“陈独秀就是真理”的标语,李大钊同志也说过:“陈独秀是真理和光明。”毛泽东同志曾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文章,说到:我们对于陈君,他认为思想界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之毫末。……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高至坚的精神万岁!^⑥就是大革命失败,陈独秀被撤职开除,毛泽东同志对陈独秀也从未有过火的指责。相反,他认为大革命中,我们犯了右倾错误,十年内战、八年抗战时期我们又犯了三次‘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一次右倾错误,都是来自共产国际。也说过:中国托派与苏联托派不同。还说过:当年没有让陈独秀到延安,那责任在我,我没有把他接过来。“将来我们修中国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虽然毛泽东同志讲过这些公正客观的话,为什么陈独秀还难以彻底翻身?足见那股潜在于党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极左妖风,已成为阻碍党内民主和和谐生活的习惯势力,是压抑党内民主和和谐生活的大山。唯有铲除恶劣的潜存的习惯势力,搬掉窒息民主的大山,一个真实的陈独秀才会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会为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忠诚的社会主义先驱、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首任总书记而自豪!

注释:

①《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1981年第2期。

②《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第19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③《陈独秀思想研究》魏知信,第9页,南京大学出版社。

④《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78页,三联书店。

⑤《陈独秀评论选编》下,第38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⑥《陈独秀文章选编》中85—98,三联书店。

⑦《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287—303页,三联书店。

⑧《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295页,三联书店。

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23页,三联书店。

⑩《陈独秀评论选编》下,第365—366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⑪《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第20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⑫《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第196、19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⑬《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第23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⑭《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616页,三联书店。

⑮《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594页,三联书店。

⑯《陈独秀评论选编》下,第66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⑰《陈独秀评论选编》下,第35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⑱《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177页,三联书店。

⑲《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21页,三联书店。

⑳《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17页,三联书店。

㉑《新青年》第九卷第1号。

㉒《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424页,三联书店。

㉓《陈独秀评论文选稿》上第104、10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变化轨迹

中共中央党校 祝彦

内容提要:陈独秀的思想和他这个人的政治命运一样“坎坷”、“曲折”。从一个科举制度下的秀才,成为对封建主义进行猛烈抨击的民主斗士,崇拜西方的“法兰西文明”及其资产阶级民主;不久又因认识到西方民主的虚伪,而予以否定,转而追求社会主义制度及无产阶级民主;到了晚年,从超阶级、超历史的民主观出发,以“斯大林现象”为案例,又觉得资产阶级民主比无产阶级民主更加“具体”、“优越”,从而使他的思想似乎又回到了“五四”时期对“德谟克拉西”的赞颂与肯定。从而也就形成了陈独秀“之”字形的思想轨迹。

关键词:陈独秀;社会主义;轨迹

陈独秀从1897年到南京参加“江南乡试”后,即有了“意外有益”的收获,而完成了“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①。从此,陈独秀把本来用来写八股试制的毛笔,转向对封建制度的批判!这可以说是陈独秀民主思想的最早萌芽。其特点是带有强烈的反封建色彩。自1903年后,陈独秀不断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其民主思想也通过《安徽俗话报》等为载体得到宣传。1915年9月15日创办《青年》杂志,成为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但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陈独秀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由一个赞扬“近世文明”的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拥护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主义者。在接受了唯物论史观、剩余价值论、无产阶级专政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后,陈独秀就告别了曾经崇奉的“德谟克拉西”,并强调资产阶级民主是“资产阶级的专政”,对其进行无情的批判和否定。此后陈独秀投身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并领导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斗争。在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的思想又逐渐开始发生“倒退”性的变化,尤其在1932年10月份被捕入狱后,陈独秀脱离了实际斗争,从“斯大林现象”分析入手,总结得出资产阶级民主的“优越性”,从而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后退”。似乎又回到了“五四”时期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崇拜。从这种变化来看,可以分析得出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变化轨迹。本文将对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变化轨迹进行探讨评述,从而更加清楚地把握陈独秀的思想复杂性,以及造成这种曲折思想轨迹的社会原因与个人因素。

—

在第一阶段,陈独秀早期民主思想的萌芽始于他对“选学妖孽”的背叛。主要内容是对封建专制的猛烈抨击。提倡民权,否定君权。反对“朕即国家”。比如对国家的概念,陈独秀解释其内容应包括土地、人民、主权三要素,“以上三样,缺少一样,都不能算是一个国”,“一国之中,只有主权居于至高极尊的地位,再没有别的什么能加乎其上了。上至君主,下至走卒,有一个侵犯这主权的,都算是大逆不道。”中国之所以在近代被西方列强侵略瓜分,就是因为只“靠着皇帝一人所为,……所以才弄到灭亡的地步。”所以,陈独秀主张要唤醒国人的“民权”意识,否则,中国人既无“爱国心”,又无“自觉心”,“人人都不知道保卫国家的,其国必亡。”^②由是,陈独秀对封建制度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他批判封建社会里中国人传统的“恶俗”:各种落后的婚姻、敬菩萨、妇女的装扮等;他批判中国人落后的生育观,指出:“若夫吾之国力不伸,日益贫弱,正坐生殖过繁,超出生产之弊。”陈独秀警告说:“长此不悟,必赴绝境。”^③他批判国民性是:“卑劣无耻退蕙苟安诡易圆滑”,对此,陈独秀感到“呜呼,悲哉!”^④他还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思想,对“孔教”进行了辛辣的抨击,陈独秀认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⑤,要去帝制,必除孔教!另外,陈独秀还从积极方面提出了许多主张,比如以“六义”来“敬告青年”,即:1、自主的而非奴隶的,2、进步的而非保守的,3、进取的而

非退隐的,4、世界的而非锁国的,5、实利的而非虚文的,6、科学的而非想象的^⑥。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⑦陈独秀号召中国青年要做“新青年”,“头脑中必斩尽涤绝彼老者壮者及比诸老者壮者腐败堕落诸青年之做官发财思想,精神上别构真实新鲜之新要求。”^⑧陈独秀被誉为“思想界的明星”,应该与他这种敢于向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及其思想文化进行挑战的勇气分不开。“予愿拖四十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⑨同时,也应该承认陈独秀的批判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要比同时代的思想家要全面、激烈,说明了他是当之无愧的思想先驱!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传统观念上的“民本主义”,陈独秀也进行了分析批判。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即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或者“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体现“民本”意识的主张。站在近代的立场,去审视这种“民本”思想,就会看出它的落后性。陈独秀以近代的眼光,认为儒学中的民本主义与近代意义上的民主主义是有质的区别:

夫西洋之民主主义(Democracy)乃以人民为主体,林肯所谓由民(Bypeople)而非为民(Forpeople)者,是也。所谓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所谓民为邦本,皆以君主之社稷(即君主祖遗之家产)为本位。此等仁民爱民为民之民本主义,……皆自根本上取消国民之人格,而与以人民为主体,由民主义之民主政治,绝非一物。……以古时之民本主义为现代之民主主义,是所谓蒙马以虎皮耳,换汤不换药耳^⑩。

在早期陈独秀的民主思想中,他通过对“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的赞扬,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向往,陈独秀提出了初步的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设想。他说:“民主国家,真国家也,国民之公产也,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者也。”“真国家者,牺牲个人一部分之权利,以保障全体国民之权利也。”^⑪为什么要以资产阶级民主代替封建君主制度呢?陈独秀认为:“因为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和君主专制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全然相反,一个重在平等精神,一个重在尊卑阶级,万万不能调和的。”^⑫而且,资产阶级民主可以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绝无尊卑贵贱之殊。”^⑬同时资产阶级民主还能够保障“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⑭从陈独秀早期即第一阶段,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接受、肯定与宣传来看,具有这样三个明显的特点:其一是陈独秀把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作为代替封建专制的先进制度,从反封建主义的意义上讲,这种选择具有它的进步性;其二是陈独秀的民主思想与科学思想是并重的,他说:“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⑮民主与科学并行,是社会进步的两个车轮,这种比喻不仅恰当,即使在今天也不失其进步意义;其三是陈独秀对资产阶级民主并没有进行消化吸收,而是囫圇吞枣地“拿来”,以急功近利的态度把资产阶级民主作为批判封建主义的武器,这种对待“主义”的态度在陈独秀的一生中都是如此。因此,之后的否定是抛弃——抛弃又不彻底,而不是辩证的扬弃。

二

第二个阶段。历史发展不可能走笔直的路,呈之字形或回旋式的路线十分常见。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探索也是如此。正当陈独秀沉迷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向往之中,称赞美国总统威尔逊“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⑯之时,残酷的现实却让陈独秀痛苦,在巴黎和会上,西方国家对中国排挤与侵略分赃,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本质。陈独秀的选择走进了思想的死胡同。而正好这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也传入中国。这无疑给了正在痛苦迷惘的陈独秀一个新的选择机会,在历史的新曙光面前,陈独秀很自然地就选择了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⑰由此,陈独秀改称威尔逊是“威大炮”。对威尔逊提出所谓“两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⑱产生了怀疑,陈独秀说:“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敌不过强权的时代!”^⑲“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⑳由对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的认

识,进到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怀疑,“君主国民主国,都不能够将人民的信仰、集会、言论出版,三大自由完全保住,不过做了一班政客先生们争夺政权的武器。”^④

由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怀疑到动摇,陈独秀逐步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最后是对其进行批判与否定。陈独秀指出:“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莫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现在宪法都有了,共和政体也渐渐普遍了,帝王贵族也都逃跑或是大大的让步了,财产工商业阶级要求的权利得到了手了,目的达到了,他们也居了帝王贵族的特权地位了。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的工商劳动阶级要求权利的旗帜。”^⑤在这里,陈独秀很敏锐地指出了资产阶级民主只不过是“新兴财产工商阶级”“要求权利的旗帜”,根本不是人民民主。劳动人民要获得民主,必须与资产阶级作斗争。因此,无产阶级民主成了陈独秀号召劳动人民向资产阶级战斗的旗帜!

1920年9月1日,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标志着他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决裂,并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该文中,陈独秀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原理,把资产阶级民主诠释为资产阶级专政,号召劳动人民起来,进行暴力革命,予以推翻它。他说:“我敢说,若经过阶级战争,若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利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莫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⑥自此,陈独秀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底诡计。……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底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党底意,一方面更不能代表资产阶级底意,他们往往拿全民意来反对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是非民主的,所以不行,这都是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⑦

封建主义时代只最少数人得着幸福,资本主义时代也不过次少数人得着幸福。多数人仍然被压在少数人势力底下,得不着自由与幸福的。……全国底教育、舆论、选举,都操在少数的资本家手里,表面上是共和政治,实际上是金力政治,所以共和底自由幸福多数人是没有的。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无论那国都是一样,要用他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命运。^⑧

从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否定,到对社会主义的肯定。从以上的表述来看,陈独秀的转变似乎很“彻底”。但几乎所有研究者都指出,陈独秀的转变实质上很不彻底,带有太多旧的痕迹^⑨;语言表达方式的铿锵有力,并不代表思想家本身思想的立场坚定、鲜明、彻底。首先,陈独秀对资产阶级民主并非彻底否定,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也不绝对的反对他。”^⑩反对什么,保留哪些,是不是剔除其糟粕,汲取其精华?陈独秀没有认真对待。此其一。就像他起初用资产阶级民主作为反对封建制度的武器而对资产阶级民主缺乏根本理解一样,陈独秀对社会主义同样缺乏深刻的领会。此其二。陈独秀对“主义”的把握很大程度上是仅停留于“器”的层面,这就必然导致其对所信仰的主义,表现出立场的不坚定,易动摇。“他的思想很庞杂,在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并未彻底地克服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并未系统地、完整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⑪因此,陈独秀晚年在民主思想上的“后退”,就是必然的结果。

三

选择了社会主义,“自此以后,陈独秀与欧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告别,迈开了一条艰难、漫长、曲折和痛苦的革命道路。建党、总书记、五卅、北伐、武汉时期、开除党籍、托派、监狱、贫病交加死于江津。”^⑫作为主宰陈独秀思想脉络的主线——民主思想,在陈独秀的晚年既没有“升华”,也没有“原地踏步”,在经过了政治命运的坎坷曲折,人生经历的颠沛流离后,陈独秀的思想“发生了一种后退的酝酿”,即向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内容呈“后退”式恢复。据托派重要成员王文元回忆认为:“进了南京监狱,离开了实际斗争,陈独秀的思想开始发生了一种后退的酝酿。最初是对苏联的国家性质发生疑问。他觉得当时的苏联已经

不再是工人国家,也不象托洛茨基所说的是什么堕落的工人国家,……他认为斯大林的苏联国家只能成为官僚国家,……从这个‘直觉’出发,他比较郑重地研究了民主主义的历史发展。”^⑨研究的结果是,陈独秀认为:“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以前,完成这些民主任务,乃人类进步之唯一伟大目标”,“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不要把民主主义的要求当做仅仅是推翻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统治的手段而不是我们的目的。”^⑩从这种立场出发,陈独秀“认为民主制是人类政治的极则,无论资产阶级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都不能鄙视它,厌弃它。”^⑪“应该把它当做战斗的目标”。尤其在拿资产阶级民主与“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特别是斯大林专制政治时代做了比较后,陈独秀似乎看到了资产阶级民主的“优越性”。因此,在“最后见解”中,资产阶级民主占了很重的份量。重新恢复了早期对资产阶级民主的评价和崇拜。其特点是结合了“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否定社会主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这种转变的开始,根据他在1940年9月份写给友人的信中所说:“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⑫估计是在1933年前后,也即在王文元所说的“进了南京监狱”后。

晚年陈独秀为什么会由信仰社会主义而又“后退”到早期的资产阶级民主呢?其一,是陈独秀在由激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思想转变不彻底,思想上带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气息。“他是拖着很长的资产阶级尾巴”^⑬。早在三十年代初期,蔡和森就说过,陈独秀是“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而且带着民族资产阶级的理想跑到中国共产党里面来影响工人运动。”^⑭其二,是现实的“刺激”,陈独秀晚年正是苏联处于斯大林社会主义时期,斯大林的种种暴行,利用无产阶级专政制造血案,形成恐怖局面,使陈独秀对无产阶级专政(民主)产生了一种怀疑感,进而予以否定。“现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所及的吗?此无他,贱视民主之故也。”^⑮由此,陈独秀对无产阶级民主由怀疑走到了否定。陈独秀不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去分析理论与现实问题,而是片面强调了斯大林专制政治利用无产阶级专政所造成的血腥罪恶行径这个事实,去否定无产阶级民主本身的进步性;以一个或者几个事实“个案”来推倒一个科学的理论命题,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可取。但是,陈独秀的偏执个性,决定了他在对待一个理论问题时,采取的是简单的“是”与“不是”的观点。“我不懂得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⑯就这样,陈独秀完成了他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否定之否定的认识转变。形成了陈独秀作为一个思想家特殊的民主思想轨迹。

注释:

①《实庵自传》,《陈独秀著作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6页。

②《说国家》,《陈独秀著作选》(一),第57、56页。

③《答张永言(文学一人口)》,《陈独秀著作选》(一),第181页。

④《抵抗力》,《陈独秀著作选》(一),第153页。

⑤《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陈独秀著作选》(一),第217页。

⑥《敬告青年》,《陈独秀著作选》(一),第129—135页。

⑦《文学革命论》,《陈独秀著作选》(一),第260—261页。

⑧《新青年》,《陈独秀著作选》(一),第185页。

⑨《文学革命论》,《陈独秀著作选》(一),第260—261页。

⑩《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陈独秀著作选》(一),第487页。

⑪《今日之教育方针》,《陈独秀著作选》(一),第144页。

⑫《旧思想与国体问题》,《陈独秀著作选》(一),第296页。

⑬《宪法与孔教》,《陈独秀著作选》(一),第226页。

⑭《袁世凯复活》,《陈独秀著作选》(一),第240页。

⑮《敬告青年》,《陈独秀著作选》(一),第135页。

- ⑩《〈每周评论〉发刊词》，《陈独秀著作选》（一），第427页。
- ⑪《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0页。
- ⑫《〈每周评论〉发刊词》，《陈独秀著作选》（一），第427页。
- ⑬《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陈独秀著作选》（二），第8页。
- ⑭《〈新青年〉宣言》，《陈独秀著作选》（二），第40页。
- ⑮《随感录·立宪政治与政党》，《陈独秀著作选》（二），第20页。
- ⑯《告北京劳动界》，《陈独秀著作选》（二），第49页。
- ⑰《谈政治》，《陈独秀著作选》（二），第163页。
- ⑱《随感录·民主党与共产党》，《陈独秀著作选》（二），第219页。
- ⑲《国庆纪念底价值》，《陈独秀著作选》（二），第178—179页。
- ⑳顾全芳《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民主思想》，《山西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 ㉑《随感录·民主党与共产党》，《陈独秀著作选》（二），第219页。
- ㉒李宏《一代伟人的失落》，《人民日报》1990年10月28日星期日第5版。
- ㉓《胡适陈独秀鲁迅》，李泽厚著《中国思想史论》（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929页。
- ㉔王凡西著《双山回忆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10—211页。
- ㉕《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火花》第三卷第1期，1936年3月10日。
- ㉖《给西流的信》（1940年9月），《陈独秀著作选》（三），第553页。
- ㉗林茂生等《略谈陈独秀》，《历史教学》1979年第5期。
- ㉘蔡和森《论陈独秀主义》，《布尔塞维克》第四卷第5期。
- ㉙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杨扬编《自述与印象：陈独秀》，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14页。
- ㉚《给陈其昌等的信》（1937年11月21日），《陈独秀著作选》（三），第431页。

晚年陈独秀对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探析

蚌埠市委讲师团 张雷

2002年1月25日,李锐在北京大学知识分子问题研讨会的讲话中指出:陈独秀一生是伟大的、光荣的,晚年还写文章批评斯大林的专制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专制制度创造了斯大林。他还认为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就等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加普鲁士民族性。

一

1937年8月,陈独秀结束五年的牢狱生活,投入抗战政治热潮。他衷心地拥护国共合作抗日,显示了民族至上,共御外侮的爱国立场。但是,陈独秀既不见容于国共两大武装政治集团,也不见容于中国托派极左小集团。1938年7月,蒙受王明、康生等人强加“汉奸”、“间谍”屈辱的陈独秀,不得不拖着贫病之躯,离开抗战政治中心武汉,来到重庆,又几经辗转,最后躲到江津,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

1939年,因老病多难,不断搬迁,陈独秀约有十个月没有动笔为文。但是,他的思索可以说一刻也没有停顿,而是更加深邃了。同年底,陈独秀定居在江津城外二十里远的鹤山坪石墙院杨氏山庄,直到1942年5月27日与世长辞。在最后的两年多的岁月里,陈独秀虽被摒除于政治中心之外,却以其清醒的思考,密切关注国际国内形势,关注上海托派临委的动向,尤其关注“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从1934年开始的持续多年对“反对派”的大清洗大屠杀暴行。苏联大批政要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以及原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立宪民主党人、民粹派分子等,都被肉体消灭。被杀人数,有说几十万人,有说数百万人,有说两千万人,究竟多少,至今是一个谜。1940年,逃亡国外的托洛茨基也被苏联秘密警察机关派人用利镐砍死。这样的历史惨剧,怎能不让陈独秀对于民主和专政问题进行思考并作出合理的解析呢?陈独秀郑重而严肃地说:“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陈独秀最后的论文和书信》,1948年印行。以下引文除注明出处者外,均引自此书,不再一一注明)所谓思虑六七年,可上溯至1934——1935年间。那时身系南京狱中的陈独秀曾经对难友濮清泉说,现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所及吗?此无它,贱视民主之过也。又说,资产阶级政权,是少数统治多数,他们能允许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不怕垮台;而无产阶级政权是多数统治少数,竟怕这怕那,强调一党专政,不允许言论自由,焉有是理?六七年后的1940年,苏联已与希特勒签订苏德条约,并出兵与德国瓜分波兰。陈独秀盛怒之下,写《告少年》诗:“旁行越邻国,势若吞舟鲸,食人及其类,勋旧一朝烹。”指斥这些行径为古代传说中的食人厉鬼伯强。

陈独秀晚年思索的结晶,集中于1940年初至1942年5月他逝世前所写十几篇文章和书信,被胡适称之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广为流布。正如陈独秀早已宣告的那样:“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1937年11月21日致陈其昌信)

二

陈独秀在“最后见解”中,对他往日曾经信仰的理论重新加以审视,作出新的判断。陈独秀对民主和专政理论的阐释,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民主主义是自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

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的旗帜”。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

(二)“‘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如果说无级民主与资级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内容……无级和资级是一样的。只是实施范围有广狭而已”。

(三)“十月(革命)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起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有国有大工业、军队、警察、法院、苏维埃选举法，这些利器在手，足够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用不着拿独裁来代替民主，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别天便会用之杀自己。列宁当时也曾经警觉到‘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而亦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许反对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自由等，TL(指托洛茨基——引者)直至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他自己，才想到党、工会和各级苏维埃要民主，要选举自由，然而太晚了！”

(四)“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政党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五)“应该毫无成见的领悟苏俄二十余年来的教训，科学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不能一切归罪于史大林，例如无产阶级政权之下的民主制问题”。“如果说史大林的罪恶与无产阶级独裁制无关，即是说史大林的罪恶非由于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制度之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自史大林)，而是由于史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我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已经耗竭之时，不必为民主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

陈独秀的饶论，可谓语惊四海，引起轩然大波。陈独秀曾说：“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致陈其昌信，1937年11月21日)当时和后来的评论者，对于陈独秀的上述言论，或誉或毁，都自有道理。平心而论，除了他毫无区别的把苏联与德、意法西斯相提并论一概否定之外，他的其他见解都是不应忽视的。

三

从陈独秀早年的活动来讲，最重要的就是提倡自由、民主和科学精神，反对自古以来的封建专制主义。他于1915年创办《新青年》(第一卷名《青年杂志》)，发刊词“敬告青年”的宗旨一共有六条：一、自主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六条从民主、科学、实事求是，直到我们现在提倡的改革开放、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本性要求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等，无不包含在内。

陈独秀早年倡导民主和科学，成为一代思想家，历经康有为党、孙中山党而至共产党，身历辛亥、反袁、五四运动、国民革命，冲入政治斗争旋涡而不能自拔，复受制于共产国际，被逐出共产党。晚年重归“五四”，重拾自我，最后觉悟到民主政治原则的普适性。陈独秀对民主政治的思索是依据现实的体验和感悟，他虽然提出了同列宁主义国家学说不同的一些见解，但未脱离辩证唯物史观思路。陈独秀这些见解，既是针对

以苏俄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针对当时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后来刊布这些言论的胡适说它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稀有重要文献。”说陈氏的这些“独立思想”,“实在是他的大觉大悟的见解。”(胡适:《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序言》,广州自由中国出版社,1949年6月版)

陈独秀六十年前并非完备的民主政治观,已有论者指出其片面性和不足,诸如:民主政治固然应当照顾多数,但也应当尊重少数;权力必须相互制约;统治必须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没有任何个人或集团可以居于法律、宪法之上;原告不能做审判官;民主的普适性应当肯定,但同时应看到,民主又确实存在新旧之分、“资”“无”之分,等等。

资本主义政治需要民主,社会主义政治尤其需要民主。民主政治原则的普适性将长久留存,其承载形式和实现步骤在不同国家自应有其不同的特点,既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现实条件,也受其传统文化因素的制约。然而若以不能即刻实行民主政治,使用种种借口拒民主政治于千里之外,那总有一天这个国家的极权制度真的成为腐败者的乐园,它终将被排除在世界先进民族行列之外了。

陈独秀晚年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想

安庆市陈独秀学术研究会 钱让能

陈独秀的一生,是执著追求进化、科学、民主、爱国和社会主义的一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奠基者、民主与科学的首倡者。他无论是身陷囹圄,与恶魔苦斗,还是坎坷多蹇、一贫如洗,都从未停止为民主而斗争。特别是他晚年深思熟虑后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想,放射出奇异光彩,曲终奏雅,堪称绝唱。

一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核心。在陈独秀心目中,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没有民主,就没有共产党;破坏民主,社会主义、共产党必然走向反面。不能包容民主的社会主义,不管它如何响亮宣称自己是怎么样的社会主义,那只不过是欺世盗名,假冒伪劣的而已。他拥护前期苏联,痛惜后期苏联。他说:“十月革命是全俄绝大多数人民集合在共产党‘解放劳动者’、‘解放农民’、‘解放小民族’三大旗帜之下成功的。革命胜利后,三样都一一实现了,并非俄国共产党的空头支票;并且对国外把帝俄时代对被压迫国家的不平等条约宣布废除了。把它在被压迫国家的特殊权利,如租界、领事裁判权等一一宣告放弃了。所以当时全世界劳动人民、全世界被压迫民族,都看着莫斯科是全世界被压迫者的灯塔,是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参谋部。”然而,苏俄领导在夺取政权后中途变节,把前期苏联站在世界革命立场,转变成站在俄国民族利益的立场。把以世界革命为中心的政策,转变成以俄国民族利益为中心的政策。更为突出和更加糟糕的是:轻率地把民主制放弃,以独裁代替民主。陈独秀在《给西流的信》中表述:“苏维埃或国会均由政府党指定。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辩。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杀人。一国一党不容许别党存在。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绝对不许罢工,罢工即是犯罪等……”^①他简明扼要叙述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是:“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之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这都是大众所需要,也是十三世纪以来大众以鲜血斗争七百余年来,才得到今天的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在他看来,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接着他又指出:“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是实施的范围广狭不同,并不是在内容上另有一套无产阶级的民主。十月以来拿无产阶级的民主这一空洞抽象名词做武器,来打毁资产阶级的实际民主,才至有今天的史大林统治的苏联……”^②“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不可分离的;无产阶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斯大林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③

然而,陈独秀的民主观并未停止在这一个层面上,他非常清晰地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虽曾在历史上发挥过进步作用,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他所追求的,就是以无产阶级最广泛的民主制,取代资产阶级民主制。他说:“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并不是抛弃民主主义,而是扩大民主主义,以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来代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即是从资产阶级的狭小范围扩大到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民众,从量改变到质,从议会到苏维埃,并且还要从大多数人民政治继续扩大到全体人民政治”的目标。^④

二

民主制是专制独裁的天敌。陈独秀一贯对专制独裁疾恶如仇。他认为专制独裁既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也是人类之公敌。他深切体验,几千年来,专制主义一直就是中国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建构的基石,民间微弱的民主思想,常常在专制主义四面围堵和无情打压中趋于沉寂。在中国专制主义似乎具有与时俱进的旺盛生命力,无论朝代如何更替,专制主义总能通过不断披挂新的现代“政治外衣”而常变常新。秉承专制主义衣钵的方丈在变,而衣钵总是代代相传,不少人在装扮新的专制主义面前,丧失了基本辨别能力,转而为新的专制主义辩护。

历史充分证明,一旦抛弃和打倒“科学与民主”,专制主义就会借尸还魂、泛滥成灾。所以陈独秀晚年义无反顾地、以彻底地历史唯物主义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斯大林权势如日中天,人们对这位被神化了的庞然大物,不敢有半句不敬之词,而他却不理这一套,只认真理,不畏权势。根据苏俄二十年的经验,特别是后十年的苦经验,深思熟虑六七年,将斯大林现象,像一具尸体标本那样,摆在桌子上进行了无情剖析。独树一帜,形成了他系统的、独创的民主思想。这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独一无二的民主观创造性地发展。他认定斯大林现象的核心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制问题。他说:“我们应该毫无成见的估计布尔雪维克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不能一切归罪于史大林。”“如果说史大林的罪恶与无产阶级独裁制无关,即是说,史大林罪恶非由于十月以来苏联制度之违反民主制之基本内容(这些违反民主制度都非创自史大林),而是史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展。试问史大林的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藉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所以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史大林,而不推源于独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史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若不从制度寻出缺点,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⑤他进一步指出:“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列宁也曾警觉到‘民主是官僚制的抗毒素’而未曾采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许反对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自由等,直至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自己,才想到党、工会和各级苏俄埃要民主,要选举自由,然而太晚了!”由起先的阶级恐怖,到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性的恐怖,专政的矛头直指党、政、军各级各部门,仅苏共十七大选举的139名中央委员中,被逮捕处决的就有98人,占70%以上,1966名党代表,就有1108人被害,不经法庭审讯、调查,就处以死刑。军队的将领,政府要员,各级各部门领导骨干,以至广大工农兵群众、专家、学者等被无辜杀害的不计其数,血雨腥风,惨绝人寰。

恩格斯有句名言: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性的思维。陈独秀全方位、多视角,重新审视历史,毫不回避涉及到列宁问题,从理性思维中把利刃直插困扰民主发展的中枢神经,其深邃的眼力,昭示着未来。上个世纪苏联、东欧巨变,中国五十年代的所谓“两把刀子不能丢”导致反右、大跃进、文革灾难性的后果,不得不令人叹服,他的预言,是绝妙的写真。

三

关于社会民主与党内民主问题。陈独秀在任党的一至五届总书记期间,虽受共产国际专断干预,但他总是把党内民主视为党的生命,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因此,这一时期,民主最为充分广泛,政治生活最为生动活泼。同时他把社会民主即实现大众民主,作为毕生奋斗的天职。他一方面号召每个党员要做政治民主的自觉战士,在权势面前决不做“随声附和的奴才”、“看鞭影行止的牛马”、“纯粹的雇用劳动”等,另一方面他反对“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在他主持中央工作时,为了幼年的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同国民党反动独裁进行了坚决斗争,即使在敌人监狱里,也未曾停止这种斗争,很明显,如果不冲破“党外无党”的禁区,

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永远都是不合法的，国民党的“清共”、“剿共”都变成合法的了。对“党内无派”问题。陈独秀也是极力反对。他历来主张党内应该允许不同意见的争论，认为这是实行德谟克拉西所必需，如果党内不允许不同意见发表和争论，一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就以反对派的名义打击之，这不但助长了党内个人专断和独裁，而且也会丧失政党最基本的生存活力。在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如同接力赛似的一个接一个的“左”上加“左”，给党造成了严重损失。每当左倾盲动主义将要形成之时，陈独秀就敏锐的发觉，并及时善意提出批评和中肯意见与建议，可惜他的观点，不被当权者所采纳。他除了承受大革命失败的打击，忍受延年、乔年在内的大批革命领导骨干被屠杀的苦痛，但仍以一片丹心，剖白于天下，在被开除出党的前夕，曾连续致信中共中央表示：“如果你们老是固执你们的偏狭，而不顾及党内德谟克拉西的重要性，而畏不同意见如蛇蝎，而企图用中央威权霸蛮的造成你们的意见的一致，对于不同意见，不管他们的内容如何，便简单的用“小资产阶级观念”、“非无产阶级意识”、“观念不正确”如此等类没有内容的抽象名词来排斥他；更或者给他戴上一顶帽子，如“反对派”、“托洛斯基派”、“某某派”等镇压住他，且以暗示一般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免开尊口，这便是有意的或无意的阻住了党的进步。”^⑥在他看来，没有反对党的存在，没有反对派的自由，民主不过是空谈。

据此笔者认为：执政党除应建立和健全党内民主制，并广泛实行，应把社会民主即国家民主放在头等重要位置之上。因为社会民主天然高于党内民主，不单如此，没有社会民主即国家的民主，能否有党内民主，还得打个问号，从现代政治学理上讲，民主概念是国家政体的事，必须有一整套的社会机制。说什么在某个党团内，不依靠宪法保障就形成民主，那就等于说把党建优于国家宪政，叫滑了大稽；再把民主说成是党的作风、传统，说成听命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更是无稽之谈，而且也太糟蹋德谟克拉西了。寄希望于党内民主的恢复，认为党建设好了，便可以带动全社会的民主进程，这种舍本求末的天真糊涂，自文革以来，一直弥漫着。许多人对党内民主还充满希望。然而遗憾的是，却——成为泡影。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党要永葆青春，就得对以往的经验教训既要哀之，又得鉴之。哀什么、鉴什么？中心是党内民主。在历史上除陈独秀、张闻天、胡耀邦主政外，民主往往是受集中支配的。如不改变民主处于从属地位，集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状况，是不可能有什么党内民主的。所以首要的只能是施行国家的民主。这是人民的期望，时代的呼唤，历史的必然。

四

有关民主几个问题的思考。

(1)民主制是好的，但也不是十全十美的。比如：民主使一些在非民主条件下很简单的事，变得复杂和繁琐，从而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民主需要协商讨论，常常会使一些本来应当及时做出的决定，变得久拖不决，从而降低行政效率；民主有时还可能破坏法制，导致社会秩序的一时失控，在一定时期内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增长，也还有可能造成国内政治分裂；民主的程序也可能把少数专制独裁者送上政治舞台。所有这些都已经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出现过，并且还可能不断再现。然而，从根本上说，这不是民主本身问题，而是政治家或政客的过错。如一些政治家，不顾社会历史条件，不按客观规律，不切实际推行民主，结果适得其反。一些政客则把民主当作其夺取权力的工具，以“民主”的名义，哗众取宠，欺骗人民，在他们那里，民主是名，独裁是实；民主是幌子，权力是实质。

政治民主是历史潮流，不断走向民主是世界各国的必然趋势。但是推行民主，决不可强制。因为民主最实质意义，就是人民的统治。民主必须尊重人民的意愿，由人民进行选择。任何人任何政治组织都无权以民主的化身自居，在以民主的名义下，强迫人民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更为重要的是民主需要启蒙。法治、权威来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同时还需要包括暴力来保护多数民众合法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但是，推行民主的基本手段，不应当是国家的强制。从国内政治层面而言，如果政府用强制手段，让人民接受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制度，那就是国内政治专制，是国内的暴政；如果一个国家用强制手段，让其他国家的人民接受自己的所谓“民主”制度，那就是国际的政治专制，是国际的暴政。无论是国内专制还是国际专制，都是与民主

本质背道而驰的。

(2)推行民主要根据实际循序渐进。专制主义所以能在中国大地上香火不绝,是中国社会臣民多,而公民少,游离的知识分子多,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少。但是,问题总根子在于几千年传承的愚民和顺民教育,国人从孩童初识汉字时起,就被掐灭了自尊自强自主的意识,被要求服从种种强制力。纵观世界各国,凡是国家普遍的道德进步,都是文化传统良性运行的结果。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皇权专制主义。一个连领导人都显而易见种种愚蠢和偏执或者虚美有加,或者唯唯诺诺,或者讳莫如深的社会,一个领导人需要社会把他当成几无自省能力的小孩哄骗的国家,怎么能产生出道德高尚、智力活跃的人民!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救治专制主义唯一出路,就得在新形势下进行新的启蒙,要彻底摆脱专制阴影,就必须致力于培育新人。凡是志在启蒙的,就要像陈独秀、像托尔斯泰等那样,躬身写作给大众阅读或者听懂的小册子——学术框架是科学的,问题是社会的,价值是普世的,语言是大众的,这样做,不仅需要学识,更重要的是道德和责任,以及坚持不懈、长期奋斗的革命精神。在中国从集权政治转变到民主政治,只要把握住:不出乱子,不变成一盘散沙,胆子就应大点,步伐就应加快点。但不管如何,特别要做好基础性的工作,从娃娃抓起,中小学要设立公民课,要开展普法宣传,让公民都能清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并能身体力行。其次从基层抓起,要有计划地、逐步地、由点到面地把乡(镇)、县(市)、省的官员,由上头任免制,改为由公民选举制;不仅仅基层如此,更重要的是国家最高的管理机构的选举,也得有步骤从间接选举走向直接选举,让各级政府的权力得以有效监督,让人民真正享受民主政治的甜蜜果实。

3、现代化的标志是民主化,民主主义者必须要以自由为出发点。中国近三十年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得益于改革开放,得益于经济融入全球化,得益于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人未曾料到,许多外国人也未曾料到。充分说明,未来中国,大有希望,现代化并非可望而不可及。另一方面证实,中国老百姓的确是世界上最善良、最纯朴、最听话、最实际、最能发挥创造性,只要措施得当,引导正确,他们在民主化进程中,也同样能大有作为,一定会探索出中国式的民主道路来。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中,作为世界最大的民族汉族、作为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不仅要在经济上继续加速全球化进程,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全球化,只要在政治民主化上赶上去,既可避免其他国家的疑虑,又能博得许多国家的尊重和爱戴。如果只有经济全球化,而没有政治全球化,那就残缺不全,同样会遭到其他国家的厌恶和恐惧。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现代化是世界性的社会历史进程,是传统农业社会和专制制度转化为现代工业和民主制度的综合性过程和目标,包括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人的素质现代化等等。社会主义的具体形态,只有顺应现代化,社会主义才能走向成功。

就民主而言,特别要把它同自由联系起来加以思考。这是因为民主的价值,归根到底是要体现人的价值,所以民主主义者必须要以自由为出发点。自由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类共同宿求,是每个人终身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在人类认为有价值的各种价值中,自由是最有价值的一种价值,而且是最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共产主义的本质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争取人类的自由解放,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核心价值部分。一百五十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所宣告的理想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所以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和基本社会形态是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我相信,《共产党宣言》所宣告的理想社会,我国一定会实现,并为世界造福增光。

注释:

①《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 557 页

②《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 547 页

③《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 560 页

④《陈独秀语萃》260 页

⑤《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 554、555、560 页

⑥《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 554 页

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是对中国行向社会主义途径的探索

中共中央党校 佟英明

什么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

胡乔木吸取中共历史上批判陈独秀右倾错误的一些说法，加以综合概论，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中作了完整的表述。他的表述是：

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批评了党内的两种主要错误倾向。“一种倾向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倾向。他们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他们根本就没有企图由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来领导这个革命，使这个革命在胜利以后，首先就有利于无产阶级，并以无产阶级为中坚力量来掌握政权，用这个政权来保障国家在以后的发展中走上社会主义的前途。他们认为第一次革命应该让资产阶级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无产阶级只能得着一些资产阶级共和国中的‘自由与权利’，不能得着别的什么。所以他们认为在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只能站在消极的帮助地位，而不能站在领导地位。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只有等资产阶级共和国成立，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后，再来推翻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次革命。所以他们的主张被称为‘二次革命论’。”^①

所谓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是共产国际、斯大林及中共中央对1924—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作出的结论。

1924—1927年上半年，在国共合作下，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帮助下，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取得很大胜利，几乎解放了半个中国。正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的同盟者中国国民党中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代表的两个掌握政权、军权的集团相继背弃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向坚决反帝反封建的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的工农分子采取血腥的镇压政策，蒋介石高呼“清党”胜利，而共产党则遭到一次惨败。这是血的教训。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共中央本应共同地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再战。

可是，共产国际、斯大林及听命于他们的中共中央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总是把政策正确及功劳归诸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而把错误及失败的责任完全诿过陈独秀。他们认为这次大革命所以失败，从主观上来说，是因为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没有执行共产国际、斯大林的正确指示，犯了不争领导权、不要政权、不重视农民问题、不重视掌握武装力量等“右倾机会主义”或“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们认为犯这种错误的理论基础，则是所谓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其内容就是本文开头引用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所表述的。

这是给陈独秀担任中共主要领导人期间所犯错误的结论性说法，或者叫给他带的一顶帽子。这是1927年—1928年作的结论。这虽然是历史问题，已过去七、八十年了。但在某些中共党史的著作中还坚持这种传统说法。2002年，人民出版社以“新世纪学术文丛”的名义出版一本研究陈独秀的专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两本书对陈独秀的历史作用讲了不少好的见解。但在这个问题上仍持传统的说法。前者说：陈独秀从“二次革命论”出发，“从右的方面执行国际路线，结果使这场革命遭受了惨痛失败。”因此，“这个理论并没有起到多少进步作用。”^②后者说：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陈独秀在理论上犯了“二次革命论”错误，到1926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没有解决党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反而指引了错误的方向，”使党内的右倾错误逐步发展成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③

由此观之，对于所谓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应根据新公布的档案史料再作些分析，得出比较符合或

接近历史真相的说法,说点公道话,似有必要。本文仅从“二次革命论”的由来、历史条件及其与共产国际指导政策关系的角度作些历史演进过程的考察,从历史考案中作点评说,就教于同行,共同研讨。

一、陈独秀把中国革命区分为“两段路程”思想是党制定最低、最高纲领的先导

1920年,陈独秀由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又看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经验,就经常思考着中国革命该怎么办的问题。他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可是,“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趋于崩坏了,”“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俄罗斯正是这种方法最大的最新的试验场。”因此在中国“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在中国怎样进行新的试验?陈独秀认为:“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基于这一思想认识,陈独秀说:“一切生产工具都归劳动者所有,一切权都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④这是陈独秀1920年11月7日为《共产党》月刊创刊号写的《短言》中说的。

这一“信条”,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来说,无疑是应有的无出其右的崇高理想;如果没有或者丧失了这样信条,就不成为共产党人了。

陈独秀虽然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但他所讲的“信条”思想观点却反映在党的一大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之中。这个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它规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英文稿此句为“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的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第三国际;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⑤

这个纲领是带有“空想”性质。在中国,革命的现实任务,是首先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而不是立即实行消灭资本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党的一大没有把这一点规定在纲领之中。

陈独秀很快地认识到这个缺点。1922年6月,他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很鲜明称之为《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首次提出中国革命要区分为两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阶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这是对党的一大纲领所作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补充和修正,它第一次把中国革命分为性质不同的“两段路程”即“两步”,表明陈独秀的认识贴近了中国国情。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他提出了当前的主张:“只有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这才是目前扶危定乱的唯一方法。”^⑥6月15日,陈独秀为中共中央起草并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团体开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来进行。该文件还郑重地声明:“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但是在无产阶级未获得[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⑦该文件在7月中共二大通过之后,曾送交孙中山的国民党中央,表示建立(党外)联合战线的愿望。^⑧

1922年7月,中共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由陈独秀主持,并代表中央局向大会作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是由陈独秀起草初稿,经过他和张国焘、蔡和森组成的起草委员会讨论修改后交给大会通过的。这个宣言在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中国社会性质及阶级状况的基础上,提出中国革命需要分两步走和党的奋斗目标。宣言规定党的目前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实际上是制定出党在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即党的最低纲领。这是第一步。在走第一步

路程时,宣言打的是共产党旗帜,号召工人和贫农快速聚集起来在这面旗帜下奋斗,并号召中国全体被压迫的民众一齐来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下的工人和贫农共同奋斗。与此同时,宣言又旗帜鲜明指出中国共产党还有第二步奋斗目标,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⑨这是规定了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即党的最高纲领。

至于第一步和第二步之间的关系,宣言也有其说法:“第一步,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中国工人运动“发展无已的结果,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在第一步奋斗中,“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即刻成功的。”^⑩

应当肯定地说,陈独秀“两段路程”的认识,被中共中央所接受,成为党中央的共识。他和党的二大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在认识上是一个飞跃,对于指导中国革命具有重大意义。此后陈独秀在中共三大的闭幕词中对此给予了很高评价:“党在第一次代表大会时还没有纲领,甚至没有规章,党的要求——无产阶级专政——悬在半空,到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就脚踏实地了,有了规章,找到了与中国实际的联系并决定了党要走的道路。”^⑪陈独秀这样的评说是客观的。尤其是“找到了与中国实际的联系,”这个评价,十分中肯,具有思想方法论的意义。

我们从上述的史实来看陈独秀的“二次革命”的形成过程,有理由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是把马克思主义革命原理及俄国革命经验同中国国情的初步结合而形成的理论成果。几年后,1927年2月,瞿秋白指出:“革命的理论永远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五四运动后,《新青年》、《星期评论》等杂志,连篇累牍地介绍马克思的理论。在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中,“只有陈独秀同志在革命的实践方面,密切的与群众的社会运动相联结,秋白等追随其后,得在日常斗争中间,力求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所谓国情。”^⑫

第二,陈独秀把整个中国革命的斗争区别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段路程”,应当分开两步走,先搞民主革命成功,准备条件,再搞社会主义革命。有了这样认识,党制定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才有了前提条件或客观依据。这对于开展革命斗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从陈独秀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最初曾一度有过像俄国一样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试验”的想法,这时,他把中国革命分为两步走,在认识上自我否定。从而同“一次革命论”划清了界限。

总起来看,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尽管有其难免的局限,甚至机械式搬用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的观点,但首先应肯定它是对中国革命行向社会主义途径的极有价值的探索。

二、共产国际强力推行党内合作的形式,陈独秀两次革命思想的论述

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对于同孙中山的国民党的合作,主张党外合作。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则极力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采取这种党内合作形式,实现国共合作。他的主要理由是:

第一,中国在一个很长时期内,只能有一个民主的民族革命,决不能有社会主义的革命;而且现在无产阶级的力量和所能起的作用,都还很小。

第二,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是中国现在一个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党,不能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

第三,孙中山先生可以而且只能容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决不会与中共建立一个平行的联合战线。

第四,中共必须学习西欧工会运动中,共产国际所推行的各国共产党员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的联合战线的经验;中共须尊重共产国际的意向。

第五,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⑬

这是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讲的,其意大致可靠。陈独秀也有类似的说法。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说:“青年团国际代表达林来中国,向国民党提出民主革命派联合战线政策。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

严词拒绝了,他只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④

对于这种党内合作形式,陈独秀等一开始就不赞成。1922年4月6日陈独秀专为此事写信给另一位国际代表威经斯基,申诉反对党内合作的主要理由是:“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国民党联美、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国民党孙中山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等。并说:“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⑤

包惠僧在《回忆马林》中说:张太雷到上海后,他奔走于马林与陈独秀之间。“有一天我去陈独秀处,正遇见陈独秀与张太雷谈话,张太雷正在以马林的口气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由发生到发展,由成长到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中国不能例外。’陈独秀把桌子一拍说:‘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作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⑥

共产国际根本不听取陈独秀的合理意见,而采纳了马林的主张。继1922年8月指示之后,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又专门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说:“中国唯一重大的国民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一方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一方面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同时又认为:“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且软弱”;“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国民革命”;“由于这个国民革命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基于上述的理由,“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并要求中共既要自己的旗帜下独立行动,又要“避免同国民革命运动发生冲突。”^⑦中共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对于决议只能贯彻执行。

为了贯彻共产国际1月12日的决议,1923年6月中共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大会。这次大会正式决定采取全体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并认为这是当时能够为孙中山和国民党所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即使到这时,对于党内合作方式,仍有相当多的代表持反对的态度。陈独秀根据共产国际决议所起草的有关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仅以5票的优势(21票赞成,16票反对)为大会所通过。^⑧这一情况,陈独秀在中共三大的报告中有意作了说明。他说:“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者,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⑨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有了什么样的重大改变呢?

《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认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在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后,“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民主革命之需要”^⑩。

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明确指出中国国民党常有两个错误的观念:(一)总是希望帝国主义的列强援助中国国民革命,这种求救于敌的办法,是引导国民依赖外力,减杀国民独立自信精神;(二)集中全力于军事行动,忽视了对于民众的政治宣传。《宣言》说:“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由于存在这样两个错误观念,“中国国民党不但会失去政治上领袖的地位,而且一个国民革命党不得全国民众的同情,是永远不能单靠军事行动可以成功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希望中国国民党“断然抛弃”这“两个观念”,“以造成国民革命之真正中心势力,以树立国民革命之真正领袖地位。”^⑪

为什么提出这样希望呢?因为中共党员加入了国民党,成为国民党的一员,实现国民党内合作形式的国共合作,是友党的忠言。

上述事实说明,这次国共合作采取国民党内合作形式,首先是共产国际和孙中山的国民党达成一致,并由共产国际强令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来执行的结果。以后,并动员工人和农民加入国民党,使它成为有群众基础的政党。这样,共产国际、斯大林就认为中国国民党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四个革命阶级联盟性的政党。力图把它改造成成为工农党或人民党。共产国际和苏联就从政治上、军事物质和财力上大力支援国民党,并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左派国民党旗帜下来进行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一直到南昌起义,斯大林还让举左派国民党旗帜,到了1927年9月才下指示放弃的。192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斯大林的指示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决定“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②

在中共三大召开的前夕或在其后不久,陈独秀在《向导》和《前锋》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1923年4月25日发表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另一篇是1923年12月1日发表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后来,人们脱离党内合作形式这一历史条件,脱离共产国际的决议,片面地孤立地从这两篇文章中摘引了一些说法,作为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及其“二次革命论”错误的“罪证”,大加讨伐。

现在,我们看一看陈独秀到底是怎么说的。

陈独秀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对中国资产阶级作了具体分析,把它区分为三部分:(一)是革命的资产阶级;(二)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也叫官僚资产阶级);(三)是非革命的资产阶级(小工商业家)。基于这样认识,他指出国民党应采取不同政策,对革命的资产阶级应该“容纳”;“应该提携中立的小资产阶级,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路”;对官僚资产阶级万不可同它“妥协”。同时指出还有一条活路,“就是与革命的无产阶级携手,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至于无产阶级,文章说:“明明知道此种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所以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必由之路。”^③当时历史条件下,确是如此,在军阀统治的区域,共产党不能合法存在,只能秘密活动。而在国民党掌握政权的广东才有一定公开活动的自由。中共三大就是在广州召开的。

文章在作上述分析之后,指出:“总括起来说,……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可是要想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完全实现,在革命运动中,中国国民党必须做到“反抗帝国主义”及“联络无产阶级”这两个原则。^④

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首先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既不是单纯反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也不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这样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陈独秀作这样区分是对的。

文章指出:“中国社会各阶级都处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两层严重的压迫之下,而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是目前的需要,而且可能。”文章预计:“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定。一九一七年俄罗斯革命就是一个好例。……但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因为“不首先解除列强及军阀之重重奴辱,别的话都无从说起!”我们必须明白“产业幼稚文化落后的中国,目前也只有这各阶级群起的国民革命是可能的。若是贪图超过可能的空想,实际上不能使革命的行动丰富起来,以应目前的需要,不但在本国的革命事业上是怠工,而且阻碍了世界革命之机运。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国民革命,形式上虽是一国的革命,事实上是世界的革命之一部分,而且是重大的一部分。”因此,“万不可轻视了国民革命的重大意义。”^⑤

从上述材料来看,可以看出是在党内合作形式下写的,其主要观点可以概述几点:

第一,认为中国的国民革命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既不是英法那种只是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是像俄国那样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第二,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区分为革命的、非革命的 and 反革命的三部分。指明中国国民党应采取不同政策:应该“容纳革命的资产阶级”;“提携中立的小资产阶级,引导他们上革命的道路”;万不可和反革命的官僚资产阶级妥协。同时指出要与“革命的无产阶级携手,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

第三,指明“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

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第四,认为中国的国民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部分。

第五,指出目前只有干国民革命是可能的,如果想要超过这种可能,就是“空想”。

第六,预计国民革命成功后,一般情形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如果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努力大,又有特殊的环境,“工人阶级在彼时可能获得若干政权”。这是依据俄国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经验作出的预计。

我认为陈独秀两篇著作的阐述的这些基本观点,是有见地的。其深刻之处在于:进一步深化和展开了他的“两段路程”的认识,紧紧扣住中国革命“特殊形式”这个特质,区分中国资产阶级的不同部分,并由此提出革命党的政策和策略;尤其是既肯定中国的国民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部分,又指出中国目前只有中国国民革命的可能,而不能“超过可能”。毛泽东后来阐述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一些重要的基本思想,其实陈独秀的这两篇文章都已闪现出思想的火花甚至是光焰。至于有人把其中某些论点孤立地摘出来,作为他犯了所谓“二次革命论”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根据,是难以服人的。在党内合作的形式下,作为国民党员的共产党员要去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独掌政权,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实在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初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政治经验、策略手段匮乏,而且现实力量和动员能力薄弱。在实际生活中,如果真要同国民党争权,又同党内合作形式的要求相矛盾。陈独秀认为国民革命胜利后,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恐怕既是源于对俄国二月革命的直观理解,也反映出当时中国革命力量格局下的一种心理上的无奈。这种人的思想认识过程中的复杂情形,很难同有系统的自觉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相提并论。因此,陈独秀某些论点有其历史局限性是可以理解的。

三、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首次从“左”的角度不点名地批评陈独秀为代表的“二次革命”的思想

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第七次扩大全会。全会的中心议题是中国问题。中国问题的中心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及走向社会主义前途问题。斯大林在全会上作报告,题目就是《论中国革命前途》。布哈林在发言中也是首先谈中国革命的“前景问题”。他说:“我首先谈一下前景问题。我认为,中国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和扩大全会的参加者都持这样的观点,即我们在中国应当采取社会主义发展的方针。”^②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共代表谭平山,还有国民党蒋介石的代表邵力子。

根据斯大林的报告和布哈林的发言所讲的精神,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案的中心内容即是围绕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而展开的,诸如争夺领导权问题,立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重视掌握武装和参加政权问题等,由此格外看重起来。决议案强调指出:“虽然中国革命发展之现在阶段,从历史上说,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但是他必然要带着广泛的社会运动的性质。中国革命的结果,不一定造成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国的革命的进程,是在资本主义衰落的时代,是消灭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总斗争之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决定要用全力去实现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之革命的前途。”因此,决议案认为,“中国革命的目前任务,仅限于(一)推翻帝国主义,(二)消灭封建残余,这是错误的。”如果“中国革命若不超出资产阶级民权范围之外”,是“不能推翻帝国主义的。”^③

这种批评,是针对陈独秀的一些说法而发的。

当时,帝国主义者和北洋军阀及国民党右派制造反赤运动,什么广州国民政府是赤色政权,什么共产共妻等谬论满天飞,打击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

1926年9月,当国民革命军胜利进军到长江流域时,积极支持北洋军阀政府的研究系在上海办的机关报《时事新报》发表时论,挑拨国共联合战线内部关系,说国民革命成功必然发生两个问题:“(一)信仰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党,将与国民党左派争政权;”(二)赤俄必定帮助列宁党战胜国民党左派,将中国设为他的赤塔共和国来主持中国的一切事。”^④

陈独秀针对反赤运动及这篇时论发表了《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一文进行批驳。文章指出:“至于国民革命成功,共产党便要与国民党左派争政权,这也是不会有的事。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

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文章还郑重地表示:“我们敢说:在国民革命的争斗中,中国共产党是不会有向左超过民主主义的倾向的”;“我们还敢说:即国民革命成功后之建设时期,也必然是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还不是工农政府;在那时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之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也只有到那时,真正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不过那时的中国资本主义,已是经过国民革命的洗礼,已经是民族的民主的资本主义”,而不是研究系这类人所要的资本主义^⑧。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民革命成功后,还需要发展资本主义问题,共产国际、斯大林从“左”的角度来批判,认为这是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内容之一。

关于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问题,陈独秀在《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一文中是怎么讲的呢?归纳起来,他讲了三个极为重要的理论观点:第一,他讲“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需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之后,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第二,在中国发展的是什么样的资本主义?他讲既不是列强在中国办的那样资本主义,也不是官僚办的那种资本主义,而是经过国民革命洗礼并在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之下的“民族的民主的资本主义”。第三,所以需要发展这种资本主义,是为了下一阶段搞社会主义预备有力的基础。

历史发展证明,在中国革命的进程、性质和前途的问题上,真正发生了错误偏向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他们强调现实的中国革命要“超出资产阶级民权范围”,已露“左”倾错误的端倪,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急性病表现之一。不久以后,这种急性病导致了中国共产党战略和策略上的失误。而陈独秀这种有条件限制地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观点,是为了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创造条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深邃之见,决不是具有急于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左”倾思想的人们所说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更不应成为“二次革命论”的罪证。

真理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陈独秀这种理论观点是1926年讲的。过了20年,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口头政治报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也有类似的理论观点,他强调指出:除了“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外,我们要广泛地发展中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这“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的思想。……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毛泽东又说:“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是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因此,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⑨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关于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论述,几乎是二十年前陈独秀文章的翻版。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毛泽东所说比陈独秀较透彻、较明确、较具针对性。有些人的态度令人不解,他们批判陈独秀的理论观点,却又赞同毛泽东说的理论观点。合理的逻辑是:要么陈独秀的观点错了,那么毛泽东的观点也就谈不上正确;要么肯定毛泽东观点,那么陈独秀的观点也就不能说是错误。如果不是这样,评价历史人物就会出现双重标准,当然就会背离历史研究客观公正的原则。

中国国民革命力量的格局是非常复杂的。当时作为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内部的重要政治人物,蒋介石在政治上很善于玩弄两手策略,一手是他使用阴谋手段经过三·二〇事件、党务整理案,赶走了汪精卫,打击了共产党,夺得了国民党的军权、党权、政权。但其势力尚未巩固起来,他就采取另一手笑脸策略,派邵力子作为代表赴苏联,对三·二〇事件加以解释,并表示“国民党应同共产国际更加密切的联系”,“请求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各种问题给予指导”。还说国民党曾提出加入共产国际的建议。同时,邵力子又说:“以蒋介石同志的观点来看,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他不可能也不应该限制它的发展。然而在统一战线中,它(共产党)应当承认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国民党是领导者,并采取措施避免产生致使统一战线削弱

国民革命力量的各种麻烦和分歧。”还说：“国民党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所犯的错误部分地是由于没有领会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应承担的基本任务”。“加强和扩大国民党，这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之下，也是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目的。”应该明白“统一战线方式不是两党站在一条线上的联合方式，而是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一种方式。”还提出“国民党希望共产党人不要在军队中建立秘密组织”。这是邵力子1926年9月在莫斯科写给共产国际两个报告讲出来的。^④蒋介石这一手真厉害，抓住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这种党内合作形式进攻共产国际，要中国共产党听命于他。这就使共产国际处于难以开口反驳的尴尬的困难境地。共产国际明知蒋介石日益向军事独裁方向发展，对他有所警觉，但又想拉住蒋介石，不使国共合作破裂，就让邵力子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并承认他是国民党常驻苏联的代表，一直到四一二政变后才返回中国。

对于党内合作问题一直是有争论的，它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难于发挥独立作用。有人说这种合作形式“束缚了中共的手脚，使它不能独立自主。”斯大林却强词夺理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⑤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的政治报告中说：加入国民党是否一个错误呢？是否后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根基就在这一点呢？是否这是最大的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在这一错误上又发生了后来许多机会主义的错误，最后促成了我党严重失败的根源呢？“我想对于这一问题，下一个否定的回答”。错误不在于此，而在于共产党内的三个最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即“缺乏独立性与批评性”，“不了解从一个阶段到另一阶段的转变”，“党没有成为广大群众革命力量的中心”。^⑥陈独秀在此前就正式说过：我们在国民党内供职，要搞政治独立“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想取得政治独立，那我们就应退出国民党。”^⑦

1927年1月底或2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传到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详细讨论和辩论”之后作出一个别有意味、独具特色的文件，名称叫《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当时中央政治局成员是5人，他们是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蔡和森、彭述之。据罗易说，只有三人参加讨论，有三种不同看法。陈独秀是认为决议案为中国共产党展现了新的前景，提出了新的问题和崭新的政治方针。他不完全相信决议案的正确，但是他还是准备看一下，如何在实践中贯彻执行。彭述之持第二种看法。他认为决议案中没有任何新的东西。瞿秋白持第三种看法。他完全同意决议案。^⑧这种情况，可以说在《解释》中得到了反映。

《解释》一开头就对共产国际有埋怨情绪和批评，说在这以前，共产国际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提案，只是抽象的一般性指示，不象此次国际扩大会议，“对于中国问题，抓住了要害”。“要害”是什么？《解释》指出党在以前，“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截然划分毫不衔接的两个时期”，“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这是“一个根本错误”。国际扩大会议的决议案告诉我们：“中国国民革命前途之发展，得超过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由无产阶级实际领导的国民革命成功，自然不必造成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环境，而是要造成从资本主义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政治环境，……以行向社会主义。”让我们“必须”抓住这两种革命的连锁，使之一气呵成，不能够机械地将他画为截然不相衔接的两个时期。”我们“不可在主观上注定了我们必须有第二次革命的运命，准备还有第二次革命，对于现在的革命遂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自限，一步也不肯超越，一切都等待第二次无产阶级革命再说，这便是我们过去方针和战略上根本错误。”^⑨基于这样认识，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解释》中表示接受国际决议案，但又要求各地方党组织讨论的重要点，“首先赞否此国际提案的根本方针与战略，然后再讨论几个特殊问题：（一）关于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二）民主独裁制；（三）和民族资产阶级争领导权；（四）农民政纲。”《解释》还明确指出：“因为国际此提案之执行，影响到我们党的政治生命非常之大，不在乎盲目的一致接受，而是要全党同志都能懂得此提案的全部意义。与其由盲目一致而实际不一致，不如由意见不一致而得到实际一致！”^⑩

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共产国际的决议持这种不是盲目执行的态度，而主张每个同志如有疑义或意见，“都可写寄党报登载，以便共同讨论。甚至于第五次大会后，仍然要继续讨论。”这是非常可贵的民主精神。

依据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研究，瞿秋白于1927年2月

写出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小册子,反对彭述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实际上也是反对陈独秀错误的。这本小册子的名称,还称之为《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中孟雪维克主义》。

瞿秋白在小册子中所批评中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主义的内容之一,即“第二次革命的思想”。认为这种思想,“是非常之错误的”。为什么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彭述之等人“不知道中国的国民革命同时是资产阶级性及社会主义性的”。应当认识“中国革命虽是资产阶级性的,然而他与世界无产阶级联盟而反抗列强帝国主义,他的胜利的前途,不能不超出资产阶级性的范围,而过渡于非资本主义的发展——直达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民革命当然不仅得着世界社会革命的‘辅助’,并且自己也带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了。因此,中国革命既以农地革命为中枢,又系反帝国主义的强有力的军队,自然应当从国民革命生长而成社会革命——就是‘一次革命’直达社会主义,‘从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可见中国现时的革命,既是资产阶级的,又不是资产阶级的,既不是社会主义的,又的确是社会主义的,这‘一次革命’的胜利终究是社会主义的。”^⑧瞿秋白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比共产国际、斯大林和布哈林更加“左”倾。斯大林还只是说中国革命要“超出资产阶级民权范围”,瞿秋白干脆称国民革命“同时是资产阶级性质及社会主义性的”,无论在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使得问题变得更加模糊不清,或在向“左”的方面滑去。果然,后来当陈独秀被强行去职后,中共很快就发生了革命要“急转直下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左”倾错误。

从上述历史事实来看,总的来说,可以得出合乎事实的看法:对陈独秀的“二次革命”思想的批评,是共产国际从“左”的角度首次提出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勉强地接受这种批评,承认有错误。而瞿秋白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精神进一步发挥,更为明确地以“一次革命”的理论观点来论述。

对此,陈独秀并不心服,还有不同的意见。中共五大对于国际这个决议案进行讨论。罗易是共产国际派出指导中共的代表团成员,大革命失败后返回莫斯科。1927年9月17日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提到如何对待国际这个决议案,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共中央委员会双方的观点不同,但经过讨论达成了协议:中央委员会将在自己的报告中,对做过的工作作出评述,进行自我批评,并将国际的决议案“作为未来的方针”。可是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上的报告,违背了协议,“他对所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没有作任何批评”。^⑨

中共五大之后,大革命很快就失败了。

四、1924—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走上失败之途,是谁之过? 共产国际、斯大林说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之过,其理论基础是“二次革命论”

1924—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走上失败之途,不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直接武力干涉所致,也不是由于尚在掌握中央政权的北洋军阀的反攻所致,从中国共产党来说,而是由于党内合作形式的同盟者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所致。这是一次惨痛的血的教训。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局呢?是谁之过?有的人说:“这里的过错是同国民党合作,这种合作束缚了中共的手脚,使它不能独立自主。”斯大林批驳说:这是“不正确的”。^⑩联共(布)内还有人表示对我们的中国政策怀有忏悔的心情。斯大林极不赞成具有这样的心情,他说:“如果这是真正的,那是可悲的。”因为“我们的政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唯一正确的政策。”^⑪蔡和森甚至说:陈独秀说他的错误“是在所谓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领导之下做出来的”,是“无耻”之言。^⑫

他们把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完全归罪于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归罪于陈独秀,犯了严重的投降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为八七会议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中还指责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犯了“坚决拒绝共产国际最高指导机关的命令和决议”的错误,并说这是“共产国际的历史上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形”。^⑬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是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起草的。决议案讲中国革命的前途时说:“在革命性质上,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实行推翻封建军阀的民权革命,所以中国革命进展的过程中决不能有民权革命自告一段落的局势(所谓二次革命的理论);这一革命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

任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④共产国际、斯大林关于中国大革命失败原因的结论,我以为与其说是认真分析的结果,不如说是推卸责任的遁词,绝非一个负责任的国际共运组织和领导人所为。更令人感觉不公的是,陈独秀本来作出了有益探索的观点和认识,尽管有局限和不完善,竟被指责为错误的理论基础,使得陈独秀二次革命思想的主流本应被肯定的,反倒成了罪过。

中国共产党中央几乎是全盘接受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结论,为陈独秀作出了“历史判决”。瞿秋白为党的“六大”准备的书面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一书中第二章第一节“中国共产党与机会主义”,主要是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其中讲到“所谓两次革命的理论”,实际上是“种着机会主义的种子”。^⑤瞿秋白的书面报告,曾油印发给“六大”代表,并出版了俄译本。斯大林看过这个报告,对于批评两次革命的理论,并未见其表示疑义。^⑥

中共“六大”之后,1928年11月1日,蔡和森在《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期上发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正式把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的思想概括为一句“二次革命论”,是“中国原始的孟塞维克倾向”。半殖民地的中国,从民权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既不能机械的想象如俄国一样,同时也不能象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的观点,“这个中间隔了一个万里长城”。^⑦

1929年9月,李立三在《反托洛茨基主义和中国机会主义》一文中,又作了进一步完整的概括。他说:“中国机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是二次革命论。认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中,革命的动力一定是资产阶级,让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发展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阶段中,只有帮助资产阶级,而不应参加政权,同时准备自己的力量(事实上便不会准备自己的力量),做将来第二次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就把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中间建造了一座人为的万里长城,而不知道从资产阶级革命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这就是完全的孟塞维克的理论。”^⑧

从此,1924——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被说成为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也称右倾投降主义),它的理论基础是“二次革命论”,像板上钉钉子,成为不能更改的定论。这顶帽子一直戴在陈独秀头上。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除了犯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一句写了“注释”。“注释”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指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⑨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扩大的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一1924年至1927年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推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这次大革命终于失败了”。革命失败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投降主义者,这时对于革命前途悲欢失望,逐渐变成了取消主义者”。^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继续坚持此说。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回顾历史时说:“一九二七年,……党当时还比较幼稚,又处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致使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⑪

通过上述的历史过程的全面考察,客观地说,所谓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虽然存在某些缺陷,即没有像后来毛泽东关于两步走思想的表述那样严谨全面,但是我们认为它是抵制急于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一次革命论的理论,是对于中国革命行向社会主义途径的有历史价值的探索。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着重防止急于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一次革命”的“左”倾偏向,其实是一个较为重要的任务。三十年代的“左”倾错误,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过急过粗的偏差,五十年代后期的人民公社化运动错误,七十年代前期的“穷过渡”错误,都贯穿了急于转变,急于改造的心理和情绪。这样“左”倾急性病不仅多次复发,而且几乎成了难治之症。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这方面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很值得认真总结。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就觉察到这个问题,而且最早批评这种“空想”错误。应该说是独具慧眼,颇富前瞻的。同他可贵认识相比,对他的缺陷或局限,我们实在应该作出合情合理地全面分析,不宜只攻真缺陷,不计其余。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过

程本来就是反复的艰难的,何况是认识中国革命这样的复杂、特殊的问题,要想一次达到完善,也只能是空想。在认识过程中,存在局限和缺陷并不奇怪。历史过去这么多年,看不到陈独秀思想上的闪光点,反而抓住他的难以避免的局限或缺陷不放,甚至至要继续沿袭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为推却责任强加在陈独秀身上的“罪名”,我以为这就不仅不是还历史以本来面貌,相反,是对历史真相作了不应有的曲解。

注释:

- ①《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13—14页。
- ②阿明布和著《晚年陈独秀与苏联经验》,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90页。
- 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138、251—255页。
- ④《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6月版第50—51页。
- 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3—5页。
- ⑥《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33页,第184—188页。
- ⑦《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一册第44—46页。
- ⑧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169页。
- 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第114—117页。
- ⑩《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第114—115页。
- ⑪《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二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477页。
- ⑫《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310页。
- ⑬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1月版第241—242页。
- ⑭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六卷第351页。
- 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第31—32页。
- ⑯《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二卷第263—264页。
- ⑰《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第577页。
- ⑱《共产国际、联共(布)与另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卷第177页。
- ⑲《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第169页;第146—148页。
- ⑳《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第169页;第146—148页。
- ㉑《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第165—166页。
- ㉒《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第370页。
- ㉓《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254—259页。
- ㉔《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259页。
- ㉕《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362页,第370—371页。
- 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和四卷第17页。
- 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第671—672页,第678页。
- ㉘《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263—264页。
- ㉙《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263—264页。
- 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22—323页。
- ㉛《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三卷第507—516页,第521—523页。
- ㉜《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四卷第407页;第363页。
- ㉝《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六卷第297—302页。
- ㉞《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四卷第407页;第363页。
- ㉟《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四卷第441—442页。
- ㊱《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第19—23页。
- ㊲《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第22—23页。
- ㊳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692—697页。
- ㊴《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四卷第444—445页。

- ④⑩《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四卷第407页;第410页。
- ④⑪《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四卷第407页;第410页。
- ④⑫《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817页。
- ④⑬《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第288页;第453页。
- ④⑭《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第288页;第453页。
- ④⑮《瞿秋白选集》第401页。
- ④⑯《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七卷第477页。
- ④⑰《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730、794页。
- ④⑱《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六卷第387--388页。
- ④⑲《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85页、第238页。
- ④⑳《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53—954页、第956页。
- ⑤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4页。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之我见

中央党史研究室 李颖

关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学界早有研究，看法不尽相同。本文通过对“二次革命论”的来源、主旨和形成过程的再考察，以及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比较研究，指出：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断革命论”和列宁的“革命阶段论”，并且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方针政策形成过程几乎同步；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问题的认识偏颇，对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的看法悲观，注定“二次革命论”不可避免的理论缺陷。

一、“二次革命论”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断革命论”和列宁的“革命阶段论”

1928年11月，蔡和森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正式把陈独秀的思想概括为“二次革命论”这样一个包含特定含义的专有名词。所谓“二次革命论”，是指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经过一段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待各种条件成熟后，再进行一次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有些学者提出，“二次革命论”不是陈独秀的独创，而是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断革命论”，即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这种说法还是有道理的。

究竟什么叫“不断革命”？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和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前，有一个资产阶级统治的阶段。这不恰恰是间断的革命吗？怎么反倒称作“不断革命”？其实，马克思、恩格斯讲的“不断革命”，是说无产阶级担负的革命任务是要不间断完成的，即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无产阶级必须“帮助资产阶级尽快地取得统治”，而当专制政府垮台的那一天起，无产者就要转而立刻开始反资产阶级的斗争，以便“尽快地再把它推翻”^①。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所谓“不断革命”的含义，不是指一种社会性质向另一种社会性质不间断的转变，而是指无产阶级担负的革命任务是连续的、不能隔断的，无产阶级要无间歇地、不停顿地革命。

列宁将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断革命论”发展成俄国特色的“革命阶段论”。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列宁指出：“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治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②

在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俄国取得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俄共（布）成为俄国的执政党，也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无产阶级执政党，相应地，俄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典范和共同的根据地。此时，其他东方和西方国家的共产党，还处于创建的初始阶段，在国内人数较少和处于秘密状态下，自然产生了对俄国共产党人的崇拜和效仿心理。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陈独秀第一个接触的俄共（布）代表便是维经斯基。维经斯基在上海与陈独秀等人会谈时，就主张中国一定要走俄国的路，完全按照十月革命的经验来发展中国的革命。马林来到中国后，更是把国民党看成是国民革命的主流和领导者，相比之下蔑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1922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中，规定了中国在当前阶段的以下任务：“1. 训练能保持独立思想的党员，未来由他们组成中国共产党的核心；2. 这个党将随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子间日益明显的分裂而成长。分裂之前，共产党人应该支持国民党，特别是国民党内代表无产阶级分子和手工业工人的那一翼。”^③

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又开篇指明：“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虽然决议也声称：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国民党“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

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④。

从共产国际的上述指令中,我们不难看出其意图:现今中国社会的领导政党只能是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只能是未来的领导党;革命的第一阶段应由资产阶级领导并掌握国家政权,到第二阶段才能由无产阶级的共产党掌权。在基本没有现成经验可以遵循,同时中国共产党又作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的情况下,陈独秀必然会受到这些思想和指令的影响与左右。由此看出,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不断革命论”和列宁“革命阶段论”,以及共产国际的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

二、“二次革命论”的主旨和形成过程

早在中共成立之前,陈独秀就考虑到了中国的发展前途问题。1920年10月,他撰文指出:“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的”,“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虽是一定的轨道,然这轨道却不能够说必须要经过若干岁月才可以改变方向”。他以俄罗斯共和推倒了封建社会半年便被社会主义代替为例,说明“封建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必经过长久的岁月”^⑤。这时的陈独秀已经认识到革命前途的社会主义性质,但“不必经过长久的岁月”的封建和社会主义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性质,他还没有明确的认识,也没有指明在这种社会变革过程中无产阶级将承担何种责任。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会议推举陈独秀、蔡和森和张国焘“组织一个宣言起草委员会”,蔡和森和张国焘“又推陈独秀先生为执笔人”。陈独秀起草完初稿后,先提交起草委员会讨论,进行补充和修改,再提交大会讨论通过^⑥。所以,可以把中共二大宣言看成陈独秀思想的集中反映。该宣言对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具体联系作了初步分析,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⑦

显而易见,这就是所谓“二次革命论”的雏形。张国焘就认为:二大宣言“提出了民主主义革命和苏维埃革命两次革命的理论”^⑧。按陈独秀的估计,民主革命的前途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民主革命胜利,资产阶级“从封建夺得政权”,无产阶级要经过一个长时期使自己的力量壮大之后,才能实行第二步奋斗;另一种是如果无产阶级的力量在民主革命中发展得很大,民主革命胜利后便能够即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但这里没有提出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也还没有指明把民主革命的结果同社会主义前途联系起来的具体途径。

1923年4月,陈独秀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明确阐述了第一步的奋斗结果:“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⑨

7月1日,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萨法罗夫的信中指出:“在当今的中国,只有国民党是革命的政党。我们应该把开展国民革命运动看作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因此我们应该扩大和改组国民党。”“只有国民党才能领导国民革命运动。我们应该利用这个党并且还要改善这个党。”“只有在国民革命取得胜利后,在阶级分化明朗后,我们共产党才能取得基本的发展。”^⑩

12月,陈独秀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对国民革命成功后的第二步奋斗过程作了进一步的描述,提出了两种可能:一种是“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另一种是“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即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成功之后“能获得若干政权”。但这种情况能否发生,取决于“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就是一个好例”,“但是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要”^⑪。显然,他认为在中国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没有把它作为现实的争取目标。

至此,陈独秀完整地表达了“二次革命论”的思想。

三、“二次革命论”的理论缺陷

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究竟通过怎样的途径才能到达社会主义的前途?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20世纪20年代的陈独秀也很难对此作出确切回答。直到10余年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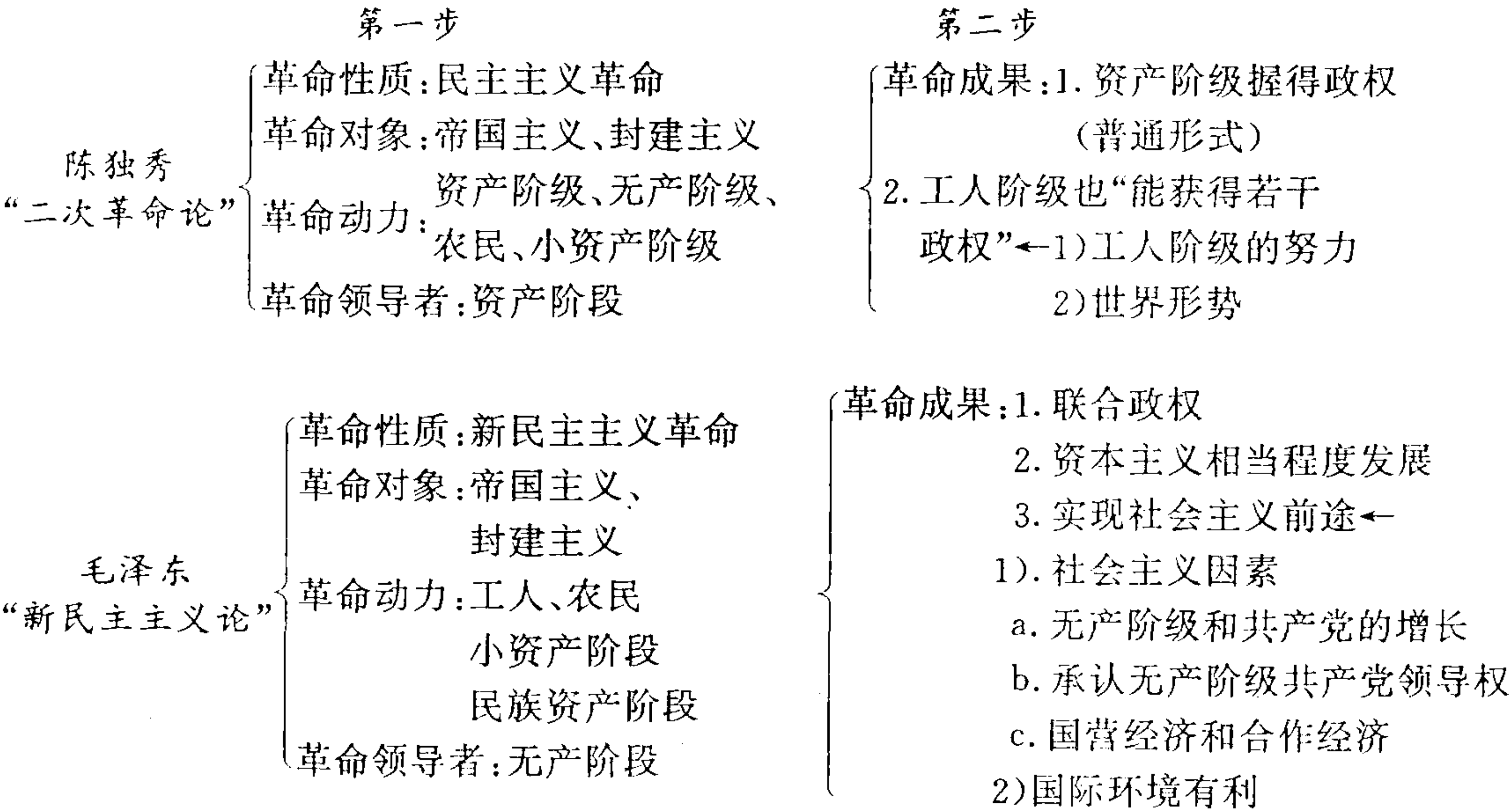
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论,才完全正确地解决了这一难题。为了说明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理论缺陷,下面将其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作一简单比较。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思想。为了避免转述得不准确,把这段原文照抄如下:

“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但这只是中国革命的一方面的结果,不是它的全部结果。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加以国际环境的有利,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⑩此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谈到了上述思想。

上面的引文包括了以下几点内容:(1)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在中国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2)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只是中国革命的一方面的结果,另一方面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的被承认,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3)加上有利的国际环境,就极有可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

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下面把“二次革命论”和新民主主义论的含义示意如下:



可见,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都主张,民主革命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分两个阶段去完成,正如毛泽东所讲的:“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⑪从字面上看,二人的观点相同,都是主张革命分两步走,但这两步具体如何走,则大相径庭。陈独秀是三段式的“二次革命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加上了一个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不断革命论”和修正了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在领导权问题上为中国的现实所否定的部分,指出:“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⑫

在这里,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毛泽东同时描绘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蓝图,提出了既不同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并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条件,它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也是三段式的。与陈独秀“二次革命论”不同的是,在两次革命中间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阶段,而是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即“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

导致两者理论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问题的认识不同。陈独秀看不到在革命的第一阶段,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可以发生转变的,以至放弃或不积极争取革命领导权,同时对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也强调不够,实际上是把共产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等同于旧式的民主革命。

由于陈独秀提出“二次革命论”时,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很弱小,加之共产国际的右倾指导和个人认识上的问题,陈独秀看不到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转变,不争取甚至放弃革命的领导权,而且悲观地看待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这是陈独秀的错误所在。

从严格意义上讲,把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毛泽东与20年代初的陈独秀相行比较,是不公平的。比较的目的不是要以此批判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而是想说明陈独秀认识的错误所在。对同一问题的认识,毛泽东比陈独秀前进一步,就是说后人超越了前人。陈独秀没有能够很好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毛泽东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并且,即使新民主主义论的所有理论观点都能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原则和共产国际的理论上,但它的某些主要观点的提出也要归功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虽然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四个阶级的联合战线的思想是共产国际提出的,但调节统一战线内外的阶级关系和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等一系列特定的政策,却是毛泽东的创新。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中共党内以瞿秋白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曾看到了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错误,并且多次对他进行批评。然而这种批评本身也带有形而上学绝对化的毛病。他们看到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同时却忽视了二者的区别,用“直接革命”、“一次革命”或“革命无间”等理论批评“二次革命论”,自然没有点到问题的实质。

注释:

①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6页。②《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的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页。

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24页。

④《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6—77页。

⑤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36页。

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115页。

⑦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37页。

⑧《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452页。

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62页。

⑩《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568页。

⑪《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0页。

⑫《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5页。

⑬《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8页。

陈独秀的扩大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

——兼谈陈独秀是不是“民主社会主义”者

江苏省社科院 陈辽

《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发表了谢韬先生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该文本是作者为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所写的序言:《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刊登在《炎黄春秋》时题目作了改动。文章刊出后反响较大,互联网上赞成者有之,批评者有之。某些陈独秀研究者,想当然地以为“民主社会主义”与陈独秀的扩大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一致,便说陈独秀是“民主社会主义”者。这一说法,关系到对陈独秀评价的大问题,因此我在这里着重论述陈独秀的扩大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同时对陈独秀是不是民主社会主义者这个问题进行辨正。

一

社会主义必须扩大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无民主,即无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这是陈独秀在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上的思想核心。

陈独秀在晚年说过:“现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所及吗?此无它,贱视民主之过也”。^①陈独秀在《我的根本意见》^②中说得更清楚:“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无产阶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度做官僚制度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苏联之所以一下子倒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苏联人民并没有享受到社会主义民主,他们对拯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还有什么积极性呢?陈独秀说得好:“后期苏联,对内实行独裁,对外站在民族主义立场,而在实际上只得认为它是世界列强之一而已,若要硬说他是社会主义国家,便未免糟蹋社会主义了。”^③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④2004年,胡锦涛在法国国民议会演讲,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可见陈独秀这一思想,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二

陈独秀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并不是否定和抛弃资产阶级民主中的一切,而是吸收和发扬其中合理的东西,用以丰富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使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更加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他曾经说过:“保持了资产阶级的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⑤为什么陈独秀对资产阶级民主采取这种态度呢?这是因为,他认为“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要丰富得多,实施的范围也广大得多。因为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时代,我们便称之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其实此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耗竭之时,不必为民主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⑥1936年3月初,陈独秀在狱中写了《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一文^⑦,其中说:“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并不是抛弃民主主义,而是扩大民主主义。”长时期以来,苏联的主流意识形态都把资产阶级民主视为伪民主,不值一提,这是十分错误的。社会主义民主,如果不吸纳资产阶级民主中合理的东西,并予以继承和发展,所谓社会主义民主也就成了一句空话。陈独秀在半个多世纪前,能够对资产阶级民主采取如此恰当的态度,一方面是因为他有过人的政治识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已经洞察了苏联模式中的民主的弊端,他才明确提出这一观点的。

三

那么,扩大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有哪些具体内容呢?陈独秀也提出了意见:

第一,“‘无产阶级民主’……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合、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⑧这里,陈独秀提出,“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资产阶级在和封建制度的斗争中懂得,仅仅一般地给公民以“集合、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是不够的,还必须给“反对党派之自由”,以便监督执政党依法统治,秉民主办事。实践证明,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实行两党制,是对统治阶级最有利的事。你在台上,必须依法统治,秉民主办事,如果你做得不对,在台下的非执政党就对你批评、监察、弹劾以至罢免你的职务。如果台上的执政党利用行政权否决非执政党的批评、监察、弹劾、罢免的意见,那就要重新举行大选,让人民作出选择。所以,近百年来,除德、意、日等法西斯统治的国家废除两党制外,民主国家始终保持两党制,给反对党以自由,而并不以执政党一党的利益而对反对党取缔。结果是,法西斯国家败亡了,实行两党制的民主国家胜利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意、日等国家也实行了两党制。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国家的政局时有动荡,但资产阶级的统治却很稳固。这一经验可以参考。所以,在陈独秀看来,给“反对党派的自由”,是扩大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特别重要”的一项内容。

第二,扩大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坚决反对独裁制。一方面是给“反对党派的自由”,另一方面,坚决反对独裁制,扩大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才有保证。陈独秀说:史大林的一切罪恶,都“是凭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⑨又说:“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史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台,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⑩陈独秀说这些话时,独裁制如日中天,苏联在经济发展上也取得了相当成绩,但陈独秀仍坚决反对独裁制。这是因为,独裁制是与扩大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根本不相容的。在独裁制的统治下,可以出现表面上的社会稳定,也可以出现经济上的一时发展,但到最后,必然会失去民心,经济发展也只能是暂时的而导致其后出现停滞落后。德、意、日法西斯国家是这样,实行独裁制的朴正熙统治下的韩国也是这样,在印尼实行独裁制的苏哈托也是这样,概莫能外。扩大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怎么可以和独裁制相容呢?

第三,扩大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还必须依法制办事,使民主与法制相辅相成。陈独秀说:“民主政治之真实内容是,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之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⑪这些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但是,扩大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不能离开法治,“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⑫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地、积极地、有效地扩大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因而不仅形成了生动活泼、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而且经济也得到了大发展。这说明,陈独秀晚年的扩大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应该给予分析,并结合当前的中国国情,接受其中的合理成份的。

四

假如陈独秀活到1951年(这时他72岁),他会不会同意1951年的社会党国际的法兰克福宣言《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成为民主社会主义者呢?我们的回答是:不会!

第一、陈独秀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第二国际里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站在本国的帝国主义一边,成了社会护国主义。列宁提出“变帝国主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发动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这场论争中,陈独秀是站在列宁这一边,而反对伯恩施坦的“民主社会主义”的。

第二、民主社会主义是在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前提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搞的改良,而陈独秀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要以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

第三、民主社会主义从根本上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而陈独秀则认为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是真理。不过,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把双刃剑,只能施之于对付敌人,而不能施之于人民内部和党内的持不同意见者。

第四、民主社会主义由于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也否定党领导军队的必要性,主张军队国家化。而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即支持党组建军队,党领导军队,只是他的动作迟了一些,措施也不够得力,因此让蒋介石得以发动4·12反革命政变,而党因未掌握足够的军队而无还手之力。如果共产党取得政权,陈独秀还是要主张党对军队的领导的。

因此,假如陈独秀活到1951年,由于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列宁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不会同意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的所谓社会主义,他也不会同意完全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党对军队的领导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和主张的。

他不会支持社会党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可以肯定的。

注释:

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陈独秀评论选编》下,河南人民出版社。

②本文中所引述的陈独秀的文章篇目,凡不注明出处者,均见《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③《被压迫民族之前途》,吴晓明编选:《德、赛二先生与社会主义——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

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⑤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第492页,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⑥《给西流的信》。

⑦《火花》报,1936年3月10日。

⑧《我的根本意见》。

⑨《给西流的信》。

⑩《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张永远、刘传学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⑪《给连根的信》,张永远、刘传学编:《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版1980年版。

⑫《德、赛二先生与社会主义——陈独秀文选》,吴晓明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

锐意进取 执着追求

——陈独秀与社会主义

安庆市陈独秀学术研究会 黄河

一、科学社会主义逻辑思维理性回归

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其政治思想经历了从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追求民主自由和建立民主政治的理想随着他政治思想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和提高,他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以至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切。

陈独秀于20世纪初登上中国思想政治舞台以后,作为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新文化启蒙运动中,成为先锋和主将,接着又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成为很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创建人之一,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上的讲话中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期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个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进入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①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这一名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最早使用。19世纪后半叶,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欧美各国的工人政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建立起来的工人阶级政党,一般都称为共产党,它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作用,是经过共产党来实现的。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它的目的和使命,是领导无产阶级和其它一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前奏,社会主义一词,系来自形容词“社会的”,其义项且赋有“交际的”、“社交的”的含义。19世纪从30年代起,“社会主义”一词在西欧广泛流行,起初含有为提高劳动群众的福利和保障社会和平而改造社会制度,容许财产不平等的存在。而当时的共产主义,一般是指通过生产资料,甚至也包括生活资料公有的办法来建立社会平等、人际公平、主张取消财产不平等,以致后来社会主义一词有了原来“共产主义”的含义,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把两者视作同义语,其区别仅如恩格所说的“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②它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是人类社会最理想、最美好的社会,循序均衡阶段性的发展。高级阶段是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是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后产生的。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第一次提出共产主义社会为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理论,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它“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③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是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因此,它必须迅速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准备条件。目前我国所面临的社会形态,就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

陈独秀作为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对中国近代政治、哲学、伦理和思想史产生过重大影响,他的思想发展轨迹,始终是朝着共产主义运动前进。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主要是服膺进化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则从进化论转向唯物史观。其进化论思想,突出特点是强调抗争和战斗,他认为宇宙万物都遵循优胜劣汰的

法则：“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④因此，万物能否存在和发展，取决于有无抵抗力之有无和抵抗力的强弱，“万物之生存进化与否，悉以抵抗力之有无强弱为标准。优胜劣汰，理无可逃。”^⑤这是反对宿命论，其目的在于人们敢于斗争，敢于战斗。陈独秀进化论思想另一特点，即是强调尊重科学的现实主义，他说：“一切思想行为莫不植基于现实生活之上。”^⑥因为科学最注重“实证”，他说：“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的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⑦这里他肯定科学是从客观事实出发，以实证为依据的，而非凭空想象，可以通过逻辑论证的。所以他说：“今欲学术兴，真理明，归纳论理之术，科学实证之法，其必代圣教而兴欤！”^⑧陈独秀进化论的唯物思想，最可贵之处在于，从世界是物质的观点出发，而得出了“尊现实”，“薄虚文”的结论，他宣称：“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在他看来，今日中国之“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都应吐弃。“偿不改弦更张之，则国力将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⑨

陈独秀唯物史观的最主要特点，体现在运用唯物史观来回答进化与革命，自然与人为的关系，自由与制裁，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其要旨表现在《新青年》第9卷第2号上，发表了《马克思学说》，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概括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是改造社会，谋求发展不可忽视的途径。陈独秀为了指导中国革命，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着重而突出地宣传了阶级斗争学说。他说，《共产党宣言》这书的精髓，正是根据唯物史观来说明阶级斗争的。他认为阶级斗争学说的要领：一是“一切过去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二是“阶级斗争之成立和斗争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必然结果”。^⑩从而确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千古流传的定例。

陈独秀是近代中国著名的革命家，毕生为中国政治革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革新而不懈努力。早在20世纪初，年轻的他就已经接受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形成比较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20年代前他完全接受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热烈主张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他站在政治革命的高度，深入分析和探讨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试图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社会进步提供理论依据的佐证与参考。科学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无产阶级斗争在理论上的概括，经马克思、恩格斯于19世纪40年代创立，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⑪其任务是考察解放全世界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和性质，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无产阶级认识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自觉地为夺取社会主义胜利而奋斗。陈独秀有见及此，毋庸置疑坚定了“心诚服”对科学社会主义信仰的信心，同时还能就原来的思想状态分清理顺民主、民主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充分认识到，科学要以民主为基础，民主要以科学为指导。陈独秀在其晚年著作中说：“民主主义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民主不是哪一个阶级的概念，而是整个人类几百年斗争才实现的。”“最浅薄的理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如有人反对或鄙薄资本主义的民主，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这不是反对资产阶级，而是帮助资产阶级更凶横地、更露骨地迫害无产阶级。”^⑫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立场，大革命失败后，他亲身遭遇而陷入了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政治漩涡，在了解其中事实真相后，顶住政治上的极大压力，重新思考，总结教训，识别真伪，明辨是非，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性和深刻性。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走一条自己的道路，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显示其科学的预见性，始终不渝，至死靡它，而葆其爱国热忱的赤子之心。

二、笃信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陈独秀被公认是“五四”时代“思想界的明星”，早年虽是清代科举制度下的秀才，却激于对黑暗腐朽封建社会的愤恨，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他对新学的追求，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为康先生辩护”，拥护改良派的主张，康梁的政教学术的维新思想启发了陈独秀的知识启蒙、思想革新的“龙性难驯”的意识，从而走出了蒙昧的少年时代，转变成了一个文化新人。而且还常常发表与康梁文风类似的关于国家大事深思熟虑的政治意见，或者改革主张，煌煌7千余字的《扬子江形势略论》，即是他抒发深沉的忧国忧民情怀，秉承清初以来以地理、军事学为国为民分忧的士大夫学术传统的一脉余绪，具有那个特定时代致知格物、经邦济

世的经济学内容倾向,从意识形态到理想追求同康梁联结在一起,凝结成“维新”“改良”的思想情结。

从1901年至1915年,陈独秀四次留学日本,通过间接对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和直接对日本明治维新的了解,并把中国与西方变革史,进行了深入地比较研究,他在社会实践中逐渐由改良派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积极鼓吹民主与科学,认为“政治之有了共和,学术之有科学,乃近代文明之两大鸿宝也。”^②1901年10月陈独秀东渡日本,普遍认为这是陈独秀投身现实政治活动的起点,也是他结束生命史上短暂的“康梁”时期的终点。当八国联军大举入侵中国的时候,俄国派遣了17万大军霸占我东北三省,消息传出立即激起广大中国人民爱国义愤,其时陈独秀由日返国,正当拒俄运动兴起之时,回皖积极发动拒俄运动,在安庆举办爱国演说会,鼓吹新思想,“词情慷慨,满座歆嘘”,“众情踊跃,气象万千”^③,堪称安徽革命宣传第一声。陈独秀在投入拒俄运动中,把反帝抗俄的斗争任务,寄托于人民大众,他提出的抗俄主张,立足于发动群众共赴国难。由此可见,他的政治思想高度明显地超越于一般人之上。从这里可以看出陈独秀深入骨髓的仇俄情绪。以至于发出“我国之人有一人不与俄死战皆非丈夫”的吼声。这与他18年后追随苏俄,全身心投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当是二重绝不不同的思想境界与理想内容。然而他潜藏在深处的仇俄情绪,又使他在大革命失败后把一股怨屈都记恨在苏俄领导与共产国际的头上,从“八七会议”前后对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策略的质疑以及“六大”死活不去莫斯科,甚至到晚年对苏联国家性质与斯大林独裁专制的激烈批评等等一系列表现来看,不难看出青年时期陈独秀内心深处潜伏下来的对俄国的复杂微妙的情绪与心结。

1903年陈独秀留学日本,在东京与章士钊^④、张继^⑤合办的《国民日日报》,通过报刊舆论宣传,“鼓吹革命”,章士钊曾在《初出湘》诗中赞誉陈独秀说:“我与陈仲子,日期大义昌,《国民》既风偃,字字挟严霜。”洋溢着派风华正茂新生气息。陈独秀在《国民日日报》上与苏曼殊合译法国小说《惨社会》,这是一本雨果《悲惨世界》的旧译,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假借书中人物之口,为世界上的穷苦人鸣不平,逸出原书,大胆发挥,豪气干云,愤懑的语境充满了“阶级斗争”的火药味。从中可以看出陈独秀为革命、为自由而战斗的理念,严肃的原则态度充盈着“社会主义”观念的美好理想。

1904年陈独秀回皖主持创办《安徽俗话报》,始创办于安庆,继迁芜湖。该报是当时国内销路最广,影响最大的俗话(白话)报刊之一,成为传播革命思想的一个重要阵地,其影响在地望上并使芜湖成了“中江革命的策源地”。陈独秀用“三爱”笔名,写了大量的论说、诗歌、小说,形式多样,门类众多,行文似流水,着笔胜万钧。谈天说地,议古论今,生气活泼,丰富多彩,旁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以至戏曲等等。文风汪洋恣肆,酣畅淋漓,涉及诸多方方面面,其中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即是反帝爱国,而且两点之间贯穿了一条红线,即科学和民主。他努力于科学的启蒙,积极宣传民主自由,向封建制度造成的愚昧和恶习进行挑战,以启发人民反帝斗争的觉悟,抨击君权,提倡民权,捍卫国家主权。对当时君主立宪愤慨之情跃然纸上,彻底同康梁决绝而分道扬镳了。

陈独秀从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入手,通过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思考,认为以往先觉者们所进行的救国斗争,所以屡遭失败,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是根本原因。因此,必须根本改造国民性,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因而以启蒙为己任,而兴发创办《新青年》。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新青年》,高举民主主义的大旗,提倡民主与科学,向封建主义伦理道德发起了毁灭性的进攻,宣传社会主义思想,闪烁着时代光芒的伟大革命氛围。《新青年》创刊号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向古旧传统的封建思潮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它以青年群众为主要的读者对象,向他们痛切地陈述当时中国社会黑暗、腐朽的状况和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罗网,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以求得思想的解放,主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内进行斗争,提倡民主,反对专制,大声疾呼:“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提倡科学,反对愚昧和迷信,提出中国要富强,就必须“科学与人权并重”。只有科学与民主,“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⑥民主的“原教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早就指出,在政治领域出现的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权、法制的理论和实践,是人类创造的共同的文明成果,是人类社会共同的进步价值观。马克思不仅称赞原始社

会的民主制,称赞奴隶社会的希腊民主制,而且称赞扫除了封建专制的资产阶级民主制,民主制是“人的自由产物,是专制独裁的对立面。社会主义民主作为新型民主,它不排斥任何形态的民主,而且还善于接纳,承继其优良的民主传统,它具有普遍性世界意义的价值,是世界上先进的政治文明成果。至于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它适应人们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是实践经验的结晶。科学不同于技术,技术的显著特征是它的功利性和工具性。而科学则是追求真知、追求智慧的。科学精神就是这样独立的,个性张扬的,非功利性的对于宇宙的探索精神。科学就是生产力,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强调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内容,突出社会发展的主体价值是它高于其它社会发展学说而赋予自身真理性关键所在。把科学与民主结合起来,作为判断一切政治、法律、伦理学术的准绳,符合这个标准就接受,信仰;凡违反科学与民主的则摒弃,批判,这可以说是陈独秀的一大贡献。当前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从实际出发,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努力把握发展的客观规律,汲取人类关于发展的有益成果,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理念,开展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而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行动口号,同陈独秀在发动新文化运动中所高举的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其理念、动因,呼应沟通,若合符节而一脉相通的。

陈独秀由于主办《新青年》而赢得了巨大的社会声誉,被各界誉为“思想界的明星”,“学界巨子”、“社会精英”。在历史潮流的推动下,他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发展成为笃信社会主义的宣传家,和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而进入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从1915—1922年这8年中,写了400余篇文章,笔触所至涉及面广,从时论到学术都是以崭新的思想,磅礴的气势和犀利生动的文风鼓舞和教育了一代青年,也为后人留下十分丰富的思想遗产,其中大部分文章都是谈论“科学”与“民主”,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猛烈地批判封建主义,他认为科学与民主好比车的两个轮子,要摆脱蒙昧与落后,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民主并重。五四运动以后,他又进一步用马克思主义给“民主”以新的解释,他说:“若经过阶级斗争,若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民主)必将永远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⑧从而把“民主”的旗帜与无产阶级革命紧紧连在一起,使它增添了新的光辉。在五四运动的鼓舞下,陈独秀的思想认识表现了更加显著的进步,而且还亲自投身于伟大的斗争当中。1919年6月11日,他因散发革命传单而被捕入狱。敌人的强暴,83天囚禁的牢狱生涯,没有使他畏缩、怯懦,相反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强了,他说:“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他认为“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⑨严峻的现实斗争,转变了他的立场,也转变了他的观点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此时开始放弃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追求,积极转向对社会主义问题的探讨。当十月革命的炮声传入中国以后,使陈独秀更进一步打开眼界,政治上看到新的曙光,越来越多的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此后一个较长时期他的思想里既有马克思主义又还残存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既有阶级论又有进化论,新旧并存,新旧矛盾,在他思想领域里激荡而碰撞着。所以此时在陈独秀身上,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并存,马克思主义观点与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互动,这时中国革命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反映,也是中国革命处在重大转折时期的反映,是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对他来讲是可以理解的。

从1918年11月第1次世界大战结束,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开始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时代,它使世界与中国的政治形势和思想潮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十月革命的鼓舞,在列宁号召下,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以至1920年5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和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陈独秀思想境界更加扩大,思想意识向前发展,从认识到接受马克思主义,逐渐懂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去观察问题,探讨社会主义,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到运用,社会主义在中国由认识到实践,不啻是“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⑩蔡和森在对《新青年》转变办刊思想时曾说:“《新青年》以前也是美国思想宣传机关,但是到了仲甫(陈独秀)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就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宣传社会主义了。”又说:“社会主义现为发行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而“社会主义必要方法”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⑪一贯具有特立独行的精神、独立自由的思想和富有创造性的陈独秀,其思想

发展的必然逻辑,无疑是一个从爱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从而显现出他是一个地道的由旧民主主义转向新民主主义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家,而且在特定的环境里又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杰出代表而转为社会主义的宣传、民主与科学的力行家。

三、学习批判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讨论

中国社会历经二千年封建统治,封建主义思想造成中国人民严重的愚昧和落后,这种腐朽意识形态,极力维护正在分崩离析封建君主专政制度和小农经济基础,阻碍政治变革和社会进步。当时不少有识之士中的不少人毕业于新式学堂,或在国外留过学,对于日本及西方国家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史特别是西方文明,有了比较深层的认识,他们相当看重精神力量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陈独秀在发动新文化运动时,即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②,拉萨尔的修正主义^③,作为法兰西文明之一,介绍到中国来,以饷国人,对辛亥革命以来共和制度的蜕变进行反思。从反对旧思想、旧道德,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改造国民性,铸造“新青年”和建设“新社会”入手,开辟一条新的救国之路。在茫茫黑夜中点燃一支启蒙运动的火炬,高歌猛进吹响新文化运动进军号角,向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进行猛烈的进攻,以摆脱封建精神枷锁及传统小农经济观念的束缚,激励铸造一座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伟大里程碑中的历史丰碑。

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当时在陈独秀看来,民主与科学是欧美进化的根本原因。中国要进化,要富强,也不能例外。他把使人摆脱愚昧的西方文明归结为“三事”:人权说、生物进经论、社会主义,主张中国必须输入这三大成果,才能“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④当时提倡的民主,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反对君主专制和军阀独裁,反对为专制独裁政治服务的封建旧伦理道德。1916年2月,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指出,中国欲求生存,必须抛弃数千年相传的“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实行“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他认为要真正实现民主政治,必须依靠全国大多数人民有政治觉悟,而不能希望于“善良政府,贤人政治”。^⑤当时提倡的科学,就是指自然科学和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反对迷信、盲从和武断,树立起积极、进取的科学精神。科学本来就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它适应人们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是实践经验的结晶。陈独秀认为:“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表明提倡人权、民主,必须同时提倡科学。他号召人们用科学态度来对待传统观念和一切社会问题,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坚持真理,打破“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树立“真实的合理的”信仰。^⑥影响所及,当时鲁迅也积极宣传科学思想,指出“科学能叫道理明白,能叫人思路清楚”;主张用“科学”这味良药,来医治思想上迷信、愚昧、安于现状、不思变革的毛病。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勇猛冲击,形成一场前所未有的启蒙运动和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长期以来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唤醒了一代青年,使中国知识分子尤其广大青年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从而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动流淌的闸门。在当时中国社会上掀起一股生气勃勃的思想解放的潮流,这就为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其实,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新思潮,早就被介绍到中国来,但在十月革命前并没有引起中国人的注意。陈独秀1915年发动新文化运动时,即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法兰西的空想社会主义、拉萨尔的修正主义,介绍给中国读者。迨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⑦毛泽东这段话,精辟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历史特点,和中国人在众多的外来的新思潮中,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历史原因。1919年5月六卷五期《新青年》编发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是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从新思潮中脱颖而出的第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个专号上刊登了一系列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令人注目的就有李大钊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并指出:“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钱,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结起来。”这对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是完整而正确的。接着陈独秀在当年12月发表《告北京劳动界》一文,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民主主义作新的解释,他说:“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谟克拉西’是那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

利的旗帜……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谟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⑧又说：“我敢说，若经过阶级战争，若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须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张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⑨与李大钊相比，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在时间上稍晚，对唯物史观兴趣也较少。作为一位具有强烈行动气质的力行革命家，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情有独钟。1920年春夏间，陈独秀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同年9月，他发表长篇政论文章《谈政治》，其中包含了鲜明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他明确宣称：“我承认是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他不仅承认阶级斗争，而且扩展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表明了决心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态度。由此可见，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虽比李大钊稍晚一点，但他接受之后，就比较更彻底。

陈独秀从接受马克思主义时起，终其一生，就对社会主义笃信至诚，对一切假社会主义理论，如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⑩及在青年中有较大影响的杜威实验主义^⑪进行猛烈的批判。而且在晚年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所暴露出来的弊端也进行了无情抨击，充分表现其追求真理，奇磊落，“孤桑好勇独撑风”^⑫的品格。在上世纪20年代，经十月革命和俄国苏维埃制度的影响。“20世纪的世界新潮”，透过重重封锁为到中国，社会主义成了人们公认的新思潮。当时这股“社会主义”的思潮，除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之外，还包括非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如蒲鲁东^⑬、巴枯宁^⑭、克鲁泡特金^⑮的无政府主义；柯尔等人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斯坦^⑯和考茨基^⑰的“议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等等。在对社会主义新思潮的宣传中，《新青年》走在最前列。1919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七卷一期《本志宣言》中郑重揭示：“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⑱理想蓝图。同时《新青年》又根据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经验，明确提出了“民众运动改造社会”的主张。由此，它从各种社会主义新思潮中脱颖而出，向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靠拢以至于服膺、力行。

马克思主义东渐来中国传播，并不是和平进行而一帆风顺的，既不断受到反动当局的迫害，又曾受到实用主义的阻挠，还不断受到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攻击。因此，马克思主义每前进一步，都要进行战斗。陈独秀及其志同道合的战友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对假社会主义理论如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以及当时在青年中有较大影响的杜威实验主义，进行了批判。发扬革命的战斗性，迅速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思想阵地。1920年继问题与主义争论后，又发生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新青年》八卷四期发表陈独秀所辑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专栏以资迎战，争论是由当时来华讲学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⑲和当时《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以及研究系梁启超挑起的，争论的焦点：在社会主义领域，主张劳资调和，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反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关于这场社会主义讨论，是“五四”之后中国政治思想界继“问题与主义”论争后，进行又一次思想大碰撞和大清洗。对于中国在历史转折关头抛弃资本主义，选择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具有重大意义。马克思主义者在论争中，坚持马克思的社会革命论，对各种各样的改良及温和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猛烈抨击，进一步树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形象，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各种假社会主义的界限，促进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更广泛传播，明确表示了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才能够救中国。

四、讴歌、崇敬列宁主义，反对、批判斯大林

学习苏联，走俄国人的路。当十月革命炮声传入中国以后，陈独秀把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寻求救国真理的目光，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转向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从此，曾满腔热忱高唱“法兰西文明”赞歌的陈独秀，开始改弦更张，以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研究感悟来破解资本主义，“走俄国人的路”。其具体表现：

其一，他初步运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社会问题，如在《马尔萨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一文中，

指出马尔萨斯的学说是“掩护资本家的偏见”。论证人口过剩的产生原因是私有财产制不合理及科学不发达。解决办法只有改造社会制度和发展科学。

其二,他认识到劳动者是历史真正的主人,初步形成了劳动创造世界的观点。1920年5月,他在上海航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发表《劳动的觉悟》的演讲,阐述劳动创造世界的理念,并提出“劳动者的觉悟,计分二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改良。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他希望中国工人运动,一要进行经济斗争,争取改善提高待遇;二要进行管理权的斗争。

其三,他充分认识了暴力革命,是由旧社会产生新社会的“产婆”,他在《革命与制度》的随感录中写道:“用力量把旧制度推翻,同时用力量把新制度建设起来,社会才有进步,力量用得最剧烈的就是革命。”

其四,他又充分认识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重要性,在《谈政治》一文中他说:“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他还以俄国十月革命为例,来说明革命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他说:“此时俄罗斯若以克鲁泡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了列宁的劳动专政,马上不但资产阶级要恢复势力,连帝政复兴也必不可免。”他相信列宁说的:“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④

陈独秀对列宁是十分敬仰的,他在《列宁主义与中国民族运动》一文中,研讨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两大贡献:“资本制度与共产制度间之无产阶级独裁制及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这两个理论。”^⑤正因为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又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其理论内涵与实践功效更“周密”了,更扩大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事为有了更科学可靠的理论指导,前途一片光明。列宁逝世一周年,陈独秀又发表了《列宁与中国》^⑥的文章纪念列宁,他告诉中国民众:“(列宁)他对于中国及中国民众之同情是何等诚挚”,“列宁的外表象一个很朴素的教授,又像一个很活泼的工人,他的内心贮藏了对于世界被压迫者的同情热泪。”他呼吁“被压迫的中国民众呵!我们若真要纪念列宁,永远纪念列宁,只有接受列宁遗训——联合全世界被压迫者,向全世界压迫者作战,为脱离被压迫的地位而战!”一直到大革命高潮的前夕,陈独秀还认定:“苏联仍旧是继续列宁的十月革命的工作,援助全世界的民族解放,推翻全世界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⑦这些话虽然是针对当时国共合作矛盾冲突,许多人怀疑苏联援华革命有政治野心的议论而发的。不难看出,陈独秀的思想境界对列宁是无比尊敬的。

陈独秀于20世纪初登上中国思想、政治舞台,作为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在反对封建专制新文化运动中,成为先锋和主将,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冲锋陷阵向共产主义进军。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成为很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1920年8月在上海建立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以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进而跃身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从中共诞生之日起,陈独秀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对苏联列宁的时期崇敬有嘉,而对斯大林则由抵制到批判,恩恩怨怨反目成仇。其动因盖缘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产国际俄罗斯化,联共(布)指挥共产国际,斯大林以太上皇的权威领导着各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斗争。第三国际成为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总部,各国共产党则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亦都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下者,工作即使遇到杆格、矛盾,几乎没有人敢怀疑共产国际,更谈不上争议或抵制。但是陈独秀则不然,从一开始就拒绝了共产国际的“好意”,不愿成为共产国际属下的一个支部。在以后革命运动中,陈独秀不断抵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英明指示”,甚至最后敢于向斯大林公开斗争。

斯大林时期苏联站在俄国民族利益的立场,处处表现了大国沙文主义^⑧的姿态,抛弃了世界革命的宗旨,单纯搞一国社会主义。斯大林在那时期厉行专制统制,践踏无产阶级民主,使苏维埃政权成了摆设,无产阶级专政成为斯大林个人专政独裁的工具。片面强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地位,给党的领导提供了滥用权势、压制民主的条件,直至动用专制手段对付人民。这在陈独秀认为,是因为十月革命以来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资产阶级民主,以致导致了“今天的史大林统治的苏联。”^⑨“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之逻辑的发展”“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些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可分离的。”^⑩“不是史大

林产生了独裁制,而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有国有大工业、军队、警察、法院、苏维埃选举法,这些利器在手,足够镇压资产阶级反革命,用不着拿独裁为代替民主。独裁制如同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④所以他沉痛地说:“我自1920年随诸同志之后,创立本党以来,忠实执行国际领导人史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机会主义的政策,使中国革命遭到可耻的悲惨失败,虽夙放勤劳,而功不补过。”^⑤

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要为广大人民谋福利。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是多元的,它不是《孟子》上所说的“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⑥陈独秀曾经指出,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是不能分裂的。“我认为民主制度是人类政治的极则,无论资产阶级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都不能鄙视它、厌弃它,把它当作可有可无,或说他是过时的东西,在东方落后的国家,长期受封建束缚,没有民主的气息和习惯,更应把它当作战斗的目标而奋斗。”“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共产主义者,本是最忠诚最彻底的民主主义者。”^⑦陈独秀要求正确对待资产阶级民主,不要动辙以“虚伪”而弃之,这一点是可取的,资产阶级民主内容中确实有值得吸取的合理成份。否则“如果说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无产阶级政权形式只有独裁,不应该民主,则史大林所做的一切罪恶都是应该的了,列宁所谓‘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乃成了一句废话,LT(L为列宁,T为托洛茨基的俄文缩写,注。)主张为恢复苏维埃、工会及党的民主而斗争,也是等于叫昨天回来,等于叫老百姓为历史残影流血。”^⑧因此,选择社会主义并不排斥民主。“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辅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的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⑨,建设高度民主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诚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⑩邓小平还说,社会主义要“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⑪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割裂二者的关系,就会导致如陈独秀所说的“残暴、贪污、欺骗、腐化、堕落”。正是由于斯大林践踏了社会主义民主,所以才导致了“红色恐怖”的统治,甚至最终导致了苏联共产党政权在20世纪90年代的彻底垮台。

关于“斯大林现象”^⑫陈独秀通过逻辑思维的理性透视,充分认识到专制独裁的深层原因,对于斯大林所造成的危害和严重后果,并不影响和动摇他对社会主义的追求,他曾说:“在现时代,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民主主义势力的真正代表,我们共产主义者同时也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一个真正的工人国家绝对应该比任何资产阶级更加民主。”^⑬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学术界曾给予很高的评价,都以为他之所以在晚年抛弃斯大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是因为他已经理智地认识到这种模式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的根本利益。^⑭对于陈独秀在五四时期提出的民主与科学两大口号更是受到学者们的高度推崇与尊敬!陈独秀作为一个学者型的思想家、革命家,他发起新文化运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笃信社会主义,大声疾呼宣传民主与科学,实无愧于他又是中国近现代史第一个深刻总结、反思苏联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人,他的一生都是忘我地在中国振兴而奋斗。他的思想领航而导向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为那个时期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纲领。他对旧民主主义的探索、和对新民主主义的开创以及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建设与构想,都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陈独秀许多观点都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理念的理论体系,根本否定以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的苏联模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当代中国政治表现形式已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理念息息相关,其终极目的都是为了更全面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体现经陈独秀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奋斗目标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真正民主的、法治的、富裕的现代化国家。

五、慷当以慨,敬思难忘

瞻顾陈独秀跌宕人生,苍茫起伏,志吞江海,上开百劫之功;播传马列、兴作新民之举,锐意进取,执着追求,秋风劲草,谤积丘山,寂寞辉煌,毁誉参半。今适遇明时,盖棺可资论定,追思怀想,荒冢拓建墓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面对美轮奂彩,转绿回黄之独秀园,能毋感慨!为赋一联、二律、六绝句,以寄缅怀。

一联

辟地开天,树帜举旗,堪称健者;
丰碑高冢,回黄转绿,不负斯人。

二律

一

国势飘摇禹甸惊,为民奋臂战旗擎。刀光剑影丹心烈,雨骤飚狂铁骨铮。
峻冢长埋高士骨,丰碑激越凯歌声。英魂辉映南湖月,创业维艰莫畿京。

二

爱恨情仇关天下,安危忧乐系一身。导向传媒兴月旦,弘扬马列作新民。
幽囚白下攻学术,老病江津诵黄庭。望帝魂归啼杜宇,首丘终古皖山青。

六绝句

一

流播马列始《新民》,北李南陈两巨人。覆地翻天兴国色,金瓯永固物华春。

二

民主由来自古尊,只缘专制讳施行。和谐今与时俱进,知耻明荣颂太平。

三

倡提民主惜蹉跎,奋力追求阻力多。权为众用利同享,箴言济世足讴歌。

四

科学持衡催发展,花繁锦覆颂时兴。和谐社会工农旺,足食丰衣聚万金。

五

早年头角显峥嵘,议论欹奇启后昆。寂寞萧森风雨恶,桀傲风骨典型存。

六

墓园筑向皖城西,道左通衢供睇睨。缔造艰难人敬仰,丰碑遗世仰瞻垂。

注释:

①1981年《红旗》杂志第14期《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上的讲话》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上)第236-23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0页。④《敬告青年》:《独秀文存》第一卷第3页。⑤《抵抗力》:《独秀文存》第一卷第21页。
⑥《今日之教育方针》:《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第140页。⑦《敬告青年》:《独秀文存》第一卷第3页。⑧《圣言与学术》:《独秀文存》第二卷第554页。⑨《陈独秀文章选编》第77页。⑩《陈独秀文章选编》第195页。⑪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

⑫《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火花》第三卷第1期。

⑬《时局杂感》、《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

⑭《辛亥革命在安徽》第3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⑮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湖南长沙人,是我国近同代著名的学者的社会活动家,解放后历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

⑯张继(1882—1947),字溥泉,河北沧州人,历任国民党立法院副院长,国史馆馆长等职。

⑰《新青年罪案答辩书》:《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第443页。

⑱《谈政治》、《独秀文存》第一卷第361号。

⑲《研究室与监狱》、《独秀文存》第二卷第540页。

⑳《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岳麓书社1986年5月第1版,第250页。

②①任武雄《党史研究文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拓者——旅法时期的蔡和森》。

②②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亦译乌托邦社会主义,一种不现实的改造人类社会的社会主义思潮。法国经济学家日罗娜·布朗基1839年在《欧洲政治学史》中第一次用“空想社会主义者”,指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以及他们的信徒。

②③拉萨尔·斐迪南,德国工人运动中最早的机会主义者,19世纪60年代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一种右倾机会主义思潮,以拉萨尔为主要代表。认为无产阶级通过和平的合法斗争,争得普选权,就可变君主专制国家为自由的人民国家。

②④《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独秀文存》第一卷第10页。

②⑤《吾人最后之觉悟》、《独秀文存》第一卷第37页。

②⑥《偶像破坏论》、《独秀文存》第一卷154页。

②⑦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②⑧《告北京劳动界》、《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第49页。

②⑨《谈政治》:《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第154页。③⑩基尔特社会主义:一译“行会社会主义”,是20世纪初英国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代表人物有潘蒂、霍布逊、柯尔等。他们力图把中世纪行会的狭隘思想同现代资本主义思想、工团主义混合起来,否认国家阶级性,在工人中散布有可能不经过阶级斗争而摆脱剥削的幻想,基尔特意译为“行会”。欧洲封建社会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为保障本行业 and 行业成员利益而建立的封建性组织。

③⑪杜威(1859—1952),美国哲学家、教育学家、心理学和政治家。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他反二元论,否认经验之外的客观物质世界。他认为经验是超出物质和精神对立之外的中性物,包括自然、社会和精神的一切现象。他把实践看作人与环境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否定人类实践的意义。他曾在1919年至1921年到中国讲学,对实用主义在近代中国的流传有很大影响。

③⑫“孤桑好勇独撑风”,《陈独秀诗存》,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第一版第114页。

③⑬蒲鲁东(1809—1865),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著名的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创始人。法国人。其理论和主张实质是妄图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巩固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幻想用改良主义的办法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鼓吹无政府主义,要求人和公民的充分自由,否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对国际工人运动起了十分有害的影响和严重的破坏。

③⑭巴枯宁(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著名代表。史称巴枯宁主义。1868年9月参加第一国际,旋背叛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大搞分裂活动,诽谤和攻击巴黎公社。马克思、恩格斯与其进行不调和的斗争,1872年被开除出共产国际。

③⑮克鲁泡特金(1842—1921),俄国革命者,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国际无政府主义运动的著名领袖和理论家。著书立说,从事无政府主义的宣传活动,主张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废除一切国家,建立“无政府”的社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③⑯伯恩斯坦(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右派首领,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1896年以的在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题,发表一系列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修正”的文章,写成《社会主义的前程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集当时修正主义之大成。主张阶级调和,宣扬议会道路,鼓吹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并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机会主义公式,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③⑰考茨基(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首领之一,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理论家。19世纪80年代,第二国际内以“中派”面目出现的机会主义思潮的考茨基为其代表,它鼓吹超阶级的国家观,反对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武装斗争没有必要,可以“使用和平的经注、法律和道德的手段”,通过“人道主义和民主的道路”取得议会多数,“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③⑱《〈新青年〉宣言》、《独秀文存》第一卷第244页。

③⑲罗素(1872—1970),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1920—1921年来中国讲学,对中国学术界有一定影响,回国后写成《中国问题》。

④⑩《列宁选集》第三卷第199页。

④⑪《新青年》(季刊)第1号,1925年4月22日。

④⑫《向导》第99期。

④⑬《十月革命与东方》、《向导》第178期。

④⑭沙文主义:资产阶级反动的本民族至上主义,18世纪末19世纪初产生于法国。因法国士英沙文,狂热拥护拿破仑一世的征服计划,鼓吹法兰西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主张以暴力建立大法兰西帝国而得名。它宣扬本民族的利益高于其他民族,煽动民族仇恨,主张征服和奴役其他民族。在帝国主义时代,它成为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侵略其他国家和压迫其

他民族的工具。

④⑤《给连根的信》：《陈独秀著作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一版，第547页。

④⑥《告全党同志书》、《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

④⑦《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火花》第三卷第1期

④⑧《告全党同志书》、《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

④⑨《孟子·梁惠王之章句上》、岳麓书社1986年5月第一版第249页。

⑤⑩《告全党同志书》、《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

⑤⑪《给西流的信》：《陈独秀著作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一版，第554页。

⑤⑫《我的根本意见》：《陈独秀著作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一版，第560页。

⑤⑬《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页。

⑤⑭《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322—323页。

⑤⑮什么是“斯大林现象”？就是“无所不管的政权同无所不管的党权混淆在一起，而无所不管的党，又同无所不管的斯大林混合在一起。”法国让·艾伦斯坦著《斯大林现象史》，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375页。

⑤⑯转引唐宝林著《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0—281页。

⑤⑰唐宝林《近十年对陈独秀的评价》，《群言》1989年第9期。

从自由主义到社会主义

1919—1920 年陈独秀的思想矛盾及其解决

华中师范大学 何卓恩

内容提要: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两年间,陈独秀经历了一个理性人格与感性人格的冲突期,理性人格主导沉静的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感性人格则在民族危机感的诱发下朝向“直接解决”的方向演绎。陈独秀曾经试图以理性人格来统合感性人格,但没有成功;后来以组编《新青年》“劳动节专号”为契机,实现了感性人格驾驭下理性人格的重新定位,才基本克服持续已久的思想矛盾和思想混乱,接受布尔什维克主义。但尽管如此,仍然留下了后遗症。

关键词:陈独秀;新文化;新政治;自由主义;社会主义

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三大思想系统之间的兴替和互动,是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思想界最值得注意的现象之一;作为其中重要思想人物的陈独秀,可谓集三大思想系统之冲突和交汇于一身。日本学者横山宏章在他的《陈独秀传》中总结陈独秀一生的思想变化,就认为“陈独秀可称为清末的民族主义者、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民主主义者,国民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并认为追随他那令人眼花缭乱的思想变化,探讨他那既能适应革命时代,又能随时代潮流而变化的思想过程,正是研究陈独秀的妙趣所在^①。有关从民族主义到民主主义的变化轨迹,笔者曾作了一点试探^②,本文将探讨的是他从自由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心路历程。

这次转变主要发生在欧战后的两年间。具体实现转变的时段,学界认知不一。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1919 年末 1920 年春说^③、1920 年 5 月说^④、1920 年 7—8 月说^⑤、1920 年 9 月说^⑥、1921 年 7 月前说^⑦等。关于这次转变的具体过程和原因,学界更远未形成一致的看法^⑧。之所以在此问题上看法分歧,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陈独秀此际留下的文字,在改良与革命、文化与政治、自由民主与劳工解放、爱国心与公共心、信仰与怀疑、理论与实践等诸多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矛盾现象。

究竟如何理解这些文义上的矛盾现象?究竟如何研判陈独秀从自由主义走入社会主义的心理轨迹和看待他的社会主义信仰特性?本文试图通过陈独秀理性人格与感性人格互动过程的观察对此略作研讨,就教于方家。

冷思:胜利狂欢的现场缺席

1918 年 11 月 11 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称欧战)交战双方签署停战协定,战争以协约国的胜利、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结束。中国虽只派出一些劳工到欧洲战场,但因名义上参与了协约国,也分享了战胜国的殊荣。这对于鸦片战争以来屡战屡败的中国来说,不啻是喜从天降:13 日,北京城兴奋的人们将象征耻辱的克林德碑捣毁,改名为“公理战胜”,由东单迁移至中央公园。北京政府“安福俱乐部”因初自日本借到外债六亿元,一时也得意莫名,教育部且于天安门一带,建筑临时讲台,由各界人士公开演讲。14、15、16 日北大停课三天以示庆祝,要求教育部把此临时讲台借给北大师生继续演讲三天。蔡元培、胡适等十一位知识界头面人物发表了演讲。当时朔风剧烈,演讲时间每人只能限以五分钟,“因此,各人的演词,非常简括,却又非常精采”^⑨。师生和市民们意犹未尽,就着月底总统府举办胜利庆典的机会,28、29、30 日北京大学又在和平公园组织了连续三天的演讲会,李大钊、陶孟和等名家和一些学生代表十余人发表了激昂的演说^⑩。大家都感觉到“‘强权即公理’的现实,似乎开始有了些修正,中国将因此有转弱为强的机会”^⑪。奇怪的是,无论这些庆典还是连续下来的万民欢愉活动,却都未见盛名天下的陈独秀之身影。

原来,事非偶然。虽然这时候的陈独秀确实小恙方愈,可他不愿出门参加欢庆却别有原因:“一来是觉

得此次协约国战胜德国,我中国毫未尽力,不便厚着脸来参与这庆祝盛典;二来是觉得此次协约国胜利,不尽归功于军事。”^②在他看来,协约国的战胜实际上是“德国政治进步”的结果——德国的民党起来革皇权和军国主义的命,协约国才趁势将德国打败。更令他“感慨”和“忧愁”而决意不参与庆祝拆毁克林德碑盛典的是,他坚定的认为,造成国耻碑的种种原因没有完全消灭之前,“这块碑实拆得多事。因为这块碑是义和拳闹出来的,不久义和拳又要闹事,闹出事来,又要请各国联军来我们中华大国朝贺一次;那时要设立的石碑,恐怕还不只一处。”^③一边是德国政治进步,推翻帝制建立魏玛共和;一边是中国依然故我,民众愚昧,政治黑暗。陈独秀遂“不愿出门”与众同乐。

陈独秀选择缺席战后大狂欢,要从他创办《新青年》以来的精神追求上理解。他对造成国耻碑之“种种原因没有完全消灭”的忧虑,实际上是对“新文化”没有建立起来的焦虑。他将“义和拳闹事”归结为传统社会蒙昧的宗教迷信、儒家伦理、旧戏剧和守旧党,认为这是“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走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④。这条道路即《新青年》创刊以来所标举的“民主与科学”的道路。

显然,欧战结束这个世界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并没有改变陈独秀一如既往的努力:通过新文化运动,健全国民的精神,趋向自由民主的新国家。因为“新旧思想之激战”愈演愈烈,此际出版的《新青年》五卷五号至六卷三号,核心的主题自然仍集中在自由主义的新文化问题上。陈独秀本人则除了在答读者问中继续讨论宗教迷信、孔教、奴性、文学艺术改革等议题外,还撰写了《〈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对于梁巨川先生自杀之感想》、《再质〈东方杂志〉记者》等专文,强调只有德、赛两“先生”可以救治中国一切的黑暗,为拥护这“两位先生”自己将不辞来自各方面的压迫和攻击,不作丝毫退缩。

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的坚守,乃辛亥革命后他对曲折的救国历程沉静反省的结果。使他在欧战后的举国欢腾中保持沉静,使他在政治的和社会的压力下保持坚韧定力的,正是这个大反省所型塑的理性人格。但是,陈独秀的理性人格形成于“后天”,他的身上同时还存在一种“先天”的人格,即那个“性情暴躁”、“疾恶如仇”^⑤的感性人格。换言之,在矢志于新文化的理性陈独秀之外,一个“不忍”不对现实政治发言的感性陈独秀同时存在。

新文化运动启动时,同人本来是相约“不批评时政”的,即“二十年不谈政治”。这里的“政治”当然指时政,而不指作为理想目标的政制。他们认定中国“政治”系“七年之痒”,需要医之以“三年之艾”。只有从思想文化入手,才能根本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为此对于纷扰的政事纠葛须暂不置评。然而,袁世凯称帝、府院恶斗、张勋复辟、军阀混战相继发生,以陈独秀“性情暴躁”、“疾恶如仇”的个性,实在不忍沉默。在《新青年》第二卷力驳康有为欲立“国教”的过程中,已经开始评论时政;到了第三卷更直言不讳地讨论“俄国斯革命”(二月革命)。当顾克刚来函指责《新青年》因评论时政“三卷之内容不若二卷;而二卷《新青年》又不若第一卷”,并以评论时政为“逐末之举”时,陈独秀反问道:“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评时政,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然有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政治思想学说,亦重要思想学说之一,有何故必如尊函限制之严,无一语拦入政治时事范围而后可?”在他看来,若完全不关心时政,便是“凉血动物”,便是“中国旧式书生,非二十世纪之新青年也。”^⑥陈独秀不忍地谈起政治,虽然篇数并不算多,也同样引起胡适等同人的不满,在《新青年》五卷一号陈氏又放言“今日中国的政治问题”时,进一步对不以为然的同人和读者解释说:“我现在所谈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此种根本问题,国人倘无彻底的觉悟,急谋改革,则其他政治问题,必至永远纷扰,国亡种灭而后已!”^⑦

既然陈独秀有着这种“不忍”的热血性格,欧战结束这样重大的时政自很难真的让他不关心,何况它关系到中国的命运。事实上,正是鉴于方便他和李大钊、高一涵等几个与他有着类似激情的同人议论这些大政的需要,他们决定在《新青年》之外在创办一个时论刊物《每周评论》^⑧。这个新刊物相对原来在《新青年》中论政而言,一来可以避开文化刊物谈政治的批评,二来“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可以克服月刊

对时效性的限制。刊物在欧战结束后四十天内出版,陈独秀主编,发刊词的主题就从欧战“公理战胜强权”说起——陈独秀缺席了庆祝协约国胜利的狂欢,却接过了庆祝协约国胜利的主流话语。随后他更接连发表《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和不少相关随感,以及《除三害》等一些谈论国内时政的文字。

不过尽管陈独秀保有谈政治的热情,谈文化与谈政治的分际还是清楚的——言论的中心依旧在文化运动方面——直到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诚然他此际发表过《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克伦斯基和列宁》等有关俄国革命的随感,以及对贫民哭声的同情文字,论者对此常有较高评价,然根据当时他的心态和他全部文字的总体考察,这些似乎很“进步”的文字,却并没有多少特别的意义。他对俄国十月革命所发表的评论正如此前对俄国二月革命的评论一样,不过是忍不住“谈谈政治”而已。

热血:外交失败的“直接解决”

1919年1月,协约国举行的国际和平会议在巴黎召开,美国学者型总统威尔逊1918年1月提出的《公正与和平》十四点方案被作为会议基础,而且威尔逊本人也参加了和会。抱着“公理战胜强权”的乐观精神,中国以参战国的资格向和会提出了废除外国在华的一切特权,取消“二十一条”,收回日本在大战时夺取的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等七个要求。这些要求实际上被欢欣雀跃参与过“公理战胜”的中国民众认为是理所当然且“必可实行”^⑨的。即使冷峻缺席欢庆活动的陈独秀,也对“世界第一个好人”威尔逊和他的“公理”寄予厚望^⑩。

然而,国际政治的理想主义终归要屈从于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和会所有参与国名义上都有发言权,实际却一开始就被英、法、美、意、日五强国把持,弱小国家的权利问题,根本“影儿没有”^⑪。威尔逊虽确实作了些仗义执言的努力,然“学者遇着‘老虎’,学者惟有失败而已!”^⑫,在大国现实利益交换下最终还是成了口惠而实不至的“威大炮”^⑬。和会开了不到四个月,中国提出的废除外国在华特权的要求和会完全不加考虑,传来的却是要求中国签字承认将德国在山东权益转让给日本的噩耗,“公理战胜强权”的奢望不期然彻底破灭。5月2日噩耗传回国内,经历了“六个月的乐观”^⑭的青年学生和市民,群情激愤,走上街头。

陈独秀原本希望借国际和会的劲风来实现国内和平,清除“三害”(军阀、官僚、政客),所以对国内于上海召开的南北和谈也保持期待。巴黎和会的破产使他联想起上海和会的失败,五四运动爆发当天,他在《每周评论》上以颇为悲壮的口气宣布“两个和会都无用”,不能指望分赃会议的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非人民站出来“直接解决”不可^⑮。这是他对学生发起的街头运动最有力的鼓励,因为“这些言论非常符合当时激进青年的心意”^⑯。

陈独秀提出的“直接解决”之“直接”,本针对“政治家外交家”这些代理人而言,他后来多次提到这层意思。6月9日他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就说“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⑰次年4月他在上海中国公学的讲演中,总结五四运动所特有的精神,也说是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的“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⑱。不过虽然这里“直接”系相对于“政治家外交家”、相对于“政府”、“法律”、“特殊实力”、“代表”而言,但由于“直接行动”更多的是需要调动“激情”而非开发“理性”,势必对《新青年》历来努力的方向——通过健全国人的理性来根本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形成冲击。所以客观上它的对应面也可适用于作为“间接解决”的新文化运动。

“直接解决”的观点固然与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有所抵触,但与陈独秀的热血个性或感性人格毋宁是相当契合的。这种个性在理性支配且同人相约“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时期尚且不时显露峥嵘,在有了《每周评论》等专门的发挥舞台,和出现了在他看来真正“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之后,自然得以顺势发挥。从1919年5月开始,陈独秀的感性人格呈快步成长之势。这个过程中,他的“直接解决”意识与自己的行动和遭遇不无交替推进。陈独秀“直接解决”意识的产生,表面的诱因确系“两个和会都无用”,尤其巴黎和会显示出“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不敌强权时代!”^⑲。说来这也是时人普遍的心理反应。参与发起五四游行的北大“国民社”成员张国焘说,“我们充满了失望与愤慨的情绪,美梦方觉,一致认为:世界上哪里有什么公理?中国人除奋起救国以外,已别无他途可循。”^⑳近人对五四前“六个月乐观”及

其心理挫折的分析^⑥,相当程度上也印证了这种心理反应。

不过,另一方面,就巴黎和会传来的不利消息本身来说,固然对日本侵占山东加以确认是极其不公正、不道义的,但联系到近代以来中国频遭的各种屈辱和劫夺,这次和会并没有实质上增加什么,跟真正亡国灭种也不完全能够等同。日本占据青岛、控制山东已经在世界大战初期(1914年11月7日)成为一个事实,在列强宰割中国的时代,“事实”本身往往就是“法律”。陈独秀们对此一和会决议案的在意程度何以如此超乎寻常呢?

诚然,“六个月乐观”所遭受的巨大挫折感是分析此问题不可忽略的因素,挫折感与希望指数的相关关系早已得到心理学证实;但同时也不能不注意到此际国人对于日本日益暴露的对华野心所特有的警惕和焦虑。

就陈独秀而言,在得到和会不利消息之前,已经早有将日本视作中国最大威胁的看法。欧战期间,西方列强忙于战事,无暇东顾;战争刚刚结束,参战大国两败俱伤,也暂收敛起在东方的咄咄攻势。从这个间隙中发现独占中国机会并为此开始激烈竞争的,主要是两个后起的强国美国与日本,而日本以其地利条件更捷足先登,胃口大开。大战方起,日本就加入战争向德宣战,派遣军舰进攻东方的德国势力,占领青岛,续办胶济路,接收德国在山东的全部利益。为麻痹中国,当时日本政府曾表示,此次接收不过暂时之事,将来“终究归还中国”;但事实上它非独永远不准备把山东权利交还中国,抑且变本加厉,意图完全控制中国内政外交。1915年1月日本竟然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觉书”,限期答复。

这个“觉书”的内容,就连主张对日“亲善”的曹汝霖都看不过去,晚年他坦承:“日本此次所提之廿一条,包罗万象,集众大成,势力由东北、内蒙以至闽、浙,权利由建铁路、开矿产以至开商埠、内地杂居。甚至第五项要求政府机关设立日本顾问,两国用同一军械,警察由日本训练,小学用日本教师,日本僧人到内地传教。凡此苛刻条件,思以雷霆之压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随其所欲,直可亡国。”^⑦日本逼迫如此,自然极大的激发了国人对日本的痛恨,“于是中日二国的感情,越弄越坏,坏到不可收拾了”^⑧。

虽然经谈判最后双方签署的协定,中国只接受了其中的十五条,“日本并没有得到它所要求的全部”^⑨,但时人并不因此减轻对日本的痛恨(19日协定签字,21日北大等两千学生举行游行请愿,为一年后的五四运动作了预演),何况它独霸东亚的企图心,日甚一日地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包括干预中国内政,使扰攘不安的中国政局更加混乱,以便从中渔利;包括在巴黎和会上施展出卑劣的外交伎俩,造成不利于中国的形势,企图使北京当局屈从。

日本的步步紧逼,陈独秀的激愤与国人同。五四之前《每周评论》的随感录中,陈独秀有不少篇幅专谈此事,对“口口声声说中日亲善”的日本企图合法盘踞山东十分不满,表示“亡国”“卖国”并无亡在哪一国、卖到哪一国的差异,亡、卖与西方列强固无论,亡、卖于近邻日本是同样的不幸,“同一亡国卖国,若说亡在卖在道路较近人种较同的国家手里,就算是亲善,不算是亡国卖国,这个道理无人能懂。”^⑩

当时西方国家所谓“黄祸论”仍有市场,而东方民族反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也往往打上了人种的烙印。中日等国知识分子出于各自不同的背景,分别形成了各自的人种话语^⑪。中国知识分子希望人种平等,日本在国际政治中也大打“人种平等”牌,试图掩盖其称霸亚洲的野心。这一点,在巴黎和会初期陈独秀还没有看出究竟,所以当日本代表提出此议时他“大为佩服”,撤回此议时他又“大为失望”;直到他们分赃图谋已显时再次大吹大擂地提出这个问题,他才觉悟到“我们中国人应当联合全体黄种人,正正堂堂的向巴黎和会要求平等的待遇,不能附属日本,做美日对抗的机械”,提出:“我们黄人既然对于白人要求平等待遇,我们黄人自己对于黄人,先要平等待遇。若是我们黄人对于黄人的什么在中国的特殊利益,和在朝鲜的主属关系,不能打破,还有什么面目向白人要求平等待遇呢?”^⑫

日本在“二十一条”问题上暴露的狡诈和贪欲,以及所采取的最后通牒的野蛮方式,不禁令人联想起20年前马关条约的耻辱,10年前日俄战争造成的日本宰割中国东北。旧仇未泯又添新恨,“日本企图阻止中国的共和民族主义保卫自己的地位,而这种企图以推进民族主义并使其集中为反对日本而告终”^⑬。在“公理战胜”的愿景越来越渺茫的情境下,国人开始退求“两害相权取其小”。当其时,陈独秀对待英美就反而比

较缓和,认为它们的威胁并不太大,甚至他们多少可以制衡一下日本。他为3月9日《每周评论》写的随感录,称日本是中国军阀混战的祸根,英美舰队来华是“东洋一线光明的希望”,中国铁路宁可国际共管不可日本独管。五四游行当天,陈独秀一方面宣布“两个和会都无用”;一方面愤激痛陈:“我们中国若免不得亡国的命运,宁可亡在欧美列国手里,不愿亡在日本手里。联合亚洲的黄人,持抗欧美白人的鬼话,我们绝对不相信。因为黄人待黄人,比白人待黄人还要残狠十倍。”^④

有关人种问题的议论,很少引起研究者注意,但实际上,这在陈独秀“直接解决”意识发生的过程中具有相当的重要性。日本独占中国的企图和“黄人待黄人,比白人待黄人还要残狠十倍”的说法,证之于十多年后全面侵华掳掠中国的历史,不幸而言中;但在五四前夕陈独秀奋笔疾书之际,却不能不说是一种对日祸强烈焦灼的表达:在他的意识中“我们对日的外交失败,又何止一个‘山东问题’!眼前已经是可悲可惨,日后亡国的可悲可惨,更加十倍百倍千倍万倍无数量倍呵!”^⑤巴黎和会不仅没有实现日本势力撤出中国的目标,反而要求中国签字承认日本的在华“权益”,陈独秀看到南北军阀和政客的倾轧和无能,诉求“直接解决”应属合乎情理。

学生走上街头,表达惩办亲日派、捍卫青岛、反对和会决议签字的决心,向“直接解决”迈出了一大步。为表达支持,陈独秀所编的《每周评论》从5月4日到6月8日,用全部版面来报道运动发展,并出了三期“山东问题”特号。他本人撰写的就有7篇文章和33篇随感录。这些报道和评论文章不仅肯定公众示威是国民“应有的权利”,“合乎正义”,而且指出行动对象不能仅仅指向作为政府“机械”的亲日分子曹、章、陆,而更应指向造成这些“根本罪恶”的政府当局^⑥。他径直主张用暴力实行民族自卫,提出了“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⑦的劲爆口号,并鼓励街头运动中被捕的学生,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⑧

陈独秀自幼具有服弱不服强的性格特征,幼年背书曾因为“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使严厉而脾气古怪的祖父极尽愤怒,斥骂他长大要做“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而见到慈祥的母亲流泪,他却立刻心软顺从下来。他自承一生都“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⑨。安徽知名人士胡子承因辛亥时期办《安徽俗话报》而与陈独秀相熟,就曾以“血性过人”评论陈独秀^⑩。学生运动越发展,被捕的学生越多,陈独秀的激愤也随之上升。沪上友人“烛知独秀在京必多危险,函电促其南下”,他在答复中称:“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促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⑪6月9日,他真的亲临街头,到闹市区去散发自己起草的要求略近“革命”意味的《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使他的“研究室—监狱”的文明观从言传上升为身教。

陈独秀在其感性人格于巴黎和会破产后持续强化的时候,其理性人格开始相应受到抑制。目前可知的文献中未见有重申“民主”“科学”新文化建设的启蒙文章或演讲在此际发表;作为新文化运动象征的《新青年》在5—6月间没有出版(《新青年》六卷五号标注1919年5月15日出版,实际出版时间则在1919年9月),不管具体原因如何,这本身也很有象征性。对感性人格增强中的陈独秀而言,“热血”要可贵于“冷思”,他直指那些自以为是地责骂爱国行动为“干涉政治”和“暴动”的人,称“这真不是吃人饭的人说的话,这真是下等无血动物”,不应当让他“住在中国国土上呼吸空气”^⑫。

“热血”与“冷思”的并存与陈独秀的思想矛盾

热血的情感人格,在价值标准上相较冷思的理性人格更倾向于“道义”而非“科学”。陈独秀“国民”观的变化就是一个说明。

“直接解决”意识产生后,以何种力量做行动主体就成为必须回答的问题。陈独秀致力于新文化运动时,其启蒙对象是“国民”;现在要解决政治危机,希望自然也在“国民”身上。他感叹“人心已死的中国,国民向从来没有团结一致的爱国心”^⑬是中国顶可伤心的现象,大声疾呼日本侵略关乎“国民全体的存亡”,“应该发挥民族自卫的精神,无论是学界、政客、商人、劳工、农夫、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出来反对日本及亲日派才是。”^⑭这里,国民内涵虽然包含官僚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人

阶级、农民阶级、流氓无产阶级等各个层次,但这些组成部分的“可靠”程度有着很大分别。他早已指出,“军阀”、“官僚”、“政客”是三害,是“国民的仇敌”^③。虽然“当兵的”不等于军阀,“做官的”也不全是官僚,但寄望于他们做国民运动的中坚显然不可能。所以在另外一些较精确的表述中,陈独秀将“直接解决”的基本力量划定为“学界、商会、农民团体、劳工团体”这类“多数的平民”^④。

但即使这些相对“可靠”的平民,也还有差异。由于商界力量的软弱,商人或“在商言商”对国事消极,或“不明白世界潮流大势”妄谈国事^⑤,甚至还有“连爱国心都没有的奸商”,竟然干出“根据个人的私利主义,贩卖日货,贩卖中国米出口给杀中国人的人吃”^⑥的下流勾当,陈独秀对商界并不看好,认定“不但特殊势力和代议员不是好东西,就是工商界也不可依赖。”^⑦

中国传统社会士为四民之首,五四运动从学界发动,陈独秀本身亦是学界中人,按说对学界应该寄予厚望。其实也未必。陈独秀在街头运动兴起后最初的一段时间内确实没有怀疑知识界的觉悟和决心,但到了后来,他越来越觉察到学界一些文人的无耻无行,对学人阶层渐生失望,以为“不但工商界不可依赖,就是学界的份子好朋友,都不可依赖。”^⑧1919年12月一位署名“明慧”的女读者来函讨论民国妇女的选举权问题。陈独秀答称:“我们若还要国会政治,男女都应当有普通选举权。他们若不肯,必有一班学者帮他们说出种种学理来;我们若是再进一步,他们必然又强制我们要选举权;到那时必有一班无耻的学者,有来说出选举权的一篇大道理。”^⑨这里明显透露出陈独秀对于知识阶层某些投机分子的不屑。他很强调道德情操的纯正价值,认为中国急需学者,但同时必须学者都有良心,“我们敬爱一个诚实的农夫或工人过于敬爱一个没良心的学者。”^⑩没良心的学者脑子里充满了权门及富豪的肮脏东西,不可能为造成一个新社会尽力。

陈独秀唯一没有动摇过的民众力量,便是那些“诚实的农夫或工人”,即朴实的劳苦大众。陈独秀较早注意到劳苦大众是在欧战结束后、和会谈判结束前,《每周评论》对劳动问题的报道很多,陈独秀本人也肯定过俄国的社会革命在文明史上具有与法国政治革命同等的意义,且对“俄国温和派”克伦斯基致电“劳农政府”发表过感慨,这本身也许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但它诱发他产生对工农问题的关注则是可能的,从此他开始体察中国“贫民的哭声”。“直接解决”意识产生后,工农成为基本政治力量看待,不仅没有怀疑过,而且越来越强化到“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珍贵”^⑪的程度。

这样一种“国民”范围缩限的过程,主要是以道德为标准的。以道德的眼光,寄生的、压迫人的上流社会往往处于劣势,而劳苦、软弱、受压迫的下层社会则往往具有优势。农夫或工人的诚实,自然超过那些“没良心”的商人、学者,更不用说那些经常无恶不作的“三害”。从排除军阀、官僚,压缩政客,到看衰“工商界”、“学界”,陈独秀心目中可靠的“国民”的范围越来越小。实际上,几乎整个上层社会都已不再被视为他希望中的“直接解决”的主体。于是,“国民”的真切所指只剩下劳工、农夫及上流社会中仅存的部分“有良心”者(尤其是青年学生),即“我们洁白的劳动工人和青年学生”^⑫了。

陈独秀日益看重劳苦民众在“直接解决”中国问题的上的潜力,势必诱发他对于民众自身解放的关心,而从这个出发点走下去,根据当时社会主义思潮方兴未艾的形势,接受社会主义便成为某种“必然”性的结果。五四运动中,有一次学生演讲团发表爱国演说,虽声嘶力竭,老百姓却还不能完全领悟。一位在场的老牧师受了感动,随后指点他们讲词要通俗,要“从人民切身问题说起”,“将人民受痛苦的根源和爱国运动联在一起”^⑬。这位老牧师的话,实际上很真切的点出了五四以后爱国思潮转向社会主义思潮的关键。这个关键也许适合于理解陈独秀思想的转变。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殿军,服膺的虽说是自由主义的学理系统,但其背后的精神动力无疑仍然是民族情感。民族情感是“体”,理论学说是“用”。既然民族情感推动他将“国民”的“直接解决”作为救亡的出路,而且将劳动民众视为“国民”的中坚,那么,对劳动民众的动员势必提上日程。动员民众需要从关注民众疾苦开始,由此社会主义极其合乎情理地进入陈独秀的思想世界。

社会主义的精神要素在中国传统中并不缺乏,但现代意义的“社会主义”直接发源于西欧,相对于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等社会政治思潮而存在。这些重大社会思潮由于其复杂的演变,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不少变化,所以严格定义起来并不容易。尽管如此,他们的基本特征仍然是清楚的:民族主义看问题以国族为中心;自由主义以个人为视角;社会主义的最大特点则在于它的阶级眼光。社会主义以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

人类的历史,看待国家的本质,而其追求的目标则是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和最终的社会各阶级平等,这在各派社会主义学说中是一种共识。其中马克思主义由于对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进行了系统论证,并设计出一套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在内的实现道路,被视为科学的社会主义。

现代社会主义思潮20世纪初传入中国。1903年赵必振翻译出版日本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对近代各种社会主义学说都有介绍;1906年的《民报》第二号、1908年《天义报》第十五至十九号都曾发表过《共产党宣言》的摘译;1912—1913年间徐企文、江亢虎还曾分别组织“中华民国工党”、“中国社会党”从事政治活动;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各种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也有发展之势;欧战告终,俄国革命的影响进入中国,社会主义的思想风气更加强劲。除了国民党的《民国日报》等报刊,陈独秀们主编的《每周评论》、《新青年》就登载不少介绍马克思学说和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李大钊还直言不讳地表示爱“谈”马克思主义。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没有李大钊那样快,但其对社会主义共同价值的同情,则也不晚。他从关注劳工问题逐渐开始接受一般社会主义的阶级观念。

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进一步提升劳工问题、“吃饭问题”的注意力,认为它“成了二十世纪劈头第一个大问题”^⑥。12月初他在《晨报》发表《告北京劳动界》,开始直接向劳动群众发言,将“劳动界”界定为由没有财产的木匠、泥水匠、漆匠、铁工、车夫、水夫、成衣、理发匠、邮差、印刷排字工、佣工、听差、店铺的伙计、铁路上的茶坊、小工、搬运工等合成的“一个无产的劳动阶级”^⑦,指出欧战以后,各国劳动界的问题都“闹得天翻地覆”,中国的资本家虽然没有欧美日本那样发达,但同样有劳动问题存在。

不过这时陈独秀对劳动问题的解决,态度比较和缓。他盼望劳动界的“并不是妄想大家像欧美劳动界那样有力量的运动,只盼望大家有自身所处的是什么境遇,并且有努力改善这境遇的觉悟”^⑧。具体讲,希望消极方面不赌钱、不酗酒、不吸毒、不早婚、不当兵,积极方面在“一不造反,二不罢工”的条件下创设同业联合组织、劳动休息所、职业介绍所、补习夜校、储蓄机关等。到了1920年4月,他在上海船坞栈房工界联合会发表演说时,才明确提出了劳动者争取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两步骤,鼓动既要罢工争取生活处境的改善,又要在将来不惜造反实现“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的目标^⑨。不过现实的劳工运动还是以经济权利的改善为主,工人的“减时”“增资”成为他强烈关心的所在^⑩。

随着陈独秀逐渐将他原来界定的最广义的“国民”清晰地界分为二:一是“游堕的上流社会”^⑪,一是纯洁的青年、劳动者,特别是“神圣的”劳工,他开始用社会主义的阶级观念来看待国家。“我以为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是资本家的国家,一是劳动者的国家,……各国内只有阶级,阶级内复有党派,我以为‘国民’不过是一个空名,并没有实际的存在。……因为一国民间各阶级各党派的利害、希望各不相同,他们的总意不但没有方法表现,而且并没有实际的存在。”^⑫当此之时,陈独秀感性人格的价值取向,已经从民族主题悄然过渡到社会主题,“直接解决”以救“国家”的初衷,已经渐次向“阶级解放”转移。1920年1月《学生界应该抵制的日货》一文提出留日学生从日本引进的“民族主义”不值得提倡,民族话语在陈独秀显意识层面已经出现淡化的迹象。

从对劳工疾苦的关注到对社会主义价值的同情,可以看出陈独秀感性人格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但如果就此以为陈独秀思想已经“完成”向社会主义尤其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也未免言之过早。1919年9月16日陈独秀在全国营救声中出狱。此前通过学生斗争,尤其借助上海三罢的威力,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三个亲日派被罢免,中国代表也拒绝了《巴黎和约》的签字,五四爱国运动已经结束。《新青年》也开始恢复出版,并由以往轮流编辑改为由陈独秀一人承担编务;在《新青年》启蒙使命的牵动下,在同人和社会的期待下,相应地,陈独秀延续新文化思维的理性人格也恢复了它的存在和表达。在这种视阈里,自由主义、科学理性的启蒙主义自然亦有相当正面的鼓吹。例如他发表的《新青年宣言》、《自杀论》、《告新文化运动诸同志》、《新教育的精神》、《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等都属于继续的启蒙性质,这些文章或讲演都是在政治性的鼓动同时展开的。这时“以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方式”与以政治运动解决问题的方式之间,显然存在不和谐处,陈独秀身上表现出较明显的人格冲突和思想矛盾。

由感性人格与理性人格的同时作用引发的思想冲突,除了在“政治解决”与“文化解决”的落脚上摇摆

不定,还牵涉到价值的层面。新文化运动原来的基本政治价值是自由民主主义,而现实政治关怀和直接行动所引发的政治价值,却越来越倾向于社会主义。这两重价值在此一时期陈独秀的精神世界里也是充满矛盾的。时而他沿着新文化的路子继续鼓吹民主主义,如1919年6月的《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12月的《实行民治的基础》、1920年1月的《中国革命党应该补习的功课》;时而他又根据其“直接解决”意识确立以来的新认知,指出自由民主主义的虚伪和不足,主张建立劳工的社会,如:1919年6月的《立宪政治与政党》、12月的《过激派与世界和平》、1920年2月的《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提出打破阶级的制度、打破继承的制度、打破遗产的制度,建立平等的信仰、劳动的信仰^⑧)、3月的《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等。两种价值认同互相交替地呈现出来。

这种思想矛盾使得人们在判定陈独秀何时“转变”信仰的问题上,发生相当困难。有学者根据《立宪政治与政党》判定他1919年6月就“同资产阶级民主分手了”,有的根据他的《过激派与世界和平》甚至更早的《二十世纪的俄罗斯革命》和《克伦斯基与列宁》对于苏俄的正面评论,就认定1919年4月开始“同情共产主义”,有的更说他在1920年3月前后演讲《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和撰写《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时,已经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问题了,这些结论都似乎没有正视陈独秀此一时期的思想矛盾。实际上,陈独秀真正接受社会主义,有待于它通过两重人格的整合来克服思想的矛盾。只有当他在显性思想层面只认为社会主义尤其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的时候,才可以说他思想实现了“转变”。

“热血”与“冷思”的整合:陈独秀思想冲突的解决

陈独秀的思想矛盾他本人不可能无所觉察,事实上他也在试图解决这些矛盾。

起初他试图以理性人格来统合感性人格,以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来包容他的新“觉悟”。这可以从上文提到的《实行民治的基础》和《新青年宣言》中得到观察。这两篇同时发表的作品,基调都是继续开展新文化运动,但同时力图将劳工权利、社会正义的思想包容进去。《新青年宣言》在继续坚持民主科学和反对旧文化的基础上,将劳动的神圣、“金力主义”的罪恶、反对政党的阶级化吸纳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实行民治的基础》则在倡扬杜威民主理论的过程中,将“社会的”、“生计的”民治主义作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并相信它可以像“政治的”、“民权的”民主主义一样可以“在中国大大的发展”。

不过,这种尝试很难说是成功的,因为即使从理性上,陈独秀也很快发现民主本身并不能容易达到劳工阶级解放的目标。“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谟克拉西’”只是新兴财产工商阶级要求权利的最佳工具,理论上虽说也可以作为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⑨,实际上由于他们不具备民主政治所需要的知识、财产、时间等条件,却很难做到。这种整合只有在“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⑩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但其感性人格强烈质疑:不发生“阶级争斗”劳工阶级如何解放?所以后来(如1920年4月《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他谈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不再刻意谋求那种以推进新文化运动的方式来解决劳工解放议题的整合。陈独秀仍然处于两条腿走路的状态。

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虽此时已经发生“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新文化阵营出现分裂,仍有一批同人坚持理性路线,无形中对陈独秀构成一种制约。2月中旬陈独秀到了上海^⑪,这一无形制约得到疏解,而且他周围的新朋友戴季陶、张东荪、陈望道、李汉俊、施存统等都是社会主义的热心鼓吹者,出现了有利于陈独秀向现实政治一边倒的形势,解决工人问题渐渐成为思考焦点。

为保障劳动者权利,1889年社会党国际已经确立了劳动节,这个节日在中国从未被正视过。随着对劳动问题的日益关注,1920年3月,陈独秀开始“决做”一期《新青年》的“劳动节专号”^⑫。经过精心准备,专号5月1日在上海准时出版(北京稍后数日出版),400页规模,相当于以往《新青年》的两倍多。专号内容主要集中在中国工人状况(北京、天津、山西、安徽、河南、湖北、浙江、南京、长沙、无锡、芜湖、江都、唐山、香港以及巴黎华工)、世界工人运动(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和工人国家苏俄的介绍和评论,而将9名普通工人的题词与孙中山、蔡元培、吴稚晖等著名革命和文化人物题词并列载于专号则更为《新青年》所首创。当时上海《星期评论》和北京《晨报》也编辑过劳动节专号,但对劳动者的热情惟《新青年》最炽。

这个专号对于中国知识界和劳工界的冲击,论者多有评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他对于陈独秀本人也

有显著的人格整合作用,开启了解决思想矛盾的另一进路。在准备这个专号的过程(3—4月)中,他除了一如既往地向知识界朋友约稿(致周作人信可证)组织译介劳动问题的文章,还派人或托人在各地调查劳动状况,得到“许多劳动者的指导和帮助”^③,他本人也对上海的中华工业协会、中华总工会等团体进行过调查。对劳工关切的深入,越来越使他的生命热情得到释放,使命感得到安置。陈独秀的个性中感性人格具有天然优势,最终以感性人格整合了理性人格,开始了新的信仰。从此他的话语对象发生显著转变,“由知识青年转向了劳苦工人”^④。正是这样一个深入劳工生活世界的过程,让他公开宣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明确提出了要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古训反转过来,为劳工争取“管理权”的社会目标。

这次“集中性思维”事实上使他大体放弃了理性人格既往的新文化运动努力,而将全部注意力放在了劳工解放的问题上。他不再正面宣传自由民主价值,也不认为文化教育是最紧要的当务之急。这一点蔡和森就看得很清楚,他曾说,《新青年》原本是“美国思想的宣传机关”,到了陈独秀产生社会主义倾向后开始宣传社会革命新思想,“俄国思想”与“美国思想”并存,一直到劳动界专号,“才完全把美国思想赶跑了”^⑤。

赶跑美国思想的过程,在陈独秀自身来说,也是感性人格统领理性人格,情感引导思维的过程。至此,陈独秀思想整合的中心由“新文化”转移到“新政治”。既然劳工问题成为“新政治”的中心,那么思想目标也应适应新的需要。放弃自由主义新文化的努力后,陈独秀思想的价值层面,无疑会快速向劳工解放的目标倾斜。就在劳动界专号上,陈独秀答读者问时,就坚持减少工时增加工资比工人教育更急,“工人教育和储蓄固然要紧”,但“不能做减时增资的必要条件”^⑥,往后更越来越重视组建劳工团体来联合斗争,争取劳工权利;而且强调这种团体必须要工人自己组织,自己做主^⑦。

新文化运动推倒了“孔家店”,催化了各种新思潮。社会主义作为新思潮也受到时人的欢迎,其中的原因,说法故多,“拿来主义”的风气不能不说是重要因素之一。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中,影响最大的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都关注着劳工阶级的解放,主张废除财产私有制度。陈独秀关注劳工问题自然需要解决劳工问题的理论,所以较长一段时间内,他对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都有尊重。不过在专心于劳工解放之前,他的尊重都比较低调。他曾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视为推进新文化运动的“持论既不谬,又加上紧密的学理研究”的“持论的榜样”^⑧;在评论马尔塞斯人口论时,他又说他相信进化无穷期,社会很复杂,任何学说只能适合于特定的环境,“时间上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空间上没有包医百病的良方。我对于马尔塞斯的人口论,就是这种见解;……马克思唯物史观,克鲁泡特金互助论,也都是这样。”^⑨

编辑“劳动节专号”从而逐步实现他的人格冲突之整合后,他对于理论的需要更加迫切,也更加自觉地注意分别和筛选,不再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同等看待。适逢此时,苏俄的远东共和国特使魏金斯基与之接触,商讨组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无政府主义才成为他这个思想过程最后的归宿。根据张国焘的回忆,大约快到7月底,张按照李大钊的嘱托,到上海当面向陈独秀表示,希望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入手,拟定一个长期工作计划,陈独秀曾开门见山地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必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⑩。假如此说属实,则陈独秀在7月底前已经确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⑪,并认为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根据参与创建共产党的一些当事人事后的回忆,1920年5月间陈独秀已经在上海组织一个秘密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计划组党,原有意取名“社会党”,李大钊来信认为“就叫共产党”^⑫。6月间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开会筹备组织共产党,推陈独秀为书记。8月间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⑬。工运先驱邓中夏明白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国工人阶级从此有了他们自己的政治领袖,开始引导他们走向革命斗争的大道。”^⑭

找到了新的理论,也就意味着为其理性人格找到了新的归宿,真正完成了人格冲突的整合。当陈独秀的理性人格被整合到感性人格诉求中的时候,他与《新青年》同人尤其是胡适为代表的固守自由价值的人士分手,从“我们”中分出“你们”^⑮,则势所难免。4月26日致信北京《新青年》同人,开始提出“是否继续出版”问题^⑯。后来陈独秀完全不再在意北京同人的意见,径直将《新青年》改组为“旗帜过于鲜明”的党的机

关刊物,他即使邀请胡适们写稿⁸⁷,胡适们也不愿意参与进来了。直到30年代,胡适在对学生的谈话中,仍然对陈独秀的“偏见”耿耿于怀⁸⁸。

共产党这个最重要的工人运动组织成立后,陈独秀才正式在文字上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宣示。在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八卷一号(改组党刊后的第一期)上,陈独秀撰写了两篇重要作品。一篇《谈政治》,从理论上指出国家是阶级的工具;现存的资产阶级(掠夺阶级)的国家不能扫除社会的罪恶,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生产阶级)的国家,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民主只是有利于具备知识、财产、时间的资产阶级,劳动阶级的国家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不仅是社会主义的观点,而且显然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文中相当篇幅用来批评无政府主义否定国家的不当,指出作为工具的国家是可以改造的,不必废弃;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国家,才能镇压资产阶级的颠覆,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这篇文章可以视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份诞生宣言书,也可以视为陈独秀思想转轨的一个事后的比较正式的交待。

另一篇《对于时局的意见》则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见地讨论实际的中国政局。他说:中华民国不能容纳不劳而获的可耻之流;没有抽象的国民只有不同的阶级、党派;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终究会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吾党应该帮助资产阶级民主派反对君主主义,当他们胜利时“马上成为我们的敌人”。这就将它的新方向与过去长期努力的自由民主主义明确区分开来,并在最终的目标上将二者绝然对立。这一点在随后发表的《国庆纪念的价值》中进一步作了发挥。后文中他说,实现多数人幸福只有社会主义政治;中国虽然资本主义政治革命尚未完成,但封建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必经过长久的岁月;现阶段不反对民主的政治革命,但不要迷信它。这就再清晰不过的表明,陈独秀已经完全走出自由主义的思想世界,对自由民主价值的某种肯定,已经变成社会主义的一种策略了。

一些学者根据陈独秀的思想是否完全“符合”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体系,来判断他是否发生了转变,其实这种观察视角值得商榷。陈独秀的思想转变应该根据陈独秀本人的思想世界的移动来观察,而不能以外在于陈独秀的标准或者后人的标准来硬套。在组织共产党之前陈独秀显然已经自我认同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应该说明的是,尽管陈独秀理性人格在思想层面得到了安置,并与感性人格取得了方向上的一致,感性人格主导的态势仍然暂时没有改变。这清楚的表现他在对“学”与“干”的关系处理上。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陈独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固然重视,但更强调“用”和“干”,认为“我们不必做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发表一个《共产党宣言》;我们只是要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⁸⁹在他看来,学说的价值,符合需要最关键。“输入学说若不以需要为标准,以旧为标准,是把学说弄成了废物;以新为标准,是把学说弄成了装饰品”;“我们士大夫阶级断然是没有革新希望的,生产劳动者又受了世界上无比的压迫,所以有输入马克思社会主义的需要。这些学说的输入都是跟着需要来的,不是跟着时新来的。”⁹⁰所以他即使做了党的发起人,也不主张高谈社会主义,而将切实发动“帮助劳动者的运动”⁹¹作为当务之急。

西方学者研究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时发现,在五四运动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多数著作还没有译成中文,李大钊显然是在没有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完整理论之前,便决定献身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了⁹²。这种情况衡诸陈独秀,不仅类似,而且更甚。陈独秀选择了马克思,信仰了马克思,但并不等于彻底的了解马克思⁹³。实际上,实践优先,根据实践的需要去寻求理论支援,而不重视理论自身的完整理解,既表明理性人格仍然不具优势,也预示了他后来革命斗争中的某种“机会主义”结局。

结论

简言之,在陈独秀游离自由主义而选择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他的人格面貌和思想世界确是充满矛盾和混乱的。但这些矛盾和混乱,表现出一定的层次性和阶段性。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之前,虽偶谈政治,间或还有对苏俄的积极评价,但新文化的建设始终是其思想重心所在,理性人格和感性人格真正的矛盾尚未出现。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发生,使得“政治”的比重上升,“直接解决”的激情开始左右他的思想,这时

才真正导致“文化解决”与“政治解决”、理性人格与感性人格的冲突。这种冲突在陈独秀出狱后显著表现出来：一方面，“直接解决”的激情持续上升，而且在道德性标准之下将“直接解决”的中坚力量逐渐缩限到“最珍贵”的劳工，引导他一步步朝社会主义思想靠拢；另一方面，五四爱国运动已经结束，《新青年》恢复编辑出版，新文化派同人以及社会各界期待的存在，使他自觉不自觉地重新回到新文化建设的主题，坚持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同一时期政治与文化两种趋向、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价值并存，理性人格和感性人格在文章和讲演中交替出现，使其思想归属难以把握。伴随着上述两种趋向、两种价值、两种人格的并存，在“改良与革命”、“爱国心与公共心”、“信仰与怀疑”等问题上也出现若干混乱。

这些矛盾和混乱，陈独秀曾经力图在原有新文化运动基点上求解决，但未能实现；直到《新青年》“劳动节专号”的出版，使他转换思想整合的视线，才得到基本的解决。但即使陈独秀的显性思想矛盾得到了理顺，由于他的解决方式是纯粹以“需要”为导向的，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认知并不充分，“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又出现了。

注释：

①陈辽：《港台及海外学者对陈独秀的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3卷（2005年）第1期，第24—25页。

②何卓恩：《民族主义的内在困境：陈独秀从民族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转变》，《安徽史学》2007年第三期，第108—115页。

③郭成棠：《陈独秀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28、133页。

④朱文华著：《终身的反对派——陈独秀评传》，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页。

⑤杨奎松：《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72—73页。

⑥尤小立：《从“宪政”到“直接行动”——陈独秀前期国家观演变述评》，《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第178页。

⑦王树棣等：《陈独秀评论选编》（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18、364页。

⑧关于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社会主义尤其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学界曾提出巴黎和会和苏俄革命影响说、中国工人阶级走上历史舞台说、中国资产阶级软弱说、马克思主义真理说、反西方的西方化心理说等。但具体到陈独秀，这些因素如何发生影响，多语焉不详。国内外相关著作除上述提到者外，还有：陈东晓编《陈独秀评论》（北平东亚书局，1933）、日本学者横山宏章著《陈独秀传》（日本朝日新闻社，1953）、美国学者李蒂甘著《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3）、魏知信著《陈独秀思想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郑学稼著《陈独秀传》（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9）、王学勤著《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唐宝林陈铁健著《陈独秀与瞿秋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冯建辉著《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贾兴权著《陈独秀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任建树著《陈独秀大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张宝明刘云非著《陈独秀的最后十年》（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胡明著《正误交织陈独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祝彦著《晚年陈独秀》（人民出版社，2006）等，另有相关论文数以百计，兹不列举。

⑨胡适：《五四运动纪念》，1928年5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

⑩1918年11月27日《北京大学日刊》头版头条刊载《本校特别启事》，谓“本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为庆祝协约国战胜日期，本校拟于每日下午开演说大会（地点在中央公园内外，俟择定后再行通告），各科教职员及学生有愿出席演说者，望即选定演题，通知文牍处，以便先行刊印，散布听众。”以后，《北京大学日刊》自12月3日至24日，共发表了七个人的演说词。

⑪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⑫陈独秀：《克林德碑》，《新青年》5卷5号（实际出版时间为1919年1月），第449页。

⑬陈独秀：《克林德碑》，《新青年》5卷5号，第453页。

⑭陈独秀：《克林德碑》，《新青年》5卷5号，第458页。

⑮陈独秀自述“性情暴躁”、“疾恶如仇”是众人对他的印象，而他自己觉得在“疾恶如仇”方面，他并不彻底。陈独秀：《实庵自传》，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集》第三卷，第418页。

⑯独秀：《答顾克刚》，《新青年》，第3卷5号，第6页。

⑰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第5卷1号，第1页。

⑱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355页。

⑲胡适：《五四运动纪念》，1928年5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

⑳只眼：《每周评论发刊词》，《每周评论》第1号，第1版“随感录”。

- ②①只眼:《揭开假面》,《每周评论》第7号,第3版“随感录”。
- ②②胡适:《五四运动纪念》,1928年5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
- ②③只眼:《威大炮》,《每周评论》第8号,第3版“随感录”。
- ②④胡适:《纪念五四》,《独立评论》第149号。
- ②⑤只眼:《两个和会都无用》,《每周评论》第20号,第3版“随感录”。
- ②⑥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6页。
- ②⑦陈独秀:《北京市民宣言》,《民国日报》1919年6月14日。
- ②⑧陈独秀:《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时报》1920年4月22日。
- ②⑨只眼:《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每周评论》第22号,第1版。
- ③⑩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
- ③⑪罗志田:《“六个月乐观”的幻灭:五四前夕士人心态与政治》,《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05—124页。
- ③⑫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98—99页。
- ③⑬胡适:《五四运动纪念》,1928年5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
- ③⑭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6页。
- ③⑮只眼:《中日亲善》、《亡国与卖国》,《每周评论》,第11号,第4版“随感录”。
- ③⑯罗福惠:《黄祸论与中日两国的回应》,台北立绪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8—11章。
- ③⑰只眼:《人种差别待遇问题》,《每周评论》,第12号,第2版“社论”。
- ③⑱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 ③⑲只眼:《共同管理》,《每周评论》,第20号,第3版“随感录”。
- ④⑩只眼:《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每周评论》,第21号,第3版。
- ④⑪只眼:《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每周评论》,第21号,第3—4版。
- ④⑫只眼:《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每周评论》,第23号,第1版。
- ④⑬只眼:《研究室与监狱》,《每周评论》,第25号,第4版“随感录”。
- ④⑭陈独秀:《实庵自传》,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集》第三卷,第415页。
- ④⑮唐宝林等编:《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页。
- ④⑯联合通讯社:《陈独秀案之大谜团》,《民国日报》,1919年6月23日。
- ④⑰只眼:《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每周评论》,第22号,第1版。
- ④⑱只眼:《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每周评论》,第21号,第4版。
- ④⑲只眼:《为山东问题敬告个方面》,《每周评论》,第22号,第1版。
- ⑤⑩只眼:《除三害》、《军人与官僚》,《每周评论》第5号第2版“社论”、第4号第3版“随感录”。
- ⑤⑪只眼:《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每周评论》第23号,第1版。
- ⑤⑫只眼:《山东问题与上海商会》,《每周评论》第22号,第4版。
- ⑤⑬独秀:《学生界应该排斥的日货》,《新青年》7卷2号,第156页。
- ⑤⑭陈独秀:《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时报》1920年4月22日。
- ⑤⑮陈独秀:《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时报》1920年4月22日。
- ⑤⑯独秀:《答明慧》,《新青年》7卷3号,第148页。
- ⑤⑰独秀:《社会的工业及有良心的学者》,《新青年》8卷3号,随感录第1页。
- ⑤⑱陈独秀:《劳动者的觉悟》,《新青年》7卷6号,当篇第1页。
- ⑥⑩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7卷1号,第21页。
- ⑥⑪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53页。
- ⑥⑫只眼:《吃饭问题》,《每周评论》第25号,第4版“随感录”。
- ⑥⑬陈独秀:《告北京劳动界》,《晨报》1919年12月1日。
- ⑥⑭陈独秀:《告北京劳动界》,《晨报》1919年12月1日。
- ⑥⑮陈独秀:《劳动者的觉悟》,《新青年》7卷6号,当篇第2页。
- ⑥⑯独秀:《答知耻》、《答章积和》,《新青年》7卷6号,通信第2—4页。
- ⑥⑰陈独秀:《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新青年》7卷4号,当篇第10页。

⑦陈独秀：《对于时局之我见》，《新青年》8卷1号，当篇第1页。

⑧陈独秀讲演报道，《国民新报》，1920年2月7日。

⑨陈独秀：《告北京劳动界》，《晨报》1919年12月1日。

⑩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7卷1号，第21页。

⑪关于李大钊护送陈独秀脱险的经过，高一涵、罗章龙、胡适、马叙伦均有回忆，但细节出入较大。根据董宝瑞的考证，经过应是：陈独秀约在1920年1月28日秘密离开北京南下，因汪精卫、章士钊之约共商西南大学筹办事宜1月29日他先到上海，2月2日水路转行武汉。2月4日下午冒雪抵达汉口，演讲座谈数日，2月7日夜间乘火车离开武汉返京。2月8日回到北京两个小时，北洋政府通过《国民新报》发表的消息发现陈独秀去了武汉，派警察去陈独秀的寓所查问。陈独秀“知道大事不好”，赶紧离家出走。先跑到胡适家，后又去了李大钊与高一涵合居的住处，李大钊和高一涵把他“藏”到北京大学教授王星拱家“暂避”，随即李大钊亲自护送陈独秀乘骡车化装去天津，然后陈独秀转赴上海，2月12日到达上海。李大钊在护送陈独秀去天津途中“相约建党”，是事后他人的演绎，当事人的回忆并不能证实有此事。见董宝瑞：《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出险》，载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唐山市李大钊研究会2007年内部编印的《李大钊史事疏证》一书，第181—190页。

⑫陈独秀：《致周启明》（1920年3月31日），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5期，第91页。⑬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新青年》7卷6号，当篇第2页。

⑭任建树：《陈独秀传：从秀才到总书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8页。

⑮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

⑯独秀：《答知耻》，《新青年》7卷6号，通信第2页。

⑰独秀：《真的工人团体》，《劳动界》第2册（1920.8.22）。

⑱陈独秀：《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载长沙1920年1月12日《大公报》。马克思原文作“克罗马”，克鲁泡特金原文作“克波客拉”。

⑲陈独秀：《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新青年》7卷4号，当篇第1页。

⑳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㉑毛泽东：“我第二次（1920年5月）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2—133页。

㉒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1页。

㉓李达：《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4月第8期。

㉔邓中夏：《邓中夏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9页。

㉕张太原：《〈独立评论〉与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20—233页。

㉖陈独秀：《致李大钊、胡适等》，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252页。

㉗陈独秀：《致胡适》，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257页。

㉘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6页。

㉙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91—92页。

㉚独秀：《学说与装饰品》，《新青年》8卷2号，随感录第2页。

㉛独秀：《比较上更实际的效果》，《新青年》8卷1号，随感录第2页；《此时中国劳动运动的意思》，《劳动界》第4册（1920.9.5）。

㉜Meisner, Maurice.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52—70.

㉝陈公博：《寒风集》，上海地方行政社，1944年版，第217页。

陈独秀与社会主义

温州 陈镜林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阶级,在资本主义废墟上建立的一个人人平等的自由人联合体。列宁依着马克思的目标,发动俄国十月革命,突破资本主义脆弱一圈,由于西欧国家没有响应,这个革命总体没有成功。斯大林在落后国家进行锁国建设,靠高压手段,弊端百出,最后以失败告终。陈独秀领导中国革命,追随国际政策也无成功,但目睹苏联二十年教训,指出苏联政权演变,斯大林非无产阶级专政而正是个人独裁。没有民主即非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人类追求的目标,民主科学公平人人自由发展,不断奋斗达到这个目标是可能的。

关键词:社会主义;陈独秀

马克思的时代,“共产主义”是一个可怕的幽灵,出现在欧洲上空,使统治者闻风丧胆。俄国革命后,“共产主义”思潮涌向东方,中国欧洲都发生滚滚红潮,成立了社会党共产党。

苏联倒台后,一党专制,腐败堕落大失人心,许多国家的共产党纷纷改弦换辙,开放改革之声风起云涌。

为了抵制政局动荡,世界出现各种呼声,否定共产主义,改良资本主义、人民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动态社会主义、欧洲共产主义等等,使人眼花缭乱,不知所是。

为纪念“独秀园”新落成,探索独秀先生一生追求的社会主义理想事业,从源头追思马恩经典作家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界定,列宁时代的实践以及苏联失败的教训,借鉴历史,明察将来,共产主义在人间并非天国,道路不平,人们渐走渐近,目标在望。

一、马恩的共产主义学说

马恩最大的贡献是研究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人类最后要从必然的王国走向自由的王国,达到共产主义社会。《资本论》揭发了少数人占有大量社会财富而大多数人失去财富被迫出卖劳动成为赤贫者。这个矛盾最后只有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消灭私有制将财富归全社会所有才能解决。

怎样才能废除私有财产的制度呢?通过一次共产主义革命。《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明确提出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马克思认为破坏旧政权可以付之暴力,只用经济手段是办不到的,应当采取一些强制措施,在运动过程中一些“越规”避免不了。由此看来,资本主义不经过强烈斗争不可能进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①

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写明:“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第十七、十八、十九问题中也说:“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②

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大工业大市场已将全球各国统一成一体,这一国影响到另一国,所以共产主义革命起来就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一切文明国家,即至少在英、美、法、德等国家同时发生、革命将在世界范围内活动。^③

马克思着重于经济的转变,着重实行生产方式的变革,采取剥夺资本家的地产、征收高额累进税、废除继承权,并且集中信贷、垄断银行资本以及运输业等,把一切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并且对全社会实施公共免费教育,实行普遍的劳动义务等手段进行整个社会的改造。在社会全面转变过程中,马克思只提出对一切叛乱分子、流亡分子没收他们的财产。他说:“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

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⁴¹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不提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也不是把被打倒的阶级打倒在地后再踩上一脚使它永世不得翻身。无产阶级取得政权,资本家交出占有的工厂、银行与一切生产资料,地主交出土地,有产者既然失去所有剥削人的生产手段,也就变成一般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无异;而无产阶级在成为统治阶级后,他们得到政权、获得民主,实际上也就获得国家的一切财富,顾名思义,他们也就不再称为无产阶级了。所以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在消灭资产阶级过程的同时也消灭无产阶级自己,阶级就不存在了。结果代替阶级对立的旧社会的是这样一个联合体:“每个人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⁴²这个联合体的公共权力已不再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

马恩二人都是从激进民主主义变为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家,对资本主义封建专制主义抱有强烈仇恨,对剥削阶级的政治专横与经济压迫之间的联系有深刻的理论认识与异常的政治敏感,他们并且还有丰富的生活经历。他们对沙皇的专制、奥地利的梅特涅、法国的基佐这些独裁统治者表示极大的愤慨,要团结一切民主与社会主义力量一致反对他们,推翻他们的反动统治。但对无产阶级怀有无比的同情,愿意为他们的解放事业终身奋斗。马恩认为革命是各种情况集中必然的结果。无产阶级到处受到强力压迫所以会引起革命。革命不是用密谋发动,密谋不但无益而且有害,革命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完全有个别政党或个别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马恩从来不是专政的拥护者,而是最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但他们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同,认为工人阶级与民主派在联合共同推翻旧政权中工人阶级应有自己的阶级利益与独立组织,与民主派只能作暂时的联盟。马克思在1850年3月发表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同盟书》中提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有自己利益打算,在跟他们共同胜利的“最初一瞬间起”工人必须针对自己从前的同盟者,即针对着那个想要利用共同胜利来专门图谋私利的政党。因为他们只要新政权巩固一定程度立刻开始反对工人的斗争。所以马克思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很警惕,革命对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来说,他们只要求在旧政权范围内得到利益的满足,他们要求赶快结束革命,不愿前进一步以免引火烧身。而工人阶级的利益和任务却要不间断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阶级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⁴³马克思进一步对工人阶级革命的目的明确指出:“问题不是改变私有制,而是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⁴⁴

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之失败

二十世纪初,欧洲资本主义显露重重危机时,而俄国资本主义也有些发展,但还是落后的封建的以农业占优势的大国。1.6亿居民中1.3亿是农民。据1905年沙皇政府内务部统计:3万户地主占有土地7000万俄亩,1080万户农民只占有土地7500万俄亩,还有三分之一的农民完全没有土地,更无农具牲畜。⁴⁵农业工具只有铁耙木犁,还没有机械牵引,而地主榨取农民的地租达到收成的50%。农村贫穷农民艰苦,而工业相当落后,一战前生铁产量以人口计年只有30公斤,棉花3.1公斤;当时英国每人已达到铁228公斤、棉花19公斤,相差六七倍。至于电力机器制造刚刚起步,汽车化工根本没有。1913年的俄国几种主要工业的人均产量仅与当时欧洲最落后的国家西班牙不相上下。工业少却高度集中,工人阶级绝大部分集中在彼得格拉、中部及南方几个工业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皇政府横征暴敛,高压盘剥。国内矛盾加急,到处发生农民暴动,工人罢工反战,战争打不下去,他们需要和平、面包、土地。1917年爆发了巨大的全国性革命浪潮。

二月革命推倒沙皇成立了临时政府,同时建立了工农兵代表苏维埃。1917年3月全国共建立了555个苏维埃,出现两个政权对立局面,临时政府代表资产阶级的正式政府,不敢宣布帝制或共和,不敢决定战争或和平,他们只有依靠苏维埃力量的支撑,实际上大权已经旁落在群众手中。因此列宁在四月三日回国后看中形势对革命有利,立即提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列宁认为俄国资产阶级不能解决土地和平,只有工农群众自己起来解决。工农群众一旦掌握政权,就不再退却,而要继续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当时形

势发展使布尔什维克趁群众情绪不断高涨,把革命不断推向前头的。

列宁是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按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理论,东方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远远没有成熟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水平,列宁站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上,俄国是世界经济脆弱的一环,世界大战突出了俄国统治者脆弱的角落。列宁认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要从这里开始,推动多米诺骨牌,革命之火将引起资本主义欧洲各国连续革命胜利的支援。布尔什维克认为自己只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一支,胜利不能仅靠自己的力量。

1917年二月到十月的俄国形势是两大阶级两种前途的搏斗:一方是工农兵群众迅速走向革命;一方是以尼哥洛夫将军为首的军官团镇压群众的反革命势力在急亟发展,尼哥洛夫要建立军事独裁,与之相反,左派革命党为了摆脱独裁必须去夺取政权,尼哥洛夫的阴谋最后被拙败,十月群众夺权的胜利也就成为必然。

有人认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足,应该走发展资本主义道路。那末,二月革命后是否可能发展资本主义呢?1917年3月,临时政府召开立宪会议,当时有近4500万选民参加投票,规模已不小,而赞成立宪民主党的选民仅占5%,工农群众大都投票赞成走社会主义取向的党;其中社会革命党获票58.5%;社会民主党获票27.6%,可见在1917年那种形势,俄国要走资本主义,建立一个民主立宪议会的政体绝无可能。^⑨尤其在八月,哥尼洛夫叛乱后,群众情绪更加明显趋向左派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势力迅速膨大。列宁的头脑非常清醒,他明白当时的群众心理,站到群众前面提出适合群众的要求,他决不寄望于立宪会议的召开,愁恐错过时机,愁恐门什维克派、社会革命党人立场动摇,所以布尔什维克坚持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就起义夺取政权。

还在1917年3月,列宁从苏黎世写来第三封《远方来信》,提出苏维埃与公社合二为一,他说:“只有公社能够挽救我们,我们大家宁可牺牲,宁可去死也要把公社建立起来”^⑩他认为十月夺权正是布尔什维克走向理论实践之时机,克伦斯基政府不可能维持下去,现在必须实行“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宣布停战和平法令,没收土地归农民,真正解决人民“土地面包和平”的要求。

十月革命是不是搞早了呢?认为历史上存在革命的时刻表是可笑的,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摆脱地主资产阶级制度造成的危机,摆脱战争与经济破坏带给人民的重压,唯一的战胜途径就是夺取政权。但这个政权不再是压迫人的。是群众自己的政权。1916年列宁写道:“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必须实现充分的民主……不实现充分的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胜利……”^⑪政权归苏维埃,在苏维埃内部包容各个政党,不能否定民主的价值,列宁当时就认为今后社会主义的政府要从“一个苏维埃政党手里转到另一个苏维埃政党,无需经过任何革命,只需通过苏维埃决议,苏维埃代表的政选就可以实现。”^⑫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这种方法就行不通的。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拒绝担当反时派这一角色,退出苏维埃,苏维埃因此逐渐失去民主气象。

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与世界革命联系一起的,落后国家革命与建设只有取得先进国家无产阶级政治,军事,经济及道义上的援助支持才能解决。当匈牙利革命处于关键时刻,列宁,契切林不断收到库恩,贝拉来自布达佩斯求援的电报,列宁对芬兰,德国,波兰的革命斗争都给予热切的帮助与期待,1920年共产国际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说:“在苏维埃俄国尚未成为全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一个环节时,国际无产阶级是不会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的”(转引自1988年6月苏联《论据与事实》第23号),当年图哈切夫斯基签署著名的命令:“…我们将用刺刀给劳动人民带来幸福与和平。前进!向着华沙,向着柏林,前进!”^⑬在寄希望于欧洲革命的同时建议在东方点燃革命的烈火,陆海军人民委员部于1919年8月5日给党中央电报中建议在乌拉尔建立军事基地以援助东方劳动者,帮助印度劳动者起义。^⑭由此可知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是整个世界革命的构思,不仅仅限于俄国一国之内,最初的设想是努力建立一个欧洲社会主义联邦。从而解决俄国经济上的落后。当时俄国愿意尽量忍受对德之让步,与之签订布勒斯特和约,目的是拖延时日以待欧洲国家革命的爆发,俄德无产阶级共同胜利就能改变局面。列宁的思想“工人无祖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党。当第二国际考茨基们在世界大战中宣称保卫自己的祖国之后,列宁就确定考茨基们背叛了

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已死亡,建立第三国际团聚各国工人在新的国际纲领领导下进行斗争。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详细说明要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新的公社式苏维埃政权。这个政权的官员不是由上而下指定,要由群众民主推举,官员是人民的公仆,不是人民的主人,官员薪给不能超过熟练工人的工资。并且时时可以罢免。人人管理国家,人人是官僚也就没有了官僚,所以社会主义的机构就是有充分民主的机制。列宁的名言:“民主是官僚的消毒剂”。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国家以公社形式替代,将失去原来国家的意义,国家逐渐消亡。因为无产阶级处于生存最低层,受压迫最深,一旦翻身解放了自己,再不需要压迫别人的工具了。

根据列宁托洛茨基的概念,“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从阶级社会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桥梁,它只能是一个短暂时期。只是大多数人对极少数反动阶级使之改变成份所采取的非常手段;也就是在经济上政治上通过它消灭阶级的手段。一旦建成了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专政本身就不存在了。托洛茨基曾将无产阶级专政比喻作营造社会主义大厦的脚手架,社会主义大厦建成后,脚手架自然要拆走。列宁托洛茨基领导的十月革命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由于西方国家的革命没有成功响应以及中国革命相继失败,就整体来说革命没有成功。托洛茨基认为苏联不垮台即变质。苏联革命长期的孤立,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会蜕化。即出现官僚化热月政变。列宁的悲剧是资本主义发展远未达到垂死阶段,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渡过萧条期后进入新的繁荣期,资产阶级仍有足够力量恢复国家的统治功能,不断打败兴起的工人运动,无产阶级运动还无能力冲破国与国的界限取得欧亚大陆的联合。特别是科技迅速进步生产力高度发展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新的持久繁荣更使列托等思想家难以预料。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掌权,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又是一种概念。与列宁相反,放弃世界革命,认为俄国可以不用其他先进国家援助,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认为只要依社会主义经济图式把工业国有农业集体化,一切经济权力集中到国家手里,实施经济计划消灭私人商品经济流动就是社会主义,毋视生产力是否高于资本主义国家,毋视人民物质文化精神的条件。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将一切权力从群众苏维埃手中,渐渐转入党的手中,以一党专政取代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党的权力集中到政治局、政治局集中到总书记一人,最后总书记斯大林决定一切。这样一来大多数人的阶级专政重又回到几个少数人以至个人独裁。

斯大林掌握了最高权力,党政不分,建立起层层统治的封建等级制,所有官员由上而下委派,实行等级终身制,用集中上级信任名义取消民主选举。党的代表大会长期不开,权力归政治局。

一党专政,党内不存在反对派,国家不存在反对党,所有党的决议一致鼓掌通过,永远没有不同意见。反对党反对派都以叛国叛党定罪。采用政治警察格柏乌制度,从上而下对人民群从到处监督,实行回报、检举、洗脑、忏悔、保证等手段强迫改造,把活生生的人的思想头脑变成机器工具,整个苏联国家搞成大兵营,实行严刑峻法,到处是集中营劳改场精神病院、搞任意逮捕、思想洗脑、肉体消灭打击异己及反抗者,全面封锁消息,笼断文化。

苏联人民被剥夺了自由,不用说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连迁居择业也不可能,更谈不到罢工抗议出国等等。工人被作为附在机器上的螺丝钉,农民作为集体农庄庄员没有身份证也就等于庄园的农奴一样生活,劳动人民只有努力完成国家定额的义务,没有要求工资福利改善的权利,一切权力由上级领导决定。一切计划任务由上级下达,劳动人民须严守规则不得,违反劳动制度。不完成生产任务即是犯罪。

社会主义的主人不是劳动大众。一切胜利成果归功党的正确领导归功斯大林及其官僚集团,官僚们享受各种特权,国家一切财富名义上属劳动人民事实上为官僚阶层占有,过去工农阶级受沙皇资本家地主压迫剥削,现今不过转入国家官僚阶层名下而已。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攻,集中所有资金投入发展军事工业,逼使它与美英德日等国进行战备竞赛,耗尽财力物力,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异常缺乏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低下。更有利用战争之便,与资产阶级列强合伙分赃,如瓜分波兰,掠夺中国东北机器及东欧国家财富。凹现出大国列强侵略面目。

斯大林的理论：“社会主义建设越胜利，阶级敌人反抗越猖獗，阶级斗争越激烈，无产阶级专政越强”。结果到处是敌人到处冤狱成灾。三十年代不断出现冤狱，大量屠杀共产党内部领导骨干、中央委员，军事将领，这样大规模镇压空前未有。有谁相信社会主义国家这些领导骨干、老红军、老布尔什维克、老战友都是“人民的敌人”、“奸细”、“帝国主义的走狗”呢？

斯大林标榜自己为列宁主义，其实与列宁思想背道而驰。无论马克思或列宁都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旨是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发展，斯大林恰恰相反：一切人都要服从物；服从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实际上是为斯大林少数上层官僚占有的国家财产做奴隶。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最后还是矛盾突出而崩溃。

三、陈独秀与中国社会主义之路

中国人认识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十月革命的途径的。俄国革命的胜利启发陈独秀等知识份子要走十月之路。当时的中国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工农业十分落后的大国，走向社会主义还有很长的路，但列宁的国家已经做出榜样，我们国家也可效法。陈独秀认为“落后国家无产阶级能比资本主义先进国的无产阶级早些得到政权”是完全可能的。1924年陈独秀在《二十年以来国民运动的教训》一文总结说：“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而且是国际资本主义之天然对敌者，不但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他是主力军，即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国民革命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

中国历次运动起义参与者，仅仅是农民、手工业者或者革命的知识阶层，它们与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始终失败没有前途，其原因就是没有无产阶级坚强的领导。陈独秀提出无产阶级督战，是一次重大的认识提高。

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先天软弱，一出生就害怕他们的敌对者工人阶级，所以自己无法对抗帝国主义的压力，无法完成民族国家独立，使自己国家强大起来，因此解放的任务天然落到无产阶级头上。

陈独秀在南京监狱中说，组织中国共产党的目的就是最受压迫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和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的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气以革命怒潮求得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共产党最终目的是实现无剥削无阶级的自由社会。近代历史上的五四运动、二七罢工、二五——二七年大革命都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运动前头领导群众斗争夺取胜利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中国民众又一次进入民族存亡大搏斗，陈独秀在《热潮》发表坚决抗日文章，指责蒋介石政府“不抵抗”主义，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时时刻刻出卖自己国家的利益，工人群众要提高警惕揭穿他们反动妥协的阴谋。

七七事变起，陈独秀从南京监狱释放，他立即到武汉抗日高潮中心，在各大学演说抗日战争的意义，发表抗战见解，准备组织军事投入全民抗战中。陈独秀当时处境困难，但决心为国人共知，认为只要人民大众团结起来，民族革命就有希望。他说：“完成中国民族解放，已经是中国无产阶级自己的任务”。^⑥应该积极领导中国的爱国运动，一直到夺取政权。陈独秀接受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主张，落后国家的中国革命其民主民族革命将不断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直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民主任务民族独立才能全满解决。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提出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口号，围绕这个口号，使革命政党一步步公开合法，走向资产阶级政权的中心。国民会议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形式，无产阶级为完成民主任务必要争取参加进去。从历史上看，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出现的国民会议，英国宪章运动以及俄国二月革命时期都出现过国民会议，但资产阶级在会议上始终未能认真实行他们的诺言，他们根本害怕群众在会议上提出的利益问题，最后开动否决机器或以解散会议达到自私的目的。虽然如此，国民会议究竟可以作为宣扬无产阶级主张的讲坛。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土地”，“保证国家主权不受侵犯”等主张，使资产阶级理屈词穷，所以陈独秀说，无产阶级参加国民会议并非拥护现政权，而是利用合法地位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而是进一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作铺板。在极端反动的国民党统治下国民会议未必召开得成，提出这一口号意义在于结合群众，争取群众团结到革命政党周围来。

有人根据1923年陈独秀写的文章：“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国民党应该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说陈独秀承认资产阶

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承认资产阶级会胜利完成革命,是“二次革命论”者。人们应该知道那个时候,共产党都参加到国民党中,怎么可能强调革命应该由无产阶级领导呢?我们不能拿早期两篇文章断定陈独秀在整个革命时期的主张。其实他在1924年后就强调无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了。中国无产阶级既参加到民族民主革命中来就有可能争取领导权,就有可能领导农民反对封建地主进行土地革命,领导城市群众进行民主改革,陈独秀领导上海三次暴动就证明他的实际思想了,他是“二次革命论”者吗?

陈独秀接受了大革命时期的教训后,对中国革命进行了全面认真的思考,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中说明他的见解:

“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任务(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及土地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城市及乡村的贫民取得政权,才能彻底完成。换言之,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之完成,应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城市及乡村中都与帝国主义经济及现在的土地关系有很密切不可分离的联系,它决不可能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以土地给贫农,而且当革命高潮时必然坚决的反对工农运动‘过火’,无产阶级没有与他们合作的可能。其次,在城市中为推翻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的第二日即应进行没收中外银行及大工厂企业,打破私有财产制。在农村中,因为土地在资本家化的地主之手,富农多兼高利贷与商业剥削者的资格,是贫农与雇农仇视的中心,是农村贫农革命的对象,当然在乡村中更无与富农联合战线之可能;我们应该领导贫农,反对富农,使中农中立。当下次革命高潮初起时,我们即应动员群众为无产阶级专政奋斗……”^⑤

陈独秀这段总结指明中国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是同一模式,是城市无产阶级起来武装夺取政权。指出未来革命目标、策略、朋友、前途。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已密切结合在一起,农村富农将不会跟着贫农走,革命高潮到来无产阶级要团结贫农不断走向夺取政权。

无奈历史没有依照陈独秀愿望发展,蒋介石政权受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打击,城市经济从来没有恢复元气,而工人阶级一边受日本军阀铁蹄的奴役,一边受蒋帮官僚资本的盘剥,生活异常艰苦,城市区内革命组织长期处于白色恐怖下几乎摧残殆尽,战争带来中国农村彻底破产,农民被逼挺而走险,形成庞大农民革命巨流,农村成了反蒋反日的中心,中国共产党乘势而起。组织各方力量包围城市逐鹿中原,最后汇成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南京蒋家王朝在风雨苍黄中降下青天白日旗。历史还没有等待第三次城市工人革命高潮来临,而蒋氏江山已经变换颜色了。摆在面前的民族民主斗争失去机遇。1938年,陈独秀对托洛茨基痛心感言,“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倾向,我们一些人对民主革命不甚理解,怀疑国民会议口号,认为民族民主斗争不是无产阶级自己任务,无产阶级只有在苏维埃口号之下夺取政权,认为任何时期任何条件和其他阶级的党派协议共同行动对付帝国主义与国内独裁都是机会主义。……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他提出警告:“如果不能深刻觉悟过去轻视民族民主斗争的错误,大大改变态度,到群众中去做艰苦切实工作就没有希望。陈独秀虽躬身力行,奈阻力重重,无法挽回大局。”^⑥

陈独秀对苏联国家政权见解非常精辟,陈是十月革命积极拥护者,从来不反对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对苏联前后期有所区别,前期是列托领导的苏联讲劳动群众解放,讲世界革命,后期的苏联斯大林领导变成个人独裁的国家,成为大民族主义的列强。若说是社会主义是糟蹋了社会主义。上世纪三十年代陈在南京监狱时就说:“斯大林的个人独裁正在代替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专政,所谓‘工人国家’与苏维埃政权只有名义上的存在。”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元勋,就不堪思议了。

陈独秀特别对苏联政权的专制黑暗反动指出五大特点:(一)所谓苏维埃或国会选举均由政府党指定,开会只有举手没有争辩;(二)没有法制,秘密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杀人;(三)一国一党,党垄断一切,不容许别党存在;(四)人民思想言论出版绝对没有自由;(五)绝对不许罢工,罢工即是犯罪。以上五点,资产阶级国家都存在的民权利。而苏联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却禁止如此之严,所以如果没有内容上民主即使名为“大众政权”、“苏维埃制度”都是虚伪可笑。尤其苏联全国建立的秘密政治警察制度,毒化了自由空气,使人民党内外陷于一片恐怖之下,这种格柏乌统治与德意法西斯无异。陈独秀说,史大林的官僚政权、残暴、贪

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陈独秀说：“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有国有大工业、军队、警察、法院、苏维埃选举这些利器在手足将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用不着独裁来代替民主”。^⑧

经济上的社会主义与政治上的民主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不能把民主说成属资产阶级独有，资产阶级也并非真希望民主，社会的进步发展民主制度也就不断扩大不断完善。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范围有广狭而已。资产阶级议会制有缺陷，会成历史残影而民主不会过时。民主是人类六七百年斗争的结果，它是每个时代的旗帜，无产阶级更应张扬。列宁虽认为“民主是官僚主义消毒剂”当时也曾警觉，但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取消秘密警察，托洛茨基想到党内工会及各级苏维埃要求民主选举但都已太晚了，斯大林的个人独裁制已经控制一切。

陈独秀说：“十月革命是政治的成熟而非经济的成熟，苏俄虽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变更了财产关系，名义上称工人国家，实际上远远优裕过一般工人工资和生活的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还存在着，如此便不能够说已经走出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⑨

斯大林把消灭资本家富农生产关系国有化集体化就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建成，但生产力远远低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人民生活在贫穷的环境，谈不到社会繁荣昌盛，更无自由幸福，那就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要领风马牛不相及了。苏联经济发生五十年代衰退，七十年代停滞，以致占并周边国家土地，夺取其他国家资源与帝国主义军备竞争。人民不堪压迫，导致九十年代崩解是势所必然。

四、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的未来

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罗列了各种式样的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保守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空想的社会主义等等，这些都与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无关。

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建立在消灭人剥削人的真正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全面发展必然从有阶级到无阶级的自由王国，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否认阶级存在的必要性，它要消灭任何阶级，消除任何阶级的差别”。

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通过最后的斗争争得民主，自身得到了解放。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只是当还没有完全战胜资产阶级时期无产阶级必要采取的暂时手段。专政只能存在不长的时期，随着剥削阶级经济地位的改变而逐渐消亡。生产力提高，经济高度发展后，阶级社会将被公平合理的共产主义社会所替代，这是必然。

列宁依照马恩理想前进了一步，他领导的俄国革命已经打破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面，但未能继续前进，其悲剧在于没有全面理解资本主义制度顽强的生命力，列宁的时代资本主义还处于中期，强大的生产力远没有发挥出来，无产阶级不可能推翻这个制度。

斯大林企图在一个经济远远落后的国家用封闭的方法建立社会主义，无视世界生产力高度，无视人民的自由意志，还是达不到消灭阶级全民富裕，企图以党代替无产阶级，卢森堡说所谓工人阶级绝不是一个七人和十二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而是有觉悟的群众本身。以国家暴力进行统治与建设，最后垮台是意料中事。

前世纪1927年中国在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中，中国无产阶级也曾有过夺取政权的机会，当时中共紧跟莫斯科指挥，由于过分信赖资产阶级联合战斗而中途受到国民党资产阶级叛变而失败。原因还是主客观不成熟。即使无产阶级夺取成功，或可与俄国革命连成一体使世界革命走向另一高潮，阻止苏联政治的改道，这仅是一种设想而已，当时中国革命如果孤立发展，结局亦不过出现另一苏联，其艰难可知。1949年中共以军事胜利夺权成功，建国后兴起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把全国人民组织到公社中来。从经济结构看，共产主义在中国已经建立，中国与苏联一样不存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但为什么不能提高生产力出现全社会繁荣；为什么最终还是把许多国营工厂农村公社解散退还给私人个体呢？不存在地富反坏右的破坏，而是在一穷二白的落后基础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生产结构的发挥。尽管社

会主义的思想规划如何宏伟仍是唐吉珂德与风车之战,历史老人告诉我们,伟人的理想只能在现实条件基础上运行,离开它,一切即成泡影。

二十一世纪人类已经进入讯息时代,当年列宁认为苏维埃加电气化就等于共产主义,现在,世界有上百成千个卫星上天,人类可以登上月球,可以与更远的外星球联络,通过卫星可以掌握地球任何角落一点,哪怕是荒漠或是海洋。最僻远的地区与最繁华的中区瞬息可通,纳米技术激光技术克隆人都成事实,如果以现代科技生产力水平什么难题都能化解。世界人口六十亿,供养改变人类生活全球进入共产主义决非浪漫之想!为什么现代世界还不能实行共产主义呢?为什么会有这样或那样阻挠呢?还是少数人私人占有与多数人失去所有财富之间的矛盾没有解决,少数人或集团千方百计维护私有不惜制造战争造成最大破坏。冠冕堂皇后面隐藏着卑劣的秘密,但人类最终会是以理智解决这个问题的。

恩格斯不反对用和平的方法废除私有制,十九世纪后期就武器的发明,恩格斯认为要重新估计巷战之价值。现今火箭导弹杀伤力可以顷刻间夺去上亿或几亿人的生命,如果统治者内部不崩裂,手无寸铁的民众暴动巷战可能性更少,统治阶级对付群众的手段越来越严密了。当年赫鲁晓夫说及革命在现阶段不能只有暴动一种方式,革命的阶级可以通过合法的议会斗争取得政权,西方先进国家有一定民主基础,配合合法的议会斗争势在必行。但也有学者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已有很大的适应性,资本主义内部社会主义因素越来越多,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即是说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毋需革命自行改进就能进入社会主义,也有认为资本主义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有,社会主义不一定以公有制为特点,社会主义可以承认私有制存在,只要生产工具与生产者不分离就是社会主义,等等说法纷纭。这些与马恩说的消灭私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由此消灭阶级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差距甚远。也许马恩设定的社会主义离开目前现实还很远,不可能一蹴而就,但这个目标是人类在理念上应当到达的彼岸。上述所谓社会主义只能属于走向马恩‘社会主义’之前的阶段。

注释:

- ①马恩选集:第一卷《共产党宣言》P. 272,1972 年版
- ②马恩选集:第一卷《共产主义原理》P. 219,1972 年版
- ③马恩选集:第一卷《共产主义原理》P. 221,1972 年版
- ④马恩选集:第一卷《共产党宣言》P. 273,1972 年版
- ⑤马恩选集:第一卷《共产党宣言》P. 273,1972 年版
- ⑥马恩选集:第一卷《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同盟书》P. 385
- ⑦马恩选集:第一卷《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同盟书》P. 385
- ⑧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 12 卷 P. 552,《俄国革命》,1988 年版社会科学出版社
- ⑨《十月的选择》P. 41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7
- ⑩《列宁选集》第三版第 32 卷,人民出版社 1960,P. 134
- ⑪《列宁选集》第三版第 2 卷, P. 561—562
- ⑫《列宁选集》第三版第 3 卷, P. 367,P. 355
- ⑬《十月的选择》P. 300
- ⑭《十月的选择》P. 302
- ⑮《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 P. 235,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 ⑯《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 P. 118,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 ⑰《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 P530—532,《致托洛斯基》
- ⑱《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 P. 555,《给西流的信》
- ⑲《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 P. 519,《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
- ⑳马恩选集:P. 219,《马克思论波兰问题演说》

陈独秀对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认识和反思

黄 公 演

一、陈独秀对后期苏联的认识

陈独秀晚年，认为斯大林模式的社会制度，不能被称为社会主义，他的认识的立足点在于这样的命题：“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他所说的民主，是有具体内容，不像一些人也整天高谈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但从来不将民主具体化，说说民主到底有哪些内容。陈独秀在《我的根本意见》第九条中说：“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在该文第八条中，他又说：“‘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和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总之陈独秀将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总结为：党内无派，党外无党，格别乌权力凌驾于国家正常的行政权力，凌驾于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是直接为斯大林个人御用工具，苏联不再是社会主义而是官僚专制政权，后期苏联若还被称为社会主义，那是糟蹋了社会主义。

不过这里应该提出，陈独秀在论述后期苏联不再是社会主义时，还牵涉到其他一些问题：

(1)陈独秀认为斯大林专制制度是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政制的逻辑发展，是制度产生斯大林，不是斯大林产生专制制度。因此要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

(2)陈独秀认为“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

这些话都合乎陈独秀的性格，表明他从来不马首是瞻、有主见。这也说明为什么他总是走在历史前面，而不是被历史拖着走的角色。这些话却被现时一些人所赞扬。自苏联解体以后，世界上出现一股反十月革命反列宁和反“无产阶级专政”的暗流。中国现在也不乏这些人，这些人中有的曾将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作为个人理想信念，已经下定决心为之奋斗终生，也打算作出个人最大的牺牲，甚至自己的生命。苏联的解体与东欧那些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消亡，使他们绝望，最终将马克思主义也说成为“乌托邦”。他们来一个180度的转变，否定十月革命，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列宁，将斯大林主义的罪恶，也记在列宁的帐上，他们也企图将陈独秀也拉下水。

陈独秀的说法与这些人的观点，当然有本质上的不同，我认为陈独秀对十月革命后苏联实际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他自接受马克思主义，他所关注的重点是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1923—27年大革命失败后，如果不是经从莫斯科回来的反对派人员的介绍，他连苏联存在左派反对派和他们曾为中国革命问题与斯大协当权派争论斗争的情况也不知道。这些党内应该有派，党外应该有党的民主思想，首先也接受于托洛茨基。

我想在这里有必要说说下面的一些情况。

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

陈独秀说：“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这话被人用来证明为陈独秀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

现代人经历了斯大林的专制统治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后，都纷纷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至少也表示厌恶，因为斯大林主义者都是挥舞着“无产阶级专政”大旗，从事胡作非为。而陈独秀并没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大家都很熟识他在狱中对西流就过：无产阶级专政专政资产阶级反革命他举双手赞

成。他所反对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专到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头上来。他在“最后意见”中说：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有国有大工厂、军队、警察、法院、苏维埃选举法，这些利器在于，足够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从这里可以肯定：陈独秀也主张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也必须镇压，军队、警察、法院这些本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那么我们怎样理解“无产阶级独裁从来没有”这句话呢？问题很简单，这话是针对斯大林政权而言的，他告诫我们，切莫不要将斯大林政权称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政权从来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它是党专政，最终还是斯大林独裁。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我还要说几句。

马克思主义的命题：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当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后，总要建立起一种政权，总不能像无政府主义一样，主张革命后不要政权。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政权，我们不要命名。这政权建立后即实施广泛的民主。如果这个实施广泛民主的政权遭到资产阶级反革命攻击的时候，将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办法呢？这里我想起俄罗斯寓言：当一头贪婪的猫偷吃桌子上厨司刚烧好的鱼时，这位厨司站在桌旁，对着这正在津津有味品尝鱼味的猫大发议论，他企图以语言说服它不要再吃这条不是预备给它烧的鱼，这头可爱的猫，并不领情。我们怎样去评论这位可敬的厨司呢？除了说他是“白痴”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评价！？这个刚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民主政权，遭受到资产阶级反革命攻击时，当然要进行反击、镇压。这时候的这个无产阶级政权，实质上就是对资产阶级反革命实施专政。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将这无产阶级民主政权一开始就命名为“无产阶级专政”呢？实质上“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就有两方面的含义：对敌人施行专政，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实施广泛的民主。

三、早期苏维埃自由

为了解决陈独秀所说的斯大林专制制度是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实施政制逻辑发展问题，有必要回顾苏联早期历史，即早期苏维埃自由问题。

日本学者藤井一行曾发表过《早期苏维埃自由》(天益社区网)。他例举事实和数字证明早期苏联是存在广泛自由民主的。虽然早期苏联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但决不是专制制度，多少年来人们认为“一党专政”被当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之一是完全错误的。藤井一行说：“在马克思、列宁的蓝图中，没有一句话表示社会主义必须实行一党专政，苏维埃俄国和苏联第一部宪法，也没有过一党专政或共产党的绝对领导的条款。无产阶级的第一个政权巴黎公社为例，当时允许多个派别的‘俱乐部’——政党的雏形，合法活动……在当选的64名的公社委员中，普鲁东分子20人，布朗基分子21人，新雅各布宾主义者及无党派分子20人，只有龙格一人是马克思主义者”。藤井还告诉我们：“苏维政权从成立时起，就是以多党制出发的。以起义后当晚召开的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为例，在开幕前649名代表中，布尔什维克390人、社会革命党193人、孟什维克80人……另外还有一些波兰社会党人、乌克兰社会党人及无党派人士”。“直至苏维埃第五次代大的在1425名代表中，布党868名、孟什维克10名、社会革命党左派470名、无政府主义7名”：藤井又说：“这些政党不但在苏维埃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还进入政府同布尔什维克联合执政。在实际领导起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五人常务局中，就有两人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这些党派所发行的报纸也合法存在，被没收和禁止发行的只是资产阶级的报纸。

除上述的日本学者所提供的材料外，从列宁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到相应材料。列宁在1917年起草的法令中提出在苏维埃实施“……承认党派和通过有组织的政党进行选举。”“今后政府由一个苏维埃政党手里转到另一个苏维埃政党手里，无须进行任何革命，只要通过苏维埃的决议，苏维埃代表的改选就可以实现”(《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第3版3卷335页)。

四、与布尔什维克党合作的党派最后结局

其他党派与布党联合执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现在继续以藤井一行所提供的资料进行论述。

这些党派由于立场观点不同，时常反对布党和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只要这些反对苏维政府、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停留在和平的论战上，当初就不禁止其存在。如1918年到1922年期间，具有各式各样思想倾向的无政府主义者，以自己的出版物和集会上展开反对苏维埃政权及政府的活动，布尔什维克方面仍

然以论战来回答。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因为在各地勾结反革命军队组织进攻苏维埃政权的事实已经确凿无疑,1918年6月,全俄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决定将其代表开除出执行委员会,并建议地方苏维埃将他们从各苏维埃中驱逐出去。右派社会党人在同年2月8日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放弃与苏维埃政权进行武装斗争,反对外国的干涉战争,号召自己的组织同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做斗争。1919年2月2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取消对采取这一立场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上述开除决定,给予其参加苏维埃活动的权利,并建议有关行政、审判机关释放被拘留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也在1918年10月的会议上承认苏维埃政权,也重获合法地位。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的分歧使左派社会革命党领导诉诸武力。和约缔结后,他们首先退出了人民委员会(但仍留在政府各部委和肃反委员会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6月份计划在预定于同年7月召开的第五次全苏维埃大会开会期间在莫斯科举行暴动,企图逮捕苏维埃政府部长,并决定以暗杀德国大使为发难信号。在第五次苏维埃大会会议的第三天,政变开始,德国大使被杀。但政变失败,出席大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团被逮捕,没有参加叛乱与叛乱无关的不但释放,而且被允许出席再次召开的苏维埃大会。1918年年底,左派社会革命党宣布停止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对抗,重新获得合法地位。虽然左派社会革命党宣布停止武装对抗,但它的党员们的反革命行为并没有停止。

这里还应补充一点,1918年6月20日,决·洛达尔斯基——著名的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党员遭社会革命党组织“中央战斗队”暗杀,8月30日,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莫·索·乌尔茨基被刺身亡,同一天,社会革命党人暗杀列宁,列宁身受重伤。

1921年3月克朗斯脱得叛乱,几乎所有的反对派都参加了这场叛乱。几百名著名的孟什维克被捕,也逮捕了社会革命党人。1922年3月,俄共十一大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才决定“应当剥夺一切敌视苏维埃政权集团的组织”,俄国共产党才成为国内唯一合法政党。藤井一行认为“少数党的消亡主要是由于他们自身的原因:诉诸武力反对苏维埃,勾结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自己堵死了通过对劳动人民的影响为多数党的道路”。

当时大家都认为苏维埃政府取缔其他政党是迫于局势的措施,同对几经反复,如果陈独秀全完彻底了解苏俄当时这种实际情况,决不会去归罪列宁和托洛茨基,也不会说要重新去估计布尔什维克理论及其领袖的价值了。

斯大林独裁以后,不要说这些政党的命运了。连列宁的近卫军——老布尔什维也遭到无情的镇压!但过去一些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分子,倒成了斯大林的座上客,有成为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家”的,有成为斯大林的打手,如马尔托夫和维辛斯基。维辛斯基不遗余力地参与镇压、杀戮老布尔什维克的活动,这也许是历史的宿命,斯大林的叛卖,也给予这些人报复布尔什维克的机会。

一党专政也变成了铁的事实,成为苏联宪法中占着特殊地位的条款了。

这里还需说明1921年3月苏维埃政府镇压克朗斯脱得水兵叛乱问题。不仅过去的资产阶级分子,就是今天某些学者先生们,也拿克朗斯脱得事件来证明列宁党的专制和残暴。关于克朗斯脱得事件,在香港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上,可以找到托洛茨基论述该事件的三篇文章。在其中一篇文章中托氏说:“克朗斯脱得在革命史上写了英勇的一页。可是内战开始,不断地调走克朗斯脱得的老人,也调走整个波罗的海舰队中的人。早在十月起义的日子里,克朗斯脱得水兵组成的队伍已被派出去援助莫斯科。……但是早在1918年,无论如何不会迟于1919年,各条前线上就开始抱怨说、‘克朗斯脱得人’的新的派遣队不能令人满意。他们需索多端,不守纪律,在战斗中不可靠……”托洛茨基说:“留下来大多是政治不可靠,对内战没有什么用处的人……我们自会看出克朗斯脱得暴动不是别的,它只是小资产阶级对于社会革命的艰苦和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严峻所进行的一次武装反动罢了”。托氏在文章中又说:“俄国的乃到外国的一切反动派立即抓住了这个暴动,白俄侨民要求给暴动者以援助。这次暴动如果胜利,不管水兵们的头脑中是如何想法,结果总是只能带来反革命的胜利。……因此这个暴动具有反革命性质。同时因为暴动者拥有要塞中的武器,他们只能用武器来扑灭的。”

五、党内无派与赤卡

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的传统就是允许党内有派别存在,党内允许不同意见存在,不同意见可以争论,同时在党内报刊上可以发表不同意见。这些在习惯于一个声音,一个调门,一定要与中央始终表持高度一致的人听来,会觉得不可思议,也许会认为是“天方夜谭”!解决争论也不是依党或政府的行政手段,而是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但少数意见不得抹杀,而要保留,并允许在下次会议上再行提出重新讨论表决。十月革命后面临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对德和约问题,当时党内有三派不同意见:列宁的意见要立即与德签订和约,因为“和平”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前对俄罗斯人民的许诺。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左派主张战下去;托洛茨基则主张不战不和。三派意见的前提都是寄希望于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第一次表决结果,列宁的意见为小数。后来托洛茨基放弃了自己的主张而投了列宁的票,列宁的意见才得以通过。党在讨论是否举行无产阶级暴动时(这是十月革命前夕的事),党内也有不同意见:列宁主张抓紧时机立即进行无产阶级武装暴动,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尼夫则反对。以后关于工会问题……都有不同意见而发生争论。总之,列宁一生,对党内不同意见,都是以民主方法去解决,从来没有压服或行政手段去解决。

因为国内和国际形势的恶化,在党的第十次代表会上,党决议暂停党内派别活动,但仍允许不同意见进行争论。托洛茨基也投了赞成票。当时这“应急”措施,的确是埋下了便于斯大林独裁的祸根,但这不能说斯大林独裁是这些措施的逻辑发展。

十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肃反组织“格别乌”,当时也称“赤卡”,它的任务当然是同资产阶级反革命作斗争。它集侦察,立案拘捕和审判于一身。“赤卡”的副主席还是左派社会党人,布勒斯特和约签字后,左派社会党人退出了政府各人民委员会,但没有退出肃反委员会。内战结束后,列宁就要求赤卡工作纳入法制轨道。斯大林执政以后,格别乌才变成斯大林陷害和镇压他的反对者的工具。使格别乌权力凌驾于国家政法部门与党中央、政治局。成为斯大林个人御用工具。

纵观苏联的历史,由于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立中,且国内形势恶化,列宁党后期的确对自由民主作出了一些限制。即使有所限制,还是十分宽松的。列宁曾大声疾呼:“同志们!别争了,现在不是时候,我们的措施是暂时的,一旦局势允许,立即解禁”(参见藤井一行的《早期苏维埃自问》)。由于斯大林的个人权术要求,才将各项本来属于临时的应急措施,推向极端,对苏联人民进行血腥统治,苏维埃制度蜕变为专制独裁政体。

再回过头来谈谈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陈独秀认为是苏维制度产生斯大林独裁制,不是斯大林产生独裁。上面的所论述苏联的经历,应该可以说已回答了这一问题。但为了彻底弄清楚问题,还需要再说几句。强调制度的作用,一般说是无可非议的,但某一历史演变中单纯地强调制度的作用还歉不够,有时候个人性格对历史的作用不能忽略不计。现代人经历了斯大林专制血腥统治以后,向往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的确,议会民主制虽然被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评为“资产阶级政客的清谈馆”,但比起斯大林模式的苏维埃好千百倍,在斯大林的苏维埃里,除了有“暴风雨般的经久的掌声”和“一致通过”外,别的什么也没有了。就是这种被人们所推崇的议会民主制,则开了一次严重的历史玩笑:使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登上国家元首的宝座。这能说是制度产生法西斯么?所以马克思说:“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偶然性’,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那些人的性格这一种‘偶然性’”(《马恩书信选集》第389页)。

六、陈独秀最后的总结

1942年5月27日,离他逝世只有十四天的日子,他发表了《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一文。他在文章中说:“……所以我认为,在资本帝国主义的现世界,任何弱小民族,若企图关起门来,靠自己一个民族的力量,排除一切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实现这种孤立的民族政策,是没有前途的。只有和全世界被压迫的劳动者,被压迫的落后民族结合在一起,推翻一切帝国主义,以分工互助的国际社会主义新世界,代替商品买卖的国际资本主义旧世界,民族问题便自然解决了。”

“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是要根本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统制”。

这些是陈独秀文章中的观点,是百分之百的他晚年的观点。这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国际主义的观

点。由于从苏联的蜕变中取得了教训,因此他反对“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他主张的是“不断革命论”观点,也就是完完全全的托洛茨基主义观点。

这也是对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前途的预言:“以实现这种孤立的民族政系,是没有前途的”。苏联的解体证实了他的预言。

文章还接着写道:“十月革命是全俄大多数人民集合在共产党‘解放劳动者’、‘解放农民’、‘解放弱小民族’三大旗帜之下成功的。革命胜利后,三样一一实现了,并非是俄国共产党人的空头支票,并且对外把帝俄时代被压迫国的不平等条约自动宣告废除。把它在被压迫国家的特殊权利如租界,领事裁判权等等,……宣告放弃了。所以当时全世界劳动人民,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都看着莫斯科是全世界被压迫者的灯塔,是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参谋部。”这是陈独秀最后对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理论及其领袖的价值估计。

但陈独秀再三强调:“将后期苏联称为社会主义,是糟蹋了社会主义。”

晚年陈独秀是怎样坚持马克思社会主义信仰的

高国发 张 同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晚年陈独秀是否坚持信仰问题一直存在分歧。近几年新出版的陈独秀传记著作,说陈独秀晚年又回到五四时代的民主主义中去;“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放弃了一切主义”、“实质上是接近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等等。我们也是研究陈独秀的,却没有形成这种结论;与此相反,我们的结论却是:晚年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信仰,不但没有抛弃和背叛,而且做到了坚持、捍卫和发展,从而使陈独秀晚年的思想更加辉煌更有生命力。下面是我们的论述。诚望入会的各位学者给予批评和指教。

一、晚年陈独秀仍坚持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规律

陈独秀在创建中国共产党前夕,就已经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说他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在今天陈研队伍中已是常识。我们几年前曾发表过两篇这样的专论。俗语克们只论述晚年陈独秀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

陈独秀于1942年5月逝世于江津。逝前四年,即1938年他发表《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的著名文章,刊于这年8月24日《政论》旬刊第一卷23期上。^①从时间上可以确定,这是陈独秀晚年的文章。文章表达了陈独秀的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首先,陈独秀论述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他以为资本主义发展,就是大工业的发展,生产力的大发展。生产力大发展使生产资料更加集中在私人手中。资本主义这种私有制度与社会化大生产不适应并发生尖锐矛盾,破坏着生产力。他指出,“聪明的人类,乃企图设法修改自己的缺点,即废除束缚生产力的财产私有制,以国家计划生产代替私人自由竞争,使社会生产力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这便是社会主义制的根本意义。”其次,陈独秀认为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也可以取代资本主义。他指俄国,资本主义虽没有欧美资本主义那样发达成熟,但毕竟有了资本主义发展基础,有了初步的工人阶级。他指出“十月革命本是政治的成熟,而非经济的成熟。”因为有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工人阶级迅速形成,才能在比西方落后的经济条件下,使社会主义胜利。当然,陈独秀也指出这样因政治首先成熟的社会主义胜利,国家要补上经济发达成熟这一课,消灭资本主义以至封建主义的痕迹。第三,陈独秀认为中国必须走俄国革命之路,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中国经济类似俄国不发达,甚至远落后于俄国。他指出“社会主义对于生产力之增高和人类幸福,都好过资本主义制,为取法乎上计,我们为什么不应该采用社会主义制来发展工业?”第四,陈独秀认为不要害怕资本主义。他从总结角度指出,近代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斗争中失败,“并非证明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好过社会主义”,“原因在于没有集中的大工业,因此没有能够领导一般平民执行社会主义任务的产业无产阶级政党。”“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经的过程。”资本主义发展,才有大工业发展,只有大工业发展,经济才成熟,促进政治的成熟,清除旧社会的落后性,“才能开辟新社会的道路。”可见,陈独秀分析论述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既充满历史唯物论,又充满历史辩证法。

二、在分析是中国国情批判民粹主义中表现了坚定的科学社会主义信仰

1938年8月,亚东图书馆出版《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6集。期中有陈独秀1938年7月在重庆民生工司的讲演稿《资本主义在中国》。^②这是一篇关于中国抗日时期国情的精彩讲演。

陈独秀认为,抗日的中国,还不是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性质而言是“初期资本主义国家”。根据初期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不成熟的国情,中国只有先搞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资本主义共和国,然后发展工业,待经济政治条件成熟了再搞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他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是必经阶段,不可跳

跃过去。他批判民粹派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企图超越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是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的。他批判俄国民粹派,首先阐述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出“我们所相信之社会主义,乃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它的特质是废除私有及生产集中,和固执私有及均产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不大相同”。他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制比资本主义生产制有更高度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条件只有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够生长起来。即使像布尔什维克那样,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不成熟,由于政治上首先成熟,而实现了社会主义,那也如列宁所说“俄国工人吃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中国更是如此。这说明,社会主义即使提前胜利了,也必须补上经济发展成熟这一课,不能让中国工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吃工业不发达之苦。

这里我们知道,陈独秀对抗日中国社会性质、国情及战略步骤的分析,与毛泽东的分析大体一致。特别是对抗日后的中国补上资本主义课后走上社会主义通路,没有丝毫怀疑。笔者读的书很有限,真不知当时中国还有谁像陈独秀、毛泽东一样把国情和两步走战略讲的那么清。

三、在批判护国主义中坚持和捍卫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

1938年8月21日亚尔图们馆出版了《告日本社会主义者》,同样表现了晚年陈独秀的坚定社会主义信仰。^⑨

由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国抗日各党派,团体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们倒向日本政府一边。即使有名望的山川、佐野和铃木茂三郎等,也都由社会主义转向护国主义,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中国社会主义者自然地要揭露批判这种机会主义的护国主义。可是日本社会主义者却说什么“在中日战争中,只许中国社会主义者考赞助爱国运动,而我们日本社会主义者转向爱国主义就应该被斥责吗”?

针对日本社会主义者的护国主义错误思想,陈独秀回答:“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即令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全世界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者(战时两方面的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者,自然都包含在内)也应该援助这一反抗战争。本是我们科学社会主义者前辈自己所曾经实践的遗教,而今天我们的日本同志背弃了前辈社会主义大师的遗教!”从文章此时用惊叹号来看,陈独秀对日本社会主义者变成护国主义者是多么气愤。

陈独秀指出护国主义的要害是“不把建设社会主义立足在革命国家间分工互助上,而立足在预先占取资源以争胜。这是中国旧时大家庭各房媳妇抢着‘积私’的丑态,还配谈什么社会主义建设!”“欧洲资产阶级御用的所谓社会主义者的背叛行为,日本社会主义者也都学会了。”这就揭穿了日本社会主义者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政府的侵略帮凶的可耻嘴脸,他们的护国主义,就是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背叛。

陈独秀在文中最后阐明中国社会主义者严正的立场,告诫日本护国主义者:“如果许我们做一个荒唐的假定,中国战胜日本后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日本时,则中国社会主义者,便应该首先反对本国政府,赞助日本政府及人民对华抗战!”同样用这个惊叹号,使我们知道陈独秀作为一个中国社会主义者代表,是多么理直气壮、态度严正、掷地有声。这位游离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大抗日党外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者,品德是多么高尚而光辉!

四、在同托派论战中坚持捍卫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

1937年陈独秀出狱后,已经脱离托派组织。他已宣布,不代表任何党派。但是由于历史问题的联系,陈独秀与个别托派成员,乃至托派领导托洛茨基都通讯研究抗战中党派关系。这是一位学者出身的领袖人物的特点。陈独秀的性格坚定、明朗、穿透性强。在同托派研究实际问题中,不能不表现论战姿态。他同托派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出现分歧。在对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托派反对,陈独秀拥护;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问题上,托派反对,陈独秀拥护;在抗日战争中,托派主张直接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则主张两步走,先民主革命,然后社会主义革命。托派自以为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妄图依靠第四国际支部的名义,闭起门来自立为王”,实际上成了“关门主义的极左派小集团,可以看出,陈独秀一点都不回避,一点都不客气。

托派朋友们论战不过陈独秀,竟然攻击陈独秀,说陈独秀否认苏联社会主义,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背

叛。陈独秀则有理有据地说,后期苏联是官僚集团专政,实行独裁,没有民主,苏联社会主义已中途变质。从总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历史教训的角度,批评了托派对斯大林的迷信。

陈独秀与托派论战,既有理论勇气、理论基础、现实根据,又有政治勇气、政策水平。托派朋友孙洪伊和明秋原先生希望陈独秀跳出马克思主义圈子。陈独秀则在1941年1月19日《给Y的信》(即给何之瑜的信)^④中,批判孙、胡“乃彼辈一向之偏见,不足为异”。

这从反面证明陈独秀是在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为了说服人教育人,陈独秀更重于对事实进行科学分析,并不把马克思主义当永远不变的教条。陈独秀说“自来之论,喜根据历史现在之事变发展,而不喜空谈主义,更不喜引前人之言以为主论之前提,此种‘圣言量’的办法乃宗教之武器,非科学之武器也,”陈独秀说:“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极及其领袖(列拖在内)之价值,乃根据苏俄二十余年的教训,非拟以马克思主义为尺度也。”看看想想,这种不唯书,不唯上,不唯名和权利的实事求是态度,不正是我们党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吗?这种思维方式不正是我们党长期坚持的思想路线吗?陈独秀在同托派论战中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不但在陈独秀个人历史上。就是在中国革命史,中共历史上也是一大亮点。

五、在揭露批判后期苏联假社会主义中坚持捍卫和发展社会主义

1940年9月和1941年11月,在同托派论战中,陈独秀先后写了《给西流的信》和《我的根本意见》。^⑤这是两篇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重要著作,标志晚年陈独秀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信仰显现了新的辉煌。

陈独秀指出:“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当我们读书看到这句话时,哪怕只见到这句话,也就不应给陈独秀加上“抛弃一切主义”的坏名。陈独秀把社会主义看作“天才的发明”、“宝贵”,这哪里有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影子呢?

陈独秀批判后期苏联,指出它是“中途变质”的假社会主义。用什么作为评判标准呢?民主。民主是区分真假社会主义的试金石。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后期苏联实行领袖和官僚集团专政,搞独裁,废民主,背离科学社会主义。他列出许多现实的根据加以论述,令人信服。陈独秀认为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就没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他指出:“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不过是“世界列强之一而已”、“早已离开了社会主义”。“硬说它是社会主义国家,便未免糟蹋社会主义了!”又是一个惊叹号。表明陈独秀在写到这里时的心境,是多么充实、自信,批判的多么透彻,捍卫科学社会主义的气度多么坚定英勇!

当然,笔者也了解国内许多学者反对陈独秀对后期苏联的评价。这也是当前学术前沿的重大分歧。研讨,是探索真理的台阶呀,越研讨越明确。我相信这次研讨会上,还会有揭批后期苏联假社会主义的论文。而且会论的更深刻、更有说服力、对今天搞社会主义都会有巨大指导意义。

六、在论被压迫民族前途中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信仰

1942年5月13日,即陈独秀逝世前14天,陈独秀写出一生最后一篇文章《被压迫民族之前途》。^⑥文章反映出,陈独秀至死都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者。

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激烈进行。国际上阵营明显,德意日一方,英美俄一方,具有世界主宰性。战争把许多落后的民族拖进了去。就经济不发达不成熟的条件而言,落后民族在战争中谈不上实现社会主义。陈独秀指出:“在今天,落后民族无论要发展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都非依赖先进国家不可。只要不是民族夸大狂的人,便能够认识这种命运。”“如果有一个领导国际集团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于纳粹失败后的德国,先进国和落后国不久便会融成一个社会主义的联邦。”

我们回顾二战历史,看陈独秀的分析和预见,虽然没有出现一个社会主义联邦,便确实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这里我们不是抓抓住陈独秀预见对多少,对不对,而是要抓住预见中的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在那样战乱中,陈独秀仍然相信可能出现社会主义新国家。一个伟人,变成一个落魄的学者,临死前还期望被压迫民族掌好自己的航船之舵,有条件就去实现社会主义。这颗伟大高尚的心灵,迟早会被中国全世界

历史的所承认所敬仰。

《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一文，又一次从总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角度，概括苏联的历史功绩和历史教训，陈独秀赞成前期苏联，赞成十月革命道路，指出，“当时全世界劳动人民、全世界被压迫民族，都看着莫斯科是全世界被压迫者的灯塔，是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参谋部。”陈独秀批判后期苏联“中途变质”、“站在俄国民族利益的立场”、“放弃了世界革命为中心的政策”、实际上成为“世界列强之一”。

陈独秀能在 50 多年前紧密结合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教训、揭开后期苏联中途变质的秘密是在于独裁、取消民主。实际上，陈独秀是为如何巩固发展社会主义指明了前进的道路。试问，中国有陈独秀这样的共产党创始人，有他这样的学者和思想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不应感到自豪吗？陈独秀还不应当在中国大地上，在他亲自创造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里站起来吗？

注释：

- ①张勇通、刘传学编《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四川人民比版社、1980 年 12 月第一版 、第 170 页。
- ② 同上、第 145 页
- ③同上、第 165 页
- ④同上、第 208 页
- ⑤ 同上、第 195、203 页
- ⑥同上、第 228 页

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思想的论述

安庆市陈独秀学术研究会 李银德辑

男德道：“世界上的物件，应为世界人公用，那铸定应该是一人的私产吗？那金华贱不过拿世界上的一块面包吃了，怎么算是贼呢？”

1903年译《惨世界》第七回

引自苏曼殊全集第五卷第133页

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

《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

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可谓之反对近世文明之欧罗巴最近文明。其说始于法兰西革命时，有巴布夫(Babeuf)者，主张废弃所有权，行财产共有制(La communauté des biens)。其说未为当世所重。十九世纪之初，此主义复盛兴于法兰西。圣西孟(Saint-Simon)及傅里耶(Fourier)，其最著称者也。彼等所主张者，以国家或社会，为财产所有主，人各从其才能以事事，各称其劳力以获报酬，排斥违背人道之私有权，而建设一新社会也。其后数十年，德意志之拉萨尔(Lassalle)及马克思(Karl Marx)，承法人之师说，发挥而光大之，资本与劳力之争愈烈，社会革命之声愈高。欧洲社会，岌岌不可终日。财产私有制虽不克因之遽废，然各国之执政及富豪，恍然于贫富之度过差，决非社会之福；于是谋资本劳力之调和，保护工人，限制兼并，所谓社会政策是也。晚近经济学说，莫不以生产分配，相提并论。继此以往，贫民生计，或以昭苏。此人类之幸福，受赐于法兰西人者又其一也。

《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

民主国家，真国家也，国民之公产也，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者也。民奴国家，伪国家也，执政之私产也，以执政为主人，以国民为奴隶者也。真国家者，牺牲个人一部分之权利，以保全体国民之权利也。伪国家者，牺牲全体国民之权利，以奉一人也。

《今日之教育方针》

1915年10月15日《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二号

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并兼未盛也。

《答褚葆衡》

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

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牵就的。

《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

1918年7月15日

我们现在要实行民治主义，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是要注意政治经济两方面，是应当在民治的坚实基础上做工夫，是应当由人民自己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创造这基础。这基础是什么？就是人民直接的实际的自治与联合。这种联合自治的精神：就是要人人直接的，不是用代表间接的；是要实际去做公共生活需要的事务，不是挂起招牌就算完事。这种联合自治的形式：就是地方自治和同业联合两种组织。

《实行民治的基础》 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

我所主张的同业联合，也含着有“两元的社会组织”的性质。但是我心中所想的未必和《联合会月刊》所说的尽同，而且我不愿意采用“两元”的名词，因为本来我们所痛苦的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分裂生活，我们所渴望的是将来社会制度的结合生活，我们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我们渴望纯粹资本作用——离开劳力的资本作用——渐渐消灭，不至于造成阶级争斗，怎奈我们现在所处的不结合而分裂的一劳资，国界，男女等——社会，不慈善而争斗的人心，天天正在那里恶作剧（现在美国劳资两元组织的产业会议，就是一个例）。

《实行民治的基础》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

我们应该补习的功课有三门：

（一）多数人民应该懂得民主政治究竟是什么。

（二）怎样完全取消帝政。

（三）怎样建设民主政治。

《中国革命党应该补习的功课》1920年1月3日《星期评论》第三十一号

他们反对马格斯底阶级战争说很激烈，他们反对劳动专政，拿德谟克拉西来反对劳动阶级底特权。他们忘记了马格斯曾说过，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用那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但是同时阶级对抗的理由和一切阶级本身，也是应该扫除的，因此劳动阶级本身底权势也是要去掉的（见《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之末）。他们又忘记了马格斯曾说过：法国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底著作，到德国就全然失了精义了，并且阶级争斗底意义从此在德国人手中抹去，他们还自己以为免了法国人的偏见……他们自以为不单是代表无产阶级利害的，是代表人类本性底利害，就是代表全人类利害的，这种人类不属于何种阶级，算不得实际的存在，只有哲学空想的云雾中是他存在的地方（见前书第三章）。他们只有眼睛看见劳动阶级底特权不合乎德谟克拉西，他们却没眼睛看见戴著德谟克拉西假面的资产阶级底特权是怎样。他们天天跪在资产阶级特权专政脚下歌功颂德，一听说劳动阶级专政，马上就抬出德谟克拉西来抵制，德谟克拉西到成了资产阶级底护身符了。我敢说：若经过阶级斗争，若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修正派社会主义底格言，就是“从革命去到普通选举！从劳动专政去到议会政治！他们自以为这是“进化的社会主义”，殊不知Bebel死后德国底社会民主党正因此堕落了！

《谈政治》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

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后事如何，就不是我们所应该所能够包办的了。

《谈政治》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

我以为解决先生所说的三个问题（其实不止这三个问题），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来改革社会制度不可。因为照现在的经济制度，妇人底地位，一面脱离了家庭的奴隶，一面便得去做定东家的奴隶，即于自由恋爱一层，在财产制度压迫和诱惑之下那里会有纯粹的自由！在国内外两重资本主义压迫之下，青年向何处去寻新生活 and 世外桃源？即于劳动问题，更可以说除阶级战争外都是枝枝节节的问题。

《答费哲民（妇女、青年、劳动三个问题）》

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

十六铺提篮桥洋泾浜底小客栈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房里住宿，这是容易见着的。丝厂香烟厂里小女工一天只得着几个铜子还要挨打，这也是容易见着的。这班人做了社会上重要的工，和懒惰的乞丐不同，但是他们的生活比乞丐还不如。所以我们现在不必谈什么改革政治和经济，也并不必谈什么社会主义，我们但凡有一点对于人类底同情心，我们但凡有一点对于同胞底感情，便应该出力帮助这种贫苦的劳动者。

《此时中国劳动运动底意思》1920年9月5日《劳动界》第四册

我们士大夫阶级断然是没有革新希望的，生产劳动者又受了世界上无比的压迫，所以有输入马格斯社会主义底需要。

《随感录》(学说与装饰品) 1920年10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二号

全国底教育、舆论、选举;都操在少数的资本家手里,表面上是共和政治,实际上是金力政治,所以共和底自由幸福多数人是没有分的。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

《国庆纪念底价值》 1920年11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三号

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的,现在虽说是共和失败了封建制度恢复了势力,但是世界潮流所趋,这封建主义得势,也不过是一时现象,我以为即在最近的将来,不但封建主义要让共和,就是共和也要让社会主义,在这一点上看起来,除追怀先烈以外,这国庆纪念日已没有可以令人狂信底价值了。但有人以为由封建而社会主义,中间还必须经过共和时代,所以眼前还是政治问题要紧,又有人以为中国封建式的武人为患,是政治造成的,不是经济造成的,所以眼前只是政治革命要紧,还不须经济革命。我看这两种话都似是而非。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虽是一定的轨道,然这轨道却不能够说必须要经过若干岁月才可以改变方向。

《国庆纪念底价值》 1920年11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三号

中国急需发达工业,但同时必须使重要的工业都是社会的不是私人的,如此中国底改革才得着西洋工业主义的长处,免和他们那样由资本主义造成经济危殆的短处。

《随感录·社会的工业及有良心的学者》

1920年11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三号

(一)我以为在社会底进化上,物质的自然趋向底势力很大,留心改造社会底人万万不可漠视这种客观的趋向,万万不能够妄想拿主观的理想来自由改造;因为有机体的复杂社会不是一个面粉团子能够让我们自由改造的,近代空想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之重要的区别就在此一点。

《答郑贤宗(国家、政治、法律)》

1920年11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三号

先生要晓得从革命发生起,一直到私有财产实际归公,必然要经过长久的岁月,从私有财产在制度上消灭,一直到私有财产在人心上消灭,又必然要经过长久的岁月,在这长久的岁月间,无论何时都有发生阴谋使资本制度死灰复燃甚至于恢复帝制底可能,我们不可把社会改造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了。先生既然承认过渡时代应有一种临时办法,这便和我的意见相差不远,但我要请先生注意的,乃是这过渡时代决非很短的期间!

《答郑贤宗(国家、政治、法律)》

1920年11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三号

现在有许多人拿“德谟克拉西”和“自由”等口头禅来反对无产的劳动阶级专政,我要问问他们的是:(一)经济制度革命以前,大多数的无产劳动者困苦不自由,是不是合于“德谟克拉西”? (二)经济制度革命以后,凡劳动的人都得着自由,有什么不合乎“德谟克拉西”? 那班得不着自由底财产家,为什么不去劳动? 到了没有了不劳动的财产家,社会上都是无产的劳动者,还有什么专政不专政?

《答柯庆施(劳动专政)》

1920年11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三号

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趋于崩坏了,在中国才开始发达,而他的性质上必然的罪恶也照例扮演出来了。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俄罗斯正是这种方法最大的最新的试验场。意大利的社会党及英美共产党,也都想继俄而起开辟一个新的生产方法底试验场。

《〈共产党〉月刊短言》 1920年11月7日《共产党》月刊第一号

我个人的意见,以为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够发达教育及工业,同时却把欧、美、日本之社会弄成贫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而且过去的大战争及将来的经济的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之产物,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

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的错路。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 致罗素先生底信

由资本主义渐渐发展国民的经济及改良劳动者的境遇以达到社会主义,这种方法在英、法、德、美文化已经开发政治经济独立的国家或者可以这样办,象中国这样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面政治的及经济的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急进的 Revolution,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的 Evolution 呢?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复东荪先生底信

1920 年 12 月 1 日《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

古代所讲的社会主义,都是理想的,其学说都建设在伦理上面,他们眼见得穷人底苦恼是由贫富不均,因此要想把全社会底贫富弄得绝对的平均或相对的平均;至于用什么方法来平均贫富,都全是理想,不曾建设在社会底经济的事实上面,所以未能成功。因为已成的社会都有他已成的经济的事实在那种做改革进化底障碍,我们固然不应该跟随着他维持现状,然而也断乎不能够妄想把社会当做米粉团子由我们任意改造。近代所讲的社会主义,便不同了,其宗旨固然也是救济无产阶级底苦恼,但是他的方法却不是理想的简单的均富论,乃是由科学的方法证明出来现社会不安底原因,完全是社会经济制度——即生产和分配方法——发生了自然的危机,要救济他的危机,先要认明现社会底经济的事实(譬如无政府主义者往往拿从前人口稀少农业时代的理想来改造现代人口发达的工业社会,便是未曾认明现社会底经济的事实。),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来设法改造生产和分配底方法。因此可以说马格斯以后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是客观的是建设在经济上面的,和马格斯以前建设在伦理上面的空想的主观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

《社会主义批评——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

1921 年 1 月《广东群报》,7 月 1 日《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转载

总之:在生产方面废除了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了剩余价值,才可以救济现代经济的危机及社会不安的状况,这就是我们所以要讲社会主义之动机。

《社会主义批评——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

1921 年 1 月《广东群报》,7 月 1 日《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转载

一定又有人说:资本制度既然是自身造成了必然崩溃的危机如马格斯所指示,而马格斯身后数十年资产阶级何以不但未曾崩溃并且日见强盛呢?我以为这不过是因为殖民政策一时的救济,并不是马格斯学说失了效验。

《社会主义批评——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

1921 年 1 月《广东群报》,7 月 1 日《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转载

一定又有人说:资本主义在欧美是要崩溃的了,是可以讲社会主义了;我们中国资本制度并不甚发过,更没有到崩溃的地步,如何能讲社会主义呢?象这样似是而非的话,恐怕很有许多人相信,其实他最大的缺点,是忘记了现代人类底经济关系乃国际的而非国别的了。

《社会主义批评——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

1921 年 1 月《广东群报》,7 月 1 日《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转载

再进而将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比较的讨论一下。这两派原来都出于马格斯,马格斯主义在德国变为国家社会主义,因为他的精神他的实质都是社会民主党,所以也叫做社会民主主义;因为他主张利用有产阶级底议会来行社会主义,所以也叫做议会派。内中无论是柯祖基底正统派或是柏伦斯泰因底修正派,都不过是大同小异罢了。在俄国才还了马格斯底本来面目叫做共产主义,其初在俄国也叫做社会民主党,随后党中分为急进温和两派,温和的是少数派,叫做敏什维克党,急进的是多数派,叫做布尔什维克党,其后多数派革命成功,改称为共产党。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虽同出于马格斯,而两派的主张彼此却正相反对如下表:

共产主义底主张	国家社会主义底主张
阶级战争	劳资携手

直接行动	议会政策
无产阶级专政	民主政治
国际运动	国家主义

《社会主义批评——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

1921年1月《广东群报》，7月1日《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转载

其实马格斯在《哥塔纲领批判》中明白的说：“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和共产主义的社会底中间，有一个由这面推移到那面的革命的变形的时期。而这个时期，政治上的过渡时代就为必要。这个政治上的过渡时代，不外是无产阶级底革命的独裁政治。”在《共产党宣言》上更是大声疾呼的说：“（一）纠合无产者团成一个阶级，（二）颠覆有产阶级底权势，（三）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又说：“无产阶级的革命，第一步是在使他们跑上权力阶级的地位……既达第一步，劳动者就用他的政权渐次夺取资本阶级的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就是集中在组织权力阶级的劳动者手里”。可见无产阶级专政明明是马格斯底主张，可惜自称为马格斯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忘记了！

《社会主义批评——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

1921年1月《广东群报》，7月1日《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转载

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两种社会主义，究竟应该采用那一种呢？我以为中国底改造与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忙，这是不容讳饰的了；国内的资本阶级虽尚幼稚，而外国资本主义底压迫是人人知道的，因此阶级战争的观念确是中国人应该发达的了；再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有产阶级的政治家政客底腐败而且无能和代议制度底信用，民主政治及议会政策在中国比在欧美更格外破产了，所以中国若是采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家社会主义，不过多多加给腐败贪污的官僚政客以作恶的机会罢了。

《社会主义批评——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

1921年1月《广东群报》，7月1日《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转载

女子问题，实离不开社会主义。为什么呢？因为女子与社会有许多冲突的地方。讨论女子问题，首要与社会主义有所联络，否则离了社会主义，女子问题断不会解决的。

《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在广东女界联合会演说

1921年2月14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后一派伦理，就是社会主义，就是人类将来的理想。过去及现在的伦理、历史，都是牺牲弱者以助强者的伦理、历史；其中最显明的，就是牺牲劳动者以助资本家，牺牲妇女以助男子。社会主义正因为扶助这两种弱者，抵抗这两种强者而发生的。

《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劳动运动与妇女运动》

1921年2月20日《劳动与妇女》第二期

历史上一切制度底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底变化而变化的。我们因为这个要义底指标，在创造将来的历史上，得了三个教训：（一）一种经济制度要崩坏时，其他制度也必然要跟着崩坏，是不能用人力来保守的，（二）我们对于改造社会底主张，不可蔑视现社会经济的事实，（三）我们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在第（一），（二）教训里面，我们固然不能忘了自然进化的法则，然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人类确有利用自然法则来征服自然的事实，所以我们在第（三）教训内可以学得创造历史之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即经济制度的革命。

《答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

1921年8月1日《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

马克思社会主义所以称为科学的不是空想的，正因为他能以唯物史观的见解，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所以成立所以发达所以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自然结果，是能够在客观上说明必然的因果，不是在主观上主张当然的理想，这是马克思社会主义和别家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之要点。

《马克思学说》 1922年7月1日《新青年》第九卷第六号

至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两句格言，不但共产党不反对，我想除了昏狂的人，没有人愿意反对。现在共产党所争持的所努力的乃是怎样使我们由强制而习惯的作工，使人人真能各尽所能：乃是怎样通力合作，怎样使生产事业集中成为社会化，怎样使生产力大增、生产品充裕，使人人真能各取所需。

《答黄凌霜(无产阶级)》 1922年7月1日《新青年》第九卷第六号

发展中国实业，只有国家社会主义与私人资本主义两个途径。先生前文是否主张资本主义的发达实业，姑且不论，惟除了国家社会主义(其初只是国家资本主义，再进一步才能到国家社会主义)，只有走私人资本主义这条路，决不是合作主义能够使中国实业充分发展的。

《答张东荪(联省自治与国家社会主义)》

1922年9月17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

用什么方法来创造经济？我们的答案是：采用国家社会主义，由中央或地方(省及市)政府创造大的工业、商业、农业，一直到私产自然消灭而后已。

《造国论》1922年9月20日《向导》周报第二期

总括起来说，我们造国的程叙是：

第一步组织国民军，

第二步以国民革命解除国内国外的一切压迫，

第三步建设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

第四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开发实业。

《造国论》

1922年9月20日《向导》周报第二期

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个社会之历史的进化来讲呢？因为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并不是凭空的盲目的去相信他，乃是社会之历史的进化程序令我们不能不相信。我们改造社会，并不是将原有的社会完全不要，白地里另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来给我们居住。我们改造社会，绝对没有这么一回事。仍然是在旧社会里造出一新社会来，所以我们要从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造成社会主义的社会，便不得不先要明白社会之历史的进化是怎么一回事。

《关于社会主义问题》——在广东高师的讲演

1923年6月20日于广州高师《六大以前》

其实专讲分配方法去平均贫富，是均富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对于生产方法和分配方法同时并重的。

《关于社会主义问题》——在广东高师的讲演

1923年6月20日于广州高师《六大以前》

社会主义的制度，简单说是：(一)资本集中，(二)财产公有。所以社会主义者对于资本制度的资本集中，并不反对。所反对者，就是财产私有。

《关于社会主义问题》——在广东高师的讲演

1923年6月20日于广州高师《六大以前》

所以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并不是主观的要求，想利用他来破坏资本主义来改造现社会，乃是因为客观上经济组织变化之自然趋势及历史进化之历程，令我们不得不相信社会主义。若有人问我们为什么相信社会主义？我们惟有答之曰：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帝国主义的路——旧的；一条是社会主义的路——新的。除了这两条路之外，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关于社会主义问题》——在广东高师的讲演

1923年6月20日于广州高师《六大以前》

共产主义者主张是：立脚在阶级斗争的原则上面(此点与基尔德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不同而与工团主义相同)，集合无产阶级中最觉悟最革命的群众，组织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共产党，无产阶级的革命

成功,即应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此点与工团主义不同),利用无产阶级的国家这个武器,压制资产阶级的反动,加入世界的革命,扑灭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然后渐渐灭绝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度及私有习惯与心理,建设无产阶级的工业与文化,最后达到废除一切阶级无国家的共产社会。这就是共产主义破坏与建设之大略程序。

《关于社会主义问题》——在广东高师的讲演

1923年6月20日于广州高师《六大以前》

我曾把各种社会主义比较过,结果以马克思派的科学社会主义为最好。我现在再重复说几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注重客观的事实,不是主观的理想的;他不独要有改造的必要,还要有改造的可能。

《关于社会主义问题》——在广东高师的讲演

1923年6月20日于广州高师《六大以前》

因为讲社会主义的人,总离不掉劳动阶级的。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开始进行,就是劳动阶级应该如何开始奋斗。劳动阶级的奋斗有两种:一是政治的奋斗,一是经济的奋斗。

《关于社会主义问题》——在广东高师的讲演

1923年6月20日于广州高师《六大以前》

所以中国劳动阶级和社会主义的目前工作,首先要做打倒军阀反革命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

《关于社会主义问题》——在广东高师的讲演

1923年6月20日于广州高师《六大以前》

俄罗斯十月革命的主义及其成功,不过是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不过是走向共产党主义的路的第一步,由此第一步,运用此政权以创造无产阶级的经济力,以建筑共产社会物质的基础(因为共产自由的社会,必须是工业的富有的,不应该是农业的俭朴的,如章士钊等所想象之古代共产村落或原始共产社会),这些工作,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环绕窥伺中的苏俄,自然非旦夕所能成。因为俄国革命不能即实现共产社会,便失望而悲观,这未免把共产社会看得不值钱,而对于俄国革命也未免太乐观了。

《苏俄六周》1923年11月7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相信社会主义的人也肯加入国民党;但他们加入国民党,是为国民革命而加入的,不是妄想赤化国民党利用国民党来做社会主义的运动而加入的:因为真懂得社会主义的人,应该很明白国民党的分子及使命和社会党的分子及使命根本不同,不是可以随便瞎来的。社会主义者在国民党中,理论上固然应该属于左派,但事实上将来是否左派,还是个问题。因为所谓国民党的左派,他的真意义乃是“始终采用革命方法,忠诚的彻[做]国民主义,不肯妥协。”并不单是唱些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高调,便算是左派。

《国民党左右派之真意义》

1924年4月23日《向导》周报第六十二期

科学及物质文明,在财产私有的社会,固可用为争夺残杀的工具,在财产公有的社会,便是利用厚生的源泉。

《评太戈尔在杭州上海的演说》

1924年4月25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革命的内外战争中,势不得不采用军事共产政策(其实只是“禁止买卖强制征发”,无所谓共产。)非此无以应军事之急需,且非此无以覆敌对阶级之基础,战争停止,破坏事业告了一段落,无产阶级开始建设的时候,即在产业充分发达的国家,也不能没有一种过渡的经济政策,才能渡到实行废绝私产,实行社会主义的分配,何况半亚洲式的俄罗斯:所以此时苏俄采用的经济政策,在社会革命之经济改造的过程上,正足以证明客观上的必然性,也正足以证明科学的社会主义和乌托邦的理想不同。说他是翻云覆雨的都是不明白俄国新经济政策之意义的缘故。

《答张君勱及梁任公》

1924年8月4日《新青年》季刊第三期

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当然应该服从墨司哥共产国际之训令，这件事可以公开的告诉普天下人而毫无惭愧与隐痛。

《答张君勱及梁任公》

1924年8月4日《新青年》季刊第三期

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运动，即是现代资本主义末期的民族运动：这时代的民族运动之特性，乃是二十世纪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及被压迫国家之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联合反抗他们的压迫者——资本帝国主义，不象前时代的民族运动是单纯的资产阶级运动。因为资本帝国主义有国际性，反抗他们之民族运动也不得不含有国际性，和前时代民族运动之对象及作战策略遂至不同，这也是此时代民族运动和前时代民族运动特性不同之一。

《孙中山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是不是国家主义？》

1926年5月25日《新青年》第四号

中国是一个被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所压迫的国家，我们决不向帝国主义者讲什么世界大同主义，我们自然急于要救中国爱中国，然而我们不是什么国家主义者。无产阶级本来无祖国，然而他们在救祖国的实际工作上，比任何阶级都出力。

《孙中山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是不是国家主义？》

1926年5月25日《新青年》第四号

现代资本制度已发达到最高形式——统一世界之财政资本主义，即国际帝国主义，因此，全世界的经济成了整个的，全世界政治也直接间接在这整个的经济影响支配之下成了整个的，因此，全世界的统治者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成了整个的，全世界被统治者被压迫者（工农阶级及弱小民族）对于统治者压迫者之反抗，也汇合起来成了整个的世界革命。

《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

1926年7月25日《新青年》第五号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他们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最懂得历史各时代之革命的理论及政策的：他们懂得中国的历史和经济状况，现在还是国民革命时代，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时代，现在不但资产阶级需要民主政治，即无产阶级亦需要民主政治，或者比资产阶级需要民主政治更为迫切，因此，我们敢说：在国民革命的争斗中，中国共产党是不会有向左超过民主主义的倾向的，或者有时比国民党左派分子一时浪漫的说话还右一点也难说。我们还敢说：即国民革命成功后之建设时期，也必然是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还不是工农政府，在那时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之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也只有到那时，真正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

《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

1926年9月25日《向导》周报第一七二期

中国国民革命之性质，是世界资本主义将近崩溃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资本帝国主义之各被压迫阶级的民族、民权、民生革命，而不是世界资本主义初兴时代之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因为革命的世界环境不同，革命的国内社会势力又不同，所以革命时革命后之政治的构造和经济的建设，便自然和前两世纪纯资产阶级的革命不同。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政治的经济的统治下之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些地方的资产阶级百分之九十九不能脱离买办性质，决不能始终忠于国民革命，决没有由他们之手实现自由独立的民族国家之可能，若由他们代替军阀统治国家，仍旧是变相的帝国主义之统治。只有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才能够真正脱离帝国主义之统治，才能够力图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建设，才能够不一定经过再度革命方式而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因此，中国国民革命之前途，只有两条路，（一）是由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之手实现国民革命而行向社会主义；（二）是由资产阶级之手联络一切反动势力，在国民革命的

假招牌之下，回复到帝国主义的统治。美国式日本式的第三条路，可惜李鸿章没有走，这时代已经过去了。

《答沈滨祈、朱近赤(国民革命之归势)》

1927年4月6日《向导》周报第一九三期

中国的国民革命，在社会的客观上条件上，固然不会有资产阶级的革命，同时也不是无产阶级单独的革命，而必然是工农中小资产阶级联合的革命。

《中国国民党的危险及其出路》

1927年7月8日《向导》周报第二〇〇期

共产党之目的是什么？简单说起来，是以革命的手段，废除财产私有制度，改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

《国民党与共产主义者》 1927年10月《中国国民党讲演集》

德谟克拉西，是各阶级为求得多数意见之一致以发展其整个的阶级力所必需之工具；他是无产阶级民主集权制之一原素，没有了他，在党内党外都只是集权而非民主，即是变成了民主集权制之反面官僚集权制。在官僚集权制之下，蒙蔽，庇护，腐败，堕落，营私舞弊，粉饰太平，萎靡不振，都是相因而至的必然现象。

《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

《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 1929年10月 上海民志书局发行

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地主及富农这些剥削者，都已经站在反革命地位；城市小资产阶级及中农，在革命斗争激进时，都必然动摇；只有贫农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而也不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在将来的革命中，只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能够始终坚决的站在领导地位。坚决的领导一般工银劳动者，中小农民以及城市乡村中成百万成千万的劳苦饥寒奴隶，以不断的革命斗争，彻底扫荡阻碍中国进步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富农等一切剥削下层民众的反革命势力，建设无产阶级贫农专政的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统一全国的政权，才能够一面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一面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

《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0月10日

当然，民主主义不是超阶级的，一般所称为民主主义的，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这一民主主义本来是资产阶级从前用做反抗封建贵族以及欺骗劳动阶级之工具，到了社会阶级关系一转变，即封建势力已溃灭劳动阶级走进了政治舞台，统治的资产阶级马上认识这一工具的锋芒要戳伤到自己身上，急急的设法收藏起来。重新在废物储藏室中拿出他们从前所抛弃的反民主主义的宗教，礼教，旧道德等等来代替。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及在它还未达到夺取政权的时候，应该不客气的借用资产阶级这一有锋芒的工具（民主主义），来对付资产阶级，来廓清无产阶级走进政治舞台的障碍，来成熟自己阶级解放斗争的条件。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未实现以前，单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宣传力量，不会使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以至一大部分工人群众能够认识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之伟大与真实，当他们需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时期还未终止之时，当他们还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怀抱之时，我们不能离开他们，此时也必须采用民主主义的口号，发展民主主义的运动，吸引他们到我们的周围，这也是无产阶级运动中一个历史的任务，决不是机会主义。

《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

1930年3月1日《无产者》第一期

至于“要求召集国民会议”这一口号，其客观条件不用说已经成熟了，我们即应重新了解新的客观状况，决定我们的策略，即是利用这一客观条件已经成熟的口号，发展两个革命间过渡时期的政治斗争。这不是我们在主观上开倒车，而是因为在客观上无产阶级的党已被革命失败推向后退，退到以前的发足点，现在的政治斗争，几乎要从头做起，所不同的（可以说实际上是大大的不同）只是根据过去的苦经验，必须根本改变其方式而已。

《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

1930年3月1日《无产者》第一期

我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个人问题，而是关于整个的政治问题，我从中国革命失败的教训中已完全证实

五、六年来国际的领导是站在官僚机会主义的路线上,尤其重要的就是你们滥用国际的威信及凭藉官僚机关的权力,继续维持这种路线,不惜破坏一切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原则,不惜恶劣地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基石,十月革命的根本方法,列宁主义的战术主要教训。关于中国问题中目前最主要的就是:(一)将来第三次革命的政权是工农民主独裁,还是无产阶级独裁?(二)目前的任务是直接准备武装暴动,还是提出过渡时期的政治口号(如国民会议)作民主斗争?你们因未得到机会主义失败的教训,来认清革命发展中阶级关系的转变,因而你们在未来革命政权上所得到的结论是工农民主独裁;因为未得到盲动主义失败的教训,不承认上一次的革命早已完结,因而你们在目前直接任务上所得到的结论是准备武装暴动和乡村游击战争。这样你们在总的政治路线上是要把革命拉向后退,在目前斗争的策略上是破坏群众革命运动的发展。关于这些根本问题,我和你们实有不可调和的不同意见,我及我们意见相同的同志所发表的政治意见书,不久你们当可以看见。这些根本问题不能解决,便没有别的问题可解决。但这些根本问题决不是调我个人到莫斯科便可解决的,而且这是官僚的办法。

《答国际的信》

1930年7月1日《无产者》第二期

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拥护十月革命,首先必须拥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一脉相传的“不断革命论”,因为它是十月革命的灵魂;同时必须打碎史大林、布哈林、季诺维埃夫的“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和“阶段论”,因为这是伤害十月革命的魔鬼。

《十月革命与“不断革命论”》

1930年11月10日《无产者》第五期

关于将来的革命性质问题 就整个的革命性质看,将来的革命胜利,特别是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这不待言是社会主义的胜利。

《答列尔士同志》

1931年1月20日《无产者》第九期

因为协委第一次纲领草案有“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这句话,引起了刘仁静同志的驳论,接着第三期“十月之路”和二十三期“我们的话”对仁静同志的驳论都加以反驳,像这样热烈的政治争辩,无论它本身是幼稚或是深刻,都算是我们队伍中最好的现象,虽然争辩的态度中还有些非科学的方法。

《中国将来的革命发展前途》

1931年3月15日《无产者》第十二期

我以为这回争论自始就不该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这样的题目。因为这一问题在我们左派反对派中已不应该讨论,并且事实上在大家争辩的文件中,都未曾否认中国将来第三次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这一定论,只要大家不用枝节之词或是用整个革命的性质把问题弄混乱了,我以为争点很明显的是在“引起将来革命的因素是什么”,“是否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性质”,“是否在最初阶段还会经过民主时期”,“在什么时候踏上社会主义政策的道路”这类问题。

《中国将来的革命发展前途》

1931年3月15日《无产者》第十二期

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既然可以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础上获得政权,便不能否认在将来革命高潮之最初阶段中会有很短的民主时期和两重政权之可能。我们不能因为反对史大林派“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一整个时代”的见解,便否认整个的无产阶级革命发展中任何小的过渡阶段。

《中国将来的革命发展前途》

1931年3月15日《无产者》第十二期

中国的革命“是以民主要求开始,而以社会主义终结。

《中国将来的革命发展前途》

1931年3月15日《无产者》第十二期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的革命；所以夺取政权的革命暴动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这自然是百分之百的真理！

《中国将来的革命发展前途》

1931年3月15日《无产者》第十二期

我真不懂得，我们在此次反日本帝国主义运动中，必须咬文嚼字的向抗日救国和对日宣战的口号放几支冷箭，才算是无产阶级的立场。如果人们效史大林派骂我们采用国民会议口号是民主主义者的口吻，来骂我们采用抗日救国口号是民族主义者；那末，只有让这班社会主义者坐在亭子间里，静候中国无产阶级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础之上取得了政权，再请他们出来到社会主义者的元老院中去。

《被压迫国的无产阶级应不应领导爱国运动》

1931年11月28日《校内生活》第一期

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积极的领导中国的爱国运动，应该用我们的纲领领导爱国运动而充实其内容，一直到夺取政权。我们对于爱国运动，不独不应该向它放冷箭，并且不应该只是尾巴式的参加，而应该是领导，因为完成中国民族解放，已经是中国无产阶级自己的任务，并且它在完成这一任务的斗争基础之上，可以比在纯粹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早些获得政权。

《被压迫国的无产阶级应不应领导爱国运动》

1931年11月28日《校内生活》第一期

国民会议或国民立宪会议，是形式的民主主义即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之政治的表现。在反革命反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国民党取得了政权而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并未完成的中国，这里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任务，今后只有由无产阶级来完成了。中国无产阶级为了这一目的，提出最彻底民主主义的国民会议做总的政治口号，在实现这一口号的斗争中，动摇、推翻资产阶级，由无产阶级专政政权，来彻底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这应该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之整个的战略。

《论国民会议口号》

1932年10月1日《校内生活》第四期

代表资产阶级及地主利益的国民党既不能够提高经济以复兴中国，别派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党派，其能力当更在国民党之下，那么，提高经济以救中国的责任，只有放在代表无产阶级及贫农利益的共产党双肩之上了。

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是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地主，军阀官僚，立在绝对相反的地位，它是在最近十余年来反军阀反帝国主义反资产阶级反地主之不断的流血斗争中生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之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没收地主的土地给农民，已经不是仅仅写在政纲上的白纸黑字，已经在它所领导的农村苏维埃区域付诸实行，虽然还没有统一中国的苏维埃政权来解决整个的帝国主义及土地问题。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苏维埃政制，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有了俄国的经验，他不但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保障，同时也是空前的最高度的民主主义政制，任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权所不能召集的彻底民主的国民会议，只有它能够召集。苏维埃不仅是整个的无产阶级联合机关，而且是一种广大而富于伸缩性的组织形式，一切觉醒起来，反资产阶级反地主的城乡被榨取的劳苦民众，都能够参加进去。苏维埃政权不是由少数人在上面统治民众，而是由民众从下创设起来的政权，除了游手好闲靠榨取他人血汗以生活的社会寄生虫，都有参加这一政权的公民权利，它废除了立法权和执行权无益而有害的分立，它撤去了人民和政府间的障壁，它引进了广大民众直接参加国家的政治及经济之管理，它废除了以官吏为职业的特权阶层，它扫清了国会及地方议会等猪圈，它实现了直接选举一切公务人员和随时撤换的彻底民权。

《谁能救中国？怎样救中国？》

1932年11月17日《先锋》第五期

共产党之终极目的，自然是实现无剥削无阶级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会。即是：一切生产工具收归社会公有，由社会公共机关，依民众之需要计生产消费之均衡，实行有计划的生产与分配，使社会

的物质生产力较今日财产私有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有高度发展,使社会物质力量日渐达到足够各取所需的程度。所以共产主义,在经济学上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度发展的生产制,犹之资本主义较高于封建生产制也。此决非世俗所认为简单的各个穷人夺取各个富人财产之意义。此种生产制,决非我等之空想。经济落后的俄国,已有初步尝试;而获得初步成功。全世界所有资本主义生产制的国家无不陷于经济恐慌的深渊,独苏联日即繁荣。此新的生产制之明效大验,众人之所周知也。

1933年2月20日《陈独秀先生辩诉状》

资本主义发达自然是社会的进步。俄国无产阶级,与其说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不如说吃了资本主义太不发达的苦(这句话用在中国更适当),在这一观点上,列宁和司徒卢威是一致的。然而列宁的革命政策,便不因此而和他一致了。我们现在且不说资本主义比较不甚发达的国家,是全资本主义世界最薄弱之一环,正容易爆发无产阶级的革命,因为还有其他必要条件。我们可以承认,任何幼稚的资本主义国家,只要那里有了无产阶级运动,只要那里有了无产阶级之有力的同盟者,那里便有无产阶级革命之可能。如果认为必须资本主义发达到和先进国相接近的程度,那里的无产阶级才能担负革命的任务,那么“无产阶级革命”这一名词,必须从经济落后国家的字典中永远除去。所以,如果有人把中国经济复兴问题和现存的无产阶级能否担负革命任务的问题牵连在一起,我必须问:所谓革命任务,是指社会主义的革命任务,还是民主体任务?如系前者,便是门什维克传统的思想,倘系后者,便是把中国无产阶级的评价拉退到中国还没有左派反对派,还没有共产党以前了。

《几个争论的问题》

1934年5月12日《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二——国民会议与苏维埃》

人们或者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既然含有缺点与罪恶,我们何不取法乎上,再大大的跳跃一下,采用生产力更高的社会主义呢?诚然,社会主义生产制,比资本主义生产制有更高度的发展,也能以清除资本主义的罪恶,已经是初期资本主义的中国,便不能够说没有跳跃进化之可能,可是,我们所相信的社会主义,乃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它的特质是废除私有及生产集中,和固执私有及均产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大不相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若走循序进化的路,必须以内部经济的政治的成熟为条件,若走跳跃进化的路,则必须以外部的影响(刺激与援助)及内部政治的成熟为条件,不象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是革命的而却是幻想的,在经济上则是反动的;资本主义比起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还是革命的,因为前者使生产力增高,后者使生产力停滞甚至萎缩。社会主义在中国之经济的成熟,自然是无稽之谈;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够生长起来,没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自然谈不上政治的成熟,外部的影响,目前还在等待时期,而我们的经济建设却不能等待。

列宁说过:“俄国工人吃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而不是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在中国更是如此!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本国的资本主义,或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

《资本主义在中国》——在重庆民生公司讲演

1938年8月广州亚东图书馆《民族野心》

现代的经济制度只有两个:一是资本主义制度,一是社会主义制度,没有第三个。

《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

1938年8月5日《政论》旬刊第一卷第十九期

现在只提出两个无关宏旨的枝叶问题,唤起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注意一下:

第一,小资产阶级的中国共产党,既不懂得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又厌恶害怕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于是乃提出“力争非资本主义前途”的说法,这正合你们的口胃;并且你们所谓中国社会生产力是封建的,这一怪论也从中共抄来,你们为什么要反对共产党呢?第二,欧美的知识分子,毕竟比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点知识,不会象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许多新发明,他们如果认为你们反对资本主义是不诚实的,他们便

知道你们将和希特勒一样，以反对资本主义始以充当大资产阶级的豪奴终；如果认为你们反对资本主义是认真的，他们便知道你们必然要走共产的道路，（德意的法西斯道路，仍然是资本主义，如果他们不是资本主义，不是为商品交换而生产，便不需要殖民地和市场了。）无论你们愿意或不愿意。并且象你们“一反近代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为交换而生产”的主张，这正是全世界至少是几个最主要的国家社会革命成功后，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方法，所谓“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苏俄，还不敢也不能如此主张，你们居然想把它运用到国民党及政府的抗战建国纲领，几个党员这样随便谈谈，还不关紧要，倘若抗战建国纲领真采用了这样幻想的主张，则敌人将如何宣传，国际形势将发生如何变化，这是可以预见的。

《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

1938年8月5日《政论》旬刊第一卷第十九期

至于中国共产党一听到有人主张发展民族工业，便认为是做了资产阶级的俘虏；这种狂吠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乐闻的，我们不应该起来严肃的加以纠正吗？

《我们为什么而战》

1938年广州亚东图书馆《告日本社会主义者》

现在的中国，也有许多青年人模模糊糊的反对资本主义，爱好社会主义，这可以说是一种进步。但我们必须向他们指出不根据经济发展，不根据政治斗争，只满怀着厌恶资本主义感情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区别。在科学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无论为功为罪，而毕竟是人类社会进化所必经的过程。没有它，小有产者的社会便没有发展生产力和生产集中之可能。因此只有无产者，而不会有工业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决不能因为人们厌恶它而不来，社会主义也不能因为人们爱好它而来。这是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条件而决定的，人们的努力，只能使可来者快点来而已。

《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

1938年9月15日《政论》旬刊第一卷第二十三期

我们不要学唯名主义者，一听到社会主义便肃然起敬，一听资本主义便畏之如蛇蝎，厌之如粪蛆，如果人们不敢断言中国此时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制发展工业，这必须毅然决然采用资本主义制来发展工业，只有工业发展，才能够清除旧社会的落后性，才能开辟新社会的道路。

《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

1938年9月15日《政论》旬刊第一卷第二十三期

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一）我认为：非大众政权固然不能实现大众民主；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级独裁，必然流为史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制，这是事势所必然，并非史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二）我认为：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的助成这一退步的人们，都是反动的，不管他口中说得如何左。（三）我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名词，有它的具体内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见前函及后表）。（四）我认为，民主之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内容，许多年来，许多人，把民主和议会制度当做一件东西，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议会制度会成为过去，会成为历史残影，民主则不然也，苏维埃制若没有民主内容，仍旧是一种形式民主的代议制，甚至像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五）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并非仅仅是过了时的一定时代中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如果说民主主义已经过了时，一去不复回了，同时便可以说政治及国家也已过了时即已经死亡了。如果说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无产阶级的政权形式只有独裁，不应该民主，则史大林所做一切罪恶都是应该的了，列宁所谓“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乃成了一句废话，主张为恢复苏维埃、工会及党的民主而斗争，也是等于叫昨天回来，等于叫老百姓为历史的残影流血。如果说无级民主与资级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内容（法院外无捕人杀人权，政府反对党派公开

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权利等。)无级和资级是一样的。如果说史大林的罪恶与无产阶级独裁制无关,即是说史大林的罪恶非由于十月以来苏联制度之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自史大林),而是由于史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藉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所以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史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史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已经耗竭之时,不必为民主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六)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要丰富得多,实施的范围也广大得多,因为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时代,我们便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其实此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不幸十月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

1940年9月《给西流的信》

《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

无产阶级没有适合于其社会条件的充分数量,没有经济的政治的组织,和别的居民没有甚么大的不同。特别是十余年来苏俄官僚统治的经验,中日战争及此次帝国主义大战的经验,使我们不能把现时各国无产阶级力量估计过高,使我们不能轻率宣布“资本主义已到末日”,没有震动全世界的力量之干涉,此次大战自然不是资本帝国主义之终结,而是它发展到第二阶段之开始。即是由多数帝国主义的国家,兼并成简单的两个对垒的帝国主义的集团之开始。

1940年11月28日《我的根本意见》

《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

民主主义是自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1940年11月28日《我的根本意见》

《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

帝国主义以殖民地半殖民地为存在条件,犹之资本主义制度以私有财产为存在条件。我们不能幻想资本统治不崩溃可以取消私有财产,同时也不能幻想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战争,不和帝国主义国家(宗主国及宗主国的敌对国家)中的社会革命结合起来,会得到胜利。

1940年11月28日《我的根本意见》

《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

近作根本意见,亦未涉及何种主义,第七条主张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托洛斯基都包含在内)之价值,乃根据苏俄二十余年的教训,非拟以马克思主义为尺度也。倘苏俄立国的道理不差(成败不必计),即不合乎马克思主义又谁得而非之。

1941年1月19日《致S和H的信》

《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

资本制度这种东西,一旦开始发生,利与弊都势必顺着她自身发展的逻辑逐日增长,一切改良方法既不能动摇其基础,节制之,更只有使整个的社会经济趋于衰落,欲只得其利而免其弊的如意算盘,是不会成功的。私有财产制和商品生产制,是资本制度之基础,亦即其弊害之根源。这一生产制,其目的是为拥有生产工具者出卖商品,增加其私有财富而生产,不是为直接供给一切人民食品而生产,其生产力愈益发展,依供求律愈益失去生产力与购买力之均衡,因之,而生产过剩,而物价低落,而工厂倒闭,而工人失业,而形成经济恐慌;经过一时期,生产力削弱而恢复原状,后又因生产力比以前更加强而走向更大的恐慌,如此循环而构成恐慌之周期律。自来救济生产过剩之策有二:一是自动的减少生产量甚至毁坏生产品这一愚蠢可笑的办法;一是争夺殖民地及国外市场走向战争这一疯狂可怖的办法。为了必须把国内生产过剩的商品向国外市场推销,还必须阻止国外商品侵入国内市场,就不得不加高关税壁垒,扩张军备,准备战争,以至实行战争。这一串因果相联的现象,都是现代国家当局所必须采用的步骤。因为他们既不能消灭资本制度,便只得让资本制度牵着鼻子走,否则只有失败,这本是事实之必然,决不是什么思想,什么良心所能使之改变的。在全世界几个强大国家必须争夺市场,必须准备战争,必须实行战争的时代,大家尽力扩大其势力范围,他们彼此挤得水泄不通,怎样谈得上民族自决、民族解放呢?上次大战之终了,威尔逊的十四条,未尝不轰动全球,而随即销声匿迹者,并非路易乔治和克利蒙梭欺骗了威尔逊,乃是威尔逊欺骗了他自己,并且这一欺骗,亡了法国,害了英国和美国,对日本丧失了强国的体面。此次大战后,谁还要在资本制度世界标榜和平主义的幻想,在下次大战中,谁就是失败者。

1942年2月10日《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

《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

有人甚至梦想战争会引起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快到来,不幸事实幻灭了他们的美梦,已经不胜悲哀,如果再觉着今后连民族斗争都会受到限制,并且纳粹党会支配半个地球,他们将感觉着由欢喜的天国坠落到悲哀的深渊,将感觉着命定的要走下坡路了,其实人类进化史,它始终很冷静的走着它前进的道路,此时它并未意图走向天国,也不是走向毁灭坠落深渊,对于人们自己由虚幻的希望欢喜而来之失望悲哀,它不负任何责任。此次大战,即使不幸得很,胜利果然属于纳粹,它竟至支配了半个地球,这占人类半数的人民,在政治上将受到整个时期窒息的大灾难,而在经济上和英、美胜利一样,固然不能动摇资本制度对于生产力之束缚,而资本制度的范畴以内会有一大进步,例如由币制统一、减轻关税壁垒、物资集中等等,渐次减少世界上许多小的经济单位,除去一部份经济发展之障碍,将比战前的社会生产力要突飞猛进,这是在客观上为将来的社会主义世界开辟宽广的道路,加强物质的基础,这本是资本主义在血的罪恶中产生进步的惯例,只有眼光狭隘的教派之人,才见不出这一远景。人类历史和地球一样,无论在光明的白昼或黑暗的深夜都是进行不息的。

1942年2月10日《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

《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

被压迫民族是资本帝国主义之产物,被压迫的劳动者为他生产商品,被压迫的落后民族为他推销商品和生产原料,这是资本帝国主义的两个支柱。被压迫民族反抗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以至走到战争,那是天经地义,无可非难,这样为民族自由而战的大斗争,无论为何人所领导,民族中一切进步分子都应该拥护;因为不但为资产阶级所领导,即令是封建王公所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有打击资本帝国主义的进步意义。

1942年5月13日《被压迫民族之前途》

十月革命是全俄绝大多数人民集合在共产党“解放劳动者”“解放农民”“解放小民族”三大旗帜之下成功的；革命胜利后，三样都一一实现了，并非是俄国共产党的空头支票，并且对国外把帝俄时代对被压迫国的不平等条约自动的宣告废除了。把它在被压迫国家的特殊权利如租界，领事裁判权等，一一宣告放弃了。所以当时全世界劳动人民，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都看着莫斯科是全世界被压迫者的灯塔，是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参谋部。如果有人根据近来苏联对于中日战争及此次大战之初对于波兰及希特勒之政策，而怀疑到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态度，这乃是他自己不明了！有班人所诋毁我们所拥护的前期苏联，和有班人所吹拍我们所痛惜的后期苏联，大大不同，前期苏联是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场，后期苏联则站在俄国民族利益的立场。自苏俄领导者，因为西欧革命之顿挫，乃中途变节，放弃了以世界革命为中心的政策，代之以俄国民族利益为中心的政策；各国头脑清醒的人，乃日渐由怀疑而失望，直到现在，人们对于苏联虽然内心还怀着若干希望，而在实际上只得认为它是世界列强之一而已，若要硬说她是社会主义国家，便未免糟塌社会主义了！假使俄国仍旧坚苦的守着当年国际社会主义的立场，中日战争一开始，她便应该以全力援助中国，这就是说，不应该和英美同样站在事外援助中国，而应该以领导中国对日抗战为她自己的责任，并且应该出兵参加战争，拚着苏联和中华民族共存亡，这才是国际社会主义者的态度，这才是领导国的态度！如果是这样，日本便没有那么容易占领上海和南京，至迟在张鼓峰事变发生时她不再和日本妥协，武汉也决不会陷落；中俄一直共同抗战到今天，日本便无力横行南洋，蹂躏菲律宾、马来、爪哇、缅甸，这一大群弱小民族了！当纳粹军队进攻波兰时，苏联若仍旧站在国际社会主义的立场，便不会和希特勒妥协，便不会把代表民主主义，领导被压迫被侵略民族向法西斯蒂进攻这一伟大事业，说成为他人在火中取栗，更不会伙同法西斯蒂瓜分波兰！这时英法比联军还未崩溃，希特勒并未曾认为能够在东西两战场同时得到胜利，孤立的波兰失败后，东战场没有问题了，希特勒才有力量击溃英法比联军，才有力量征服挪威、荷兰、丹麦、南斯拉夫、希腊这一大群小国！

1942年5月13日《被压迫民族之前途》

《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

几点说明

一、辑录《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思想的论述》，目的在于给研究陈独秀社会主义思想的同志们提供一个查阅资料的经索。希望大家能够仔细地去读原著。

二、做完了这份《辑录》，想到了几个问题，提出来，以求教于到会的同志们：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话不符合历史事实。

1949年，毛泽东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时，发表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还说：“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事实并非如上所说。

1898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中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讲到了社会主义学说。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说：“麦喀士（马克思），德国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

1903年，马君武说：“社会主义发源于圣西门、傅立叶、极盛于马克思。马克思以唯物论解历史之人也。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

1905年，孙中山曾到布鲁塞尔访问第二国际书记处，要求参加该组织，并说：“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1912年，孙中山在上海社会党总部演说时，称马克思“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阐出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系统之学说，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

1903年，陈独秀与章士钊、张继等在上海主编《国民日报》。第一集中介绍《德国之社会民主党》时，说这个党奉马枯士（马克思）之革命的共产主义为圭臬。1903年陈独秀与苏曼殊合译的《惨世界》中借男德

的话道出“世界上的物件，应为世界人公用”之说。1915年陈独秀在《法兰西与近世文明》一文中说：“近代文明之特征……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同此篇中，陈独秀推崇马克思把社会主义学说，发挥而光大之。1917年1月，陈独秀在答褚葆衡的信中说：“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国产业未兴，并兼未盛也。”

在十月革命之前，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中，除陈独秀外，李大钊、李达、瞿秋白等也都知道德国有马克思、恩格斯，俄国有个列宁。经过几十年的革命实践，中国人才认识清楚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确是经过苏联的政治家、理论家们篡改后的马克思主义，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之路，既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和帮助，而主要的方面，更多的却是灾难和痛苦。

陈独秀理解的社会主义与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有区别的。

陈独秀在1922年7月1日《新青年》第九卷第六号发表的《马克思学说》一文中说：“马克思社会主义所以称为科学的不是空想的，正因为他能以唯物史观的见解，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所以成立，所以发达，所以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自然结果，是能够在客观上说明必然的因果，不是在主观上主张当然的理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和别家的社会主义不同之要点。”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八卷第三号上答复郑贤宗的书信时，他说：“我以为社会的进化上，物质的自然趋向的势力很大，留心改造社会的人万万不可漠视这种客观趋向，万万不能够妄想拿主观的理想来自由改造；因为有机体的复杂社会不是一个面粉团，不能够让我们自由改造的，近代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之重要区别就在此一点。”《新青年》第八卷第三号上载陈独秀《国庆纪念的价值》中说：“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以上这些论述，可以看出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思想核心是特别强调社会改造要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千万不能按主观意志办事。1923年，陈独秀在广东高师的演讲时说：“我曾把各种社会主义比较过，结果以马克思派的科学社会主义最好。我现在再重复说几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注重客观事实，不是主观的理想的；他不独要有改造的必要，还要有改造的可能。”而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主观性太强是他们失败的主要原因。

历史事实证明，陈独秀对前苏联社会主义的分析是有远见的

陈独秀对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在前后时期上划分是很清楚的。1942年5月13日他在《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一文中说：“有班人所诋毁我们所拥护的前期苏；和有班人所吹拍我们所痛惜的后期苏联，大大不同，前期苏联是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场，后期苏联则站在俄国民族利益的立场。”“若要硬说她是社会主义国家，便未免糟蹋社会主义了！”1940年9月，陈独秀在给西流的信中说：“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已经耗竭之时，不必为民主斗争，即等于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更有重要意义的是陈独秀在《我的根本意见》中指出：“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这个模式的社会主义终于在几十年后，被陈独秀的远见言中了。而陈独秀当时说这些话，确是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理论家对真理追求的执着，以大无畏的勇气，站出来向全世界革命者发出的警言。就在陈独秀看出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有很多弊端时，在中国中有人做出另外一种结论，说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祝他六十大寿。并说：“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的朋友。中国人民对斯大林的敬爱，对于苏联的友谊，是完全出于诚意的，任何人的挑拨离间，造谣污蔑，到底都没有用处。”历史又过了几十年，事实已经证明了，陈独秀的远见是正确的。

陈独秀晚年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贡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940年9月，陈独秀给西流的信中，对社会主义的民主作了详尽的论述。特别是第五条意见中说：“民主是自以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

仅是过了时的一定时代中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如果说民主已经过了时,一去不复回了,同时便可以说政治及国家也已过了时即已经死亡了。如果说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无产阶级的政权形式只有独裁,不应民主,则史大林所做一切罪恶都是应该的了,列宁所谓‘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乃成了一句废话。”这封信中,所论述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想,远远超过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认识。他站在人类历史的发展的高度,说明社会主义不能没有民主,而民主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所在。试想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对人民没有民主权力,能算是什么样的文明社会吗?可喜的是,中国共产党已经从盲目崇拜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的阴影中走了出来,经过几代人的不断探索,在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之后,终于找到了要高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评八七会议对陈独秀的处理与批判

中共中央党校 郭德宏

1927年8月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的紧急情况下,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和进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使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由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因而成绩是主要的。但是,这次会议也有明显的缺点和错误,一是对陈独秀的处理和批判不当,开启了惩办主义的先例;二是为其后的“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这里只谈一谈第一个方面。

关于八七会议对陈独秀处理和批判的不当,我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

首先,会议的主要议程是批判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立新的革命方针,却不允许陈独秀参加会议,不允许他进行申辩或保留意见。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最主要的创始人,从中国共产党创立起一直担任最主要的领导人,在1927年4月底5月初召开的中共五大上仍然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汪精卫叛变革命前的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虽然按照共产国际的“训令”进行了改组,成立了五人临时中央政治局兼常委,陈独秀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从此被停职,“不再视事”,但他仍然是中共中央委员。八七会议召开时,在武汉的其他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都参加了,可是唯独没有让陈独秀等所谓犯了“错误”的人参加,不允许他们到会申辩或保留意见,实际上是对他们进行“缺席审判”。这种做法,明显地是不对的。当时主持会议的李维汉后来也说:陈独秀当时虽然“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但‘八七’会议主要是批判他所代表的投降主义,应当要他参加会议,允许他进行申辩或保留意见”^①。

其次,把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推给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而把共产国际说得完全正确,实际上是让陈独秀做“替罪羊”。对于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当然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但是,陈独秀的错误大部分来自于共产国际,例如国共两党的磨擦加剧之后,陈独秀曾主张中国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即实行党外合作,但共产国际坚决不同意,认为中国共产党员不能退出国民党,必须维持党内合作的统一战线。既然中国共产党员要继续留在国民党内,维持党内合作的统一战线,就不能不限制中国共产党的手脚。如果按照陈独秀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员及早地退出国民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对于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就会好处理得多,国共合作分裂之后中国共产党也不会遭受那么惨重的损失。但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不能不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而且共产国际还派有代表在中国,直接指导中国革命,他们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太上皇”,陈独秀不得不听从他们的命令和意见。因此,如果要追究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无疑是主要的,陈独秀的责任是次要的。可是按照共产国际命令,并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实际主持召开的八七会议,把共产国际说得完全正确,责任完全推到了陈独秀等人的头上。所以,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的这种做法很不服气。7月12日他被停职以后,就曾致函临时中央政治局,要求辞去总书记职务,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工作。”^②八七会议召开之后,瞿秋白和李维汉到陈独秀的住处,把八七会议的情况告诉他,并劝他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到莫斯科去,但他坚持不去,并“表示他的错误共产国际有责任”^③。1929年陈独秀被开出党籍之后写的《告全党同志书》,进一步申明了他的看法,他说:“当时要执行左倾的革命政策,根本政策必须转变,即是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真正独立起来,尽可能的武装工农,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推翻国民党的领导。否则任何较左的政策,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共产“国际始终承认国民党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主体,‘国民党的领导’这句话,在斯大林口中叫得异常响亮(见中国革命问题中反对派的错误)所以始终要我们屈服在国民党组织之内,用国民党的名义,国民党的旗帜

领导群众。一直到冯玉祥、汪精卫、唐生智、何健等全体国民党公开的反动，公开的取消了联俄容共（他们老早就说：‘只承认容共而不承认联共’）及帮助工农运动等所谓三大政策。国际还电令我们‘退出国民政府而不退出国民党’。……在以上这样始终一贯的机会主义政策指导之下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怎么会看清自己的前途，怎么会有自己的独立政策，只有步步投降于资产阶级，附属于资产阶级，以至一旦资产阶级的大屠杀到来而我们没有一点办法”。因此，“我们应该很坦白的很客观的认识过去以至现在的机会主义政策，都是来自国际，国际是应该负责任的”^④。我认为，陈独秀说的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如果当时共产国际勇敢地承担指导错误的责任，而不是把责任全部推给陈独秀等人，陈独秀也不会与共产国际决裂，以至最后参加托洛茨基派小组织。这种委过于人、文过饰非的做法，在八七会议之前的中国共产党内还没有出现过。八七会议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开了中国共产党内掌权者委过于人、文过饰非的先例，影响非常不好的。

再次，给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扣上“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说他们“执行了很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空前的妥协的机会主义的路线”、“机会主义的不革命的政策”、“客观上出卖革命的机会主义政策”，甚至“退让投降政策”^⑤等等，并不利于客观地、深入地总结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认清指导上的错误，实际上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扣帽子的恶劣先例。“机会主义”这个名词，源自法文，意为“妥协”或“应付”，以此形容十九世纪法国政治舞台上那些没有定见而随机应变的政党和政客。后来指工人运动中或无产阶级政党内出现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只图眼前暂时的利益和一时的成就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的政治思想。它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⑥由于其含义很宽泛和笼统，人们并不清楚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往往以为机会主义就是没有原则，搞投机。陈独秀既然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当然他也是没有原则，搞投机的人。事实上，陈独秀是一个毫无心计、光明磊落的人，根本不会进行投机。包惠僧在解释为什么陈独秀没有出席中共一大，反而被选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时候，就说是因为他“有学问，光明正大，喜形于色，不说假话”等等。^⑦鲁迅更这样形容陈独秀：“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⑧这样一个人，怎会是搞投机的人呢？他的错误，不过是主动或被迫执行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其实质是教条主义。因此，把机会主义的帽子戴在陈独秀的头上并不合适。在八七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内扣帽子的现象很少，可是从八七会议给陈独秀扣上机会主义的帽子以后，扣帽子的现象就越来越多，以至帽子满天飞，陈独秀最后竟被扣上了十几顶帽子。八七会议的这种做法，对中国共产党后来的影响是很不好的。

复次，会议对陈独秀的批判是不够实事求是的。在会议通过的文件中，明确点陈独秀的名字的地方并不多，多是以“党的指导机关”而代之。但在会上的发言中，对陈独秀却是频频点名，而且批判得很严厉。即使在会议通过的文件中，也对陈独秀进行了点名批判。例如在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中，就有两处点了陈独秀的名：一处是批判陈独秀和谭平山反对土地革命；一处是在汪精卫说的话中提到，批判陈独秀完全服从国民党的领袖，放弃共产党的独立政策与政治路线。由于这不是正面的点名批判，因此下面只分析一下关于陈独秀和谭平山反对土地革命的问题。

八七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说：“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共产国际特别说明这一问题不止一次了，这许多时候，共产国际曾经给我们中国党明显清楚的指示，指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然而党的指导机关的工作，恰好和这种革命方针绝对相反”；“当第五次大会时，虽然土地问题的决议案通过了，但是党的领袖陈独秀、谭平山同志，却说现在只要扩大而暂时不能深入革命，所以没收土地还要等一等。”“党的指导机关的方针，客观上是反对土地革命的方针。”^⑨这就是说，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陈独秀等却不去执行，他们“客观上是反对土地革命”的。这种批判，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第一，共产国际关于要进行土地革命的指示与继续维持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是矛盾的。例如斯大林在蒋介石叛变后一方面指出：“蒋介石的政变表明革命已进入其发展的第二阶段”，即已“转变为土地革命”，现在要使“土地革命扩大和深入”，要“以全力展开土地革命”，“没有土地革命，没有千百万工农群

众对武汉军队的积极支援”，要打倒反动势力“是不可能的”^⑩。另一方面仍然盲目想信汪精卫，一再指示中国共产党要千方百计保持与汪精卫的合作。而汪精卫是不赞成进行土地革命的，要继续与他合作，就不能不尊重他的意见，就不能进行土地革命。如果要开展土地革命，就势必影响和汪精卫的合作，影响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因此，对于共产国际的这个方针，陈独秀等人感到无所适从。八七会议说共产国际关于土地革命的指示完全正确，是不符合历史事实。恰恰是共产国际本身存在矛盾的指示，束缚了中国共产党的手脚，影响了土地革命的开展。

第二，说陈独秀、谭平山提出“现在只要扩大而暂时不能深入革命，所以没收土地还要等一等”，即“先扩大，后深入”的方针，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这个方针是苏联派到中国的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先提出来的。在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对于是先开展土地革命，发动工农群众，巩固武汉国民政府，还是先进行北伐，解决国民政府内外的压力，然后再来开展土地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代表和武汉国民政府内，一直存在做激烈的争论。鉴于武汉政府当时面临的重重困难，鲍罗廷提出了“先扩大，后深入”的方针。他说：武汉政府国民革命军的很多军官都出身于地主家庭，如果开展土地革命，势必影响他们的情绪。因此，在四一二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面临重重困难的情况下，在土地问题上应该向国民党让步，首先进行第二次北伐，然后再进行土地革命，即所谓“先扩大，后深入”。这个方针被武汉国民政府和中共中央所采纳。如果说这个方针是错误的，责任首先在苏联派来的鲍罗廷，陈独秀不过是同意这个方针而已。

第三，说陈独秀等人不同意进行土地革命，甚至在客观上“反对土地革命”，更不符合历史事实。由他主持召开的几次中共中央的重要会议，都论述了土地革命、“耕地农有”的重要性。1927年4月29日他在中共五大上的报告中，还专门谈了土地问题，说：“从去年下半年起，农民运动已由广东发展到湖南，由提出组织问题和减租运动进而到提出土地问题。目前，农民运动已经到了解决土地问题的时刻。现在农民运动中的土地革命已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活生生的事实。毫无疑问，这一运动必然随着总的革命高潮的到来而发展起来。”“过去，我们党限制了农民运动，而现在必须没收大地主和中等地主的土地。”^⑪当然，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从维持统一战线的需要出发，他主张土地问题的解决必须经过国民政府的同意和批准，暂不没收小地主的土地。1927年4月26日，他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上即说：土地问题的解决“甚复杂，牵涉甚大”，“各方面都不能满意”，因而主张把原则和方法分开。原则上他同意“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以外之出租的土地，分给农民”，即没收大地主等土地进行分配；方法上则主张由农政部制订土地改良方案，各省党部、农协然后照它议定实施条例，再“呈请中央党部批准，交政府土地主管机关执行之”^⑫。他在中共五大上的报告中，也说“对于小地主的土地是不能动手没收的”，因为“小地主属于小资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我们需要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必须向他们作某些让步”，“目前就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毕竟太激进了”^⑬。在他的主持下，中共五大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议决案》，提出国民革命中的农民政纲是：“一、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二、（甲）无代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经过土地委员会，将此等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乙）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丙）革命军人现时已有的土地可不没收。”^⑭在当时国共合作的情况下，这个决议案的规定应该说是很好的，既照顾了国民党的主张，又提出了开展土地革命的任务。这些事实说明，陈独秀一直是主张进行土地革命的，怎么能说他“反对土地革命”呢？至于他对土地革命增加的那些限制，完全是由于共产国际那个既要开展土地革命，又要维持统一战线的充满矛盾的指示，责任并不在于陈独秀。

八七会议虽然没有明确撤消陈独秀的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但选出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陈独秀的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实际上被撤消。同时实际上被撤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的，还有谭平山和蔡和森，实际上被撤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有陈延年。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则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变成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也就是说，原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大部分出身知识分子的干部，不是实际上被撤消职务，就是实际上被降职。新提拔上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大部分是工人出身的干部。这实际上是一种带有宗派性的惩办主义，即认为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员中知识分子太多，他们已经不行了，需要撤换。所以主持召开八七会议的李维汉曾说：八七会议的主要缺点除了为

“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外，“同时在组织上开始了惩办主义的过火斗争”^⑤。中国共产党屡次打击知识分子，实际上就是从八七会议开始的。

当然，由于八七会议是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召开的，而且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实际上由共产国际代表主持召开的，最主要的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甚至都是由共产国际代表起草的，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我在这里指出八七会议对陈独秀处理和批判的不当，并不是责备八七会议，而是为了对八七会议做出客观的评价，总结其中的教训。如果不对八七会议做出客观的评价，后来的很多问题就不容易说清楚。

注释：

①《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回忆》，1986年4月，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和研究组编《老一代革命家论党史与党史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37页。

②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287页。

③《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回忆》，1986年4月，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和研究组编《老一代革命家论党史与党史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37页。

④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93—94页。

⑤《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52—289页。

⑥《简明社会科学词典》编辑委员会编《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310页。

⑦萧生（生）《访问建党时期的知情人》，《百年潮》2001年第5期。

⑧转引自张家康《陈独秀的个性和人品》，《江淮文史》1995年第6期。

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67页。

⑩《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03、216、230—234页。

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52、353页。

⑫陈独秀：《怎样解决土地问题》，载《中国农民》第2卷第1期，1927年6月出版。

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52、353页。

⑭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70页。

⑮《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回忆》，1986年4月，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和研究组编《老一代革命家论党史与党史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37页。

简论陈独秀晚年民主观

大庆师范学院 贾立臣

陈独秀早年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过程中,曾将西方的民主理念引入中国,开启了对中华民族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启蒙运动。到了晚年,他在反对官僚主义尤其是汲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教训时,对民主政治又进行了理性的反思,从而提出了许多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少有的真知灼见。

一、民主是旗帜,是“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

陈独秀从投身于革命之日起,就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和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舍生忘死,宁可“断头”“流血”也在所不惜。因此在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虽然中共中央罢其官却没能丧其志,革其职却没能夺其责。不过,无论是向中共中央提出不同政见探寻新的革命道路,还是身陷囹圄与各类恶魔苦斗抗争,或是力求摆正中国共产党与联共(布)中央的关系,都无法回避一个最敏感的问题——民主问题。

民主是一面旗帜,这面旗帜既不是哪个时代的专有物,也不是哪个阶级的专利品。陈独秀说:“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日、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并非仅仅是过了时的一定时代中资产阶级统治形式。”^①正因为陈独秀认识到了民主是随着历史时代不断发展的,因此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同时还公开地反对党内官僚主义和国际共运中滥用无产阶级专政而推行个人独裁统治的斯大林现象。

陈独秀后期阐发民主思想主要是针对两种现象,一种是针对犯有“左”倾错误的中共中央压制党内民主,一种是针对苏联的斯大林现象。前者的观点主要集中在1929年8月5日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中,针对中共中央以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名义压制不同意见的情况,对德谟克拉西进行了重新的研究和阐释;后者的观点主要集中在1940年7月至11月写的《给连根的信》、《给西流的信》和《我的根本意见》中。他当时虽然不能掌握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的全部档案资料,但是他却从零星的相关报刊资料中以及他本人与莫斯科方面的交往中,比较清晰地感悟到了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现象的基本情况。

陈独秀努力追求的是实现“大众民主”,是大多数人享有管理国家权力的民主,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是以实现党内民主为前提。可是,当陈独秀对革命的主张不但不能被党中央所接受,反而对他进行无情打击的处境下,使他深深地体会到打破官僚主义统治推进民主化进程是多么的艰难。所以,他不得不面对现实,重新发出“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进步的”的呼唤。同时,陈独秀也认识到:“非大众政权固然不能实现大众民主;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级独裁,必然流为史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制,这是事势所必然。”

陈独秀强调,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是进步的,但是,如果“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的助成这一退步的人们,都是反动的,不管他口中说得如何左。”^②在这里陈独秀把俄与德并称为“独裁”国,并较之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从陈独秀的言辞中不难看出,他在表述自己的观点中夹杂着明显的情绪化。但是如果我们能平心而论,结合以“独裁”取代“民主”及其背后“助成这一退步的人们”的所作所为,然后再客观地分析陈独秀的观点,就会发现他的观点与客观实际并没有多少误差,只是当时的人们长期受到以“民主”之名掩盖“独裁”之实的当权者政治威慑而不敢直面现实而已。

陈独秀后期民主思想是对党内“左”倾思潮进行斗争的产物。陈独秀从创建中国共产党开始,几乎没有间断反对党内“左”倾思潮的斗争。中国革命之舟是在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之中漂泊的,各种急进狂躁的情绪一浪高过一浪的发展着,大有后浪推前浪且后浪超前浪之势。

大革命失败之后，瞿秋白、李立三以及后来的王明等新的领导人，并没有正确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不能正确对待陈独秀提出的一系列的中肯意见。他们破坏党内民主，容不得政治观点上的一点分歧，听不进有违中央意见的不同声音，采取一种主观武断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来对待持有不同政见者。

陈独秀承受着大革命失败的猛烈打击，忍受着包括陈延年和陈乔年在内的大批革命领导骨干被屠杀的巨大悲痛，希望新的中央能发扬民主，以集体的智慧来弥补党在幼年时期的不足，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以新的政策和策略开辟新的道路。可是新的党中央却使他大失所望。尤其使他无法接受的是，“现在中央政策，竟在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名义之下，把党内必需的最小限度德谟克拉西也根本取消了。”^③这与陈独秀担任总书记期间的情况大相径庭。在陈独秀主持中央工作时期，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每年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而且平时还要召开多次中央全会和临时扩大会，各种会议都畅所欲言，允许不同意见相互争论，对陈独秀的主张也可以评论和否定。尤其是在党的五大召开期间，党内高级领导人瞿秋白私自散发反对总书记陈独秀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对这种不利于团结和统一思想的不正常现象，陈独秀也能坦诚相待，也能以其宽阔的胸怀与平和的民主意识待之。

可是在他离开了党的领导岗位之后，新组建的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却一再坚持“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以维护党的领导之名而行树立个人权威之实，放任革命事业遭受损失而不顾，不遗余力地打击持有不同政见者。面对这种情形，陈独秀不顾个人得失，宁可戴上“反对派”这顶足以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大帽子，也要把自己的一片赤诚之心剖白于天下。他在被开除出党的前夕曾连续致信中共中央，表示“如果你们老是固执你们的褊狭性，而不顾及党内德谟克拉西的重要性，而畏不同的意见如蛇蝎，而企图用中央威权霸蛮的造成你们意见的一致，对于不同的意见，禁止讨论，或消极的不在党报上公表出来，一听到同志中和你们有不同意见，不管他的内容如何，便简单的用‘小资产阶级观念’‘非无产阶级意识’‘观念不正确’如此等类没有内容的抽象名词来排斥他；更或者给他戴上一顶帽子，如‘反对派’‘托洛斯基派’‘某某派’等，来镇压住他，且以暗示一般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免开尊口；这便是有意的或无意的阻住了党的进步。”^④历史实践证明，党内破坏民主都是借助于批判“小资产阶级”、“极端民主化”等帽子、棍子的威力发展和恶化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如同接力赛似的一个接着一个地犯着“左”倾错误。每当失误发生之后，我们党都进行了认真总结和批判，这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每当错误开始形成之时，陈独秀就敏锐地发觉并进行了毫不留情地揭露和斗争，这其中的必要性要比已经造成损失之后进行总结批判大得多。

在封建专制的传统极其浓重的国家，高举“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是很难的，实现“大众民主”真的是任重道远，决不是当年陈独秀邀请“德先生”和“赛先生”飘洋过海远渡重洋来到中国那么简单，当然也不是如同后人把民主二字写在党的旗帜上就自认为已经实现了民主那么容易。因为深受专制之苦而渴求民主的中国，用民主外衣美化专制尊容的现象并不少见，假借“民主”之名强化个人独裁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故而在中国的现在和将来，继续高举“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仍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二、民主是制度，是根绝斯大林现象的法宝

陈独秀后期民主思想是反对斯大林现象的思想武器。陈独秀是讲究实事求是之人，他虽然连遭打击，甚至有人暗中落井下石，但是他却健骨傲立，不改本色。他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深思熟虑六七年之后，对斯大林现象进行了无情的剖析，认为斯大林现象的核心问题，是无产阶级政权下的民主制问题。因此我们“应该毫无成见的领悟苏俄廿余年来的教训，科学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计布尔雪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不能一切归罪于史大林。”^⑤

当时，人们能从苏共的历史中觉察并怀疑斯大林现象的没有几人，敢于公开批评斯大林现象的就更是微乎其微了。而此时的陈独秀却不惧权力的神光威慑，把剖析斯大林现象的利刃直指“格柏乌政治”。他要“毫无成见的”“重新估计”以往被人们神化的“理论”与“领袖”，且以“科学的而非宗教的”态度去求索真正的“价值”。这不仅是做人做事所必需的自主原则和求真精神，而且是播撒民主种子所必备的禀性和品格。

陈独秀非常严肃地指出：“如果说史大林的罪恶与无产阶级独裁制无关，即是说史大林的罪恶非由于

十月以来苏联制度之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自史大林),而是由于史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藉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苏联二十多年的历史教训已经告诉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⑥

陈独秀对斯大林的个人独裁深表义愤。在揭露斯大林现象时把注意力转向了苏联的政治制度,这不仅是有远见的,而且是有胆识的。他如果回避这些敏感的政治问题,固然会增加政治上的保险系数,但是如果那样,所议论的民主问题只能是蜻蜓点水或雾里看花,不可能切中要害。因此,陈独秀不后退半步,而是急流勇进,把利刃直插困扰民主发展的政治制度。这应该说是二十世纪国际性思想大解放的震天雷。

另外,这里涉及到陈独秀批评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实行“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独裁制问题。“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现象是陈独秀历来反对的,因为这是与民主原则相背离的。关于“党外无党”的问题,陈独秀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为了争取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众团体的合法性,同各种反动的独裁统治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即使在敌人的监狱里,也没有停止这种斗争,如果不冲破“党外无党”的禁区,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永远是不合法的党派,国民党的“清共”和“剿共”都变成合理的了。关于“党内无派”的问题,陈独秀更是极力反对的。陈独秀主张党内应该允许不同意见的争论,这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所必需的。如果党内不允许不同意见发表和争论,一有不同意见,就以“反对派”的名义加以打击,不仅助长了党内的个人专断和独裁,而且也会丧失政党最基本的生存活力。每当党内发生意见分歧,都以张派李派相称相斗,轻者斗个没完没了,重者斗个你死我活。如联共(布)中央反对所谓的“托洛斯基派”、中共中央反对“托陈取消派”就是这样。以人划派,以派待人,以“赝品民主”破坏和反对真正民主,掩护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扛着“民主”大旗招摇过市。

陈独秀后期的民主思想已经不是单纯地宣传民主和要求民主的问题,而是要从制度上铲除萌发专制独裁的祸根。从这个意义上说,陈独秀后期所主张的民主制度,正是当时党内极其缺乏的一种预防和制裁“专制魔王”的法宝。

三、民主就是民主,民主本身即不姓“资”也不姓“无”

陈独秀晚年在追求民主真谛的过程中,在与不同观点进行辩论过程中,从政体建设的角度对民主的真正内涵作了必要的说明:“吾人第一须知民主之定义,即为由大多数人民管理即统治国家”。“以言民主,其一即由大多数人民管理政治,亦即由大多数人民代表政制行使国家统治权,此乃君主一人统治及贵族少数人统治之对称也。”^⑦

与此同时,陈独秀根据民主的发展历史,对民主价值及其具体内容进行了详细的阐释:“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是: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⑧陈独秀强调,民主“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之一,“至可宝贵”,我们必须正确认识民主,万不可因为无产阶级发展壮大甚至是夺取了政权就“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⑨

在国际共运史上,关于民主阶级性的论说,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并根据政治斗争的需要不断夸大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对立性。陈独秀经过一番深入的思考后指出:“所谓‘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是实施的范围广狭不同,并不是在内容上另有一套无(产阶)级的民主。”^⑩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在内容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只是在实施范围方面有所不同而已。在陈独秀看来,资产阶级民主狭小,是少数人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广泛,是多数人的民主。大家熟知的“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要丰富得多,实施的范围也广大得多,因为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时代,我们便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其实此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

的。”^{④⑤}

民主的内容是有具体规定性的，并不因为不同的阶级使用而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④⑥}如果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各有自己的一套民主，两不相干，那么坚持无产阶级民主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必要性和历史意义了。

然而，受苏共中央对民主问题的误导，常常把民主的内容与民主的形式混为一谈。在批驳西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之时，不加分析不加选择地把民主也否定了。其实：“民主之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内容，许多年来，许多人，把民主和议会制度当作一件东西，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议会制度会成为过去，会成为历史残影，民主则不然也。苏维埃制若没有民主内容，仍旧是一种形式民主的代议制，甚至像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④⑦}至于民主的形式，是根据不同国度的具体国情来选择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本阶级的利益，曾把近代民主作为一种反对封建制度的锐利武器，为发展资本主义扫除障碍，采取了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形式。

我们也不否认，资产阶级在实行民主的过程中，自然要采取某种欺骗的手段，从而给人们一种（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的假相。

其实，被人们称为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并不是民主自身固有的，而是由具有虚伪性的资产阶级在运用民主的时候产生的，也就是由借用民主的主体的虚伪性决定的。如同导弹究竟是具有用于侵略他国的进攻性，还是具有保护本国安全的防御性，则取决于占有国的性质一样。一碗大米饭，并不因为资本家吃了就具有自私自利剥削别人的资产阶级性，也不能因为工人吃了就具有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无产阶级性。

可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人们要求民主的时候，常常被少数企图维护个人权威、显示个人权势的人斥之为“资产阶级民主”。如此一棒喝来，民者只好向“主”闭口、望“主”却步了。运用民主的阶级性来保护官僚主义，这是阻碍民主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

在陈独秀所宣传的民主思想里，民主就是民主，民主本身既不姓资，也不虚伪，无产阶级完全可以而且应该理直气壮的加强民主建设，确保广大民众的民主权利和民主地位的真正实现。

四、民主是“消毒素”，是“官僚制”和“独裁制”的克星

民主与专政，是同一国家制度的两个方面，是国家权力的两种职能。所以民主实质上是一定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政治手段和工具。

陈独秀指出：“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④⑧}陈独秀在这里强调的是没有民主制的无产阶级独裁，必然是党的独裁，领袖的独裁，实质上必是个人独裁。正因为有这种认识，所以陈独秀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说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无产阶级的政权形式只有独裁，不应该民主，则史大林所做一切罪恶都是应该的了，列宁所谓‘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乃成了一句废话。”^{④⑨}

他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有国有大工业、军队、警察、法院、苏维埃选举法，这些利器在手，足够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用不着拿独裁来代替民主，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④⑩}可是，在一段时期里，苏共领导人却在开展党内斗争时，无限夸大并片面渲染列宁关于只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而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言外之意似乎不承认无产阶级民主的人则可以是马克思主义者。正是这些形而上学的理论权威，“把独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联共（布）中央领导人太讲特讲无产阶级独裁，一方面为了运用专政手段惩治政敌而发挥舆论导向作用，另一方面是借用“独裁”的声威震慑和约束人民，强化和神化自己。“他们企图把有思想的人类变成无思

想的机器牛马,随着独裁者的鞭子转动。”^⑥

其实在独裁统治之下的思想统一,必定是缺乏民主孕育出的真诚,那么这种“统一”或者“一致”掩盖下的分歧,要比公开的分辩和论争更危险。

陈独秀说:“我们对于关联中国无产阶级运命的民主运动民主口号,必须有深切的认识,必须认识它已经由资产阶级打击封建势力的武器变成无产阶级打击资产阶级的武器;必须认识它不仅是在反动时期向资产阶级进攻的武器,并且是在革命高潮中推翻资产阶级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武器;必须认识它不仅是在某一时期的策略,而是中国革命的骨干,中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之全部策略的基石!”^⑦

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把民主与专政统一起来,万万不可用专政、独裁取代民主。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时期,随着主要矛盾的转移,生产力水平的逐步提高,无产阶级的民主必将更加扩大和更加完善。只有以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民主制作为官僚主义的消毒素,领袖个人独裁的历史悲剧才不会重演。

陈独秀始终念念不忘要加强民主建设,以有利于未来社会主义的实现和完善。他对民主问题的再探讨,不仅纠正了人们对民主的误解,而且对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重大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首先,陈独秀重新认识了民主的属性以及轻视民主的危害性。他指出:“德谟克拉西,是各阶级为求得多数意见之一致以发展其整个的阶级力所必需之工具”,没有了他,“在党内党外都只是集权而非民主,即是变成了民主集权制之反面官僚集权制。”^⑧只有加强和完善民主建设,才能有效地防御和抵制政治腐败的泛滥。

其次,陈独秀强调了民主与社会主义的不可分割性。民主绝不应该成为少数人为了实现独裁而玩弄权势的统治术。从民主演化的过程看,“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⑨同时强调“它和社会主义并不是对立而不相容的东西。”在陈独秀看来,民主主义一方面可以与资本主义“分离”,另一方面又可以与社会主义“相容”。所以“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并不是抛弃民主主义,而是扩大民主主义。”^⑩不能包容民主的社会主义,不可能是健全的社会主义,甚至不是社会主义。陈独秀认为“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⑪破坏民主,社会主义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总之,陈独秀将民主与社会主义紧密地联在了一起,这是陈独秀民主观在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飞跃。再次,陈独秀强调了民主对于政党建设的重要性。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始终坚持代表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共产党的建设必须以坚持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的组织原则。

加强民主建设,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必然要求。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并不等于广大人民群众必然享受到了民主。在许多情况下,执掌实权的首脑人物常常觉得加强专政比加强民主建设更紧迫,更有利于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所以,对来自党内党外的各种意见和建议,总要保持一种警惕的心态予以审视。他们有意无意地要求维护领导者的个人权威,以个人为中心,树立个人形象,以个人意见左右全党,以个人是非为是非,一家之言被认为真理的标准。在这种形势下,凡是有疑义或有异说者,便要品尝一番被专政的滋味。其实,在我们党内,“同志无论在理论上,在政策上,在工作方法上,只要不离开革命的立场和党的立场,即和中央有显然不同的意见,而公然出来争辩,都是党内德谟克拉西所容许的。”^⑫

如果全党只是一个声音,有意见也不允许讲,不进行争辩,学术争鸣成为一种罪过,那么“党八股”式的套话、空话,官僚主义者的大话、官话,昏庸无道者的废话、鬼话,溜须拍马者的假话、屁话,必然充塞报刊和广播电视等各种媒体且泛滥成灾。由于各种信息失真,上下梗阻,由此形成的所谓“稳定”和“高度一致”,其危害性和危险性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陈独秀大声疾呼:“党教育党员,是要教成有政治自觉的战士,而不是要教成随声附和的奴才,不是要教成看鞭影而行止的牛马,不是要教成纯粹的雇佣劳动。”^⑬这是陈独秀为了实现真正的党内民主而发出的最恳切的呼唤。

陈独秀所以终生为民主而奋斗,就是因为他相信德谟克拉西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生命之

源。没有民主的民族必定是野蛮的落后的民族,没有民主的国家必定是残暴的病态的国家,没有民主的政党必定是独裁的短命的政党。有些领袖人物并非不懂得这个道理,但是由于民主素养欠缺,所以常常把民主反其意而用之。为了实现个人专权,以“非民主”的手段维护“民主”,以“非民主”的方式讨论“民主”。在这种所谓的“民主讨论”中,只许甲方对乙方信口开河的“讨”,而不允许乙方与甲方进行据理中辩性的“论”。在这方面,苏联最为典型。陈独秀在分析了苏联实行个人独裁践踏民主的严重后果时指出:“斯大林的官僚党制已经摧毁了共产党的活力和精神。”“斯大林的个人独裁正在代替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专政。”“斯大林在替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服务。”“帝国主义者如今不再需要拿起武器来反对苏联,他们可以通过斯大林主义者达到这个目的。”^①陈独秀根据苏联的历史和现实,断言将来“帝国主义并不一定要采用武装进攻政策,也可以使无产阶级的苏联不能长久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巍然独存。”^②

在历史的车轮还没有转入二十一世纪的前夕,苏共(布)解散,苏联解体。历史早已证明,当一个政党完全抛弃了民主和自由的时候,必然蜕变成了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并且与人民群众处于对立状态的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那么人民群众就必然毫无惋惜地将其抛弃。历史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陈独秀当年的预见在苏联得到了验证。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么无情。

注释:

- ①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54页。
- ②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53页。
- ③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53页。
- ④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
- ⑤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0页。
- ⑥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54—555页。
- ⑦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6、324)页。
- ⑧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7页。
- ⑨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55页。
- ⑩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7页。
- ⑪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55页。
- ⑫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0页。
- ⑬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54页。
- ⑭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0页。
- ⑮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54页。
- ⑯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55页。
- ⑰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56页。
- ⑱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5页。
- ⑲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页。
- ⑳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0页。
- ㉑唐宝林编《陈独秀语萃》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页。
- ㉒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55页。
- ㉓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5页。
- ㉔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 ㉕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345页。
- ㉖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0页。

应该宣传和学习“独秀精神”

肇庆学院 王福湘

内容摘要:在继续完成为陈独秀辩证的艰巨任务的同时,更迫切需要宣传和弘扬陈独秀的伟大精神。独秀精神的基本内涵是:永远寻求真理努力实践的精神,永远执着于民主和科学的精神。这些精神具有陈独秀的特质,而且已经化为他的人格操守,他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最优秀的楷模。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贫病交迫中度过了他最后的岁月,于流寓之地四川江津寂寞地辞世。此时他从国民党监狱释放不到五年,还处在特务宪兵的监视之下,共产党则早已开除了他的党籍,且在原来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的路线错误之上又加之以反革命托派汉奸的罪名。三年后,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基本正确地肯定了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和建党时期的历史功绩:“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我们是他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进入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工作,创造了党,但他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他创造了党,有功劳。”^[1]然而,所谓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以致这次革命终于失败;所谓土地革命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投降主义者,这时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了取消主义者。他们采取了反动的托洛斯基主义立场”,“不但不肯接受党的意见,放弃这种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反党观点,而且还同反动的托洛茨基分子相结合,成立了反党的小组织,因而不得不被驱逐出党,接着并堕落为反革命。”^[2]这些诬陷不实之词却正式写进了党中央同时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留在大陆的中国托派成员被一网打尽,陈独秀则被作为一个反面人物,牢牢地定位在历史教科书上。

经过半个世纪的沧桑巨变,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苏联的解体,当年共产国际和联共档案资料解密并在中国翻译出版,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工作终于在陈独秀问题上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被颠倒的历史又颠倒过来:一,说陈独秀拿日本人津贴当汉奸,完全是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副团长王明康生的造谣诽谤,与斯大林将十月革命的元老托洛茨基等人诬为外国间谍暗杀匪帮如出一辙;实际上,陈独秀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坚决拥护者。二,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后曾一度转向托派并组织党内反对派,主要是因为他与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反对斯大林的意见共鸣,托、陈的主张虽有错误,但属于革命阵营内的分歧,陈与托也有分歧,但都决不是反革命;前苏联的托派冤案已经公开正式完全平反。三,1924—1927年大革命中的右倾机会主义以至投降主义路线来源于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主要责任者是斯大林,主要执行者是他们派往中国的代表,都不是陈独秀,而且陈还进行过抗争和抵制,陈的错误是抵制无效后服从国际纪律作为执行者的错误。

真相大白之后,陈独秀终于恢复了他本来的历史地位,近代史学界已经公认:他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启蒙运动的领袖,杰出的民主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自觉继承鲁迅传统的中共党内老一辈杂文家、原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曾彦修撰文给陈独秀重新“定位”:“我以为,陈独秀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稀有伟人之一,也是三千年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大伟人之一。”“他是全中国各民族历史上高揭反对封建主义的纲纪伦常、人生哲学之旗的第一个最彻底的革命思想家,是最早而又最坚决要求彻底改变

我们民族不幸的、落后的命运,改造我们民族灵魂的伟大的战斗的思想家。他是‘德先生’‘赛先生’两个名词(民主与科学)的提出者,是一心要使中国现代化的先知。”^[3]这些评价也已逐渐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虽然还存在某些方面的阻力,但陈独秀研究正一步一步艰难地从“险学”走向“显学”。

当然还需要继续冲破阻力。与此同时,我们应该从陈独秀的历史遗产中继承珍贵的思想文化财富,也吸取重要的经验教训。在辩诬的任务完成之后,最迫切的需要不是脱离现实的所谓“纯学术”、“纯历史”研究,而是宣传和弘扬陈独秀的伟大精神,——许多研究者称之为“独秀精神”。

我以为,构成独秀精神的内涵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永远寻求真理努力实践的精神,一是永远执着于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它们互相联系相辅相成,超越了一般的概念,具有陈独秀的特质。兹分述如下:

永远寻求真理努力实践的精神

陈独秀生活在民族灾难深重和革命风云激荡的年代,他从青年到老年,始终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和革命者,不倦地寻求着救国救民的真理,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从反帝反清的民族主义,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的思想与时俱进,总是引领着时代潮流前进的方向,不但保持着先进性,而且具有超前性。陈独秀对真理的求索有三个显著的特点,这些特点又都表现出一以贯之的实践品格。首先,他是以社会历史的实践作为衡量某种思想理论的价值标准,从而决定自己的态度。对孔子儒家学说的批判和否定,是基于它对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作用,对国民个性的压迫和对社会进步的阻滞。他向发达的西方寻求真理,采取如同鲁迅所提倡的“拿来主义”,把眼光投向先进的法国、美国和十月革命时期的俄国,选择和输入那些已经或正在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社会科学理论,作为改造旧中国的思想武器。其次,一旦他认定和掌握了某种真理,他便勇敢地积极地付诸实践,掀起了或参与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次巨大的变革。辛亥革命时期他就是安徽的革命领导者之一。1915年他创办《青年杂志》,发动和领导了启蒙主义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他亲自撰写《北京市民宣言》,印发传单,并因而被军警逮捕。他总结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五四运动比以前爱国运动不同的地方,就是“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两点。^{[4]130}接着他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进入新阶段,掀起新高潮。即使革命遭到挫败,个人身处逆境,他仍然通过各种途径发表意见,尽全力实践自己的思想,心口如一,知行一致,奋不顾身,死而后已。第三,他能够根据实践的检验不断地自我反省,勇于坚持真理,也不惮于修正错误,不惜推翻以前的见解去探索新的真理。在探索过程中出现失误本是在所难免的,难能可贵的是他时时保持一种冷静反思的心态,能在实践中发现失误并努力纠正失误。陈独秀的主要失误可分为政治策略和基本理论两类。在政治策略上,他始而屈从共产国际和联共的指示,采取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不平等合作方式进行国民革命,失败后又转向托洛茨基,建立托派小组织,并主张以“国民会议”取代武装斗争。在基本理论上,他一度把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政治对立起来,低估了民主在人类社会发史上的长远地位和作用。这些错误不可谓不大,但都是他自己发现的,最早提出改正的,并且经过反思达到了理论的自觉,实现了认识的飞跃。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反思和飞跃是在监狱里进行的,陈独秀践履了自己在“五四”时发表的一段名言:“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4]21}陈独秀正是凭着他持之以恒的无所畏惧的探索精神和实践精神,为中华文明走向现代化作出了最有生命和价值的开创性的贡献。

永远执着于民主和科学的精神

民主和科学是陈独秀从西方拿来的真理,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的启蒙运动,他义无反顾地回答守旧派对《新青年》的攻击:“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5]442-443}陈独秀认为民主与科学紧密相连不可或缺,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两大动力:“没有民主,就没有进步,也没有革命,没有科学就不能生存,就要亡国,有民主才能有科学,有科学才能保民主,二者缺一不可,少一点也是不行

的。”^[6]陈独秀的民主精神包括政治思想的民主主义和为人处世的民主意识两个层面。前者是他终身为之奋斗的社会理想,也是他永在探索和实践的革命途径。他的民主思想有一个曲折的发展演变的过程,20世纪初创办《安徽俗话报》到五四时期为第一阶段,建党到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为第二阶段,被解除职务开除党籍到逝世为第三阶段。^[7]他总结了人类追求民主的历史尤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俄苏和中国革命的事实,经过否定之否定,最后达到新的思想高度,极具现实性和预见性。后者则是他安身立命的伦理思想和行为准则,也是他改造国民性的首要目标,即:独立自主。他把培养独立自主的民主意识视为国人最需要的最根本的伦理道德的觉悟,在《新青年》创刊号“敬告青年”,“谨陈六义”第一义就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5]130}与此相类,陈独秀的科学精神也表现在两个层面,即具体的专门的学科层面和基本的普泛的意识层面。前者主要包括政治学、文化学、伦理学、文字学、音韵学等,他都有深入的独到的研究。后者指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实事求是的方法论,贯穿于他的全部思想和行为,使他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保持着理性的批判态度,既不迷信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道家等传统经典,也不迷信形形色色的洋权威洋教条,包括共产国际和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他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如胡适所言“终身的反对派”。他说:“我向来有两种信念:一是相信进化无穷期,古往今来只有在一时代是补偏救弊的贤哲,时间上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也没有‘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一是相信在复杂的人类社会,只有一方面的真理,对于社会各有一种救济的学说,空间上没有包医百病的良方。”“这本是我个人的一种愚见,是由种种事实上所得一种归纳的论断,并且想用这种论断演绎到评判各种学说,研究各种问题的态度上去。”^{[4]106}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独立自主的民主意识互为因果,奠定了陈独秀一生特立独行的最坚实的思想基础。

上述精神能被研究者称为“独秀精神”,也是陈独秀最伟大之处,在于这些精神已经化为他的人格操守,他真正做到了为全中国乃至全人类的解放奋斗终身,真正做到了“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先忧后乐舍生取义的古仁人志士之风和献身真理启蒙民众的现代思想家革命家的品格近乎完美地统一在他身上,使他极富人格魅力。最难得的是他始终不渝,做到了两个“永远”(即上文所述“永远寻求真理努力实践”,“永远执着于民主和科学”),尤其在晚年面对极端困难复杂的环境,他的高风亮节更是发挥到了极致。他在狱中题写的一副对联:“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就是独秀精神的生动写照。他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最优秀的楷模。由陈独秀领导创建中国共产党,是历史最正确的选择,也是历史的必然,这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今天宣传和学习独秀精神,对于改造和提高中国人的文明素质,培育真正现代的中国知识阶级,从根本上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这样感叹:“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8]这段话移用于陈独秀之死和国人对他的态度,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陈独秀当然不是完人,但无疑是我们民族少有的伟人。陈独秀的沉冤昭雪,独秀精神薪尽火传,再一次证明中国大有希望。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谨以此文学习和弘扬伟大的独秀精神,纪念这位历史伟人。

注释:

[1]毛泽东.“七大”工作方针[N].人民日报,1981-7-17.

[2]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905-906.

[3]严秀.我看陈独秀[N].文汇报,1999-5-8.

[4]陈独秀著作选(2)[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5]陈独秀著作选(1)[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6]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G]//文史资料选辑(71).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61-64.

[7]王福湘.陈独秀的民主三部曲[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1):49-55.

[8]郁达夫.怀鲁迅.文学,1936,(11).

陈独秀宗教观的变迁轨迹

安庆师范学院 张洪波

内容摘要:陈独秀的宗教观大体经历了否定——肯定——更高层次的否定过程。早期认为“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继而主张要用“较好的宗教”代替“较不好的宗教”,当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用唯物史观去分析宗教,认为宗教也应“受时代及社会势力的支配”

关键词:陈独秀;宗教观;变迁

陈独秀对宗教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二十世纪初的前二十年,自从他亲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国际国内的形势迫使他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上,1924年以后,再也没有写过专论宗教的文章。通观陈独秀的宗教观大体经历了一个否定——肯定——更高层次的否定过程,同时也从宗教角度反映陈独秀由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过程。

“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大动荡时期,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传统的“三纲五常”伦理观念失去了政治依托,但新的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相适应的思想上层建筑尚未确立,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信仰无着,精神无序的混乱状态。社会上对鬼神和迷信的宣扬盛极一时,在理论界提倡基督教者有之,提倡佛教者有之,提倡鬼神救国者有之,提倡以孔教为国教者有之……对此陈独秀逐一进行了分析、批驳。

1912年康有为任孔教会会长,不仅发表尊孔文章,而且上书当局,要求以孔教为国教,他说:“凡国必有所谓国教也”,“欲定国教,惟有尊孔而已。”在康有为看来,由于西方宗教的侵入,使得中华文化乃至中华民族出现了深重危机,只有立孔教为国教方能抵御西方的宗教侵略,也只有孔教,才能适于现时中国,认为中国的一切文明,均与孔教相系相因,如果弃却孔教,一切文明会随之而灭,四万万同胞会沦为“天教之禽兽。”甚至说:“不拜孔子留此膝何用”,^①袁世凯颁布《尊孔祀孔令》,宣称“中国数千年来立国根本在道德,凡国家政治、家庭伦理、社会风俗、无一非先圣学说发皇流衍,是以国有治乱,运有隆污,惟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如布帛菽粟之不可离”。^②针对康有为的尊孔论调和袁世凯的“复辟”活动,陈独秀明确指出“宗教实质,重在灵魂之救济,出世之宗也。孔子不事鬼,不知死,文行忠信,皆入世之教,所谓性与天道,乃哲学,非宗教”。“孔教绝无宗教之实质与仪式,是教化之教,非宗教之教”。^③孔教宗教论者欲将重伦理观的入世之孔教视作神学性的出世之宗教,并同基督教、佛教一样列入世界性的宗教,存在着概念上的混乱,简直是“平地生波”,“惑民诬孔”,“凿孔栽须”。

如果通过政治上层建筑的干预,硬性将孔教定为国教,也违背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信仰自由乃近代政治之定则,把孔教列入宪法,就是“蔑视他宗,独尊一孔,岂非侵害宗教信仰之自由乎”?^④他认为在民主政治下,在观念多元化的当今社会,强制国民只能信仰某一教是行不通的,只能引起社会的纷乱。

1917年秋,桐城派文人俞复等人在上海创建了“盛德坛”和“上海灵学会”,并制订了《盛德坛坛规》和《灵学会简章》。《盛德坛坛规》是“以就正古哲,指津破迷为旨,用以富有日新,昌明教化,研穷学术,濬发灵性为宗”。^⑤灵学会则说“研究人鬼之理,仙佛之道,以及立身修养种种要义,极有益于人心世道”。这样,盛德坛重迷信实践,灵学会则重迷信理论宣传。出版了《灵学丛志》等刊物,宣传鬼神迷信,维护封建旧文化,反对新文化。面对鬼神迷信说,陈独秀利用自己主编的《新青年》,进行了揭露和批判。陈独秀撰写了《有鬼论质疑》和《再质有鬼论》等文章,用其善用的诘问、质难的方式从多方面对鬼神论提出了责问,揭露有鬼论在逻辑上的自相矛盾以及对科学常识的违背。对与宗教相连的偶像,陈独秀亦持否定态度。他说:“天地间鬼神的存在,尚不能确实证明,一切宗教都是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是骗人的,玉

皇大帝也是骗人的,一切宗教家所尊重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当破坏”^⑧。对于偶像,陈独秀描述是“一声不做,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全,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音同久)坐不动,十(音同实)是无用”,^⑨可见,偶像“是个无用的废物”,是“骗人的”。既然是骗人的废物,当然应该破坏、抛弃。当时的中国,大多数国民素质不高,对宗教难以从理论上进行解说,而在感性上对鬼神与偶像存在着较为普遍的盲目崇拜。因此,社会上风水、算命、卜卦、画符、念咒、扶乩、炼丹、运气、求雨、祈晴、迎神、说鬼种种邪僻之事肆意横行。陈独秀反对鬼神与偶像说,既批判了宗教说的粗俗,同时也有益于国民素质的提高。

对于佛教,早年的陈独秀也有较多关注,因为他知道,“吾国四万万人,佛教信者最众”。^⑩要研究中国的宗教,就不能不涉及佛教。在他交往的人士中,既有佛教界人士,也有佛学根底较深的文化名人,与著名诗僧苏曼殊有莫逆之交,在其早期诗文之中也可以看出受佛学的影响。陈独秀认为佛学与佛教是有区别的,前者属于思想观念,后者是宗教派别,如果去研究佛理,无可厚非。“佛法为广大精深之哲学,吾所素信不疑”^⑪“那佛教的道理,象这救苦救难的观世音,不生不灭的金刚佛,我是顶信服的,顶敬重的”。^⑫从佛教的教义看,佛教可谓的爱他主义之极,“然究其归宿,仍为自性涅槃,脱生死轮回,以至佛地计耳”。^⑬也是一种“自利主义”。佛教僧团之中“好言护法,不惜献媚贵人,以宏教大业,求诸天下万恶之魁,如尊武则天为菩萨化身之类,古今不乏其人”,^⑭他还一针见血地揭露说,虔诚信奉佛法,口念阿弥陀佛的人,往往是自己做了十恶不赦的坏事后,为求得心里上的平衡而投奔佛门,这样似乎可以逃避世人的谴责。有的人则是口里念着阿弥陀佛,心里想着坏主意,“虽为大师而不腐败堕落者……兹世曾有几?”^⑮“几乎可以说,凡受佛化的都是恶人”。^⑯虽言之过激,但陈独秀是强调佛教的社会作用的消极性,虚伪性。陈独秀认为,当时的中国之所以国力薄弱、民智主张是与佛教的影响有关的,“魏、晋以还,佛教流入,生事日毁,民性益偷,由厌世而灰心,由灰心而消极,由消极而堕落腐败,一切向上有为,字曰妄想,出世无期,而世法大坏”。^⑰正是因为佛教“薄现实而趣空观”,“取世界有为法一切否认之”,要人们不执著现实,把目光投向虚无缥缈的未来,必然阻碍社会进步,导致民族文明的衰弱。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大地之所以悲观厌世情绪和虚无主义思想弥漫一时,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其理论源头上有佛教的“空观”学说。不否定佛教,中华民族难以自立自强。

对于基督教,早期陈独秀也持否定态度。基督教主张人和宇宙万物都是由上帝创造的,因此,上帝理应是宇宙最高主宰。人们对它只能是盲目信仰,虔诚崇拜,上帝是解释世界生成发展,万事万物生生灭灭的终极原因。对此,陈独秀尖锐地指出这完全是“凭空捏造,不能证实”的,如果“上帝能造人类,上帝是何物所造呢?”^⑱所以,“耶和华中上帝也是骗人的”。^⑲那种认为只有宗教才能解析宇宙人生,只能“自欺,始克自解,非真解也”,^⑳总之,五四前期的陈独秀竭力主张要解析“宇宙人生之秘密”,“厥唯科学”^㉑。从而大声疾呼“人类将来真实之信解行证,必以科学为正轨,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㉒

用“较好的宗教”代替“较不好的宗教”

1920年前后,陈独秀的宗教观有一个较明显的转变。陈独秀在重建中国新文化以及改造国民性的过程中,深感中西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要重建中国文化必须借鉴吸取西方文化中的积极成分。在他看来,“支配中国人心的最高文化,是唐虞以来伦理的道义。支配西洋人心的最高文化,是希腊以来美的情感和基督教信与爱的情感……道义是当然的、知识的、理性的,情感是自然的、盲目的、超理性的”。^㉓中国人缺乏西方那种“美的宗教的纯情感”,“没有情感的人,任你如何给他爱父母、爱乡里,爱国家,爱人类的伦理知识,总没有什么力量能叫他向前行动。”^㉔中国国民性中那种麻木不仁,不思进取的“根性”是与情感的缺失有直接关联的。在陈独秀看来,情感的力量是伟大的,离开情感的伦理道德只是僵化的形式,而缺乏内省自律的力量,离开情感的知识是片段的而非连贯的。因此,补救中国文化的弊端“应当拿美与宗教来利导我们的情感”。^㉕

1920年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指出:“宗教在旧文化中占很大的一部份,在新文化中也自然不能没有他”,“因为社会上若还需要宗教,我们反对是无益的,只有提倡较好的宗教来供给这需要,来代替那较不好的宗教,才真是一件有益的事”^㉖“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意美术、音乐,又要反对宗教,不知道要

把人类生活弄成一种什么机械的状况,这是完全不曾了解我们生活活动的本源,这是一桩大错,我就是首先认错的一个”。^⑤陈独秀认为,在诸多宗教的比较之中,基督教可以说是一种较好的宗教。他曾经说过,在解释死与爱的问题上,基督教较之儒教要“妥贴而易施”,“基督教根本教义只是信与爱,别的都是枝叶”。^⑥基督教的精髓在于耶稣伟大的人格和情感,即“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平等的博爱精神”,耶稣精神是永恒的。在他看来,基督教传入中国几百年,没有起到什么好的作用,负面作用到不少,究其原因不是基督教本身,而是因为中国人不理解基督教的教义是信和爱,“这种根本教义,科学家不曾破坏,将来也不会破坏”,^⑦因此,“我主张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⑧由此可见,陈独秀的宗教观较之新文化运动前期主张的“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有较大的修正。

当然,此时的陈独秀对基督教的推崇并不是基督教的全部,“基督教的‘创世说’,‘三位一体说’和各种灾异,大半是古代的传说、附会,已经被历史学和科学破坏了,我们应该抛弃”。他接纳的主要是“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⑨

陈独秀宗教观的修正,究其原因主要有:其一,建设新文化的需要。陈独秀认为,无论是旧文化或新文化都不能不包含宗教,在诸多宗教中,他认为基督教最好,基督教中包含的美的、宗教的纯情感,能弥补中国文化的偏弊;其二,从现代社会生活出发。陈独秀指出中国的传统宗教,都是产生于封建社会,已经不适宜于现代生活,而基督教提倡的平等博爱精神不但可以冲破封建的等级观念,也与现代社会要求的财产独立,政治民主有相通之处;其三,是提高国民觉悟的需要。此时的陈独秀对伦理觉悟十分注重,他认为辛亥革命的失败,中国的不进步与国民不觉悟有直接关系,而伦理与宗教又密切相联,宗教、伦理、法律,同为“维持群治之具”。^⑩选择什么样的宗教伦理来启发国民觉悟呢?陈独秀认为最好是基督教伦理精神;其四,与陈独秀本人的理论基础有关。陈独秀1919年下半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但还不可能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问题的方法,推崇的还是自由、平等、博爱等抽象理论,而这些理论与基督教教义有相通之处;其五,学习西方的需要。在陈独秀看来,中国较之西方,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均有较大差距,要向西方学习,不仅是要学习其科技、经济、政治,同时也应引进西方包括宗教在内的文化,他早在《答佩剑青年》一信中就说过,“吾人倘以新输入的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吾人只得任取其一”。^⑪在中国传统宗教精神与基督教精神之间选择,只能是非此及彼。

“宗教思想的变迁”,“需受时代及社会势力支配”。

陈独秀对基督教的肯定时间并不长,大约百天左右,与后有近两年时间,陈独秀很少谈及宗教问题。

1920年4月始,陈独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观察和分析社会问题,由他主编的《新青年》也发生了观念上的转变。正如蔡和森所说:“《新青年》以前是美国思想宣传机关,但是到了仲甫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就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了,宣扬社会主义了,到1920年‘五·一’特刊‘完全把美国思想赶跑了’”。^⑫从此,陈独秀的宗教观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开始用唯物史观去分析宗教问题。

第一,不同的宗教产生于不同的社会条件。陈独秀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认为宗教的产生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条件。他说:“孔子的学说思想所以产生在中国也决非偶然之事……这完全是中国的社会才产生孔子的学说,决不是有孔子的学说才产生中国的社会……我相信耶稣若生在中国,也必然主张夫妇、父子、君臣的伦理道德,孔子若生在印度,也必然是一个悲观厌世的宗教家,释迦牟尼若生在欧洲,也必然是一个主张自由进取的伟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在的社会都有支配他们思想的力量”。^⑬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地理环境对宗教的形成也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孔子之学说,为社会所养成……印度地居热带,酷暑如焚,人人皆抱厌世悲观之思想,故造成释氏之学说……耶稣重自由与进取,然究其原因,亦与欧洲多岛,交通便利,人民轻于迁徙往来,故无家族观念,且其地属北温带,气候温和,故无厌世悲观思想……此三大伟人之学说,非自成之,乃社会成之也”^⑭陈独秀的这一见解,无疑是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的。

第二,对宗教的认识根源作了唯物主义的解说。宗教是怎样产生的,其认识根源如何,是宗教研究者不能不关注的问题。陈独秀于1922年4月1日在交大就宗教问题作过一次专题演讲。他说:“宗教问题,也该

用历史观来研究”。^①陈独秀认为,宗教的发生是对超人间力量的崇拜,那为什么人们有崇拜心呢?“不出二种原因:(一)可怕;(二)可爱罢了”。^②早期宗教是一种多神教,较多表现为自然崇拜,因为某种自然物或自然现象常常给人带来难以认识和把握的神秘性,有时给人带来灾难与痛苦,有时给人带来欢乐与幸福,对这些既可怕又可愛的自然物或自然现象,人们产生了崇拜心,这属于自然宗教阶段。后来随着人类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想象出“一种很大的力量超过人的灵性的东西,来支配人类的灵魂,于是抽象的神就被他们想出了”,^③从而产生了人为宗教。基督教、佛教、道教都属于这种宗教。陈独秀对宗教产生的历史考察,是符合宗教产生的历史过程的。

第三,对基督教教义提出诘难。陈独秀指出:基督教“教义中最简单最容易说明的缺点就是上帝全能与上帝全善说矛盾不能两立。”^④“他们以为一切世界人类……都是上帝造的,所以有反叛上帝的意思的,就是罪恶,但人类为什么要有罪呢?说,是不听上帝的命令,可是一切世界人类,都是上帝造的,那上帝为什么又要造有罪的人呢?上帝是慈善的何必使世界上有许多有罪的人,使世界不能一日平安呢?不是上帝大儿戏吗?既要使人类无罪,却造了许多有罪的人,既要使世界和平,却培育了许多乱世的原素,这又何苦呢?”^⑤基督教的“原始罪恶说与上帝全善全能说不相应”^⑥。对于基督教宣扬的博爱、牺牲等美德,陈独秀肯定这是“至可宝贵的基督教义”,同时又指出:“博爱、牺牲,不是有了基督教才能成立,他是能独立脱离了基督教而实行的,所以这二种美德,不能算是基督教独有”。^⑦第四,对宗教的虚伪本质进行深刻批判。陈独秀不但指斥基督教的有些教义相互矛盾,而且象“耶稣一生的历史象降生、奇迹、复活等事,却没有历史和科学的证据使我们真实相信”^⑧“基督教的爱也叫了几千年,何以现在仍是‘人类自杀’的情形。”^⑨这种爱的呼声“能够感动欧美资产阶级使他们实行人类相爱,使他们自己取消资本帝国主义,不去掠夺劳动阶级不去侵略弱小民族吗?”^⑩这些掠夺和侵略他人的欧美资产阶级恰恰大多是基督教信徒。他们的爱心何在?佛经上“明明说无我相,我们反要造一个佛相来拜,岂不是和佛教大相反背了吗?”^⑪第五,揭露教会的罪恶。对基督教的评价,陈独秀“总觉得基督教与基督教会当分别观察”^⑫其目的是认为基督教的教义还有些值得肯定的东西,不必“特别攻击”,“至于基督教会自古至今所作的罪恶,真实堆积如山,说起来令人不得不悲愤而且战栗!”^⑬异端裁判所对科学的敌视,对科学家的迫害,对自由的践踏,举不胜举。如果把基督教会“压迫思想自由,压迫科学的事,细举起来,一大本书也载不了。”面对“大战杀人无数,各国的基督教会都祈祷上帝保佑他们本国的胜利,各基督教的民族都同样的压迫远东弱小民族,教会不但不帮助弱小民族来抗议,而且作政府殖民政策底导引。”更为可恶的是“无数的宣教师都是不生产的游民,反要劝说生产劳动者服从资本家;无一国的教会不是日日向资本家摇尾乞怜,没有财产的新教教会更甚。”为了诱使青年学生入教,不惜“以介绍女生来劝诱学生信教的,更有以婚姻的关系(而且是重婚)诱惑某教育家入教的,势力金钱之外,还要用美人计来弘教,是何等下流?”^⑭教会与政府的关系是一种“我给你圣经,你给我利权”的交换关系。陈独秀列举了基督教会的大量罪证,从而认为:“天主教的罪恶是刻薄惨杀,基督教的罪恶是笼络”。^⑮因此,他对学生反基督教运动“十分赞成”。对主张静坐不辍,念经拜佛的同善社,陈独秀认为,对他们简直无“学理”可说,“只有用刑法来制裁”^⑯。

注释:

①《康有为政论集》(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58页。

②《政府公报》1914年9月26日。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5、225、391、391、216、162、46、301、163、163、162—163、346、391、253、253、253、300、281、46页。

⑤《灵学丛志》第一卷一期。

⑭《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知新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71页。

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6—87、87、88、125、125、85、92、88、89、323、257—258、342、343、343、330、345、369、344—345、330、666、666、332、330、331、347、314页。

⑳《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7页。

陈独秀是不宽容的代表吗？

——兼评胡适《容忍与自由》

吉林长春 靳树鹏

胡适四十多年前写的《容忍与自由》近年又被提起并全文刊登。王毅先生写道：“现在看来，除了若将 tolerance 译为‘宽容’，则可能比胡适当年将其译为‘容忍’更贴切以外，此文所叙述的一切理念以及他信奉‘宽容’的那份真诚，似乎都还没有过时。”（《书屋》2001 年第 5 期）胡适论述宽容的文字不少，此篇却称不上佳作。

胡适这篇文章的主旨就是他反复强调的一句话：“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我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对我的容忍度量是可爱的，是可以感激的。

人类的习惯总是喜同而恶异的，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

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

胡适此文有提倡不反抗之嫌，发表当时就引起许多非议。有人认为把容忍和自由混为一谈，已经不像是主张“自由是要人们去争取的”那位胡适了。胡适“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毛子水和殷海光也立即各写一文（毛是胡适老友，殷是晚辈，他们三人都是《自由中国》半月刊编辑委员）。毛文强调胡适所说的“容忍”是“克己”的功夫和“守法”的精神，有宋儒吕伯恭“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哲学基础，并不是要大家不要去争取自由。这是感到胡适的文章漏洞太多，替他作些解释。殷文的指向则与胡适不同，他写道：“同样是容忍，无权无势的人易，有权有势的人难。……有权有势的人颐指气使惯了。他言欲为无穷则，行欲为后世法，到了现代更变为‘主义’等类‘绝对真理’的化身。要这类人士学习容忍，真比缆绳穿过针孔更难。”（《殷海光文集》第一卷 318—319 页，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出版）

台湾大学历史教授张忠栋说：“胡适这篇文章的主要对象究竟是谁？他究竟是要求‘国家’‘社会’的容忍，还是如他文章最后所说特别要求‘我们’容忍，某些读者难免有所疑问，甚至他自己也有一点困扰。他的题目曾经一改再改，最初想用《政论家的态度》，后来改作《自由与容忍》，最后才用《容忍与自由》，似乎他最初的构想，是要求发表言论的人多用容忍。”（张著《胡适·雷震·殷海光》29—30 页，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 1990 年出版）可见胡适此文不但令读者一头雾水，他自己的立意也有些游移模糊。

胡适是在什么情况下写这篇文章的呢？原来《自由中国》半月刊惹上官司，是人家设计好的政治陷害，以“伪造文书”、“诽谤”和“有利于叛徒之宣传”三项罪名控告发行人雷震。1959 年 3 月 3 日下午雷震被台北地方法院传讯。胡适很焦急，几次往编辑部打电话询问。傍晚雷震从法院回来即去胡适寓所，胡适先倒一杯酒给他压惊。几天后胡适就写了《容忍与自由》，还写了致《自由中国》编辑委员会的信，这是一封谴责的信，要求编辑委员会“检讨自己的编辑方法”。雷震夫人宋英女士等人都不同意发表这封信，胡适坚持要发表，雷震分别说服了几个人才发表出来。胡适的动机很明显，是要给官方一点面子，抹平这场官司，保住《自由中国》，这是他向美国友人证明台湾有言论自由的一块招牌。

胡适在《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演讲中，又应殷海光的要求讲了他写《容忍与自由》的考虑。除了重申那篇文章的意思外，他又强调了两点：一是容忍是双方面的事；二是不仅有兵力有政权的人是有权有势的，我们拿笔杆写文章的人也是有权有势的。他还建议大家无妨“巧言令色”，说话要说得巧，说得非常客气，非常婉转，好让别人听得进去。胡适说完这番话不久，雷震被捕，《自由中国》停刊。有人说：《自由中国》办了十年，国民党一向容忍，想来是容忍到了极点，才出此断然的手段。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说得非常明

白：“已经容忍得够了。”

殷海光在与学生及友人通信中曾说，晚年的胡适心智已死，又说胡适的学问有如台湾的“浅碟子经济”。话虽偏激，也有相当的根据。人类喜同恶异的习惯能是不宽容的唯一根源吗？历史上的宗教迫害、思想迫害和政治迫害，仅仅是因为施暴者深信自己正确（即不会错）的心理吗？难道没有更为重要的政治经济利害纠结其间？在一个专制独裁的社会里，也不能把摇笔杆的人的所谓权势与强大的国家机器等量齐观。施暴者并不总是自以为真理在握，有时可能恰恰相反，觉得自己并没有多少道理，才把批判的武器转变为武器的批判，以铁血政策代替是非之争。很可能，内里的精神越虚弱，表面的暴戾越凶残。胡适是有才气的，也是敏锐的，无论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常能提出一些新颖的见解，有时也难免深一脚浅一脚。他这篇文章或者是为了一个具体目的仓促写成，一些看法就失之肤浅。

不是宽容比自由更重要，如果没有对每一个个人的真正尊重，没有对人权的真诚保护，难有宽容，也不会有自由。也不是没有宽容就没有自由，而是没有人权就没有自由。

胡适在这篇文章中还用五分之一左右的篇幅，举出了近代中国一个不宽容的实例。他引录了陈独秀倡导白话文时说过的话：“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几十年前胡适赞赏过这些话，此时他认为陈独秀“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是典型的不宽容态度。近代中国不宽容的实例很多，胡适却把板子打在老友的屁股上，也是他的败笔。谈论宽容还是不宽容，也不是不能以陈独秀为例，但重点并不在文白之争。陈独秀曾倡导布尔什维主义，这个主义强调阶级斗争，更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本质上是不宽容的，只是陈独秀晚年又否定了这个主义。宽容精神是指宗教、思想、学术容纳异端和异己，政治上允许反对。在中国近代陈独秀是主张政治反对派的最著名人物。胡适1949年写的《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序》，对陈独秀说的“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推崇备至，认为“在这十三个字的短短一句话，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制度的生死关头”。可是他写《容忍与自由》时，却把他十年前说过的话淡忘了。

陈独秀那几句话确实激进，确实武断，确实霸道，也不过是论争中的一种姿态。论争中可以平和些，也可以激烈些，陈独秀常取后者，充其量是“论士峥嵘未可非”（放翁句）。反对白话文的大有人在，其中就有陈独秀的老友章士钊，更有人骂陈独秀为“陈独兽”，还有人诅咒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等人，梦想有一个伟丈夫将他们斩尽杀绝，或被鬼诛。陈独秀既封不住人家的口也夺不下人家的笔。你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不登反对白话文的文章，“不容他人之匡正”；我章士钊主编的《甲寅》周刊干脆不登白话文，也终生不用白话文写作。彼此彼此。不是反对白话文的势力不够强大，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压制这种反对，白话文很快风行，是因为陈独秀等人的主张顺应了历史潮流。

蔡元培是本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把陈独秀请到北京大学主持文科的。陈独秀麾下的教授，既有脑后拖着小辫子念念不忘皇权的辜鸿铭，也有以“八部书外皆狗屁”闻名的黄侃，更有名节有亏的刘申叔（即刘师培，他曾是拥戴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等各类名流。陈独秀认为他们思想虽然有点旧，但他们有真实的学问，就应该让他们堂堂正正站在北大的讲坛上。陈独秀是有容还是无容？“有容斯大，无欲乃刚”，胡适可能就是在“刚”上欠缺些。宽容精神来自一个人的根本信仰，来自他的世界观，并不在于其性格急躁与否，也不在于其言词激烈与否。一个真诚追求思想自由的人，绝不会压制扼杀别人的思想自由。陈独秀曾连任五届中共中央总书记（或委员长），在党内诸多人物中，必然有他比较喜欢的和不十分喜欢的，这是人情之常。在党内激烈的争论中，陈独秀也会瞪眼睛、拍桌子，但他任中共领袖的六年中，并没有用政治的手段或组织的手段整肃过任何一个和他意见不同的人，更不要说把人家整死。

胡适是在养尊处优中度过一生的，他才感激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对他的宽容。他是了解陈独秀的，可他写这篇文章时却没能好好想一想陈独秀是怎样度过一生的。清末时陈独秀即被通缉，辛亥革命时又被绑架，险些被枪决。接着又是被通缉被抄家和逃亡，再接着是四次被逮捕，他既进过法租界的班房也蹲过国民党的监狱。国民党内某些人认为他该杀，共产党内某些人也认为他该杀，皆曰可杀。陈独秀是中国

近现代最不被宽容的人，政府不宽容他，政党更不宽容他。在胡适写这篇文章二十多年前，曹聚仁为陈独秀第四次被捕也曾撰文呼吁宽容，他说“杀了陈独秀，正如东汉失了蔡邕”。曹聚仁认为一个政党政派或政治集团的宽容精神，就在于给别的政党政派或别人一条路走，把别人的路都堵死了，自己也不会有好结果。他认为张作霖杀李大钊，湖南农民协会杀叶德辉，国民党杀共产党，共产党内的干部派（指八七会议后在党内掌权的一派——靳注）开除托陈派，都是“残忍”而不是宽容。他进而说：“在朝党不宽容则反动派必得势，将来反动派上了台，不宽容则反反动派的必再起，杀来杀去，杀到‘天下大事去矣’为止。”（1932年11月19日出版的《涛声》第31期）

胡适这篇文章也有可取之处，如他说：“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就很有见地。1993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48/126号决议，宣布1995年为联合国宽容年。宽容还是不宽容，总得有个界限。联合国倡导宽容精神，六十年来联合国也出台了许多制裁性决议，有宽容有制裁。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也无论是强国还是弱国，违反了联合国宪章，违反了公认的国际公法和条约，从道义上说就可以对其制裁。无论是什么人，只要触犯了法律，量刑上或有偏宽偏严，但与宽容不相干，要以法律为准绳。在人的心灵心智方面，即在对信仰的坚守和对理论的推崇方面，也就是在思想言论方面，宽容精神是普遍适用的，你可言来我可语去，不能对别人和社会造成事实上的伤害。如果把对某一种学说、思想和理论的推崇写进法律，就是意识形态上的不宽容。言论自由应该是全方位的，不能这个问题可以言论自由，那个问题不可以言论自由，这就在事实上取消了言论自由。只能以思想言论对思想言论，不能以权威对思想言论，更不能以枪炮对思想言论。口里吐出来的是语言，笔底写出来的是文字，枪炮里放出来的可是枪子儿和炮弹。

宽容确实是双方面的，政党政府对民众要宽容，民众对政党政府也要宽容。宽容不是忍辱，也不是单方面让步。提倡民众对执政者的宽容，绝不是主张不反抗。对于漫无边际的恐怖和暴力，对于不合理的法律和规章，对于不肯改悔的极权统治，人们不可能永远宽容，迟早会起来反对或反抗，并使之减少，使之修改，使之更换。圣雄甘地主张不以暴力抗恶，提倡对邪恶势力采取不合作政策，就是坚持理智的反抗，理智就包含着宽容。博弈双方的不理智不宽容是经常发生的。如武力征税（合情合理征税何以用武力？）就可能引发暴力抗税。对于关系全局的重大纠纷，博弈双方更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框架内化解它，不然会造成严重祸乱，留下千古遗恨。

宽容精神源于根本信仰和世界观。有些人的所谓信仰是假的。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的回忆录里谈到，勃氏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如果一个人并没有真正的信仰，骨子里只有权力和财富，也就不必和他谈论宽容了。

试述陈独秀等中共三大代表 在广州春园的重要活动

广州农讲所纪念馆 卜穗文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恤孤院路后街31号召开。到会的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项英、罗章龙、何孟雄、陈潭秋、向警予、徐梅坤、邓培、冯菊坡、阮啸仙、朱少莲等40人,代表全国42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参加了大会。广州东山的春园与中共三大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围绕着中共三大和中共三届中央委员会的许多重要活动是在这里举行。

春园是指广州东山新河浦22号、24号、26号三幢洋楼,是一名姓黎的美国华侨商人与其他两位华侨1922年建的一式3幢并列的3层砖木混凝土结构的公寓式楼房。春园借鉴欧美建筑风格,又糅合广东传统民居的特点,以红砖为墙体,是一所很有特点的民国初年建筑。历史把这所普通的房屋载入中共党史中去。

一、陈独秀等居住和举行重要会议的地方

1923年6月上旬,中共三大预备会议在春园召开,会议由陈独秀和马林主持。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意见,报告国际形势。会议讨论了中央委员人选和起草三大的各个决议案问题。马林和中共中央领导人们经常在春园24号楼二楼客厅、三楼客厅研究国共合作的方针策略,讨论修改中国共产党党纲、党章问题,起草中共三大的宣言和各项决议草案。

据中共三大代表罗章龙的回忆:“中共三大期间,马林、张太雷、毛泽东住在东山春园。这春园是三栋房子组成,毛泽东等人住在中间的一栋二楼。春园是公寓式的房子,其二楼室内有三房一厅。客厅的陈设,有写字台、转椅、书架,客厅没有挂什么东西。我们曾在客厅举行了中共三届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对客厅的情况有印象。但睡房情况,因我没有进去,不了解内部陈设。”^①中共三大代表徐梅坤回忆:“三大期间,代表分别住在春园及会址楼上。住在春园第二栋三楼的有陈独秀、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国际代表马林。毛泽东、李大钊、蔡和森、向警予、陈独秀、瞿秋白和马林都在春园吃饭。”^②6月23日,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春园24号楼三楼客厅开会,研究中央局成员组成及分工。决定由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罗章龙组成中共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二、陈独秀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办公地点

中共三届中央委员会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在春园24号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机关就在春园24号办公。中共中央领导人入住春园后,积极开展各项工作。6月16日,中共中央机关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在广州创刊。据广东区委工作人员李甫回忆:“1922年至1923年初由于广东支部扩大,原支部活动地点不够逐渐转至鲍罗廷公馆活动,地点在春园一号二楼,经常开会深夜,1924年我在黄埔军校曾与周总理坐电船来找鲍罗廷等顾问开会,船泊在河涌头(则桥的附近)。”^③

1923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根据形势的变化,由广州迁回上海办公。

三、陈独秀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等活动的地方

1923年10月,苏俄顾问鲍罗廷来到中国,入住春园26号东房。陈独秀经常和鲍罗廷在此商量工作和谈话。据屋主黎福俊、黎母说:“1923年至1927年期间春园(现在的26号)二楼曾住外省人,我迁来不久租给法国人住,后来又租给法国人住。这四栋房子的二、三楼都住过外国人,但多数是俄国人。1923年苏联顾问加伦、鲍罗廷曾在二、三楼居住。”

包惠僧回忆:“春园住过鲍罗廷、加伦、施舍渥诺夫,还有黄埔军校顾问。”^④

张国焘回忆:“马林住在附近一幢较为华丽的房子里,瞿秋白、张太雷和马林同住,任他的工作助手。看来,马林准备在广州作久居之计,他的房子里布置美仑美奂,有点像共产国际大使的气概。”^⑤

春园26号楼三楼客厅成为中国共产党和苏俄同志们的一个活动点,他们经常开会到深夜。有时候中国同志与苏俄顾问(包括一些苏俄水兵)还举行舞会。孙中山曾坐电船到春园26号找中共中央领导人和鲍罗廷开会,研究国共合作问题。

鲍罗廷在春园26号居住到1924年初,才迁至广州东较场鲍罗廷公馆居住。

注释:

- ①《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页。
- ②《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9页。
- ③《广州大革命时期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1页。
- ④ 中共三大材料《居民回忆录》之二,有关春园综合材料,原件藏广州农讲所纪念馆《中共三大档案》。
- ⑤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85—286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朱蕴山与陈独秀

安徽大学 徐承伦

一

掀起红楼万丈潮，当年意气怒冲霄。
暮年萧瑟殊难解，夜雨江津憾未消。

二

一瓶一钵蜀西行，久病山中眼塞明。
僵化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

上面两首诗，是朱蕴山在重庆听到陈独秀于1942年5月逝世消息，于同年6月以《挽陈仲甫诗二首》^①写成的。这首诗对陈独秀的一生作了评价。朱蕴山是陈独秀的朋友，从有关资料看出两人交往30年。追寻二人交往的历程，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二人志同道合，从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相互支持和配合；后期，从大革命失败到陈去世，二人先后脱离中国共产党，政见不同，私人之间友谊仍存在，晚年二人的命运也大不一样。

一

朱蕴山与陈独秀于何时何地相识，介绍人是谁？没有见到文字记载，根据有关资料，略加考证。朱陈相识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根据是1913年朱蕴山作《新感事示别石安并寄希平仲甫诸友》一诗。介绍人应是朱陈共同的好友刘希平、高语罕。刘希平(1873—1924)六安县人，朱蕴山幼年好友。1906年他们就到毛坦厂向群众宣传民主思想，并发起组织“天足会”。1907年刘东渡日本留学并与陈独秀结识。回到安徽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是安徽教育界的先进代表人物之一。朱蕴山说“刘希平实际上是陈独秀在安徽的代表”。^②高语罕(1888—1948)，寿县人。1908年与朱蕴山协助革命党人韩衍创办《安徽通俗公报》，针砭时弊，鼓吹革命。1911年与韩衍等共同组织学生军，由此与陈独秀相识相交，是《新青年》主要撰稿人之一。五四运动期间，被称为“芜湖新文化运动的领袖”。1920年秋，经李大钊、张申府介绍，成为陈独秀后安徽第二位共产党员。

朱蕴山与陈独秀的交往经历，前期大致可分以下三个阶段。

(一)在反清、反袁革命斗争中，朱蕴山与陈独秀大方向一致，各自在安徽作出了贡献。

朱蕴山(1887—1981)六安县人，出生书香门第，曾考中秀才。早在1904年，他在六安就看到陈仲甫主编的《安徽俗话报》，该报开发民智，宣传爱国反帝的进步思想，使他受到深刻的影响。^③后到安庆考入安徽巡警学堂，加入光复会，开始进行反清活动。1907年他参与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捆绑赴刑场陪斩，表现了临危不惧的气概，成为当时广为传诵的英雄人物。^④1908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

陈独秀(1879—1942)今安庆市(怀宁县)人，字仲甫，生于书香人家，也中过秀才。1903年发起成立安徽爱国会，并在安庆藏书楼举行拒俄大会。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1905年在芜湖安徽公学任教时，联络革命志士，发起建立反清革命团体岳王会，积极在芜湖、安庆、南京等地进行革命活动。

1913年3月，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被刺后，孙中山先生号召武装讨伐袁世凯。时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来到芜湖，痛斥当地驻军首领龚振鹏残杀无辜民众，即被绳绑，险遭枪决。反袁斗争失败后，倪嗣冲出任皖督兼民政长。10月21日，倪发出通告，捉拿革命党人，第一批20人名单中，陈独秀被列为第一名“要犯”，被迫逃往上海。^⑤1916年春，朱蕴山与刘希平、沈子修等密谋在安庆起义反袁。不幸事泄，

朱再次被捕入狱,直到袁死后才被获释。^⑥

(二)陈独秀在倡导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朱蕴山在安徽办学校和刊物,同时进行反对军阀祸皖斗争,积极进行配合。

陈独秀在离开安徽时,曾对刘希平、朱蕴山说过:“我去搞全国性运动,你们在安徽搞反军阀活动。”^⑦朱蕴山回忆:“陈独秀曾跟在安徽的一帮老朋友打过招呼,要求省内的革命运动配合他发动的思想文化运动。”^⑧因此,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出版发行后,安庆、芜湖、六安等地知识界、学校纷纷订阅,有的进步教员还选择重要文章在课堂讲授,积极宣传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

朱蕴山出狱后,首先到上海进行反对安徽军阀倪嗣冲的斗争,并撰写了《倪嗣冲祸皖记》,揭露倪的种种罪行。1917年8月,朱蕴山到北京大学会见陈独秀和胡适,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一致认为,要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必须提高民众觉悟,并从教育青年入手,开展宣传,为反帝反封建而呐喊。^⑨1918年朱蕴山回六安,同皖西教育界进步人士共同筹建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简称“三农”)。1919年3月,“三农”正式开学,该校设农、林两科,学制4年,全校师生员工200多人。朱蕴山任文牍兼修身课教员。由于他们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这所学校为皖西和豫鄂边区培育了一批优秀干部。他们还以此为阵地,开展反帝反封建革命活动。

据朱蕴山回忆:“安徽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从芜湖第五中学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推动了反帝反军阀运动,实质上是民族民主革命运动。”^⑩当时,安庆、芜湖两地以进步的教育界和青年学生为中心,组织了全省教职员联合会和全省学生联合会。当时的文化运动有两股力量:一股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他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在安庆、芜湖两地知识界先进人士和各校青年学生都受到很大影响。另一股是以李光炯为代表的反清、反北洋系民族主义思想的文化界人士。他们在文化界是很号召力和影响的。“陈、李两人早有深交,但是政见不同。在当时都是具有较大政治影响的人物。”^⑪在五四运动前,当时在北京的陈独秀和在安徽的刘希平、李光炯与朱蕴山等都有联系,口信也不断频传。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安徽的芜湖、安庆、合肥、蚌埠、六安、寿县等地的广大青年,纷纷起来响应北京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在青年学生宣传动员下,工人、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广大城镇居民也纷纷行动起来,形成一股巨大的反帝反军阀的力量。同时还开展群众性抵制日货的运动。

从1920年到1923年,陈独秀在上海主要忙于创建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早期领导工作。朱蕴山在安徽主要进行反对北洋军阀祸皖斗争,并通过《平议报》,抨击时弊,启发民智。在反对军阀祸皖斗争中主要有这样几件大事。

一是组织六二惨案后援会。1921年6月2日,安庆各校师生集会,反对省政府削减教育基金以扩充军费,遭到军阀倪道烺、马联甲武力镇压,打伤学生50多人。酿成震惊全省的“六二”惨案。朱蕴山和三农沈子修、桂月峰、钱杏邨联合省法政专科学校校长光明甫、一师校长李光炯、一女师校长徐皋浦等共同发起组成“安徽六二惨案后援会”,通电省内外,声讨马联甲、倪道烺镇压学生的罪行。由于安徽各校师生和各界人士声援讨伐,迫使省当局增加教育经费70万元,并允许教育经费独立,省长聂宪藩同意抚恤死者家属和治疗受伤学生。

二是反对省二届议员贿选斗争。1921年秋,省二届议会期满解散,军阀倪道烺、马联甲为操纵议员选举,拿出人民血汗钱100万元,由其御用工具“安徽省公益维持会”,派爪牙到全省各县进行贿选活动。为反对贿选,省会各界成立了“安徽各公团澄清选举办事处”。朱蕴山等联合六安农会、工会成立“六安议员选举视察团”,配合省“澄清选举办事处”,到各地调查贿选真相,并及时揭露各地贿选丑闻。省长聂宪藩慑于全省各地民众反对的威力,被迫辞职。新任省长李兆珍来皖不到十天,也吓得深夜逃走。一幕全省贿选闹剧随之告终。

三是驱逐六安知县骆通的斗争。1922年2月,骆通被派往六安任知县。上任后,横征暴敛,压制民主,指派心腹干将,控制六安教育界大权,对三农新文化宣传教育横加干涉,并趁暑假之机,查封了学生联合

会,扬言要拿办蛊惑民众的分子。朱蕴山等到省城向省学联呼吁,并向省府控告骆通。六安召开民众驱骆大会,省长许世英迫于民众压力,只得罢免了骆通的职务。

由朱蕴山任总主笔的《平议报》于1920年2月创刊,它以评议安徽政局,宣传革命思想,积极支持全省教职员联合会和全省学生联合会,推动安徽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为宗旨,大造革命舆论。在“六二”惨案斗争中,该报刊载陈绍禹(三农学生)痛斥军阀镇压学生,并赋《高琦不死》诗一首:

死于军阀手,活在青年心。

英雄倒一个,继起千万人。^⑫

在反骆斗争中,该报发表钱杏邨(三农教员)的《驱骆宣言》。《平议报》1922年5月1日,出版了《劳动纪念节特刊》。这期特刊刊载九篇文章,其中两篇是转载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上的重要文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敬告工人》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黄、庞被害事对中国无产阶级的宣言》。这表明朱蕴山与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团组织的密切关系。其他七篇文章有:朱蕴山以“稳公”笔名撰写的《为劳动者进一言》、蔡晓舟《我对于今年劳动节的感想》等。还刊载了《芜湖劳工会宣言》和诗歌《可怜的工人》等。⁽¹³⁾特刊中心内容是号召被剥削被压迫的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和他们的敌人进行斗争。从中可以看出朱蕴山思想先进的一面。

1921年后,安庆、芜湖两地就已出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据朱蕴山回忆:“记得与《平议报》发生关系的青年团员有:柯庆施、周新民、朱子帆、许继慎、薛卓汉、舒传贤、郑鼎(李云鹤)、王坦夫、宋伟年等”。^⑬

(三)在陈独秀领导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朱蕴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出席国民党二大,在安徽主要从事党务工作,紧密进行配合。

1922年底,朱蕴山在上海拜见了孙中山先生,谈到酝酿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接着又去会见陈独秀。陈当时正与孙先生商讨改组国民党,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回省后积极进行宣传配合。1925年5月,朱蕴山在北京会见李大钊,谈到防止西山会议派反共阴谋问题。李“促我速去上海和陈仲甫商议”,^⑭到上海与陈独秀商讨防止国民党右派反共阴谋的应变活动,并接受了陈的意见,回安徽做国民党党务工作。^⑮经过南京时,朱蕴山与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侯绍裘、张曙时商议加强苏、皖两省国民党左派联合办法,取得了一致意见。

朱蕴山回到安庆后,便立即着手开展国民党党务工作。主要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基础,开始恢复改组工作。这项工作得到广州国民党中央和中共安徽地方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但也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反对。

1925年11月,朱蕴山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出席国民党二大。到广州后,他经过薛卓汉、高语罕介绍,陈延年批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1月16日,朱蕴山在国民党二大会上报告安徽党务工作开展情况和发展计划。二大闭幕后,国民党中央指定朱蕴山为“国共合作的安徽省国民党省党部常委及筹备召集人。经过上海时,由中共中央介绍柯庆施同志当秘书,回皖工作。柯担任国民党省党部秘书长,我为驻会常委,负责对外联络。”^⑯

当时统治安徽的军阀陈调元加紧镇压革命势力。朱蕴山被迫随安徽临时省党部先后迁到上海、武汉,坚持进行革命活动。到1926年底,全省已有30多个县市建立了国民党左派市县党部。

1927年3月,安徽的陈调元、王普在北伐胜利进军的影响下,归顺革命军。这样,北伐第六军、第七军顺利进驻安庆、芜湖。朱蕴山和省及安庆市党部组织开了几次军民联欢会,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情绪。

朱蕴山拒绝蒋介石的拉拢。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一行在九江制造三一七惨案后,于3月20日到达安庆。蒋介石找朱蕴山谈话说:“你是老广东,老同志啦!你肯到南京就好办了。”朱客气地说:“总司令,我们还是不要走太平天国的末路自相残杀。我劝总司令最好要搞国共合作,中山先生的遗教是不错的。”当时蒋介石听了以后,只是鼻子哼了哼。^⑰第三天在蒋介石的纵容和支持下,一批流氓伙同反动分子捣毁了左派临时省党部、安庆市党部、省总工会、省农协筹委会等机关,殴伤省党部职员数十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

·二三事件。朱蕴山在离开安庆前，“以左派国民党省党部及北伐军三十三军联合名义，发出了反蒋通电。”^{②7}7月下旬，朱蕴山到南昌参加了著名的八一起义。8月1日上午，参加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区特别市代表联席会议，选举产生了革命政权机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通过革命政纲——《联席会议宣言》。随后革命委员会召开会议，发布命令，任命朱蕴山为党务委员会委员。^{②8}8月2日，全市各界群众五万人集会，庆祝南昌起义的胜利和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二

（一）大革命与南昌起义失败后，朱蕴山与陈独秀先后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但在反蒋抗日问题上目标一致，私人友谊长存。

先说朱蕴山。南昌起义胜利后，他奉命回武汉，通知安徽、江苏、浙江及其他各省左派人士到广州，拟另立政府。到达上海时，知道南昌起义部队已遭到失败。在上海会见了王若飞，“得知陈仲甫已被解除总书记职务，谭平山从汕头逃亡香港来沪，亦被开除共产党，革命处在十分艰难的阶段。”^{②9}朱在《岁暮》一诗中写道：

雪满关河雁叫哀，丝丝热泪洒寒灰。
愿将第二洪荒水，一洗人间避债台。^{③0}

南昌起义失败了，朱蕴山心情沉重。他看到右倾错误导致了大革命失败，左倾盲动主义又在党内抬头，使革命事业遭受惨重的损失。当时，他对惩办主义和盲动主义十分不满，痛苦地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忆昔》一诗中描述了当时的痛苦心情：

去年今日来黄浦，烈风倒海江水变。
今年今日哀江头，故鬼啾啾新鬼哭。
苍鹰作势孤鸟避，饥鼠上床娇儿哭。
弹指风云十七载，祸乱由来相倚伏。
梧桐落落秋雨深，皖山青青楚云覆。
破碎山河伤老泪，千家万户乌上屋。
明年今日知何处？暂隐荒江问松竹。^{③1}

再说陈独秀。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在北伐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发动工农群众，积极的支持和配合。北伐军出师不到十个月，就歼灭了吴佩孚、孙传芳主力，从广州打到武汉、南京和上海，革命势力从珠江流域一直推进到长江流域，席卷了半个中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时，蒋介石也积极准备叛变革命，陈独秀与中共中央准备进行反击，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却一再指示对蒋介石应采取妥协退让政策。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革命遭到失败。同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了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等五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委会，陈独秀“自此即不视事”，离开了中国革命的舞台。

1927年以后，朱蕴山虽然离开了共产党组织，但一直是中共的朋友。他“在共产党人的引导下，继续从事反蒋活动”。积极支持许继慎到鄂豫皖组建红军，开辟革命根据地。^{③2}九一八事变后，参与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组织的抗日同盟军活动，与李济深、蔡廷锴等发起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他曾受中共委托，三去太原联络阎锡山推动抗日。在大别山主持安徽省总动员委员会期间，多方支持坚持在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并掩护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1939年来到重庆，在周恩来、董必武等支持和指导下，积极推动抗日，往来于西南几省联络国民党民主派和地方实力派人士，反对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错误政策。^{③3}

1940年9月，朱蕴山由重庆到江津“访问仲甫，力劝他回延安”。^{③4}但被陈拒绝了。他说，“中共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大钊死了，延年死了，他也‘落后’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我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弄得无结果而散。”^{③5}

1941年冬天,陈独秀向著名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借《武荣碑》时,心有所感地写了一首诗,诗中自比五代十国时期的名僧贯休,描述了他过着贫困生活和消极伤感的心绪,读来让人感慨不已。

贯休入蜀唯瓶钵,久病山居生事微。

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羨武荣碑。

朱蕴山见到此诗后,买了几只鸭子去探望陈独秀,见陈胃病发作,痛得在床上滚动。“朱曾劝他不要搞托派,又劝他不妨去延安。他都未听从。”^⑧所以陈死后朱写诗纪念他(见本文开头)。诗中反映出陈晚年的清苦生活,也批评他思想“僵化”,不能与时俱进,是个“老书生”。

大革命失败后,在共产党内失意的陈独秀,又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他只得在上海隐姓埋名,隐蔽下来。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却把失败的责任推到陈独秀一人身上,陈独秀成了“替罪羊”。不久,陈独秀参加了托派组织并成为领袖。1929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把陈独秀开除出党。1932年10月,南京国民党政府逮捕了陈独秀,并以“危害民国”罪,判处徒刑八年。1937年8月23日,因抗日战争爆发,陈被提前获释,才结束长达4年零10个月的牢狱生活。在南京监狱释放后,面对种种高官厚禄的拉拢诱惑,陈独秀均予以一一拒绝。入川定居江津后,平时绝大部分时间,是在石墙院里从事文字学研究。生活来源主要是靠自己平时写文章的稿酬,以及北京大学同学会的捐助,常常入不敷出,生活十分拮据。但即使这样,他也拒绝嗟来之食,尤其对一些来路不明的赠款,都马上退回去。蒋介石也曾给陈独秀汇去“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后来,“这笔钱原封退回。”^⑨他不仅在经济上穷困潦倒,政治上还一直处于国民党特务监视之下。他真正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终于在物质和精神双重压力下,因病在江津逝世,享年63岁。当时,国民党中央社、《申报》等只作了简短报道。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均未予报道。6月4日重庆《大公报》发表了高语罕《参与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他赞扬了陈独秀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的地位,但也回避党派问题。正如《大公报》上悼念的短文所言:“这一代人杰之死,此时此地,无论在国家或其个人,均不胜寂寞之感。”^⑩

(二)陈独秀逝世60年,中共中央对他的评价及其变化。朱蕴山多次怀念老朋友。

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他生前跌宕起伏,曲折坎坷,又是一位争议很大的历史人物。从1927年八七会议决议开始,到1929年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和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作为党史权威著作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胡乔木著)等,党的文件和领导人的文章、讲话,给陈独秀头上扣了九顶帽子: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⑪几十年来,一直成为中共党史上的“反面教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解放思想,恢复实事求是评价历史人物的传统,对陈独秀一生的思想和活动,重新进行考察,发现以上罪名均不能成立,从而一一被推翻。特别是中共中央党史部门翻译出版了俄罗斯解密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原来“指导中国革命的最高决策机关是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政治局。1923—1927年,该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共召开了122次会议,做出了738个决定。”^⑫陈独秀这位总书记只是一位权利有限,还要坚决贯彻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指示的执行者。陈独秀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有些成果已被中央有关部门接受和采纳。2002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充分肯定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建党前后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作用。对斯大林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示,陈独秀执行这些错误指示,因而导致大革命失败等复杂情况,已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令人欣慰的是,陈独秀在党史上已开始成为一位正面人物,他的历史真面目已逐渐得到恢复。

朱蕴山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等重要职务,位居国家领导人行列。1981年4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5月11日,乌兰夫在“朱蕴山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中,称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革命的坚强战士和政治活动家”,“是一位不断追求进步的爱国的革命老人”。^⑬

朱蕴山生前多次谈到陈独秀。一次,谈到陈独秀墓碑如何题写问题时,他说:“你们要把陈独秀墓保护好,墓碑上只写‘陈独秀之墓’五个字”。^④

朱蕴山在回忆陈独秀有关情况时,有一个重要问题引起学界关注。周恩来是否到江津劝说陈独秀回党工作问题。

朱蕴山在《关于陈独秀的几点回忆》和《挽陈仲甫诗二首》均说“周恩来同志曾和仲甫谈过一次话,但他的思想未能解决。”^⑤这个回忆真实性如何?学界有两种看法,有的认为是可信的,并加以注释;有的表示怀疑,认为是记忆有误。我是同意后者。因为周恩来与陈独秀在江津是否会晤,应该是一件大事。但《周恩来年谱》里不见记载,周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也不曾提到。从已披露的陈独秀寓津期间大量书信中,也未谈及这件事。关于周恩来,1940年6月12日,陈独秀复函杨朋升中说:“示函云‘恩来昨日来蓉’,不知是否周恩来,兄曾与彼接谈否?此人比其他妄人稍通情理,然亦为群小劫持,不能自拔也。彼等对弟造谣诬蔑,无所不至,真是无理取闹。”^⑥从这里,说明陈独秀对周恩来曾有的印象较好,但不能证明周到江津与其面谈过。有的学者认为,周恩来“几次托人去看望陈独秀,并嘱陈在当时‘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⑦此说比较可信。朱蕴山数次看陈并“力劝他回延安”就是一例。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年,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动荡剧变的时期,又是空前发展进步的时期。朱蕴山与陈独秀经历了这些历史剧变,走过了一条异常艰难曲折的道路,不断探索寻找正确的政治方向。本文所述朱陈二人30年交往历程中,从志同道合到政见不同,结局两样。从中我们应该学到什么,得到什么启迪?

注释:

①⑤②⑥⑤《朱蕴山纪事诗词选》,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136、84、91、130、136页。

②④⑥⑦⑩⑪⑭⑮③③《纪念朱蕴山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125、8、3、125、124、124、125、235、235页。

③⑨⑩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3)(9)(16)(22)(23)(24)《朱蕴山回忆录》未刊稿。

⑤⑩任建树著《陈独秀大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96、673页。

⑧沈寂主编《陈独秀研究》第三辑,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362页。

⑫张召奎等主编《教坛古今》,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99页。

⑬安庆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安庆地方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46页。

⑰⑱⑲⑳朱蕴山《关于南昌起义的一段回忆》,载《南昌起义》,人民出版社第246、247、247、48页。

㉑㉒唐宝林著《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68、306页。

㉓许伯建著《陈独秀拒收蒋介石汇款》,《世纪》杂志1994年第3期。

㉔奚金芳主编《陈独秀研究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39页。

㉕唐宝林著《重评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路线》,《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

㉖帅文洁《陈独秀墓四次修建的经过》,载《百年潮》2007年第2期

㉗《陈独秀书信选》,新华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496页。

㉘王光远编《陈独秀年谱》,重庆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375、358页。

“《新青年》三个字的金字招牌”

——《新青年》的经营与传播策略

南京财经大学 石钟扬

《新青年》并非天生的“一代名刊”，也是经历了一番与时俱进的经营，虽不是惨淡经营，确颇费了几番策划之力。对其经营与传播的谋略作一总结，既能见着一代名刊节节攀登的艰难步履，也能为今日的报山刊海留下点历史的启迪。

一、从亚东图书馆到群益书社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之初，除了以往办报办刊的经验，以友谊与志趣扭结的作者群落以及粪土万户候的勇气，几乎是赤手空拳办刊物。1914年7月陈独秀应章士钊之邀到日本协助编辑《甲寅》，1915年6月中旬因妻高君曼病重咯血，经汪孟邹写信催返，一家人聚居在上海法租界高山路南口吉甯里21号。生活尚且紧张，哪来余力自办杂志。但陈独秀偏偏豪情万丈地筹谋着自办一个既有鲜明个性，又能令全国思想改观的杂志。这自然须找个有一定经济实力又热心文化事业的出版单位作后盾。

就热心文化事业与友情而言，最理想合作伙伴自然是上海亚东图书馆。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是安徽徽州人，与陈独秀为莫逆之交，汪氏当初在芜湖创办科学图书社，尔后在上海创办亚东图书馆（实为出版社），都是陈策划的产物；陈当初创办《安徽俗话报》就是“背了一个包袱，拿着一把雨伞”来到芜湖科学图书馆的，他们合作的故事就曾传为佳话。可以说亚东图书馆的发展与命运几乎始终与陈独秀连在一起。正是着眼于此，汪孟邹之侄汪原放所著《回忆亚东图书馆》，再版时被出版社干脆改名为《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①

陈独秀早在1913年亡命上海时就对汪孟邹说，“想出一本杂志说是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到1915年他自日本归来，真的要将那酝酿之久的宏愿付之实践时，他叫汪“认真想法子”。得到的回答是：“我实在没有力量做。”这是实话实说。想不想做有情感因素，有没有力量做则是量力而行的选择。汪原放说：“当时亚东图书馆生意不好，又正在印行《甲寅》杂志，经济上甚为棘手。在大叔的日记中，时有‘社务乏款，焦急之至’……之类的记载。所以无论如何，实在是无力再出一个杂志了。”^②汪孟邹实在，主张做就做好，不肯苟且。他曾说：“亚东出版认真，不肯苟且，一半由于个性使然，一半也是许多朋友，如章行严（士钊）、陈仲甫、胡适之诸先生督促之力。”^③

忠厚老实的汪孟邹不会“以‘实在没有力量做’为托词拒绝了陈独秀，却接受了章士钊（秋桐）创办于日本东京的《甲寅》杂志”，“基于章的声望以及《甲寅》杂志已见之影响”，“在章、陈之间做出厚此薄彼的选择。”^④汪决不会如此势利。须知汪与章、陈皆友善，相对而言汪与陈关系更铁，此其一。其二，《甲寅》曾是章、陈共同经营的刊物，《甲寅》共出十期前四期在日本出版，后六期移上海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其中不排除陈策划的因素。其三，《甲寅》1914年5月创刊，1915年10月终刊，历时一年零五个月，它移上海出版社当是1915年初的事；而《新青年》到1915年9月15日才创刊，一先一后根本不存在“在章、陈之间做出厚此薄彼的选择”。史家将陈独秀所说：“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曲解为“十年、八年才能开创局面”，然后说：“一个处于初创阶段的书局所不敢冒险投资的”。这种解读能力，真令人浩叹。

汪孟邹“实在没有力量做”，不等于对之置之不理，汪孟邹始终关注着《新青年》的生存与发展，《新青年》出版中大小事多有汪的参予。当务之急是积极地将“介绍他给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兄弟。”^⑤陈氏兄弟是章士钊的湖南老乡，是汪孟邹的老朋友。汪孟邹说：“我在章士钊的苏报馆里认识了陈子佩（沛），他是长沙群书社的主人。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子佩开了群益书社，叫我搬去和他一道住，于是我们常在一起了。”^⑥汪原放用“过从甚密，情谊极深”^⑦八个字来形容他们的关系。后来陈独秀曾多次谋划这两家出版

社合股联办——这是后话。

有了这层关系,汪孟邹一说,陈氏兄弟就爽快地承担杂志的印刷与发行工作。了却一桩心愿,汪孟邹何等高兴,于是在1915年的《孟邹日记》中庄严地写下一笔:“七月五日,星期一,晴。子寿来,告以‘青年’事已定夺云云”。^⑧汪原放也欣然地说:“如果介绍到群益,群益又不同意接受,那么,仲翁想出的‘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影响’的一个杂志,就决不能在‘民国四年(1915年)九月十五日’问世了。”^⑨

1915年9月15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史家称之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光辉起点。

二、从《青年杂志》到《新青年》

《新青年》的初名为《青年杂志》。

《青年杂志》办得怎样?只能从当年读者反应中寻找答案。开卷第一期就有王庸工说:“别后闻在沪主持青年杂志,必有崇论宏议,唤醒青年。”(第1号)这只当是信任与期待,紧接着就有读者的称赞。李平说:“刻读大志,极称法兰西文明之优美。仆与同学杨成志君均信仰法兰西教育者。”(第2号)李大魁:“刻读大志,见独秀君所著文章,均非难佛法。足甚惑焉,深幸有以教之。”(第3号)。吴勤:“顷读大志,精旨名理,钩元提要,盱冲时局,力辟新机,饷遗学者,为益闳多矣。”(第3号)。张永言:“顷由乡里来沪,购得贵杂志三册,展诵之余,无任钦佩。内有通讯一门,尤足使仆心动。”(第4号)姚孟宽:“大志以灌输表扬知识为前提,无任感佩。”(第6号)。辉瞿:“自贵杂志出版以来,风行全国,遗泽后进,曷胜钦佩。”(第6号)当然也有提意见,如张永言就说:“贵志之文,似有扬西抑东之意。如此等等,恐尚须斟酌商量也。”(第6号)

可见《青年杂志》一开局就不是“一个既无人喝采,也无人反对的普通刊物。”^⑩我这里再举一则《青年杂志》通信栏以外的文献。柳亚子在近代文坛上的地位大概是无庸置疑的吧,他于1916年5月21日致信另一位南社成员徐梦鸥说:“《新青年》杂志中陈独秀君巨著,宜写万本,读万遍也。”^⑪按,《新青年》当为《青年》之误,《青年杂志》改为《新青年》是1916年9月的事,柳写信时尚未改,可能是发表此信时受已改名杂志之影响而致误的。柳亚子所见“陈独秀君巨著”当为《青年杂志》第一卷(1915年9月15日到1916年2月15日)中陈所著之《敬告青年》、《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今日之教育方针》、《抵抗力》、《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九一六年》、《吾人最后之觉悟》等。

实事求是地看,《青年杂志》就已办得颇有影响,才会引起一代名士柳亚子的喝采。

1916年2月15日《青年杂志》出至第一卷第6号,因护法战争爆发被迫停刊。同时又遭刊名雷同事件。现存权威叙事为汪原放的文字。汪说:

《青年》杂志怎么改名《新青年》的呢?我还记得,我的大叔说过,是群益书社接到上海青年会的一封信,说群益的《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周报)名字雷同,应该早更名,省得冒名的错误。^⑫

这里的《上海青年》名称可能有误,若其名为《上海青年》则与《青年杂志》不存在雷同,《上海青年》则可能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1897年创办的《青年》杂志之误,这份基督教杂志,由上海昆山花园4号的青年协会书报部发行,到1917年3月与1911年11月份创办的另一个基督教杂志《进步》杂志合并而成《青年进步》杂志。^⑬这样,才会有“名字雷同”之嫌,并由基督教上海青年协会向群益书社发难。

1916年3月3日,群益书社经理陈子寿到陈独秀住宅商量,拟将《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商量时正好汪孟邹在座,于是他在日记中赫然写上“仲与予均赞同也。”1916年8月13日陈独秀写信告诉远在美国的胡适说:“《青年》以战事延刊多日,兹已拟仍续刊,依发行者之意,已改名《新青年》,本月内可以出版。”^⑭

汪原放称这次更名事件为“因祸得福”。^⑮从1916年9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一号起,就正式改名《新青年》了。现代中国思想革命史上最重要的杂志之一的《新青年》,就是这样诞生的。

在这首期《新青年》上,刊有《通告》向读者报告:

本杂志自出版以来,颇蒙国人称许,第一卷六册已经完竣。自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励,勉副读者诸君属望,因更名为《新青年》,且得当代名流之助,如温宗尧、吴敬恒、张继、马君武、胡适、苏曼殊诸君,允许关于青年文字,皆由本志发表。嗣后内容,当较前尤有精彩。此不独本志之私幸,亦读者诸君文字之缘也。^⑯

陈平原对之作了解读：聪明绝顶的陈独秀，将因刊名雷同而不得不重起炉灶这一不利因素，说成是因应读者要求而改名，且由此引申出新旧青年如何具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刻意制造杂志的“全新”面貌。此举不但博得当年读者的极大好感，也让后世史家马失前蹄。^[2]

需要说明的是：其一，基督教青年学会发难，责成群益版《青年杂志》改名，恰恰证明其影响不凡，大有覆盖另一个同名刊物之势，基督教会正是在这种危机感的驱使下给群益书社发难的。不过，也证明当时已有相当自觉的“版权意识”，这是个可喜现象。

其二，《新青年》的主旨在《青年杂志》仍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新青年》从第2卷到第7卷每期封面上仍赫然注明：“原名青年杂志”，既标示杂志风格的连续性，也维系着原有读者群的信任。“颇蒙国人称许”的正是第一卷的《青年杂志》。

其三，令读者耳目一新的是，陈独秀与李大钊，一以《新青年》，一以《青春》，一反一正，一曰“发财固非恶了，即做官亦恶事，幸福亦非恶事，惟吾人合做官发财幸福三者以一贯之精神，遂至大盗遍于国中。人间种种至可恐怖之罪恶多由此造成。国将由此灭，种将由此剥。吾可敬可爱之青年！倘留此龌龊下流，与彼腐败堕落之旧青年无以异也”；一曰“俾以青年纯洁之躬，饫尝青春之甘美，浹浴青之恩泽，永续青春之生涯，致我为青春之我，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斯青春之我乃不枉于遥逢百千万劫中为此一大因缘，与此多情多爱之青春相邂逅于无尽青春中之一部空间与时间也”，同营造着“新青年”的新气象。《新青年》的作者阵营除当初在第一卷就有出色表现的高一涵、易白沙、高语罕、刘叔雅等之外，陈独秀以其人格魅力又网罗了一批“当代名流”，并预告他们有尤为精彩的“青年文字”见诸《新青年》，日后除张继之外，他们果然在《新青年》上精彩登场。从而使《新青年》成为名副其实的《新青年》。胡适当时虽尚留学美国未归，但他曾有文见诸《甲寅》时就被章士钊誉为“比傅中西，得未曾有”；将其列之于“当代名流”未必如某君所云是“虚张声势”。到第三卷第一号才名列《新青年》之林的吴虞是惊喜不已，并非如某氏断章弃义所云“不无惊诧”。吴虞1917年5月19日《日记》原文为：“《新青年》三卷一号将一、二卷目录特列一页，上署大名家数十名执笔。不意成都一布衣亦预海内大名家之列，惭愧之至！然不经辛亥之事，余学说不成；经辛亥之事，而余或不免，四川人亦无预大名家之列者，一叹！美人嘉莱儿曰：‘文人亦英雄之一种。’余正不可妄自菲薄，以为逊于世之伟人也”。“后世史家”萧超然所说：“陈独秀应读者的希望，更名为《新青年》”固为“马失前蹄”；但他说：“添加一个‘新’字，以与其鼓吹新思想、新文化的内容名符其实”，^[3]却并没错。

三、从欢迎来稿到“不另购稿”

《新青年》从第二卷到第三卷一号在同位置上，刊登《投稿简章》：

一、来稿无论或撰或译，皆所欢迎，一经选登，奉酬现金，每千字自二元至五元。

二、来稿译自东西文者，请将原文一并寄下。

三、本志每面十六行，每行四十字，稿纸能与相合者最妙。字以明显为佳。

四、来稿以未经登载各处日报其他杂志者为限。

五、来稿无论登载与否，概不退还。声明必还，亦当照办。

六、寄稿最好由邮局挂号掷下，本社即以该局回单盖戳为凭，不另作复。

七、收稿处上海棋盘街群益书社。

这份《投稿简章》从第二到第七条，皆属投稿技术类条款，今天仍能引人注目的唯有第一条，“来稿无论或撰或译，皆所欢迎”，足见《新青年》思稿若渴。为扩大稿源，与《投稿简章》相配合的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还另刊有《通告(二)》：“本志自第二卷第一号起，新辟‘读者论坛’一栏，容纳社外文字，不问其‘主张’‘体裁’是否与本志相合，但其所论确有研究之价值者，即皆一体登载，以便读者诸君自由发表意见。”一个特别注重个性的杂志为广开言路，竟不问其“主张”、“体裁”是否与其相合以容纳社外一切有研究价值的文字。这种姿态，不能不叫四方作者惊喜。不过《新青年》在第三卷四号上声明“本志对于投稿无论登载与否，概不退还”。到第五卷第六号又重申此议。即使如此，几乎并没影响作者投稿的积极性。

那么“每千字自二元至五元”稿酬,在当时属何种境界呢?

清末民初,除了个别同人刊物没稿酬或还得“助刻资”外,绝大部分报刊和书局都为小说的译者、作者付稿酬。稿酬没有一定标准,《小说报》杂志刊“募集小说”启事,明确声称“甲等每千字五元,乙等每千字三元,丙等每千字二元”;而大部分报刊则喜欢用“润笔从丰”之类的“模糊语言”。商务印书馆请林纾译小说,每千字稿费五元;请包天美译书,则是每千字四元;陆秋心要求编译小说,则“告以最高等千字三元,次二元五角,次二元”。据说其时上海的小说市价,普遍是每千字二元,最低者可压到每千字仅五角。^⑨

小说在当时是俏货,故能率先走向市场,“当时报纸,除小说之外,别无稿酬,写稿的人,亦运之于兴趣,并不索稿酬的。”^⑩

相形之下,《新青年》作为纯言论类的杂志,稿酬能开到“每千字自二元至五元”,已相当可观。《新青年》重要作者与编者之一的高一涵曾说:“余时已日本三年余,为穷所迫,常断炊。独秀约余投稿,月得十数元稿费以糊口。”^⑪可见高氏为《新青年》投稿月得稿费十数元就是他的生活来源。当时稿酬是付大洋,含金量颇高。须知毛泽东当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打工月薪只八块大洋,也还过得去。

然而到第四卷第一号,《投稿简章》就悄然退出《新青年》,到第四卷第三号则代之以《本志编辑部启事》:

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简章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录载者,可否惠赠本志?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

这一启事宣告,《新青年》从此“不另购稿”,而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的所有撰译概不付酬。这表明《新青年》由主要作者组成的编辑队伍是个强有力的阵营,谋义不谋利的高尚情怀与共创新文化辉煌的崇高理想,是他们“精神之团结”的纽带。

胡适曾有文字表白过他的稿酬观,他说:“拿尽心做的文字去卖三块钱至五块钱,不算是可耻的事。献寿文,作瞒心昧己的谀墓文,那是文丐。借文字敲竹杠,那是文丐。用抄窃敷衍的文字骗钱,那是文丐。迎合社会的恶劣心理,制造下流读物,那是文丐。但拿不苟且而有价值的文字换得相当的报酬,那是一种正当的生活。”^⑫这也可代表一般作者的共同心态。但为了共同的道义,他们也可放弃稿酬。

1918年3月16日胡适为《新青年》写一篇重要文章《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一著名观点。写完此文的次日,胡适写信给母亲,高兴地说:

昨天忙了一天,替《新青年》做了篇一万字的文章。这文是不卖钱的。不过因为这是我们自己办的报,不能不做文。昨天一直做到半夜后三点半钟方才做好。这篇文字将来一定很有势力,所以我虽吃点辛苦,也是情愿的。^⑬

若按《投稿简章》的标准计算,胡适这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大概要卖四、五十元至二三十元大洋。这个数字在当时不算太少。胡适在此信的前十日给母亲信中说:“昨日商务印书馆又送来第二次稿费现洋四十五元,正好应用。这时候的四十五元,真抵得八十五元的票子。”^⑭后十日的三月二十七日又给母亲写信说:“我已租了一所新屋,预备五六日内搬进去住。这屋有九间正房,五间偏房(作厨房及仆婢住房),两间套房。离大学也不远(与江朝宗住宅相隔一巷)。房租每月二十元。”^⑮如此道来,就可知那四、五十元大洋的分量了。胡适此文发表于《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日后果然成为新文化运动纲领性文件之一,确实“很有势力”。因为是给“我们自己办的报”做文,即使“吃点小辛苦”,即使“不卖钱”,也是情愿的。问题是胡适所奉献的并非只此一文,而是从此几乎每卷有大小撰译十来篇;当然非胡适一人如此,而是《新青年》同人都如此。这就真实地见出《新青年》同人“谋义不谋利”的高尚情怀。对作者不付稿酬,则以十本左右的样刊略表谢意。作者亦高兴地转赠朋友或图书馆。《鲁迅日记》、《周作人日记》上就有此类记载。我甚至认为这期间或许在《新青年》同人中尝试“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之类空想社会主义的因素。有趣的是,即使取消稿酬,即使声明“不另购稿”,仍然有外稿投向《新青年》。如第七卷第一号所刊潘力山《论新旧》,就在作者名下注明“来稿”。

取消稿酬与不另购稿,都是相对而言的,估计都会有例外,如从第四卷起已有北大在校学生傅斯年、罗

家伦等的撰译文稿发表,对他们估计是需付酬的。再如从第七卷第一号又新辟“社会调查”栏目,就注明“本栏欢迎投稿。”

从欢迎来稿到“不另购稿”的变迁,不仅是稿源的组织与处理问题,更反映了作者结构乃至刊物属性的变迁。《新青年》前期虽欢迎来稿,其实其作者是以与陈独秀有交谊的皖人为主体的,稿源可能并不丰富;自第四卷始,虽“不另购稿”,其作者却已突破皖人圈子,而以北大新派教授为主体。《新青年》开始是陈独秀依托民间出版机构自主创办的杂志,既由陈氏一人编辑,也由他主撰,每期重大文章都出自陈氏之手,因而前三卷每期封面上都标明“陈独秀先生主撰”——既显示了他的自信,也昭示着他在读者尤其是知识青年中的精神魅力。到第四卷“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则显示《新青年》从此隐然有个“编辑部”存在,而且这个“编辑部”的同人不仅是编者,更是作者,完全有能力“担任”起所有撰译的使命。这就意味着《新青年》已由陈独秀独家经营的杂志,基本上变化为“同人杂志”了,因而“陈独秀先生主撰”的字样也从杂志封面上取消了。

“同人杂志”有别于清末作为政党舆论工具的报刊,它是民初一批洁身自好,独立于政治集团之外的自由知识分子,为思想启蒙而作自由发言的媒体。世人心目中的“《新青年》同人”,不仅仅是某一杂志的作者,而是一批带有鲜明思想倾向的精英群落。

四、从群益书社到新青年社

当初上海群益书社同意印行《新青年》时,即“议定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月出一本”。^⑨有人以商务印书馆对一切杂志皆“销数满二千部后,其二千部以外销出之数,发行人应以版税二成交著作人”的规定^⑩,推断出在不支付编辑费的情况下,至少需销数两千本以上,出版商才有可能赚钱。从而再推断出群益之出《新青年》,显然勉为其难。^⑪因为《青年杂志》时代每期印数仅一千本。其间多有想象之言。其一、销数满二千不支付编辑费,不等于出版商就不赚钱,只是赚钱多少问题;其二、清末民初不少杂志销数多在一千本左右,未必全亏本;其三、商务印书馆的规定,从胡适信知为1924年的事,物价乃彼一时此一时地波动着,以1924年的规定来衡量1915年出版行情,未免有点牛头不对马嘴。不过,如此道来,并非说《新青年》月出千本且支付编辑费与稿费二百元,群益书社立即就有多大赚头。《新青年》每册定价二角,全卷六册一元,一年二卷二元。邮费另加。一千册只有二百元的收入,自然无赚。不过这只是艰难的开端,《新青年》开局不久就突破了千册印数。而且作为出版商群益自有他的经营之道。如今仅从《新青年》文本上观察,也能看出点名堂。

如在日渐走俏的《新青年》杂志上大登群益的广告,以促销其书业。群益书社的书业,主体是外语工具书与中等学校数、理、化、外语教科书及相关教辅书。前者如《中英会话辞典》、《英汉辞典》、《英汉双解辞典》、《普通英华新字典》、《中学英汉新字典》、《方年英字方笺》等;后者则是以当时日本最通行之教科书为底本或译或编的教科书。兼有《青年英文学丛书》与《精印传奇小说》(前为《绝岛日记》等域外文学书籍之译本,后为本土戏曲《长生殿传奇》、《牡丹亭》等书),这些书籍的广告从第一卷到第三卷每期都以整页或文末空白反复出现。此外《美国公民学》、《美国民主政治大纲》两书广告出现的频率也很高。至于《社会经济学》、《货币论》之类的学术著作也偶尔出现。惟第四卷不见广告,不知何故。到第五卷则刊有群益社经营的湖南名笔的广告。

再如开辟有偿广告业务。《新青年》上除群益自家之外的广告,大致分两类,一类为“交换广告”,此为各类报刊的广告,一类为有偿广告,《新青年》的版权页上有云:“广告价目,另有章,如蒙惠顾,即行奉告”。可见有偿广告另有一套游戏规则,只是不见其档案文本,现已难知其详。但经营者则当是群益书社,而未必是《新青年》同人。

还有就是再版《新青年》前五卷的合订本。第七卷每期登有关于这合装本全五册《新青年》的广告,广告对《新青年》作了全面介绍,劝未读者去读,已读者重读。其精新处是不断被研究者提及的,说:

这《新青年》仿佛可以算得中国近五年的思想变迁史了。不独社员的思想变迁在这里面表现,就是外边人的思想变迁也有一大部在这里面表现,要研究以后的思想会如何变迁去,就不可不知道现在的思想是如

何变迁来的。

广告中还特别强调《新青年》中的《通信》栏与“孔子问题”好看,现在和将来都值得看。常装实价银五元,精装实价银六元五角,邮费另付。其销售策略是“五卷合卖,不能选择”。

第七卷第三、四号刊出民国九年(1920)正月十日至三月底限期出售《新青年》第五卷特价的广告,用词更精炼更有煽动性。前者说:“从前几卷里面真有许多好文章”,“现在《新青年》里讨论的问题,有许多是由从前一直说下来的。所以——非看从前的,不能明白原委”;后者则套红有问有答:“什么书有这样便宜?前五卷《新青年》再版合装本,总共是合装五大本——纸数三千面,文章八百篇——字数二百万,现在特价,每部常装只卖四元五角,比较最初发行的购价还要减少实银五角。请问什么书有这样便宜?”广告做得很到位,估计卖得不错,因为此时已到《新青年》的颠峰期。具体数字不好推测。但有文献可作参考。即汪孟邹有则回忆说。

1935年,群益书社已经到了后辈手里,不能维持,只有收歇了。可是在子寿手里,我曾替群益做过房东的保人,要赔款五千元左右。章士钊出来了此案。我损失很大,要群益拿《新青年》给我印一版便算了。1936年,我重印了1500部,又还送了群益若干部。^⑨

这里提供了两则信息,其一是即使到1936年,《新青年》几乎成了“历史文物”它仍是一份可观的文化资源,重印1500部就可抵五千元的债务;其二即使到了1936年《新青年》编辑部或新青年社都早已烟消云散了,但杂志的版权仍属于群益,是群益的一笔财富(文章的版权当然属于作者)。亚东图书馆重印的是《新青年》前七卷的合订本。汪原放说:“重印《新青年》,计十六开本八大本。有现成纸型,只要纸张、印刷、装订费了。内封有‘亚东图书馆,求益书社印行’字样,因为群益已经歇业了;当日的‘求益’,陈汉声兄还是有关系的”。^⑩不过,亚东图书馆也很精明,在再版《新青年》时,请蔡元培、胡适作了精彩题词,勾起了人们对《新青年》的重新认同,促销了合订本《新青年》。由此不难逆推群益在《新青年》颠峰期出售《新青年》前五卷合订本的盛况,以及群益从中所获丰厚的利润。

再就是陈独秀将自己编著的《英文教科书》第一册由亚东图书馆转到群益书社出版。此书计划四册成套,陈独秀终未完成这套丛书的写作,但他将新编第二册,与第一册一起交群益配套出版。这无疑也是对群益出版《新青年》的一种补偿措施。苏曼殊的《汉英文字因缘》等书,估计也是经陈独秀介绍到群益出版的。

即使如此,销量仍是发行者非常注重的问題。鲁迅1918年1月4日有信透露:“《新青年》已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独秀辈与之交涉;已允续刊,定于本月十五出版云”。^⑪不过,好在《新青年》的发行量终于远远超过千册,并不断攀升,而群益所付的编辑费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从创刊时的二百元降到了一百五十元。《新青年》第7卷第1号刊有《新青年》编辑部与上海发行部重订条件第六条,即明文规定为此数,且以第七卷为试行期。估计这“重订条件”已将《新青年》“不另购稿”,用稿“概不付酬”的因素已考虑在内了。其实不用统观群益于《新青年》的经营之道,估计仅此一条,就令群益大有赚头。

不过,报刊的编者与印行者从来就是相生相克的。编者总希望报刊做得漂亮点,而印行者则更关注成本。各自的立场都可以理解,问题是如何协调。如《新青年》的版式中仅标点符号的使用,就颇费周折。当时有人不接受新式标点,鲁迅曾说:“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⑫《新青年》自1918年(第4卷第1号)起试用“采用西制,稍加厘订”的新式标点。《新青年》1919年12月(第7卷第1号)起连续发布《本志使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旨在进一步规范新式标点符号的使用,此前1919年4月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向教育部提交了《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1920年2月教育部发布“训令”,批准了“议案”,正式颁布行新式标点,先在中、小学课本上试用。印行者却将之视“花头”,不愿费事,以至仅此一端就令杂志过期。1918年10月5日汪孟邹致信胡适说:

《新青年》过期太久,炼亦深不以为然。但上海印业、商务、中华不愿代印,其余民友各家尚属幼稚,对于《新青年》以好花头太多,略较费事,均表示不愿。目前是托华丰,尚不如前之民友。炼今日代群益向民友相商,子寿之意如可如期,决不惜费,奈民友竟一意拒绝,使人闷闷,拟明日更至别印所接洽。^⑬

从“决不惜费”云云中透露,增添了新式标点之类“花头”的《新青年》是否能如期出版的关键还在那个

“费”字上。再如“左行横拖”，钱玄同从1917年5月起就反复呼吁，并从现代医学角度上来论证：人的眼睛是左右并列的，不是上下垂直的。如果左顾右盼，就十分“省力”；如果上下仰俯，就非常“费力”。从而肯定“横行”比“直行”可行与便利。这个建议，除胡适以为横竖是个“小节”，从陈独秀、鲁迅到读者都视之为“除旧布新”的举措。原打算第6卷第1号实行，“只因印刷方面发生许多困难的交涉，所以一时尚改不成，将来总是要想法的”。^④谁知直到《新青年》终期，也未实行这项改革。令后世史家浩叹为“元典的遗憾”。

估计此类矛盾在具体编、印过程中时有发生。因为《新青年》愈往后其版式上的“花头”愈多，以至第6卷第1号开始已有彩色播页，虽数量不多，但在当时技术条件下，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新青年》于第六卷第四号起（1919年4月15日）曾一度移北京印订。而1919年12月于第7卷第1号上公布的《新青年》编辑部与上海发行部重订条件，当为解决编、印双方矛盾达成妥协的条件：

一、自七卷一号起，印刷发行属上海发行部办理。

二、中国北部约每期可销一千五百份，由发行部尽先寄与编辑部分派。以后如销数增加，发行部应随时供给。

三、以后发行部当担任每期至少添印二百五十份。

四、编辑部担任如期交稿。

五、发行部担任如期出版。

六、发行部每期除赠送编辑部一百份外，并担任编辑费一百五十元。但编辑员于所著稿件仍保留版权。凡《新青年》刊载之小说、戏剧，如发行部欲另刊单行本，其相互条件由看著作人与发行部商定之。著作人亦可在别处另刊单行本，但承认发行部有优先权。

七、此上各条以第七卷为试行期。第八卷以后，应否修改，由编辑部与发行部商酌定文。^⑤

可惜试行期就出了问题。原因是第7卷第6号为“劳动节纪念号”（1920年5月1日出版），《新青年》的页码由通常的一百来页猛增到四百页，群益承受不了，欲加价才予印行。于是陈独秀取消了从创刊号起一直没动的“上海群益书社印行”字样，自行印行了。对此，汪原放后来回忆说：

陈仲翁认为《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劳动节纪念号”（1920年5月1日出版）虽然比平时的页数要多得多，群益也实在不应该加价。但群益方面说，本期又有锌版，又有表格，排工费很多，用纸也多得多，如果不加价，亏本太多。

我们大叔两边跑，两边劝，无法调停，终于决裂，《新青年》独立了。

记得我的大叔说过：“仲甫的脾气真大，一句不对，他竟大拍桌子，把我骂了一顿。我无论怎么说，不行了，非独立不可了，我看也好，我想来想去，实在无法再拉拢了。”^⑥

据郭沫若在《创造十年·发端》中说：“新青年社由群益书社独立时，书社的老板提起过诉讼”。汪原放则说不很清楚。郭所言当为传闻。但闹得很不愉快却是实事。

1920年9月1日版的第8卷第1号《新青年》封面上由“上海新青年社印行”取代了“上海群益书社印行”。并发表《本志特别启事》云：“本志自八卷一号起，由编辑部同人组织‘新青年社’，直接办理编辑、印刷、发行一切事务。凡关于投稿及交换告白杂志等事，均请与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社编辑部接洽；凡关于发行事件，请与上海法大马路大自鸣钟对面新青年总发行所接洽。八卷一号以前的事，仍由群益书社负责。以后凡直接在本社总发行所定购一卷以上者，在此期限内发行的特别号（例如前次的《劳动节纪念号》）概不加报价及邮费。特此预先声明，以免误会。”

此时陈独秀邀请陈望道参加编辑，发行部另请苏新甫负责。“新青年社”似乎试行股份制经营。致使陈独秀1920年有信给胡适云：“新青年社股款，你能否筹百元寄来？”^⑦本年12月陈又有信寄北大诸君说：“弟在此月用编辑部薪水百元，到粤后如有收入，此款即归望道先生用，因为编辑部事很多，望道境遇又不佳，不支薪水似乎不好。”^⑧既然是股份制，“新青年社”的资金就当是独立核算。以至1921年上海党的经费发生困难，李汉俊提议“新青年社”按月支二百元做党的经费，陈不答应；即使《新青年》不能按月编出，“新青年社”也拒付编辑费。因而引起李汉俊的误解而责备陈私有欲太重，两人闹得很不愉快。^⑨

独立编辑印行的《新青年》在增大书刊广告之外,还有眼镜与医药之类的广告,后者当为有偿的。新青年还出版了自己的丛书,如《社会主义史》、《疯狂之心理》、《哲学问题》、《工业自治》等,宣传信仰而不排斥经营。有趣的是到第8卷第5、6号上又有了群益版书、刊的广告。

1921年10月1日,《新青年》出至第九卷第六号停刊,新青年社解散。

五、从一千本到一万五六千本

《新青年》起初每期只印一千本。

如何看待那起初每期只印一千本的《新青年》。我的看法是,评判一个杂志的质量,既要参考其销量又不能走向唯销量论;而且《新青年》既有个自身发展的过程,读者对它也有个认知的过程。这里只说其后一项。

即以周氏兄弟为例。尽管“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④,但在1917年,他们都不怎么看好《新青年》,鲁迅从旁观的角度看“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⑤;周作人也视之为“普通的刊物,虽是由陈独秀编辑,看不出什么特色来”。周作人进而说:“我初来北京,鲁迅以《新青年》数册见示,并且述许季弗的话道,‘这里边颇有些谬论,可以一驳’。大概许君是用了民报社时代的眼光去看它,所以这么说的吧。但是我看了却觉得没有什么谬论,虽然也并不怎么对。”^⑥但很快鲁迅就觉察到这里有个读者眼光问题:“该杂志销路闻大不佳,而今之青年皆比我辈更为顽固,真是无法。”^⑦一经陈独秀、钱秀同催促,他们兄弟很快就成了《新青年》的骨干力量。

《新青年》起初发行量虽少,但改变风气之力却不小。吴虞1920年春致书胡适说:“成都风气闭塞,顽陋任事,第二十年中与之宣战,备受艰苦。《新青年》初到成都不过五份,弟与学生孙少荆各购一份,为之鼓吹。……近一、二年风气渐开,而崇拜先生及仲甫之学说者尤多”^⑧。这“初”指1917年1月,3个月后销量已到30份。或许可以说就是那少许几本《新青年》拯救了吴虞。1916年12月3日,读了易白沙《孔子评议》之后的吴虞,给陈独秀写了封长信,并寄去《家族制度为专制之根据论》、《礼论》等非儒反孔文章“以求印证”。1917年1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了吴的来信,与他的《答吴又陵》;接着在下一期的《新青年》上发表了吴的第一篇文章。这令吴感奋不已:“余非儒及攻家族制两种学说,今播于天下,私愿甚慰矣。”^⑨到1921年吴任教北大时,胡适5月10日与之会见。胡适日记云:“(吴虞)这人是十年前的激烈分子,在成都为人不容,后来《新青年》出版,守旧的空气稍变,他才渐渐的受人欢迎,但旧党终忘不了他。”^⑩

随着编辑部的北移,作者队伍的不断壮大,话题更聚焦于思想革命——文学革命——新旧之争,尤其是复辟与反复辟的搏斗,《新青年》确实越来越兴旺。诚如周作人所言:“以后蓬蓬勃勃起来的文化上诸种运动,几乎无一不是受了复辟事件的刺激而发生的兴旺的”^⑪。如成都《川报》有评论说,北京政府驱逐陈独秀、胡适、傅斯年、钱玄同出校,“从此《新青年》的价值愈增高了!陈、胡、傅、钱的声名,也是愈增高了!”^⑫上海《中华新报》更有文云,听了陈、胡、刘(半农)、钱四君被逐的消息,并不悲观,“至少言之,我知从此以后之《新青年》杂志发行额必加起几倍或几十倍”。^⑬

《新青年》的主动出击,社会效应则尤为强烈。如1918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于1919年2月再次撰文责难《东方杂志》。如同“杀手锏”,令《东方杂志》招架不住,先是减价促销,再是撤换主编也挡不住声望与销量的暴跌。当初销量远胜《新青年》的《东方杂志》,立即出现了逆转。这自然是文化论争的成果,而决非陈独秀见其“甚为流行,难免心生嫉羨,”于是“违背常规”,“诋毁”、“攻讦”对方。^⑭

尤其是“五四”运动的兴起,则极大地推动了《新青年》的传播。1919年4月23日汪孟邹写信告诉胡适说:“近来《新潮》、《新青年》、《新教育》、《每周评论》,销路均渐兴旺,可见社会心理已转移向上,亦可喜之事也。各种混账杂乱小说,销路已不如往年多矣。”^⑮汪说的是“五四”前夕的情景。经“五四”的刺激,《新青年》其名声大震,销量猛增。汪原放曾欣喜地说:“《新青年》愈出愈好,销数也大了,最多一个月可以印一万五六千本了。”^⑯清末民初迅速崛起的报刊,已经大致形成商业报刊、机关刊物、同人杂志三足鼎立的局面。注重商业利益的《申报》、《东方杂志》等,一般来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立论力求“平正通达”;代表学会、团

体或政党立场的《新民丛报》、《民报》等，横空出世，旗帜鲜明，但容易陷于“党同伐异”；至于晚清数量极多的同人杂志，既追求趣味相投，又不愿结党营私，好处是目光远大，胸襟开阔，但有一致命弱点，那便是缺乏稳定的财政支持，且作者圈子太小，稍有变故，当即“人忘政息”。^⑤《新青年》作为第三类中鼓吹思想文化的刊物，有此销量这在当时确实相当可观。《新青年》因此确实成了具有社会号召力和市场号召力的“金字招牌”（钱玄同语）。

不过，凡此种种，尚不能算具体的传播策略。从狭义的传播角度视之，《新青年》销量的猛然攀升，还有若干具体招数可言。

其一，1918年12月陈独秀创办了《每周评论》，1919年1月陈独秀又扶助北大学生傅斯年等创办了《新潮》。与月刊《新青年》相比，作为周刊的《每周评论》直接介入时政，真正做到“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改守的手足”。^⑥而《新潮》“精彩充足，确是一支有生的生力军”。它们堪称《新青年》的卫星，三刊协同作点，立即形成群体效应。如《每周评论》在“五四”前后的1919年4月13日、4月27日、5月18日连续以“特别附录”的形式，就“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对北京学生运动的舆论”，集中了数十篇各家报刊的言论，借助大众传媒延伸与强化了《新青年》的命题。更何况《每周评论》作者队伍与《新青年》几乎等同，与《新青年》稍不同的是“一个人除分任写文章，每月捐助刊资数元，印了出来，便等于白送给人家的。”^⑦《每周评论》似是制造舆论的免费报纸，其受众面则可想而知。不仅如此，他们间还互作广告，互作评论，相得益彰，自然促进了各自的传播。

其二，1922年，胡适在其名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五四运动时代，各地的学生团体忽然发生了无数小报纸，形式略仿《每周评论》，内容全用白话。此外又出了许多白话的新杂志。有人估计，这一年（1919年）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⑧这些白话报刊不仅在内容上与《新青年》相呼应，他们还与《新青年》交换报刊，交换广告，互相鼓吹，扩大受众面。《新青年》第七卷上有各类新报刊的广告，除少数学报和专业杂志外，多数是人文类的，虽以北京、上海为主体，也不乏县、市基层的报刊，甚至中小学的报刊都有。仅第七卷第三号《新刊一览》中就排列了33家新刊。

报 名	发行地点	已出号数	价 目
北京大学学生周刊	北京大学学生会	第二号	每份铜元三枚邮寄三份
新潮(月刊)	北京大学出版社	二卷二号	每册三角每卷五册一元二角
国民(月刊)	北京北池子五十三号本社	二卷二号	每册三角全年十二册三元
新生活(周刊)	北京后门内东高房一七号本社	第二十二号	每册铜子四枚邮寄三分半
法政学报(月刊)	北京太仆寺街法政专门学校	二卷二号	每册二角半年六册一元
曙光(月刊)	北京西河沿二二〇号本社	一卷二号	每册一角全年十二册一元
通俗医事月刊	北京后孙公园七号本社	第四号	每册一角全年十二册一元
工读(半月刊)	北京翊教寺高等法文专修馆	第三期	每份铜子二枚邮寄大洋二分
少年(半月刊)	北京师范附属中学少年学会	第六号	每份铜子二枚邮寄大洋二分
新社会(旬刊)	北京南弓匠营社会宝进会	第七号	每份铜子三枚邮寄大洋三分
工学(月刊)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工学会	一卷二号	每册六分全年八册四角
平民教育(周刊)	北京高等师范平民教育社	第十三号	每号铜子二枚邮寄二分
建设(月刊)	上海法界环龙路四十六号本社	一卷六号	每册三角半年一元六全年三元
新华(月刊)	上海五马路亚东图书馆	一卷二号	每册二角半年一元一角全年二元
解放与改造(半月刊)	上海新学会	二卷一号	每册一角半年一元全年二元
少年中国(月刊)	上海五马路亚东图书馆	一卷二号	每册二角半年一元一角全年二元
新妇女(半月刊)	上海西门方斜路一八八号	一卷一号	每册铜子五枚全年小洋十角
少年世界(月刊)	上海五马路亚东图书馆	一卷一期	每册一角全年十二册一元
星期评论(周刊)	上海爱多亚路新民里本社	第三十二号	每份铜子二枚邮寄二分
太平洋(月刊)	上海商务印书馆	二卷二号	每册二角全年十册一元八角

报 名	发行地点	已出号数	价 目
科学(月刊)	上海大同学院内中国科学社	四卷十二号	每册二角五分全年二元五角
新教育(月刊)	上海西门新教育共进社	二卷二期	每册二角全年十册一元八角
兴华(周刊)	上海吴淞路十号本社	第十七年第三册	全年五十册一元
青年进步(月刊)	上海昆山花园四号本社	第二十九册	每册二角全年一元五角
民风周刊	广州东堤荣利新街二十二号	第十九号	每册五分每月二角
教育潮(月刊)	杭州浙江省教育会	一卷五号	每册一角全年一元二角
钱江评论(周刊)	杭州上集营巷三十二号	第二号	每号铜子二枚邮寄二分
体育周报	长沙储英园二三号本社	第四十九号	每份铜子三枚全年八角
新生命(半月刊)	天津真学会	第四号	每册铜子三枚
闽星(半周刊)	福建漳州新闽学书局	二卷一号	每月二册每册三仙
新空气(周刊)	成都商业场内支街大兴隆号	第十八号	每份铜子二枚
向上(半周刊)	武昌中华大学部向上社	第二期	每份铜子一枚邮寄一分半
社会新声(半月刊)	武昌中华大学书报经理部	第二期	每册铜子四枚邮寄四分

多一家报刊交换广告,就意味着《新青年》多一个宣传渠道。相信《新青年》的促销广告,不限于与其他报刊的交换,今天也无法统计《新青年》当年广告的面与量。《吴虞日记》(1917年3月25日)云:“午刻陈岳安送来《进步》十一卷四号,《新中华报》三月七日,因上登有《新青年》六号要目,余之《家庭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在上,故送来一阅也。”由此可知,四川的吴虞所见一报一刊上就有《新青年》要目广告。其三,在上海总发行部之外的全国各大中城市设有“代派处”。《新青年》似乎在第四卷第三号上就公布了各地的代派处。但我手边的这几期《新青年》是1936年的复印本,复印时将这些资料都切去了。现存第七卷第一号上的公布的代派处表:

各 埠 代 派 处

地 区	书 店	地 区	书 店
北京	中华书局	长沙	群益图书公司
天津	中华书局	汉口	会文堂
天津	新华书局	武昌	昌明公司
保定	直棣书局	南昌	开智书局
保定	群玉山房	南昌	点石斋
大名	大名官书局	广信府	益智书局
济南	山东官书局	安庆	中华书局
烟台	教育图书社	芜湖	科学图书社
太原	晋新书社	屯溪	科学书馆
运城	交通义书社	福州	宏文阁书庄
西安	中华书局	福州	陈寿记
西安	中英书局	厦门	新民会社
云南	云南图书公司	坎市	广益书局
云南	森宝书局	苏州	振新书社
云南	邱文雅堂	苏州	交通图书馆
奉天	会文堂	苏州	文怡书局
黑龙	维新书报社	奉天	关东书局
贵阳	群明社	新加坡	曹万丰书庄
兰州	正本书社	苏州	小说林

地 区	书 店	地 区	书 店
成都	国民公报社	南京	共和书局
成都	陈岳安	无锡	文华书局
成都	崇文书局	无锡	乐群公司
成都	点石斋书局	南通州	导文社
成都	源记书庄	南通州	谷记书庄
重庆	二酉山房	扬州	志成书局
重庆	崇文书局	常州	新群书社
泸州	二酉山房	杭州	问经堂
梁山	益学社	杭州	教育潮社
开封	文会山房	宁波	文明学社
开封	百城书馆	宁波	汲绁斋
广州	共和书局	绍兴	教育馆
广州	蒙学书局	处州	悦兴学社
汕头	共和编译局	温州	日新书社
桂林	石渠书局	温州	维新书局
奉天	神州图书局	奉天	图书发行所
哈尔滨	魁升堂	吉林	图书发行所
嘉应州	启新书局	新加坡	普益印务公司

这个表上有七十六代派处。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有两个代派处。从《新青年》的版权页与前五卷合订本销售广告知,《新青年》早销出国门。只是如今无法统计国外销售额有多大。我们知道日本学者青木正儿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曾撰有《以胡适为中心而掀起之文学革命》和《吴虞底儒教破坏论》,热情称扬中国的文学革命,推崇胡适、鲁迅、陈独秀,力介吴虞,多取材于《新青年》。这也是《新青年》远播海外之一证。到下一期公布的代派处,城市与同一城市中的书店都有增减变化,总数增加了四个。到再下一期又有变化。各个代派处的销售业绩颇不一致。如湖南长沙文化书社1919年8月成立,半年之内销售《新青年》就有两千本。西部地区则相当滞后点。申朝晖等有《〈新青年〉在中国西部的传播——以川陕为考察中心》^⑥,叙之甚详,不再重复。

还应指出,即使《新青年》月销量最高达一万五六千份,它也不是当时最畅销的杂志。当时有些更加平民化刊物如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8月创办的通俗小报《劳动界》,北大出版部主任李辛白编辑的小型通俗刊物《新生活》,似乎都比《新青年》畅销。但这并不影响《新青年》“曾为中国真革命思想的先驱”的历史地位。

六、从租界到北洋政府

《新青年》1915年创刊,几经变幻,直到1926年7月自动停刊,前后坚持了整整十年时间。作为民间刊物,《新青年》在中国近代期刊史属罕见的长寿,从而实现了陈独秀以一杂志令全国思想改观的宏愿。

《新青年》能如此长寿,既不能不佩服其编辑与作者避讳策略之高明,也不能不庆幸《新青年》的生存环境尚不算极端恶劣。《新青年》从第五卷起封面注明“中华民国邮局特准挂号认为新闻纸类”,即意味着其为政府法律认可的合法出版物。《新青年》生命历程直接遭遇警方干涉事件似不多。最著名的一次即《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付排时,全部稿件被法租界巡捕房派包探到印刷厂抓去,罚洋五十元,并禁止在上海印刷邮寄。于是不得不移广州,直到1921年4月1日才出刊。第九卷第一号《编辑室杂记》里声明:“本志八卷六号排印将完的时候,所有稿件被辣手抓去,而且不许在上海印刷;本志既须找寻原稿重编一道,又须将印刷地点改在广东,所以出版便不能如期了,劳爱读者诸君,屡次来信询问原由,本社非常抱歉——这也许是中

国应该向我们抱歉!”

租界(鲁迅称之为“且介亭”)似乎是国中之国,不受中国法律管束,而租界之外租界方面亦多不管,这就形成一个特殊空间。当年不少文人利用这一空间作为生存之道。当然租界也有与中国当局联手整治“不轨”的时候。但《新青年》的被查封则属法租界的行为,明知其移粤出版而不追究。

1921年10月4日,陈独秀在上海渔阳里2号住宅被法巡捕房搜捕,搜出《新青年》等印刷品多种。巴和律师代为辩护:“《新青年》自奉谕禁以后,即移至广州出版,并未在法租界出售……”,26日法副领事宣判:“搜获书籍虽多,尚无激烈言论。惟查出新青年有违前次堂谕,判罚洋一百元了案。”^⑧

1922年8月9日,陈独秀再次在上海家中被租界侦探拘捕;又搜出《新青年》纸版等。18日巴和律师帮办博勒律师称,所搜之物“不能认为充分证据”,“法兰西与中华民国同为共和国家,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载诸宪章约法。况陈君为学者,从事社会学之研究,安可不罗致书报”,“收藏新青年书籍底稿,并无违犯章程。尚有各种往来信札,亦无鼓吹共产党行为。”最后中法会审官互相商议判决罚洋四百元,交保释放。^⑨

须知这几次被罚,都是《新青年》成为中共机关刊物之后的事。

《新青年》在第八卷第六号之前未遇警方干预之事。倒是其卫星杂志《新潮》、《每周评论》曾遭北洋政府责难。在“五四”前夕的1919年3月,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令教育部长傅增湘致函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说:

自《新潮》出版,辇下耆宿对于在事员生不无微词。……近顷所虑,乃在因批评而起辩难,因辩难而涉意气,倘稍逾学术范围之外,将益启党派新旧之争,此则不能不引隐忧耳……甚冀执事与在校诸君一扬摧之,则学生之幸也。

对于傅增湘的信,蔡元培以太极功给顶回去了。蔡复信说:

据《新潮》编辑诸生言,办此杂志之初心,原以介绍西洋近代有益之学说为本,批评之事仅属末节。……《新潮》持论或有易致骇怪之处,元培自必勉以敬慎将事,以副盛情。……大学兼容并包之旨,实为国学发展之资……^⑩。

事后虽有皖系段祺瑞的安福俱乐部唆使议员张元奇在参议院提议查办蔡元培,弹劾傅增湘,却并未获准。

再就是1919年9月《每周评论》上刊有若愚《司法独立与教育独立》一文,说司法官的任务是神圣的,不应当作军阀的“鹰犬”。北京政府司法总长朱深见了立即派武警查封《每周评论》。当时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在狱中,《每周评论》由胡适代为主编。9月1日北京政府警察厅总监吴炳湘为此召见胡适。胡适记载:“我与虞春汀同去见吴炳湘,谈了一会,他劝我不要办《每周评论》了,要办报,可以另起报名。我答应了,此事就完了。”^⑪对于《每周评论》的被封,国内许多报纸鸣不平。胡适因此写了首《乐观》的诗对那些报人表示感谢。

把这几则故事连起来,大抵可以推断《新青年》的生存环境。

对之还有两则材料可作佐证。一是陈思和从宏观上来看,他说:

政治上军事上外交上都处于短兵相接的时候,政治家尚顾不到文化上的大一统,这时,往往是国家之灾,文化之幸——文化在王纲解纽,专制崩坏之中找到了生存发展的空隙,由此兴盛起来。在中国历史上,一次是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一次是魏晋南北朝的佛学入华,再一次就是民国军阀混战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都证明了这种虽然令人扼腕叹息,但不得不承认的文化发展规律。^⑫

一是李欧梵从《申报》中的“游戏文字”谈到北洋政府的文化政策,他说:

《申报》是全国第一大报,发行于上海,不受北京的控制,对于时政的批评更变本加厉,不禁使我臆想到两件事:近年台湾议会的大打出手其实“古亦有之”。而军阀时期的言论尺度,反较后来国共两党执政时宽松得多!且不论这些“游戏文章”当时会产生何种影响,我认为它已经造成一种公论,提供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公开政治论坛,也几乎创立了“言者无罪”的传统。如此发展下去,中国现代报纸所能扮演的“公共空间”角色可能绝不较美国独立前的新英格兰报纸(当时也有不少才智之士用化名发表论政之文)为逊色。问题是:这一个逐渐独立的报纸言论,并没有完全生根结果,国民党北伐统一中国后,在言论上采取检查制度,

遂把这个言论空间又缩小了。^③

这两则材料都不是直接谈《新青年》的生存空间,但将两者结合起来看,恰恰能更深切地感受到《新青年》的生存空间。没有一个起码的生存空间,报人们再智慧再勇敢的努力,都会付之东流。为写这一节文字,我检阅了《大清报律》(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颁布)、《著作权章程》(宣统二年颁布)、《报纸条例》(大总统袁世凯申令于民国三年四月二日公布)、《修正图书杂志审查办法》(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一日公布)、《国民政府有关新闻出版之法规》(从民国二十六年到三十三年所颁布者十项之多)、《汪伪政府出版法》(民国三十年一月二十四日公布)……令人吃惊的是中国新闻出版方面的法令,从晚清至民国,真的是在某一方面前进半步而在另一方面倒退两步!从而我更信服李欧梵由个案研究的所得出的准确结论,并真的庆幸《新青年》的生存环境尚不算极端恶劣。换个环境它未必能健全地生长。《新青年》在一个特殊时代获得了一个特殊的生存空间,《新青年》则借机创造了一个新时代。

注释:

①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年11月版;《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学林出版社2006年2月版。

② 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第33页。

③ 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第234—235页。

④ 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⑤ 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第33页。

⑥ 汪孟邹《亚东图书馆简史》,《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附录一。

⑦ 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第33页。

⑧ 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第32—33页。

⑨ 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第33页。

⑩ 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

⑪ 柳亚子《南社》第20集,1917年7月。

⑫ 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第33—34页。

⑬ 参见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2卷第243页,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1月版。

⑭ 陈独秀《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

⑮ 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第33—34页。

⑯ 《通告》,《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按,此《通告》自第二卷到第三卷都刊之每号的扉页上。

⑰ 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上)。

⑱ 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第3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⑲ 参阅陈平原《清末民初小说研究》第8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版。

⑳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时报的编制》,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

㉑ 高一涵《李大钊同志略传》,1927年5月25日《中央副刊》(武汉)。

㉒ 胡适《致高一涵》,《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258页。

㉓ 胡适《致母亲》,《胡适全集》第23卷第183—184页。

㉔ 胡适《致母亲》,《胡适全集》第23卷第180页。

㉕ 胡适《致母亲》,《胡适全集》第23卷第190页。

㉖ 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第33页。

㉗ 转见胡适《致高一涵(稿)》,《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259页。

㉘ 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

㉙ 汪孟邹《亚东图书馆简史》,见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第228页。

㉚ 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第192—193页。

㉛ 鲁迅《致许寿裳》,《鲁迅书信等》第1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8月版。

㉜ 鲁迅《忆刘半农君》,《鲁迅论文学与艺术》第715页。(按当时有出版社标点符号不付稿费,鲁迅给一书稿通篇无标点符号,令编辑“难以断句”,只得同意“标点也得字数”,鲁迅才补上标点符号。)

- ③汪孟邹《致胡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存《胡适档案》。
- ④《通信》，《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8年1月15日。
- ⑤此后亦见诸刘运峰编《鲁迅佚文全集》（上）第294—295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9月版。按此文何以变成了鲁迅佚文，编者未说明理由。
- ⑥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第56—57页。
- ⑦陈独秀《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13页。
- ⑧陈独秀《致李大钊》，《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16页。
- ⑨唐宝林等《陈独秀年谱》第142页。
- ⑩钱玄同《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师大月刊》第30期，1936年10月。
- ⑪鲁迅《呐喊·自序》，《鲁迅论文学与艺术》第91页。
- ⑫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224页。
- ⑬鲁迅《致许寿堂》，《鲁迅书信集》第19页。
- ⑭吴虞《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87页。
- ⑮《吴虞日记》1917年3月25日。
- ⑯《胡适日记全编》第3卷第250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 ⑰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224页。
- ⑱因明《对北京大学的愤言》，转见《每周评论》第19号（1919年4月27日）。
- ⑲志拯《谁的耻辱》，转见转见《每周评论》第19号（1919年4月27日）。
- ⑳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
- ㉑汪孟邹《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40页。
- ㉒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第33页。
- ㉓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
- ㉔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鲁迅论文学与艺术》第932页。
- ㉕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314页。
- ㉖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156页。
- ㉗《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2期。
- ㉘《民国日报》1921年10月27日。
- ㉙《民国日报》1921年8月19日。
- ㉚阴法鲁《北洋军阀对进步刊物的摧残》，《大公报·史学周刊》1952年10月30日。
- ㉛胡适手抄汤尔和日记和跋，《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288页。
- ㉜陈思和《徐树铮与新文化运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3期。
- ㉝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见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第13页，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12月版。

还一个真实的陈独秀

湘潭大学 李衍增

内容摘要: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都产生过巨大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其评价却莫衷一是。恢复陈独秀的历史地位,还一个真实的陈独秀,不仅涉及到对其个人的“公正”问题,而且涉及到我们如何对待文化精英、思想先驱与革命功臣的问题,意义重大。

关键词:陈独秀;评价;功过是非

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极具复杂性的重要人物,他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都产生过深刻影响。在他的头上既有金灿灿的光环,如:“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共一大到五大的总书记”;又有沉甸甸的帽子,如:“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1]长期以来,对陈独秀的评价莫衷一是,研究陈独秀的历史作用和功过是非,还一个真实的陈独秀,不光是还个人以公正,更是还历史以公正,意义重大。

一、关于陈独秀的历史功绩

1894年,甲午战败,中华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的危机。出于挽救民族危亡的热忱,陈独秀开始了政治生涯,并因此改变了人生轨迹,离开了“举人、进士、状元郎”的旧路,踏上了“康党、乱党、共产党”的新路。陈独秀几乎参加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全过程,从拒俄运动、辛亥革命到反袁斗争;从励志会、青年会、暗杀团、欧事研究会到岳王会;从《国民日报》、《甲寅》、《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更为辉煌的是他成为了“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五四运动”既是指学生爱国运动,又是指这一时期的新文化运动。陈独秀最先撑起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掀起了思想解放运动的高潮。无庸讳言,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确有偏激的观点和言论。然而,这些观点“固然偏激武断,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不能不说,它是打破宗法礼制、圣贤名教一统天下的禁锢,为中国文化步入现代化进程,立下不世之功的。”^{[2](p90-91)}因此,毛泽东和孙中山都对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毛泽东称赞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3](p305)}。孙中山则认为“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4](p210)}。然而,长期以来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旗手的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突出。对此,一位台湾的学者做出了公正的评价:“中国大陆的文化界长期以来高举鲁迅而贬低陈独秀,在台湾及海外则高举胡适而贬低陈独秀,两者都是有欠公平,而不合乎实际的。事实上,陈独秀无疑是这一时代的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的领导者,而鲁迅和胡适乃是陈独秀主办《新青年》时代的左右大将罢。”^{[5](p305)}。

新文化运动中的陈独秀,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认识到,要解决革命的根本问题,必须依靠国民思想的变革。他指出,一国的兴衰存亡,决定于“其国民之行为与性质”的优劣。陈独秀宣传民主与科学,致力于国民思想的改造。他虽然没有造就出新一代的国民,但他对于国人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影响却是不容低估的。这正是他能够成为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的原因所在。

1917年,陈独秀投身北大,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带入北大,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为鼓吹新文化的舆论阵地。他敬告进步青年要成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6](p4-8)}新青年。勉励受难的青年“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进研究室”^{[6](p540)}。陈独秀的激进主张,受到进步学生的欢迎。罗章龙回忆,五四时期陈独秀

一直强调“要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他的这些言论非常符合激进青年的心意。青年们对他十分敬佩,亦步亦趋团结在他周围。”^[9]陈独秀引导学生们培养独立的思想人格,敢于直接干预国家政事,从而为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四时期流传着一首诗“北李南陈,两大星辰。漫漫长夜,吾辈仰承。”这既说明了陈独秀是“开一代风气的宗师”,又说明他深受世人的景仰与爱戴。毛泽东在日后评价陈独秀时说到:“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个《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才成立了党。”^{[8](p294)}陈独秀对五四运动确实起到了领导和推动的作用,而五四运动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这就使得陈独秀能够在领导五四运动后,再创辉煌——创建中国共产党。

1920年8月,陈独秀正式建立了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9](p75)}而陈独秀作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更是直接帮助、推动了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

陈独秀委托张国焘联络李大钊建立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直接指导李汉俊,刘伯承建立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函约毛泽东,王乐平分别在湖南和山东建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王虽未参加,但推举了王尽美、邓恩铭);携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建立了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授意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在旅法学生中建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指定周佛海为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负责人。由此观之,陈独秀对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虽未参加中共“一大”,但由于其崇高的威望和重要的影响,仍被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一直到中共“五大”他都担任着总书记或者相当于总书记的职务。

陈独秀一生做了两件大事: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推动了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和学生爱国运动;以高瞻远瞩的目光和开天辟地的勇气,发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两件大事中的任何一件都足以使他名留青史!

二、关于陈独秀的四大错误

陈独秀一生既有叱咤风云、纵横政坛的风光,又有蛰居寒乡、病痛缠身的窘境。世人对他的非议集中在四个问题上:理论上的“二次革命论”、实践中的“大革命失败”、组织上的“托陈取消派”以及工作中的“家长制作风”。而陈独秀在这些问题上是否犯有错误或者说犯了何种程度的错误,随着时间的沉淀,随着大量档案材料的公开,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关于“二次革命论”。虽然陈独秀本人从未明确提出“二次革命论”,“‘二次革命论’这个名称是别人强加给陈独秀的”^{[10](p619)}。但是,不可否认,陈独秀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二次革命论”的代表,或至少是有“二次革命论”的倾向。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包括三个方面:一、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分阶段进行;二、民主革命的成功,离不开以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战线;三、民主革命的结果,在普遍形势下,自然是资产阶级获得政权。这种主张实际是一种“不断革命论”的思想。凡是认为,革命过程需要分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者性质不同,但又要从前者转变为后者的思想,都可以叫做“不断革命论”。事实上,恩格斯很早就提出了“不断革命论”的思想,他说:“在德国资产阶级和君主专制之间的决战还在后面。但是共产主义者不能指望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权以前就和资产阶级进行决战,那么共产主义者为了本身的利益就得帮助资产阶级尽快地取得统治权,以便随后能尽快地把它推翻。”^{[11](p246)}可以说,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与马恩的“不断革命论”是有相通之处的。

对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最大指责集中在“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上。不可否认,陈独秀存在着重视资产阶级,轻视无产阶级的思想倾向。他认为“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12](p29)}、“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12](p32)}。这客观上对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起了消极作用。但是,应当看到陈独秀在主观上并未“自觉”地放弃领导权。有学者把陈独秀在《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的“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13](p23)}这句话当作陈独秀放弃领导权的有力证明。这其实是一种误解,“统率”资产阶级并不是让资产

阶级当“统帅”，况且这句话的主语是“中国国民党”，它对资产阶级当然能够“统率”，对无产阶级也只能是“联合”。陈独秀在《二大宣言》中对革命前途作了分析：“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14](p15)}可以看到，陈独秀并没有坚持民主革命后，必须要有一个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而是认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是可以“即刻成功的”。而他的这段分析又与中国后来的社会发展何其相似！因此，我们对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评价应结合当时的具体国情，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既要认识到“二次革命论”所造成的损失，又要看到“二次革命论”产生的客观历史环境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

关于“大革命失败”。学术界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已基本上达成共识，客观上是由于敌强我弱，主观上因为中共是幼年的党，缺乏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加之共产国际给予了错误的指导。然而，究竟谁应该对大革命的失败负主要责任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早在大革命失败前夕，斯大林就为其对华政策辩护。他说：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唯一正确的政策”^{[15](p410)}，然而中共中央并没有执行这些重要的指示。这样一来，失败的责任自然落到了中共中央的负责人陈独秀身上。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根据俄罗斯新近公布的档案材料，可以看到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所谓七大右倾错误（在国民党二大的上退让、在中山舰事件上的退让，在整理党务案问题上的退让、对北伐持消极态度、对汉口会议决策负有责任、“四·一二”政变前三十丧失对蒋介石的警惕、危机时刻对汪精卫抱有幻想），“都与莫斯科方面的决策有着直接的密切的关系”^[16]。

必须承认，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给予过很多有益的指导。但是，从组织关系上看，实际上是联共（布）通过共产国际来领导中国共产党。联共（布）指导中国革命，其中既有国际共产主义的情感又有民族利己主义的因素，而后者往往处于主导地位。联共（布）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强调中国革命反帝的一面而忽视了反封建的一面，这就为大革命的失败埋下了祸根。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组织原则上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国际。陈独秀也曾同共产国际争论过很多问题并提出过许多正确的意见，但是没有被共产国际所接受。共产国际实质上主导了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的政策和行动，理应为大革命的失败负主要责任。

在大革命后期，“‘五月指示’来华，陈独秀、鲍罗廷、罗易都认为无法执行，于是做出决议，并由陈独秀答复莫斯科。结果，大革命失败时，陈独秀就被指责为拒绝和违反国际指示而成为替罪羊。”^{[17](p7)}对于为何让陈独秀来当“替罪羊”，张国焘作出了恰如其分的分析：“中国革命失败了，责任问题要交代。中共一切虽然事实上遵照共产国际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这个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领导。为了使共产国际今后能领导中国革命，中共中央只能挺身而出，承担这个责任。”“如果这一失败由中央政治局全体负责，中共领导就会破产，损失也太大了……那我们不如把全部失败责任推给他（陈独秀）一人身上，而我们自己应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立场上，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18](p237)}。从这里，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将责任推给陈独秀的政治原因。

陈独秀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缺乏坚持真理的决心，缺乏驾驭复杂问题的能力，对于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如果将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推给陈独秀，那似乎是说不通的。

关于“托陈取消派”。陈独秀加入托派组织，并被推举为中国托派的领袖，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说陈独秀是“取消派”实难令人信服。即使在被称为“托陈取消派纲领”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中，陈独秀仍然指出：“我们更不是主张用国民会议来代替苏维埃，而是要利用国民会议的斗争来发动广大的下层民众反对国民党资产阶级的军事专政，走向‘武装暴动’和‘苏维埃政权’。”^{[19](p481)}可见，陈独秀只是认为在革命低潮时应当保存力量，不能盲目进攻，而一旦时机到来仍要通过“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何以见得就是取消革命？

陈独秀的一个重大过错就是参加了中国托派。但是，对此我们也要作具体的分析。陈独秀加入托派并成为领袖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而陈独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他个人的脾气禀性则是最重要的两个方面。

如前所述,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被当作“替罪羊”。随后的“八七会议”对陈独秀作了简单粗暴的批评。周恩来在谈“八七会议”的缺点时就曾指出:“‘八七’会议在党内斗争上造成了不良倾向,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而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犯了惩办主义的错误”^{[20](p172)}。1929年,陈独秀给中央的“三封信”成为其被开除出党的原因之一。但是,从这三封信的内容上看,前两封信主要是与中央争论对于中东路事件的政策,认为不应该简单地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而应从民族利益出发,反对国民党的误国政策。应该说,他与党的争论,从主观上讲是“对于重要问题,都想有点贡献于党”^{[19](p343)},从现实上讲“仍是革命阵营内部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路线和方法上的分歧”^{[21](p1)}。至于陈独秀的第三封信,“对于向李中央盲动主义的批判,不消半年历史就证明是正确的,指出因盲动主义而扼杀党内民主推动命令主义也是正确的。”^[22]然而,中共中央对这三封信大加指责,使陈独秀极为不满,成为他另起炉灶的重要原因。

令陈独秀更为不满的是共产国际的所作所为。中共中央开除陈独秀的四个理由(不肯去苏联接受共产国际的教育;不同意“拥护苏联”的口号;反对“六大路线”;公开为托洛茨基鸣不平),个个都与共产国际有关。陈独秀具有反叛精神,崇尚民主、自由,敢于为追求真理而斗争。大革命失败前,他被迫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时,已经不断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大革命失败后,他蒙受“不白之冤”,恢复了“终身反对派”的本性,不在接受别人的意旨,不管它是来自莫斯科还是党中央,他都极力抗争,即使被开除党籍也在所不惜。陈独秀确实是一个“终身的反对派”,他自己也承认:“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的反对派’实是如此”^{[23](p567)}。那为何这样的一个“终身的反对派”开始时接受共产国际的错误领导,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他必须服从组织原则,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有一种“优容奸恶”的性格,“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24](p213)}

陈独秀与托派的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课题,相信随着有关档案材料的公开,这一问题的研究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关于“家长制作风”。陈独秀在工作中确实有简单粗暴的做法,但据此认为陈独秀有一贯的“家长制作风”却值得商榷。陈独秀禀性倔强,年青时就是“酒旗风暖少年狂”,到晚年依然“且喜疏狂性未移”。陈独秀脾气火爆,“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团烈火似的”。这种脾气禀性或许是他工作简单粗暴的重要原因。事实上,陈独秀一生提倡民主,反对专制。五四时期,陈独秀的这一特点就表现了出来。他在与人进行激烈的争辩时,尊重对方保持见解的权利,他赞成蔡元培给辜鸿鸣等旧学者以讲学的机会。他说:“蔡先生对新旧各派兼收并蓄,很有意义,很有分寸,是尊重讲学自由,是尊重新旧一切正当学术讨论的自由”^[25]。1920年,陈独秀在与张国焘讨论党的组织问题时,主张“中国共产党不采党魁制,如孙中山先生之任国民党的总理那样”,强调“减低书记的职权,遇事公决;这不仅可以确立党内的民主作风,也可以杜绝党魁制的个人独裁及官僚式的流弊。”^{[26](p137)}直到被开除出党的前夕,陈独秀依然认为:“同志间关于理论上政策上意见不同的争论,是党的进步的现象,决不是坏现象;反之,大家都没有什么不同意见,这正是党之幼稚的表现。”^{[19](p418)}当然,我们评价一个人,不能单单看其言论,还要看其行动。在陈独秀担任中央主要负责人的1921至1927年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五次中央扩大会议和政治局会议;领导了四次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四次劳动大会和多次全国及省的农民代表大会。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党内民主比较充分的时期,从而使党员积极性较高,使党的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而且,陈独秀对待同志谈成坦诚率直,光明磊落。鲁迅曾说:“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27](p56)}陈独秀从未因为意见不同对任何同志进行过打击和处分。可见,无论从思想上还是实践上,陈独秀都是主张民主的。他在工作中某些带有“家长制”倾向的做法,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中似乎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做法在当时复杂的革命环境中甚至是必须的。

三、关于陈独秀的综合评价

“总观陈独秀的一生,他的历史功绩是主要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28](p27)}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尘埃慢慢落定,一个真实的陈独秀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在我们的面前,人们对他的评价也更加接近了客观与公正。

我们在记取教训的同时,应对陈独秀的功绩作进一步的肯定。陈独秀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推动了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成为“开一代风气的宗师”;陈独秀领导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成为进步

青年的精神领袖；陈独秀以开天辟地的气概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在中国革命中的不懈努力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确立提供了经验教训。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那么陈独秀就是抡起开天之斧的盘古氏；如果说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是“始于毛、成于邓”，那么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则是“始于陈，成于毛”；如果说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将继续在黑暗中摸索，那么没有陈独秀结果也是如此。总之，陈独秀是20世纪初一位功不可没的重要的历史人物。

“此骨非饥寒所困，一身为人类之桥”是陈独秀的自我写照。他一生赞扬“造桥”的精神，认为从桥上“过去底人不是我们的真生命，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永远的生命！因为过去的人连脚迹也不曾留下，只有这座桥留下了永远底价值。”^{[6](p434)}陈独秀失败了，但他无愧于一个坚实的“桥墩”。因此，忘记陈独秀犹如“忘桥”，而过分否定陈独秀则近乎于“拆桥”。

注释：

- [1]唐宝林.中国学术界为陈独秀正名的艰难历程[J].纵横,2002,(9).
- [2]“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课题组.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 [3]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C].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 [4]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5]陈鼓应.悲剧哲学家尼采[M].台北:三联书店,1996.
- [6]陈独秀.独秀文存[C].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 [7]罗章龙.红楼感旧录[N].团结报,1983-06-27.
- [8]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 [10]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下)[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4.
-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2]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Z].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13]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Z].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14]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Z].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1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Z].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 [16]苏杭.谁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主要责任[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01).
- [17]唐宝林.陈铁健.陈独秀与瞿秋白[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 [18]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北京[M]: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 [19]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 [20]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21]唐宝林.陈独秀传(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 [22]王观泉.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M].台北:业强出版社,1996.
- [23]陈独秀.致S和H的信[N].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 [24]陈独秀.实庵自传[M].陈木辛.陈独秀印象[C].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 [25]周天度.关于陈独秀的一封信[J].近代史研究,1986,(3).
- [26]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27]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28]廖盖隆.陈独秀的评价问题[A].王学勤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

陈独秀：江淮地域人精神的一面镜子

安徽省颍上县政协 龚武

由于与世界第一大党，而且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特殊因缘，陈独秀作为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个公众人物，其生平事迹似乎早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当然就除去陈独秀身上浓重的政治油彩加以立体地再现他作为一个感性的人活生生存在而言，可能今天人们还有很多话要说。囿于本人术业专攻方面的弱点，对陈独秀可以说素无留心研究，但要说对安徽的这位影响中国现代史的著名老乡一无所知，也未免说不过去。所以，偷一下懒，选择一个近来个人比较注意的研究方向——地域历史文化与地域历史人物的关系这一个话题，就陈独秀个案，谈一点对江淮地域人文特色不成熟的看法。

一、陈独秀的两宗功

中国国防大学教授马祥林、徐焰曾于纪念陈独秀的《追念叹息长相随》一文中开宗明义：“一代宗师，仲甫先生；科学民主，二旗高擎。南陈北李，建党丰功；晚年颓唐，浩叹由衷。昔毛泽东主席‘七大’评价，功过分明。‘五四运动总司令’、‘创造了党’，两语千钧，可为墓铭。”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是新文化运动的创始人，创办《新青年》，倡导文学革命，撰写革命文章，引荐新思潮，介绍马列主义学说，扶植革命青年，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创始成立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自己没有出席，派出代表包惠僧出席)，当了五届党的总书记，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领导参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犯了右倾投降主义，被开除出党，继而组织托派……，晚年，虽有机会“回党”，但机缘已尽，至死未能重返中共政治舞台。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松年都是我们党早期领导人和革命烈士，陈独秀当然是革命先烈的父亲。因此今天我们研究陈独秀无难免不怀着复杂的心情。

纵观陈独秀一生，有这样几个极为重要的关键词：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五四运动总司令”，《新青年》创办者，“创造了党”，首任中共总书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国托派的发起人。这几个关键词，几乎都可以以“第一”冠之。陈独秀的文化人格基本是一个顺应并引领时代潮流、敢为天下先的知识者，一个伟大的“造反秀才”(他也应了中国那句老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其中最伟大的历史功勋就是领导五四运动倡导新文化运动，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一个人一生中能够做到这两件事中的一件，已足以称得上伟大。而陈独秀这两件大事都做了。不管其以后如何，都应当尊重历史肯定他的功绩，承认他的历史贡献，而不能因为其过，而忽略其功。

中国是儒文化过分发展的国度。儒文化为一尊的封闭性和排他性，排拒了多样性文化因素生长的空间。而儒文化的核心是道德化的臧否，不能理性地分析研究一个人功过，而习惯常常对一个历史人物采取纯伦理的道德化评价的方法，即简单的把一个人两分，好的部分有多少，坏的有多少，好坏相加减，然后得出一个结论。譬如“几几开”这非常类于小学生作算术的结果。这种小学生做算术似的评价历史人物，是非常不好的一种文化。因为这种文化，容易把一个不是坏人的人，结果得出是坏人的结论，而把一个不是那么杰出的人，妆扮成完美的圣人。

我们一度对陈独秀的历史功过的评价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摆脱“小学生做算术”的评价体系。所以一批就全盘否定，一评就无不美妙，显得比较乱。是否定者，就专事寻求否定的证据和资料，只说否定之词，而肯定者也专事寻求肯定的证据和资料，只过肯定之词。陈毕竟首先是政治人物。对其评价说一点不受领导人和党的政策的影响，这是不现实的。因此，大家出现了各说各话的现象。在历史人物研究领域，相当普遍地方法是形而上学猖獗。说的好听一点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说的不好听，就是学术的虚假繁

荣。因为方法上是有问题的。

个人认为,五四时期的陈独秀是中国最先进思想的代表之一,与中共建党时的其他领导人大都是师生关系。1945年在“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曾客观地评价了陈独秀,称他“做了启蒙工作,创造了党”。1953年毛泽东乘军舰沿长江东下经过安庆时,专门向当地负责人询问起陈独秀在故乡的遗属,并指示要给予生活照顾。据毛泽东向斯诺回忆,是《新青年》改变了他的人生取向。毛泽东还认为,在北京时他受陈独秀的影响最大。在著名的《新青年》在创刊号上,第一篇文章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作为新文学实绩代表作,鲁迅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便在此刊上登出。因此,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勋是与天地共存的。

二、江淮地域三分谈

今天的安徽,即江淮大地,以地域文化的视角划分,省内文史界比较一致地认为,以水系为“地理—历史”座标大抵可一分为三:即自南而北,依序为新安江文化(或称徽州文化)、皖江文化和淮河文化。而从古今人物诞生的时间划分,这个次序是反过来的,即自北而起,于先秦时代,淮河流域最早,产生了“三子”即管子、老子、庄子为代表的上古文化;然后,汉代淮南王、三国时期“三曹父子”,以及魏晋时代嵇康、阮籍等文学家,继续引领时代的风骚。到了元明时代,风气文脉从沿淮淮北向沿淮淮南和江淮之间转移的趋势初露端倪,阜阳的刘福通风阳的朱元璋,相继完成了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建立了明王朝。

风气文脉逾淮河,在江淮分水岭徘徊,继续向南延展。清代,有桐城古文学派,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和“淮军”,近现代有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三陈父子”,以冯玉祥为代表的巢湖“三名将”、五四文学流派之“未名社”以及位于大别山麓的将军县金寨……还有塔城安庆和誉满全国的黄梅戏艺术。

风气文脉从皖江而皖南新安江流域,从文房四宝,到新安画派,新安医学和徽商文化,从胡雪岩、胡适之到绩溪龙川、旌旗江村的宗祠文化……重视商贸,重视教育,踏踏实实,埋头苦干的“徽骆驼”,显然那是一种比“黄山松”更具有人文内涵和精神底蕴的道德形象。尽管后起的文化现象已经渐渐远离早期淮河文化的经典性。但毕竟江淮风气文脉就这样走了一条北风南渐的历史之路。对于这个一脉相承的人文风气流变的过程,具体路线图是什么,内在的根据又是什么,个人还没有来得及深究。但至少从现象学上观察,它具有如下一些特征,也是皖籍古今人士地域文化的特色,反过来说,皖籍著名的代表人物总不免打上地域文化的一般烙印。

三、皖籍人文四特色

一般来说,陈独秀传奇和丰富的人生经历和遭遇,当然具有时代的特征,即所谓时势造英雄。实际上仅仅停留在这个认识的层面,什么历史问题也不能说明。比如我们如何理解陈独秀为什么不同于同时代的李大钊,或者蒋介石?我们可以把时代客观环境和条件当作一个要件,作为考察和研究一个历史人物的参照系统,但它决不是唯一重要的系统。而结合时代条件,从地理、地域文化,即从更感性的方面个性的方面来认识一个历史人物,也是一个可供选择的视角。

1、引领风气之先的经典性

毛泽东曾经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称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而这个“开天辟地大事变的”领头人之一就是陈独秀。

从管子、老子、庄子“淮河三子”为标志的中华古典文化的典范来看,皖籍地域文化雏形最早形成了一个最基本的旋律:引领并开肇风气之先,往往不避开创之险,不避处于风头浪尖之嫌。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管子是这样,他敢于而且精彩之极地说“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主张“无为而无不为”的老子是这样,他敢于说而且精彩之极地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子是这样,他敢于说而且精彩之极地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管鲍之交是这样,神童上卿甘罗是这样,魏武帝曹操是这样,明太祖朱元璋也是这样;首倡并身体力行洋务运动的李鸿章、戴着顶戴花翎经商的胡雪岩是这样,曾任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也是这样,甚至带头农村“大包干”的风阳小岗村的十八户社员和第一个敢吃市场经济“螃蟹”芜湖的傻子瓜子的老板年广九……都无不是这样

的人物。

细读陈独秀一生,其独特之处似乎总是在“开风气之先”。这与其说是陈独秀的喜剧,毋宁说也是陈独秀的悲剧。如果说,甘罗12岁为宰相,12岁就遭杀身之祸,是第一个不得善终的皖籍历史人物,那么,陈独秀和王明是否是不幸而步了甘罗后尘的最后两位人物呢?

2、“政治动物”的天赋性

管子、鲍叔牙、甘茂、甘罗、曹操、朱元璋等的杰出政治家不去说了,即使皖籍人物中的纯文人墨客而青史留名者,甚至著名的隐士,骨子里也还是离不开政治的。主张“治大国如烹小鲜”的老子难道讲的不是“小国寡民”的政治吗?主张“无为而治”的庄子难道讲的不是一种原始理想的政治吗?以策论天下而无匹敌又被举为孝廉的黄宪,不愿意在洛阳做官不又何尝不是在坚守一种政治的乌托邦?他们只是用自己方法在讲政治而已。竹林七贤不讲政治吗?他们的放浪形骸,其实是对当时政治的极端失望的反抗。身陷专制政治漩涡中心的李鸿章和皖系军阀,不必说了。胡雪岩更是大商人政治家。一生头戴了无数顶洋博士帽的胡适之先生总体上好像是个学贯中西的学者,骨子里却十分懂得政治取舍,他不喜欢“主义”,只研究问题,崇拜美国,却反对日本,整理国故,却抹杀管子。只是他所讲的类于忠君的政治,与陈独秀“创造的党”所讲的造反的政治,不是一回事罢了。

陈独秀的生平事迹显示,他是一个一生都在从事政治,不断创造党派组织,并总是愿意“当头”的人。中国共产党是他创造的,他当了五届的头。但中共并不是他创造的惟一的政治团体,他早于1905年,即组织了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头”。被开除出党之后,于“1929年12月发表由81人署名的作为托陈取消派纲领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同时,在上海组成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出版刊物《无产者》。1931年5月,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陈独秀还是当头,尽管最后的政治组团是人生的败笔。亚里士多德说过,男人是天生政治动物。这至少对皖籍的历史名人而言似乎颇为适用。

3、格物致知的人文性

有关资料记载:“陈独秀到日本学习,对占统治地位的军国主义极为反感,接受的是西方传来的民主思想。回国后他发动的新文化运动,恰恰是以民主、科学为大旗,向统治了中国千年的专制、迷信开战,使一代青年从封建伦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五四时期的陈独秀是中国最先进思想的代表,与中共建党时的其他领导人大都是师生关系。”

“陈独秀学识渊博,懂日、英、法三种文字,工宋诗,写隶书,旧学有根底,新学造诣尤深。他和胡适等参考日文、英文的标点,为现代汉语确定了一整套标点符号。”

安徽被称为历史文化名人之乡,言其文风鼎盛。以上我们屡屡提到的历史人物大多以开化文物、倡引风气而著称于世。如《管子》,煌煌17万言,被宣兆琪新著《图说管子》称为“中国第一部百科全书”;《道德经》,被奉为中华本土宗教道教的最高经典;《庄子》,成为我国最早浪漫主义美学流派庄楚文学的典范,“三曹”则以“风骨”清丽著称而首创建安文学流派,以武功著称“羽扇纶巾”的周瑜,也是精通音律,世传所谓“曲有误,周郎顾”……以致世人都公认“惟楚有才”。无论是魏晋的“正始文学”,还是清代的桐城散文学派、著名小说家《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无论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之一的胡适之、陈独秀,还是后来的六安蒋光慈、未名社诸君、美学大师朱光潜、著名作家戴厚英、著名学者常任侠、吕荧……他们无论是从政,还是从文,总是最大可能地追求政治和文化的联姻,追求文化的经世致用,同时毋庸讳言,他们也追求人文精神价值本身。

1943年,中共元老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先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提出后,很快被全党同志所接受。美学大师郭因先生早于1980年代初期,就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作为人类审美的最高境界,是我国最早提出建设“三大和谐”的第一人。以“我手写我心”为座右铭的著名女作家戴厚英,在新时期发出《人啊,人》这文学人性解放的第一声呐喊。

他们都曾是时代思想和人文的播种者和耕耘者,不必苛求他们十全十美。道德文章,美文宏论,长篇巨制,琴棋书画、医艺表演……皖籍文人的门类总是最为齐全的,他们的作品和业绩往往也是最棒的。历史上还有皖籍科学家华佗、王蕃、程大位,有画家戴逵、曹霸、李公麟、渐江,有演艺家程长庚、杨月楼。还有陶行知、黄宾虹、林散之、赵朴初、吴作人、杨振宁,等等。

4、特立独行的鲜明个性

皖籍历史人物总是有血有肉,个性鲜活,特立独行,能应事变而不随波逐流,“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管子一生,活的真实,敢于自揭其短,于“穷”“不遇”时,在朋友面前放下身段,常有越乎常理之举,显达时不忘根本,始终锁定以天下为自己生死的目标。鲍叔牙忠于友情,不惜放弃相位,甘居人后,高风亮节,爱憎分明。庄子的妻子死了非但不哭,反而“鼓盆而歌”。十二岁的甘罗,少年天才,锋芒毕露,临危不惧,傲骨铮铮,甚至不惜犯上拂逆,以身试法,以致英年早逝。喟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曹孟德,是否是“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不说,在汉代儒家文化定为一尊之后,居然没有一丝一毫的迂腐之气,拥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不仅凭着文韬武略,还施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手段,他的名言“宁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比之晚于他差不多一千年后的意大利诗人但丁的“走自己路让别人说去吧”的名句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东吴时期的天文学家王蕃清高坦诚,磊落光明,傲骨铮铮,从不像群臣中的庸碌之徒,善于观察吴主孙皓的脸色办事,他有时还不计利害,违逆孙皓的想法,直言相谏。这样的事情积累多了,就受到了小人的诋毁,结果被孙皓借口其酒宴醉后失态而杀害。

“竹林七贤”中人物大多以离经叛道、放浪形骸著称。嵇康因为朋友山涛推荐其做官,而作著名的《绝交书》与之断绝往来。如说:“吾直性狭中”……“加少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性复疏懒,盘弩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而为侪类见宽,不攻其过。”委实是一篇自我解剖的千古奇文。

“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李鸿章必为19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李鸿章死后不足两月,一代国学大师梁启超为李鸿章作传曰:“李鸿章一如霍光不学无术,又像诸葛亮身兼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与曾国藩犹如管仲之于鲍叔,韩信之萧何;更有甚者,把他比做梅特涅、俾斯麦、伊藤博文。然启超曰:‘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又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陈独秀也个性鲜明:譬如他一生具有鲜明的造反者的叛逆性格,不能安分,常遭厄运而屡败屡战。同时也有儿女情长、柔情似水的一面。

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1927年7月他离开中央共领导岗位。创立党内之党,转信奉托派观点,1929年11月,在中东路问题上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党籍被开除后,发表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在上海组成托派组织“无产者社”。1931年5月,召开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担任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

正是这时期,处于穷途末路的陈独秀,与上海滩的芳邻,比他小30岁的浦东女子潘兰珍发生了一场忘年之恋。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于判刑遭囚禁期间,潘兰珍不顾阻拦从上海赶往南京探监,“称陈独秀家属”,化名王哲亚,横遭狱衙相阻,不得相见。潘兰珍成了他委托狱外事务的重要内容。他将处理潘兰珍的善后工作委托给了老友高语罕。于狱中多次写信叮嘱高,要他“婉言”劝潘“不必来看我”。“无情未必真君子”。这一段故事,今天读来,令人也难免为之动容。

而另一面,在中共党内五届任职期间,陈独秀也好以家长自居,党内同志谈话常称呼为“老先生”、“老头子”,视其他同志为小辈,在党内文件中干脆简称一个“老”字。遇不同意见动辄拍桌子、砸茶碗。俨然一位中共党内封建大家长。

今天评价皖籍古人(当然不必局限于皖籍历史文化名人)的个性,主要是观察得失,汲取长短,道德化的批判已经于事无补而又害之。我们研究陈独秀,分析其得失个性的优劣已经不那么重要。当我们从尘封的历史中,偶然捕捉住陈独秀当年做党总书记时候的封建大家长的文化形象的一面时,却忍不住发了“思

今”之“幽情”：解决党内的民主问题，也许即使对于一个世界上最革命的党来说，也从来就是一个与生俱来而关乎兴衰存亡的大课题，尤其是在其成为执政党之后。

值得欣慰的是，在今年的中共十七大胡锦涛总书记的政治报告中，多次提出了要“让人民当家作主”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要求，把党内民主问题提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的位置。世界上的事情，有时就是知易行难，所以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就成了今后五年全国全党的大事情。我衷心希望我们安徽的各级党政领导能够从皖籍历史人物的身上汲取鉴别优劣，继承精神智慧，善于学习历史，发扬皖籍地域人文的历史传统，继续走在引领时代新潮流的前列。

不能忘记陈独秀

山西省委党校 黄学诗

中共十六大以来一直号召全党要树立科学发展观。我认为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必须先要树立科学的历史观。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历史,同时还要正确地认识现实的环境,才能树立起科学的发展观。

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的总司令。

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可以说是第一位的。

是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导师和领袖。

是坚定地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革命家。

是敢于对共产国际、斯大林说“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深刻见解的思想家。

是一个真正人格独立、有骨气的人。

可是几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内一直被批判,被认为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许多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甚至不知道陈独秀,有些党的领导人也只知道陈独秀是坏人。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共党员应首先了解党的历史,对陈独秀冤案必须平反,还他本来面目。

我认为中共党史教学必须作以下修正:

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这一说法不确切。

李大钊、陈独秀等接受马克思主义肯定在1917年之前。中国最早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是梁启超,但他认为不适合中国。孙中山也初步了解马克思主义,在1913年他曾请求欧洲的社会党(还是社会民主党?总之是第二国际)请他们“帮助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也曾想参加国际,说他是中国劳动人民的代表。他提出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就是民主主义,他认为就是政治革命,民生主义就是社会革命,社会革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他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他提出要把“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追随孙中山先生的廖仲恺、戴季陶等也曾接触和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的。十月革命后,苏俄远东局十分重视中国、朝鲜、印度等国的革命运动,宣传思想,培养人才做了大量工作,可以说造就了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是马列主义,后来特别是斯大林的思想理论,因此造成了陈独秀、李达、陈望道等等与瞿秋白、王明、博古、李立三等人之间的差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来源有日本、苏俄、德、法等国。

二、中国共产党成立在哪一年?

1921.7是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中共成立于1920.7—8月间,是在上海环龙路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成立的,有维廷斯基(伍廷康)给共产党国际的信为证。陈独秀、李达、张国焘和伍廷康为领导,渔阳里2号是全国各地共产党人的联络中心。9月1日《新青年》成立中共党的机关刊物,俞秀松为共青团的领导人。中共成立时间与一大召开时间不能混同。

三、谁是中共创始人?

主要代表只能是陈独秀。如果扩大一点的话应包括李大钊、李达、张国焘等。毛泽东当时是地方党的负责人、领导人,是一大的积极参与者。一大会议上主要主张还是陈独秀的(虽然他没有参加,但仍被选为主要领导人、书记)其次是李达、李汉俊、张国焘,毛泽东在一大上并没有什么突出的言行。

四、说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第一次路线斗争中错误路线的头子,这完全是诬陷不实之词,源于共产国际、斯大林,是中共历史上第一大冤案。

(1)陈主张国共合作,可以组成统一战线。因为革命目标相同,反帝反封建,但国共代表的阶级不同,革命最终目标也不同,因此他主张党外合作,不赞成中共加入国民党。

(2)共产国际指示必须加入国民党,陈提出自己意见后组织上服从,中共党员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他自己仍从事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

(3)中共在国民党内要争夺领导权,陈认为这不很光明正大“如果我是国民党,也不允许这样干的”。

(4)蒋介石制造事件,陈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进行斗争,共产国际特别是斯大林认为“蒋介石代表中国革命,中共退出国民党就是不要革命”,一再右倾退让,陈只能执行命令。

(5)大革命失败(1927.4—7)斯大林要陈独秀不检查领导上的错误,只要他承担革命失败的责任,可是陈不干,第一他承认自己负有领导责任,第二说明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右倾错误(告全党同志书),第三批评左倾盲动主义。

(6)因为陈不听话,共产国际把陈开除出党,并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瞿秋白对李立三说:不能让国际负责,应维护国际威信,我们把一切责任推到陈独秀身上……

(7)说陈是第一次路线斗争中错误路线的头子的说法完全无根据的,陈既遭冤屈又要受自己党内毫无事实根据的指责。

五、关于“托陈匪徒”这顶帽子,也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1)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在共产党策略方面的争论,是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争论。斯把托打成反苏、反党、反革命、社会主义的敌人等等已属不正常,那是苏共党内的事,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不能用自己的脑子来判断是非,只能以斯的是非为是非?跟着斯瞎起哄?

(2)实践证明托许多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和理论比斯的要合乎实际,也符合陈的想法,可谓不谋而合。为什么陈就不可以同情支持托?为什么同情支持了托就是“托陈匪帮”?

(3)中国托派也是共产党内部的一个派别,他们中的许多人为革命牺牲了,也应该是人民英雄中的一部分,根本不是反革命、反动的、反社会主义的。

(4)后来苏联解体后为托洛茨基平反了,中国对托派只是从狱中放出,给予离休待遇,但未予以正式平反。

(5)陈独秀晚年对中国托派的极左政策及一些错误观点也给予反驳,脱离了托派,声称“自己不再从属于任何党派,我只对我自己负责”。

(6)王明、康生等诬蔑陈每月领取日本特务经费300元的说法,曾引起国民党统治区民主人士的怒斥,纷纷起来为陈辩诬,认为这是政治斗争中的最不要脸的手段。后来有人证明这300元是北大对教授的津贴补助。由此可见,反陈的积极分子“100%布尔什维克”的不择手段。这是共产党人的作为吗?

六、关于说“陈独秀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

(1)好的与不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是什么?

(2)陈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或叫两次革命论,其内容被毛泽东吸收,写入《新民主主义论》,关键只是在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可以由无产阶级来领导,陈当时认为应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陈认为要进行两次革命,毛认为可以一次革命分两步走、两个阶段。

(3)可是后来毛泽东自己违反《新民主主义论》,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就着手要消灭中国的资产阶级,为此宋庆龄曾说:“这不是自食其言吗?”可是毛说“不理她”,继续执行改造资产阶级的政策,一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毛死后,邓小平不得不改弦更张,到底哪个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呢?

(4)陈晚年潜心研究分析苏联社会主义制度问题,得出专制独裁制度就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民主政治。

21 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应忘记陈独秀。

以上见解是我潜心研究有关陈独秀的各种资料后得出的结论,我坚信这个结论是能站住脚的,我要为平反陈独秀冤案而奔走呼号。

试论陈独秀的武装斗争思想

安徽省蚌埠市检察院 彭劲秀

长期以来,提起陈独秀,不少人都是从政治的层面把他与敌人“退让”、“屈服”、“妥协”、“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联系起来,甚至有人污蔑、谩骂他是“间谍”、“叛徒”、“反革命”、“不可救药”,等等。即使侧重于正面评价他的人们,也多是仅仅把他定格为不懂政治、不敢斗争的“文人”、“书生”而已。在武装斗争问题上,更是批评和批判他“不敢开展武装斗争”、“否认武装斗争”、“放弃武装斗争”,等等,好象陈独秀压根儿就与军事、武装绝缘似的。

事实真是这样的吗?否!当我们跨越历史的时空,透过浓浓的迷雾,洗去泼洒在他身上厚厚的腥污,看到真实的陈独秀屹立在天地之间时,我们才愕然一惊:啊,陈独秀原来是这样的!过去对陈独秀的认识太不真实、太不全面了!对他的评价太不准确、太不公正了!长期被人们忽略、遗忘甚至歪曲、抹杀的陈独秀的武装斗争思想就是典型的一例。

十八岁纵论长江军备防务

纵观陈独秀的一生,他不是那种生性懦弱、优柔寡断、怕事怕死、不敢斗争的胆小鬼,也不是那种只会花前月下,多愁善感,浅吟低唱,不问国事的“纯文人”,而是生性刚烈,不怕事,不怕死,敢作敢为,宁断不弯,认准的路百折不回的硬汉子。这是他产生和坚持武装斗争思想的性格因素。

陈独秀是一个既有文韬又有武略的人,早在18岁时就锋芒初露,展示出他军事上的远见卓识。

1897年11月14日,德国侵略者悍然占领了山东胶州湾。接着,沙俄、美国、日本、法国等列强一轰而上,纷纷到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企图瓜分中国。年仅18岁的陈独秀痛感国难当头,热血沸腾,奋笔疾书,撰写了《扬子江筹防刍议》和《扬子江形势论略》两篇论文,还准备写一篇《湖中水师》。这些文章都是他站在军事的角度论述大江军备防务的。他在7000余字的《扬子江形势论略》中指出:“近时敌歼卧榻,谋堕神州,俄经满蒙,法伺黔贵,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覬觐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权力。……万一不测,则工商裹足,漕运税饷在在艰难,上而天府之运输,下而小民之生计,何以措之?”所以“爰采旧闻旅话及白人所论,管蠡所及,集成一篇,略述沿江形势,举办诸端,是引领于我国政府也。”

陈独秀在这篇文章中详尽地分析了长江的地势、水情,并结合历史上的战例,提出了长江军备防务的具体方案。他深刻论述了武汉三镇的战略地位,具体指出“武汉沿江均不宜设置炮台,……倚城设置炮台,一朝有战,则城市全冒敌火,今日炮弹之利固非昔比矣!”他又根据武汉东南数十里的阳逻为“东西当荆扬之要会,南北为荆豫之通津”的战略地位,建议当局在阳逻设置炮台,“再屯陆军于界埠,以防其由陆绕攻台背,则阳逻无隙可乘矣!”

令人吃惊的是,陈独秀对远在长江下游的吴淞口的地势居然也了如指掌。他胸有成竹地分析:吴淞口“另有一台在狮子林下,距吴淞十六里,去诸台太远,未能犄角,……崇(明)宝(山(川))沙无台,则他台皆成虚设”,必须“当以崇宝沙西北沙尖以为主台,……且能兼顾吴淞口以遏敌船掩入吴淞江,登岸攻我上游台背。崇宝沙为四面受敌之地,非用德国格鲁森厂所制硬铁为台不可。……此防断不可弛,果能如法布置,迨大敌当前,方有把握。”

陈独秀满怀信心地指出:“总论全江大局,若防内乱必据上游,若遇外侮必备下游,必长江之备已周,再有海卒为辅,则欧西之铁甲虽强,亦不容其越雷池一步矣!”

《扬子江形势论略》不仅是一篇文采斐然、动人心魄的极佳论说文章,而且是一份高瞻远瞩、见解独到

的军事布阵方案。读了此文，屹立在人们眼前的哪里是一个年仅18岁的文弱书生，分明是一位胸有雄兵、指挥若定的军事统帅！

为了使自己掌握更多的军事知识，将来驰骋沙场为国家和民族的解放大展身手，1902年9月，他第二次东渡日本，与潘赞化一同进成城学校（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学习陆军军事。一个对武装斗争不感兴趣的人是不会远离家国到异国他乡专门学习军事的。尽管因故第二年就回国了，但是从他曾经作过出国学习军事的选择，这已足以说明陈独秀有志于军事久矣！

“有一人不与俄死战皆非丈夫！”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4月，清政府与沙俄订约规定侵占中国东北的俄军应在1903年4月全部撤走。届时，沙俄不但违约赖着不撤，反而向清政府提出更多的无理要求，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4月，上海各界人士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北京等地的学生也纷纷集会抗议，留日学生秦毓鎰等在东京召开拒俄会议，成立拒俄义勇队，派代表回国呼吁，要求上前线抗击沙俄。

就在拒俄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陈独秀经上海回到安庆，很快与葛温仲、张伯寅等人取得联系，筹组安徽爱国会，发动拒俄运动。5月17日，陈独秀在安庆藏书楼发表爱国演说。安徽大学堂、武备学堂和桐城、怀宁等县公学的学生等约300多人前来听讲。整个书楼挤满了听众，不少人只好站在门外。

陈独秀慷慨激昂地逐条抨击俄国提出的七项无理要求，指出“举凡政权、商权、矿路权、兵权、税权，均归俄人之手，则东三省已非我有。……我政府若允此约，各国必执利益均沾之说瓜分我中国；若不允，则必与俄战。我国与俄战之仇固结不解，我国之人有一人不与俄死战皆非丈夫！”陈独秀还号召大家广泛传播沙俄侵略的消息，发扬爱国主义精神，锻炼强健的体魄，担当起历史的责任，否则，“不可以生存，况欲执干戈卫社稷乎！”

陈独秀举办的爱国演说会，是安徽省有史以来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次群众大会，在安庆地区引起强烈的反响。清廷和地方官员吓得要死，不仅封闭了藏书楼，安徽巡抚聂缉规还下令通缉他，陈独秀被迫潜至上海。

“我国之人有一人不与俄死战皆非丈夫！”这句话体现了陈独秀在安庆藏书楼演讲，其主旨就是号召民众不怕牺牲，拿起武器，抗击侵略，驱逐强虏，保卫祖国。不久，陈独秀在《哭汪希颜三首》中又壮怀激烈地写出“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的诗句。不是中华民族的热血健儿，不是敢于拼杀的英雄志士，岂能发出如此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心声！

一介书生曾经加入暗杀团体

1904年夏，东京留日学生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主持人杨笃生和成员何海樵等六人潜回北京，准备刺杀顽固派首领慈禧太后。因没有下手机会，手中的费用也已用尽，只得南下上海。何海樵介绍蔡元培加入暗杀团，蔡元培又介绍爱国女校懂得化学的教师钟宪鬯、俞子夷加入暗杀团，由他们专门制造炸药。不久，章士钊等人也成为暗杀团的成员。

此时，黄兴等人领导的华兴会正积极准备趁慈禧太后万寿节那天在长沙发动起义。杨笃生、章士钊为了配合长沙起义，于是在上海成立了有蔡元培、蔡锷等人加入的爱国协会。协会拟定了“以暴力为主，而暗杀也在讨论之列”的计划。为了加强力量，章士钊迅即写信给老友陈独秀速来上海。正在办《安徽俗话报》的陈独秀刚刚来到上海便由杨笃生监督加入爱国协会。后因华兴会起义的预谋泄露，长沙起义胎死腹中。陈独秀于1905年初返回芜湖。

7月，清政府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声称“立宪”作准备。枞阳（一说桐城）志士吴樾（字孟侠）为了戳穿清廷“立宪”的骗局，决定赴京刺杀五大臣。行前，吴樾“与赵声（伯先）、陈乾生（独秀）密计于芜湖科学图书社小楼上”。

9月25日，吴樾怀揣炸弹潜入北京正阳门站，并登上五大臣启程的专车。但因人多拥挤，车箱晃动，怀中炸弹提前爆炸，吴樾壮烈捐躯，载泽、绍英二人受伤，五大臣出洋考察之事遂告夭折。

陈独秀闻讯后立即与在保定的张啸岑联系，要他“关于吴兄一切，务速详告。”张啸岑遵照烈士壮行之

前的嘱托,将吴樾生前草拟的万言《意见书》寄给陈独秀。后来,陈独秀在《存歿六绝句》的第一首写道:“伯先京口夸醇酒,孟侠龙眠有老亲。仗剑远游五岭外,碎身直蹈虎狼秦。”深切悼念为国捐躯的烈士。

十多年后,陈独秀对自己加入暗杀团体,参与暗杀密谋的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我敢说暗杀只是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此时的陈独秀对社会革命的认识比十多年前理性、科学多了。

创立反清秘密军事团体——岳王会

陈独秀虽然反思和检讨了暗杀行为“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发动武装斗争的思想。陈独秀回芜湖后,一面继续办《安徽俗话报》,一面教书,联络革命志士,集聚革命力量,决心采用武装斗争的手段推翻清朝统治。于是,他与柏文蔚、常恒芳等人于1905年夏创立了反清秘密军事团体——岳王会。

据常恒芳说,“组织岳王会,意思是崇拜岳王精忠报国的精神。”参加岳王会的成员除安徽公学的优秀学生外,“还有武备学堂的部分军人”。岳王会总会设在芜湖,由陈独秀任会长。安庆、南京都设了岳王会分部。为了壮大实力,岳王会侧重在新军中发展成员。“新军中多数下级军佐和士兵都受了他们的影响,倾向革命”(杨士道:熊成基安庆起义的回忆)。

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去世。不久,慈禧太后去世。岳王会获知消息后,认为武装起义的时机已到,于是推举熊成基为起义总指挥。19日,熊成基率领新军马、炮两营士兵1000余人起义,与清王朝官兵浴血激战三昼夜。最后,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这毕竟是以陈独秀为会长的岳王会对清王朝发动的一次军事行动,体现了陈独秀早年就已具有的武装斗争思想。

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响应北伐军攻打上海,推翻反动军阀的统治,在上海领导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这期间陈独秀除到汉口出席十二月特别会议外,他一直坐镇上海。共产党在工人武装起义中所执行的重大政策,都是经陈独秀认可,或是由他亲自制定的。这时期上海工人斗争的得失成败、功过是非,都同他的活动密切相关,都反映了他的思想。”(任建树:《陈独秀大传》第379—380页)

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第一次发动于1926年10月23日,第二次发动于1927年2月21日。这两次武装起义都因为敌我力量悬殊、准备不足等原因,在军阀孙传芳、张宗昌的镇压下失败了。

但是,肩负着民族希望和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决心踏着烈士的血迹继续奋斗。2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果断地决定由总工会下令复工,同时做好充分准备,特别强调“扩大武装组织”,还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专门领导和指挥第三次武装起义。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汪寿华等人组成。在2月24日特别委员会的会议上,陈独秀明确地提出:“要造成工人群众夺取武装的野心”。在26日的会议上,陈独秀又提出“我们要集中口号工作,群众的夺取武装,群众的开代表会议,这二层是武器与政治同有意义的。……无论是警察的兵士的一支二支(枪)都夺取。”当时的陈独秀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置生死于度外,只要张口,不是“武装”,就是“夺取”,哪里有一丝一毫的“右倾”?

特别委员会经过认真的准备和周密的部署,仅过1个月,3月21日,中国共产党又发动了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在陈独秀为首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下,上海80万工人首先举行大罢工,接着举行武装起义,英勇无畏地向上海的直鲁联军发动进攻。血战30个小时,终于在22日晚占领上海,取得武装起义的胜利,并建立了上海市民政府。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充分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强大的革命力量和主力军作用。

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特别委员会从2月24日至3月30日,共计召开31次会议,陈独秀就参加了30次,可见他对这次武装起义何等重视。而且,每次到会他都与大家共同总结教训,分析情况,研究问题,发表意见。陈独秀亲自领导、直接指挥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凝聚着他大量的心血和丰富的智慧,体现了他武装斗争思想的坚定不移和誓死与敌人血拼到底的革命勇气。

如果说当年18岁的陈独秀发表纵论长江军事防务的论文《扬子江形势论略》是一介书生纸上谈兵的

话,那么,三十年后48岁的陈独秀亲自组织和领导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则是陈独秀武装斗争思想的具体实践,是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

最早提出军队“必须受民众和党的制裁”原则

陈独秀不仅主张在革命运动中必须积极组织民众,创建人民武装,而且特别强调:“革命是不能没有武力的,可是革命的武力至少必须与民众合作,必须受民众和党的制裁”。(《陈独秀著作选》第1145页)陈独秀在这里所说的“武力”就是指“军队”;他说“必须受民众和党的制裁”,其实质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军队必须为人民服务,必须接受党的领导。他还进一步指出:“每个有兵权的人,若不能够受民众的或党的任何制裁,都有变成军阀和形成军事独裁政治之可能。”(《陈独秀著作选》第1144页)因此,每个革命党人,都不可单看自己是一个军人,必须看自己是一个有武装的党人。虽然统帅十万大军的总司令也应如此。每个革命军人,都应尊重党的权威在军队的权威之上。”(《陈独秀著作选》第1145页)

由此可见,陈独秀不仅最早提出“革命是不能没有武力的”,而且最早提出革命的军队“必须受民众和党的制裁”这一根本原则,堪称“党指挥枪”的原则之母!

最早提出到西北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战略设想

在旧中国,城市的反动势力比农村集中、强大得多。当革命遭遇到严重挫折的时候,党向何处去?革命如何发展?这是摆在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为党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对这个关系着党和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问题是如何思考的呢?争鸣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论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贡献》一文中指出:“面对帝国主义在城市力量强大,陈独秀1927年就曾有放弃上海、广州、汉口等这些工业区域,到西北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初步思考和理论,在”五大“会议上曾受到党的批评。到西北以后怎么办?陈独秀的政治遭遇造成他思想的中断,我们无法推断陈独秀到西北去的未来。”陈独秀在党的“五大”提出到西北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设想,立即遭到诸如“逃跑主义”、“投降主义”、“机会主义”之类的批评、指责和嘲弄。根据当时的国际背景以及党内的实际情况,不管陈独秀提出的设想多么具有战略意义,多么符合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都是注定不会让他付诸实践的。因为,在当时的共产国际看来,国民党比共产党有实力、有希望得多。何况陈独秀不太听话,撤换他已成定局。在陈独秀提出到西北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战略设想之后仅两个月,便从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岗位上黯然下台,一切雄心壮志、宏图远谋只有统统付之东流!

早在党的幼年时期,陈独秀不仅最早提出“革命是不能没有武力的”,最早提出军队必须接受民众和党的监督、领导,而且最早提出到西北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战略设想,这是何等的远见卓识!后来,我们党历尽艰难险阻,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转战万里,到延安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站稳了脚跟,进而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胜利。君不见,早在十年前的1927年,陈独秀就提出了到西北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战略设想。延安地处陕西省北部,从全国的角度来说,延安就在中国的西北。历史把陈独秀的战略设想变为现实,难道这仅仅是偶然的巧合吗?!

一以贯之的武装斗争思想

陈独秀的武装斗争思想见诸于他一系列的文章和讲话之中。他早就旗帜鲜明地说过:“反对‘革命要武力’这种人不是糊涂蛋便是反革命者。任何国家任何性质的革命,都非有武力不可;因为被革命的统治阶级都有强大武力,革命的统治阶级如果没有武力,当然不会成功。尤其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众的势力还没有充分组织起来,需要军事行动更多一点。”(《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1142页)1922年9月22日,陈独秀在《向导》第2期发表的《造国论》中明确指出:“用什么方法来造国?我们的答案是组织真正的国民军。”在陈独秀的领导下,周恩来在黄埔秘密发展和组织了100多人的铁甲车队,叶剑英组建了两支亲共产党的连队(南方周末,2006年6月1日)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我党组织和发动武装斗争的骨干。

陈独秀说中国民主运动,有三种形式的可能,其中之一就是“革命的军事行动”。1926年10月2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当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拉菲斯提出下一次工人起义的指导方针主要应为“政治罢工”而不是积极主张武装斗争时,陈独秀直言不讳地批评

拉菲斯的观点,说他如果认为“上海无产阶级应当更加做好战斗准备,那么这是对的。但如果他想使无产阶级的发动不依赖军事力量,那么这是不对的。”他还进一步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这里军事因素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没有军事力量,无论在这里还是湖南都不可能发动。”

陈独秀在“五大”召开之前,在武汉听取湖北省军委书记聂荣臻汇报军事工作时明确指出:“军事因素仍旧是革命的最重要因素,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是对的,应当继续坚持下去,而且必须进一步加强军事工作。”

陈独秀在“五大”报告中回顾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时再次指出:“我们在当时就已经认识到,这条道路是革命的道路,这种策略是正确的必要的策略。过去,由于实行了这种策略,我们已经获得很多有益的成果。这方面没有任何错误。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强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

陈独秀关于“军事因素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的论断,是他武装斗争思想的集中体现,他坚持这种思想从未放弃,直至他被共产国际从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岗位上赶下台之前8天的1927年7月4日,在中共中央召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陈独秀仍“强调利用各军招兵之机会,将农民输送进去,因各军政治部都有共产党员,这样可以使农民武装化。”(任建树:《陈独秀大传》第430页)由此可见,陈独秀的革命武装斗争思想是何等的坚定不移,一以贯之!

我不否认陈独秀身上浓厚的文人和书生气质,也不否认他身上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他在自己亲手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内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包括他在武装斗争问题上的错误。但是,历史证明,陈独秀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贡献是巨大的,占主导地位的,他的缺点和在革命斗争中所犯的错误是次要的。长期以来人们对陈独秀的误读太多、太多,施之于他的伤害太深、太深,他身上负载的冤屈太重、太重。“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诚哉斯言!

身处艰难气若虹

——陈独秀晚年的理论创新

江苏南通 黎化

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陈独秀的中共政治领袖生涯正式宣告结束，当时陈49岁。自此至64岁病逝，陈独秀晚年的政治活动大体可分三个阶段，而每个阶段差不多都是五年。

第一个五年（1927·9—1932·9），寓居上海，接受托洛茨基思想并参与托派组织活动，对中共中央奉行的共产国际路线展开批判；

第二个五年（1932·10—1937·8），被捕关押于南京老虎桥监狱，与狱外托派保持联系，关注苏联国内“大清洗”，并讨论阶级专政和民主问题；

第三个五年（1937·9—1942·5），由武汉入川，移居江津鹤山坪，为“托派汉奸”案和中共发生论争，深入思考民主、独裁等问题，形成“最后的政治意见”，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和“十月革命”，并与托派组织分道扬镳。

十五年间，陈独秀历尽浮沉坎坷，尝遍酸甜苦辣。寓居上海和隐居山野的前、后两个五年里，他生活窘困、疾病缠身，有时连一日三餐也难以继。国民党政权的缉捕关押，共产党方面的批判攻击，托派朋友的争吵不休和分道扬镳，都让这位曾经引领时代、指点江山的风云人物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

但，“幸有艰难能炼骨”，对思想者而言，孤独从来就是通向深邃和广阔的天梯。困境和厄运，恰恰造就了一个更为深沉、也更为高远的陈独秀。他立马横刀，豪气若虹，不仅勇敢地分析、批判迎面而来的汹涌潮流，也无情地反思、解剖自己数十年来所信奉的思想学说，同时，还无畏地挑战、回击对于他独立思考所得结论的质疑和发难。他在痛苦中上下求索，在孤独中攀登前行……“沧溟何辽阔，龙性岂可驯”，于是，一个伟人的光辉思想令后人肃然起敬。

在《致S和H的信》中，陈独秀曾谈及自己的思想方法：他的“自来之论，喜根据历史现在之事变发展，而不喜空谈主义，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为立论之前提”，这也是他“探讨真理之总态度”。坚持独立思考，反对“迷信与成见两端”，使得他晚年的政治理念和思想体系有了多方面的重大突破。

一、布尔什维克非马克思主义，应重新估计其理论及其领袖的价值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这句描述，曾不惮重复地出现在我们的教科书里。没人怀疑过它的确切性。

列宁主义果真和马克思主义是一回事吗？或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扬”？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1919年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时，十月革命的胜利，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但他向中国人民介绍的，是晚年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说的是“社会党”，并没有提到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可见，在中国共产党先驱们的视野里，并没有把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

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当是苏联“输出革命”的结果。

岁月蹉跎，转眼百年。今天，我们回头审视列宁主义的学说，会清楚地发现，其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民主集中制的建党学说等三个组成部分，均没有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在“红旗”下生活了74年的俄罗斯人民，以全民投票公决的方式弃用了具有丰碑意义的“列宁格勒”这一城市名称，而恢复了十月革命前“彼得格勒”的旧称。这种变更，代表了一种取舍。我们只能尊重俄罗斯人们自己的选择。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惨痛，中国学者王若水、谢韬等人，也开始把马克思和列宁剥离开来，理直气壮地对列宁主义的真理性质提出了质疑。

其实，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陈独秀“根据苏俄三十多年来的经验，深思熟虑了六七年”，就提出了自己“最后的政治意见”，主张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托洛茨基都包括在内）之价值。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并非马克思主义，乃是俄国激进的小资产阶级亦即法国布朗基主义”，“布尔什维克的横暴、欺诈等罪恶”“与马恩不同”（《致XX的信》）；故而，他曾经打算，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全面否定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长期以来，一个“钦定的法则”是：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然而，陈独秀谈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断然决然地写道：“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我的根本意见》）

——西方语汇里，“独裁”与“专政”是同一个词。

在《给西流的信》中，陈独秀深沉地感慨：“科学，近代民主，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不幸十月（革命）以来轻率地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

苏联发生的事实证明，陈独秀的剖析击中了要害。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的领袖人物卢森堡，就曾对苏联体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她在《论俄国革命》一文中这样写道：

“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一批工人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讲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派系政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

她所描述的场景我们中国人并不陌生，直至今天，似乎还在不停地上演。

没有资料证明陈独秀能够听到或读到过卢森堡的宏论。两人的见解如此一致，只能解释为“英雄所见略同”。

研究陈独秀晚年的政治见解，人们普遍认为，从政治理论和思想体系上，其实质是接近了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理念，同时也衔接了二战之后为人们所高度重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今天西、北欧众多国家所信奉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他们共同的特征，就是承认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但否认“无产阶级专政”。

——仅仅从这一点上，我们就不难发现，陈独秀的完全属于自己的独立思考达到了怎样的深度！

二、独裁体制的苏联，不能视之为社会主义的国家

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前，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向中国广大民众介绍马克思主义，反复宣扬的是社会党的“阶级竞争”（并非“阶级斗争”）学说。他和李大钊都把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视为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其时，社会党的意识形态是和天演论、进化论一起，被视作“德（民主）先生、赛（科学）先生”的精华引进中国的。1920年建党时，陈独秀甚至主张党的名称就叫“中国社会党”。

1919年3月，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在列宁主持下在莫斯科成立，与第二国际倡导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唱对台戏，大力宣扬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积极推行“输出革命”。与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建党不久便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作为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也曾高举列宁主义的旗帜，同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他的同乡挚友胡适的自由主义展开激烈的论争。而当共产国际将中国视作“输出革命”的试验田、大革命失败之后又诿过于人、强加于他种种罪名之后，陈独秀的理论探索便不再以马列主义的教条为评判尺度，而以自己的独立思考为取舍判断之依据。

据和他同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的难友濮德志回忆：1935年底，陈独秀在狱中就曾谈到：“现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

始料所及的吗？”(云南《文史丛刊》1988. 3)

在《给托派国际书记局的信》里,他索性否认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人国家性质,认为:“在苏联,斯大林的个人独裁正在代替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专政。所谓‘工人国家’与苏维埃政权只有名义上的存在”;“现在的苏联,若是硬说是社会主义,便未免糟蹋了社会主义”。进而,陈独秀甚至提出:“我们必须把‘保卫苏联’这个口号代之以‘重建十月的苏联’的口号”。

“重建十月的苏联”,已是在公开号召推翻布尔什维克的苏联政权了。陈独秀的这种观点,不仅对共产国际来说是一种大逆不道,而且与托洛茨基的看法也大相径庭。四次被斯大林政权缺席判处死刑的托洛茨基,直至被克洛勃杀害之前,始终认为苏联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其本质仍是工人的”,因此“仍旧要保卫苏联”。

话虽如此说,此时的陈独秀尚没有对苏联感到完全绝望。他“公开而坚定地否定”苏联工人国家性质,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

二战初期,德、意、日法西斯在欧亚战场所向披靡,英、法等西方列强的绥靖主义政策,斯大林所表现的助纣为虐,让陈独秀对二战以及人类的前途产生了深深的忧虑。1938年8月,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1939年至1940年,苏联红军相继侵入波兰、芬兰、罗马尼亚以及波罗地海沿岸,把西部边界向前推进了三百公里,大国沙文主义的嘴脸暴露无遗。

“一个无月的夜晚”,当陈独秀得知苏联和德国按照秘密协定瓜分波兰的消息后,他满怀悲愤,奋笔疾书,写下了长诗《告少年》,把斯大林比作传说中的大厉疫鬼,“旁行越邻国,势若吞舟鲸。食人及其类,勋旧一朝烹……云雨翻覆手,信义鸿毛轻。为恶恐不足,惑众美其名。”诗句所表露的愤怒,选用词语的激烈,都达无以复加的地步。

此后几封致友人的书信里,他多次将斯大林与希特勒相提并论,认定德国的法西斯和苏联的独裁统治同属于世界上最危险的敌人,“人类若要前进,必须首先打倒这个比中世纪宗教还要黑暗的社会主义和格柏乌政治。因此,一切斗争(反帝斗争也包含在内)比起这个斗争都属于次要又次要地位”(《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541页)。

三、民主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或反动的唯一标准

1936年初,有感于苏联“肃反”的悲剧,也有感于托洛茨基筹建托派的“第四国际”,被关押在狱中的陈独秀,就曾写过一篇题为《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的政论文章(刊于《火花》1936第三卷1期),着重探讨了无产阶级应如何看待民主主义的问题:

“人们对民主主义,自古有不少的误解”,而“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

“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一种动力”,“民主主义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形成各阶段的内容与形态”;

“不应把解决民主任务及夺取政权分开”,不能认为民主主义在“取得政权后便用不着了”,而应该认识到,“采用民主主义的政纲与口号,是目的并不是手段”;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并不是抛弃民主主义,而是扩大民主主义”,如果谁不懂这一点(如斯大林),谁便是“抛弃了民主主义”。

这些话,今天听来依然振聋发聩,令人感觉十分的新鲜。以这些观点观照我国政坛的“毛泽东现象”,总能触发太多的感慨。

陈独秀生命的最后历程,隐居于江津山林,避开了中国社会的现实纷争。他用情最专、考虑最深的,当是民主问题。在《给西流的信》中,他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民主观:

一、不建立大众政权固然不能实现大众民主;但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会沦为斯大林式的个人独裁。

二、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进步的;以德国、苏联式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则是退

步。

三、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

四、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内容;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是苏俄堕落之最大的原因。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

五、民主是大众的旗帜,民主主义永远都不会过时。

六、近代民主的内容,比希腊、罗马要丰富得多,实施的范围也广大得多。

为说明自己的观点,陈独秀还精心列了一张以英、美、法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国家(甲方)和俄、德、意为代表的独裁制国家(乙方)的对照表,从五个方面作了比较:

(一)甲:选举发表竞选政纲及演说,由选民投票,可以开展讨论、争辩;

乙:苏维埃或国会选举由政府党指定,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辩。

(二)甲: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

乙: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杀人。

(三)甲:政府的反对党派公开存在;

乙:一国一党不允许别党存在。

(四)甲:思想、言论、出版相当自由;

乙: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

(五)甲: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

乙:绝对不许罢工,罢工即是犯罪。

列表之后,陈独秀言辞振振地发问:“每个康民尼斯特看了这张表,还有脸咒骂资产阶级的民主吗?宗教式的迷信时代应当早点过去,大家醒醒罢!”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表中的第三条,政府的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是陈独秀所特别看重的。他的老朋友胡适曾评判说:“从‘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的自由’这十三个字短短的一句话来看,独秀抓住了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近代民主政治与独裁制的基本区别就在这里,承认反对党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独裁制度就不容反对党派之自由。”(《陈独秀论文和书信(序)》)

无疑,陈独秀的这些观点,已经超越了同时代人们对于民主的理解和认识。“神龙见尾不见首”,于是有人认为,他已经“回到资产阶级民主的老路上去了”。显然,这是一种因难以望其项背而生发的主观推断。“五四”时期,陈独秀和胡适、李大钊等人一起,从西方请来“德”、“赛”两位先生,打开了国人的眼界;“十月革命”后,掌握了丰富的对比材料,陈独秀在充分肯定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的历史和现实作用后,对苏联的独裁现实给予了尖锐的批判和揭露,从而得出自己独立的见解:唯有民主,才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或反动的唯一标准。这一见解,不仅是对“五四”精神的继承和高扬,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由民主思想的充实与发展。从哲学角度认识,陈独秀的民主论,是一种经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后的升华。

历史的脚步走到今天,苏联及东欧解体这一无情的事实告诉我们:独裁专制的结果,将必然导致灭亡;只有民主政体,才能推动国家的进步和发展。瑞典、荷兰、挪威等西北欧国家的成功业绩就已经证明:民主社会主义代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进步方向。胡锦涛同志在法国国民议会的演讲也郑重昭告世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四、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了独裁制

斯大林攫取苏联党政大权之后,排斥异己滥杀无辜,大力推行个人崇拜。仅1936年8月至1938年3月这19个月的时间里,苏联高层就曾有过四次震动世界的大审判——

第一次,发生于1936年8月,被审判的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6人,罪名是和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结,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

第二次,发生于1937年1月,被审判的是皮达可夫等17人,罪名是和托派秘密联系,企图发动反革命

政变。

第三次,发生于1937年6月,对红军总参谋长图哈切夫斯基等83名红军高级将领、军官进行审判,指责他们和德国法西斯秘密勾结。

第四次,发生于1938年3月,审判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等人,指责他们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

据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披露:联共“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被逮捕、处决的是98人;1966名代表,被害的达1108人。在军队系统,5个元帅3个被杀,5个一级集团军司令3个被杀,10个二级集团军司令全部被杀,57个军长50个被杀,186个师长154个被杀……

大半个世纪过去,回头进行审查,人们这才发现:被斯大林杀害的些“罪犯”,差不多全是些优秀的共产党人。不幸的是,当时的“革命法庭”根本就不管什么证据,连喊一声冤枉的权利也被取消;甚至有人提出: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斯大林的崇高威望,你蒙冤受屈或者牺牲生命,都是应该而且必须的。《莫斯科青年报》的一篇文章认定:斯大林时代被迫害至死的政治犯不下于3000万人。

1940年秋,逃亡到墨西哥的“十月革命”实际领导人、“红军之父”托洛茨基被迫来的克格勃残酷杀害。得到消息,陈独秀大为震怒:“独裁,这就叫独裁!列宁逝世留下的七名政治局成员,除了他斯大林,其余全成了反革命,全都被杀害。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荒唐、更无耻的吗?”

激愤之余,陈独秀对苏联独裁体制下的大清洗、红色恐怖、个人崇拜等统治现实作了尖锐的抨击,同时,追本穷源地指责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学说,最后则归结到对苏联模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治体制的否定。

在《给西流的信》中,陈独秀指出:在苏联,“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有国有大工业、军队、警察、法院、苏维埃选举法,这些利器在手,足够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用不着拿独裁制来代替民主。”从政治理论上看,“列宁和托洛茨基都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上之真价值”,而“拿无产阶级的民主这一空洞抽象名词做武器,来打毁资产阶级的实际民主”,结果导致了今天苏联社会“流为史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制”。

究其原因,陈独秀深刻剖析:是“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制度违反了民主制的基本内容——这些制度并非创自斯大林。这种局面的形成,也并非是由于史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而在于“史大林的一切罪恶”,无不是“凭借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等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

最后,陈独秀明确的结论是:“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

煌煌谏论,有如黄钟大吕!这样的分析,出自对斯大林反感之至的陈独秀之口,更增添了一份理性的力量。回顾曾笼罩于我国以及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朝鲜、越南、红色高棉等政坛的专政烟云,能不服膺陈独秀的高瞻远瞩?!

环顾今天的中国社会,反腐反贪的浪潮浪浪相随,警钟不可谓之不响,惩处不可谓之不力,为什么依然会有那么多的政府官员飞蛾扑火般自取灭亡?也许,陈独秀早就为我们找到了答案:事同此理,并非成克杰、陈希同、陈良宇们天生就心术不正,是现行的政治体制不完善的方面催化了一批又一批贪婪的卑劣灵魂。

五、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然的过程,没有必要害怕它

虽然蜗居山林,穷困潦倒,陈独秀依然关注着中国的抗战前途,并写下了《告日本社会主义者》、《我们为什么反对法西斯特》、《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等一系列政论文章。在张国焘的建议下,蒋介石也曾指派他的得意门生胡宗南、戴笠为抗战大计前来拜访过他。

其时,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已为世所公认。如何增强持久抗战的经济实力?陈独秀对资本主义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

在《资本主义在中国》一文中,他认为:虽然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但“比起资本主义先进国来,

中国此时还是一个‘初期资本主义的国家’，就是说资本主义在中国，还大有发展余地”；“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本国的资本主义，或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

把民族利益放在党派政治纷争之上，无疑是正确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陈独秀左右开弓，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一些政治理论都作了批判。

他批评共产党，“既不懂得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又厌恶害怕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于是乃提出力争非资本主义前途的说法”；“一听到有人主张发展民族工业，便认为是做了资产阶级的俘虏，这种狂吠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乐闻的，我们不应该起来严肃加以纠正吗？”（《我们为什么而战》）

当然应当纠正，只是，真正的纠正一直拖后了40年。直到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人才放胆举起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旗帜。

陈独秀也严厉地警告国民党：“如果经过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庚子战争，以至今日敌人的飞机、大炮、坦克车，还不能唤醒我们的痴人迷梦，还死守着前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生产制、武器、道德和文化，跟着以最前进政党自命的蠢材，大反其‘唯武器论’，和大唱其‘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大吹其‘大刀挥舞起来，皇军就要发抖’的法螺；或者承袭着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半吊子的见解，反对全部欧化……中国永远还是农民无知、商人无耻、士大夫无知而又无耻的中国，永远没有什么民族野心。如果这样永远糊涂下去，我们对得起子孙吗？！”（《民族野心》）

这样的言论，既不倾向共产党，又不阿谀国民党，甚至也毫不顾忌世人的攻讦，沧海横流，显示出英雄本色，陈独秀的言行，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不隶属任何党派”的立场。

在《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一文中，他更是大声疾呼：“在科学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无论为功为罪，而毕竟是人类社会进化所必经的过程。没有它，小有产者的社会便没有发展生产力和生产集中之可能”；“我们不要学唯名主义，一听到社会主义便肃然起敬，一听到资本主义便畏之如蛇蝎，厌之如粪蛆……我们只认为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经的过程，要来的东西就让它快点来，不要害怕它。老成谋国者，要‘负责任，说老实话’，不好有丝毫虚矫之气。”

六、坚持独立思考，反对迷信与成见，一个“终身的反对派”

陈独秀一生的生命轨迹，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发生了奇特的碰撞。国民党害怕他、通缉他、囚禁他，共产党摒弃他、批判他、诋毁他，共产国际指责他、辱骂他、诬陷他，托派组织也嫉妒他、排斥他、攻击他。天性刚烈、不屈不弯的他，身受八面来风，始终高扬探索真理的风帆，颠簸在茫茫沧海……

挚友胡适，为他奉上了这样的评语：终身的反对派。

陈独秀笑纳：“实是如此”；但也为自己一辩：“非弟故意如此，乃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也。”

陈独秀一生，确实走的是一条逆反之路：反科举、反清廷、反礼教、反旧文学、反无政府主义、反国民党独裁、反共产国际的肆意干涉、反斯大林的独裁官僚体制、反中国党内的左倾盲动主义、反托洛茨基追随者们的“唯我独革”、反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一路前行，义无反顾，虽九死而无悔。这是一条上下求索、与时俱进的革命之路，这是一种无私无畏、夸父追日的豪迈追求，这更是一种在不断否定中盘旋升华的人生选择。

早在1916年9月，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就曾言简意赅地提出了评判一切社会现象的现代尺度：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这六条原则，可视之为革命的指导纲领，也可以称之为治国的根本方略。遗憾的是，九十年来风风雨雨的实践中，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很多时候都抛却了陈独秀为我们制定的这六条光辉的原则，而选择了“奴隶的、保守的、退隐的、锁国的、虚文的、想象的”国策。直面历史，我们能不感到愧对独秀先生的谆谆教导？深入剖析，我们党如今所倡导的实事求是、改革开放、与时俱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针政

策,其实也都包含在这六条原则中。

这六条原则,也可看作是陈独秀探求真理、理论创新的方针。他的独立思考,建立在“历史现在之事变发展”的基础上,不唯圣贤,不违良知,想别人之未想,说自己所想说,决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不说不错又不对的话。故而,论点既出,总是直指要害,且极富穿透力,也总是激起道道轩然大波。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瞎指挥,导致了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激愤之中,陈独秀发出惊雷般的“天问”:大革命失败了,我是有责任,可共产国际更有责任,我只是执行了他们的指示而已。要我悔过,“过”从何来?如何“悔”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让斯大林悔过?中国的事情为什么要去请教外国人,苏联的问题斯大林为什么不来请教中国人?!

在《我的根本意见》一文中,陈独秀对工人阶级的革命热情提出了与马、恩、列、托等人不同的见解:“无产阶级的群众,不会在任何时间都倾向革命,尤其是大斗争遭到严重的失败之后,或社会经济大恐慌之时”,故而,“我们必须驳斥‘人民愈穷愈革命’的胡说”。

劳动人民夺取政权,是否就一定意味着社会的进步呢?社会的进步,究竟是靠生产力的发展,还是靠阶级斗争、武装暴动?同样是在这篇文章里,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战争与革命,只有在趋向进步的国家,是生产力发达的结果,又转而造成生产力发展的原因;若是在衰退的国家,则反而使生产力更加削弱,使国民品格更加堕落——夸诞、贪污、奢侈、苟且,使政治更加黑暗——军事独裁化。”

战争的胜败由什么来决定?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唯意志论”的宣传,把帝国主义和原子弹都看作是“纸老虎”。唯陈独秀,坚持彻底唯物主义的态度,实话实说:“国际战争,只有在两方武器和军事技术相等的国家,才能把人数、民气和作战精神,看作决定胜负的因素。”(《我的根本意见》)

.....

透过这些棱角分明、色泽刺眼的观点,我们不难看出,所谓“终身的反对派”,吐露的是一腔无私无畏的浩然正气,折射的是一颗献身真理的赤子之心,体现的是一种高尚的人格魅力。

“行无愧作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陈独秀在监牢里写给大画家刘海粟的这副对联,或许,正是他晚年心灵追求的最好写照。

由于生活困窘、贫病交加,陈独秀的晚年心力憔悴,虽思想光华四射,却难以付诸笔墨详加阐述。他最后几年的著作,因精力不逮,大多为数百字或一两千字的短文,文笔也显示出一种直奔指向的匆促。此期间,其最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当数文字训诂学著作《小学识字教本》了。当他注释到下篇“抛”字时,便撒手人寰,终成绝笔,令人为之扼腕叹息。

六十余年过去,沧海变桑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胡锦涛总书记在2006年元旦讲话里提出:要“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不断开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新局面”。创新首先是理论创新,“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方面的创新”。在这一重塑我们民族灵魂的伟大进程中,毫无疑问,我们尤为需要陈独秀这样的探索精神和做人勇气。

注释:本文涉及的陈独秀文章篇目,除标明者外,余皆见于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独秀著作选》。

浅谈陈独秀、托洛茨基与中国革命

温州 陈良初

原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曾彦修先生在《我看陈独秀》一文中对陈独秀的评价：“陈独秀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稀有伟人之一，也是三千年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大伟人之一。”不管怎样说，陈独秀作为历史伟人，总不为过吧！毛泽东也曾说过：陈独秀“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我们是他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进入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正是以他为主缔造了中国共产党，所以1921年7月中共第一届代表大会在他缺席的情况还被选为中共书记（或称总书记、委员长），其后又被选为中共第二至第五届的总书记。也是他领导了1925年—1927年的大革命。

然而，在1922年7月16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第二届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确认中共是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加入共产国际后，必须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陈独秀作为中共主要领导人，亦必须尊重、服从党的纪律，“下级服从上级”是党章所规定的，作为领导人就应带头遵守，是顺理成章的。因此，在整个大革命过程，中共所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皆遵循共产国际的路线和指示、指令。陈独秀对革命事业的一些重大问题，虽有他自己的意见，囿于党的纪律的约束，不得不服从共产国际或斯大林的指示而执行。这一历史事实是无庸置疑的。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了革命，难以数计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死于屠刀之下，落入监狱之中。革命临到紧急关头，陈独秀于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召开中共“五大”。会议针对当时的形势及今后任务进行讨论。会议上陈独秀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这长达六小时总结性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军事及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代表们依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精神，结合陈独秀报告内容进行讨论。最后，大会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

继中共“五大”之后，共产国际于1927年5月18—30日召开第八次执委会议，通过了《中国问题的决议》，给中共下达五点指示，史称“五月紧急指示”。中共中央于6月1日收到这个指示。陈独秀根据当时的形势，认为“五月指示”难以执行。谭平山、张国焘等亦认为党未必能够贯彻执行，因而认为“五月指示”是不能接受的，甚至鲍罗廷也抱怨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形势。陈独秀处于两难境地。如果执行“五月指示”，武汉国民政府的成员，尤其是掌握军权的军阀，肯定会起而对抗，中共力量又会受到一次打击，后果是严重的；如果不执行“五月指示”，违反纪律也同样犯错误。他左右为难，不得已于1927年7月12日辞去总书记职务，“不再视事，保持着沉默”，但这种态度不合于陈独秀的性格。他从千头万绪的事件中，经深思熟虑总结出一个主要的教训：自中共“二大”以来，中共作为国际的支部其高层领导者在整个革命过程，始终贯彻共产国际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中国革命必须走“国共合作”这条路。陈独秀等中央领导人曾一致反对这条路线，与国际代表马林争论过。终于马林以党的纪律迫使中共执行。陈独秀等人只得退让，同意以中共党员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从而使中共在革命运动中失去独立自主的作用，更不可能掌握革命的领导权。俗话说“一失足而成千古恨”，这就是革命失败的根源。

陈独秀辞去总书记职务之后，形势发展果然不出所料。当鲁易将“五月紧急指示”文件给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看后，汪大吃一惊，立即着手策划与南京蒋介石合作，实施“宁汉合流”的阴谋，共同反共。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的真面目暴露了，他赤裸裸地进行“清党”，在两湖地带刚刚兴起的工农运动受到打击。

中共只得将主要力量结集于江西南昌策划反击。8月1日,名闻中外的“南昌起义”,拉开了武装斗争的序幕。

“南昌起义”失败后,形势表明共产国际的估计错了。为维护威望,共产国际采取以下相应的措施:将伍廷康、鲁易免职,命鲍罗廷返回莫斯科,同时任命罗明纳兹来华接替伍廷康的职务。罗明纳兹上任后,即约瞿秋白于庐山密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瞿秋白主持会议。在会上,“秋白手里拿了一叠稿子,读起来。那是告全党党员书,写得很长。内容是批评过去的错误,指示今后的方向。在批评部分没有点名,但一听就知道是批评陈独秀的。”“这个文件显然是俄国人用俄文起草而由瞿秋白译成汉文的。”(引自《郑超麟回忆录》)当时陈独秀仍在武汉,“八七会议”没有通知他参加,显然是错误的,其目的不言自明,就是不让陈独秀有申辩的机会,这就可让他们任意在会上散布“大革命失败是由中共中央的右倾机会主义造成”的舆论,只要舆论形成气候,共产国际就可推卸由它导致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了。这是多么阴险的一步呀!陈独秀被处于那种境况,只得偕同秘书黄玠然离开汉口,乘船返回上海。

舆论加权力就是结论:大革命由于中共中央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而失败的。“罪归元帅”嘛!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就戴在了陈独秀头上。“强权胜于公理”,陈独秀成为替罪羊。共产国际、斯大林则显得是完全正确的、英明的,责任全在陈独秀身上。这种观念深深烙印在中国人的头脑中达半个多世纪,至今可能还有人仍保持着。

再说陈独秀返回上海后,他仍关心时局的发展。本文已提到有人说他“不再视事,保持着沉默”是不合实际的。《郑超麟回忆录》中又是怎样写的:“瞿秋白从武汉回上海后第一次去访问陈独秀,就请陈独秀在即将出版的中央机关报上写文章,陈独秀没有拒绝。以后我收到了他写的‘寸铁’,每期好多条,一连好多期都交了稿,我全部采用。”在《布尔塞维克》上发表,“他署名‘撒翁’,我猜想这个署名表示他撒手不再领导中国共产党之意。”可见陈独秀在那时并没有“保持着沉默”,他仍给党中央机关报写文章,这表明了他的思想始终在关心国家大事和革命事业。

近年来,专家、学者们依据各方面的资料,经缜密的深层次的探讨,实事求是地给陈独秀作出新的评价。在2002年9月新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这本权威性的党史,已将陈独秀头上所戴的所有帽子,除了保留“右倾机会主义”外都已摘掉了。最近笔者看到2004年6月19日江苏省陈独秀研究网发播一篇由南京大学奚金芳教授作的《江苏省陈独秀研究会筹委会座谈纪要》,内云:江苏省历史学会陈独秀研究会筹备会委员学习胡锦涛总书记指示,现摘录其文章(大意)如下: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办的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胡总书记高度评价任弼时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丰功伟绩,并说他同错误领导的斗争,亦同时与‘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作坚决斗争的新提法,胡总书记这一新的提法,参与学习的委员认为它具有重大意义:

(1)它改变了自1927年八七会议以来77年中长期对陈独秀冠以不实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政治帽子’;

(2)把犯错误的领导决策层——共产国际列于陈独秀的前头;

(3)把陈独秀作为犯错误的前中共领导人看待,而不是以往那种扣上九顶政治帽子,横加罪状。

大家一致认为,总书记的讲话为新世纪历史学研究,尤其是中共党史求真求实的科学研究创造了条件,……具有很大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

笔者的领会是:“右倾错误”是属于思想意识问题,而“右倾机会主义”是路线的错误,涉及方针、政策等方面。胡总书记的指示,进一步体会则意味着戴在陈独秀头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论断亦应作修改,他的政治历史地位就可以盖棺论定了。

现今,史学界虽对陈独秀的历史地位已作出正面的肯定,可从学术思想的研究角度来看,笔者认为有必要对陈独秀与托派之间的问题作深入地探索,才能对陈独秀的思想演变作出正确的评论。曾彦修老先生在文章中说“至于陈独秀后来去加入中国的托派组织那当然是一个大错误,……这当然不是说他们是‘反革命’。陈独秀去和他们搞在一起,是比较难于理解的……”曾老说“难于理解”是出于内心真实的话,恕笔

者冒昧地说中国至今已出版托洛茨基著作真是寥若晨星,有谁阅读过托氏那150卷之巨的著作,哪能“理解”呢。可笔者胆敢“班门弄斧”,据仅有的资料 and 知识来谈谈个人的看法。

陈独秀的性格是倔强的,有独立人格的,他对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判断力。在大革命失败之后,陈独秀的心态是沉重的,尤其在共产国际给他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后,他的心情更不能平静。请看陈独秀1930年2月17日《答共产国际书》中写道:“自1927年中国遭受了悲惨的可耻的失败后,我因亲身负过重要的责任,一时实感觉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省期间。我虽未能及时彻底认清这个失败的教训而找出新的出路,但我本着我亲历的经验,深深知道这种失败是过去整个政治路线之必然应有的结果。”书中又说:“因为你们的蒙蔽与封锁,直到半年前我们才得到托洛茨基同志关于中国问题及一些苏联问题的文件,从此以后,我们才彻底地系统地了解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是真正的根源所在。”(转引自《郑超麟回忆录》第281页)这段话是陈独秀坦诚的表白,在他看到托氏的文件之前,他是处于个人反省和对革命前途的迷茫之中,在他知道托氏文件后,“才彻底地系统地了解中国革命中所犯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之真正的根源所在。”于是他才毅然决然地加入了托派组织。

可是陈独秀不是随随便便地而是十分慎重的认真的加入托派的。郑老回忆录也有介绍:当尹宽拿油印的托派文件给彭述之、汪泽楷、刘伯庄等人看,陈独秀也在彭、汪家中看到托派文件的。“陈独秀看了托派文件,每次都提出不同的意见,然后他们同他辩论,但他下次来时,就放弃他上次的不同意见,而以他们所说的意见为基础而提出进一步的不同意见了。……如此类推。说服他时,尹宽用力最多。”这情况足以说明陈独秀在参加托派前的态度是严肃的;在理论上经过研讨的。至于托洛茨基对中国问题的意见是否正确?陈氏加入托派是否是一大错误,是否是误入歧途?是属于政治理论问题,作者不敢妄加评述。

若要评论上列所提问题,先得了解托洛茨基的真实面貌。为此,笔者摘引马长虹先生撰写的《中共对托洛茨基评价的转变》一文的内容,供读者参考。

马先生的文章开门见山地写道:“每当提托洛茨基或以他为首的‘托派’,人们往往是谈虎色变。盖因自上世纪20年代末以来的近80年时间里,在整整几代人心目中,托洛茨基或‘托派’都是反动或反革命的代名词”。(岂只是叫“代名词”,在1952年12月22日,中共发起一场“肃托”运动,仅只一天,散布于全国各地的托派分子(包括外围读书会成员及其同情者)全部被公安机关逮捕,投入牢狱。搞得人心惶惶,媒体宣传“托派分子”是“反革命”。故而在人们的心目中就产生“谈虎色变”的恐惧心理。——笔者注)“这并不奇怪,因为早在中共1929年10月的《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中,就有托洛茨基反对‘积极地在政治上、组织上,各方面来攻击党,破坏党’的定性,在毛泽东的著名文章《论持久战》中,甚至有‘托派汉奸’这样的字眼,而《野百合花》的作者王实味也是戴着‘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罪名在1947年被处决的。”更不奇怪,中共开始“反托”与斯大林的“大清洗”在同一时期,在“1929年1月20日,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国境’。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刺客用冰镐暗杀。”从两个事件的时间只隔了七个月,可见中共的“反托”是斯大林的“大清洗”在中国的翻版,决不是巧合。

马先生在文中又写道:“由于中国舆论宣传的特点,托洛茨基渐渐淡出了普通大众视野。几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几乎已经忘记了托洛茨基。”近二十年来,我国掀起了研究陈独秀思想的热潮,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研究陈独秀与托洛茨基这两个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人物也有了新的评论。对陈独秀的研究,专家、学者们已基本上取得共识。独秀园的建设 and 这次扩建,充分显示出人们对中国革命的先驱者陈独秀老先生的敬仰和怀念的心愿。至于对托洛茨基,人们仍缺乏较全面的正确的认识。为此,笔者觉得应该读一读马长虹先生文章。

马先生的文章中说:“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和斯大林以后的苏联以及后来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托洛茨基一直被当成反革命来丑化。”“人们知道十月革命,却不知道正是托洛茨基在列宁不在的情况下——一手领导了十月革命;人们知道苏联红军,却不知道托洛茨基正是红军的缔造者,并率领它打败了英法帝国主义干涉者和白军,捍卫了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人们知道1924年的新经济政策,却不知道托洛茨基正是新经济政策最早的提出人;人们知道斯大林是列宁的继任者,却不知道托洛茨基在苏维埃俄国的地位原本仅次于列宁,他

的肖像与列宁的肖像并排悬挂；人们知道苏联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性，却不知道早在1930—1933年间，托洛茨基就在竭力争取德国工人阶级组织联合阵线，反对法西斯势力抬头，防止希特勒上台；人们知道新版《列宁全集》中文版共有60卷，却不知道《托洛茨基全集》竟达150卷之巨，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艺术、教育等等几乎一切领域……”从而可见托洛茨基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思想家，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胸怀大志且有预见性的政治家，是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革命家，有英明谋略的军事家，是深谙社会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家，还是一位天才的文学艺术家……总之他是历史上的伟大人物。革命导师“列宁曾不止一次向党和共产国际表明，他认为托洛茨基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者。列宁1922年12月23日至25日日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认为托洛茨基是‘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凭着他在苏共党内的地位和威望，只有他有资格有胆识于1927年5月7日发表严厉批判斯大林主义者对中国革命所犯下错误的机会主义的文章，他反对共产国际强令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的路线。这个原则性问题，托洛茨基的观点与陈独秀所反思的革命失败根源是不谋而合的。从这个观点来看，陈独秀之所以会加入托派，不致于是“误入歧途”吧！说他加入托派是一大错误，未免带有点“胜败论英雄”的意味。

托洛茨基是国际共运史上伟大的人物，这从马长虹先生文章中已有论述，毋需赘言了。笔者下文试谈托派的情况。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官僚集团起始于“1921年秋以后，列宁的健康每况愈下，后又突发严重中风，右肢瘫痪，口舌失灵，有时甚至不能说话。1922年12月，列宁抱病重新审查了与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冲突的前因后果，终于明白了斯大林作为民族人民委员在格鲁吉亚的粗暴举动。”列宁虽在重病之中，坚持着进行干预，严厉地批判斯大林等人的民族主义的错误。托洛茨基完全支持列宁的观点，除此之外，“在‘对外贸易垄断权’，‘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优先地位’，‘共产国际统一战线’，‘对工农检查院的批评’，‘党的官僚主义’等等一系列国内外重大问题上，列宁和托洛茨基也都是团结一致甚至是紧密合作的。”托洛茨基不负列宁的嘱托，坚决维护列宁的观点、立场，在党内展开对斯大林派的批评。于是苏共党内形成两派；以斯大林为首的官僚当权派与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称为“托派”）。

在列宁病逝后，托洛茨基为“经济建设道路、党内民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问题”等问题，遵循马列主义原则与斯大林派进行争论。在这场斗争中，斯大林利用手中掌握的无限权力，结派营私，以行政手段来打击托洛茨基，“最终于1926年褫夺了托洛茨基政治局委员的职位，并将其逐出中央委员会”。又于1927年11月14日以“挑起反革命示威游行和实际上的煽动叛乱”的罪名将其开除出党，流放于阿拉木图。如此，斯大林慑于托洛茨基的威望，害怕他的统治仍受威慑。于1929年1月20日将托洛茨基驱逐出苏联国境。

托洛茨基在格别乌的严密监视下被押送到土耳其君士坦丁堡，后又被迁送到王子群岛避难。他和夫人娜塔丽亚在王子群岛生活了四年，当然他是不能忍受这种与世隔绝的状况，经他积极地争取和各方人士的支持，他曾在法国、挪威避难。1936年8月莫斯科举行第一次公审以季诺维也夫、卡米涅夫为首的16名被告。当托洛茨基获悉这一情况，立即撰文揭露莫斯科的公审是一大骗局。这对斯大林来讲是不能容忍的。挪威政府在莫斯科的压力之下，莫奈何于1936年12月19日安排将托氏夫妇送往墨西哥。

1937年1月9日，托氏夫妇抵达墨西哥。当时墨西哥政府为他们提供避难权，并受到政府的保护，他的处境较前大有改善，能获得通信、写文章、作演讲的自由，并可以与各国左翼反对派成员的联系。托洛茨基的这些活动，斯大林官僚集团是决不容忍的，非要置他于死地不可，特指派格别乌潜入墨西哥进行暗杀活动。阴谋终于得逞，在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住宅的书房内，毫无戒备的状况下，被格别乌用冰镐击中头部，经抢救无效而亡。

托洛茨基自1929年开始过着流亡的生涯，可他仍然关注着世界形势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动态，关注着苏维埃祖国的前途。他虽憎恨斯大林独裁专制的统治；践踏民主，破坏法制。在他的观念里还是认为苏联是一个“工人的国家”，这个国家“虽然具有工人阶级的性质，但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它是处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是一种过渡性的社会。”托洛茨基提出的达到社会主义的标志：“在经济方面，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方面，是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消灭了国家。”依据托洛

茨基的观点,托派则认为:“由于过渡性社会内部新的阶级分化,分化出新的官僚特权阶层,导致这些国家(指的凡是斯大林主义者领导的国家——笔者注)在政治上发生蜕化变质。”(注)因而,托派认为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是一个“蜕化了的工人国家”,也有称之为“堕落了了的工人国家”。“蜕化了”也好,“堕落了”也罢,托洛茨基说:“在经济落后、战争破坏和由此而产生的物质资料奇缺的情况下,党和国家干部必然要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为个人谋利益,扩大社会不平等,逐步蜕变为享有各种特权的官僚阶层,而为了保护这个阶层的利益,他们自然要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力,剥夺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主权利,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成为官僚阶层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国家,这样便产生了官僚主义国家的两个基本特征,即经济上的不平等和政治上的不民主。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上层建筑,首先是政权的性质便发生了变化,由无产阶级的权力机关变成官僚机构和官僚主义政权。”(注)斯大林统治时代的苏联的实际情况完全符合托洛茨基的论述,它的主要标志就是“官僚特权阶层”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这种统治方式终于形成了“斯大林模式”。陈独秀和中国托派坚信托洛茨基的论述的预见性、正确性。为了保护十月革命所取得的成果,为了维护共产主义走向列宁的原则和实践上来,与斯大林主义者作不调和的斗争,在苏联,必须唤醒工农群众起来进行一场政治革命,推翻已经变质的官僚统治,建立起真正的工人国家,实现名符其实的苏维埃民主政制。在这方面,陈独秀所领导的中国托派与“第四国际”的观点和态度是一致的。如今,原苏联是解体了,以斯大林模式的政制的东欧国家都转轨了,之所以这些国家会发生剧变皆源出于它们施行的制度所造成的必然后果,亦可以表明托洛茨基早已预测到的现实。但还必须明确:苏东剧变只能说明是斯大林主义或“斯大林模式”的失败,决不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

反思历史对学术研究是有裨益的。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所有斯大林主义者领导的国家都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作为范本,无论在教科书中或舆论宣传上必须要以“教程”为准则;斯大林是“列宁忠实的学生,是列宁主义的执行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英明的导师和领袖,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击败各个反对派,建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凡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都以“斯大林模式”来统治、建设国家。在这种思想的教育下,上述的思想观念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脑海里,尤其在有些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里仍然固守着旧的观念难以抹去。虽然,他们也清醒地看到苏东剧变的主要原因是斯大林统治制度的错误所产生的必然后果,可他们认为斯大林施行的制度来自列宁在十月革命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于是他们又寻根刨底,引经据典,列宁的思想出自马克思主义。说马克思在150年前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过时,所以马列主义要进行修正,要重新阐释。因而,他们论断:斯大林独裁专制统治,其思想根源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所产生的,苏东剧变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幻想,是失败了。有的学者认为陈独秀晚年也是这样认识的,所以陈独秀在晚年才提出民主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

对于上述的思想意识、理论逻辑是否正确,作为学术问题应予以重视和研讨。限于水平笔者尚在探研之中,在此文还不能有所评述。不过最近笔者读到两篇文章关于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很有研究价值,现摘录供参考,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一、黄学诗先生撰写的《谈对几段外文的翻译与理解》一文,发表于江苏省历史学会陈独秀研究分会会刊《陈独秀研究》2006年第三期上,摘抄于下:

1、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笔者解注)。这个专政dictatorship来源于dictator,意思是独断、独裁,一人说了算,不与人分享的意思,马克思讲阶级斗争的信中用了这个词。阶级斗争在今天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是为达到彻底消灭一切阶级差别的过渡。这里说的专政,讲的是无产阶级将自己作主,一个阶级说了算,不与其他阶级分离权力,后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用过无产阶级专政,作过渡时期来达到消灭了一切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主义讲的dictatorship并没有中文专政一词中含有的武力镇压,更没有踩上一只脚让你永远不得翻身,可以任意地强求“阶级敌人”干又脏又累的活的含义。

由中文的“专政”来理解“无产阶级专政”并再加以发挥变味了。从而也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意。

2、“《北京日报》3月27日刊登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教授、北京大学博导许耀桐的文章说,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要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例如,在我国一些地方,民主政治制度并不健全,民主集中制形同虚设,变成了一把手说了算,搞家长制、一言堂,一把手成了特殊的党员,不要监督和制约。”(抄自2007年3月30日《报刊文摘》)。

笔者从黄学诗先生对“无产阶级专政”一词的“翻译与理解”的体会,再回顾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确实已分化出新的官僚特权阶层,那么,从实事求是进行学术研究的要求来看,人们的老观念是需要转变。陈独秀曾说:“世界上出现了一些斯大林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若要硬说它是社会主义国家,便未免糟塌了社会主义。”许耀桐先生也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因而,笔者认为,如果把苏联作为是社会主义国家看待,由于它的解体就评论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这种观念是应该深思的。

注释:

引自黄文扬主编《国内外民主理论要览》第353—35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9月第一版。

陈独秀出狱后就抗战等三问题 与托派同志们的争论

上海 曹家骢 叶春华

1937年抗战开始,陈独秀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认识到这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发展的新阶段,主动调整革命策略,把从前倒蒋抗日的政策改为拥蒋抗日。出狱后,他与托派同志们就这个问题的意见发生分歧,形成争论。世界大战发生后,他又根据形势的新发展,提出对世界大战的新态度。1939年斯大林与希特勒勾结,订立秘密协定瓜分波兰后,陈独秀再次根据新形势对苏联的国家性质进行界定。这三个问题又与托派同志们发生了争论。随着时间的延长,争论的内容逐渐复杂,以至有的同志要“开除”陈的党籍,有的同志则反对开除他,而他在武汉时却公开宣称自己已不是托派,他的政治意见只代表他自己。

他们双方就这三个问题争论的内容与实质到底是什么?陈独秀最后究竟还是不是托派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现就我们的所知,作一些阐述。

现先就这三个争论的问题作一简要的说明。

关于抗日战争问题。

还在1931年9.18事件发生,日本帝国主义用武力侵占我国的东北三省,蒋介石奉行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宗旨,对日帝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而是集中兵力进行“剿共”。这时期,陈独秀在领导托派进行革命活动时,采取抗日倒蒋的政策。1937年7.7事件发生,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不得不停止“剿共”而进行抗日。陈独秀认为这是中国政治形势的一大转变,蒋介石能够率军抗日,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发展的新阶段。这个抗日是为了民族独立,有进步意义,虽然蒋介石的抗日是被动的、片面的。于是他在革命策略上主动进行调整,以适应新时期新环境的需要。在不改变托派革命总战略——最终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统治——的原则下,从以前抗日倒蒋的政策主动改变为拥蒋抗日的政策。因此,他在离开国民党南京监狱去武汉后,就到处发表演说或文章,说明这次抗日的进步意义,号召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抗日。他的主张在各阶层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中取得很大的反响。

与陈独秀这一抗日主张相对立的有彭述之与刘嘉良,王凡西,郑超麟等人。

彭述之与刘嘉良也认为这次抗日有进步意义,但他们认为抗日必须同时要打倒蒋介石国民党。彭述之从南京监狱出来后回到上海,就推行他的这一主张。到后来,才取消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刘嘉良的主张与彭相同。

郑超麟在抗战一开始,当他还在南京国民党监狱时,从世界革命的观点出发,竟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没有进步意义,形成了他的“革命的失败主义”的主张。所谓“革命的失败主义”就是主张在抗日过程中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国民党的政权,随后用革命人民的力量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的这一主张当他从国民党监狱出来,经陈独秀介绍到安徽绩溪安身时,还只是他个人的思想。在前世纪40年代初,他从绩溪来上海后,才在托派组织中提了出来。作为托派组织,当时并没有采纳他的主张成为整个组织的主张,它仍只是郑个人的主张。

王凡西在抗战之初,也认为抗战有进步意义。但他这时的主张基本上与彭述之等人相一致。因而他在武汉遇到陈独秀时,就对陈的开头几篇演讲不能完全同意,对陈演讲的内容没有表达托派自己的原来主张,即没有批判国民党的内容不以为然。但在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认为中国已经卷入世界大战,抗战的性质已不单纯是反对日帝而是站在英美法的阵营反对德意日的斗争,中国已经丧失了为民族独立而战的立场,进入了为帝国主义集团争夺殖民地利益而战的范围了。因而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已丧失了进步意义,开始转变为资本主义世界二大集团之间的斗争。这就是他说的“抗日变质论”。从此出发,

他也主张对中国的抗战采取“革命的失败主义”的立场,与郑超麟的主张一致起来。

关于世界大战问题

陈独秀当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意日为一方的力量与英美法为另一方的力量的斗争。双方都是帝国主义集团为争夺商品市场、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陈认为苏联的实力还不足以强大到成为这次大战的主要一方,因而还没有给予必要的充分的分析。

对于德意法西斯,陈认为是金融寡头结合流氓无产阶级及右派急进的小资产阶级的独裁政制,而英美法则是金融寡头结合中产阶级的民主政制。在没有世界革命爆发的条件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第四国际托派应支持英美法一方而反对德意日一方。因为英美法如得胜,除在其本国保持资产阶级民主制之外,在其占领区也会推行它们在本国所执行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这样,对于托派国际不论在战争过程中或战后都有资产阶级民主制可以利用,使自己的组织能够开展活动并得到壮大。反之,如果德意日得胜,当法西斯独裁的制度伸张到英法等战败国之后,托派国际就会被取缔,无法开展活动,无法生存。

在这个问题上,不论彭述之、郑超麟或王凡西,他们都一致不同意陈的意见。他们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必定会产生世界革命,总会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因而他们主张托派国际在交战的双方都应当采取失败主义,即各国工人阶级在本国都应反对统治阶级进行的战争,用自己的革命行动结束本国资产阶级的统治,从而用革命的精神影响交战国工人阶级也起来革命,最后结束这场掠夺的战争,使世界革命得以实现。

关于后期苏联的政权性质问题

陈独秀认为后期苏联,即斯大林时期的国家乃是列强政权,并非“堕落的工人国家”的性质。陈所以会有这样的看法,是因为在抗日问题,他看到苏联并没有真心援助中国抗日,而是借援助中国抗日的名义为自己谋利益;在欧洲,苏联伙同希特勒瓜分波兰,还掠夺芬兰的土地;在国内,正步步加强格别乌的统治。

与陈独秀持不同观点的人都认为苏联是“堕落的工人国家”。这是托洛茨基下的定论。因为托洛茨基认为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的国有财产制度还没有被废除,这是十月革命的遗产。不好的只是斯大林官僚集团的领导,只要这个领导集团一旦被改变过来,恢复列宁时代的民主领导,它仍是十月革命后的工人国家,社会主义国家。

正确在哪边?

针对上述有关的三方面的问题,结合事后的社会实践,我们毋庸置疑地认为正确的是在陈独秀的一边。

抗日战争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压迫下,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是当前首要的矛盾,中国当前的任务是武装抗击日帝的侵略,争取民族独立。中国内部的阶级矛盾在新的环境下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无产阶级不仅受到国内资产阶级的压迫,更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残酷压迫。中国的资产阶级与全国各阶层人民这时也都受到日帝的直接压迫。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有敏锐政治观察力与丰富政治经验的陈独秀就及时调整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主张积极地参加这次抗日战争。拥蒋抗日是有现实意义,但其更深远的意义是中国托派要利用这次抗日战争,以扩大自己的组织,以利将来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因而他在武汉、在重庆等地发表演说与文章,除了说明这次抗战的进步意义,号召各阶层人民拥蒋抗日之外,更积极地发表他自己对于抗战的方略,如提出全民抗战,积极抗战;在野党及一般人民都应有政治的自由,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没收敌伪及贪官污吏的财产,以济伤兵及难民之用;解除人民痛苦;减少工人工作时间,解决农民耕地问题;要准备持久战,也须开展敌后的游击战;广泛地武装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工人农民;恢复由各业群众选举自己的工会,学生会,商民协会,农民协会;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以增强抗战的实力,以增加工人阶级力量的团聚;要在国内召开国民会议,推行民主政治;要争取日本社会主义力量与日本人民的支援等等。他的这一整套方略,既有利于抗战,也有利于托派活动的开展。

但与陈独秀持不同政见的人们,对于抗战虽然也承认在客观上有进步意义,却不知道首先应当结合实

际调整自己的斗争策略,而仍旧抱着 9.18 后的主张,喊着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就郑超麟所主张的“革命的失败主义”而言,它本身更是忽略中国民族需独立的要求。这样一来,他们的一套政治主张就与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势不相符合,就不能与广大群众见面,更谈不上在群众中生根、发芽与结果。就多数派而言,他们在日帝占领下的上海,在一丝绸厂里曾有过活动与发展,也搞过罢工斗争,结果由于力量薄弱,厂里的组织遭破坏,骨干分子被逮捕,进而还影响到领导机关的安全,不得不采取应变措施。在广东,也有人搞了一支小型的抗日武装,只因其政治主张与当时的客观环境不相适应,这支队伍很快也就消失掉,其领导人也在这过程中丧生。在温州,托派组织曾有一定的发展,其成员总共发展到 30 多人,在当地的针织业中还取得了领导地位。兹因保密工作做得不够,其组织也遭到破坏,以及其他等等。整体说来,当时的组织只能秘密地出版少量的油印刊物,其力量也就不能影响当时的政局。

当时托派中的一些人,总认为自己的政治意见正确,认为陈独秀的政见已经背离托派的传统理论,准备对陈采取组织措施,加以制裁。但碍于陈的历史地位与威望,又不敢贸然行动,遂写信给托洛茨基说明陈的“错误”,并要开除陈的党籍。

托洛茨基很尊重陈独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与品质,不肯轻易相信一面之辞,就带信给托派中央,转告陈要他离开中国到美国去进行抗日宣传。这样既可以取得宣传抗日的好效果,也可以解除托派中央与陈之间的矛盾。

托派中央决定由陈其昌带着托的口信去见陈独秀。陈其昌从上海出发,经过香港,辗转到了四川江津见到了陈独秀。陈知道陈其昌的来意后,除表示作为中国人,他要在中国宣传抗日,明确拒绝托洛茨基的邀请外,还写了一信给托洛茨基。信中,陈以托派成员的身份,向托洛茨基汇报中国抗战中工人阶级的现状与中国托派组织的情况,也讲了自己的主张。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现状,陈说:“中国初生的工人阶级,经过上次革命之失败和中共盲动政策所招致的屠杀,已大大地削弱了,再加上此次战争中全国工厂及运输机关大部被毁灭,中国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在物质上,在精神上,都退到三四十年以前的状况。”讲到托派组织时,陈说:“我们在上海、香港二处有组织的人共计不满五十,其余全国各地游离分子大约在百人以上。”接着,陈独秀即批判托派集团极左派的各种错误政治倾向。在批判之前,陈说:“我们当然未曾幻想在此次战争中有很大的发展,然如果政策比较的正确些,也不致像现在这样衰萎。”在讲到自己的政治主张时,陈说:“我们不应该幻想着把工作推迟到收复失地以后再做;应该立即准备在日本继续占领的环境中开始在当地狭小范围内从头做起。我们的发展须等待一个时期。战后工业开始恢复(无论在外国的或本国的统治之下)才是我们工作较顺利之时。”“只有组织上获得相当数量的工人群众,政治宣传行动上无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之于民主民族斗争的小集团,才能够得上做重新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在组织上努力接近工人,加上民主民族斗争的宣传,这种初步而基本的工作,在日本占领区或国民党统治区域,都同样应该是应该采取的方针;所不同者,在日本占领区域更加秘密而已。现时远离群众,远离现实斗争的极左派,如果不能深刻的觉悟过去轻视民族民主斗争的错误,大大的改变态度,如果不是每个人都低下头来在上述工作方针之下刻苦工作,如果仍旧说大话,摆领导者的大架子,组织空洞的领导机关,妄想依靠第四国际支部的名义闭起门来自立为王,那么除了使第四国际的威望在中国丧失外,别的将无所成就。”(《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第 530、532 页)

托洛茨基接读陈独秀的来信后,就写信给上海的托派中央,说陈的意见“本质上是正确的”。并希望托派中央“要在这基础上能够经常同他合作”。托洛茨基之所以如此表态,是因为陈独秀在信中所表明的政治主张与他本人的主张基本上是一致的。1937 年 7 月 30 日,托洛茨基与一位新闻记者谈话,谈到中国与日本的战争时,他说:“在认真的社会改良之条件下,中国政府可以在群众中唤起深刻的同情,并动员群众去作抵抗日本侵略的斗争。过去的经验,不允许我们对蒋介石将军的社会纲领抱有幻想。但如世界上果有正义的战争的话,那么,这一次中国人民反对其侵略者的战争,正是这种战争。一切中国工人的组织,一切进步的势力,不论它们对于蒋介石政府的态度如何,应当于不放弃自己的政纲和政治的独立条件下,在这解放战争中实践它们的义务到底。”(《中国革命问题》陈研会翻印版 299 页)1937 年 9 月 29 日,在给里维拉的信

中,托洛茨基指出中国托派将会受到与国民党结盟的苏联格别乌的谩骂时说:“我们的中国朋友之中,最好的,以陈独秀为首,也许会在国内与国际被人诬蔑,被人枪毙。必须用全力指出第四国际是站在中国方面反对日本的。同时,我又添一句话说:‘却不抛弃它的纲领和它的独立’。”当有人嘲笑托洛茨基的抗日主张是替蒋介石服务时,他说:“积极而自觉地参加战争,这并不是‘替蒋介石服务’,而是违反蒋介石,而替一个殖民地国家的独立服务。”(同前书第321页)同样性质的言论,托在该书中还有好多处。

可是托派中央仍认为陈批评他们为“极左派”、“宗派主义”是错误的。对于像陈独秀这样的领袖人物的“错误”要与他进行斗争到底。

但在实践中也有一些地区的托派组织按正确路线而活动。抗战时四川托派组织的产生、发展的过程,证明了陈独秀的主张正确。据熊安东与曹毓林近年合写的未刊手稿《战争年代成长的青年群体》一文中所载,抗战兴起,山东有济南一中等几个中学的学生,向内地流亡,历时18个月(自1937年7月——38年12月),经过鲁豫鄂陕川五省,到达四川绵阳后,合并设立为国立六中,学生人数有2000多人。在流亡之初,济南一中已存在一个真理读书会,其成员有5——6人,到了绵阳国立六中时,真理读书会成员发展到50多人。这一读书会成员后来都直接转成为托派成员。他们在流亡过程中,以济南一中的5——6人为核心,在一托派老师的指导下,积极宣传抗战,以陈独秀当时的演说思想为指导(这是根据熊安东的口述),采用演话剧、出墙报等公开活动的方式,扩大在学生中的影响,又以马恩列托的书籍为秘密武器,吸收进步的同学加入读书会组织。到了绵阳后,他们就从学校走向工厂,很多同学分批南下重庆,打进当时的兵工厂、电力厂、炼钢厂以及其他工厂,在工人中开展工作。兹因工作取得进展,对保密工作放松了警惕。他们在重庆的工厂、学校中半公开地散发具名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文章与传单,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特别是1941年王振华到了重庆,主持重庆的托派工作后,在出版物《工人呼声》中加强了批判国民党的力度(笔者注:这就是王执行了上海托派中央组织的政治主张),结果组织遭到了打击,从兵工二十一厂等厂中逮捕了好多名托派工人。到了1942年春,王振华也被捕。笔者补充:根据赵芳举在《夕阳忆语》一书中的记载,重庆解放前夕,王与他妻子黎洁霜以及二个幼小的儿子在中美合作所被国民党特务所枪杀。解放后直至80年代才被评为烈士。

又据赵芳举同书记载:在1941——42年,重庆托派组织被破坏了。嗣后,未曾被捕的人员重新秘密聚集起来,外地又有新的人员补充进来。到了1944年,托派人员仍有20多人。在1945年二月春节期间,当地发生了“胡世和惨案”。托派组织乘势发动全市电力工人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反特斗争,并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事情的缘起是重庆的特务头目依仗其特务势力,在餐厅经营中进行偷电,引起了与电力公司的矛盾。电力公司依章前往断电。管用户电路的几组工人惧于国民党特务的势力,都不敢承接任务,唯有担任领班组长的托派人员刘振基愿意带领两名技工前去断电。其中一名叫胡世和(又名胡世合)的技工也是托派人员。三人到达目的地,刚一动手,就遭到许多青年店员(实是特务喽罗)的围攻。特务头子之一江德懋还打了刘振基一记耳光,寡不敌众,他们三人只得撤回。第二天,重庆电力公司更多工人再去断电。在这过程中,另一特务头子田凯(又名田士兴)竟开枪打死工人胡世和,引起全厂工人的愤怒。重庆托派组织乘机决定通过刘振基发动全厂工人并联合两个分厂的工人共一千多人举行大示威,并准备罢工。由于示威工人的声势浩大,又得到社会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支持,更慑于电力工人若罢工将会给重庆全市经济生活与社会秩序带来的影响,迫使蒋介石亲自下令将田凯枪毙以平民愤。托派在这一斗争中取得完全的胜利,极大地动摇了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基础。(详见《夕阳忆语》第七章)

从此一前一后,一反一正的事例中可见当时托派如果能遵循如陈独秀给托洛茨基信中所说的在政治宣传行动上无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于民主民族斗争,在组织上采取秘密行动以团聚力量,那么,在八年的抗战过程中其力量必然会有所壮大。到了战后,它将会以有较大的力量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它对动摇蒋介石统治的作用决不会像当时托派多数派、少数派那样只能处于宣传小团体的情况了。

关于世界大战问题

陈独秀认为这次世界大战中不会有什么国家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其理由有四点。在1940年9月间,

陈给西流的信中把这四点理由讲得很清楚：

(1) 各国的革命力量，已给斯大林派摧除乾净；

(2) 各国资产阶级有了 1871 年和 1917 年的经验，战败后宁肯把武装全交给国外的敌人，免为国内的敌人所利用；

(3) 此时德国的武装和战术及统治征服地的方法，均非 1871 年和 1917 年可比，英法政府军失败后，民间一时决不能苍头特起；

(4) 德国尚未获得世界霸权，一败战事即可了结，纳粹失败后，继之者不会仍为法西斯政权，(此情势恰与英法相反) 届时社民党及其他自由派会抬头，然此只能说有利于革命运动之开始，很难说希特勒失败德国马上便会起革命。

在这四点理由中，陈独秀特别重视第(1)点，所以他在接着上述四点之后说：“以无革命政党故，基于上述原因，以前我们相信的‘帝国主义大战后失败国将起革命’这一公式，完全被推翻了，只有迷信公式对历史事变发展闭起眼睛的人们，才会做 1917 的梦，才会说此次大战是上次大战的重演。”

反对陈独秀这意见的人们都以为自己的意见有托洛茨基关于二次大战的论述为根据的。郑超麟有一封因得知陈独秀死讯后而未发出的信中曾引伸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在第二次大战中也必然会有国家出现俄国十月一样的革命。他们普遍地批评陈的这一观点是站在英美法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讲话，或者批评陈重复了第一次大战时社会民主党的立场。

人们的这类批评，看来是有所根据，但实际上并没有符合陈的原意。因为陈认为各国的托派力量太弱小了，他的这一主张是使各国托派在战争过程中能争取到有利于自己活动的空间，有利于自己革命工作的开展，以求能够团聚力量。与之相反，陈独秀对他们的批评是十分中肯的。陈说他们的这种主张是只希望革命的最后斗争的早日到来，而不知道革命的最后斗争是要经过中间阶段的斗争才能到来的。

事情已经过去 60 多年了，我们后人现在回顾起来按照当时历史的客观情况来判断争论双方究竟谁是谁非，事实最能回答问题。在大战过程中，英、美并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法国成了希特勒的占领国，更谈不上革命。最后，德国是战败了，也没有发生革命。从这里可以看到正确的是陈独秀所作的分析，错误的是与陈争论的人们。他们只是背诵托洛茨基的个别词句而对客观形势的把握却跟不上现实的发展，错失了机遇。从这里应当如实地承认在二战问题上，陈独秀是站在托派的立场上又比托洛茨基的观点要看高一筹。

关于后期苏联的国家性质

陈独秀认为后期的苏联已是列强国之一，并非什么“堕落的工人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陈也有一个认识上的转变过程。还在南京监狱中当他写信给托派国际局，建议将“保卫苏联”的口号改为“重建十月革命精神的苏联”的口号时，他仍认为当时的苏联还是“堕落的工人国家”。所以在中国抗战之初，1938 年 2 月陈独秀在武汉发表的《抗战中应有的纲领》一文的第三条中还说“联合苏联及全世界的工农民众(日本的工农民众也在内)，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后来苏联所表现的诸种情况，使陈独秀对她的认识发生质的变化。

抗日之初，苏联还在援助中国抗日，她曾以志愿军的名义派遣空军协助中国军队作战，在保卫武汉的空战中击落日机多架，给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曾起过振奋人心的作用。可是没过多久，它就与日帝订立《苏日中立条约》。条约规定：“相互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满洲国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性。”这就是说她向日本出卖中国人民的利益，竟承认中国的东北三省为独立国，她还要日本承认外蒙古独立，使外蒙古从此脱离中国而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这与列宁领导时苏联主动废除沙皇时代对华的不平等条约相对照，其性质是何其明显的不同。陈独秀从此认识到苏联援助中国抗日，其目的是让中国拖住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不让她协同希特勒从东西两侧夹击苏联。

在欧洲，苏联原来高喊反对法西斯的口号，可是到了 1939 年 8 月 23 日，她竟与希特勒订立《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接着 9 月 1 日，德军入侵波兰，9 月 17 日苏军也入侵波兰东部，苏德从此完成瓜分波兰。此外，苏联还藉口自己的列宁格勒距国界太近，不宜防守，竟向芬兰提出领土要求。芬兰不依，苏联竟发动赤裸裸

的武装侵略。芬兰人民抵抗了100多天,因国力不支,出于无奈,不得已割地了结。这是陈独秀认识苏联是强权国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在苏联国内,自基洛夫案件后,斯大林进一步迫害老布尔什维克,把他们斩尽杀绝。对流亡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竟派人去暗杀掉。苏联的政制是斯大林的个人独裁,格别乌是他统治苏联人民的凶恶工具。苏联人民根本没有民主、自由。苏维埃大会的选举仅仅是走过场,它还不如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不论在党内或国内,人们都没有公开表达自己政见的权利,有的只是被强制地跟着斯大林的意旨讲话。

根据上述三方面的情况,陈独秀断定苏联已是列强国之一。

依照托洛茨基生前的论述,如果苏联是“堕落的工人国家”,在苏联不好的只是斯大林的官僚统治,党内通过民主的程序,更换了斯大林的统治,这个党就会恢复成列宁时代的政党,这个国家也会重新恢复成工人国家,即社会主义国家。但在上述的事实面前,这种愿望是不可能达到的。

在上面三大问题的争论中,陈独秀基本上是正确的,他的预见性与分析符合客观实际,经得起历史事实的考验。但在这三个问题的个别方面,陈也都有错误,有的错误还比较严重,甚至牵涉到 he 是否仍是托派的根本立场问题。

在中国抗战问题上,陈在正确地指出中国的抗战有历史的进步意义时,又在《抗战一年》一文中,他竟说假使意大利政府有助于我国。我们便不惜承认意大利兼并阿比西尼亚(现译埃塞俄比亚)。这话显然是错误的。我们中国人民需要民族独立,难道阿比西尼亚人民就不能要求民族独立吗?要是允许意大利兼并阿比西尼亚,岂不是鼓励正在抬头的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吗?

在世界大战问题上,陈能正确阐明在二战中没有世界革命的形势下,国际上的托派应站在英美法民主国家一边,提出共同打击希特勒的口号,但在《给西流的信》中,他却说在这种形势下,就是印度人民要求独立也是反动的。这也是显然的错误。难道印度人民在二战中没有要求民族独立的权利吗?陈担心印度一旦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就必然会转入日本或俄国的统治,从而助长了法西斯势力。这种推理显然不能成立。难道说印度人民在这种时候能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她就不能把自己作为新兴的独立国家参加英美法一边共同抗击德意日法西斯吗?

在苏联的国家性质问题上,陈能坚定而明确地指出当时的苏联已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充其量不过是世界列强国之一时,但他在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与斯大林的个人独裁之间有所误解,分不清界限。他在《给西流的信》中指出,斯大林独裁所造成的根源在于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制度之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自斯大林。斯大林的罪恶并非斯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斯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专政之逻辑的发展。

这里,陈独秀指出当时苏联制度的缺陷,给斯大林的篡权夺位提供了条件,是很正确的。但他说斯大林的罪恶并非斯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斯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专政之逻辑的发展,则是偏激之言了。斯大林的心术特别坏,从他担任总书记后就逐步看得明白了。斯大林担任布尔什维克的总书记,是在1921年联共第十次代大上由季诺维也夫提议而通过的。在这次代大以前,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不和,在国内南方战线上反对反革命武装颠覆的斗争中可以找到根源,在反对波兰的武装干涉苏联的斗争中同样可以找到根源。在这次代大上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开始勾结,他们的目的是想不能让党的最高领导权落在托洛茨基之手。到了1924年5月,在公布列宁的遗嘱要撤换斯大林为总书记的那次中央全会上,他们二人外,又加上卡明涅夫相互勾结成三驾马车。当时斯大林听到了这个遗嘱,神情相当惊慌,而季诺维也夫与卡明涅夫联手为他保驾护航。季在会上说列宁所指出的斯大林的那些缺点,斯大林已经改正过来了。卡则在会上提议仍让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见艾·多依彻著的《斯大林政治传记》310—311页)从此以后,斯大林就稳坐联共总书记这一宝座并逐步实施他的个人独裁。托洛茨基从此以后更是步步受制于他们的这个三人小组。到了最后,托洛茨基被赶出了苏联,辗转流亡在国外。事情到此,苏联的政局并未稳定下来。接着斯大林又祭起基洛夫案件,阴险地把一批又一批的老布尔什维克,包括把他推上总书记地位的季诺维也夫与卡明涅夫都以帝国主义间谍、企图刺杀斯大林为案由,逐步分批把他们杀害掉。最后他竟下令派人

把流亡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暗杀掉。结合后来赫鲁晓夫所揭发的,联共第十七大后的代表、中央委员与苏军中的高级将领被大量杀害的事实,活现了斯大林个人暴政的凶恶面目。斯大林还把自己的这种行动提炼成理论,写在他自己著的《联共(布)党史》中,说:“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见该书第397页)斯大林的这种残忍手段,还能说他的心术不特别坏吗?

同样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体制下,当列宁领导党中央,领导政治局时,就没有发生斯大林这样滥杀同志的事例。布列斯特和约讨论时,党内的争论也是够激烈的。布哈林坚决反对列宁主张签订和约,并在党内形成一定的声势,险些使列宁的主张处于少数。但最后,当形成以列宁的主张为多数并决议签订了和约之后,布哈林在党中央并没有受到任何打击,照常参加政治活动。列宁丝毫没有想借故加害于他。列宁在遗嘱中对他还有恰如其分的评价。

再说,列宁在病重时的文章与遗嘱中对斯大林都有严重的批评,在《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中,说原检察院缺乏工作效率,甚至出现官僚习气等等就是针对斯大林而批评的。因为斯大林原来担任着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的职务。后来列宁在他的遗嘱中更是直接点名要撤换斯大林作总书记的建议。

这些是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斯大林的暴政是斯大林的心术与品质特别坏所致。

陈独秀在这里所以说斯大林的暴政不是斯大林的心术特别坏,是因为他没有把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与斯大林的个人独裁之间划清界线。如果划清界线,他显然是不会这样论述的。斯大林独裁的形成过程,本文上面已有扼要的说明,其始自1921年第10次代大,确立在1924年5月季、卡联手保住斯大林为总书记的日子,往后的一切暴政都是他独裁逐步加强的过程。

当然我们这里说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与斯大林的个人独裁的不同,并不是说列宁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完美无缺的。它也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在十月革命初创过程中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表现在苏维埃政权上,与后来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当初,领导这个苏维埃政权的不只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其中也还有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党,他们在其中虽只居少数地位,他们的成员与布尔什维克成员一样的参政,他们的报纸也一样的发行。在布列斯特和约时,他们的成员在苏维埃中照样参加讨论。列宁还主张过在苏维埃内由占多数票数的党派居领导地位,往后政权的转移在苏维埃内通过选举,取得多数票就可以实现,用不着再用武力夺取政权这样一种举动了。联系到上述的布哈林在布列斯特和约讨论时的表现,说明苏联当时并不是党内无派,党外无党的情况。

在布列斯特和约以后,部分社会革命党人、部分孟什维克党人企图用武力夺取苏维埃政权,社会革命党人还曾刺杀过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直到喀琅施塔德叛乱,他们这些人都参与其中,并打出拥护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的口号。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取缔的。与此同时,国内推行新经济政策,必然使阶级矛盾重新出现,因而在第10次代大上决定取消党内派别活动。这样就形成了党内无派,党外无党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

这是国内政治形势恶化时,不得已而采取的一项措施。

这样的制度在列宁这样的革命家领导下,党内国内的政治生活是可以正常进行的,虽然有其不健全的地方。但一旦列宁患病,大权落到以斯大林为总书记这样人物的手中,无产阶级专政就逐步蜕变为斯大林的个人独裁,遂就产生如后人看到的那样不可估量的恶果。列宁在病重时,也已看到党内的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矛盾在加深,他只考虑在党内采取步骤调整内部矛盾,如扩大工农检查院的组织,甚至建议撤消斯大林为总书记的职务。但不久,他就离开人世,因而没有考虑用制度保障反对派在党内合法的地位,没有用制度限制领导人的终身制,没有考虑扩大民主用全国人民的力量选举产生最优秀的人员为国家的领导人并限制领导人的职权和任期,没有用法律保证反对党的公开合法存在等等。所以,当革命取得成功,镇压了反革命的反抗,稳定了无产阶级政权后,能够实行如陈独秀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民主(即大众民主)就可以制约官僚向个人专权和独裁的发展。这样,苏联党和国家的历史就不会走回头路,也不至于在地球上消亡,国际共运也不会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与挫折。

关于陈独秀给郑学稼信中的话,称:“列托之见解,在本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他主张“要

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内)之价值。”他还说要“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等等,这是性质相当严重的一番话。

陈独秀讲上述言论的时间是在1940—1941年之间。到了1942年5月,一年多时间过去了,其间陈独秀在不断地写文章,但我们始终没有看到他曾经要拟写的《俄国革命的教训》这一小册子出版。相反,在他离开世界前不久,即同年5月13日,他写出了郑重回归原先见解的精辟论述的文章。这就是《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一文。这是他写的最后一篇政治论文。在这篇文章中,陈全面明确地表达出自己的政治信念,仍是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与不断革命的思想:

一、在当今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世界,任何弱小民族“它的唯一前途只是和全世界被压迫的劳动者,被压迫的落后民族结合在一起,推翻一切帝国主义,以分工互助的国际社会主义世界,代替商品买卖的国际资本主义旧世界,民族问题便自然解决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仍主张世界革命。这是马列主义的宗旨,也是托派所坚持的立场。这里陈不提列宁提倡的苏联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因为苏联在斯大林统治下已经变质了。

二、“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是要根本推翻国际资本主义的统制,所以自第一国际以来,‘解放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和‘解放被压迫的民族’是这一运动的两面大旗。社会主义革命一旦成功,只要不中途变质,他是不能日久和商品货币制度及国家制度并立的,到此时还有什么被压迫民族存在呢?”在这里表明他要用暴力推翻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国家制度,并要不断革命。这是列宁——托洛茨基一贯的主张。这也与因陈独秀主张社会主义民主(大众民主)而被人批评为放弃阶级斗争的言论而划清了界限。

三、“十月革命是全俄绝大多数人民集合在共产党‘解放劳动者’‘解放农民’‘解放小民族’三大旗帜之下成功的;革命胜利后,三样都一一实现了,并非是俄国共产党的空头支票,并且对国外把帝俄时代对被压迫国的不平等条约自动的宣告废除了。把它在被压迫国家的特殊权利如租界,领事裁判权等,一一宣告放弃了。”这话表明他拥护十月革命,不仅拥护它的暴力革命,也拥护革命成功后前期苏联共产党对外的一切社会主义政策。

四、“前期的苏联是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场,后期的苏联则站在俄国民族利益的立场。”从这里,我们看到他对苏联有前期与后期之分,前期的苏联是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场,因而被人认为他“是全世界被压迫者的灯塔,是全世界革命运动的参谋部。”而后期的苏联,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在实际上只得认为它是世界列强之一,若要硬说她是社会主义国家,便未免糟蹋社会主义了。”

五、“俄国在欧洲,毕竟也是一个比较落后的民族,……她为俄国安全计,以向法西斯蒂妥协代替了向法西斯蒂进攻,……她为俄国安全计,始终避免和日本开战,……所以任何落后民族,若以民族政策自限,必至陷于孤立(民族政策实际上就是孤立政策)而没有前途,就是苏俄也不能例外。”这里陈独秀预见到苏联消亡的前景。他的这一见解,与托洛茨基的见解基本上是一致的。托洛茨基认为苏联为“堕落的工人国家”的发展有二种可能。其前进,则会恢复社会主义国家;其后退,不是被国内的资本主义势力所推翻,就是被国际帝国主义势力所推翻。在这里,陈与托二人的见解,在苏联发展的实际中是走到一起了。

由此文可见,这就把他曾说的准备写一本小册子彻底推翻自己从前建立的见解等等的言论,由他自己写的最后这篇文章纠正过来。这明确说明他临终前表达出的内心思想:拥护前期列托领导的经过十月革命洗礼的苏联,反对后期斯大林独裁专制的苏联,即已蜕变为世界列强国之一的苏联。我们认为一个人的最后思想是反映出他当时最真实的思想,是盖棺论定的思想。

此外,在这篇文章中,他把自己以前曾评论印度在二战中要求独立是反动的这一错误言论也纠正过来。他说:如果印度人以民族独立的理由排出英国势力,“这理由当然十分正当。”(见《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605页)

这里特别一提的是他写就该文的同一天,便立即写信给何之瑜,说该文是前三篇文章(即《我的根本意见》、《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与《再论世界大势》——笔者注)的结论,更是“画龙点睛”。从此可见陈独秀在离世前是非常重视自己的最后一篇论文并认真纠正自己以前一些错误观点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以上我们谈到的有关陈独秀晚年的一些言论的错误,乃是他矫枉过正的错误。这是他的性格所使然。正如他在《给陈其昌等的信》中所说的,他“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他“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说不错又不对的话。”

作为一般人,讲了这些矫枉过正的错话是没有多大影响的。像陈独秀这样一位曾是中国大革命时的领军人物,现在仍是托派的精神领袖,讲了这种错话,其影响就不是小事了。特别是关于要写书推翻列宁所倡导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革命理论的大问题,其影响就相当深远了。以致彭述之等人抓住陈的这一论述,批评陈已背离列宁——托洛茨基主义,企图把他“开除”出托派组织。幸亏后来他自己把这些错话纠正过来。不然,他真的如托派某些人员所批评的那样从无产阶级革命派退回到资产阶级民主派了。

这里,必然牵涉到二个重要的问题,即陈独秀自从南京出狱到武汉转到四川直到他逝世时止,他是否为托派的问题以及他发表拟写推翻列托理论的错误言论,如何受到托派诸领导人所作的评论的问题。不久前,我们在一篇文章《陈独秀晚年与托派的关系》中,已经作了详细的说明,并以有力的证据证明陈在1942年逝世前仍是托派,而托派组织也始终保留陈独秀的党籍;同时也明确地辨明陈独秀的思想立场仍是托派的立场。因此,这里就不再重复了。需要说明一下的,是那篇文章乃是本文的一部份,只因当时为了特殊的需要,特地把它提前写出来而已。

陈独秀在批评斯大林的独裁制度时,也谈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缺陷,也谈了苏维埃必须完善民主的话。他的这些话,除了托派同志当时批评他为错误的话之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人能认识它的真正价值。最近十几年,随着陈研会的开展,他对社会主义制度探索的价值,逐渐被众多的学者所认识。几年前,就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对这些话有深刻的理解,并因此认定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深刻总结、反思苏联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人。他晚年的民主思想,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对民主政治的最深刻的思索,至今很少有人能够超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仍是我们奋斗的目标。”陈独秀的这些精辟话,主要集中在《给西流的信》与《我的根本意见》等文中,现摘其主要的如下:

(1) 陈独秀认为列宁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有缺点的。他说:“民主之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内容,许多年来,许多人,把民主与议会制度当做一件东西,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议会制度会成为过去,会成为历史残影,民主则不然也,苏维埃制度若无民主内容,仍旧是一种形式民主的代议制,甚至像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如果说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无产阶级的政权形式只有独裁,不应该民主,则史大林所做的一切罪恶都是应该的了,列宁所谓‘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乃成了一句废话。”“如果说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内容(法院外无捕人杀人权,政府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权利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一样的。”

(2) 为了说明民主并非资产阶级的专用品,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更应当实施民主。陈说:“近代民主制之内容,比希腊、罗马要丰富得多,实施的范围也广大得多,因为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时代,我们便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其实此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千百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不幸十月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的门面语而已。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有国有大工业、军队、警察、法院、苏维埃选举法,这些利器在手,足够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用不着拿独裁来代替民主。”

(3) 当时托派中流行着一种理论,认为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是私人占有的经济,为了反映这种私有经济占有者竞争的利益,才有多党制政治;而在苏联,经济都已国有化了,反映这种经济制度的利益,只须一党制就够了,用不着多党制进行竞争。为了回答这种理论,陈说:“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阶级政党若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

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4) 陈独秀认为列宁时代的这种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是斯大林式的政权的温床。因此,必须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克服这种缺点,才能防止斯大林现象的再生。他说:“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所以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史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史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已经耗竭之时,不必为民主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

陈独秀的这些以民主制来纠正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所存在的缺点的思想,是他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之后而形成的。这些言论以及其他有关的言论是十分宝贵的。

陈独秀的这些意见,当然会引起托派同志们的批评。在讲托派同志们的批评之前,先讲托派以外的人士,陈的好朋友胡适的评判。1949年春,何之瑜把不久前刚才秘密印刷出版的《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这一小册子送给了胡适。胡适读后,拍手称庆,说陈独秀大彻大悟,重新回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从胡适的观点出发,这是不足为怪的事。因为胡适原本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在这里所看到的陈独秀民主思想只是强调提及在社会主义革命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仍有利用的必要,而陈的真正立场与思想实质,他是不能理解的。

托派人士的批评,首先讲彭述之。他在《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托派)中央委员会“关于DS(独秀之简写——笔者)对民主与独裁等问题的意见的决议”》中,说陈独秀在《我的根本意见》中所表示的观点“是根本否认了无产阶级专政”。而“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基本问题”。它也是托洛茨基所坚持的观点,因此决议认为“DS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表示他在思想上根本离开了第四国际,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而完全堕落成为极端庸俗之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了。”“DS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因是他根本不了解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在他看来,‘民主主义’是超历史、超阶级的,因为在任何时代任何条件下都是存在的,发展的,甚至进步的。”

这个决议说陈独秀“根本否认了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恰当的。陈在这里所讲的话,并不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他只是指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缺陷并因此给斯大林的篡党夺权创造了条件,以致在夺权后给社会主义革命事业造成不可估量的恶果。至于陈独秀的无产阶级民主的主张是正确的。因为民主是官僚制之消毒素,是人民政治生活的必需品。在人类历史上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不同时代的民主,如希腊、罗马时代等等。资产阶级时代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时代更应有进一步的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范围应比资产阶级时代还应扩大、全面,因为这时代的社会财产为全民所有,人人应该享有民主,不像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选举,选民都有财产、文化程度等等条件的限制。

王凡西在争论时期,也反对陈独秀的改进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不过当时的文字记录我们找不到,无法摘录引证。1956年,当他居住在澳门,写他的《双山回忆录》时,同时写了一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叙述他自己与陈意见的不同。在这篇文章里,他表示反对陈独秀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对于陈所主张的无产阶级民主,除了批评他的民主主张太抽象而无实质内容外,而王对陈主张的民主还有引伸与发展。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王说:“首先让我们看看他关于革命与独裁的意见:‘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它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接着王分析说:“一个阶级经过其政党实行专政,不仅理论上说得通,而且事实上经常

有(差别只在于各该独裁的程度不同)。至于有深度的社会改革,不论它是反对抑是革命,为要确保其胜利与成果,从来都要采取独裁形式的,所以说根本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东西,在理论上是无视了革命史的教训,在行动上则根本否定了无产阶级革命。”(载《陈独秀研究动态》合订本上册,第68页)

王凡西以陈独秀说“根本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东西”这句话来批评陈是等于根本否定了无产阶级革命,这显然是误解了陈独秀这话的原意。从陈讲这句话的上下句联贯起来理解,恰恰相反,这表明陈独秀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是现在的苏联,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它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这是他针对着斯大林的官僚独裁才这样说的。如果在十月革命初期1917年冬至1920年春为例,当时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一个党的独裁,当然也不是领袖的独裁,陈独秀当然是赞成这种专政的。所以在这里,陈的这句话表明他是主张有民主的专政,并不如王凡西批评他的是根本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至于王凡西赞同并发展陈独秀的无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内容,都记载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一文中。该文的内容甚为丰富,对工人民主,对党内有派、党外有党等的主张,发挥得十分详细。这篇论文载在前引书合订本上册第67—70页,第81—84页。现在我们这里只摘录其要点如下:

(1) 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必定是暴力的革命,因之破坏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是必然的事。

(2) 如此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绝对不应取消在资产阶级民主制下面人民所已争得的民主权利,它们包括:人身保障法、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诸自由以及罢工权等等。

(3) 由全体劳动人民选举产生的专政机构,应彻底受选举人自下而上的监督,并事实上可随时撤换。同时,专政的权力不应集中在一个机构的手中,而应实行分权,俾收“箝制与平衡”之效,借以防止个人独裁的产生。

(4) 专政下面应允许反对党存在——自然我们只能让拥护革命的政党存在。

(5) 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必须容许反对派存在,绝不允许以组织制裁、特务手段、刑事迫害来对付不同意见者,反对以思想入罪。

(6) 无产阶级的专政绝对不应该变成一党专政。由部分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组成的工人政党,决不能代替由全体劳动者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权。执政党的决策必须首先在真有权力的、包括反对党在内的议会(或苏维埃)中提出与通过,然后由政府执行。执行中仍受议会监督。

(7) 鉴于政治民主实际上乃是经济民主的反映。因此,为使社会主义的民主有其物质基础起见,应实行计划经济中的分权制与自治制。

郑超麟在民主与专政的问题上,是基本上同意陈独秀的主张。他在自己的一封因闻知陈的死讯而未曾发出的信中说:“苏联的堕落当然不能归罪于斯大林一人,因为这是俄国本身落后和世界革命第一潮失败之结果。我们有权利希望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不会产生‘斯大林’,因为第二次革命潮将成功于好几个先进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仅仅是资产阶级无政治权之意,是对于过去统治阶级的专政,而非对劳动群众的专政——对于劳动群众则是民主。这是理论,不错,但苏俄的试验还不够给我们证明这个理论是行不通的。再来一个试验,如果再产生一个‘斯大林’的话,我们才肯怀疑这个理论。”(同前书,合订本上册,第99页)郑超麟与陈独秀在这里的不同,是在于陈独秀主张民主、反对独裁有强烈的声势,不怕一切个人后果,大声的说出来。郑超麟没有这种声势,而只是承认“苏联的堕落当然不能归罪于斯大林一人”,而把纠正斯大林现象寄托在第二次世界革命在西欧诸先进国家出现。这里与彭述之的不同是郑把自己作为陈的学生来看待,而彭述之则把陈作为批判的对象来看待,因之用激烈的言辞进行批判。他们二人对陈独秀的这种不同态度,在对陈的悼词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

* * * * *

这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托派内部就抗战等三大问题所进行的一场大争论。尽管各人的意见不同,态度不同,所使用的言辞也各不相同,但都能各抒己见,毫无保留地进行探讨。这着重体现了托派内部一贯重视民主的一个突出方面。参加上述争论的人,主要的是陈独秀与彭述之、王凡西、郑超麟等四位领导人(其中也包括西流、陈其昌与赵济等人,他们也积极参与争论),他们都是我们的革命前辈。

我们有以陈独秀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为革命导师而感到自豪。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抗战中他特别重视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性并积极支持抗日战争。同时他又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的立场关怀世界上的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人民。这反映在他晚年最后一篇论文《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中。他在其中具体表达出对资本帝国主义的谴责。他提出要根本推翻国际资本的统制,最终要全世界被压迫的劳动者和被压迫的落后民族结合起来推翻一切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旧世界。陈独秀在最后反思中得出摧毁旧世界必须用革命暴力和世界革命运动。我们后人对此决不能视而不见或有意抹杀了他这段光辉思想的存在,否则,是根本没有真正理解陈独秀的革命思想实质。

另外,由于历史事实的发展与苏联后期的变质等等客观原因,陈独秀晚年对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问题,是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与发挥,尤其对专制——独裁作了更深层次的批判,从而提出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首先要维护前期广大人民群众在历史上已取得的民主胜利果实,并进而扩大与加强民主,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其中他着重提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后的新政权中必须允许反对党的公开存在,在党内必须允许不同派别的合法存在;必须要以这作消毒剂的民主制来防范一党专政而蜕变为斯大林式的独裁产生。这是沉痛的历史教训与经验总结。

同时也使我们联想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他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见《马恩选集》第三卷第21页)对于这个问题是很值得我们后人作进一步的思索和再探讨。至于其他三位托派主要领导人彭述之、王凡西与郑超麟,他们都是革命的先行者。他们一生都热衷于马列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信仰。为了传播马列主义,为了中国的革命,他们坚决反对旧社会对劳动人民的压迫与剥削,为争取人民的民主与正义自由,一直站在斗争的前沿,始终不渝。其间,他们之中虽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与不同的争论,但在马列主义的旗帜下大方向是一致的,追求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与前途也是一致的。在前世纪四十年代末,彭述之与王凡西先后去了国外,不管以后环境的变化如何险恶,生活如何困顿,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中国革命、为全世界人类解放事业,孜孜不倦的工作、著述,直至为崇高的信仰而贡献终身。郑超麟选择留在国内,经历了失去自由的27年之后,才获得重回社会。这时他已是耄耋的老人了。他仍以不屈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继续书写他的革命人生经历与政治见解。当然其中有些见解是否符合当前的现实发展,尚须历史的检验。但他的坚持信仰和学习进取精神是执着可嘉的。他讲述自己的见解非常坦率。在监狱中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变,直至出狱。他从不模棱两可,委曲求全,这是郑超麟人格品质的可贵之处。

现在,这些可尊敬的老人都已先后去世。他们留给我们的是为革命而追求民主与真理的精神,尤其是陈独秀的先知先觉的思想,更值得钦佩。

通过这次写托派组织内部争论的有关文章,从中看到了陈独秀思想的闪光点,大大提高了我们已有的认识。回顾我们1947年在接受了托派思想后积极投入当时的学生民主运动时,在认知陈独秀的光辉思想实质方面,还是很肤浅的。对于陈独秀的博大精深的思想,我们今后还须继续学习。

论陈独秀的妇女人权思想

绍兴文理学院 谢一彪 欧阳云梓

陈独秀是中国现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重视妇女的人权问题,提出:妇女享有其本的生存权,有按劳动的质和量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生命安全应得到切实的保障;妇女与男子的地位平等,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也有获得家庭遗产继承的权利;妇女有婚姻自主权,有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他人不得干涉;妇女的健康权不容忽视,必须废除缠足的陋习,打破摧残妇女身心健康的封建礼教;妇女唯有参加革命,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得到切实的保障。

生存权

妇女有按劳动的质和量,获得应有的劳动报酬,维持基本生存的权利。陈独秀就上海厚生纱厂到湖南自治女校招收50名女工,工作时间长达12小时,每月只有8元工资,还必须与厂方订立三年契约合同,撰文责问老板穆藕初。陈独秀抨击资本家唯利是图,贪得无厌,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假定穆先生底工厂用一千工人,每人每月以8元计算,一年工资96000元;倘若一年得净利20万元,内中提出24000元分配给工人,每人每月就可以增加工资2元;资本家除得官利外又得那176000元,总不算太吃亏。”^①上海丝厂女工的工资很低,工作时间又长,生存状况极为恶劣。1924年女工每日工资至多四角二分,比往年减少三分,却要增加工作时间。女工方面提出既要增加工作时间,不说加薪,至少也应恢复去年每日工资四角五分的工资。由于资本家拒不答应,1924年上海十多个丝厂女工举行了大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陈独秀在《向导》发表文章声援丝厂女工罢工。“第一,在工资方面说,上海各丝厂女工工资最低额每日一角,最高额每日四角,其余二角、三角半不等;向例新茧上市时,每日工资多的加到四角五分,少有也有一角五分,此外每星期每人赏工半个,每月赏工四个,现在一律取消了。”而丝厂资本家以去年每百斤丝价售银1700两,增加工资四角五分;今年每百斤丝价售银仅900两,所以工资只定四角二分,这是毫无道理的。“第二,在工作时间方面说,厂主们想要更多赚钱,只有设法和外丝竞争市场,若要穷苦的女工多做点工,拿他们的血汗,来弥补你们的损失,漫说丧良心而且也有限。”^②按照北洋政府规定工人每日的劳动时间为九小时,女工从早上五时上班,到晚上七时下班,中间除去午饭一小时,实际做工十三小时。上海物价日见高涨,女工所得工资已难于维持生存,又要增加工作时间,女工自然要罢工了。陈独秀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尤其是支持劳工运动的国民党,援助这些贫苦无告的女工为改善生活状况而进行的斗争。

妇女还享有生命安全的权利。生命权是一种不可放弃的权利。任何一个人无权剥夺自己的生命,也不能将支配自己生命的权利交给别人。生命权是一种维持生命存生的权利,即活的权利。1924年上海闸北川公路祥经丝厂兼织绸厂失火,许多女工来不及出逃,最后检出尸体61具,另有下落不明者十多人。该厂招募外地女工四百余人,分住在厂房的底层和二层。晚上起火时,女工均已熟睡,只有住底层的女工逃出,住二层的女工因只有一门三窗,各窗装有铁栅,无法跳出,门口和楼梯又狭小,人多拥挤,堵塞出口,致使多数女工在屋中被烧死。待救火队赶来时,又因水管没水不能及时灭火,造成近百人被烧死。陈独秀撰文愤怒地谴责祥经厂主和江苏省长是火灾事件的罪魁祸首。事件的直接责任人就是厂主。上海丝厂及绸厂厂主防备工人如盗贼,不但大门紧闭森严,而且窗户也被封死。“祥经厂不但建筑多用木材易于延烧,而且每窗都有铁栅,数百人的卧室只有一门,门梯又均极狭小,岂不是将工人们活活地闭在屋中烧死?”厂主烧毁厂房倒不要紧,可以从协隆保险行得到11万保险费。女工被烧死,又有谁支付保险费?事件的间接责任人为江苏省长。闸北官办的自来水厂异常腐败,居民缴纳了自来水费,可一个月总有好几天无水可饮。“闸北人民因为这种情形,极力争持将水电厂改归商办,而江苏省长始终不允,以至自来水厂至今未能改良,水力甚

弱,祥经厂火起,虽救火会与警察同时驰至,而无水也无法拯救。”^③为此,闸北居民更有必要向江苏省长要求将自来水厂改归商办,以便不再重演女工被焚的悲剧。

平等权

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受教育权。1918年,一些有识之士提出男女同校问题,得到不少进步人士的赞同。1920年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冲破重重阻力,招收王兰、邓春兰等九名女生,率先实行男女同校。蔡元培惊世骇俗的举动,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非议,各省议员纷纷提出禁止男女同校的议案。陈独秀撰写署名文章,支持男女同校,怒斥顽固派的责难。“男女同校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在理论上简直用不着讨论。上海大同学院是首先实行的了,北京大学收容女生,就是腐败的教育部也居然许可了,现在南京高等师范也打算收女生,可见男女同校,在中国已经成了事实了。但是广东、浙江、江苏什么省议会,都提出什么禁止男女同校的议案。”^④陈独秀对于如此顽固不化的省议员,嗤之于鼻。陈独秀曾对筹建中的西南大学,寄予厚望,也提出“实行男女同校,附设工厂实行学生半工半读。”^⑤广东没有一个女子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毕业的女生只有极少数升到岭南大学。陈独秀应广东省长陈炯明邀请,从上海到广东主持教育工作,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兼大学预科校长。陈独秀提出了“男女同校”的办学方案,并委派袁振英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袁振英任职后,立即实行男女同校,遭到守旧派的反对。陈独秀坚决支持袁振英实行男女同校,广东省教委最后做出决议,同意广东中学实行男女同校。广东高等师范理应该招收女生,广东教育大会因此通过了高师“开放案”,但广东省长却以高师男女同校省会“碍于风化”为由,作出高师“无开放之必要”的批驳。广东的有识之士准备开展“高师开放”运动,出版“高师男女同学问题号”专刊,针对男女同校的利弊进行讨论,并致信陈独秀,请求帮助。陈独秀复信予以声援,谴责封建顽固势力的迂腐。“关于男女同校这个问题,本来没有什么深的理论值得当个问题去讨论。像这样浅近的事大家还要大惊小怪的起来反对,可见我们中国人底程度还同五六十年前反对铁路时代差不多。”^⑥陈独秀强烈要求改革女子教育,实行男女同校,大学开放女禁。

妇女也享有平等的财产继承权。1919年8月,北京女子高师的广西籍学生李超因过继的哥哥和嫂子剥夺其家庭的财产权和继承权,在贫病交加中病逝。由此引发了关于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争取平等财产权的争论。11月29日,在李大钊等人的倡议下,北京学界为李超举行了追悼会。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表了演讲,要求找出一个解决的办法,以便不再重演李超的悲剧。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也发表署名文章,对李超事件背后的社会因素作了深入地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妇女失去平等地位,作为男性的财产,不再有平等的财产权,是因为社会制度上的两大“缺点”,即“男系制”和“遗产制”。远古乱婚或同姓为婚的母系氏族社会,人类以渔猎为生,家族内的妇女地位崇高。后来,随着农业发达,人口增加,土地私有观念的产生,加上战争频繁,战胜的部落将战败落部的男子掳为奴隶,妇女掠为妻子,形成“掠夺婚姻”。也有的以农产品或家畜交换妇女,形成“买卖婚姻”。妇女在家族和社会的地位因此急骤下降,“一是不能和男子平等,一是女子变为个人的私有物。”^⑦妇女一旦成为个人的私有物,妇女的身体就不能归自己所有,在家便归父所有,出家归丈夫所有,夫死则归夫家或儿子所有。妇女作为个人的私有物,便与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一样,所有人可以随便毁坏、赠送和买卖。母系氏族社会的子女,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遗产自然由男女平分或专归女子所有。而妇女自从作为个人私有物以后,父子关系也明朗了,遗产自然专归男子专有。后来,由于宗法观念和家长观念的发达,长子和嫡长子又比次子和庶子地位更高,形成长子或嫡长子承袭爵位的习惯。没有爵位的平民也模仿形成长子继承遗产的习惯。由于东洋各民族父系的血族观念特别发达,妇女的地位也格外低下,宁可承继旁系的男子,而剥夺嫡系女子的财产继承权。现在不再是宗法社会,母权制和父权制均已成为历史,父权制的道德和法律不再是现代社会的标准。至于遗产制也应该予以改革,陈独秀提出两点思考的问题:“(一)倘若废止遗产制度,除应留嫡系子女成年内教养费以外,所有遗产都归公有,那么李女士是否至于受经济的压迫而死?(二)倘若不用男系制做法律习惯底标准,李女士当然可以承继遗产,那么是否至于受经济压迫而死?”陈独秀认为这“不是个人问题,是社会问题,是社会底重大问题。”^⑧陈独秀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男女享有同等的财产继承权。

婚姻自主权

妇女有婚姻自主权,有自由结婚的权利,他人不得干涉。陈独秀倡导男女自由恋爱。有人将恋爱分为“自由恋爱”和“极端自由恋爱”,赞成“自由恋爱”,而反对“极端自由恋爱”。陈独秀对此持有异议,“既已赞成恋爱,又复赞成自由恋爱,尚有何种限制之可言,而不谓为极端主义乎?”^⑧陈独秀猛烈评击封建包办婚姻,谴责其不合情理。人类婚嫁,应该男女两情相悦,不忍相离,男女因此缔结婚约。如果由他人作主,强逼成婚,则匪夷所思。可悲的是中国男女的婚姻,都是由父兄作主,极少男女相悦,心服情愿。开店的老板请个伙计尚且要情投意合,不要说夫妇相处几十年的大事,怎能不分青红皂白,随便将两不相识,毫无爱情的一对男女配为夫妻。如果歪打正着,那就是天大的幸事了。只要双方相貌、才能、性情、德性有一样不合,便终身难于和睦。“那守规矩的人,不是毫无爱情,难以生育,就是抑郁成疾,除死方休。那不守规矩的人,还要闹出许多新鲜的笑话来。”^⑨“巧妇常伴拙夫眠”,都是婚姻由父兄包办的结果。而有些男女双方的情况,因为是指腹为婚或从小定亲,连父兄也不知道。有的是因为贪图对方有钱有势,也有的是因为亲戚的交情,孩子年幼,就草率说媒定亲,后来是个瞎子,是个哑子也不知道,或是疯子、傻子、瘫子、跛子也不清楚,身带暗疾,不能生育,难于长寿也不晓得。尤其让人深恶痛绝的是“等儿媳”的恶俗,因为没有生下儿子,就先娶下媳妇,等着儿子,如果等到二十岁那儿子还不来,才可以择配嫁人。最为悲惨的是媳妇等到十八岁等到儿子来了,“十八岁大姐周岁郎”,少得要守十几年的青年活寡才能成亲婚配。陈独秀称赞西洋的婚姻最为文明,“他们都是男女自己择配,相貌、才情、性情、德性,两边都是旗鼓相当的。”^⑩虽说日本结婚规矩由父母作主,但也要与儿女商量,两情相悦才会缔结婚姻。陈独秀倡议效仿西洋的“章程”,日本的“规矩”,不再有像中国包办婚姻这样野蛮的风俗。

妇女不仅有自由结婚的权利,也有自由离婚的权利。陈独秀认为结婚的规矩应是男女相悦,自己作主,这样才合乎情理。但有些头脑冬烘的先生却说如果男女自己作主结婚,唯恐闹出许多笑话。而且中国女子没有见识,毫无学问,如果自己作主结婚,不一定能找到如意的郎君。倒不如由父兄选择更为妥当。除了幼儿结亲之外,待儿女长大成人,父兄尽心择婚,征得男女双方同意,也勉强可行。至于结婚后,女子不能离婚的规矩,就更不合乎情理了。婚姻大事,无论是自由结婚,还是由父兄择婚,不可能都非常般配。如果结婚后,不能离婚,那就有误终身了。“象那有才有德的姑娘,许配了一位愚蠢无识的姑爷,也是有的。许配了一位吃喝嫖赌,败家荡产,不能养妻室儿女的,也是有的。还有许配了一位吃鸦片烟,做扒手,无所不为的,也是有的。”^⑪如果一位才貌双全的姑娘,配了这样一位不成器的姑爷,又不让离婚,与生活在十八层地狱有什么两样。合股做生意,若是双方脾气不同,还要拆伙。更何况婚姻大事,至少要相处三四十年,勉强生活在一起,双方像冤家对头一样,终身不得其所。所以,现在世界各国的法律均规定男女不合双方都可以提出离婚,各人另行嫁娶。解除不幸的婚姻,有二大好处。一是可以增进人类的幸福。人生在世,夫妻相处时间最久,如果遇上不钟爱的夫妇,便是一生的晦气。女子嫁了不成器的丈夫,受罪一辈子,即使有家财万贯的娘家作为靠山,也不是长久之计。妇女能够退婚改嫁,再找一个合式的丈夫,能够幸福地过一生。二能保全国家的安宁。夫妻性格不合,双方成了仇人,时常吵架,鸡犬不宁。如果家家不得安宁,国家也不得安宁。如果夫妻不睦,妇女可以退婚再嫁,天下的才子佳人都各得其所,家家安宁,国家也太平了。而中国律例,女子不好,男子享有“七出”的权利。男子不好,女子却不可以退婚。“天生男女都是一样,怎么男子可以退女人,女人就不可以以退男人?岂是女子天生的下贱,应该受男子糟蹋的吗?”尤其让人深恶痛绝的是女人死了,男子照例可以续弘。而男人死了,女子却要守寡,终身不能再嫁。“若是夫妻恩爱得很,丈夫死了,女人不肯改嫁他人,这也是他的恋爱自由。旁人要逼她嫁人,这本是不通的话。但是他自己本来愿意改嫁,若是拘了守节、体面、请旌表、树节孝坊种种迂腐的话,不能改嫁,真是冤深苦海了。”^⑫陈独秀认为男女不合式,男女双方提出离婚,都是天经地义的事。

健康权

妇女享有健康权。陈独秀认为妇女的解放,也应该包括“身体上的”解放。中国有许多摧残妇女的“刑法”,妇女一生一世都生活在黑暗的地狱中,受到极重的刑罚,如同犯重罪的囚犯一样。可妇女遭受这个“刑

法”的折磨早已习以为常，不以为苦，反以为乐。越是大富大贵的妇女，越是乐此不疲。这不是衙门的“刑法”，而是家里的“刑法”。但这个家里的“刑法”，比衙门的“刑法”有过之而无不及。衙门的刑法若罪不至于死，三五年还有刑满释放的日子，而家里的“刑法”遥遥无期，成了无期徒刑。陈独秀一一列举了六大摧残中国妇女的“刑法”。第一就是“脚镣的刑法”。妇女的双脚缠得跟粽子一样，皮开肉绽，疼痛异常，超过犯有重罪装钉脚镣的囚犯。陈独秀年幼时，“曾纠合一帮小朋友，用黄纸大字抄写好几十张清朝西太后禁止缠足的上谕，张贴通衢，劝人放脚。”^④然而，中国妇女缠足恶习依然根深蒂固，不但乡村普遍盛行，即使大都市也未绝迹。而陕西和甘肃的缠足最为恶劣，脚小的妇女无法行走，终日只能膝行，以至于出现了专门出卖妇女膝行器具的店铺。第二是“手铐的刑法”。富家妇女的双手带着十来只镯头，有翡翠的，有玳瑁的，也有金银珠嵌的，还有白玉金镶的，有四五斤重，伸手吃饭不方便，洗脸穿衣也不方便，垂下双手，动也不能动，恰如犯人的手铐。第三是“耳朵的刑法”。妇女两只耳朵穿了两三个孔，挂着几只耳环，越是有钱的妇女，挂的越多，耳朵挂得皮开肉烂，失去知觉，即使是犯人也没有这种“刑法”。第四是“链条锁头颈的刑法”。妇女头上都要套上一条兜兜链，还要讲究链条的长短粗细。姑娘说嫂嫂的链条是金的，嫂嫂笑姑娘的链条是银的，姐姐说妹妹的链条长，妹妹说姐姐的链条粗，仅仅为讨男人的欢心，却忘了自己活像犯人的模样。第五是“枷锁的刑法”。富贵人家的新娘披在肩上的披肩，钉了许多金银珠翠和玛瑙玉器，足有六七斤重，压在肩上，头颈都不能动，背脊骨也不能弯，就像枷锁一般。第六是“打皮巴掌的刑法”。无论是四五十岁的老太太，二三十岁的少奶奶，还是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十二三岁的小姑娘，都要涂脂抹粉，两只手在脸上乱打乱拍，将脸拍得通红，像犯罪的人被打了皮巴掌一样。由于脂粉含铅质高，最伤皮肤，天长日久比打皮巴掌还厉害。陈独秀呼吁要解除摧残妇女健康的“六项刑法”，将妇女从黑暗的地狱中解放出来。

妇女除了享有身体健康权以外，也享有身心健康权。中国妇女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压得喘不过气来。首先应推倒是儒家的“三纲”，君为臣纲，民为君的附属品，无独立自主的人格；父为子纲，子为父的附属品，无独立自主的人格。“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的人格。”受到三纲之说的影响，天下男女，无论是为臣为子为妻者，不见有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以一人而附属一人，丧失其自由自尊之人格，沦于被征服的奴隶地位。“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奴隶道德者，即丧失此中心，一切操行，悉非义由己起，附属他人以为功过者也。”^⑤陈独秀要求妇女奋起挣脱附属品的地位，恢复独立自主的人格。其次应该破除的是束缚妇女的三条锁链“三从主义”。“所谓三从，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老来从子。”^⑥女子在家里的一切活动都要受到父亲的干涉，尤如桌上的一只花瓶，可以随便摆放。父亲可以随心所欲地将女儿卖人或送人，或者送给达官贵人做妻做妾。女儿如果不肯嫁给有钱有势的人，就是不孝。中国妇女的婚姻大都由父母作主，父母并不为女儿的幸福着想，不过是以此联络有权势的人，送给他人作为妻，将女儿作为攀缘富贵的敲门砖而已。至于出嫁从夫，男子指使妻子做任何事件，妻子也不能持有异议。若是不从，则为社会所不容。丈夫不仅可以随意命令妻子，也可以将妻子出卖，或者送人。有些男子因为抽鸦片上瘾，将妻子出卖，也有的强迫妻子卖淫，也有的将妻子出租。妇女只有砸碎封建礼教的枷锁，才能得到彻底解放，恢复身心健康。

妇女的人权保障

陈独秀认为保障妇女人权，首先应恢复妇女人格上的独立地位。中国封建社会统治的根基是以男子为中心的封建宗法制度，妇女不仅受到政权、族权、神权的压迫，还受到夫权的支配。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迫并没有随之消失，妇女受奴役的地位也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变。陈独秀愤怒地谴责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残害，“妇女不是我们的同类吗？本是人类同类的母亲，反变了人类的奴隶；不寄食于父，便寄食于夫；得意者也等于珠围翠绕的娼家，失意者便是日暮无归的乞丐，至于一般受虐待的养媳婢女，更过的是极人间悲惨的生涯。”^⑦陈独秀认为争取中国妇女人权最要紧的一个问题，就是解决妇女作为“人”的地位。因为中国诗书人家有客人来访时，如果男主人不在家，女主人必定隔着门帘说家里没有人。中国妇女自己也没有把自己当作独立的人来看待。“所以，中国妇女，第一必须取得法律

家所谓的‘自然人’的资格,然后才能够说到别的问题,才能够说到和别的人同等的权利。”^⑨因此,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的创刊号上,大声呼吁广大青年,特别是广大青年妇女奋起破坏君权,求得政治的解放;否认教权的神圣地位,以摆脱宗教的束缚;倡导“均产说”,争取经济上的解放;支持“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而“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⑩维护妇女的人权,需要广大妇女的自我觉醒。如果妇女没有自身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愿望和要求,即使法律上赋予妇女人格独立的地位,妇女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人权。

陈独秀认为要保障妇女人权,妇女必须在经济上独立。妇女之所以人格不独立,与经济不独立密切相关。在封建宗法社会中,妇女被束缚在家庭相夫教子,操持家务,不能占有生产资料,也没有财产继承权和支配权,社会上的职业也不对妇女开放。“女人没有好衣穿、好菜吃,好首饰戴,便有埋怨男人。”^⑪妇女注定没有经济地位,只能依附于男子生存,成为男人的奴隶,过着没有自由的生活。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妇女问题虽多,总而言之,就是经济上不独立。因经济不独立,遂生出人格不独立,因而生出无数痛苦的事情。”^⑫陈独秀以上海中西女学女生为例,批评中国妇女没有经济独立的思想。中西女学是上海著名的学校,尽管中西女学的女生有着丰富的知识,但追求衣着阔绰,穿着时髦,如果一个女生衣着朴素,其他女生就瞧她不起,她自己也觉得羞愧。她们最大的理想就是嫁一个留学生,回国之后能做大官。她们不想劳动,而是将自己的生活,寄托在别人身上。她们希望男子送来衣饰,丧失了自己独立的人格。“中国社会上的女子,无论从父从夫,都没有独立的人格,靠父养的,固没有人格,靠夫养的,也没有人格。所以女子丧失人格,完全是经济问题;如果女子能够经济独立,那么必不至受父、夫的压迫。”^⑬陈独秀要求中国妇女也像“西洋妇女独立自营之生活,自律师医生以至店员女工,无不有之。”^⑭妇女要经济独立,必须参加社会经济活动,求得与男子同等的就业机会。陈独秀鼓励妇女勇敢地走出家庭,走向社会,自谋职业,自食其力。

宪法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妇女的人权需要法律的保护。然而,《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第十条却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本。中国的士大夫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去个人独立的人格,又无个人独立的财产。现代的立宪国家,无论是君主国,还是民主国,都是政党政治。凡投身于政党生活者,莫不发挥个人独立信仰的精神,各行其是,子不必从父,妻也不必从夫。而按儒家的三纲五常,就无法自择政党。西方妇女参政运动,也是现代文明妇女生活之一。若以儒家要求“女不言外”,妇女参政就成了奇谈怪论。西方妇女孀居无论再嫁与否,由妇女自由选择,社会并不轻视。而中国礼教“夫死不嫁”,不自由的名节,致使许多年富有为的妇女过着凄惨孤独的生活。文明社会男女交际,习以为常。而孔子之道却是“男女授受不亲”,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西俗子女成年之后,由国家法律和社会予以制裁。而孔子之道却是“父要子死,不得不死;君要臣亡,不得不亡。”“盖宪法者,全国人民权利的保证书也,决不可优待一族、一教、一党、一派人之作用。”^⑮孔子生长在封建时代,所倡导的封建时代的道德、礼教和政治,仅仅涉及少数君主贵族的权利与名誉,与数千年以后的共和时代殊不相宜,宪法将摧残妇女人权的“孔教”定为国教,更是不可思议。

妇女只有参加革命运动,建立社会主义,才能真正确保妇女的人权。陈独秀号召“被轻视的妇女”积极参加革命,“要在参加革命运动中,极力要求在身体上在精神上解放你们自己,解放你们数千年来被人轻视被人侮辱被人束缚的一切锁链。”^⑯而唯有通过斗争,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妇女才能得到真正解放。“女子问题,实离不开社会主义。”这是“因为女子与社会有许多冲突的地方,讨论女子问题,首要与社会主义有所联络,否则离了社会主义,女子问题断不会解决。”^⑰妇女人权问题,与经济不独立有关,而经济不平等由社会剥削制度所造成。如果不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来改变社会制度,依照目前的经济制度,妇女“一面脱离了家庭的奴隶,一面便得去做东家的奴隶;即于自由恋爱一层,在财产制度和诱惑之下那里会有纯粹的自由!”^⑱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男女平等,未成年时,由社会公共教育,成年后则参加社会公共劳动。“在家庭不至受家庭之压迫,结婚后不受男子压迫。”^⑲女子不仅在家庭有独立的人格,在社会上也有独立的人格。

尽管陈独秀的妇女人权思想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但对中国现代妇女解放运动有重要的影响。五四运

动以后,陈独秀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考察妇女人权问题,不再局限于封建礼教对妇女人权的束缚,深刻地认识到妇女没有人权的根源在于私有财产制度,妇女唯有参加社会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得到彻底解放,才能享有真正的人权。

注释:

- ①《我的意见》(1920年5月1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23页。
- ②《上海丝厂女工大罢工》(1924年6月18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15页。
- ③《上海织绸厂焚毙女工之责任者》(1924年3月19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34页。
- ④《男女同校与议员》(1920年9月1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4页。
- ⑤《陈独秀答高适》(1920年10月1日),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262页。
- ⑥《陈独秀答人社》(1920年月1日),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274页。
- ⑦《男系制和遗产制》(1920年1月1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75页。
- ⑧《男系制和遗产制》(1920年1月1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77页。
- ⑨《陈独秀答刘延陵》(1918年1月15日),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200页。
- ⑩《恶俗篇》(1904年5月15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6页。
- ⑪《恶俗篇》(1904年5月15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7页。
- ⑫《恶俗篇》(1904年5月15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9页。
- ⑬《恶俗篇》(1904年5月15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1页。
- ⑭《我妇女解放观》(1921年3月8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14页。
- ⑮《一九一六年》(1916年1月15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3页。
- ⑯《女子问题与社会主义——在广东女界联合会演辞》(1921年1月29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4页。
- ⑰《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劳动运动与妇女运动》(1921年2月20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12页。
- ⑱《我的妇女解放观》(1921年3月8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14页。
- ⑲《敬告青年》(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4页。
- ⑳《恶俗篇》(1904年5月15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6页。
- ㉑《女子问题与社会主义——在广东女界联合会演辞》(1921年1月29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4页。
- ㉒《女子问题与社会主义——在广东女界联合会演辞》(1921年1月29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5页。
- ㉓《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1916年12月1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54页。
- ㉔《孔教与宪法》(1916年11月1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45页。
- ㉕《我的妇女解放观》(1921年3月8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14页。
- ㉖《女子问题与社会主义——在广东女界联合会演辞》(1921年1月29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4页。
- ㉗《陈独秀答费哲民》,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258页。
- ㉘《女子问题与社会主义——在广东女界联合会演辞》(1921年1月29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6页。

陈独秀学习与研究精神刍议

湖南益阳 喻国良 罗孟冬 陈晓南

毛泽东说过：“中国靠我们来建设，我们必须努力学习”。

陈独秀的一生是革命的、战斗和学习与研究的一生。“五四运动”前后，为了在中国创立马列主义政党，他如饥似渴地攻读马列著作，钻研建党学说。他有句名言：“饭菜可以少，书报不能少”。1920年初，他亲自抓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工作。他指导陈望道“费了生平译书的五倍工夫”，将《共产党宣言》全文译出，让李汉俊译出《马克思资本入门》、组织李达等人译出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问题总览》、《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并亲自创办了第一个党刊《共产党》和影响巨大的《新青年》。1918年9月，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第一次见到陈独秀时，喜出望外，忙行礼说：“先生，感谢你对学生的栽培，湖南长沙的青年学生很爱读《新青年》，在它的影响下，长沙成立了新民学会……”为了在中国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亲自写了许多马列主义文献。1920年9月，他发表了《谈政治》一文，这样就标志着陈独秀从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的黑暗中国，陈独秀高举马列主义大旗，创建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后来毛泽东公正的评价说：“我们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也指出：“丢了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是错误的、有害的”。陈独秀就是我党学习与研究马列主义，结合中国实际，干社会主义运动的老祖宗、老楷模。

陈独秀在学习与研究上，还有一个常人不可想象的奇迹，他多次把牢房当学习与研究室。他为了中国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出生入死，一生五次被捕入狱。

1932年10月，由于叛徒出卖，陈独秀第五次被捕。此时，他虽然被共产国际错误的开除了党籍，但他坚信马列矢志不移。所以，陈独秀被捕后，轰动中国和世界各地。当时的《先锋报》第四期呼唤社会：“起来！起来！！声援中国革命领袖陈独秀”。同年12月8日，世界著名自然科学家爱因斯坦，给蒋介石发来电报称：“陈独秀是东方的文曲星，而不是扫帚星，更不是囚徒，请求给予释放”。世界20世纪的三大哲学家也给蒋介石发来电报。特别是英国人伯特兰·罗素、美国人约翰·杜威更是强烈抗议蒋介石逮捕陈独秀。可是，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恨之入骨。陈独秀此时虽不是共产党党员，但由于他不改变党的立场，又是共产党的鼻祖，蒋介石岂能放过？他诬蔑陈独秀犯有“危害民国罪”。有一次，在中山公园，蒋介石被记者团团围住，问蒋介石如何对待与处置陈独秀？蒋介石竟胡说：“陈独秀虽已非共产党之首领，然而近年来共产党杀人放火，独秀乃始作俑者，故不可不明正刑”。

陈独秀是职业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在他身上最先体现共产党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有次，蒋介石竟派宋美龄和顾孟余去做陈独秀的劝降工作，只要陈独秀写出悔过书，官职任他选……陈独秀说：“我不是当官的料，我哪有顾先生会当官呵”。就这样，宋美龄和顾孟余与陈独秀“会谈”不到半小时就不欢而散。之后，蒋介石又派徐恩曾、陈公博等人作陈独秀的劝降工作。陈独秀严词批判了他们的叛徒嘴脸。徐恩曾出门后对人说，我以为陈独秀会放弃他的政治主张、但交谈之后，我们发现他的政治态度相当坚强……一个被开除了党籍的总书记陈独秀，坐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牢房里，马克思主义政治信念不变，视死如归，这是什么精神？当代的党员干部们，特别是一些动摇过共产主义信仰的人，你们想一想吧！坚持“三讲”，当好“三个代表”，坚持科学发展观，陈独秀不愧是楷模，是祖师爷！

人心都是肉长的，当时的典狱长见国民党诸多要人都要“看望”共产党的鼻祖陈独秀，他对陈独秀的态度也来了个大转变。古人云：“养心莫如静心，静心莫如读书”。根据陈独秀的要求，监狱让他看书、写信、会客人。并对他的房间进行了修缮。将两个大书架搬进他的牢房，让陈独秀方便读书、写作、搞研究。在国内

外的舆论压力下,由于狱中的宽松环境,再加上夫人潘兰珍对陈独秀坚贞不移,全力以赴协助丈夫的学习与研究。帮助陈独秀搞到了一切学习与研究写作的需求品。就这样,陈独秀把牢房当成了研究室,著作一部一部的问世:如《连语类编》、《古音阴阳入至用例表》、《荀子韵表及考释》,还有《老子考略》等。所以,中外人士,无不称赞陈独秀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革命家、又是文学家,永远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伟人,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骄傲!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了,陈独秀高兴得不得了,他从不饮酒的,这一次破先例,他要饮酒,第一杯敬慰先烈,第二杯告慰自己的两个爱儿,即被蒋介石杀死的陈延年和陈乔年,第三杯自己痛饮了……并兴致勃勃地对大家说:“共产党有希望了”!陈独秀一生很倔犟,从未流过泪,这回他竟泪流不止……

迫于政治形势,国民党中央政府对陈独秀提出释放的两个条件:一、有人担保,二、本人写出悔过书。陈独秀听了哈哈大笑说:“我宁愿死在狱中,决不悔过!”正义是不可战胜的,1937年8月22日,经过党中央和社会各方人士的努力活动,陈独秀被减刑释放了!他出狱后,不是先去医院治身体,不顾虚弱多病,奋笔致函《申报》为自己申冤辩诬。《申报》出于国民压力,发表了他的辩诬文章。8月25日他又给《申报》写了一函:“家国诚意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怕指……我决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特发表此书面谈话,以免与新闻界诸群面谈时口耳之间有所误。”我们认为,这就是一位职业革命家即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正气歌。

以上所写是历史唯物主义反映论。论述当否?请专家学者和党务工作者指正!

从日本看对陈独秀的评价

——陈独秀既不是右倾，也不是“左倾”

日本国北九州市立大学 横山宏章

一、陈独秀研究的深化发展

拙著《陈独秀》^①自1983年出版以来，已历时二十三年。1980年代初期的中国，体现改革开放政策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解放运动还刚开始，对陈独秀的重新评价也才起步不久。当时，有关陈独秀的专著尚未问世，拙著与Lee Feigon的Chen Duxiu^②不期同时出版，二书为最早陈独秀传记。同一时期，我在上海、美籍华人Lee Feigon在北京，分别受教于任建树先生和林茂生先生。1983年，陈独秀编辑的《安徽俗话报》^③再版，揭开了一些事实真相，推动了早年陈独秀研究的前进。其后，中国的陈独秀研究大有进展，继任建树的大作《陈独秀大传》^④出版，迄今已著述丰盛。另外，还出版了《陈独秀文章选编》三卷^⑤和《陈独秀著作选》三卷^⑥，据说正准备出版《陈独秀全集》。使陈独秀评价问题复杂化的托洛茨基研究的禁区也已打破，与陈独秀共同组织托洛茨基主义派（托派）的老托洛茨基主义者郑超麟的《郑超麟回忆录》^⑦也已刊行。

陈独秀的活动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时期。①辛亥革命以前刊行《安徽俗话报》，以及参反清秘密团体岳王会活动的爱国运动时期。②在新文化运动中，介绍批判儒家启蒙思想的“民主与科学”运动时期。③中国共产党建党与国民革命时期。④因反对斯大林而被开除党籍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时期。⑤出狱后的抗战时期。对陈独秀的评价，有关第③时期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和第④时期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是相当严峻的。历来评价陈独秀，皆指责其推行右倾机会主义招致大革命的失败，背叛共产党沦为反党托派主义者。有时还被扣上背叛中华民族“汉奸”的帽子。陈独秀的名字从其亲自发起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中消失，成为地地道道的反面角色^⑧。

现在，对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总司令的评价已无异议，而究竟是“右倾”还是“左倾”的争论却还在进行^⑨。随着托派研究禁区的打破，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的关系以及中国托派的研究也有了进展。当然，这与苏联的对斯大林的批判有关。在这样的气候下，各地成立了陈独秀研究会，唐宝林主编的《陈独秀研究动态》一直在介绍活跃的研究状况^⑩。看到今天陈独秀研究的活泼局面，与二十几年前拙著出版时有隔世之感。在陈独秀故乡的安庆市郊外，陈的墓地已修成公园，并设立了陈列馆。可以说，一直被作为反党分子而受批判的陈独秀，平反之日已为期不远。

我开始研究陈独秀，还是在刚入研究生院的时候，距今已有三十多年了。那时，中国正刮着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陈独秀被视为一个背叛中国革命的罪人。陈独秀是“右倾投降主义者”，一直被打上与共产党敌对的托派的烙印。我为了揭下陈独秀的政治烙印，从学问的角度洗刷其污名，斗胆地着手“危险”的陈独秀研究。当时，在日本几乎没有人从事陈独秀研究。所幸，当时在日本对斯大林的全面批判，已无任何阻力，因为斯大林把社会主义歪曲成全体主义。所以，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陈独秀没有戴上任何帽子，日本的陈独秀研究具备了对其①～⑤时期的不同作用进行客观分析的条件。

拙著对陈独秀的评价如下：

“（陈独秀）最早地洞察了时代的趋势，理清了混乱的思想，指出了前进的方向。从外国传入的革命思想，经陈独秀之手，转变成推动中国社会的革命运动思想。陈独秀以罕见的组织能力，使革命思想结出革命运动之果。”

“陈独秀一心考虑如何将中国社会从前近代传统思想的束缚中开放出来，一直在探索新的运动与思想，他是时代的旗手。所以，陈独秀不固守一种立场，不断自我革新，接受新的思想。时代改变了陈独秀，同时陈独秀也改变了时代^⑪。”

陈独秀一直对第三国际持有不同意见，而第三国际却无视陈独秀的意见，顽固地继续执行其国共合作的错误政策，最终酿成了大革命失败的悲剧。然而，第三国际却稼祸于陈独秀。另外，在中东路事件上，陈

独秀指责李立三的“保卫苏联”是激进主义,证明了其对形势判断的正确性。

因此,陈独秀对第三国际和中共中央持不同意见,既不是背叛中华民族、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右倾主义,也不是激进的左倾机会主义。这是我二十三年前研究陈独秀的结论。后来,我除发表了描述领导新文化运动的两个轮子—陈独秀和胡适,进入二十年代后分道扬镳过程的论文(其后的胡适与陈独秀—《打倒孔家店》的去向)之外^⑩,暂时放下了陈独秀研究。

重新审视今天的陈独秀研究的盛况,我感慨很深。但是,从一个日本学者的角度而言,我仍然与中国学术界有一些不同看法。

二、扣帽子式的历史评价

在日本研究陈独秀或中华民国史,不能理解为什么要给陈独秀扣上“左倾”或“右倾”的帽子^⑪。

陈独秀创立了中国共产党,率领共产党领导了激烈的武装革命—国民革命,在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失去了许多同志,导致党组织的致命损失,这公认的事实。从失败中再起之际,不明确领导人应负的政治责任,就没有组织的重建,也是自然的。与此同时,伴随党内的权力斗争,过激地追究政治责任也是不可避免的。在斗争中使权力交替正当化的逻辑成为必要的手段。于是,含有负面价值的“左倾”或“右倾”的帽子被当做工具使用。但“左倾”或“右倾”是给敌人的罪名,是胜者谴责败者的罪名。大概愈是给建党元勋陈独秀那样的伟大领袖戴上带有异端性质的“左倾”或“右倾”的帽子,就愈能标榜新领导人的“正统”吧。

给陈独秀戴帽子是基于政治价值观的政治性行为。给政党的政治声明、文件、历史评价下政治结论^⑫,我作为一个政治学学者可以理解。但是,把政治结论带入学术研究,以政治性评价代替学术性的历史评价,我难以赞同。

据中央党校韩钢教授称,以往的中共中央文件一直给陈独秀戴五顶帽子—叛徒、汉奸、托派、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现在,“叛徒”和“汉奸”的帽子被摘下了,“右倾投降主义”也不提了,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仍在继续使用。关于“右倾机会主义”有如下说法,“这些年来,学术界的研究实际上已经大大地突破了官方的界限。研究者还在不断发表著述,争取最后摘掉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帽子,为他彻底平反。当然,不同意见、不同看法的争论仍在继续。”但听说,主张给陈独秀恢复名誉的陈独秀研究会,在开始讨论摘下“右倾投降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这两顶帽子时,研究会的内部发行刊物却被迫停刊^⑬。这是不是政治干涉学术呢。陈独秀是“左倾”还是“右倾”的争论,那是政治的事情,学术应基于“事实求是”的精神,一丝不苟地还历史本来之面目。

给政治对手扣上“左”或“右”的帽子,不仅从政治上、还从肉体上将其消灭,这是斯大林的一贯作法。斯大林主义者把自己的价值观作为公认的、正统的价值观,并加以绝对化,对不和拍的反对派冠以马克思主义叛徒的罪名而清洗之。就是说,当权者僵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束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解释和发展。本应解放人类的马克思主义反而束缚了人类,这是产生斯大林体制下的恐怖政治的原因。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展开了对斯大林的批判。斯大林的长期统治腐蚀了苏联社会主义,并最终导致了苏联的消亡。

以唯一的、绝对的、公认的解释尺度来判断历史,将异化学术的本质。把丰富的历史本质化为空洞的政治语言,历史将成为异化的历史。正像共产主义的目的是把人从忽视人性的劳动中解放出来那样,解放历史就是把被异化的历史从政治中解放出来,恢复历史本来的面目。这才是于学术具有实在意义的工作^⑭。

三、向儒教教义挑战

事实上,正是陈独秀高举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向正统的儒教统治挑战,提倡人性的解放,在中国进行了具有启蒙意义的活动。

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强调,“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非然者,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⑮。”陈独秀呼吁人们不要盲从“忠孝节义”的正统教义,以独立自主的自由价值观来解放自己。后来,陈独秀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绝对成宗教。当国民党试图以儒教解释三民主义,特别是戴季陶将孙文主义绝对化时,陈独秀进行了严厉的批判^⑯。有意思的是,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胡适在这一点上显得更为坚决。胡适的“多研究些主义,少谈些主义”^⑰,批判了“××

主义”的简单化倾向。正如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指出的那样,怀疑一切的“批判的态度(精神)”才是思想的解放、人性解放之根本^④。胡适彻底地批判了国民党取得政权后归权威传统的倾向,指责孙文及其接班人完全没有理解否定传统权威的新文化运动精神(解放人性、拥护人权),要求国民党“取消统一思想与党化教育迷梦”^⑤。和胡适强调新思潮的“反对盲从”一样^⑥,陈独秀也不放弃“批判的态度”和“反对盲从”。

四、和斯大林的斗争

在大革命期间,陈独秀最不满的是斯大林欲假第三国际的权威指挥、干涉中国革命。陈独秀认为斯大林要求中国“盲从”。陈独秀虽在中共党内有巨大权威,但与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权威相比微不足道。当时陈独秀反对以政党合作的形式来进行国共合作,第三国际在中国的代表马林借国际的权威,以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合作政策是国际的意向为由,压制了陈独秀的反对意见。陈独秀认为斯大林的权威主义——干涉中共的政策,侵犯了中国的“独立自主精神”,理所当然地对斯大林强迫中国“盲从”表示了强烈不满。

斯大林主义的本质是斯大林一个人垄断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中共党内给政敌或反对派加上区分敌我的、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左倾”“右倾”的手法,都是从苏共那里学来的。从苏共党内派别斗争中产生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名称,起初并无褒贬之意。列宁死后,斯大林在与托洛茨基派的权力斗争中,将托洛茨基派打成反对列宁主义的思想潮流,企图作为“人民公敌”而消灭之。托洛茨基派被扣上“左倾机会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展开了残酷无情的流血清洗。为形成斯大林的独裁体制,“左倾”、“右倾”的用语作为消灭反对派的政治工具而被乱用。

五、大革命失败与陈独秀的罪名

在1927年8月的“八·七会议”上,陈独秀承担大革命失败的责任,被解除了总书记职务,并被第三国际戴上“机会主义”的帽子。据“八·七会议”的《告全体党员书》称,机会主义是“经常的摇动和犹豫、在紧急关头总是没有坚决行动的决心”^⑦。当时,还是作为政治态度的问题,并非意识形态的批判。1929年,陈独秀因赞同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中国政策的批评,并批评中共中央和第三国际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态度,于12月被开除党籍。中央决议指责陈独秀“从机会主义深入到取消主义”,“这样极端右倾的思想,这样反国际反党的路线,如果在党内存在,毫无疑问地是破坏党、破坏革命、以至背叛阶级帮访助敌人”^⑧。中共中央指同时被开除的彭述之,自命为“左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给其按上“右倾”帽子。在马克思主义者中,“左派”代表正确,大概不愿使用“左”而代之以“右倾”吧。提倡“继续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一般被认为是左派,但为了强调其负面印象,使用了加引号的“左”倾,意思是“所谓左派,实则‘左’倾”。

被开除党籍后,陈独秀集结了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组织了无产者社,并受托洛茨基的请求联合了其它托洛茨基主义小派别,于1931年组成“中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形成了党内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组织。于是,取代陈独秀领导中共中央的陈独秀的旧部下,一起开始了对这位过去老师的非难。蔡和森在《论陈独秀主义》中指陈独秀主义为“机会主义”,“孟什维克主义”、“取消主义”、“合法主义”、甚至是“法西斯主义”^⑨。博古骂陈独秀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先锋队”^⑩。

针对中共中央(李立三)高叫“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加强武装斗争的路线,陈独秀指出其盲动主义的危险性,劝告中央放弃武装斗争、展开政治斗争。立三路线的领导人李立三谴责陈独秀是“取消主义与取消派”,“把党、把中央看做第一个敌人,不去做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反豪绅买办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工作,专门来反对党、破坏党”^⑪。瞿秋白也抨击陈独秀是“中国的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放弃斗争是“向资产阶级投降的取消主义”^⑫。后来,瞿秋白路线、李立三路线的盲动主义受到批判,历史证明了陈独秀的正确。

陈独秀因与反对斯大林的托洛茨基派合流而被痛骂,甚至被斥为投降资产阶级。实质上,并不是什么投降主义的问题,而是得罪了中共中央被扣上投降资产阶级的帽子罢了。中央新领导给陈独秀定的罪是工农之敌,显示了自己的正统性。

陈独秀于1932年10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坐了五年牢。抗日战争暴发后陈独秀出狱,在抗日统一战线高潮中,有人提出了恢复陈独秀党籍的问题,但遭到从莫斯科回国的王明(陈绍禹)的强烈反对^⑬,理由是决不能饶恕托洛茨基主义者。其后,陈独秀无党无派,也拒绝蒋介石的邀请,移居四川江津,在那里继续抗日的言论活动。1938年,康生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中,给陈独秀等托派扣上沦为日本的奸细、“汉奸”、堕落成中华民族“公敌”的帽子^⑭。背叛中华民族“汉奸”的帽子是对陈独秀最大的污辱。

“破坏抗日战争、分裂统一战线、实行叛卖祖国、甘作日寇侦探、进行军事破坏、采取暗杀手段”^⑥等理由，都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捏造。

从1935到1938年，在苏联，“人民公敌”的概念是斯大林用来清洗对手的工具。遭到清洗的不仅有托洛茨基主义者，还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著名的布尔什维克。菊池昌典认为，大清洗的原因是斯大林对苏联国家内部的崩溃抱有过度的恐惧^⑦。面临日本的全面侵略、国难当头之际，中国共产党沿用斯大林清洗的逻辑排斥中国的托派，其原因也不难想象。“汉奸”乃捕风捉影，只不过是斯大林式清洗的翻版，为非难而非难的捏造。斯大林的蛮横，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已有充分揭露。“斯大林不是用说服、说明或是耐心的合作方法，而是用暴力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使之无条件屈服。持反对意见、或是试图证明自己意见正确的人们，无不陷于被撤职、或从精神上肉体上被消灭的命运”^⑧。

六、作为学术的人物研究

记得日本著名的研究中国思想的专家西顺藏，在给我的私人信件中这样评价陈独秀。“在黑暗中，陈独秀比谁都先走一步，但被桥上的栏杆绊倒而跌下河去”。陈独秀是一个启蒙思想家，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改革家，在列强侵略与军阀统治的黑暗中国，他点燃了民主与科学的星火，站在知识分子的最前列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他是照亮黑夜的先觉先行者。什么绊倒他的栏杆呢。西教授所谓的“跌下河去”，很可能就是指陈独秀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一事。成为托派便失去领导共产党和人民大众资格，这正是陈独秀的悲剧所在。

如果是那样的话，使陈独秀变为托派的“栏杆”，不正是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追随者吗。陈独秀并非甘心情愿当托派的。在大革命的过程中，尽管陈独秀对斯大林的中国革命论抱有疑问，但不得不“盲从”斯大林的权威。陈独秀亦深悔自己的无力，反省革命的失败。陈独秀在“机会主义”非难声中苦闷。当他从回国留苏学生处得知托洛茨基也对斯大林的中国革命论持有不同观点时，便毫不犹豫地与托洛茨基合流，组成了反对派。结果，苏共党内的反对派托洛茨基被清除，中共党内的反对派陈独秀也被清除。陈独秀离开了中国革命的主航道。

陈独秀领导托派组织，是否有被排斥在中国革命主流之外的危机感呢。要留在革命主流内，就不能对斯大林有抵触，但陈独秀做不到。陈独秀或许抱着即便身败名裂，也不能放弃信念的想法。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后，陈独秀的一行诗披露了他的心境，一语道尽了他是一位孤高的思想家，“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⑨”。或许有人会说陈独秀一直站在政治、思想的第一线，率领大众的人物，孤高思想家的叫法不太相称。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革命以来，陈独秀寻求国民的思想变革，一直在探索与社会的有机联系，在知识分子群体中闪闪发光，决不孤独。

然而，作为托派，追随陈独秀的同志并不多，他未免有孤立感。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曾一度深受挫折感的折磨。辛亥革命后，岳王会的同志柏文蔚就任安徽省都督，陈独秀任都督府秘书长。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逃亡日本。1914年，陈独秀在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上发表〈生机〉一文，叙述了当时的心情。“仆本拟闭户读书，以编辑为生。近日书业、销路不及去年十文之一，故已搁笔，静待饿死而已。……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不独党人为然也”^⑩。这是陈独秀在政治上受到挫折后的内心写照。但陈独秀立即从挫折中奋起，于次年（1915年）创刊启蒙杂志《青年杂志》（即后来的《新青年》），一跃成为论坛明星。那年陈独秀36岁。这次被国民党逮捕，陈独秀已53岁，再起之力已不如前。

陈独秀入狱后，为他奔走的不是共产党，而是杜威、罗素、爱因斯坦等世界著名学者，他们通电蒋介石要求释放陈独秀。国内旧友柏文蔚、蔡元培、胡适、柳亚子、杨杏佛等也声援陈独秀，章士钊主动承当辩护律师，他们都是一些非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籍著名知识分子。陈独秀的心情一定非常复杂。政治对手的国民党籍高级知识分子一起出来营救陈独秀，而他自己一手创建的共产党却把他当做托洛茨基主义者，见死不救。

非共产党高级知识分子相惜陈独秀，并不因为他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是共产党总书记、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等政治上的所为，而是因为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反对儒教传统的自由旗手，赞赏他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所作出的成就。章士钊说“陈独秀之暴动，谓与国民党打倒北洋军阀时所用之策略正同”^⑪？章士钊把陈独秀反对国民党比为孙中山反对清政府和军阀。当然，章士钊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批判不亚于共产党。章士钊批判国民党在批判无产阶级政的同时，实行和共产党同样的一党专政。“民主国家主权、寄于

全民，则以主权论。全民者国家也，国民党不过全民中一小小分子。……既谓党即国家，此溢为国民党专政，其谁曰不宜。中国国民党专政，苏俄无产阶级专政，此正两国相同之处、焉得曰否^①”。

陈独秀的“批判态度”与“反对盲从”的精神，始终贯穿于他的共产党员时期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时期。所以，营救他的人士虽然政治立场不同，却都从他的思想中发现诤諫人民不要盲从国民党蒋介石、对掌者的自由批判精神，因而敢于同蒋介石政权唱反调，维护被囚的言论大师。

陈独秀在辩护词中宣称自己反叛的正当性，力陈反叛不忠于国家和人民的政权是知识分子的使命。“若认为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人民自由权利的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即属‘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一非曾经‘叛国’，则国民党亦曾‘叛国’^②”。陈独秀的反抗性是植根于中国文化中的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当时的知识分子超越党派营救陈独秀，是因为他们感到以政治上的理由来消灭像陈独秀那样中国可引为自豪的文化人是一场危机。

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因散发批判军阀政治的传单而被捕。在陈独秀被捕之际，胡适指出给被捕者按上政治烙印毫无意义。当时的御用报纸指陈独秀“反动”，为此胡适在北京大学说“他是因为这种(件)事被捕，然而报上却载着他是反动！这是反动，那么现在的革命是不是反动？‘反动’抹杀了许多事实，他怎么算是反动^③”。胡适意在揭露“反动”、“右倾”等政治帽子是如何掩盖事实的，是如何的空洞无力。胡适不满以政治为由捕人，称赞了思想家陈独秀的成就。

共产党却对陈独秀下政治结论，给反对共产主义运动化身的斯大林的政治罪犯陈独秀戴上各种帽子。中共无法从文化的角度评价建立了伟大思想的陈独秀，只能囿于政治性处理。

如何从历史学、政治学的学术角度来分析政治上有争议的人物。我认为大前提应该是有不受政治价值观影响的学术自由。中国曾经历了政治高于一切的时代，文化、艺术、学术等必须为政治服务，学术没有自由。在摆脱文革后遗症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下，时代也要求学术必须有实事求是的客观性。所以，作为学术研究的陈独秀研究，也必须摆脱评价陈独秀的老框框。陈独秀是“右倾”还是“左倾”，或是“形左实右”，这些都是根据政治价值观给人物下结论的政治语言，是政治色彩浓厚的语言，而非根据学术价值来评价人物所应该使用的学术语言。

我认为，应该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分析陈独秀一生五个时期的思想活动、政治活动，不应该简单地使用非学术性的“右倾”、“左倾”等用语。

注释：

[1](日文)横山宏章《陈独秀》朝日新闻社、1983年。

[2]Lee Feigon, Chen Duxiu: Found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3]《安徽俗话报》(第1期~22期)2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

[4]任建树《陈独秀大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5]林茂生、杨淑娟、王树棣编《陈独秀文章选》上中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

[6]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7]《郑超麟回忆录》上、下、东方出版社、2004年。

[8]1928年，陈独秀被撤销共产党总书记职务后，对立派为中伤陈独秀，使用了各种具有政治价值观的用语，如“机会主义(日语译作：日和见主义)”、“取消主义(日语译作：解党主义)”、“败北主义”、“官僚主义”、“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经济主义”等，这些都是具有负面色彩的用语。抗日战争开始后，又使用了“民族公敌”、“日寇走狗”、“卖国的汉奸”等用语。

[9]《陈独秀是右倾是“左倾”的讨论》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安庆市陈独秀学术研究会主办《演示文稿》2003年7、8合刊、2003年9月。

[10]唐宝林主编《陈独秀研究动态》上(第1~23期)、下(第24~39期)原中国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善后小组、2004年10月。由唐宝林主持的北京陈独秀研究会于2003年11月在北京被解散，其过程详见唐宝林《再告全体同志书——张静如安庆讲话批注及陈研会被撤销真相》(同前、附录)。

[11]横山宏章《陈独秀》前揭、7~8页。

[12](日文)横山宏章《其后的胡适与陈独秀—《打倒孔家店》的去向》历史学研究会编《讲座世界史7》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

[13]表示派别的用语很多，据当时的文献，有“右派”、“左派”、“右倾”、“左倾”、“反对派”、“取消派”、“极右倾”、“极左倾”等。陈独秀有如下说明，“向左的极端是梦想革命，向右的极端是抛弃革命”。(陈独秀“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

题”《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前揭、149页。)在日本,使用“左翼”、“右翼”、“左派”、“右派”、“极左”、“极右”等词,中国则现在不大使用“左翼”、“右翼”。但对日本的政治状况,有时使用“右翼势力”。“极左”的含意是脱离正统的左翼,用“左”倾来表示。

[14] 据新的中共党史《中国共产党历史》,把陈独秀定位于“右倾机会主义”,对托洛茨基主义者时代的陈独秀,没有像过去那样使用“投降主义”的字眼。该书把瞿秋白定位于“‘左’倾盲动”、李立三是“‘左’倾冒险”、王明是“‘左’倾教条主义”、张国焘是“分裂主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着《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251页、315页、343页、388页、493页。)

[15] 韩钢《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一、陈独秀问题)<http://chinsci.blogchina.com/237803.htm>

[16] 据说,近年陈独秀研究会的主要工作是除掉了陈独秀的“十大罪状”。所谓十大罪状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托陈取消派”、“反第三国际”、“反苏”、“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唐宝林〈告全体会员书〉唐宝林主编《陈独秀研究动态》上〈第1~23期〉、下〈第24~39期〉、前揭、附8。)

[17] 陈独秀“敬告青年”《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前揭、130~131页。

[18] 陈独秀“给戴季陶的一封信”《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前揭。

[19]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

[20]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同前、112页。

[21] 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同前、259页。

[22]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前揭、110页。[23]“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253页。

[24]“中共中央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入党籍的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552页。

[25] 蔡和森“论陈独秀主义”陈东晓编《陈独秀评论》北平东亚书房、1932年、31页(《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821页)。

[26] 博古“托洛斯基主义、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先锋队”陈东晓编《陈独秀评论》同前、109页。

[27] 伯山(李立三)“取消主义与取消派”(小册子)1929年10月(东洋文库藏)、24页。

[28] 秋白(瞿秋白)〈中国的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莫斯科、1930年(东洋文库藏)、10页(《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681页)。

[29]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明报月刊出版社、1974年、1331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9年、422页)。

[30] 康生“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托派在中国》新中国出版社、1939年、45页(王树棣等编《陈独秀评论选编》下、前揭、217页)。

[31] 同前、72页。230页。

[32] (日文)菊地昌典《在历史中的斯大林时代》盛田书店、1966年、130页。

[33] (日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志水速雄译)《斯大林批判》讲谈社学术文库、1977年、27页。

[34] 陈独秀“赠刘海粟联”安庆市陈独秀学术研究会编注《陈独秀诗存》安徽出版社、2003年、187页。

[35] 陈独秀“生机(致《甲寅杂志》记者)”《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前揭、103页。

[36]“陈独秀案开审记”《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178~179页。

[37]“章士钊律师为陈独秀的辩护词”同前、196页。

[38] 陈独秀“辩诉状”《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前揭、318页。

[39] 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陈东晓编《陈独秀评论》前揭、52页(王树棣等编《陈独秀评论选编》下、前揭、290页)。

论陈独秀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影响

——兼论陈独秀何以当选“一大”中央局书记

安庆师范学院 董根明

内容摘要: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到中共“一大”召开前的这段时间里,陈独秀以《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为阵地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对各种假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论战,重视培养党的骨干力量,积极推动党的组织建设,具体指导中共“一大”党纲和章程的制定。尽管陈独秀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但他还是众望所归地当选为“一大”中央局的书记。

关键词: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影响

陈独秀没有出席1921年7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却被“一大”代表们公选为中央局的书记,对于这一结果,文革时期曾有“陈独秀篡夺了党的总书记职务”和“我党早年幼稚”等说法,^①现在学术界还持此种观点的已经鲜见。没有出席这一历史盛会的还有当时在思想文化界颇有影响并在北京加入共产党的北大教授李大钊,就当时在思想文化界的地位及党员身份来看,李大钊与陈独秀有着相同的影响。为什么“一大”代表们却偏偏推选陈独秀为中央局的书记呢?如果说陈独秀之当选中共“一大”中央局书记是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的话,那么,这种影响肯定不是直接的。^②那么,陈独秀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直接影响是什么呢?笔者认为陈独秀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直接影响就是他在推动党的组织建设和理论建设方面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后,陈独秀非常重视党的理论建设。“新青年社”是我党建立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作为“新青年社”的负责人,陈独秀非常重视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当时翻译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主要有《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和《共产党宣言》。^③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自1920年9月1日第8卷第1号起也改为上海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并新辟“俄罗斯研究”专栏,1920年11月7日《共产党》月刊作为党内理论刊物在上海创刊。陈独秀便以《新青年》和《共产党》为理论阵地,发起了对各种假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论战,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五四”运动前,“民主”、“科学”是《新青年》的主要旗帜。陈独秀曾因发起思想启蒙运动、勇猛批评封建思想文化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那时,陈独秀所崇尚的是“法兰西文明”。“五四”运动后,陈独秀逐步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恩赐给中国的并不是什么“近世文明”,而是导致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因此他否定了自己原先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救国方案,开始接受和宣传社会主义。“中国介绍马克思思想最早,影响最大的就算《新青年》了。”“中国研究马克思学说最有心得,介绍最早的就算陈独秀,李大钊,李达。尤以陈氏的影响最大。”^④1920年9月至1921年8月,陈独秀先后发表《谈政治》、《对于时局的我见》、《社会主义批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和《讨论无政府主义》等文章,比较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发起了对各种假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论战。

“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直接影响来自英国的哲学家罗素,在中国受其影响较大的是以张东荪为代表的一批主张政治改良的知识分子。首先、陈独秀否认张东荪等人主张在中国先发展实业,即期待中国资产阶级“发达起来”后“抵制外国资本家”、“保全中国独立”的基本观点。陈独秀认为旧中国受外国资本主义压迫的现状表明,“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中国劳动(农工)团

体为反抗资本家资本主义而战,就是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之目的。”^⑥其次、针对张东荪等人关于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而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论调,陈独秀明确指出:这种意见“最大的缺点,是忘记了现代人类低经济关系乃国际的而非国别的”,并进一步说:“此时我们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的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的必要。”^⑦在这里,陈独秀无疑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来指导中国革命的政治立场。再次、陈独秀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时,也从理论上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实质,划分了它与“古代所讲的社会主义”的界限,而且对于工团主义等流派也作了正确的分析批评,指出只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客观的。由此,陈独秀还批判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认为它的要点与科学共产主义所主张的阶级斗争、直接行动、国际运动等内容是截然对立的,指出“只有俄国底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⑧

无政府主义是从西方传播而来一种的社会思潮。因其具有反封建主义和否定旧中国现实政治秩序的客观意义,因而在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时期就在中国产生着重大影响。陈独秀敏锐地感觉到无政府主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尖锐对立。首先、陈独秀批评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强权和否定国家机器作用的理论观点。陈独秀尖锐地指出“我以为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和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这表明“人类的强权也算是一种自然力,利用他也可以有一种排除黑暗障碍的效用。因此我觉得不问强权到底用法如何,闭起眼睛反对一切强权,像这种因噎废食的办法,实在是太笼统的武断的,绝不是科学的。”^⑨其次、陈独秀批评了无政府主义的抽象民主及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他指出无政府主义者“若是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出现;那班资产阶级仍旧天天站在国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梦想自由,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所以资产阶级所恐怖的,不是自由社会的学说,是阶级战争的学说;资产阶级所欢迎的,不是劳动阶级要国家政权法律,是劳动阶级不要政权法律。”^⑩此外,陈独秀还对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约束,主张个人绝对自由的观点进行了批判。陈独秀认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宗旨虽然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方法实不宜于组织不宜于革命,劳动者也不宜相信他们;因为他们太过看重个人的或小团体的自由,他们反对中央集权及强制执行,如何能组织强大的团体去干革命的事业呢?”^⑪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正是在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从她最初成立的时候就努力摆脱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建党学说来推动党的理论建设,从而保证了其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我党保持组织理论纯洁性的传统与陈独秀等早期共产党人所发起的这场思想论战是分不开的。

二

陈独秀积极参与并指导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党纲和章程的制定。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后,陈独秀等人就和其他党员一起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以及其纲领草案。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第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是从苏共中央移交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中选出来的,是根据英文稿又翻译成中文的版本,“这个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在去年11月间决定的”,即1920年11月。^⑫虽然今天我们已无从考证其作者是谁,但作为上海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和书记——陈独秀参与或指导过《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制定,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党的第一个代表大会正是以《中国共产党宣言》为蓝本而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诚如《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译者所说的,“这个宣言的内容不过是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向外发表,不过以此为吸纳党员之标准”。宣言明确昭示党的奋斗目标是“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铲除现存的资本制度”,“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⑬这些内容在1921年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均有体现,如“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等^⑭“一大”召开前,陈独秀在广东委托陈公博和包惠僧带去致各代表的信,并向大会提出了关于组织和政策的四条指导意见:“一曰培植党员(按:指发展组织),二曰民主主义之

指导(按:指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三曰纪纲(按:指强调党员纪律),四曰慎重进行发动群众”。同时,陈独秀还提出:“政权问题,因本党尚未成立,应俟诸将来,而先尽力于政治上的工作”(按:指为将来夺取政权作好准备)。这些意见经过代表们的讨论也被吸收,并且反映在最后形成的党的纲领上。^⑩

第一、关于党的性质。李汉俊等人曾表示,“不赞成组织严密的、战斗的工人政党,而主张团结先进知识分子,公开建立广泛的和平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党”。受陈独秀思想的影响,代表们否定了李汉俊的意见,“最后在原则上通过一个基本立场,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党的基本任务。”^⑪以致党纲中明确提出,党的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取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⑫早在1920年9月,陈独秀就在《新青年》8卷1号上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他认为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并没收他们的财产之后,还要“利用政治的强权,防止他们的阴谋活动;利用法律的强权,防止他们的懒惰、掠夺,矫正他们的习惯、思想”。“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⑬

第二、关于吸收党员的条件。鉴于当时党员的数量少,且大多数是知识分子的现状,代表们一致同意陈独秀关于在工人中组织力量的意见。关于入党的条件,李汉俊等人也曾认为“不论成分,学生也好,大学教授也好,只要他信仰马克思主义,了解马克思主义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即可入党,至于是否实际参加党的一定组织担负党的一定工作,他认为是不关重要的。”^⑭与会代表依据陈独秀的意见否定了李汉俊的主张,因而党纲明确规定,党员的首要条件在于“接受我党的纲领和政策,愿意忠于党”,“在加入我党之前,必须断绝同反对我党党纲之任何党派的关系”。^⑮

第三、关于党的组织原则。早在1921年初,陈独秀就在广州起草了一个党章,提出党要实行中央集权制。陈独秀主张中国共产党不能孙中山先生之国民党那样采取党魁制。他举出许多事例,证明中国过去各政党因采取党魁制而发生的种种流弊。他主张中共采取较民主的委员制,从委员中选取一个书记出来负责联络之责;其他委员分担宣传、组织等方面的工作。他认为采取这种组织形式已由俄国共产党证明其妥善,也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强调减低书记的职权,遇事公决。这样不仅可以确立党内民主作风,也可以杜绝党魁制的个人独裁及官僚式的流弊。据李达回忆,1921年2月,陈独秀起草的党章寄到上海时,“李汉俊看到草案上主张党的组织采中央集权制,对陈独秀甚不满意,说他要党员拥护他个人独裁,因此他也起草了一个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中央只不过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陈独秀看了李汉俊这个草案,大发雷霆,从广州来信责备我一顿。”^⑯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的内容看,实际上是采纳了陈独秀的中央集权制的观点。如第9条和第12条就明确规定:“不到十人的地方委员会,只设书记一人管理事务;超过十人者,应设财务委员一人,组织委员一人,宣传委员一人;超过三十人者,应组织执行委员会。”“地方委员会的财政、出版和政策都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和指导。”^⑰当然,我党后来在实践中所形成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既是对李汉俊所提出的地方分权制的否定,也是对陈独秀所提出的中央集权制的补充。

三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后,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作的组织准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重视党的骨干力量的培养。受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影响,“五四”时期的一代青年人摆脱了封建的枷锁,走上了思想启蒙与民族救亡的革命道路,有的还坚定地走向了马克思主义,并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力量。李达就认为“陈先生是一个极端反对顽固守旧思想的急先锋,并且还用文字反对政府卖国的行为。他的文字,很有价值,很能够把一般青年由朦胧里提醒觉悟起来。”^⑱毛泽东也坦言自己是受了陈独秀的影响才走上革命道路的,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承认自己是在陈独秀的影响下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他回忆说,“1920年我第二次到上海。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陈独秀。我第一次同他

见面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③“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④其实,受陈独秀影响的不仅是毛泽东和李达,还有邓恩铭、包惠僧、刘仁静、张国焘、瞿秋白、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以及他的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等,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中的骨干成员。

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和上海的《星期评论》经常答复各地青年提出的问题,帮助和教育广大的青年。浙江、湖南、湖北、安徽、广东等地一批青年,他们或因学潮被迫离校、或因摆脱封建家庭的束缚、或因渴求新的知识与学术,纷纷到上海的《新青年》社和《星期评论》社,还有当时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和“沪滨工读互助团”的一些青年,都迫切期盼陈独秀等人给予帮助。为了培养党的骨干力量,一方面,陈独秀决定开办“外国语学社”。外国语学社表面上公开登报招生,实际上许多人都是通过陈独秀和上海组织的其他成员介绍入学的。任弼时、肖劲光、蒋光慈、刘少奇、罗亦农、柯庆施和彭述之等都是外国语学社的学员。后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还从这些学生中挑选20多人分三批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其中就有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罗亦农和李启汉等。另一方面,陈独秀决定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先发展团员,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然后再发展党员。据李达回忆:“1920年夏间,内地有许多青年脱离了家庭,离开了学校,去到上海找《新青年》社的陈独秀和国民日报觉悟栏编辑者邵力子。党在上海发起后,决定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租定新渔阳里6号作为容纳那些青年的处所,并介绍他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派俞秀松同志(党的发起人之一)负责主持。”^⑤当时在上海发展的团员中就有李启汉、罗觉(罗亦农)、王一飞、刘少奇、任弼时和肖劲光等,他们后来都成长为我党的骨干力量。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曾向各地共产主义者寄发它所拟定的团的章程,要求各地建立团组织的工作,此后,北京、天津、唐山、太原、武昌、长沙和广州等地都成立了共青团组织,为我党储备了大批骨干力量。

二是积极推动党的组织建设。上海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后,由陈独秀和李汉俊负责党组织的发展工作。^⑥

1920年7月,陈独秀就动员到上海的张国焘回北京后发展党的组织,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工作了,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⑦并委托张国焘向李大钊转达他的意见。据张国焘回忆:“1920年8月底,我回到北京,即以兴奋的心情将我和陈独秀先生的谈话的经过告诉李大钊先生。李先生略经思考,即毫无保留的赞成。”^⑧1920年10月,北京就建立党的早期组织,成员主要有李大钊、张国焘、张太雷、邓中夏、刘仁静、罗章龙等。

1920年下半年,“曾在广东从事社会主义宣传工作的刘伯垂由广州回武汉,途经上海时,由陈独秀吸收入党,并派他到武汉发展组织。刘伯垂带着一份抄写的中国共产党草案,回到武汉,首先找到包惠僧、郑凯卿进行商讨,随后又与董必武、陈潭秋进行秘密联系,共同商讨建党事宜。”^⑨

“1920年8月,共产党在上海建立后不久,由陈独秀函约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在广州建党。”但大多数成员为无政府主义者,党组织被无政府主义者控制。1920年底,陈独秀应邀到广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在此期间,他一方面在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宣传,批判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一方面“与米诺尔、别斯林、区声白、梁冰弦、刘石心、谭祖荫等联系,研究党的组织问题。”^⑩“他们进行过非常激烈的争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也就在这时,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于是,我们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⑪先由陈独秀、后由谭平山任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党员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连同陈独秀、米诺尔、别斯林在内一共九人。

在其它地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都与陈独秀的影响与推动有关。在济南,陈独秀通过齐鲁书社的王乐平联系到进步学生王尽美和邓恩铭;在长沙,毛泽东也是受陈独秀的直接影响而发动新民学会的骨干;旅日学生是在上海入党的施存统和周佛海的影响下带动起来的,陈独秀还去信指定施存统为负责人;^⑫旅欧支部中的很多骨干分子,如赵世炎、陈公培和张申府等都是在国内入党的,而旅欧学生蔡和森等人早就与陈独秀有书信往来。综上所述,在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到中共“一大”召开之前的这段时间里,由于陈独秀在推动党的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尽管他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大

会还是众望所归地推选他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的书记。

注释：

①林茂生：《关于陈独秀评价的一些问题》《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内部资料）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习研究会编印1979年，第91页。

② 参见拙文：《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共“一大”的几个问题》《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③《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综述》《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

④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8页。

⑤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页。

⑥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9—250页。

⑦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页。

⑧陈独秀：《谈政治》《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⑨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

⑩陈独秀：《告做劳动运动的人》《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3页。

⑪《中国共产党宣言》《“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⑫《中国共产党宣言》《“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

⑬《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

⑭朱文华：《终身的反对派》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第176页。

⑮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7页。

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

⑰陈独秀：《谈政治》《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9—164页。

⑱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7页。

⑲《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10页。

⑳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

㉑《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页。

㉒李达：《陈独秀与新思想》《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页。

㉓《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页。

㉔《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页。

㉕李达：《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负责同志的信》《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81页。

㉖《“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页。

㉗《“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3页。

㉘《“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4页。

㉙《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56—357页。

㉚《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678—679页。

㉛《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684页。

㉜施复亮：《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页。

被湮没的陈独秀伟大思想光辉

常 征

一、时代巨变要求研究视角的转变

近些年来陈独秀研究比较活跃,出现不少新成果,学界重新认识陈独秀先生,对他的评价也随之发生很大变化,尤其在社会民主化进程中,在民主宪政建设中,人们重新发现了陈独秀思想的重要而独特的价值。

5月27日正是陈独秀先生逝世纪念日,我们深切缅怀中国民主政治、和谐社会建设的这位伟大先驱者、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思想家。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人们对陈独秀的认识和评价就愈会发生更大变化,就愈日趋正确认识。

陈独秀先生一生充满着传奇色彩,从北大名教授、著名语言学家,到新文化运动旗手、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共产党五届首领,再到右倾机会主义者、托派领袖、民主社会主义者、中共最大反对派……多种角色都具有其重要价值,而且随着社会发展人们愈会发现其每个角色都有着不寻常的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

陈独秀先生一生坎坷曲折,却始终执著追求真理,充满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激情和伟大人格。他从激进民主主义者到暴力社会主义者,最终成为民主社会主义者,从信仰马克思主义到扬弃马克思主义,完成了中国知识分子从暴力革命理想到社会民主建设的伟大转变,成为后世不朽楷模。

陈独秀先生1942年逝世至今已过去56年,期间世界形势和格局发生了巨变,这些历史巨变愈加证实了陈独秀先生晚年思想的正确性及其伟大光辉!陈独秀先生辞世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政治发生最明显、最深远的巨大变化:

一是,自19世纪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起、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夺取政权及其所席卷多国、轰轰烈烈的上百年“共产国际运动”,到1990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以及东欧所有共产党政权全部倒台、“国际共运”破产灭亡,正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历史悲剧:自称代表人民的共产“人民政权”竟被各国人民纷纷推翻!几代人为之终身奋斗的“革命事业”以及几千万人抛头颅洒热血铸成的“社会主义”竟在一夜间化为泡影。苏联和东欧各国人民均毫无例外地纷纷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民主宪政道路。毛泽东先生在世时尽管尚未出现“社会主义”全面崩溃败局,但他老人家晚年已不无哀叹地叹息:“马列也被人打得粉碎了。”

二是,自19世纪末以来一百多年的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苏联和东欧的历史变化已证实:依靠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革命”所建立的均是封建专制政权,均与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者”所毕生为之奋斗的“人民当家做主”的崇高民主理想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美好信念背道而驰,而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苦苦努力仍处于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水准低下之落后状态。而长期被指责为“资产阶级”的“腐朽政党”、“腐败政权”却已“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转变为全民普选的民主宪政制度,且在经济上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生活富足自由安乐,社会日趋和谐公正。即便“代表资产阶级反动派”的蒋经国先生晚年开放党禁报禁,也走上了民主宪政、社会快速良性发展道路,开创了中国数千年以来第一个民主宪政的典范。孙中山先生一个世纪前制定的建国大纲“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终于逐步得以实现。

上述变化均为活生生的历史现实,却至今都令学界噤若寒蝉,不敢正视,从而使学术研究蜕化变质为政治研究。面对世界形势巨变、社会变迁,诸多专家学者依旧用一百多年前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那套破坏性理论、恶斗性理论、毒化社会和恶化人性的理念去做学术研究主导思想,这和陈独秀先生敢于正视社会现实、不断追求真理、敢于说真话的崇高学术品质和伟大人格精神相去甚远。

二、诸多过去被曲解的“错误思想”如今重放伟大光辉

50多年前陈独秀先生便以大学者、大思想家的远见卓识、敏锐的洞察力、大无畏气概,提出了一系列

光辉思想,成为后人的深刻思想宝库。我认为至少有几个关键问题值得重新认识:第一,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正是为建立民主宪政迈出的第一步。

陈独秀从大革命初期“二次革命”主张,到北伐战争时期“放弃领导权”、提出“让步”政策,长期以来被视为“右倾机会主义”而受到批判。其实,陈独秀的“让步”政策如能实现作为反对党合法存在,那么将成为共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势必加快中国民主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妥协”实际上是社会各派政治力量重要的运行方式,强调“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夺取政权”并非善举,并非是建设民主宪政社会的最佳途径。但是党的领导集团未能理解陈独秀,“八七会议”撤销了陈独秀领导职务,可惜历史没有给独秀先生这个机会!“八七会议”却使洪秀全式农民起义的革命暴力占据主导地位,从而改变了历史走向。

长期以来凡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主张暴力革命道路。然而,半个世纪后苏联和东欧的历史实践已充分证实,凡是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所建立的毫无例外均为封建集权政权,最终还是为人民所推翻所抛弃,使历史曲折迂回了七八十年。

第二,陈独秀先生是共产党阵营中第一个反思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不朽世纪伟人。

1940年他在《我的根本意见》一文中对苏联共产党以及共产主义运动做过深刻揭示:“无产阶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清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民主信念是陈独秀一个突出思想特点。他明确指出:“民主主义是自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陈独秀先生深刻地指出:“应该毫无成见的领悟苏俄廿余年来的教训,科学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不能一切归罪于斯大林,例如无产阶级政权之下民主制问题。”他在50多年前就独具慧眼地看到了“暴力革命”症结所在,他指出“在政治上毁灭民主制,回复到中世纪的黑暗,即使不很长久,也是人类可怕的灾难和不可计算的损失。”

然而,多年来国人紧跟时髦政治,无法理解并曲解陈独秀思想,还持激烈批判态度,这皆反映出国人长期蒙昧,才导致把陈先生这些伟大光辉思想当做“反面教材”半个世纪之久。自1911年清王朝灭亡以来已近百年,而国人却仍沉湎于大清王朝类似体制之中,当今文人思想理念竟比清末时期还落后不少。

第三,陈独秀从共产党创始人、党的五届首领到最大反对党领袖,恰恰反映出一个正直知识分子执著追求真理的伟大思想转变,昭示出中国乃至人类的正确发展道路。

陈独秀是个卓越的学者、伟大的思想家,他处于清王朝衰败、民国崛起的新旧交替时代,身处军阀混战、党派纷争的漩涡中,他能如此坚守自己信仰而不崇尚权力,更非“暴力夺权”,能如此面对历史实践情况而不囿于马克思主义教条,尤其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他被撤销中共总书记职务、1929年被开除出中共后,在无稳定经济收入、颠沛流离的窘迫生活状况下,依然坚持自己信念,弘扬救国救民的政治理念,竟单枪匹马与多方面强大势力论战,不断撰写文章、发表意见,并试图组织“不拥国,不阿共”的第三势力,依然苦苦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体现出中国高级知识分子难得的铮铮铁骨、崇高社会信念和高度社会责任感。

纵观陈独秀先生一生,经历坎坷,曲折多姿,他的崇高人格、光辉思想、顽强意志为后人所崇敬,他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财富。

陈独秀,乃“独秀”中国也!他必将“独领风骚两百年”: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他坎坷曲折,多彩斑斓,系引导中国潮流之思想先驱;在未来的一百年里他将波澜起伏,启迪新天,乃后发中国崛起之思想柱石。总之,他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思想源泉!

秉笔直书写伟人 敢当华夏太史公

——从写《胡耀邦传》想到写《陈独秀正传》

湖南党史人物研究会 陈利明

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大家好！我怀着无比激动和喜悦的心情，向大家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祝福！衷心祝贺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30余年来，我在新闻、党史、文艺三条战线的工作经历，为文史结合的创作道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已撰写出版了《程潜传》、《陈明仁将军传》、《谭震林传奇》、《王首道传》、《胡耀邦传》（上下集），另有3部纪实文学专集《名人风采》、《名人心迹》、《名人忧乐》出版，计400余万字。

我深切地体会到，要写好领袖人物传记，特别是有争议的领袖人物传记，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敢于维护真理，敢于排除各种阻力和干扰，“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1988年，当我开始采访和撰写《胡耀邦传》时，一些好些人关切地对我说：“胡耀邦是有争议的人物，你写他会有很大风险，甚至有‘文字狱’的危险。”我坦然回答：“要向司马迁学习，他不顾宫刑，写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作为共产党人，更要甘冒风险，敢于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不溢美，不隐恶，将世纪风云凝于笔端，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胡耀邦任党中央总书记7年，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建立的丰功伟绩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公道自在人心，历史定有公论。”于是“我行我素”，不管遇到多大风险，我决心将这本文学著作展示在世人面前。

为了详细、全面地占有传主的材料，要求传记作者长期、深入、艰苦地进行采访，作者必须做到四不怕：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冷脸挨热脸、不怕吃闭门羹。做到六多：多跑、多看、多问、多听、多想、多记。做到四勤：腿勤、口勤、眼勤、笔勤，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努力完成征集、采访任务。为写《胡耀邦传》我采访了他的上级、战友、同事、部属、亲属不下百人次，走遍大江南北，天涯海角，四处奔波。如为采访、征集胡耀邦在团中央的事迹，团中央先后有12名书记，我采访了8位，即冯文彬、胡克买、李昌、王照华、罗毅、刘导生、项南、王伟等；为了征集他任中组部长时平反冤假错案的事迹，采访了李锐、陈野萍、曾志、王照华、郑伯克等5位副部长；为了了解他在革命战争时期事迹，我采访了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副总理耿飚、总参谋长杨得志等；对他的亲属李昭、胡德平等更是多次采访。还采访了他的几位大秘书，如原中央党史委副主任李传华、中央统战部第一副部长梁金泉、中央文献室原秘书长高勇、原团中央办公厅主任严如平等；为了解他对知识分子关心，我采访了臧克家、贺绿汀、新风霞、张黎群、邢方群、李立、张扬等。为了解他领导新闻舆论、科技战线的事迹，采访了《人民日报》原正副总编胡绩伟、秦川、经济学专家于光远等；为了写他的下台内幕，采访了中组部原常务副部长李锐、中纪委书记李昌、总参谋部原政治部主任冯征、全国政协副主席、中顾委常委王首道、原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习仲勋等，收集的文献资料和口头资料不下千万字。有时上午采访一个，下午采访一个，晚上还采访一个。几十年来，我没有什么节假日，更不打扑克、搓麻将，我也没有学会搓麻将、打扑克，现在仍然如此。我虽然活得很累，但乐此不疲，决心做到生命不息，笔耕不止。

2005年11月，在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前夕，我写的《胡耀邦传》（上、下集）在香港出版后，在世界上引起轰动。香港的媒体以“十年磨一剑，天下最权威”为题，报道说：“今年（11月）是胡耀邦诞辰90周年，胡耀邦同乡作家陈利明（黎明）历时10年，从中央到地方采访近百位知情人士，写成鸿篇巨制80万字《胡耀邦传》，带给读者许多不为人知的胡耀邦史实。”正如《亚洲周刊》所云：“这是迄今一本最权威、最全面、最真实

和最详尽的胡耀邦传记。

本书向世人披露：

胡耀邦仓促下台之谜

胡耀邦猝然死亡之谜

胡耀邦安葬江西之谜

胡耀邦活在人心之谜

胡耀邦与邓小平关系之谜

胡耀邦与胡锦涛关系之谜

本书由胡耀邦夫人李昭题辞，由李锐题写书名。”

此书因为是在中央召开纪念胡耀邦诞生90周年会议之前出版的，引起国内和国外的强烈反响。有关领导找我谈话，叫我赶快将“三不精神”（不入关、不再版、不要扩大影响）告诉出版方，香港某出版集团便将此信息捅出去，《亚洲周刊》以一个整版篇幅，以“胡耀邦传记被禁内情”为题进行报道，声称我与总策划受到中共当局“警告”。其实至今我并未接到正式“禁令”。“美国之音”、“香港电视台”、“凤凰卫视”等媒体予以报道，还有加拿大、日本等多家媒体要采访我，我都一一拒绝，作低调处理。一位外国记者在电话中说：“有报道说你失去自由，受到监视，若如此，我将报道出去，向世界求援。”我回答说：“没有这回事，我很自由，毕竟中国在不断推进民主和法治建设。”网上的评论文章连篇累牍，评论纷纭，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当时我感到大祸临头，心烦意乱，但坚信我国是民主、法制社会，作家有创作自由和人权保障。“文革”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文革”的悲剧不会重演，充其量开除我30余年的党籍，总不会让我当“张自新第二”。为了坚持真理，何足惧哉！当时我立即向党中央有关领导求助。他回答我说：“千万要沉着、冷静，中央马上开会，等中央召开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会议后，一切就会归于平静。”果然如此，中央会议由吴官正主持、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出席，曾庆红作报告，对胡耀邦作了高度评价，恢复了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来面目。我也有惊无险，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李锐祝贺说：“全世界你第一个写了最详尽、最全面的《胡耀邦传》，就是胜利，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你作为一名有良知的作家，应该永远眼观世纪风云，笔写时代春秋。”北京著名书法家张济生为我题词祝贺：“勇为时代弄潮儿，敢当华夏太史公。”（此书仍在香港畅销，远销世界许多国家，但不能随便入关。）

从写《胡耀邦传》，我受到深刻的启示，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决心再接再厉，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写好《陈独秀正传》。

我在写《胡耀邦传》第十七章“高风亮节永留芳”中，写了一节“公正待人”，兹将其中有关部分摘录于下：

“胡耀邦在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和总书记期间，曾兼任中共党史委员会领导成员之一。在1980年3月29日，他亲自主持召开筹建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会议，明确规定这个研究机构的职能、义务，特别强调在撰写党史事件和党史人物时，一定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实事求是，正确评价历史人物，不溢美、不隐恶，公正待人，还历史本来面目。中央党校组织编写党史教材，中央组织班子起草《历史问题决议》，都根据他的指导原则和指导思想进行，得益于他的帮助和教诲。

1984年初春，陈独秀的一个后代向中央提出恢复陈独秀党籍的意见。中央书记处专门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认为不应当恢复陈的党籍，但指示中央党史研究室写一篇评价陈独秀一生活动的文章，澄清过去的历史是非，使这个党的重要历史人物得以恢复其本来面目。当时，胡绳作为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亲自指导并参加了这篇文章的写作。此文最初由党史研究室的王洪模教授起草，经过反复多次的大修改，形成两万多字的送审稿，上报胡耀邦、胡乔木。那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已达6年之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为尊者讳”，积重难返，党中央虽然改正过去对陈独秀的评价不谈或少谈陈独秀的历史功绩的缺点，破除了强加于陈的“汉奸”、“特务”等十分荒谬的政治诬陷，但在几个重大历史是非功

过的问题上,舆论界、学术界一般仍然是因袭旧说,很难重新根据历史事实完全改变不当的评价,起草这篇文章的人虽然想在评价上尽力做到客观公正,但受到当时材料的限制,还是有责备过严过苛的地方总要留一个“尾巴”。这种情况引起了耀邦的关注,他在阅读送审稿后不久就召集了一个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会议于这年11月23日召开,参加的有胡乔木、胡绳、郑必坚和郑惠。胡耀邦在会上反复强调对重要的历史人物的评价一定要非常慎重。他特别提到鲁迅临终前写的纪念章太炎的文章,叫大家从中吸取教益。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说:“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成为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六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模范。”胡耀邦在引述鲁迅的这些警策的文句时,很有感慨地说:要学习鲁迅的这种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的科学态度。他认为对陈独秀复杂的一生,应当根据详尽确实的材料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得出正确的结论。过去很长时期对陈予以全盘否定是不公正的,陈在本世纪的最初二十几年为中国革命建立了很大的功劳,后来犯了错误,但也不能将大革命的失败完全归咎于陈。当时敌强我弱的阶级力量对比形势十分悬殊,我们却又处在幼年时期,缺乏革命经验,即使是中央领导人在理论上政治上也很不成熟。加上共产国际脱离实际的指导,在这种条件下,陈独秀是很难不犯错误的。胡耀邦主张写陈独秀这种对革命有过很大贡献的历史人物,要像鲁迅写章太炎那样,有一种深远的历史眼光,深刻吸取历史教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使后人受到教益。

胡耀邦的真知灼见,客观公允,高瞻远瞩,符合历史事实,为如何评价历史人物指明了方向。经过胡耀邦这样一番指点,文章的作者将这篇文章作了许多修改,以《关于陈独秀一生活动的评价》为题,在1985年9月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相当细致地分析了陈独秀一生的思想和活动,就他几个时期对于革命的功过作了有褒有贬的评价,指出:陈独秀一度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杰出人物和中共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他在推动中国历史前进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后来走上错误道路。他的错误是在中国复杂的历史条件下犯的,除了他主观的原因以外,也有当时历史条件的某种影响。文章最后说,我们在深刻认识他犯过的严重错误的同时,还要回顾他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建党初期和大革命前期、中期的功绩,“把这些作为历史财富继承下来。”这篇文章虽然还有许多不足,但在推动对陈独秀的科学研究和公正评价方面,起了首创作用。

胡耀邦当时处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之中,居然抽出宝贵的时间来仔细阅读这篇历史长文,专门召集会议讨论改进文章的写作。就像他为了平反万千冤假错案而敢冒风险一样,为了恢复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他排除重重阻力,勇往直前,这是一种什么精神?是一种对事业、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一种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胡耀邦虽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也不可能花很多时间去研究大量的历史材料,但是他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党内斗争经验,因而能够敏锐地察觉陈独秀评价上的问题。随着岁月流逝,历史沉淀,在大量新发现的材料包括苏联的档案材料翻译出版并经过学者、专家深入研究之后,充分证明过去党对陈独秀的评价有很大的片面性,有大加改正的必要。现在,回溯20年再看胡耀邦在1984年的这一行动,不能不令人赞叹他胸怀的宽阔和眼光的远大。他不愧为独具慧眼、厚重公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胡耀邦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公正待人。有段时期,党史界、文艺界、哲学界出现对待历史人物不能“一分为二”的偏向,若前半生有功、后半生有过,就被全盘否定;若前半生有过,后半生有功,就被全盘肯定,说成一贯正确。甚至出现歪曲历史人物的现象。据此,他多次强调要“一分为二”,客观公正,1986年1月12日,胡耀邦对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的一个报告作了重要批示。他指出:“作家创作以党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党允许作家在风格和艺术上的自由选择,不要干预,但在这类作品中,特别是在文学传记作品(包括小说、戏剧、电影、电视片)中,不应虚构重大的党史史实,对党的历史人物的描写,更不能歪曲。因为这不是什么艺术领域内的是非问题,而是政治领域的是非问题,也是作家的社会责任和职业

道德问题。对此,党员作家必须模范遵循,不能含糊。”

胡耀邦的重要讲话振聋发聩,引起我的深思: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已达6年之久,虽然党中央及党史界对陈独秀的评价较之过去那种只贬不褒有所改进,取掉了强加在他头上“汉奸”、“特务”“反革命”之类莫须有的罪名,但在重大历史是非功过问题上,仍然“因袭旧说”,未能重新根据历史事实给陈独秀以公正的评价。时至今日,我们应该还历史本来面目,给陈独秀正名。从此,我决心不畏任何风险,写出一本符合历史真实、客观公正的《陈独秀正传》。

决心已定,立即行动。2005年10月,当《胡耀邦传》在香港出版后,我便制定写“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一至五届总书记——《陈独秀正传》”的宏伟计划。这是一项艰巨的浩大工程。近几年,为收集有关陈独秀的文献资料、学术论文和口头资料,先后到陈独秀的家乡安庆、合肥、南京、俄罗斯、北京、重庆、江津等地,广泛采访陈独秀的亲属、研究陈独秀的专家、学者以及其他知情人,全面征集有关史料,受到安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的领导李银德、邵华、张皖生、市政协文史办主任滕秀丽,安庆师院学报主编余昌谷、副主编汪祚民、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聂皖辉、办公室主任李茂辉、合肥工业大学教授、陈独秀的孙子陈长琦、安徽大学教授沈寂、徐承伦、南京大学教授奚金芳、南充大学教授丁弘等研究陈独秀的专家、学者的热情接待和鼎力支持,他们将多年的学术成果、收藏的珍贵史料无私奉献给我。尤李银德主任为我穿针引线,联络采访,提供方便,将自己珍藏的十余本有关陈独秀的传记史料、《学术论文集》、《独秀文存》、《陈独秀著作选》等,毫无保留地复印给我。丁弘教授曾多次寄给我他写的《探访陈独秀》、《往事》等专著,他的人格魅力和敢为天下先的凛然正气,为我写《陈独秀正传》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特地赴南通专程拜访他,亲聆教诲,获益殊多。奚金芳教授不顾老弱之躯,及时寄来有关陈独秀弥足珍贵的学术论文和专著,使我获益匪浅。在此,我向热忱支持我的各位专家、学者,致以深深的敬意和谢忱。

目前,我已收集有关陈独秀的史料和论著不下千万字,为我写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透过这些瀚如烟海的史料,我坚定了从实际出发、写出一个真实的陈独秀、给他以公正评价的信念,坚信“历史定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

陈独秀不愧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的伟大旗手,他开启了中国20世纪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他提出的“民主”与“科学”两大任务,迄今还是我们党继续努力的奋斗目标。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开天辟地”第一人和首要功臣、功大于过的中国共产党的鼻祖,却长期蒙受委屈,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特别是长期窃踞要职、一贯搞阴谋诡计的康生,于1938年1月无中生有地把陈独秀硬说成是“领取日寇津贴的汉奸。”这纯粹栽赃诬陷。在“文革”中,林彪、“四人帮”煽动极左思潮,胡说陈独秀是“投机革命”、“混入党内”、“窃取了党的总书记”,诬蔑他是“尊孔派”、“投降国民党当特务”等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虽然党史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做了大量的拨乱反正工作,但不少论著仍囿于过去的因袭观点,不敢冲破“禁区”,未给陈独秀进行全面公正的评价、彻底恢复名誉。

1981年6月,党中央正式公布了毛泽东在1945年4月21日在《“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表明确认这篇讲话中对陈独秀功过的评价。毛泽东在讲话中说道:“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才成立了党。”

毛泽东还在1942年3月3日中共中央学习组发言时,就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说了一段这样的话:“五四运动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有了觉悟,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1921年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现在,距离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已66年,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已经近30年,我认为现在应该是为陈独秀彻底正名、恢复本来面目的时候了!我完全同意丁弘教授在《探访陈独秀》一书中发出一个有良知、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共产党人发自内心的强烈呼声:“人们理所当然关心陈独秀的复出。这是政治品格的苏醒,是民族道德底线的提升。它是新世纪地平线上升起一缕新的曙光。”丁弘先生正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哲思的眼光,用辩证的方法,从陈独秀长期以来蒙冤受屈的国际与党内的根源上,去解开一连串的症结,特别是从陈独秀桀骜不驯的性格和“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的高风亮节上,去为陈独秀正名,拂去历史的烟尘。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和后来创立的中国共产党的五届总书记,是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先驱者,是一代风云人物杰出的代表,是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向封建主义旧礼教、旧道德宣战的先锋,是一直保持独立性人格、民族气节、张扬自主精神的伟人,是新论蜂涌、气势磅礴、志壮情豪、富于鼓动性、号召力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为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推动中国历史的进程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不愧为“开天辟地”的一代伟人。

我也完全同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著名研究员石仲泉同志在“从党的五大到八七会议学术研讨会”上所作学术报告中的精辟论述,他在文中的末尾大声疾呼:“现在到了全面评论陈独秀功过的时候了。2009年是陈独秀诞生130周年。我们党史界从现在起就应当着手准备,为推进给陈独秀平反、恢复党籍和召开纪念学术研讨会等活动作点工作”。

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和有良知的国家一级作家,我强烈呼吁:勇为时代弄潮儿,敢当华夏太史公。英勇无畏,敢于冲破一切“禁区”,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共产党的真正创造者、一至五届总书记陈独秀正名!为恢复他亲自创建的共产党党籍、恢复他的历史本来面目而奔走呼号,为昭雪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作出应有的贡献!谢谢大家!祝各位幸福安康!再创辉煌!

陈独秀先生还需要平反吗？

江南大学 刘焕明 侯 玉

内容摘要：陈独秀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不是最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正是陈独秀的魅力所在。陈独秀已经摘掉了汉奸、叛徒等帽子，从这个意义上讲，陈独秀也无需再平反。把陈独秀作为一位客观历史人物进行研究却更有意义。

关键词：陈独秀；无需平凡；启示

一、陈独秀的另一种魅力

陈独秀是对近代中国发生了重大影响的少数几个顶尖人物之一，围绕他的思想、学术、生活等多方面的讨论和争论，多年来几未平息过。陈独秀先生乃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但不是最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我看来，这正是陈独秀的魅力所在。陈独秀鼓吹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中国共产党有功，大革命后期右倾妥协有错，大革命失败后追随托洛茨基组织中国托派有瑕，出狱后未去延安有憾。

（一）青年领袖陈独秀追求民主、献身真理，是一位大思想家、大政治家。

创办《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发起五四运动，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一系列改变中国历史走向，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历史事件都与陈独秀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陈独秀是这一系列事件的主要发动者和领导者，在这些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事件中都起到了主要作用。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开创了历史的新时代。新文化运动传播世界先进文化思想，鼓吹新思想、新文化，培育了一代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精英。新文化运动开启民智，振奋国魂，倡导文学革命，推广白话文，有助于政治、文化、科学知识的普及，把我国文化迅速推向前进，利在人民，功在千秋；它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以开放性与批判性的根本立场反思中国文化，为我国走向现代化鸣锣开道，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准备了思想、文化和干部条件。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勇猛冲击，形成一场前所未有的启蒙运动和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如毛泽东所说：“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①。

十月革命之后，新文化运动进入了新的发展境界，以着重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为重要内容。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陈独秀逐渐否定过去信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开始转向科学社会主义，并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传播，通过对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学习，通过中国工人运动的实践，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步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必须像俄国那样，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经过酝酿和准备，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陈独秀为书记。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大会选举陈独秀、陈独秀担任党的书记。陈独秀创建中国共产党，开创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这在中国历史上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二）对陈独秀的错误我们应该客观对待。

大革命中右倾妥协有错。大革命后期和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犯了严重的右倾妥协错误。其主要是：第一，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作出错误的判断。陈独秀认为，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治及经济状况，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全民族各阶级共同起来谋政治经济之独立”的“国民革命”，革命的前途“自然是资

产阶级的胜利”。第二，否认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他认为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虽然是重要分子，但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中国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斗争需要和可能。陈独秀既然在理论上如此低估和轻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作用，那么，在实际工作中，自然会采取不依靠工人阶级和放弃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权的政策。第三，低估了农民的革命性和革命要求。他认为号召开展农民运动，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由于不了解农民问题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陈独秀也就不懂得农民是工人阶级最广泛最可靠的同盟军。第四，过高地估计了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他认为资产阶级的力量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不能忽视资产阶级。

大革命失败后追随托洛茨基，组织中国托派组织有瑕。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取消主义者。他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它对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陈独秀断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只能进行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被称为“托陈取消派”。1929年8月5日，陈独秀给中共中央常委写信，要求中央接受托派的主张，改变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中共中央对陈独秀进行的多次警告，陈独秀均拒绝，并坚持错误立场，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于同年11月15日被开除出党。12月15日，陈独秀纠集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公开打出“左派反对派”的旗帜，攻击党的政治路线。在1931年5月召开的托派统一大会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成为书记处书记。

抗战爆发，陈独秀出狱后未去延安有憾。1932年10月15日下午，由于叛徒告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入狱。蒋介石下令把陈交由法庭审判。陈独秀在监狱蹲了5年，直到抗战爆发后，才从监狱里出来，从武汉至重庆，后来居住于四川江津。他时刻关注抗战的发长，关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但是，在抗战期间，他始终未去延安，也不向党中央写检讨。1937年年末，中共中央让董必武去找陈独秀，表示欢迎陈回党工作，但要他先书面检讨自己的错误。陈独秀拒绝检讨，他认为“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②没有回到党内，没有去生机勃勃的延安，终究是一大遗憾。

二、摘掉汉奸、叛徒帽子的陈独秀已无需平反

2002年唐宝林发表在《纵横》的长文“学术界正确评价陈独秀的艰难历程”里概括加诸陈先生头上的帽子有九顶之多：“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③。唐文令人信服的证明了，这些罪名均不成立，实际已被摘掉。八十年代中期，首先摘掉的是“汉奸”的帽子。1936年有人说“中国的托派是拿着日本人津贴的汉奸”，“陈独秀就是拿着日本津贴的汉奸”。1938年1月，康生在《解放》周刊发表的文章《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斯基匪徒》，矛头直指陈独秀是汉奸。后来研究者根据文献材料，把陈独秀“汉奸”的帽子给摘掉了。事实上，不仅“汉奸”论毫无根据、子虚乌有，而且相反的，陈独秀发表了许多关于抗日的言论和主张。《毛泽东选集》原来的版本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有一个注释，原来的注释说托陈取消派是说托洛斯基分子、汉奸，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那个注释改了，就是原来托陈取消派是日本汉奸，是根据苏联审判托洛斯基分子的错误结论得出来的，等于就给翻过来了，这顶帽子就给摘掉了。

“叛徒”的帽子，更是子虚乌有。所谓“叛徒”，一个是抽象地说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把领导权拱手让给国民党新右派，出卖了革命；还有就是说他一九三二年被捕，被关到国民政府监狱，做了叛徒。陈独秀在狱中被关了五年，直到一九三七年才被释放，期间没有发生任何因为陈独秀的被捕而使中共首脑机关或其他机关遭破坏的事情。相反，在出狱以后，蒋介石一度邀请陈独秀出任教育部次长均被他拒绝。所以，这顶帽子在八十年代初期也摘掉了。

2008年1月《上海党史与党建》上，石仲泉的长文多处论及陈独秀先生，提出：“陈独秀功大于过，应予平反、恢复党籍、郑重纪念”^④内容丰富，论证翔实。读来颇为受益之余，又有了些不是不同看法的看法，又值安庆会议相邀，遂草成微文，略抒胸臆，一呈为快。杨奎松在其《5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一文中指出：“历史研究本身既不是为谁找说法，也不是为谁讨公道。所谓‘拨乱反正’，不过是特殊历史条件下

历史研究的一种附带的功效罢了,它并不是历史研究本身应有之义。但80年代的中共党史研究却可以说基本上处于一种“拨乱反正”的阶段。好在这种“拨乱反正”对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的推进,是具有相当积极的作用的。这是因为,不管人们怎样理解这四个字,这时的所谓“拨乱反正”,实际上并不仅仅是针对文革中那些胡编乱造的“两条路线斗争史”而来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建国以来中共党史研究中所存在的种种背离实事求是精神的错误倾向而来的。”

平反是政治色彩浓厚的思维方式,党的决定也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做出研究的。我们要做的就是从纯学理的角度来分析,以陈独秀这位近代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为例,认识历史,服务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讲,把陈独秀平反成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没有必要;从执政党的最高层面上的确没有过郑重和隆重的纪念,但来自海内外多方面的纪念和研究从未间断,对陈先生的纪念从来都那么郑重、隆重甚至有些悲壮!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某些纪念活动有意义得多。对于我们研究者来说,把他作为一个客观历史人物由后人进行研究即可。

石仲泉老师呼吁为陈平反是扬陈先生,我言陈勿需平反绝不是贬陈先生,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扬。诸位以为然否?

三、启示

(一)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长期、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我们党早期的许多领导人都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陈独秀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代表,在建党初期就担负起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任。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中国现象,解决中国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门。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国近代史上国际共运史上、中共党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对于推进我国的社会进程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他对中国国情,中国社会各阶级的革命态度,中国的发展道路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对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分析。1922年6月,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政治声明,明确提出:“虽然辛亥革命推倒了几千年因袭的帝政,但是最后因为与北洋军阀的妥协而失败,使中国成为半独立的封建国家,处于国际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之下,明确提出了中国的社会性质。”^⑤陈独秀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的论述直接影响了党对这两个问题的看法,对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所提到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性质产生了引导的作用。正是在陈独秀起草的这个文件的基础上,1922年7月的中共二大上通过了由陈独秀起草的大会宣言,在中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在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处理的妥当与否,对中国未来命运的走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面临着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问題。陈独秀在这一问题上的论述对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也产生了深远影响。1922年4月,陈独秀发表文章《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从政治态度和经济地位上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划分为三个部分:革命的资产阶级,即赞成革命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即官僚资产阶级;非革命的资产阶级,即对革命采取消极态度的小资产阶级。^⑥在分析资产阶级组成的基础上,陈独秀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幼稚。陈独秀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论述包含了党以后对待资产阶级的许多正确思想,为以后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对资产阶级提出又联合有斗争的政策提供了基础。

对中国革命发展前途的分析。陈独秀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陈独秀对于中国革命发展前途的论述在党的二大上通过,形成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才能在党的成熟时期提出“两步走”的科学思想。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对中国的国情,中国社会各阶级的革命态度,中国的发展道路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对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创立都起到了引导和启发的作用。但是由于历史的

原因,他的这一作用并没有得到肯定。由于受到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局限,陈独秀不可能对中国问题研究比较深刻,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但是,他研究问题的方法,以及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最终形成的引导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二)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

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是陈独秀一生坚守的基本思想,更是他晚年的民主主义思想的闪光点。陈独秀对中国民主问题的反思开始早,时间长,文字多,思想深刻,因而非常有价值,值得我们学习、研究、分析和借鉴。

关于民主政治的内涵。陈独秀认为“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是: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⑦

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陈独秀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发掘了民主,发展了科学,使人类大踏步前进。陈独秀认为“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⑧

关于无产阶级民主。陈独秀指出:大有利于多数人民利益,就是最好的阶级立场,民主与科学大有利于中国人民,当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他认为所谓的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的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

关于无产阶级独裁。陈独秀总结了斯大林独裁的反面经验,从而驳斥了所谓的“无产阶级独裁”。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有国有工业、军队、警察、法院、苏维埃选举法这些利器在手,足够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用不着拿独裁来代替民主,独裁制是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会用之杀自己。关于苏联和斯大林问题。

关于苏联和斯大林问题。陈独秀在其生前最后一篇论文《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中,高度赞扬了列宁时期的苏俄,强烈谴责了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陈独秀批判了斯大林独裁,并上升到制度的高度,指出斯大林的罪恶完全是由苏联的独裁制产生出来的,应该从制度上解决民主政治问题。

陈独秀晚年对民主的探究和思考,体现了一位东方启蒙思想家和社会主义者在独裁逆流中对民主理想的执着追求。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政治思想,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对民主政治的深刻的思索,它不但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而且在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三)学习陈独秀的爱国主义精神,做坚定的爱国主义者。

陈独秀始终是一位怀有浓烈的爱国情怀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的爱国者。1897年,18岁的陈独秀就以饱蘸爱国热情的笔墨撰写了《扬子江筹防刍议》、《扬子江形势论略》两篇论文,希望清政府能够意识到危机四伏的现状,加强长江国防。1903年,沙俄拒不撤出中国东北,陈独秀在安庆发起成立了安徽爱国会,并召集安徽爱国人士在安庆藏书楼举行拒俄大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陈独秀敏锐的意识到民族矛盾将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他迅速地提出抗日的主张。从1931年9月到1932年7月,他发表的文章、宣言、决议和书信达38篇之多。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大举侵略,晚年的陈独秀坚持爱国主义立场,主张抗战到底。他坚决抗战,反对中途妥协。自1937年8月出狱之后,陈独秀立即投身于对抗战的宣传之中。他发表了一系列演说和论文,陈独秀积极主张全民抗战,他要求国民党政府自上而下地改革政治,解除民众痛苦,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参加抗战。他积极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认为“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主张以国民党为核心,联合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力量,共同抗日。他的这一思想,与当时的中国托派组织发生了激烈冲突,成为他晚年与托派决裂的一个重要原因。坚守民族气节,鄙视汉奸行为。晚年陈独秀不仅从未做过汉奸,相反,他始终坚守民族气节,坚决主张严惩汉奸卖国贼。对有汉奸行为的人,陈独秀极端鄙夷,即使与他有多年交情的老朋友周作人,他也毫不留情地对其汉奸行为给以蔑视和声讨。

爱国、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最主要的追求,陈独秀堪称其中的优秀代表。他的一生,始终是一位怀有浓烈的爱国情怀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的爱国者。人无完人,陈独秀是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最早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知识分子,但是他并不是最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时代,历史,个人因素综

合造就的。客观地看待陈独秀的功过,为我们思考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提供了最好的范例,也给今天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带来深深的启迪。

在思想体系的定位上,我很赞同胡乔木当年的观点,他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是这样说的:“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央的领导工作。陈独秀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以前和‘五四’运动中间以中国急进的民主派著名;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他成了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⑥这个话完全可以作如是解:陈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和幼年时期的党相联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还远远不够,与中国的实际还不可能紧密的结合。但陈独秀先生的很多观点仍然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他远不是教条式理解和对待马克思主义本身,不是盲从共产国际和苏联,他比很多“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更能够独立地思考中国的实际问题,为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去冒死拼争和奋斗。

注释:

①《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0页。

②转见冯东书《陈独秀一案有了新说法》,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

③唐宝林:“学术界正确评价陈独秀的艰难历程”《纵横》2002年第9期。

④石仲泉:“从党的五大到八七会议”《上海党史与党建》2008年1月。

⑤《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一),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3页。

⑥《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任建树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8页。

⑦《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任建树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7页。

⑧《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任建树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55页。

⑨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转见《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陈独秀社会主义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作者 =

页数 = 2 7 3

S S 号 =

D X 号 =

出版日期 =

出版社 =

书名
目录

论陈独秀社会主义思想	
陈独秀：一位勇于探索、终生不渝的社会主义先行者 & 叶尚志	
建党前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 盖军	
陈独秀对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探索 & 杨熙曼	
陈独秀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 & 聂皖辉	
陈独秀“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思想初探 & 叶庆	
二十世纪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孙中山、陈独秀、毛泽东的异同 & 沈寂	
陈独秀对社会主义与民族解放问题的见解——读陈独秀的《被压迫民族之前途》有感 & 姚金果	
堪称远见卓识的“最后见解”——陈独秀晚年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思考 & 孙其明	
陈独秀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层困局 & 冉占国	
浅议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思想 & 奚金芳	
陈独秀与中国社会主义 & 李淑嫒	
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变化轨迹 & 祝彦	
晚年陈独秀对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探析 & 张雷	
陈独秀晚年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想 & 钱让能	
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是对中国行向社会主义途径的探索 & 佟英明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之我见 & 李颖	
陈独秀的扩大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兼谈陈独秀是不是“民主社会主义”者 & 陈辽	
锐意进取 执着追求——陈独秀与社会主义 & 黄河	
从自由主义到社会主义 & 何卓恩	
陈独秀与社会主义 & 陈镜林	
陈独秀对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认识和反思 & 黄公演	
晚年陈独秀是怎样坚持马克思社会主义信仰的 & 高国发	张同
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思想的论述 & 李银德	
其它论文	
评八七会议对陈独秀的处理与批判 & 郭德宏	
简论陈独秀晚年民主观 & 贾立臣	
应该宣传和学习“独秀精神” & 王福湘	
陈独秀宗教观的变迁轨迹 & 张洪波	
陈独秀是不宽容的代表吗？——兼评胡适《容忍与自由》 & 靳树鹏	
试述陈独秀等中共三大代表在广州春园的重要活动 & 卜穗文	
朱蕴山与陈独秀 & 徐承伦	
《新青年》三个字的金字招牌——《新青年》的经营与传播策略 & 石钟扬	
还一个真实的陈独秀 & 李衍增	
陈独秀：江淮地域人精神的一面镜子 & 龚武	
不能忘记陈独秀 & 黄学诗	
试论陈独秀的武装斗争 & 彭劲秀	
身处艰难气若虹——陈独秀晚年的理论创新 & 黎化	
浅谈陈独秀、托洛茨基与中国革命 & 陈良初	
陈独秀出狱后就抗战等三问题与托派同志们的争论 & 曹家骢	叶春华
论陈独秀的妇女人权思想 & 谢一彪	欧阳云梓

陈独秀学习与研究精神刍议 & 喻国良 罗孟冬 陈晓南
从日本看对陈独秀的评价——陈独秀既不是右倾，也不是“左倾” & 横山宏章
论陈独秀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影响——兼论陈独秀何以当选“一大”
中央局书记 & 董根明
被湮没的陈独秀伟大思想光辉 & 常征
秉笔直书写伟人 敢当华夏太史公——从写《胡耀邦传》想到写《陈独秀正传》 & 陈利明
陈独秀先生还需要平反吗？ & 刘焕明 侯玉